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上册

〔美〕汤普逊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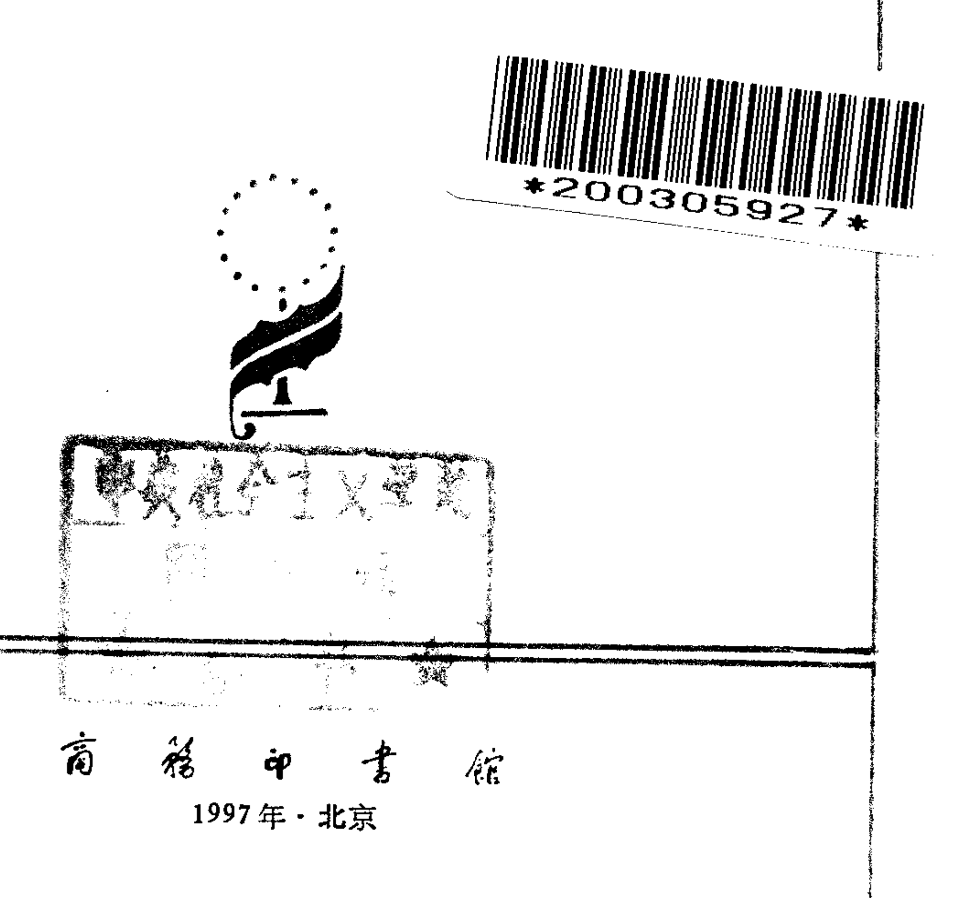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年）

上　册

〔美〕汤普逊 著

耿淡如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中譯本序言

湯普逊的《中世紀經济社会史》是一本在資产阶級史学界流行較广的书。它和另外两种資产阶級历史学者所写的中世紀經济社会史(即:比利时历史家庇倫所著的《欧洲中古經济社会史》和奥地利学者道普什所写的《欧洲文化的經济社会基础》)比較起来,在內容方面有显著的不同。庇倫对于中世紀城市起源問題,道普什对于中世紀初期德意志的經济发展問題都有自成一家的論点。他們的这些唯心史观的論点,在資产阶級史学界中有很大影响。苏联学者对于他們的錯誤观点曾予以有力的駁斥。湯普逊对于以上两种著作也不同意,但是他所不同意的只是他們处理問題的某些方法,而不是他們的立場观点(他和他們是站在同一立場,而且还吸取了他們的一部分主張)。湯普逊自称他所用的方法是"历史論述法",寓观点于叙述之中,而反对作出系統的解釋,提出鮮明的論点(見本书"序言")。比如,关于罗馬帝国灭亡这个重大問題,他既不同意以前历史家的各种解釋,也沒有专門論述自己的見解,而只是叙述了罗馬帝国瓦解的过程。他在另外一本著作《欧洲中世紀史导論》中,說出他采取这种作法的原因。他写道:"[对于罗馬帝国灭亡的原因],历史家坦白地承认他不知道。他有时能够确定事实,有时甚至能看出症結所在,但是至于分析到历史事件的为什么,他是无能为力的。"(原书第 25 頁)。因此,湯普逊这部书的特点,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提供了比較丰富的历史事实,而沒有提出什么論点。但是,湯普逊和庇倫、道普什一样,都是站在資产阶級立場,运用唯心主义方法来編写历史的,只是他的論点不象其他二人那样明显而已。至于对旧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湯普逊就比其他

二人大得多。他所編的教本《西洋中古史》，解放前曾有中文譯本(陈受頤、梁茂修譯，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館版)。不少在美国曾听过他讲課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学任教，傳播他的观点。他們所散布的影响，至今尙未完全清除。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党的領导下开展对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批判。湯普逊《中世紀經济社会史》中文譯本就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之一，帮助我們了解在世界中世紀史这門学科中正在进行着的无产阶級历史学和資产阶級历史学的斗爭；帮助我們識別哪些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观点，哪些是資产阶級的錯誤观点，从而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来对这本資产阶級历史著作进行批判，从战斗中来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来清除現今还存在着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影响。

下边对本书作者的經历作一簡单介紹，对于他的基本論点也提出一些初步意見，以供讀者参考。

湯普逊(1869—1942)是美国比較著名的現代資产阶級中世紀史专家之一。他生于美国中部的艾奧华州，1892年毕业于罗特学院，189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以后一直到1932年在該校担任中世紀史的教学工作，晚年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1942年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国宗教战爭》(1909)，《德意志封建制度》(1928)，《中世紀經济社会史》(1929)，《中世紀晚期經济社会史》(1931)，《西洋中古史》(1933)，《中世紀史》(二册，1932)，《欧洲中世紀史导論》(1937)，《史学史》(二册，1942)等书。通过这些著作和长期的教学活动，他在美国中世紀史学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湯普逊研究历史的路綫和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几个同事一样(如担任古代史的布萊斯提德，教近代史的施維尔和教美国史的惹內干等)，都是屬于所謂“新史学派”的。这个学派对历史

研究的基本主張是把历史学的范圍从傳統的狭窄的政治軍事史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在資产阶級历史学界中，这种主張是始于十九世紀末德国历史家兰普萊特（1856—1915）所提倡的“新史学”运动。經魯濱孙(1863—1936)介紹到美国，而又加以重大的改变。兰普萊特以孔德的实証主义为主导思想，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他称之为“精神生活”）分为六个阶段，而企图发現它的規律。魯濱孙則以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为主导思想，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有規律性的，并且反对把历史分成若干发展阶段，不主張以某种学說来解釋历史。而提倡“用历史来解釋历史”，“为历史而历史”。湯普逊正是属于这一派的。尽管他在本书中也搜集了若干社会經济史料，也讲了一些經济发展和阶級斗爭的历史事实，但是他所代表的資产阶級的經济社会史与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背道而馳的。

湯普逊在本书的“序言”中声明，他反对把中世紀史看成是由神学思想支配的“宗教时期”这一陈腐观点。他认为当时的天主教会拥有龐大的物质利益，絕不是一个单純的精神机构。他并且声称：“这本书的宗旨就在于叙述中世紀这些經济社会利益和活动的历史。”从这篇“序言”和全书的內容看来，湯普逊是承认社会經济的变革对历史发展是有影响的，而且也提供了一些史料。但是作者承认这一些，絕不等于作者就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上面已經提到，湯普逊这派人根本否认历史发展是有規律性的，而是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发生过程，他所强調的“社会經济利益和活动”，也不过是一堆偶然事件中一部分历史現象而已。

再就本书的年代断限而論。湯普逊在本书中是把公元三百年至一千五百年間看作是中世紀时代的。为什么公元三百年是中世紀的开始，他在本书中并未交代。从他的叙述中也看不出公元三百年前和三百年后，究竟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在湯普逊的另外一

部著作《欧洲中世紀史导論》中(1937年,紐約,英文版,这是湯普逊所著的中世紀史最后的修訂本)指出了他这样分期的理由。他写道:“到了三世紀末,所有促成罗馬文化瓦解的神秘原因都开始出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說,罗馬帝国在它存在的前三个世紀中已經走完了一个循环;現在就需要另外一个救世主,另外一个奥古斯都,来挽救它的命运。”(原书第9頁)。这个新的“救世主”既然沒有出現,龐大的罗馬帝国終于瓦解了。他在这书另外一个地方又把公元四百年至八百年时期看成是中世紀的形成时期。(原书第2頁)。

可見他把公元三百年左右(按罗馬皇帝戴克里先去位于公元305年)作为中世紀的开端,主要是按政治上的表面現象,而不是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划分的。他虽然对罗馬帝国灭亡的原因沒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那就是把罗馬帝国的兴盛和衰亡,都归結于个人的作用。足見他虽然标榜要以“經济社会利益和活动”来叙述中世紀史,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帝王将相,而不是人民群众。足見象湯普逊这样的資产阶級历史家口头上提倡“用历史来解釋历史”,“为历史而历史”,儼然只有这一派的历史观是最客观的,实际上他們的資产阶級立場,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就包含在他們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了。順便說一下,有人被他們这种資产阶級客观主义所迷惑,也跟着說什么历史学就是研究史料,历史学就是要以史料挂帅,而据此反对以馬克思主义理論挂帅。殊不知資产阶級客观主义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們正是用自己的“理論”挂帅的。我們主張論和史結合,必須充分地占有史料,仔細的研究史料,但是理論总是統帅。而且只有掌握馬克思主义理論,才能正确地处理史料。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按照社会发展阶段作为历

史分期的标准的。中世紀是封建主义在全世界絕大多数国家占統治地位的时期。湯普逊在本书中虽然也談到封建主义，并且认为封建主义具有它的社会、經济特征，但是他和其他的資产阶級历史家一样，只是把封建制度看成是一种政治組織形式（見本书第九章），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根据这个定义，他认为西欧的封建制度是从九世紀初法兰克帝国瓦解后开始的。但是作者又认为罗馬帝国自四世紀以来农奴制已經占了上风。那么自四世紀到九世紀之間，这个漫长的时期，究竟是什么社会性质呢？由此可見，尽管作者也用了不少篇幅論述封建制度（第九章、第二十六章），但是由于他对封建制度的概念是錯誤的，因此他的那些論述也是似是而非的。

湯普逊在本书中也經常提到阶級矛盾，但是同样由于概念的混乱，作者对于各个时代阶級斗爭的性质是沒有正确认識的。他把罗馬帝国末年的奴隶、隶农起义和中世紀的农奴反抗运动混为一談。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对于阶級斗爭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他在本书中虽然也提到一些人民起义，而对它們的影响却未能清楚地看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其他資产阶級历史家一样，对于重大的历史問題就得不出正确的解答。比如对于罗馬帝国灭亡的問題，上面已經提到，他一方面以不可知論的态度，认为“历史家只能坦白地承认不知道”，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在論述中，实际上是归結于个人作用的。而对于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作出科学的論断，那就是如《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所說：“奴隶主幷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統治，它的統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綿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紅旗》，1960年第8期，第18頁）。

本书名为《中世紀經济社会史》，顧名思义，本书內容应該包括中世紀各主要国家的經济社会史，但是湯普逊在本书中只叙述了

西欧几个大国，而对于东欧方面只叙述了拜占廷帝国，其余国家則未涉及。这又是資产阶級学者另外一个荒謬的看法。現代西方資产阶級学者对于中世紀史的处理，大致仍是沿用十八世紀末英国历史家吉朋在«罗馬帝国衰亡史»中所搭起的架子。但是，吉朋处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当时理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大胆揭露教会的愚昧、反动（該书第十五、十六章），在当时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而且吉朋的主題是叙述罗馬帝国衰亡的历史，因此对于东欧他只讲到拜占廷帝国的历史，这还是可以理解的。現代資产阶級历史家如湯普逊等，在叙述欧洲中世紀的历史时，对于东欧，除拜占廷帝国外，其他一概不讲，这就使人很难理解了。在中世紀时期，东欧方面的俄罗斯、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塞尔維亚等国的生产水平，文化成就，絕不比西欧英、法、德、意等国低。而作者却把东欧各国看成是在欧洲历史上无足輕重的，认为只有西欧各大国才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这种极端錯誤的反动观点是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制造理論根据的。

湯普逊在本书中所体現的資产阶級傳統历史学，和資产阶級其他学者的历史观点，在我們看来都是一丘之貉。但是在他們之間，还是有爭吵的。有一批更露骨的反动历史学者就反对湯普逊这一派的史学观点，他們认为傳統历史学所采用的考証方法和比較隐蔽的态度，未免过于繁瑣迂腐，而主張公开地任意捏造历史，創立"体系"，以为垄断資本效劳，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辯护。如美国的哥拉斯，以前也曾写过几种关于經济史的著作。但是在他后来所写的«資本主义与企业史»一书中，竟把資本主义說成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即已存在的永恒制度，把垄断資本家歌頌为历史的主人。又如英国的历史家湯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竟把西方以外的国家都說成是处在瓦解过程中的社会，并且无耻地宣称美帝国主义要統一全世界是一种不可遏阻的趋势，以为美帝国主

义妄想霸占全世界的企图制造理論根据。

湯普逊这本书是第一次大战后的产物。他还是运用了西方資产阶級历史学的傳統方法，进行編写的。我們对于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唯心主义的錯誤論点，应該加以批判。同时，也应該注意到，本书还搜集了不少資料。把他的整个体系加以批判，对于书中的資料，經过审查之后，剔除其中不可靠的部分，对于其中可靠的部分，还是可以加以参考利用的。

齐思和

1 61年6月

前　言

本書是一部从經济社会史观角度所編写的中世紀史。它既不是一篇經济学的专題論文，也不是一部社会学的研究著作。我在全書中力图避免前一类著作中常有的空論，以及后一类作品中总括性的論断。我所用的方法，是一种历史的論述法，往往敍述即是論点的表达。为了本書不致过分冗长，我故意省略了中世紀英国的一部分，除非当时英国的事情有涉及欧陆的地方。因为英文中已有很多关于英国的著作，这項省略似乎是有理由的。

今天流行的一种“新中世紀主义”和百年前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中所崇尙的“中世紀主义”迥然不同。由于經济社会史观的发展，我們已可看出：很多过去的历史曾被估价过低甚至估价錯誤。中世紀有时被称为“宗教时代”，因为在那些时代里教会拥有莫大势力而神学思想又长期占着上风。但是在中世紀欧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关心的，是求得生活資料，而他們的統治者所注意的，是从农业和工商业所产生的資財方面征取賦稅。当时，教会也享有很大的物質利益，远不是一个单純的精神机构。本書的宗旨，就在于敍述中世紀这些經济社会的利益和活动的历史。

按內容和形式說，本書是从实际課堂教学所产生的。眞的，我在这里所提供的很多材料，是在“課堂討論”中同我的学生們一起整理出来的。这样获得的知識和經驗，我想会有助于别的教师以及我的班級以外的班級。由于本書所屬丛書〔指《世紀历史丛書》——譯者〕的体例的限制，我未能广泛地引証参考資料；为了稍稍弥补这項缺点，書末附有参考書目。但是，还应指出，本書的編写是依靠广泛閱覽第一手資料，而非仅仅依靠第二手的权威作品，不

論后者怎样重要。

本書所附地图，有些是由作者自己繪制，用以解釋在現成地图册內找不到合适地图来說明的那些課文部分。繪制这些地图的用意，不是要使学生不用历史地图册，而是作为对这种地图册的补充。最合乎学生使用的，是威廉·R.錫倍德教授所編制的«历史地图册»(紐約亨利·霍尔特公司出版)。它最近已有新版本。为了学生方便起見，若干章的开端附有脚註，指出应参考的适当地图。如欲作更充分的研究，«牛津历史地图册» (R. 兰-蒲尔主編)以及«劍桥中世紀史»(現已出版五卷)各卷所附地图可資查考。还应指出，巴門梯尔的«历史画册»第一卷 (巴黎阿蒙·科林公司出版，1900年) 包括有中世紀生活的——关于农业、工业、商业、服装和风尙的出色插图。为了課堂內应用的目的，作者繪制了一幅大型挂图，由伊利諾斯州芝加哥城尼斯特洛姆公司出版 (編号：M. M. 4，或 E. E. 15)。

我的妻子曾帮助我閱讀校样，罗宾絲小姐曾帮助我編制索引，在此致謝。

詹姆斯·韋斯福耳·湯普逊

芝加哥大学

目 錄

地圖目次

第一章　罗馬帝国的盛衰*

我們应該略知罗馬帝国的經济社会結构作为一个背景，因为罗馬帝国不单单是中世紀的历史背景，而且罗馬文明的殘余大多滲入中世紀文明的成分里。罗馬創造了十分广大而又深厚的一种文明，因此罗馬国家虽然一去不复返了，罗馬法、拉丁語、拉丁文学以及好多别的罗馬文明却能保持下去，对世界发生影响。我們必須注意，不要認为罗馬只是一个穷兵黷武的軍事帝国，也不要認为罗馬文明的扩展是单純軍权的結果和单純軍权的淫威。罗馬帝国却是个从事建設工程的帝国。

罗馬的广大公路系統在罗馬帝国的商业发展上起着很大作用，可是海路的重要性也不次于陆路。地中海是罗馬扩展中的不应忽視的地理因素。这个几乎风平浪靜的海面把南欧、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欧洲海岸尤多港口。非洲和叙利亚海岸虽沒有这样良好的供应，可是有一群大小島屿在气候恶劣时期可供船只躲避之所，而且在貿易上也是經常有利的停泊港口。

从尼奥波利斯到亚历山大港需时十二天，从科林斯需时七天。从南高盧的那巴到非洲的航程，如遇到順风，仅需五天；从塞提斯到亚历山大港則需六天。从以弗所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的陆路行程当然須花費一个月的时間。在帝国的初期，在各海面上都有罗馬船舶往来航行。霍勒斯常提及大海上的漂泊商人；普林尼認为罗馬的海上貿易是它的最重要的商业。皇帝克劳第烏斯对罗馬的海上运輸的貿易和造船事业深感兴趣。尼祿和图拉眞曾改进奥斯替

* 地图：錫倍德(Shepherd)：«历史地图册»，第38—39頁。

亚、安提阿姆、奇維塔-維奇亚、安科納諸港口；安敦·庇护曾修理特拉西那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在那里，太尔人有着一个"商站"，好多儲棧、店鋪和办事处，象在十字軍时期意大利商业公司在利凡得所設的商埠那样。

現在我們还可看到有些流傳下来的关于第三和第四世紀船夫行会的重要文献；当时这些团体在帝国的大部沿海城市中都可找到。它們主要被雇佣于运入粮食，它們的經营和資本雄厚的商社相勾結着，而那些被禁止經商的罗馬元老往往是这些公司的匿名股东。大伽图就是投資于这类企业的一个人。虽有风浪的危险——而在帝国成立之前还有海盜的危険——又沒有保險制度，但是这类營业可获得很大的利潤。当时，所用的船舶有很多类型，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运云石的船只和运粮快船。在罗馬，沿台伯河畔，在阿文丁山脚下排列着一长行用扶梯伸入河中的碼头，在那里有大儲棧、倉庫、貯藏室、武器庫，来保藏所有从已知的世界各地方运来的商品。罗馬本土也有許多市場。公元前184年伽图曾建造第一所商品陈列所——商場——于公所① 內，从那时起公所逐漸变为象紐約的百老汇② 了。某些街衢专做某些商业，在罗馬城內也有为經营各种工业和工艺而設立的地段。商品和样子間的陈列，当占用人行道的时候，毕竟成为一种討厭的东西，所以多米蒂安加以禁止了。

在政府控制下的，甚至由政府专利的粮食貿易，是一种巨大而有厚利可图的事业。麦子从撒地尼亚、西西里、西班牙、非洲、尤其是从埃及輸入，埃及每年供給二千万摩底③ 麦子。琉息安所描写的一只埃及运粮船"爱色斯"号有一百八十呎长，四十五呎闊，有三重

① 公所在罗馬城市的中央，用作大会場。——譯者

② 是商业中心街。——譯者

③ Modius 是罗馬的干量名，約合英国的两加倫。——譯者

甲板，載重一千五百七十五吨。每次所載的貨物平均約值一万五千美元。当时有整个运粮船队，即亚历山大船队或亚历山大商船分队，它的船只定期开到馬尔他、里吉安和西西里各碼头。当运粮船到达鮑索里的时候，这消息馬上傳达到罗馬城。除亚历山大船队之外，从科馬杜斯(公元 180—193 年)时代起，另有非洲运粮船队、西班牙运粮船队和撒地尼亚运粮船队。所有这些运粮船只是由那些和政府签訂合同的公司来管理的。我們知道一些有关这类合同的条件。在第四世紀亚历山大船只可得4％的利潤，从非洲来的船只可得 1％。可是实际上那利潤是超过这一項数字的，因为政府供給造船木料而公司成員享有某种特权和免稅权。因此，他們終于失掉独立性質而变成为服务公家的工具了。

罗馬帝国的內河和沿海貿易虽不若海上貿易的重要，可是也很活跃。在帝国的早期，奥斯替亚港已淤塞，以致重載船舶不能越过沙滩进入。因而，在鮑索里用駁船来运送船貨；那时鮑索里已变为罗馬城的最重要港口。后来，克劳第烏斯开始在奥斯替亚建筑一个新港，后由图拉真完成。这港口叫做“港口”、“烏尔比斯港”、“奥古斯提港”。此后奥斯替亚旧港逐漸沉入沙泥中去。奥斯替亚港和后来的新“港口”都先后充滿着卸貨工人、秤手、計度員、挑夫、搬运夫、船匠、小販、封印員、公証人，等等，另加上各色各样的商人，并有一个船夫行会叫做“科狄卡里”，壟断着台伯河上运輸业。

罗馬帝国內所有沿海和沿河城市，在商业上，是依照上述形式組織的。在里昂，船夫組織了一个著名的团体。它的成員在尼姆的圓形剧場里享有四排坐位的权利，而且君士坦丁曾賜給他們武士的等級。在里昂还有两个控制罗尼河水上交通的团体，另有一个在梭恩河上。在各条可航行的河道上，也許都有类似的組織。据我們所知，高盧的都兰斯河和塞納河、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和瓜达尔

几維河、意大利的阿特里亚和佩斯奇亚拉、加达尔湖畔的里瓦、科摩湖、日內瓦湖、萊茵河以及卡尔斯堡的摩洛斯河畔的达謝，都有这种团体的存在。

所以，总括起来，那整个地中海区的統一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旧时的混乱情况逐步退減，而在帝国成立之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經济供求規律而自行調整的趋勢，不再被政府的人为措施弄得混乱了。那些生产商品的地方，由于交換的方式，获得了由它們的自然的和制造的財富带給它們的重要地位。毫无疑問，那些富人穷奢极欲的风气也人为地刺激了某种商品的生产。現在，即使我們沒有統計資料，尽管有这些不很均衡的状态，但我們可妥当地說，跟着帝国的成立，一种类似經济上的平衡力量占着上风，这力量并在第一和第二世紀中繼續保持下去，这种情况使我們了解为什么在安敦时代結束以前罗馬世界能享有那一般所承認的普遍繁荣。

公共建設不仅在罗馬城內，而且也可以在各省的許多城市里看到；这些城市的遺跡迄今还有存在，可作为这种物質繁荣的有力証据。尼尔华和图拉眞所設立的慈善院，由后任皇帝繼續維持到第三世紀。至少在意大利，各城市必須登記生死事件，又在第三世紀，法律家阿尔匹安設計了一种死亡率表格。

在公元 200 年左右黃金时代已在衰落的时候，甚至基督教作家，如爱里尼阿斯和特图良一派人的写作，还証实了这个时代的繁荣景象。从特图良的笔下，我們可看到下面一段頌揚文字：

的确，只要放眼看一看世界，就可知道土地耕种日多，人丁日益兴旺。現在一切地方都可暢通，为人們所熟悉，便于商业的經营。現在使人愉快的田野已把一切荒涼痕跡抹去了，丛林已被剷除而代之以春耕夏耘的隴亩、牲畜成群奔逐而野兽匿跡了。沙地已經播种了，山峪碎石已經扫除了；沼地已經排干了；过去貧困的农舍所在地，現在已被大城市占据了。島屿已不再[視

若海盗的出沒之地〕認为可怕了。到处可看到屋宇、人群、文治和文明〔国家所在，生气所在〕①。稠密的居民到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世界已被我們挤滿了。自然物資已难于維持我們了。我們的欲望愈增加，而我們的需求也愈变迫切了。

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后14年）所創立的帝国对各省来說，标志着一个更有利时代的开端。这时代除了有些間断外，綿延到安敦时期的結束（公元180年）。权力集中于一个人之手，使大批文武官吏所干的那几乎不堪容忍的勒索勾当归于停止；他們的一貫作风，原是搜刮各省的民脂民膏。而且帝国逐漸抹去了罗馬公民和省区屬民之間的差別，并由于两类人民的同化，保証了省区人民可享受法律上的平等保护，特別紧急状况下的政府帮助，以及那經常而有效能的行政利益。帝国的开始几世紀，对有些地方来說，是它們历史上的最繁荣的时期。这对叙利亚、高盧、非洲和埃及来說，尤为确当。埃及的人口有着显著的增加。“罗馬和平”的利益，不仅在道德方面，而且也在物質方面；它在陆地上和海面上扑灭了搶劫和海盗行为，給生命和財产以保障，給旅行以便利。

第一世紀中，甚至象尼祿和多米蒂安一流最坏的皇帝，也切望保持各省內的良好行政。各省受苦最深的时期，倒是象克劳第烏斯那样懦弱而好心腸的皇帝的統治时期。第一世紀中除了瘋狂的加力古拉以外，沒有一个皇帝不注意于各省的福利的。提庇留、多米蒂安、图拉眞和哈德良特別关心于各省的良好行政。他們的严厉监督，使各省长官的舞弊成为一种可招致危險的行动。在帝国的早期，有着审判不良长官的很多例証。就这一方面說，甚至塔西佗也承認尼祿的行政效能。但是，罗馬帝国政府沒有揚言过，它是为了慈善和文化的利益；它沒有那“白人的負担”②的近代观念。

① “ubique respublica, ubique vita”

② 西方帝国主义者，把对落后国家和有色人种的侵略，硬說成为“白人的負担”。——譯者

它只是热衷于各省的物質发展，使它們变成为有利可图的地方。一个地区被征服以后，紧跟着的，便是开发农业、进行殖民、筑造道路、兴建港口等等事业，所以一般的結果，那被破坏地区的物質复兴，能迅速地完成。罗馬人到处应用了各种有系統的財政原則，因此在早期帝国內生产和搜刮資財之間能够保持平衡状态，使各省不致发生財源枯竭的現象。那共和国时代的包稅制度以及对各省的殘酷掠夺已被逐步消除，虽然这种恶习的完全剷除，直到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的統治时代(公元193—211年)才能做到。至于間接稅，在直接稅承包制停止以后，在有些省內，还是繼續承包。但是，所有的这些考虑，不是从什么人道主义出发的，而仅仅是为了行政效能而已。

在略述了背景之后，我們必須再談一談罗馬帝国內各地区的(虽然不是每一省的)特殊經济状况。为了这样的一种概述，我們可在下列两种叙述法之間，加以抉擇：年代的叙述法和地域的叙述法。如果采用了前一項，我們就必須分出三个时期：(1)共和国时期，(2)从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时期(公元前27—公元后284年)，(3)帝国最后几世紀时期，在西方到帝国統治消灭为止，在东方到帝国在395年狄奥多西逝世后轉变为拜占廷帝国为止。至于地域的叙述法，它似乎是比較好些，因为它具有一种优点，就是可使我們能更具体地表达，还可使我們更好地观察經济社会的轉变，而更清晰地了解各种过程。当然，由于交換品的种类繁多、市場数目的龐大、道路系統的复杂以及地中海沿岸和內地有着很多重要商埠，要詳尽地綜述罗馬帝国的內部商业，是决不可能的。

关于意大利，可以說，意大利即是罗馬城，因为差不多所有的意大利产物不是在产地消費了的，必然流入台伯河畔的那个大城市。現在我們有着很多資料，足以証明：在帝国时代汇合到罗馬的交易有莫大的数額，而罗馬城所消費的商品种类更是不胜枚举。历

史家、詩人、代人写信者、法律和銘刻都証明了这种貿易的数量、种类和价值。可是沒有关于它的性質和范圍的概論，留傳下来。

罗馬城的主要港口是那不勒斯湾上的鮑索里，可是有些商品的輸入是經过次要港口的，例如安提阿姆、奇維塔-維奇亚、安科納、奥斯替亚、布林的西、他林敦、特拉西那和基泰各港。在帝国时代意大利本部已是一个大世襲領和大地主領地的国家；大业主拥有这些土地，使用着一大群一大群奴隶来耕种，在夜間把这批可憐人关入叫做改造所的牢獄圈里。这些大領主們几乎都經营种植橄欖和葡萄并牧畜牛羊。葡萄和橄欖的种植可提供特別优厚的利潤，因为罗馬政府在三百年期間，用对别处輸入的葡萄和橄欖征課苛重进口税的方法，来保护意大利的葡萄园和橄欖林，也就是保护意大利的种植者。在高盧，甚至禁止种植葡萄，这項禁令直到普洛巴斯(公元 282—284 年)，才予以廢止。

巴土亚是意大利北部的大商埠。它是农产品产地，也是紡織业中心。阿奎里亚是一个从日耳曼运来的奴隶和毛皮的采購基地。阿勒索出产某些陶器。維塞利在斯特累波时代，不是重要地方，但塔西佗还提及过它。維罗那在奥古斯都設立上多瑙河省分之后，变得重要，因为它毘連着勃倫納山路。奥古斯都曾建立特里登得城，就是，近代的特稜特。米兰直到第三世紀末期，才变为重要。当时，戴克里先为了軍事理由，把米兰作为意大利总督区首府，因为它控制着阿尔卑斯山通路。

公元前 241 年罗馬从迦太基夺取了西西里的西部，后来又获得了島上的叙拉古部分。曾以麦产富饒而出名的西西里島到公元前第一世紀中期不复是罗馬的一个重要倉庫。另一方面，撒地尼亚和科西嘉已被西塞罗列入“共和国的三个谷物补充地”之內。

在非洲和努米底亚，罗馬势力的不断进展，表現在物質文明方面甚于在精神文化方面。公元前 146 年迦太基被毁灭之后，約有

六千罗馬公民被賜給非洲的土地，一部分土地被售給罗馬的投机商人，其中 1/3 被留給国庫。結果，在罗馬屬非洲，兴起了一个非常有錢而又有势力的业主阶層，他們的世襲領或大地产遍布全境。在尼祿时代，据老普林尼的估計，有六个人占有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数。

泰巴喀、喜坡·第阿罗得斯（比塞大）、犹提喀、哈德拉孟敦、雷普提斯·馬格那、霍里亚·西利亚、塔普薩斯，都是除迦太基以外，非洲的最重要城鎮。的确，城鎮很多。努米底亚的情况也是那样的。在普丁革的“城市表”里，列举罗馬屬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六十个港口。

非洲人在罗馬軍团保护下，不受南方游牧族和西方（摩洛哥）部落的侵略，还有着那种官吏的統治，他們不求自己的致富，而以主权者的名义，經常力求有效能的治理；因此非洲人可十分安全地发展着他們非常富饒的地区。罗馬的公路似网一般地遍布了全境，由东到西，由海岸到沙漠边緣。有些公路起源于迦太基人，而罗馬人使用軍团士兵一年复一年地加以建筑；从而把它們大大地扩展了。

总督管轄下的非洲在第二世紀，无論农业或商业都达到了頂峯。非洲內地的产物依靠动脉似的公路，得到达海岸，居留地也依靠这些公路得向腹地一步步地推进。来自辽远腹地的公路是以塔喀普、薩布拉特、奥伊亚、雷普提斯·馬格那为終点，从那里連接着那些穿越沙漠的旧商队路綫。这个腹地从来沒有被罗馬人穿入过，直到在图拉真的統治时期，那里的半遊牧部族被征服以及軍站設立时为止。这些軍站，有的建立于沙漠中的綠洲上，例如：在比勒尔·海基夫的，由高摩达建立；在蓬真的，由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建立；在加列特和加达美斯的，由亚历山大·塞弗拉斯建立。那时，地中海沿岸和非洲內地之間只在商业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已。

甚至在奥古斯都統治时代，斯特累波已贊揚过塔喀普城为一个貿易中心，一世紀之后，普林尼也欢嘘这个城所在的綠洲的繁荣情况。雷普提斯·馬格那欣欣向荣，直到364年它被柏柏人洗劫时为止。它是一个从辽远內地运来貨物的特殊出口地；这些貨物包括有食盐(产于巴克图附近著名的自然盐井)、皮革、駝鳥、羽毛、象牙、碎金、象和别种野兽(做馬戏用的)以及奴隶。

非洲省从公元前146年被征服到公元后429年丧失时为止，一向以罗馬帝国的一所谷倉地位和埃及相竞爭着。它主要是一个农业省分。在利用山上泻入运河的水流系統地灌溉着的肥沃土壤上，茂盛地长着谷物青苗、葡萄藤和橄欖树。非洲省产的小麦、葡萄酒和葡萄干都是出名的。可是，小麦占着第一位。它比起那来自西西里島和埃及的小麦，既坚硬些，又飽滿些。在征服埃及之前，非洲省原是罗馬的最大谷倉，罗馬政府曾采用特殊措施，来維持該省的治安，保护那里的沙漠边境以防止遊牧部族的搶劫性的突击。迦太基的貨棧里和碼头上，除了当地所产的谷物外，堆积着从內地經过喜波·勒吉斯、台維斯特和图柏多·馬朱斯三条大路运入的大量小麦。当时，罗馬人期待着非洲省运粮船队和后来期待埃及运粮船队同样地殷切。这可以說明为什么維斯帕西安在公元69年因总督路求·派索久不承認他的新皇帝的地位，迅即把他罢黜；又为什么由于同一原因，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登极时，赶快派遣軍团开往非洲。哈德拉孟敦在谷物出口港的地位上，是迦太基城的劲敌，而今天哈德拉孟敦后面的荒蕪不毛之地，当年曾是遍地青枝綠叶的橄欖园；从那里所出产的大量橄欖油运往罗馬城去，以供市場、浴場和运动場的需要。

罗馬的另一个丰富資源，是遮盖着阿特拉斯山脊并沿山坡下延到海岸附近的密林。当意大利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以后，非洲木材替代了意大利木材，有些港口，有着重要的造船工业。非洲森林

的逐漸伐除，沒有使它的繁荣景象减色，因为削光的地面上种植着葡萄和橄欖。甚至在公路两側，橄欖树排列成行，綠蔭密布，以致略为夸張些可以說，一个人从的黎波里到丹吉尔去，一路走在它們的林蔭之下。穆罕默德教的史家易宾·阿布德·哈坎所述的一件故事，使上面所說的事情，生色不少。他告訴我們，647年一个阿拉伯酋长占領苏斐图拉时，获得了大量战利品；他好奇地詢問当地的富源所在，因而一个路人献給他一个橄欖。

非洲最名貴的树木是香櫞树；希腊人称它为“紫茵”(thyine)，罗馬人称它为“色特倫”(citreum)。这种树木在阿特拉斯山脉里，生长得很多，它的叶脉活象孔雀尾巴上的翎眼，老虎身上的条紋，豹身上的斑点，因此它受到了很大的珍視。它还有各种各样的顏色。辛尼加有着三百張象牙脚的香櫞木小桌子。香櫞木大多是用作鑲盖木以及用作制造小艺术品。努米底亚出产的云石，特別是一种濃牛血色的，非常名貴，成为一种重要商品。运輸船即重載船，装載着努米底亚云石，駛过加拉塔島到卡拉里斯（卡格利亚里，撒地尼亚），再从那里到达奥斯替亚。这些船只也載运着木材和野兽。另有一种有价值的磨石，是从摩洛哥采石場得来的。

在非洲和在罗馬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社会上經济和社会等級是有着很大的差別，而且，还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趋势。在城市里富商阶層，大多是罗馬人和意大利人。另一方面，小店員和小商人，一般是布尼克人的后裔。当然，各大城市的社会結构象在这样隆盛的工商业生活里，必然会密切地接近罗馬本部的社会結构。在那里，一定会有很多手工业者的行会，但是可以确实知道的，只有一个漂布工的行会。象所有的港口城市一样，迦太基、雷普提斯·馬格那以及沿海城市都有着大批装卸船貨的工人、碼头工人、搬运夫等等。当时，奴隶制是广泛通行的。但是，在罗馬屬非洲省，奴隶也好，自由人也好，我們知道得很少。

罗馬非洲省是一个多部族的地方；有些部族屬于本地血統，其他部族，象布尼克人和拉丁人，則屬于外来的血統。原始居民，包括利比亚人和柏柏尔人，虽然分成为很多部落，但在語言方面却是屬同一个系統的。他們在罗馬人統治下，保存了他們的姓氏，他們的宗教，以及至少保存了他們的部落部分自治权。这些部落大都始終住在山岭地带，所以，罗馬从来沒有办法，迫使他們接受任何城市制度；这一事实后来阻碍了基督教在他們中間的傳布。布尼克居民占有了这沿海地区，已有千年之久；他們构成了那些城市的主要人口；而这些城市中，有很多是源出于布尼克人的。在罗馬非洲省存在的整个时期中，腓尼基人口① 在数字上繼續地占着或多或少的优势。他們的宗教依然是古代布尼克人的信仰。布尼克語不仅是保存下来，而且还成为非洲的通俗語言，直到它被阿拉伯人所征服为止。后来，直到提庇留时代，所使用的硬币，还是刻着布尼克的印章；罗馬語："两头統治"(duumviri)，在布尼克城市里，叫做"苏斐特"(sufetes)；布尼克語不但繼續被使用直到第六世紀为止，而且在长时期甚至成为有教育的人士的习惯用語，也有很多基督教社团，把它作为教会的习惯用語。皇帝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有一个姊妹，生于雷普提斯·馬格那；她說拉丁語，說得这样坏，以致皇帝因为她留在罗馬城而感到慚愧。約在423年圣奥古斯丁在努米底亚的佛薩拉，建立了一个主教区，曾委派一个通曉布尼克語的人；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講道中，引用了一句布尼克成語，接着說，"我为了你們，再用拉丁語来說一遍，因为你們中不是都懂得布尼克語的"；还有关于另一个主教的例子：由于不懂得布尼克語，他在布道时，就不得不僱佣一个翻譯員了。

可是，尽管有这些腓尼基的殘余繼續保持着，但如果把非洲的

① 就是布尼克人口，因布尼克人原是腓尼基的殖民。——譯者

罗馬化認为是浮面的，那将是一个錯誤。迦太基除了商业上重要地位以外，从第三世紀开始时起，还是一个学术活动的中心；它确实可以亚浦利厄、特图良、亚諾比厄、息普立安、奥古斯丁这一批人，引为自豪的。

罗馬非洲省的衰落，开始于第三世紀中期，当时，努米底亚的副总督卡伯林納斯，为了馬克息馬斯、色雷克，推翻了戈諦安一世，并对所有拥护后者的城市，洗劫一空。从那时起到戴克里先登极时止，非洲省外受努米底亚人和摩尔人的不断侵掠，而内遭派系的斗爭而变为分裂。所有的"皇帝屯营"，沒有一个能够維持那里的秩序，或給予保护。君士坦丁在312年推翻了馬克森細阿之后，曾努力恢复当地的秩序，特别是塞塔港。这个港口的名称，由他改为君士坦丁，而那省的名称改为努米底亚·君士坦丁那。后一个名称到今天还是保存在法屬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州内。

在罗馬非洲省东部，即在利比亚沙漠和近代突尼斯之間，橫亘着一片广大的，一度曾是肥沃的施勒尼高原（即近代意屬的黎波里）。施勒尼，原由多利安人移殖，在公元前322年被托勒密征服，后来随同埃及的被占一起归入罗馬的版图。罗馬帝国在这个地区的建省，原是頗費躊躇的，因为那里的交通很不便利，而且容易遭到沙漠中貝督英人的侵掠。起初，罗馬政府滿足于仅仅占有托勒密的王室領，以及对当地主要产品通便树脂的課税；它是一种很名貴的药材。那里的人口混合着利比亚人、犹太人、希腊人和埃及人。施勒尼的貿易一度是兴旺的，但后来因为受到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影响而衰敗了。当时，罗馬政府似乎也未曾有所作为，来挽救这种衰落的趋势。約在400年时它的衰落达到了极点；正是在主教息尼細阿斯时代，从他的書簡里我們可获得关于罗馬帝国衰敗的耐人寻味的資料。

罗馬逐步征服了伊伯里安半島（西班牙）上的各部族，使之归

順于罗馬的統治；这战爭从第二次布尼克战爭起（公元前 218 年）到公元前 19 年坎塔布立亚人最后屈服止，延續了两百年之久。在那里，最早建立的两省，是內西班牙省和外西班牙省。喀他基那在迦太基統治时期，原是西班牙的第一流的城市，現在成为內西班牙的首府，而哥尔杜巴（哥尔多华）成为外西班牙的首府。奥古斯都和提庇留努力把罗馬权力扩展到整个半島上。在斯特累波时代，半島的大部分，已在礼节、风俗和語言方面，变为罗馬化。后来，公路的建筑（特別是由龐培，及在他以后由各皇帝建筑的公路）、罗馬公民的移入征服地、西班牙人的被强制服軍役等等事情，使西班牙的徹底罗馬化底于完成。当时，西班牙有好儿百座城市；重要的城市有四百座，次要的城市有二百九十三座。

西班牙是罗馬帝国的加利福尼亚州①。它的金、銀、銅、鉄等矿产資源，起初曾由迦太基人开采，而后来由罗馬人大規模开发出来。新迦太基② 附近的白銀矿場雇佣着四万矿工，每天出产約值二万五千便士的白銀。硃砂和鉛是在俾替卡开掘出来的；毕尔比利斯，即近代的毕尔巴鄂，从古代起一直經过整个中世紀时期，是以产鉄著名的。

在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半干燥高原上，牧养着无数的羊群，当时，西班牙的羊毛和西班牙的皮革，都是出名的。在它的南部，橄欖油是一种重要商品，并大量地出口。根据普林尼的話，俾替卡（安达盧西亚）和喜斯特里亚所产的橄欖油，就等級論，仅次于意大利所产的橄欖油。馬細阿尔曾說过哥尔多华所产的油，相等于意大利所产的最好的油。在茂密的橡栩森林里，飼养着成千成万头的猪豚；坎塔布立亚出产的火腿，有广大的銷路。在罗馬統治时期，加第斯（加的斯）变成为西班牙的最重要的城市，非常富庶繁

① 美国西南部的一州，即旧金山所在地，曾以金銀矿产著名。——譯者

② 就是喀他基那城，在西班牙的东南部。——譯者

华，所以第二世紀中，和古代的太尔城一样，它成为城市的代表。加的斯的魚市場是罗馬遊历者所称賞的地方。它出产的熏鮪魚、醃鮪魚輸出到罗馬城去。阿布第拉及西班牙南部的其他港口的情況，也是如此。

"高盧全部分成三区①"。高盧不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利維拉在内，被称为"那邦內細亚"，是在公元前121年时征服的。又在凱撒于共和国最后的一个世紀中完成了它的征服后，高盧乃分成为三大行政区；这些分区是很密切地符合古代凱尔特高盧的历史分区的。这些行政区是：拉格杜息，即位于罗亚尔河、塞納河和梭恩河之間的領土；阿奎坦尼亚，即位于庇里牛斯山、色芬山和格罗內河之間的領土；以及貝尔吉卡，在三区中它是范圍最大的一区，西界塞納河，北濱海，东临萊茵河。在帝国早期，有两个日耳曼省，是从貝尔吉卡分割出来的。第四世紀中，奥古斯大·特累伏倫（特里尔、特累甫）成为貝尔吉卡府的首都。

罗馬高盧省成为整个罗馬帝国中的最繁荣的地方。在第三世紀中期以前，它很少显出衰落的跡象。它的农业、工业、商业享有高度的繁荣。里昂、波尔多、阿尔兹、土魯斯和馬賽，都是最重要的商业区。但是，"在那邦內細亚省內，特別是沿着罗尼河水流，有許多欣欣向荣的城市的崛起，使馬西利亚城的繁荣逐漸减色，到了第四世紀，奥索尼阿斯不再把它列入高盧的漂亮城市之中。"布尔日以它的鉄制品出名；加奥尔以它的紡織品出名。特里甫和奥东，是政府兵器厂的所在地。甚至辽远的布勒塔尼，罗馬商业也已滲入。

东方商人，主要是叙利亚人群集在馬賽、里昂、波尔多、奥尔良、巴黎各城市；他們的居留地在帝国灭亡之后，还是长期地存在着。近时，为要发現考古学上的碑銘，有人进行了发掘工作；在一

① "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

个高盧罗馬人基督徒坟墓的石槨里(在波尔多附近),发現了陈酒。这陈酒和放酒的玻璃瓶一样,看来是源出于叙利亚的,因为我們在盧佛尔博物院內可看到那些在小亚細亚所找出的同一类型的很古酒瓶。玻璃瓶的形式是相同的,而玻璃可能是在盧佛尔那供应瓶子的工場里制造出来的。叙利亚所产的各种酒,在早期罗馬帝国內,已經非常有名;当时,叙利亚和波尔多間的貿易也已活跃。那在波尔多所发現的陈酒瓶是在法国境內所找到的第二只瓶子。1877年在阿尔兹,还发現了一只小酒杯。

高盧随着第三世紀中期各省的叛乱而开始遭受灾难。这些反叛运动由于經济社会的紧張而声势更大,終于形成了巴古达的大叛乱。在加力伊那斯統治时期,日耳曼人侵入高盧,其成功的原因,与其說是由于阿勒曼尼① 的威力,不如說是由于这种內部的弱点。那时,高盧存在的內部混乱和外来侵略,給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举例說,在奥汾涅的克勒芒附近,上述的遊牧部族破坏了雷苏城的陶器大工場,那里的商店根据近代的发掘所指出,行列綿延,长約五哩。制陶工业从第一世紀以来原是高盧一項主要工业,而現在因此受到致命的打击了。

关于罗馬征服不列顚,其进程是迟緩的。这一事实的基本原因,也許在于这个国家的富源有限。凱撒在公元前55年和54年两次出征不列顚,沒有获得持久的結果。事实上,他对不列顚被征服部落所課的賦稅,长时期內,也无人繳納,因为他沒有留下駐防軍在那里。后来,公元前34和27年奥古斯都也两次計划出征不列顚,但是他的計划都沒有产生什么成果,他只得以一种空洞的宗主权名义,聊以自慰而已。有些不列顚酋长好象請求过他的保护,另有些酋长对罗馬商人也准許过入境。但是不列顚繼續保持着自

① 日耳曼人的部族联盟。——譯者

由，直到公元43年时为止，当时，克劳第烏斯派遣將領阿格利柯拉出征該島，获得部分成功，因而罗馬从那里征收定期貢賦。至于不列顛島的完全征服，是在哈德良和安敦·庇护时代。

不列顛的最重要产品中有鉄、鉛，尤其是錫。泰晤士河流域成为产麦区，从这里輸出的谷物渡过海峽，上溯萊茵，以供应駐在那里的軍团，因为在高盧沒有东流的大河，使得中高盧谷物不能廉价运出。至于愛尔兰，虽然罗馬从沒征服过它，但它和該島也許有着通商关系。

在早期帝国，沿萊茵左岸的整个地区是和高盧分开的，并設立为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两省；前者約包括瑞士西部、亚尔薩斯以及現在的法屬和德屬萊茵兰；后者包括近代的盧森堡、比利时东部以及荷兰南部。

罗馬人在东高盧和两个日耳曼省內遍布了公路网，这些公路主要是为着軍用，但附带地也大大地便利了貿易。这公路系統，虽在近代史上因它的輻射点从理姆向后推移到巴黎而作了很多更改，但还可容易地找寻出来。在罗馬时代，公路从理姆象扇形般地散开来。第一条路从理姆通往萊茵河畔美因斯；第二条路經梅斯和凡尔登到斯特拉斯堡（罗馬的阿根托拉敦）；第三条路到图尔；第四条路經过朗格勒（罗馬的林哥尼斯）到味松省（貝臧松）。另一条大路，从里昂起上达索恩河，下达摩塞耳河經过梅斯、图尔、特累甫到美因斯和科隆，它橫断了所有上述的路，并使它們互相連接着。在罗馬的亚尔薩斯，有来自意大利越阿尔卑斯山的延伸路綫；它沿萊茵河下行，从巴塞尔到达科隆和烏得勒支。这样，有着两条沿河流的縱路，由各条橫路来联系着的。

然而萊茵河沿岸城市：科隆、美因斯、沃姆斯、科不林士、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直到帝国历史的后期，与其說是城市，不如說是軍营。但是后来，这些据点变成为从事于农业和貿易的大批平民

的居住区。洛林的矿业、摩塞耳河流的葡萄培植，以及养羊事业，都是重要的活动。

奥古斯都是罗馬帝国边防政策的創立人。在他的政治遺囑里，他劝告了他的后繼者务須保存他所建立的边防綫。后来克劳第烏斯征服了不列顛，多米蒂安組織了"十营陣"①，图拉眞合并了达謝、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在此之后哈德良回复到奥古斯都的政策；他滿意于按帝国界綫来巩固疆界，在沒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即用墙垣、壕沟、角面堡、塔楼等等組成边防綫。此外还有严格的边境管理章程。在日耳曼，非罗馬屬的萊茵河岸以及沿多瑙河岸，保留着一条无人地带；不讓任何蛮人的船舶在这两条河上航行，而罗馬艦队則在全綫上巡邏着。穿过上萊茵河和多瑙河所构成三角地的人工墙垣，是由哈德良开始建造的；这項宏大的工程由其后繼者繼續，而底于完成。这条人为的疆界是由土墙构成的，并用壕沟木柵，以及一系列的塔楼或堡壘来保卫着的。这城垣开始于累根斯堡西南的克尔海姆向西經威森堡和符登堡的干曾霍遜，到达罗耳士和卫尔柴姆，乃折向北，在弗洛登堡过美因河，在福吉尔斯堡之南和托納斯之北，迂迴曲折地延到瀾河，于是順河流而下，达科不林士对面的萊茵河岸。

罗馬的边疆警察对边界上的貿易实施严格的监督。任何人在天暗以后，不得穿越边界，也不得携带武器；要通过必須僱一个护送兵。有时甚至禁止任何人走近疆界的边緣，帝国的信使除外。一切貿易項目概須繳付进口税；甚至外国君主或他們的使节，如果随身携带商品，也須付税。另一方面，有些商品是被禁止出口的，特别是鉄，无論生鉄或鉄制品，各种武器、酒、油、谷物、食盐以及貴金屬。在边境上的固定地点，設立官方批准的市場，在那里有一个軍

① "Decuman fields"——古代罗馬的軍营的正門設在距敌最远的那一边，由每个軍团的第十营防守，因此得名。——譯者

事警察，实施监督。在所有的边境上，对一切进口物所征的正常税率是 12.5%，惟紅海口岸不在此例，在那里所征的税率是 25%。

我們幸有屬于努米底亚和摩里得尼亚边境的公元 202 年港口法的一部分。它有四种税率表。第一种表适用于奴隶、馬、騾、牛、驴；第二种表适用于农产品；第三种表适用于皮革；第四种表是关于各色各样的进口貨。所有的东西概須納税。比起上項文件更有趣的，是高摩达統治时期的关于东方的进口貨的一項税率表。其中包括六类商品；(1)香料、香粉、膏药和药材；(2)棉織品、毛皮、象牙和印度鉄；(3)各种宝石；(4)鴉片和印度布匹、生絲和綢緞；(5)奴隶、馬戏場用的野兽；(6)染料、毛織物、馬匹。

看来倒是有趣，高盧人和日耳曼人对这些边境上的关卡，都深恶痛絕。公元 69—71 年在息維力斯統治下，巴塔維亚人叛乱时，萊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联合巴塔維亚人，共同要求关卡的撤消。日耳曼人虽是蛮族，但对做生意一門，却显得十分精明。日耳曼人最先接触到的罗馬貨币，是共和国的銀币（比加蒂和塞拉蒂①）。这种貨币在帝国早期，还是在流通。但尼祿縮減了銀币（德那里②）的分量，因而日耳曼人拒絕接受它，象塔西佗在一段有名的文字中所記載的那样；他們要求給他們以旧的优良貨币付款③。值得注意的，在德意志发掘出的罗馬古币的窖藏里，比加蒂和塞拉蒂这些銀币，数量上多于那后起的德那里銀币。

里細亚在公元前 15 年被征服，并組成为一省；它包括多瑙河南的巴伐利亚、北提罗尔及东瑞士。勒赫河畔奥古斯大·文得力科倫（奥格斯堡）是从奥古斯都得名的，它变成为阿尔卑斯山北側的

① 比加蒂銀币(bigati)刻着双馬拖双輪車图，塞拉蒂銀币(serrati)是边緣上有刻痕的。——譯者

② 德那里銀币(denarius)，也可譯作便士，原值罗馬的十个銅币。——譯者

③ [“他們的确認識并选擇我們貨币及貨币的类型”。“formasque quasdem nostrae pecuniae agnoscunt atque eligunt”。]

最重要的貿易中心；由于它便于到达勃倫納山路的地位，罗馬和日耳曼的貨品，就在那里交換。在里細亚之下，是諾立坎，以产鉄著名。

班諾尼亚在公元 10 年組成为一省。它的本地居民几乎全部曾被出卖为奴隶。它是上多瑙河三省中的最罗馬化的一省，这一点可从班諾尼亚省内的大批旧罗馬区获得了証明。近代的伊塞克、阿尔-奥芬、塞兰克曼、奥索尼、汉堡附近的德意志-阿尔丁堡、伊塞格、安吉尔河畔斯坦因、腊伯(阿拉波那)、来巴哈、息塞克、庇图、彼特洛尼尔(罗馬的卡嫩敦)、特勒芬、息太耶伏、奥登堡；这些地方或在奥地利，或在匈牙利，或在塞尔維亚，最初都是罗馬人建立的。目前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大多数重要港口，也是这样的。这里的拉古薩、都拉索、薩拉，都是由罗馬人打下基础的。

下多瑙河两省，即两个米西亚省，是在提庇留的統治时期建立起来的。这里，希腊的傳統是很强的；罗馬城市过去大多曾是希腊人的大商埠。其中最重要的，是貝尔格萊德、尼科坡力斯及伐那；它們今天还是存在着。在共和国时期，已有一条沿黑海岸的罗馬公路，从赫勒斯滂海峽到达托力克·契索尼斯半島。然而，色雷斯省是在罗馬帝国时期建立的。这一省（包括近代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欧洲領土），就它的早期历史来說，当然是要追溯到古希腊和馬其頓时代的。在罗馬帝国的統治下，色雷斯省中最重要的地点是：巴拉斯特勒(古代的阿布第拉)、拜占廷、亚得里亚那堡、菲利波利和索非亚(罗馬的索第卡)。亚得里亚那堡是一个制造兵器的重要地点；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前，它还是一个罗馬巴尔干半島上的主要商埠。在軍营的周圍，往往兴起了酒肆旅館，商人移民遂云集在那里。貝尔格萊德城(新基德納姆)以及摩拉瓦河多瑙河汇合处的維密那西城便是这样开始的。摩拉瓦河是一条重要的河流，因为来自薩罗尼卡的貿易，是沿河而上的，而尼西是这一条路上的一

个中途站。

第二世紀中，图拉眞的征服达謝，是罗馬扩展領土主权的最显著表現。达謝位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即是今天罗馬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区。由于那里有丰富的矿产儲藏，从經济来說，它是一个重要的占領。它的本地居民差不多整个地被杀掉或出售为奴隶，因而这地区完全被罗馬移民居住。罗馬人来到那里的时候，只有一个重要城市，即是达謝国王的首府——薩米士基得斯大城。这地区和“十营陣”相似，是用人工墻垣来补充喀尔巴阡山的曲折崖壁的天然屏障，以防止蛮族的侵犯。在东南欧的这一部分，和南德意志一样，所有的重要城市，大多可追溯到罗馬人所創立的基础，如卡尔斯堡、托尔达（托倫堡）、克劳曾堡、图尼、塞維力那、奥尔索瓦、威特鲁克以及在小瓦雷启亚的塞維林·巴納特。尽管有这些基地，但这地区的占領还是很不巩固的，因此哈德良想要把罗馬軍队撤回到多瑙河南岸，但由于罗馬移民的抗議，这計划未曾实行。所以，达謝繼續是罗馬的一省，直到加力伊那斯的統治时代，当时（256年）它的很多地区已受到哥特人的蹂躪。最后，275年，奥理略把它完全放弃了。

罗馬人对希腊，比对任何其他征服地，除了迦太基外，更加殘酷。他們破坏了科林斯、底比斯和卡尔息斯。他們使波的亚和优卑亚变为人烟絕跡，并沒收那里的土地作为公产。他們以苛重的賦稅强加在被征服的人民身上。因为土地集聚在少数大地主手里，希腊的人口有大量的减少，也有显著的移动。牧場的扩展破坏了农业。大部自由居民向城市迁徙，特别往沿海各城市，在那里工商业尽管不很兴盛，但还留存一些，并且在那里穷人可得公家的救济，象罗馬的“下民”① 那样。在希腊有許多城市完全消灭；别的城

① “下民”(Iazzaroni)是罗馬城无家可归、依靠搬运貨物或乞食糊口的人。——譯者

市也人烟稀少。至于爱琴海上的島屿大部变成一片荒凉的山岩。阿加狄亚几乎回到了自然状态。

为了避免繞过馬利亚角的又长又危險的航路，尼祿曾有一个开通科林斯地峽的可实行的想法。如果这計划能够实現，那会有利于希腊的航行，也会促进希腊半島东西两岸城市之間的商业关系。公元 92 年多米蒂安为了意大利葡萄种植者的利益而禁止希腊的葡萄培植，使希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誠然，第二世紀中，希腊的若干地区获得了部分的复兴，因为有几个皇帝对希腊采取了有利的措施，特别是哈德良；后者对古代希腊抱有浪漫的好感。然而，在帝国的后期，据一般情况来說，希腊是一个財源枯竭的地区。

罗馬还繞着黑海北岸伸展势力，那里希腊的商业傳統是很强的。关于它們的起源，我們可追溯到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的商业关系，这些殖民地，不仅和周圍的非斯拉夫族而且和第聶伯河中游的古代斯拉夫人維持商业关系。其中主要殖民地是：奥尔比亚，在公元前第六世紀从米利都移来的人建立的，契索尼斯，位于同名称的半島上的西南角；狄奥多西亚和帕第克比姆，位于东南海岸；番那哥立亚，位于息米立亚·博斯普魯斯的东岸，以及坦納易斯，位于同名称的河流的河口，就是，近代叫做頓河的河口。这塊罗馬人泛称为“西徐斯”的，而今天我們称之为克里米亚的地区，有着丰富的原料产品：牛、羊、馬、皮革、羊毛、蜜、蜡、盐；另外从其腹地可获得几千几万个奴隶。

不象希腊半島一样，整个小亚細亚在罗馬帝国的統治时期，享有高度的繁荣。那里，有古老而数目又很多的城市，有稠密的人口，有从远古傳下的貿易技巧，有高度发展的艺术和手艺，有当地的各种自然資源，——这一切創造了小亚細亚罗馬各省的繁荣条件。这里，也存在着商人和工人的有势力的团体。

在奥古斯都时代，以弗所和士麦拿各有人口二十万人。只在

亚洲一省內，有十二个城市，是罗馬殖民的中心社会。在小亚細亚各省，所有的合并組成的城鎮，数以百計。差不多全小亚細亚，在从拜占廷帝国到它被土耳其征服止这个整个时期，繼續保持着它的商业上和工业上的优势。到了第四世紀，甚至加拉太也徹头徹尾地罗馬化了。但是，卡帕多細亚，一般說来接受罗馬文明較慢，而且罗馬文明在那里从沒有过完全的发展。它的山区和低地草原，以养馬牧場出名。由于皮西底亚、弗里加、爱索立亚以及托魯斯的盗賊猖獗，罗馬政府一向認为統治小亚細亚的中央山区是一件难事。

叙利亚在罗馬出現于东方之前，已有一个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业历史。叙利亚的經济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尔和西頓两城。它們的繁荣不曾因为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来。叙利亚这个古国中的一些最重要城市，有其远古的根源，这些城市包括有阿勒頗、大馬士革、劳狄栖亚、的黎波里、西頓、太尔及貝利亚。从太古时代以来，——也許在埃及开始在經济上对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发生影响之前，——叙利亚-腓尼基人已形成为东方奢侈品經营上的卓越商人；在活动上稍弱于他們的，是散处于古代利凡得各地的犹太人。在罗馬帝国中，沒有一塊地方，甚至小亚細亚各省也沒有，比叙利亚承繼着更加复杂的遺产。它是一張重写过好多次的羊皮紙①。叙利亚民族和語言沒有越出大馬士革范圍之外。东方和东南方的人口，屬于阿拉伯族；南方的人口，屬于犹太族；那沿海一带的居民則是腓尼基人。插在这些不調和的部族之間的，有着許多源出于希腊人的城市，其中有的城市是从亚历山大帝及其繼承人，特别是塞琉息兹朝开始的。除了这些血統、习慣和語言上的分歧之外，我們还須指出其他复杂情况。南叙利亚曾一度隶屬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北叙利亚則归塞琉息兹朝統治。这

① 原文用“palimsest”一字，指用以重复写字的羊皮紙。古时，因紙类缺乏，把初次写在它上面的字跡擦去，以便重写，象我們使用的石板一样。这里用作比喻。——譯者

可說明存在两个叙利亚的原因。

叙利亚內地民风古朴，原是頑抗都市生活的。它的都市化是由塞琉息兹王朝开始而由罗馬人繼續着的。尤其在塞琉息兹·尼卡篤时期，叙利亚遍布着希腊式的城市。当时，犹太君主仿效它們，建造了凱撒利亚、撒馬利亚和提比里亚三城。在叙利亚，尽管有对內和对外战爭，但它的城市的筑造、道路的修建以及商业和工业，还是都在令人惊异地发展着。甚至那被犹太人認为是最荒僻、最凄凉的豪藍高原也接受了一些罗馬文化，然而在那里这种文化旋即消逝。在叙利亚，希腊和罗馬的影响都是从沒徹底深入过。那里的各种語言：叙利亚語、希伯来語、腓尼基語、阿拉美易克語、帕尔迈拉語，还是繼續存在着；那里居民的部落、部族、村庄形式的古旧生活，也是这样的。然而，罗馬的成分在叙利亚的結构中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罗馬的阿拉伯省，面临紅海的頂端，位于巴勒斯坦之南，而后者的唯一港口便是扎发。阿拉伯省的皮特拉城，即"古老的紅玫瑰城"，是东方和西方商人会集的場所；托勒密王朝曾看到这地点在貿易上的战略价値。"他們要控制那横过阿拉伯半島到迦薩的貿易通路；除了他們自己的尼罗河水道之外，它是对印度交通上的另一条路綫。"

誰也不知道，埃及和印度以及东方的貿易究竟已有多少久远。埃及位于地中海的东头和紅海的頂端、这双重地位使埃及获得了那控制大量东方貿易的战略地点，这項貿易原是西方各国自远古以来一直渴望的。但是，埃及的勢力跟着亚历山大帝的征服而上升，达到空前的程度。它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且成为欧洲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部分。占有埃及的領土，可使那控制它的国家成为那支配着欧洲和东方間貿易上最大数額的主人翁。

不可能想象，罗馬在东地中海沿岸各地扩展的时候，最后不会

侵犯埃及的。有一連串的事件，促进了罗馬对埃及的占領，而这些事件也只是偶然的巧合罢了。所以，凱撒和安东尼发生互相爭夺地中海世界霸权的时候，埃及便成为爭夺的焦点。安东尼被迫得走头无路的时候，就溜到埃及，作为避难所，所以罗馬的征服埃及是势所必然的(公元前30年)。

罗馬对埃及的統治，对一般省行政的常規来說，倒有各种破例的地方。其原因是：埃及有特别长久的独立国的历史，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有稠密的人口。罗馬人在那里維持了很多托勒密王朝的現成制度，比較上沒有作出多大变革。

自古以来，埃及是以其人口的稠密出名的；在古代，号称拥有一万八千至二万所村庄和城鎮；到托勒密王朝时代，这項数字，据称在三万以上。戴奥多拉斯估計埃及在被罗馬占領之前的人口有七百万人，約瑟福斯估計埃及在維斯帕西安时代的人口是七百八十万人，比今天少些。在这項数目中，有着約一百万犹太人。其余的人口，包括有本地的埃及人、希腊人、罗馬人以及奴隶。本地人和希腊人在很大程度互相杂处，可是犹太人的大殖民地还是保持着它的隔离性。值得注意的，在埃及农业区里，由于有大量依附农或賤农，奴隶是很少的。

古代埃及人习惯于专制統治，他們是以虛伪性、謙卑性、宗教迷信、以及好小爭吵的性質出名的。罗馬在埃及所作的改革中，最少的，便是关于埃及的信仰方面。对于神庙，不加騷扰；对于僧侶所使用的象形文字，任它繼續流行直到卡拉卡拉时代为止，甚至更后一些——到第六世紀中为止。托勒密王朝所采用的希腊文仍旧作为官方語言。罗馬的各省一般是由一个省长来治理；但埃及則不然，是由一个拥有国王尊严的总督来統治的。象不列顛帝国中的印度一样，埃及是受着一个特殊类型的統治的。

关于埃及的工业生活，一般說来，奴隶劳动和資本主义都是几

乎沒有起过什么作用。不仅埃及土地是完全由佃农来耕种，而且我們所知的埃及手工制造业大多是在小手工业者手里；他們或者为自己工作或者出僱于主人，替他工作。

埃及对罗馬帝国有其农业上的重要性之外，还在亚历山大城有着那个第一流的世界市場。它是罗馬和远东貿易的基地。象近代史一样，古代史很多是关于爭夺商路控制权的历史。当时，苏伊士运河虽然还沒有开通，但紅海在欧洲和远东間商路上的地位和它在今天的地位，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起初，东方的貨物似乎是由印度和阿拉伯的船只运到南阿拉伯和阿比西尼亚各港口的。可是，不久希腊人加入了竞爭。普林尼曾提及那在馬拉巴海岸由希腊商人所建的一个殖民地。这样看来，欧洲和东方之間建立了一个直接的貿易关系。事实上，奥古斯都在公元前 25 年，就是在亚克兴战役六年之后，所頒布的最早法令之一，便是关于力图夺取这項貿易的控制权。为了这个目的，这位皇帝，由于錯認阿拉伯，而非印度和远东，是东方貨物的产地，乃命令埃及总督出征阿拉伯。这項努力是失敗的。后来，罗馬人发現了这貿易是来自印度的，于是对东方貨物征收了 25% 的进口税。罗馬帝国对紅海上海盗的剿灭大有助于这項貿易的发展，可是尤重要的，是約在公元 48 年，关于印度洋上按季节吹来的貿易风或季节风的发現。此后，埃及和印度之間的东西航程就定期地进行着。但在此之前，所有的船只是依循那条沿波斯湾和馬克兰海岸的又长又迂迴的航綫行駛着的。

和一般的想象相反，紅海航路的終点，不是在海湾的頂端——因为紅海的上端，富于淺滩与暗礁——而在迈奥斯-霍尔木斯(馬斯尔港)，即近代的拉斯·阿布·森默，在下行紅海的非洲沿岸的中途。这个港口是由于上紅海的航行有着危險性，由托勒密·非拉得尔斐斯在公元前 274 年建筑起来的。后来，在它附近，另有其他港

口兴起，如阿辛諾伊、多利买和阿杜力斯各港。在这些港口里，祀貨物过船，再用駱駝队輸送，越沙漠达尼罗河畔科普多斯(近代的庫甫特)，再順河下航达到河口的三角洲。据普林尼記載，約值二千万美元的黃金，每年从罗馬帝国支出去，以平衡东方貿易差額[①]。現在印度发掘出幷保藏于各大博物館的各色各样的罗馬硬币，数以千計，那可証明普林尼所說的不謬。

此外，罗馬的貿易企业也深入了非洲中部。在奧古斯都时代，罗馬在埃及最远的南疆，是賽伊尼(近代的阿斯旺，近第一瀑布)。后来，这边界再向南推移，达到海厄拉·息坎米諾斯，它是“罗馬在热带上所占有的唯一地方”。这塊地方是和非洲內地“蛮族”貿易的市場，在那里所进行的是純粹物物交換的貿易。

罗馬通过埃及，控制着那条經紅海和印度达远东的通路——海路。但是，还有一条横貫陆地的大商路，开始于中国和印度之間，經巴克特里亚、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而終止于叙利亚的各港口，特别是安提阿港。

这一条陆地大商路上的西部各段，是經过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一事实一向使这两个地区內的任何政权，不管屬于巴比倫人的、亚述人的、波斯人的、帕提亚人的、新波斯阿薩西或薩薩尼王朝的、或穆罕默德教哈里发朝的，能用对过境的东方商品勒索通行税以及对这运輸課以苛重不堪的关税的方法，来堵塞住欧洲。例如，巴比倫和尼尼微堵塞过太尔和西頓；波斯堵塞过安提阿以及小亚細亚的爱奧尼亚希腊城邦；帕提亚堵塞过罗馬；阿薩西和薩薩尼王朝以及后来的巴格达哈里发朝堵塞过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馬帝国。爱奧尼亚城邦由于痛恨波斯对它們的經济压迫政策，在公元前500和494年之間，曾反叛大流士，而欧洲的希腊人就給予支援，进

① 在奧理略时代(270—275年)，“一磅絲綢价值一磅黃金”。

行干涉:这一事件引导到薛西斯的劳而无功地企图征服希腊,引导到馬拉敦、德摩比利和薩拉密斯各战役。亚历山大帝东征的动机一部分也是經济的,就是說,要打破波斯对西方商业的障碍,要消除欧洲和远东間的“中間商人”。他的东征在一个时期内,是成功的。由于波斯的复亡,希腊和叙利亚人获得了大利,同时,东方奢侈品的价格,在地中海区城市的市場上也跌落了。

但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和帕提亚帝国崛起后,西亚恢复了原来的局势。在这时期,罗馬成为对帕提亚商业控制的反对者。罗馬和帕提亚間的长期斗爭,主要地是在古代史上的一个商业竞爭,象从爱德华三世統治以后,英法两大商业国家为了商业竞爭而发生的战爭一样。在公元前250年和公元后226年間,帕提亚的阿薩西朝諸王的权力扩及幼发拉底河和印度河之間的領土上,在西亚形成了一个初对希腊的、后对罗馬的权力东侵的屏障。公元前53年革拉苏的慘敗,使罗馬人长期留着痛苦的回忆。罗馬人对帕提亚所举行的各次正面的进攻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公元前36年安东尼被打敗,公元232年亚历山大·塞弗拉斯被打敗,公元258年瓦勒里安被打敗而成为沙浦尔大帝的俘虜(他是唯一的罗馬皇帝死于俘囚里),公元364年朱理安被打敗而陣亡。罗馬在帕提亚的各次战爭里,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罗馬想要对帕提亚举行正面的进攻,都是枉費心血的。它沒有能够冲入帕提亚的国境。的确,图拉真虽征服过两河流域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巴比倫和亚述各省,罗馬虽可占有以得撒、尼士比、崔格馬、撒摩撒达和帕尔迈拉,并在那里可設立海关,可是帕提亚还是这地区的主人翁,盘踞在“大商路”上。另一方面,帕提亚人对控制里海和尤克辛海① 間山区地峽中兇悍的居民,

① 即黑海。——譯者

即亚美尼亚人和伊伯里安人，一向覺得是有困难的。这一事实曾使罗馬人想到繞兜过帕提亚的可能性。因为那經由亚美尼亚和伊伯里安通远东的交通路綫，可以不受着帕提亚的阻撓。这一观念原不是新的，新的东西倒是在于实行它。

早在公元前第三世紀之初，帕特洛克利斯奉着安泰奥卡斯一世之命，曾往里海去探險，他回来报告說，那里有一条重要商路，起自北印度(和中国)到达奥克塞斯河①，在那里乘船下行該河，或者經过奥克塞斯河流入里海的航道直达里海，或者登岸走一段陆路，以达里海。然后，把貨物用船运載，横渡里海，并上溯庫尔河，达到航路的頂端，再从这里，把貨物运送，經过梯弗利斯…以达黑海…所以奥克塞斯河流域是一条貿易大道。它是通过里海和外高加索而进入西方世界的路綫。跟着占有里海与黑海間的地峽，罗馬人就掌握着这条通路的控制权②。

亚美尼亚原来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个王国，就是，由本地君主統治的高加索王国。他們对帕提亚有着松弛的藩屬关系。对亚美尼亚，罗馬逐漸扩展其势力。在那里，龐培立国王第奥塔魯斯为藩王；凱撒立国王阿利奥巴扎尼斯；奥古斯都立国王亚琪雷厄，尼祿立国王底格拉尼。然而，尼祿不久取消了这个国家的半独立的地位，并把它的領土合并成为"小亚美尼亚"；維斯帕西安在那里設立了一个省政府，并在庫尔河畔建筑了一座砲台。此后罗馬迅速地进行征服那整个里海地峽，直到公元115和117年間为止。图拉眞又获得了"大亚美尼亚"，也把它組成为一个省。

罗馬現在可以繞过帕提亚所壟断的横貫亚洲的大商路了；它由于获得那些对帕提亚沒有好感的高加索臣服部族的帮助，开辟了一条新商路。这条商路連接那在帕提亚东疆之外，即近代土耳其斯坦地方的横断大陆的干路，沿着里海南岸以达現在的巴庫；从那

---

① 即阿姆河。——譯者

② 麦琪(D. Magie)，«年报»，美国历史学会，1919年，第1卷，第302—303頁。

里起有两条可进行远东貿易的不同路綫：一条是直接穿过海峽（需五天），上行庫尔河流，到达黑海各口岸：科尔奇斯、非息斯、戴奥斯邱里亚斯（近代的伊斯庫里亚）；另一条是向西南上溯阿拉克賽河，下航幼发拉底河上游，达以得撒及撒摩撒达，乃至叙利亚。这两条路綫都是繞过帕提亚所控制的范圍的。

这两条路綫中的第二条路，进入叙利亚境后即和别的路綫相归并了，可是第一条路成为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条商路。由于这条商路，上述的尤克辛海各港口遂一跃而成为商业上的很重要地方；而这些港口的古老的历史可以远溯到耶孙和金羊毛的故事①。科尔奇斯城建造在一个三角洲上的，在尼祿时代有着一百二十条桥梁。在戴奥斯邱里亚斯城，有着一百三十个翻譯員，来帮助处理那使用多种言語的交易。据說，在那里所講的語言和方言达三百种。这些港口的剩余品是运往特勒比遵德去的。

在罗馬帝国的最盛时期，远东和西方間的商业关系比以前所認为的还要扩大。由于近代学者的研究，增加了一大批的資料。卡尔·馬利·考富曼教授說过下面一段話：

那幅显示公元 100 年时中国、印度和罗馬間的交通路綫地图（刊登在来比錫大学比較宗教研究院 1922 年“会报”里），有力地証明了：在那个时期全世界的相互交通已有高度的发展。普通讀者会惊异地看到欧亚間所存在的稠密的道路网，——特别是那些位于緯綫第十和第十四度之間的大批平行的貿易通路，以及那些在埃及和小亚細亚和索格狄亚那、巴克特里亚、根达拉和馬拉巴下行海岸之間的很多連接路綫。除了这商队路网和海路以外，这幅地图还指出：象印度河这类河流在那个时期的世界貿易里曾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②。

---

①按希腊神話，耶孙（Jason）是伊孙（Aeson）的兒子，爱奥尔卡斯国王比立阿斯（Pelias）的姪兒。比立阿斯为了使他不登王位，曾命令他去求科尔奇斯国王厄伊提（Aeëtes）所藏的金羊毛。——譯者

② «法兰克福周报»，1922年 6 月12日，轉載于«活的时代»。

耐人玩味地指出，罗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不是沒有人知道的。那个时候，中国在西亚的边疆，远远地超过它的現时的边疆，确然包括了蒙古，并曾伸展到俄屬土耳其斯坦。虽然中国对地中海世界的知識，尙屬模糊，但是这"天朝帝国"却也曾約略知道罗馬的。中国史籍告訴我們，公元 97 年时甘云出使"大秦"——在中国史上这个名詞是指安提阿的。但是这使节到了波斯湾，不再前进。他向西續进的企图，也許曾受到帕提亚商人的阻撓，因为阻止罗馬帝国和中国間的直接交通是对他們有利的。据中国史籍的記載，"大秦国王[就是，罗馬皇帝]一向希望派遣使节来到中国，但安息人[帕提亚人]愿和罗馬人进行着中国絲綢貿易，正是为了这个原因，罗馬人到中国的交通路綫被隔絕了"。

但是，帕提亚的这种压制外交，在第二世紀遭受了部分的失敗，因为馬卡斯·奥理略曾打敗帕提亚，并把塞琉細亚和特息丰化为灰燼，并且那失去了的美索不达米亚省也被克复了一部分。公元 166 年时，中国史籍上曾明确地提及一个罗馬皇帝的名字：

至桓帝延熹九年①，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②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③

毫无疑問，这个叫做"安敦"王者，便是罗馬皇帝馬卡斯·奥理略·安东尼那，但是，不可能断言：这是否一个中国的正式使节，或冒用天朝皇帝名义的一个中国商人集团④也不能确定，"陆上羊腸路"，究竟被利用到若何程度，但有一本中国史——《后汉書》⑤写

① 公元 166 年。——譯者

② 即越南。——譯者

③ 《后汉書》《西域傳》。此处作者系轉引自柏立（Bury）版，吉本（Gibbon）：《罗馬帝国衰亡史》第 4 卷第 535 頁。——編者

④ 按照事理，这里应是："………这是否一个罗馬的正式使节或冒用罗馬皇帝名义的一个罗馬商人集团"。——譯者

⑤ 宋范曄撰，今本共一百二十卷。——譯者

于第五世紀，曾提及一条“飞桥”，那可能就是幼发拉底河上那条有名的崔格馬桥。这一本历史还提及了一些东方和西方間的貿易品，例如，宝石、玻璃、絲綢和染料、香膏及其他葯品。又中国史上多次提到安提阿，叫做“安都”。

在罗馬帝国內完全的自由貿易是沒有的，因为有着許多关税勢力圈；在它的边界上，征收那叫做“轉口税”的內地通行税，另外对食品，大多城市还課以入市税。这些关卡有的比罗馬还要古老，特别是在东方的。每一个关税勢力圈不是由一个省构成，而是由毗連的几个省集合起来的。税率也不一致，一个关税勢力圈和另一个关税勢力圈各不相同，从 2% 到 12% 不等，后一項税率起初是对奢侈品征收的。由于所掌握的資料太不充分，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这些关税勢力圈确定下来。我們所可知道的，有意大利、西西里、高盧(包括两个日耳曼省在內)、不列顛、多瑙河各省(連同伊利里亚)关税勢力圈。小亚細亚决不会是一个关税勢力圈。事实上，亚洲、俾斯尼亚、本都、帕夫拉哥尼亚諸省，各自成为一个关税勢力圈。关于非洲各省怎样集成关税勢力圈，我們不知道，关于巴尔干半島、或希腊或叙利亚的关税勢力圈，我們也一无所知。跟着帝国貧困的增长和賦税負担的加重，轉口税率变得越来越大了。到第四世紀那不折不扣的 12% 税率变为到处实施的税率了。

現在，我們从罗馬的商业历史轉到它的工业历史。在这里，使我們立刻感到惊奇的，是在罗馬工业世界里行会組織的普遍存在。在这方面，本沒有什么新的或特殊新穎的东西，因为屬于同行业手艺人和手工业者組織的团体，在古代已是一个寻常事件。然而，重要的，应指出这种組織的基本目的是社会性的。我們沒有資料来証明：它們象中世紀行会那样，供給学徒以技术訓練，或者象近代工会那样，力图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时間等等，的确，这类事情在古代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当时很多工业是由奴隶劳动来进行的。因

此，罗馬行会在工业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它們是由社会下層分子所組成的地方社会；象近代的“互助社”和救济会一样，旨在联絡会員間的感情，办理救济事宜。他們援助病人，遇到死亡事件，进行适当殯葬。他們通常是在庙宇的庭院里集会的。只有极大的行会才能自設会所。这类行会往往有一个“贊助人”，就是，一个发財的会員，他为了充任会长的荣誉，愿負担一所会場的开支。所有的行会都侍奉一个神或女神，作为守护神，正象中世紀行会侍奉它們的“保护圣”一样。它們也有各种职員，以及一种入会仪式。从銘刻里可看出：在帝国时代，罗馬城内，有八十种不同的行业，都是这样地組織起来的。其中船員行会，即內河船夫行会，勢力最大，組織性也最强。在它們安分守法和不“玩弄政治”的条件下，政府对它們从沒加以麻煩，甚至几乎不予以注意。只在小亚細亚几个手工业人口众多而又有高度技术的城市里，我們才可找到工人騷动和工业罢工的例子。

但是，在第二世紀，可看出政府的政策已有轉变。政府見到管理那些和国家应有关系的职业，可获得經济上的利益；例如，制造武器、制造軍事供应品、造船、运輸、食品生产和流通。图拉眞曾組織面包工人行会，哈德良曾組織国家监督下的水手行会。在作为皇室大部收入来源的皇室領地上，各类工人都迅速地在国家控制下組織起来。

到第三世紀，另作出一种政策上的改变，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甚至性質上是革命的改变。由于稅收的減少，課稅已成为政府的一个极端担心的事件。它提高賦稅率，設計新賦稅，并設立新稅局。在卡拉卡拉时代，可能对若干种行业已經征稅；但是，到亚历山大·塞弗拉斯的时代（224—235年），一切手艺和行业被强制地合并起来，放在国家的控制下，而行会本身也成为一个課稅单位。各行各业包括有裁縫、各种紡織工和金屬匠、毛皮工、皮革匠、马鞍

匠、制陶工、面包工、挑夫、碼头工人、船貨装卸工、木匠、石匠、小販和商人、旅館管理員甚至妓女。后来，戴克里先制定一項法律，要求每个城市对所有的这些职业进行登記。

根据課税的各类对象，給予它們各色各样的名称。但是其中最通用最普遍的，是"金銀税"(Chrysargyrum)这一名称；它从希腊文金銀两个字得来的，因为这項税須用貴金屬来繳納，不象很多别的罗馬税那样，可用实物来繳付的。此后，政府管理了金銀的供应，規定了工資、价格和工作鐘点。它是罗馬后期一种最苛重、最失人心和最有危害性的賦税，因为它几乎全部落在負担已重的中等阶層身上；毫无疑問，它是促使这个阶層最后消逝的一个因素。500年时皇帝阿那斯塔細亚撤消了"金銀税"，但是，到那个时候，它的坏影响已經表現无遺了。只有做小販的退伍兵士和教士阶層是被豁免这項税的，基督教在得到承認后，基督教僧侶也列入教士阶層。

国家管理只要再进一步，就可实現政府在工业上奴役罗馬世界了，果然这种情况不久就出現。这就是那使一切手工业变为世襲的一种臭名昭著的法律，規定兒子必須繼承父亲的职业。再也不能想象有比它更有效地压制創造力和摧殘天才的办法了。一个裁縫或一个馬鞍匠的兒子，不管有多少理想力和艺术的或文学的才能，被注定要固守他父亲的縫針或鑽子，一个陶工的兒子被束縛于他父亲的輪盘。只有法律、医葯、教育、美术，各种"自由"职业則不在此限。这是在中世紀和近代中机械艺术和自由艺术区别的起源。

在第五世紀中，由于工資的低微、工作时間的久长、賦税的苛重，或在职业上沒有兴趣，有成千累万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他們从原住的城市，逃往别省去，甚至逃入边疆上蛮族中去。高盧总督曾奉到一項指令，里面有下列一段文字：

凡是失掉了正当服务的社会，就失去了它們过去出名的繁华景象，特别是那些有很多行会人員离开的城市；这些人寻求乡村生活，隐匿于秘密荒僻的地点；但是，我們已以下列命令阻止这种勾当：不管世界上什么地方，所有被找出的逃亡者，概須强制他們回到原来的職位，不得有任何例外。

从上文看来，显然，商业和工业在罗馬帝国文明中已是重要的經济和社会現象。然而，从范圍、生产和影响来說，农业的重要性則还要大得多。

我們現在的土地租賃形式、耕种方法和农村經济制度，是从各种实踐方面得来的混合物，从罗馬帝国的罗馬人，从那些第四第五世紀侵入罗馬帝国并定居于帝国境內的日耳曼族得来的。在罗馬共和国的早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爭时（公元前 201 年結束）止，罗馬人主要是牧畜牲口的"民族"。在这时期，农业还是在簡陋的未发展的状态。大批猪群在广闊森林里寻食果实；牛羊在夏季里放牧于草地，而在冬季里則飼以干草和树根；所产谷物，仅足供制面包之用。罗馬人民的骨干部分，是由自由农民阶級构成的。貴族，就是一个地主紳士兼軍官的阶層，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府。但是老百姓，除了每个自由人須担負軍事服役外，还不覺得政府压力的沉重。奴隶是很少的。种田被認为是一种荣耆的职业。新新納图抛弃犁鋤从戎，成为当时代的一个最偉大的将領，象在美国革命时期中帕特南那样；新新納图的这一故事，表明了这个时代有着朴素和民主的风气。农田是划成小塊的，由所有者和他們的兒子，借助于几个奴隶来耕种的。老伽图說过："我們祖先，贊揚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頌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这样称頌的人，認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最强壮的人、最不畏縮的兵士，就是来自农民間的。"

但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紀里，意大利曾发生一个深刻的經济革命，大大破坏了簡朴的农民生活。罗馬在公元前 200 和 146 年間，

征服了希腊，也在公元前146年灭亡了迦太基大帝国；于是，一些富庶的省分归并于罗馬的版图，在那里已有好几百年流傳着高度发展的耕种方法。罗馬遂迅即向它所征服的敌人学习这种方法。

罗馬元老院命令迅速把迦太基人美哥著的有名农业論文譯成拉丁文。老伽图，即著名的监察官，曾劝告罗馬农民应用書中所述新方法，而他也亲自編写了一本农田管理手册。这是罗馬农业丛書中的第一本；这类丛書是論述耕种、畜牧、培植水果、修剪葡萄藤、养蜂等等的。結果，罗馬土地所有者，从那时起，試驗了更精細的种田方法，把有技术的农夫、种葡萄者及花园匠輸入意大利，还有牲畜的改良种和水果蔬菜的新种。研究土壤和种植及采用施肥、排水方法，跟建造优良谷倉及别的田間房屋同时并举。

在共和国最后百年及在帝国早期中，我們可找到其他农业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瓦魯、科琉麦拉和帕雷狄阿斯。瓦魯所出生的村庄，就是，后来詩人賀拉西所有的著名"薩平田园"的所在地。瓦魯屬于前一輩人，生活在凱撒和龐培的极盛时期。在这两人的內战里，他是拥护龐培的，但在凱撒胜利后，他很幸运，得被赦免。后来，他获得了凱撒的嗣子和繼承人，罗馬皇帝奥古斯都的保护，从此以后他遂专心于研究工作了。他的学識很渊博，也許他是古代最多产的作家。他享年九十岁，根据他晚年自編的目录，他曾写成七十四种大著作。他所研究的領域，包括有历史、修詞学、地理、科学、法律、教育、戏剧等。

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只有一本文法書及"农业論三卷"得流傳下来。后一書是在他八十岁时，用对話体裁写的。第一卷讲述耕种方法，第二卷講述牧养牲畜，第三卷講述养家禽和养魚类。但是瓦魯与其說是一个农夫，不如說是一个文人，他象許多富有的罗馬人那样，喜欢他的田庄，因而有着关于田园管理的实际知識。但是，他对田园生活的兴趣，在于避去那个喧扰热鬧的首都，和自然

界接触，享受一个簡朴生活。上述的著作是关于农业的漫談，而不是关于实踐的农业書。

作为一个农业作家論，科琉麦拉比瓦魯高明得多。他是一个罗馬化的西班牙人，在公元第一世紀出生于加的斯附近。父亲在他的壮年的早期去世，傳給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庄园；在耕种这些庄园方面，他非常感到兴趣。他不但勤勉地研究当代的一切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論文，而且亲自远遊各地，以求新的知識。西班牙在古代以及在中世紀是以养羊业出名的，而科琉麦拉对改进本地伊伯里安羊种特感兴趣，把从非洲亚特拉斯山区輸入的螺角羊和本地羊交配。根据有些作家的記載，他为了購买著名的叙利亚种的牡羊往叙利亚去，就死在那里。他的《农村論》凡十二卷，就是他的辛勤研究、到处旅行、实际观察和实驗的結果。幸运的，这書能完整地流傳到今天。他是以优美的文笔和专門的技术写成它的；有时夹杂以輕松的哲学說教，因为科琉麦拉是向往于“誠朴的古代”，而歎息于当代增长着的奢侈虛伪风气的。例如，他說：一个土地所有者从他的庄园上租戶和奴隶所得的服务，比来自外地的租戶或購自远方外国市場的奴隶所得的还多。科琉麦拉对于中世紀的寺院田庄，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作家帕雷狄阿斯，可能約在公元400年时出生于高盧的波亚蒂尔。他曾著农业論十四卷。其中主要部分(第1—12卷)是依日历或历書形式排列的，依次講述各接續着月分的工作。他广泛应用古人的著作，特别是科琉麦拉的論著和迦太基人美哥的拉丁論文譯本。然而，另一方面帕雷狄阿斯却是一个开辟了新基地的罗馬作家，因为他大量利用希腊的农业专著。可惜他对引用这些資料，一般仅仅注明引自“希腊作者”。只有一个例外，即指明那由叙利亚的貝魯特·阿那托力奥斯所写的一本农业手册。帕雷狄阿斯的論文由于編制上的实用性和說明上的簡明性，成为中世紀

人們愛讀的一本書。

罗馬元老院成員或特权貴族，由于法律禁止他們参与貿易的結果，遂变得过分重視了土地的占有。另一方面，他們却使用了間接的办法来規避这項禁止参与貿易的法令，就是，使用一个灵巧的奴隶或自由人来代做生意。这說明了为什么商业活动几乎全部落在自由人手里。“发財要象自由人”曾是一句諺語。很多“新富”是屬于这一自由人阶層，他們升任政府的高級官职，象克劳第烏斯时代的帕拉斯、象尼祿时代的那息薩斯。帕特洛尼阿的諷刺詩，“特立馬乔[1]的宴会”，是針对这批暴发戶的一种譏笑。在尼祿时代以后，罗馬帝国开始把重要的行政官职委任給自由身分的人，特别是騎士阶層。但到哈德良时代。国家所有的高級官职除了財政官职以外，几乎完全不复由自由人来担任。然而，他們还是繼續在行政机关內和法院內充任下級官职，但是他們必須和一大群外省人相竞爭着，特别是和希腊人和敍利亚人。克利安得是在后期自由人中享有煊赫政治勢力的唯一例子；他在科馬杜斯时代，担任过判官长(公元 192 年)。

奴隶制是一个重要制度。我們虽可有力地爭辯說在早期罗馬，从需要粗劳动的經济观点来看，奴隶制有它存在的必要，但这却并沒有否認了：在帝国时代，它是一个有害的因素。罗馬人从最早时代起，就有着奴隶，但起初奴隶的人数是很少的。在早期，罗馬农夫在种田时，除自己的劳动以外，很少需要别人的劳动；有几个奴隶就綽乎有余。下列四項原由，促使奴隶人数日益增加着：(1)农民被迫放弃耕种和大地产占有制的增长，带来了由奴隶劳动来开垦土地的办法，奴隶劳动比自由人的劳动高出一等，因为奴隶是不担負軍役的，并可被迫无間断地工作着：(2)奢侈风气的增长，把大量新

[1] 特立馬乔(Trimalchio)是一个有錢而无风趣的暴发戶。——译者

的需要引入罗馬生活里，而其中很多是需有奴隶的劳动来满足的；(3)在制造工业中使用奴隶日多，这項慣例在东方原早已存在，但在罗馬，却只在共和国历史的后期才被采用；(4)最后，奴隶人口的繁殖，由于需要奴隶来做的經济工作的增加，由于立法改进了他們的命运，奴隶人口的增加也越来越多了。

奴隶分成为两大类，即城市奴隶和乡村奴隶；前者是屬主人的城市产业的奴隶，后者是屬主人的乡間住宅的奴隶。这两类的奴隶按照他們所做的职务的性質，各可再分为各种类别。一个希腊人說过：罗馬人的富源在于农业，他們比希腊人較少需要使用奴隶于工业方面；这句名言在罗馬帝国时代已不复适用了，因为当时我們可看到大批奴隶在矿井里和石場上，在造磚場和玻璃厂工作着，也有充任織工、染匠、漂布工、婢僕等等。农业愈衰落，資本愈多流入开发工业方面而城市奴隶的重要性也愈提高了。占有奴隶就是投資，而小农逐漸被迫得走头无路。那些被剝夺了土地的农民中，富有冒險性的，往往不顧一切地移往别的省去，特别是移往边境上新省去；但是，很多人听天由命，流入城市里，在那里他們变成为富人的扈从食客，或者淪落于城市中日益增加的游民群里，靠公共救济来糊口，靠浴場和馬戏場来消遣。貧困的农民要找寻工作，甚至当个傭工，也越来越困难了。那反映公元第一世紀末期情况的《新約全書》指出在巴勒斯坦也是这样的，而巴勒斯坦是由农民居住着，那里經济和社会結构比在其他很多罗馬省，要簡单得多。馬太福音第 20 章：第 3、第 5—7 行里，曾提及有工人閒着站在市場上，等待被僱佣；西比太在他的加黎利海上的漁船上有着一队僱佣的船員，象希腊字"Misthotoi" 所指出的那样(《馬可福音》第 1 章：第 20 行)；一般講，在《新約全書》的时代僱工已不复被重視了，——"僱工逃走了，因为他是一个僱工"(《約翰福音》第 10 章第 13 行)。

使用奴隶来开垦土壤已成为日常事件。业主的农田，有时范

園广大，包括几千亩，由一个监工来管理，而监工本人往往就是一个异常聪明的奴隶，他监督着几百甚至几千个奴隶工人。G.C.C.以西多勒斯死于公元前8年，他在遗囑里，在叙述他因这世紀的內战而遭受了巨大損失之后，还傳留了四千一百十六个奴隶，三千六百对牛，二十五万七千头其他牲口。另外还有一笔約合二百五十万美元的現款。大田庄上的奴隶的命运是苦恼的。他們不在田野劳动的时候，被关閉在奴隶大营里；他們的工作时間是长久的；他們被监工的皮鞭赶去做工。因此，他們中間死亡率很高，但是，奴隶市場繼續由罗馬的战爭所获得的俘虜来补充着。下面一句話几乎成为早期罗馬农业經济上的格言：与其厚待奴隶，宁可使奴隶劳碌到死，另买一个新奴隶，較为合算。庄稼的价値比人还大。伽图屬于这种硬心腸、辣手的功利主义的类型。对他来說，奴隶只不过是一只很聪明的牲口，而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奴隶的。

大土地占有制大量地增加着，特别在意大利和非洲。对这改变了的情况，小农是无法进行竞爭的。他負担着軍事服役，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能驅使他的奴隶不断地工作着。大农比他能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場上出售牲口和农产品。結果，在相当时期以后，独立的小农被迫得无路可走。起初，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部分田地抵押，最后，須把全部抵押了。一般說，抵押的經手人把抵押品售給附近的大地主，而后者正急切地想要增加他的田亩，好几年来本已垂涎于他邻人的小塊田地时机終于来到，当那些独立小农从他們祖傳的田亩上被逐出的时候，这些田地就又扩大了大地主們的已經很龐大的地产。拉丁文著作里，有很多关于这弊病的怨言；当时的思想家已看到这是正在侵蝕着国家的元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按罗馬共和国最后一世紀的奢侈标准来判断，西塞罗过着朴素的生活，但是，他所拥有的一座宮殿，連同地基在內，使他花費了約合四十八万多美元的錢。自由农民阶層，即作为每个健全社会骨髓

的中等阶層，逐漸被消灭了。但是，有些开明公民所提出的抗議，完全无效。政府是由富有的資本主、政府承包商、随軍酒食商以及有錢地主所构成的寡头政治控制着。他們对这些抗議不予理会。罗馬史家阿匹安曾生动地描写这一項农业危机。

这項土地壟断的弊病遍及整个的罗馬帝国。尽管法律上限制大地产的占有不得超过一定的面积，但是大地主們用分散大地产于各省的方法来規避这項限制。第四世紀的一个作家A. 馬塞里納在他的《罗馬史》第 27 章第 11 节第 1 段內写了一句名言："世襲地产遍布世界"。这一句話是針对判官長 S. P. 普洛巴斯說的。另一个担任同一职位的辛馬奇斯，在罗馬城內領有三座宮殿，并在乡村里領有十五所田庄。我們不知道它們的規模怎样，但是它們的总数一定是龐大的，因为他每年的收入估計达九十万美元的价值——而当合法利率在 12% 的时候，这已尽了一个人所能搜刮的能事。这种弊病，在中意大利、非洲和高盧最大。象上文所說，在尼祿时代六个业主占有非洲省內耕地的半数。据弗倫提納的記載，在尼尔华（死于 98 年）时代，非洲的私人地产和城市的領土同样大小。

这些大田庄有时包括整个一郡，而它們的領主以私人資格，行使着过去地方政府的行政职权。地方政府和庄园政府已变为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在富豪的手里。政府的合法形式，只在理論上繼續存在着，而实际上已被代替。到第五世紀，帝国已变成为一个空壳。它昔日一度强大而集中的主权已經烟消云散，而分裂成一群有势力的私人土地所有者；他們执行司法、征集賦税、維持公路（当公路还在維持的时候），甚至由于情势或幻想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发动战爭。一句話，封建制度上台了。

近代法国的地方名称，还証明了第四、第五世紀这种情况。奥俾內是从一个罗馬貴族名叫阿尔俾那者得名，而这个城市的雛型，

就是那些在第五世紀中聚居在他的广大的世襲領地上的居民形成的。索力那克是从一个名叫索倫尼斯者得名；弗勒里是从一个名叫弗洛拉斯者得名。这些領地的大小一定是不等的。但是，甚至当时認为是小領地的，今天我們看来似乎已是够大，而那些“大田庄”則一定是大得可观的。在第四世紀，有一个富裕作家，記述了他在南法所領有的一个“中等”世襲領。在他的眼光里，它还是不够大，可是它已包括有四百亩谷田、一百亩葡萄园、五十亩草地和七百亩森林地。当日耳曼人进入罗馬帝国的时候，西方罗馬世界的情况便是这样。这种流行的状态，是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东哥特人在意大利、汪达尔人在非洲、法兰克人在高盧所看到的。他們自己的土地所有形式及他們自己的耕种方法怎样来改变这种制度呢？罗馬怎样来影响他們呢？这些問題，在另一章內将給以解答。

到第五世紀日耳曼人开始侵入帝国的时候，土地壟断的弊病已非常严重，实际上一个有势力的地主貴族阶層已經占有整个帝国的土地。自由农民和自由手艺人差不多已經絕跡。他們已淪为世襲大領地的农奴；他們住在那茅舍密集小村里，这些小村往往是和大庄园上奴隶“区”毗連着的。这些奴隶在一个人监督下，成群結队地耕种那庄园里的原有的土地。至于其他部分的土地則由农奴耕种。这种土地是从繼續圈圍附近抵押出去的以前的自由田庄而得来的。换句話說，农奴原是自由农，虽丧失对自己土地的产权，但仍准予留在原地上作为佃戶，来替大地主工作。但是，农奴是一个永远不复能回复其自由的佃戶。按法律理論来說，他的劳动，便是地主所勒索的“地租”。过去这塊土地原是他所領有的，現在它已变成为地主的产业，而地主已变成为他的主人了。用成語来說，他是“被束縛于領地”；因为他受到了永远还不清債务的束縛；他虽繼續以劳动来支付債款，但他是永远不能还清它的；因为債务积累的速度赶上了他以工作来償付的速度。农奴，如果逃亡的話，可加

以逮捕，押回受审，作为逃避债务論罪。又如果他被判有罪的話，那么，他就完全失掉其自由，而淪为一个奴隶，因为他既然一貧如洗，拿不出分文，就应出售其本人来繳付罰金。在这样的情况下，逃亡农奴如果能以受到痛打而过关，則已是幸运的了。

农奴或甚至事实上的自由人，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常逃到日耳曼人，甚至匈奴人中間去。448年时，有一个由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派遣到阿提拉那里去的使节，在多瑙河外的地方曾遇到这样的一个逃亡者。关于他們間談話的紀录，值得閱讀玩味：

"他認为，他在匈奴人中間的新生活，比他在罗馬人中間的旧生活还好。罗馬臣民在和平时期的境遇，比受战禍还更痛苦，因为勒索賦稅凶猛得很，又因为法律实际上不是对所有的阶級都生效的，所以，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富人犯罪不受处罰，而穷人犯罪則蒙受刑法制裁。"

除了上引文字以外，我們可举出一百年前另一个作家的話，来說明同一事情：

"多数人受少数人压迫。除强者以外，誰也不能逃避这批盗匪。穷人遭劫，寡妇嗟歎，孤兒受苦，終于很多出身名門的人，也逃亡到我們的敌人那里去了。他們因为不能容忍罗馬人中的野蛮人性，想在蛮族中找寻罗馬人性。"

概括說来，在第五世紀的开端，整个西欧是由有势力的地主貴族控制着的；他們占有着有时是毗連的，但多半广泛地分散的龐大世襲領，它們由两类劳动者，即部分是奴隶，部分是农奴来耕种。由于这些轉变，人口的移动，在总数上是很大的。商业和工业的萎縮，使城市人口减少。农业乃成为主要的，差不多独一的生产形式。財富是由土地来代表，很少由别的东西来代表的。跟着城市的衰落，乡村中兴起了很多由住在大領主的大庄园上农奴和奴隶构成的新社会。所有的大領地漸漸变成为一个私人业主手中的地方政府的单位，因而把合法的政权抹去了。

然而必須指出，即在后期帝国的最坏日子里，也从沒有过一个自由农或自耕农全部消逝的时期。毫无疑問，在罗馬城的郊区，小业主早已被排挤，同样可断言，坎佩尼亚及大部分南意大利已变为大地主領地，但是北意大利的一部分則沒有发生这种轉变。它还保存着大量的小农。大地主領地的弊病曾被很多历史家夸大。对过去总括性的論断，我們必須审愼接受。“大地主領地”(latifundium)这一个名詞是一个相对的名称。这大地主領地制度在非洲及东方各地，在罗馬征服之前，原已存在。在有些地方，大地主領地的形成，并沒有把农民阶層挤出，而这种制度，和象在拉丁姆、伊特魯立亚、坎佩尼亚存在的性質逈然不同的其他大地主領地制度，繼續在罗馬世界里并存着。罗馬作家所特别引为悲痛的，是意大利的大地主領地制度，可是他們并沒有看到那些起源不同、性質也异的其他大地主領地。在高盧、非洲及其他省內，虽然大地主領地起着巨大作用，但我們无法准确地决定它的規模。但也有理由相信：各省的大地主領地和意大利的大地主領地，在性質上是大不相同的。在有些省內，大地主似乎已从农民征收劳役或实物，和封建貴族一样。举例說，在高盧，罗馬貴族很巧妙地变換了旧的土地所有权，使农民阶級几乎沒有覚察得主人的变动。这类情况，也許在意大利的若干部分，特别是在北部同样存在着；这些农民，毫无疑問就是普林尼所說的“隶农”(coloni)；他們是以实物繳租，并以自己的工具来耕种土地的。

我們在罗馬历史和法律文献里，可看到各种描写一块大地产的名詞。这些名詞，虽是同义的字眼，但它們的含义却是不相等的。如果說这財产在种类上沒有什么重要的区别，那么它們的經济和社会条件却是大不相同的。“世襲領”(patrimonium)是由几塊土地或者往往散布各地的田庄合并而成的大地产。一塊单独的土地，叫做“地产”(fundus)；它只包括着一組房屋以及附屬于它們

的土地；“林牧地”(saltus)是一片牧場，或一片森林地或未开垦的土地，其中可能包括或不包括一些农田。在包括农田的場合，它常常也叫做“地产”(fundus)；“庄宅”(villa)这名詞原来指业主的乡村住宅或庄园别墅，后来，还用以指整个地产。到第五世紀，乡村住所經常包括了三个方面：孤单的农場、附屬的小村及庄宅。“庄宅”这个詞可以同样适用于而实际上是适用于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面。一个不附土地的庄宅叫做大“建筑物”(aedificium)。“小村”(vicus)这个名詞是有伸縮性的；在城市里它意味着一条街道，或一个街区；在农村里它意味着一个村庄；按后来的用法，它已很少用来指示一个乡村的大建筑物，因而已变成等同于“庄宅”一个名詞了。

罗馬皇帝在帝国中是一个最最大的地主，他在各省中几乎都有地产。就埃及来說，那整个国家是屬于皇帝的財产。其中有些財产是跟着共和国的傾复，移轉給帝国的；另一部分是从朱理安族龐大遺产的捐献得来的。阿古利巴（他的妻子是奧古斯都的女兒朱理雅）所領有的广大領地，在他死后，就移轉給皇帝。在每一塊新征服地上，一部分領土是为皇室保留的；所有的沒收、充公和归公的土地也使这个皇室領地的数量增加着。整个說来，皇帝的領地，叫做“皇室財产”(res familiaris)或者“国庫財产”。有几种財产，按其性質，是应屬于国庫的，例如矿地、石場、盐井、广闊森林地带。帝国政府把帝国内重要的自然資源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它也把大量的幷差不多包括每一省的麦田、农場、橄欖园、葡萄园等等，都归入国庫財产之中。皇后利維亚領有巴勒斯坦的四个城市，其中之一便是亚实基倫。

所有上述的領地，是在皇帝的支配之下，他专設一个行政部門来管理它們。其中有些領地，是直接管理的，其他領地則租出去，或分成几部分承包出去，但如果我們認为从这些財产所得的大量

进款，完全是私人的收益，那会是一个錯誤了。它們却是和近代君主国家中为了贍养王室、維持法院和支付文官俸給的撥款相同。英王的一部分收入是从康华尔直轄公領得来的，而这公領是一个王室領地。只有坏皇帝和揮霍的皇帝会濫用那些从皇家領地上所得的进款的。第一世紀中，加力古拉、尼祿和維特力阿斯的揮霍，使我們明白为什么維斯帕西安要实行节約而变为吝嗇；公元 69 年他登极的时候，据說，国庫已亏空了四千万。維斯帕西安所节省下来的，后来由多米蒂安花費光了。在第二世紀，安敦族的开明皇帝的时代，皇室国庫財产的管理，是又廉洁，又有效能，而且又可得盈余。可是，其中大部再次被科馬杜斯和卡拉卡拉揮霍一空。从第三世紀开始到罗馬帝国的結束时止，帝国的財政状况經常是在窘迫的状态中。在后来几百年中，国庫管理跟着所有别的事情一样，敗坏腐化。

对皇家庄园里的居民来說，所过的生活和在别处的生活，沒有絲毫不同的地方。乡村領地上的居民，是佃农或农奴；如果領地是一个城或鎮的話，他們是商人或手艺者。但是，他們不是隶屬于政府的普通行政官吏或长官，而是隶屬于皇帝私人的管理人，即受一个代理人或管理員的管轄的。

罗馬帝国和近代国家一样，所有的重要資源及各种財富，都須課稅。但是，在帝国后期的情况下，課稅問題变成为政府的主要利益的問題。原因是很多的：行政費用的增加、物价的上漲、貨币購买力的跌落和貨币制度腐化、富人用特权或規避的方法来逃稅（那必然会加重那些不能逃稅者的負担）、壟断和不公平的竞爭、資金消耗而无法节約、民众的日益貧困化、穷人的遊蕩、生产的下降（因为生产阶級，无論是农民、商人或手工业者，都日益变得心灰意懶）、社会风气的敗坏、政治叛乱（例如有些省的僭称皇帝的反叛，有时竟发展到好多省，并連續几年）、农民起义、盜賊橫行、費用浩

大的战爭(象波斯的战爭那样),这一切,几乎都是毁灭性的。其中有些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往往連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也不易弄得明白的。

古代政府很少理解那經济和社会势力的性質或作用,虽然近代政府也不見得在这些方面,可夸耀已有了多大进步。但是,如資本、信用、消費、价值、分配、使用价值、交換价值、流通、膨脹、間接税、不劳而获的增值、服务工业这类經济名詞,甚至工业这个簡单名詞,会使一个罗馬人觉得莫名其妙。拉丁文不能表达由我們看来似乎是簡单而熟悉的經济过程,那是由于罗馬生活比現代生活簡朴呢?还是由于思想上的貧乏和經济上的缺乏見識呢?"米尔西斯"(merces)这一个詞,在古典拉丁文中按上下文的語气可指工資、地租、房租、利息、价格。"利第脫斯"(reditus)这一个詞可指公共的收入,也可指私人进款。塔西佗創造了"公共进款"(reditus publici)这一詞以区别于"利第脫斯"(reditus),他前进了一步。

上文已提过,賦税負担的加重在后期罗馬帝国,——可以說从公元200年时起,已是一个严重的經济和社会問題;我們也已談过一些关于工商业的課税問題。現在我們应該稍为詳細地討論着罗馬帝国的課税这一个題目,特别是关于土地税問題,因为已提过,农业构成了罗馬帝国財富的主要泉源。

按广义,罗馬賦税可分成为两类,即直接税和間接税,尽管罗馬官吏是不会理解这种区别的。主要的直接税,是人头税和土地税:前者是向一切沒有罗馬或拉丁公民权的臣民征收的。在皇帝的省分內(因为那些省分是屬于皇帝独一的管轄权范圍),土地税是按年产的一定比例額征收的;在元老院省內,土地税是每年向各省社会所課的一个規定的总額。主要的間接税,是关税以及第三世紀起所征收的"金銀税"。这两类税,上文已經說明过。此外,另有較少普遍性的間接税:一种1%的售貨税,一种奴隶釋放税,一

种只向罗馬公民征收的5％的遺产税。其中好多賦稅就是征收所課稅的实物，如屬动产，則征收所課稅的財产，虽然征稅吏所作的收稅报告里，这些課稅是以貨币数字来表明的。甚至連在埃及，也是这样，在那里，征收了琉璃、紡織品、紙張等等，并在出售以前，把它們堆儲于政府倉庫之內。

罗馬帝国对其臣民，要求担当若干种义务性的公共服务。这些服务，叫做"公役"。其中最苛重的，是在各省內及各城市內須要維持驛站，即帝国郵站，就是說，須要給养信差用的和馱物用的馬匹以及騎师、馬夫、厩丁，另外，还須招待那些往来的官員。其他强制性的义务是："賞金"①和"献金"；前者在理論上是一种自动的，而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捐款，每隔五年从城市官吏，征集一次；后者是一种相类的稅，加在帝国的元老阶層身上，实际上，就是加在大土地所有者貴族身上。各省的元老阶層，和罗馬城元老院，沒有什么相干。其中很多人，从来沒有到过罗馬城。元老的头衔，到第四世紀，已成为一种社会尊严和貴族地位的标志；它是大地产占有制的表面象征。总起来說，土地稅，是由土地所有者阶級来繳納的，工商稅是由中等阶級来繳納的，人头稅由下層民众来繳納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外表現象。因为賦稅的負担归根到底总是回到人民大众的头上去的。地主阶級可把加在他們身上的賦稅，或以增加地租的形式轉移到他們的佃戶方面去，或增加对农奴和奴隶剝削。至于商人和制造家，他們可把售給消費者的貨物抬高价格。

无可否認，罗馬帝国，就征稅方法来說，是不科学的，是粗糙的。例如，一个矿場的价值，是按它所僱佣的矿工数目来作估計的。又如一塊土地是按它的面积来課稅的，至于土壤的肥瘠，耕种

① 賞金(aurum coronarium)是各省献給胜利将軍的。——譯者

的难易，或位置的优劣，都不加以考虑。

罗馬帝国从第三世紀起开始逐漸衰落，并接連不間断地衰落下去直到灭亡（其中的原因和过程，我們将在下文再談），这种情况使課稅問題，越来越被推到前台了。政府靠課收新稅来弥补国庫的經常亏空；同时，把旧稅，更加推广开来，象218年卡拉卡拉扩充人头稅那样；稅率也不断地在提高着。

第三世紀的危机，使局勢发展到頂峯了。那一世紀的好皇帝，象奧理略和普洛巴斯之流，曾企图进行这种或那种改革，但是都沒有成功。直到戴克里先（284—305年）和君士坦丁（311—337年）时代，才有持久而又徹底的改革出現；他們大刀闊斧地革新了行政，使帝国得延长了寿命。意大利原是豁免了繳納稅賦的，而戴克里先把征取貢賦办法，同样适用于意大利了。这項措施除了具有經济上的公平性以外，还清楚地标志着：罗馬和拉丁貴族所享有的特权和勢力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此之前，他們的崇高身分，由于卡拉卡拉的扩大罗馬公民权，原已降低下来。

但是，戴克里先所作的最重要的賦稅改革，在于修正土地稅。他編制了一种新的土地清丈册，并建立了一种新的課稅估价法。土地稅一向是以“牛軛”①（这个名称是从拉丁文“牛軛”这个詞得来的，大約等于一对牛在一天內所可犁耕的面积）作为单位的。过去，政府征收土地稅，按照土地的面积，而不分土地的肥瘠的。現在，戴克里先按照不同的肥沃性、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用作果园、葡萄园或草地那样，建立各种不同等級的“牛軛”单位。他还把“牛軛”单位折算为一定数目的牲口或劳动力。比如作为相等“牛軛”单位的劳动单位，規定为一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在田地上耕作的劳动。对这些改变，大土地所有者，大声叫囂抗議。这是很

① “牛軛”(fugerum)是古罗馬量地单位，与二万八千八百平方呎的长方形的面积相当，就是二百四十呎长乘一百二十呎闊，約二十五公亩。——譯者

易理解的，只要我們注意到貴族拥有多么大的世襲領財产的时候。但是，这項制度是賢明的、公道的，而在戴克里先的时代，也是徹底实行的。

約在尼祿时代，物价的高漲，换句話說，貨币購买力的跌落，已开始尖銳地显露出来了。几代以来，罗馬吸收并壟断了那流通于地中海区的貨币。罗馬人用剝削各省所得的万千貨币，建立了持久的投机方法和成功的高利貸制度。巨富的豪华生活引起了奢侈品的大量消費，而这种奢侈品的貿易，又使大批貴金屬，尤其是白銀，源源輸出国外，流入西亚、印度，甚至中国。罗馬帝国不能以相应的国內产品，来抵消輸入的东西；結果，它的貿易差額，經常是入超的。在东亚文明国家里，帝国的糧食和制造品，却是找不到銷路的。从印度来的輸入商品，无可比拟地远超过那些从帝国輸出到印度的东西，而当时的亚洲人，和現在一样，是有着窖藏金銀的明显傾向的。

罗馬金銀数量的縮減，当然也是由于罗馬人把很多金銀消耗于艺术方面，那自然是絕对非生产性的消耗。其次，那些边境上的蛮族地区，特别是萊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地区，还窖藏或埋藏着大量金銀。到了第三世紀中期以后，金銀矿的出产已不足以弥补这項亏空了。

在罗馬共和国时代，白銀原是主要金屬。但在帝国早期，制造了金币“奧勒斯”① (aureus)以及比較少量的銀币“德那里”(denarius 即銀便士，九十六个便士合成为一鎊)和“塞斯脫”(sestertium 或 sesterce，相等于便士价值的1/4)。第一和第二世紀里，銀便士約值十八美分。在亚历山大·塞弗拉斯(死于235年)时代，它的价值已不到七美分了。它已含有50%—60%的杂金。因此，跟着銀

① 罗馬金币(aureus)有着不同的分量，而且繼續貶值；在苏拉时代等于1/31镑，到戴克里先时代降到1/70鎊。——譯者

币的贬值，黄金騰貴而物价高漲了。从 250 年以后，当銅币及銅錫鉛混合币流通的时候，政府乃要求以黄金或白銀来繳納稅款(即金銀稅)，虽然它有时还以贬值的貨币来支付了自己的开支。

戴克里先的貨币改革，包括他的最高限价法律，恢复了銀便士（德那里）的信用，采用了几种新銅币，制造了一种新金币（奥勒斯）。在公元 300 年时，白銀对黄金的比价，似乎曾是稍高于14:1。君士坦丁的功績之一，是他企图并部分地完成了把罗馬帝国币制放在金本位之上，并把那高到 48% 的利率降到 12%。可惜这种改革不能維持久远。罗馬的貨币問題，和它的經济和社会問題一样，已經无法解决。它的整个文明繼續在瓦解着。

戴克里先所进行的經济改革中最著名、又最受人欢迎的，是他的所謂价格詔令(301 年)；严格說来，它不是这一种名实相符的措施，而是一种最高限价的法律。这項詔令的序文中，已明白地指出說：“朕决心要規定的，不是这些貨品的价格，那会是不公道的；而是这些貨品无論如何不准超过的限价。”这項法律的原意，在于保护政府来防止对各种供应品的过高索价。皇帝抱怨地說：“由于壟断者的貪婪，朕对軍队的供应，已成为不可能。貨物的价格已增加到四倍，甚至八倍于它們的实际价值了。”但是，这項詔令所产生的效果，一定也会减少对别人，即政府圈子以外的人的勒索高价的。的确，这項詔令也列举了很多和政府沒有直接关系的許多項目、业务和商品。詔令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那些谷物、羊毛和皮革屯积商人猛抬食物及其他必需品如服装、鞋子等的价格。这詔令是否曾施行于或想要施行于整个帝国，还是一个爭論的問題。但是，历史家都同意这一点，即在实踐上，它只是在希腊及帝国的东半部，获得了成效。

虽然不可能按近代貨币来說明当时的物价是怎样，但也有理由可猜想在第四世紀中(不是按今日的条件)，物价仍然是高的。关

于确定当时物价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是把詔令中所列举的各种项目，来互相比較一下。一蒲式耳[①]的裸麦价，值三双多鞋子，一磅猪肉的价格等于今天二倍或三倍于一磅猪肉价格的各种制成品。由此可見，食粮价格是高的，为什么？因为种田劳动力的缺少呢？还是因为生产率的下降呢（由于土質肥沃性的递减或由于耕种方法的不良）？是否奴隶种田比不上自由人种田有利呢？好多年来，在农村里，曾否有农民流入城市的現象，使种田方面缺少劳动力呢？要是这样的話，我們又怎样来解释那农村工資反比城市工資低下呢？那是由于奴隶和农奴的竞爭嗎？提出这些問題，比回答它們，容易些。这項詔令在比較城市工人和乡村劳动者时，指出，城市里的自由工人所得工資是不差的。显然那陷入奴役状态的趋势，在农民中間比在城市工人中还大。現在，我們所談的，是又复杂、又难于捉摸的各种現象，其中部分是經济的，部分是社会的，部分是政治的，而它們又錯綜地互相起着作用。

戴克里先时代的繁荣（連当时象拉克坦蒂阿一流的反对他的人，也予承認）与其說是由于經济建設，不如說是由于行政改革和强硬統治。就这些改革的本身言，花費是浩大的，特别是关于宮廷的改組：帝国分成四个总督区，每区有着一个宮廷；繁华富丽，仅次于皇帝的宮廷；宮廷以及省政府的官員在人数上也增加起来。毫无疑問，在戴克里先时代，賦税的負担是在加重，不是在减輕。

从君士坦丁时代起，課税問題成为政府的，也是人民的急切注意的問題。当这位皇帝建立“微賤公役制”(sordida munera)并征收一种“超貢賦”税的时候，富人們瘋狂地爭求特权和免税权；这种爭求状况，是破天荒的。他們鑽营教会圣职，或在許多异教中間求得宗教职位[②]，已成为一种令人起反感的醜事。这种勾当是有成

① 蒲式耳(bushel)，量名，用以量谷类的，也可譯为蒲。合8加侖。——译者
② 当时，异教僧侣和基督教僧侣是同样享有免税权的。——譯者

效的，因为君士坦丁发觉了：他必須收买富人阶級的好感，来获得他們政治上的支持。一个第四世紀的作家薩尔維抱不平地說，"現有很多富人，迫使穷人負担他們的貢賦，同时富人又对穷人提出新的勒索，迫使他們繳付"。

君士坦丁保存了那些从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198—211年）到戴克里先（284—305年）时代逐步建立起来的壟断事业。君士坦丁的賦税管理中所做的显著变革，是"小纪"制度①的建立。这不是一种賦税，而是一种决定税率及重行估价課税单位（即"牛軛"单位）的办法。它的第一次規定，是在313年。它的原来用意，是使評价和課税估价，除非每次間隔了十五年时期，不应有所变动。但是，事实上这个时期不久递減到十年、五年，甚至三年了。据說"小紀"制度曾产生一个嶄新的紀年法，就是，按十五年时期来計算时間，标出第一、第二或第三等等小紀，来記述事件曾发生于某一小紀的某一年代里。由此可見，第四世紀中的賦税问题，是多么重要了。这种新穎的紀年法曾保留到罗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紀史家，迟到十一世紀时为止，还是在沿用着它。②

在整个第四、第五世紀中，賦税負担繼續加重起来，而这正是在帝国日益貧困化的时候。圣巴錫尔用下列比拟来描写这一禍害：他說，"比如有一个船夫在洶涌的波濤里駕駛着一叶扁舟，正在他应該減輕船貨，竭力使船平稳下来的时候，反而有人再以行李什物滿載于他的船上。"因此政府势必一省又一省地撤銷欠税，并減低課税估价。公元311年君士坦丁曾把爱提安人所欠的五年税款予

① "小紀"（indiction）包括十五年，系君士坦丁所創立的会計年度。——譯者

② 找出小紀的方法，是在普通紀元年代的数目加三，再以十五除这和数，所得余数即是"小紀"，如果沒有余数，"小紀"即是十五。另一确定小紀的方法，是从年代数目中減去312，用十五除之。这种老方法对历家来說是有用处的，但是对常人来說則是令人头痛的，尤其是因为按照这种計算方法，年代必須从9月1日开始，到次年8月31日为止。

以豁免，并对他們以后的課税估价，削减了1/4。公元356年朱理安对高盧人做了一种类似的事情；虽然由于安密亚那斯·馬塞里納[①]（第16卷，第5章第14节）对这事的記載模糊，我們还不能断定他究竟做到什么程度。瓦倫丁尼安一世慨歎着他政府无可奈何地对人民所加的賦税負担。公元422年，霍挪留也大量豁免了非洲的賦税，在那里由于多那特异端派的叛乱及努米底亚人的侵略，全国已有一半遭到破坏的地步。

自从布尼克战爭以来，罗馬的私人、金融、銀錢业和政府已保持密切的联系。罗馬共和国和罗馬帝国在这方面，都和近代国家沒有什么不同之点。在格·白兰德司新近出版的《論凱撒》一書里，我們可讀到下列一段文字：

在共和国的最后两百年中，罗馬財富对立法和公私事务所发生的影响，日益增长起来。理財家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上，越来越占着重要的位置。那些势力雄厚的团体，如雨后春筍般地一批一批兴起，来做政府的生意；就重要性来說，它們不仅和政府机关分庭抗禮而且有时还会凌駕其上……在罗馬城金錢是万能的。西塞罗常常提及債券……老伽图以苛重的利率，放款給无数的借債者。布魯特斯以48%利率放款；曾迫使五个无力还債的元老餓死。龐培靠着他的軍队和他的势力，迫使城市接受他放款的这种苛刻的交易；然后再靠这种势力来收集这些放款以及他所想要的成百万的利息。

当时，罗馬共和国在各省內包税的恶习以及委派沒良心政客和成功将領充任各省长官的陋規，也加剧了这种政治和銀錢业之間的关系。

到帝国时代，有才干的皇帝，特别是奥古斯都、提庇里斯、图拉眞、哈德良之流，取消了这些陋規恶习，并把財政管理放在廉洁而有效的基础之上。政府和銀号老闆間的关系虽依然繼續着，但是

---

① 罗馬史学家（約330—390年），著有《罗馬帝国史》，凡三十一卷，留存下来的只有十八卷。——譯者

銀錢业营业却已由政府来認眞监督，这监督任务，在罗馬城內由城市总监，在各省由地方長官来执行。当时，地方長官按他的省屬，帝国省或元老院省，分别对皇帝或者元老院直接負責。銀錢业对檢查人員必須公开它們的帳册，并呈交它們营业的証件。这些帳册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記帳，登記每天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第二种，是流水帳，登記每一个人或一个公司的存款和借款。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帳，是收入和支出的清册，記录每一笔錢款的經营和投資以及有关人的姓名。

另从各城市物質和道德的敗坏方面，也可以看出罗馬帝国显著的衰落狀态。为了充分認識这敗坏的重要性，我們必須記牢：罗馬帝国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机地汇合而成的一个大联合。各城市宛如人体里的細胞，是最小的，可是最有活力的有机体。在罗馬世界里乡土观念远远地强于我們的时代。但民族情緒却不存在。种族感覚也不显著。帝国除了它地方上接触民众的机构以外，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罗馬人的愛国心，只是在对自己的城市或乡土的愛护和忠誠方面表达出来。

在第一和第二世紀里，富裕公民为了公共目的，对城鎮慷慨解囊，已是寻常事件。在奥古斯都时代，有一个阿提那城的富人遺給本城公民的財产，达一万二千塞斯脫。几年以后，又有一个馬釐城的公民，把他的全部財产遺給城市。小普林尼，曾有一时抱怨自己不是一个富人，后来在发財以后，他陆續捐給他的本城科摩六十万塞斯脫，約合七万五千多美元。其中 5/6 款子，充作那免費发給穷人食粮的基金，其余款子充作建造公共图書館的經費。在去世的时候他遺囑以五十多万来建筑浴場和救济穷人，另給一千个自由人終身养老金。还有一个富人留給本乡四十万塞斯脫。

原在帝国的盛世，有勢力的公民曾爭先恐后地竞爭市政官位。这批人通常是巨富；他們能以自己的資財，来維持这种官位的开

支，来供給遊戏和竞技場那样的公众娛乐。法律虽然使他們对中央政府向城市所征税款如有不足应負責任；但他們并不因此裹足不前。他們覺得，即使遭受可能的損失，这职位的体面却已使自己够光荣了。的确，当时"光荣"和官位是同意义的名詞。但是到了第三世紀，情势迥然不同了。在那个时候，我們看到拉丁字"onus"意即"負担"，作为官位的代名詞了。这种改变，首先出現于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时代，他死于211年。可是，城市衰落的象征，早在图拉眞时代（98—117年）已有显露，因为我們看到那位皇帝給小普林尼的一封信里，提及那些不愿意担任"什长"① 的人。然而对城市財政上的亏空，往往应由城市本身，而非中央政府的苛捐杂税負責任的。因为城市时常在进行公共建設、兴建戏院、浴場等等上面揮霍金錢。很多城市已陷入这样严重的破产状态，使哈德良和馬卡斯·安理略不得不指派查帳員去稽核它們的帳册以及阻止它們的浪費了。由于城市管理的不善，有时城市自治权被撤消，从而城市政府归并于省政府。这种中央集权化的过程，虽可認为是遺憾的，但却是无可避免的。凡是批判这种趋势的人，应該好好地記牢这一点，即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增长，一部分也是由各邦政府的貪污和无能所引起的。

当什长的私人财产遭受危險的时候，他們势必榨取商人和店主，来挽救自己的破产；結果，那些苛重的捐税逐步削弱了整个帝国的中等阶級。为了搪注亏空，政府往往占取城市的公地，并照例把它們售給附近发財的地主，这批人的后嗣，后来就成为这个城市和它的周圍土地的封建主了。朱理安皇帝曾以沒收了的城市公地还給城市而声名远揚。到了第四世紀，城市状况达到了这样的严重地步，以致政府强迫有錢的人担任官职，并有系統地以消耗私人

① "什长"（decurion）是十戶之长，或市評議会的議員。——译者

財富来平衡城市的預算。为了这項目的，使城市官职成为富貴家族的世襲职位。如果什长逃亡的話，他将被抓回，受处罰；他从此不得再离城市他去。

城市和乡村的一般貧困的增长，也在各省內的农民起事和沿海的海盗猖獗方面表現出来。对这些問題，各省长官往往是束手无策的。因此有許多沒有城垣的城市，就赶速筑造了城垣，而富裕的地主也把他們乡間的庄宅改为有墙垣的或有塹壕的田庄了。地方将領或有野心的貴族，正好混水摸魚，从中取利了，而在第三世紀里，有几个省分的确曾好多年脫离了帝国而独立，特别是高盧省。小朴茨默斯，是高盧的一个"僭主"的兒子，曾发表多次演說，把他所講出的經济和社会痛苦暴露无遺。他說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了。他好象几乎已經預見到284年巴古达地方①发生的农民大叛乱。他大声疾呼地說，"从前我們有法院和法律。而現在弱者备受压迫了。該死的富人們！如果穷人真觉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話，注意他們会使你們同归于尽的。"尽管在这些演說里，包含着很多煽动性的呼吁，但是他所描写的真情实况是显然可見的。戴克里先，在他統治的第一年里，鎮压了巴古达的起义，并大力处理了政府所面临着的各种經济問題。但是，他所能做到的，只是暫时阻止了衰落的进展。他終沒能够把局势长久地扭轉过来。

为了摆脫負担，邱里亚②阶層所可找到的唯一出路，或者向上爬到元老地位，或者加入僧侶阶層。我們可以断言，在第四世紀中，好多中等阶級的上層的"皈依宗教"，与其說是由于什么宗教信仰，不如說是由于自私自利的心理。僧侶所享的"恩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特权。但是，追求元老的特权、更甚于追求僧侶的特权，

① 在高卢。——譯者

② 邱里亚(curia)原是古罗馬部族之一，这里是泛指罗馬中等阶級的上層分子。——譯者

因为前者是可傳子傳孙的。法国历史家佛斯特尔·得·庫兰曾主張：中等阶級的上層以爬上元老地位而逃避了負担的人数，多于向下淪落者；只是中等阶級的下層，遭受着社会不景气和貧困的灾难。

我們有很多理由可支持这个論点。在后期帝国，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时候，罗馬皇帝越来越依靠富人了。但是相反的說法也是对的：富人越来越控制了政府，要不然的話，他們变得勢力十分强大可以不把政府放在眼中了。罗馬皇帝一向切望維持元老阶層的尊严地位，有时竟令人奇怪地立出法律，来保护这个阶層的威望。从中等阶級的上層对元老地位热衷追求看来，已可証明：这等級所享的特权一定大于它所負的义务。事实上，我們也已知道，它享受着范圍很大的豁免权。但这些豁免权的內容是随时变更的，有时且被削减；举例說，在 387 年后，元老阶層必須捐助公路桥梁的修建；供应兵士宿舍，起初是自愿的，后来逐漸成为元老阶層除了少数特权者外的一般义务；至于提供新兵，起初也不是强制性的，但在 375 年也推广到元老阶層了。

政府官員的豁免权比元老的甚至还要大些。一般說，这批官員同时也是大土地所有者。罗馬皇帝表現出对他們的特別照顧，使他們不受国庫稅款的追索，还特別关心来帮助他們繳納稅款。元老业主是不付苛捐杂稅的。元老領地所有者，在他們的人員中，有正式的商人；他們借助他們主人的金錢、信用和名义，能够完全压倒一般得到营业許可的商人的竞爭，使后者陷于破产。查士丁尼新法告訴我們：教会、地方长官和高級元老所經营的私人制造厂，由于免稅特权，破坏了正規的工业組織，查士丁尼取消了君士坦丁堡的这种恶习，但是，在别的地方它可能还是存在着。

然而，元老阶層儘管享有各种特权，也不是完全免繳賦稅的。君士坦丁部分为了增加收入，部分也許为了分化元老阶層，以两种

新税，加在它的身上。因为社会上尊严地位甚至也可用賦税来賜給的。我們可看到元老阶層为反对皇帝的政策，所发出的很多怨言：例如，佐息馬斯，在其著作第2卷第38章①，譴責了君士坦丁。但是，奧林拜杜魯斯告訴我們，在第五世紀中期，很多罗馬家族还有着大量常年进款。那拥有最多土地的貴族阶層，几乎完全支配着帝国內所可利用的資本，并因为大家族的数目，通过同一阶層家族間的联姻关系，經常縮减，这些龐大財产，非但不会分裂，反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了。当时，大土地所有者阶級中的趋势，就是形成規模更大、数目更少的地产。第五世紀的地产和第一世紀的地产已是大不相同了，尽管有些历史家，还沒有观察到这点。

大領地領主拥有不断增加着的財富，也表現出日益脫离政府的独立性。罗馬皇帝在剝夺罗馬旧貴族的权力里，在縮减他們的古老的家族特权里，扩大了財富的优势；久而久之，大財产的所有权却反过来反对政府了。富人夺取了政府控制权，并在半私半公的地位上行使了这种权力。甚至在第二世紀的末期，我們已可听到各省长官对私人僭窃政权的訴苦。地方大紳士可拦阻政府官吏对罪人的追捕。克劳第烏斯·哥的克斯在第三世紀的末期，曾力求革除这种庇护犯人的弊端。可是，中等阶級上層，为了逃稅請求大貴族的庇护；从而使皇帝遏阻这种发展过程的企图，成为徒劳无功。中央政权的日益衰敗，看来又可憐又可笑。狄奧多西一世曾設立一种农村警察，即“治安維护者”，但在409年时狄奧多西二世，因为这种警察干着盜劫勾当，不得不取締它，并把地方警察的职务，委托給大領主本人。換句話說，公共行政权已移轉到私人手里。按狄奧多西法典，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上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应受逮捕，执行逮捕者，不应是国家官吏而是領主的管家。只有領主

① 他是希腊的异教历史学家，著有《新历史》(Historia nova)。——譯者

拒絕执行的时候，皇帝的官吏才可使用武力。国家非取得奴隶主的同意，不得捕拿犯罪的奴隶。馬約林不平地說，許多大領地已給稅吏以閉門羹了。在帝国后期，大領主常常庇护着逃亡奴隶。圣奥古斯丁說过，自成一个单位的庄园，实际上是独立的。在查士丁尼新法和历史文献里，已可十分明显地看出把行使公法作为私人权利这一点了。强者侵占弱者的財产，已是寻常事情。私产很少有安全保障。有势力的人們厚顏无耻地掠夺离乡者的財产，搶夺孤兒寡妇的財产。一个罗馬总督劝告一个朋友趁着一个富孀离开的机会，侵占她的財产，同时他本人发牢騷說，他自己在摩里得尼亚的財产遭受了那里的长官的侵犯。在卡帕多細亚，那些替大貴族服务的奴隶軍队，曾对皇室領地进行搶劫。薩尔維在其著作的每一頁上描写着小业主仰富人的鼻息。

当时，大領地越来越成为国家中的半独立国家，成为地方主权的小島；乡村和城市的下層阶級，为了避免盜劫、蛮族掠夺，为了逃避苛捐杂稅的勒索，越来越多地向那里集中，以求庇护。无論在东方或西方，小业主和隶农为求避免各色各样的苛政，請求大領主，或政府官員，或軍事司令甚至或皇室領上官員的庇护。庇护已成为一种制度了。第四世紀中演說家里巴尼斯曾以全篇演說来談这种习惯所发生的恶劣影响。有些村庄全村請求庇护，在埃及尤其如此。它的效果是：阻塞了皇帝的权力的施行，妨碍了司法的执行和賦稅的征集，以至使政府权力化为烏有。尽管皇帝曾企图限制这种习惯的傳布，但无論在东方或西方，它还是方兴未艾。在小亚細亚、在西班牙、在埃及、在高盧，都有这种恶习的存在。

后期罗馬帝国轉变过程中的基本特征是：大地主幷吞着周圍的小塊土地，有产阶級由于庇护制度盛行，不断增加着他們的經济和政治权力。这些过程破坏了帝国政权的完整性和深刻改变了帝国社会的結构。

上述的大領地，是經济实体，也是政治实体。領地上的农奴可找得它們所需的各种东西。每个大領地，象美国內战前南方的大农場一样，是有倉庫的。在法律条文和銘刻里，常常說及：为了当地平民的便利，在領地上設立了工場和商店。每个領地的社会，宛似一个城鎮，有着商場和市場。我們可找出普林尼时代的資料，来証明：这些大領主的市場，是經由政府認可的。关于这些領地市場，有两塊从罗馬非洲省得来的碑銘，特别有力地証明了这一点。第一塊是关于公元 138 年"元老院关于貝基安塞斯牧場区市場的决議"原文；它批准大地主路求·阿夫立揆那在他的土地上設立一个每月开市两天的市場，即在每个月的 2 日和 20 日。第二塊，是关于一个妇女叫做安托尼亚者，她在領地上設立一个类似的市場。碑文上还曾說及别地方的領主市場。因为"牧場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同于城市，往往又是規模很大的，所以，它常常自有一座或几座教堂，自有教士，而且(非洲)还自有主教。

上文已討論过各种問題，現在我們可以談一談那些住在世襲貴族大庄园上乡村农夫群众(奴隶除外)的經济社会状况；换句話說，討論隶农制的起源、性質和扩張。隶农(colonus)这个詞，第一次出現于 332 年君士坦丁的上諭里。可是，在罗馬社会中，这个阶級的起源和发展日期还要早些。隶农阶級不止于一个源流。从历史上看，凡是完全是独一的而又包括一切的理論，总是站不住脚的。我們至少可以找出三个源流：被削弱了的貧困自由小农；获得部分解放的奴隶；移居在荒地或空地上的"蛮族人"。有些作家認为：重稅和政府的压迫，是隶农制形成的原因。另有些作家則从那些空泛而又难捉摸的經济社会力量的作用方面，来找寻各种原因。

隶农是依附的农民，耕种屬于别人的土地，以金錢、服役或实物来繳付地租的农民。按术語来說，他們是自由人，可是实际上，

他們在永远还不清的債务压迫之下，是被束縛于土地的。这項債务移轉給他們的子子孙孙，这样就发展了一个世襲的奴隶阶層。这一类的农夫，在历史根源上、身分上，都异于眞正的罗馬农奴。后者原是奴隶，由于获得其主人的准許，得自行耕种着那从奴隶群耕种的大土地上划出来的一塊土地。

在罗馬帝国内隶农的身分，按术語来說，在法律面前是一个自由人——就是說，不是奴隶——但按經济地位来說，是一个不自由人。如遇他所耕种的土地被售出的时候，他連他的家族，一起跟着那产权的移轉，而轉給新主人了，因为他的債务原是由于他借以为生的土地而背的，而不是由于那土地的所有人而背的。只要他能以服役（服役逐漸由慣例来規定的）繳付他的地租，他不得从这田庄上被逐出去，他或他家族的任何成員，也不得被出售为奴隶。在这一点上，隶农的状况，是远优于奴隶的，因为奴隶仅仅是一种工具；可把他本人出售，或者出售其家屬給另一主人，而使他同家屬分离。

但是，尽管隶农的法律地位和奴隶的法律地位这样明显地区别开来，可是，两者的社会地位则完全混淆不清了。他們都是屬同一个人支配下的"下賤"劳动者，那个人是主人，也是的的确确名实相符的地主。隶农的茅舍和"奴隶区"的小屋，是彼此毗連着的。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又是不相上下。一个隶农的兒子繼承其父亲的身分；而一个奴隶的兒子也繼承其父亲的身分。历时旣久，这两类人的子女，因为在一起成长起来，势必发生联姻关系。这种情况，后来变成这样普通，以致法律終于規定了这种双重身分的婚姻，所生的子女应繼承其母亲的身分；举例說，如果一个隶农娶了一个女奴隶，他們的子女，也是奴隶。其次，君士坦丁关于財政政策的严峻立法，又使隶农制硬化成为永恒的农奴制了；因它不准任何人放弃他出生所屬的职业。象早期的工业劳动一样，現在第四

世紀中，农业劳动，也成为严格的世襲职业。① 跟着时間的进展，我們就看到了整村整村的隶农。

到了第三世紀罗馬帝国內发生了“弃田”的問題，这个問題从那时起，使最英明的皇帝也覺得寢饋不安。促成这个問題的因素是：农村劳动人口移入城市的趋势（这趋势直到被强制隶农世襲制所阻止时为止）、資本的萎縮、沒收性的課税、富裕地主的竞爭、地力枯竭、自然資源的荒廢（387 年圣安布洛兹“看着亚平宁山区的荒蕪景象，感到伤心”）、不安全状态、盜风昌熾以及蛮族的不时侵襲。甚至早在哈德良时代（117—138 年），我們已可看到把日耳曼人輸入来拓殖这些被遺弃的土地。馬卡斯·奧理略大規模地使用了这种制度。他的傳記作者写道：“他把无数的蛮族人移住在罗馬土地上”。第三世紀，那些主張改良的皇帝，曾把这办法发展到最高峯，特别是普洛巴斯；他被說成是“把罗馬省日耳曼化”。他曾把汪达尔人移殖到不列顛，阿勒曼尼人〔日耳曼部落——譯者〕到亚尔薩斯，革坡德人和加森基人（哥特人）到米西亚，法兰克人到安如，甚至到黑海沿岸的本都，又有几千几万的巴斯特尼人，即凱尔特人的最后一支，也从萊茵河东岸携老扶幼，移入色雷斯去。他的傳記作者还写道：“蛮族人替我們劳作，替我們播种。”一个君士坦丁的贊頌者誇耀說：“法兰克人耕种着我們的田地”，另一个人宣称：“錢馬維安人和法里西安人替我們耕田。”

关于建立上述日耳曼人殖民地的經济意图，我們可从狄奥多

① 拉伯斯雷：《土地所有权的起源》，《美国历史評論》，第 8 期，第 430 頁。“农奴制較奴隶制能更好适应新的农业状况，起初是政府，其次是城市，再后是教会，采用了长期租賃的办法；最后皇帝芝諾也承認私人业主采用这种办法的合法性。第六世紀和第七世紀中，所可看到的农村經济的最普通形式，是田庄划分成为两部分：地主的住宅附近田地，由奴隶来耕种；其余的土地則分成份地由依附佃人来耕种，不管他們是自由的或依附的……所以他們和隶农化成为一体了。阿那斯塔細亚曾規定：凡是使用別人土地的自由人，当然是被束縛于这土地的。”

西二世的一項法律里(公元440年)清楚地看得出来，該法律条文說：任何地主得向“判官长”申請那些从新近征服地息立来的劳动者。第五世紀的一个作家左息馬斯，也証明了这同一的事情：“好多省內的本地人口竟減少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蛮族人移殖到那里，来接替他們，地方名称也竟被改变了。”这后一項的論証是有趣的，也是正确的。

在几个东方省內，农业的荒廢是由綿延和持久的旱灾所促成的。在阿拉伯省、巴勒斯坦和息里內易卡，情况尤其是这样。

和上述提倡开垦弃田的正式企图同时并进的，有很多“擅占土地的行动。”① 这些弃田和擅占土地的行动使罗馬法律增加了一条新的条款。罗馬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私产的不可侵犯性。可是，在193年，皇帝帕提那克斯，在发給阿拉伯和叙利亚各省的一項詔令里，有下列規定：如果有人进行耕种弃田，这塊田地就成为他的財产。如果旧主人在两年之內想要恢复它，他必須偿还給占据者对土地上所作的一切改进費用。如果占据者占有土地已滿两年，而原主从未提出抗議过，他就获得这塊田地的产权。在193年帕提那克斯的詔令之后，另有瓦倫丁尼安、阿卡狄阿斯及霍挪留的各項詔令。可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是：这項新立法反映出那久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前，关于“死”地的阿拉伯人慣例。的确，瓦倫丁尼安的宪章，特地指出：这宪章的用意，在于維持他們中間的土地慣例。

这許多不利的力量同时起着作用，有时联合在一起起作用，使帝国人口逐漸縮減下去。在意大利早在公元前一世紀时，人口減少現象已經显然可見，而在外省內，則出現于早期帝国时代。公元166年的疫癘以及后来251—253年間的疫癘，特别严重地影响着

① 指沒有权利而擅自居住在新地或空地上的行动。——譯者

帝国的东半部。在第四世紀，坎帕納的蕭条景象已經显著，虽然它人口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外移而不是由于死亡所引起。甚至連埃及的人口，也在萎縮着；如果象埃及那样的国家，如此免除了旱灾，人口如此稠密，还有人口减少現象，那么，你們想想，其他条件不如埃及优越的地方的情況，又会是怎样呢？埃及人口縮减，已由第四世紀的一个历史家尤西比阿斯保存下来的文件証明了。他說，在亚历山大城，按救济分配处表册上所登記的四十至八十岁的人数，并不大于以前曾領取补助金的四十至七十岁的人数。由此可見，亚历山大城的人口是在减少着。

在紆廻曲折地分析討論了許多复杂的現象之后，我們最后就要面对着这一个問題：罗馬帝国衰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一問題，历史家曾作过很多的、也是良好的努力。可是，在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里，我們看到下面一段話："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問題，即罗馬怎样兴起和它怎样会衰亡，从来不曾有过，也許永远不会有着一个徹底的解决。"自从吉本的著作出現以来，历史家的观点和意見是有着广大分歧的，試把它們作一比較研究，倒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所引文字，据我所知，是关于后期罗馬帝国的一个最出色的記載，可是还有很多未能說明的地方！

在公元最初几世紀里，罗馬帝国的經济状況大部分是很窘迫的。………一个不健康社会的任何成分几乎都有。大塊乡村土地，弃而不耕。应作为生产用的資金，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于奢侈品上，而不使用于农业方面。大庄园的离乡地主① 揮金如土，鼓励下流艺术，濫賞濫賜作夸耀过眼即逝的官場的排場。小土地所有者被不平等和苛重的賦稅压得走投无路。财产逐步聚集于少数人手里，因而穷人和富人的界綫越来越見分明，直到那公民和外人間或公民和自由人間的旧区别，被那上層阶級和下層阶級間的新区别所淹沒了。各城市爭先恐后地竞造了巍峨壮丽的大廈；这些大廈的斷垣殘碣，不仅告訴

① 指不住在庄园而住在城市过奢侈生活的地主。——譯者

了旅行者或历史家那一去不复返的宏偉景象，而且給經济学家指点了关于揮霍的后果的教訓。各城市为了支付它們的建筑經費，有时竟至負債累累；有时不惜以高利取得借款，以将来的收入来支付現在的費用；有时它們采用貨币貶值的方法。城市的胡作胡为，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皇帝往往不得不派遣欽差大臣賦予特殊权力，来重新整頓城市財政；最后，皇帝对城市公共工程計划实施了否决权，又把制币权抓到自己手里。但是，皇帝的这种行动，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不是一种根本的治疗。果然它可使那最后的崩潰推迟一步，可是，不能阻止它的来临。同时，在这最后崩潰来临前的时代里，貧困的压力，已十分严重。这倒不是由于那种大飢荒或大疫癘所引起的灾难，而是由于那种社会有机体內神經的可怕紧張，象有人在我們社会里所可看到的那样。当时，在希腊-罗馬社会里，成长了一个新的阶層——貧民阶層——而且它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起来。①

在說明罗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絕对的判断和概括的結論，是不中肯的，也是无意义的。現象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有着不同的性質，使我們不得不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那些貨币貶值和黃金流入印度一类的有形現象，是迥然不同于道德的、經济的和社会的現象；后者按其本質論，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力量。而且，我們还須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和表象。我們常常不可能断定，我們所講的，是某一現象的原因，还是它的后果。后果本身也創造出新的条件和原因的。当然，容易作出一个空泛的論断，比如說：这基本原因是政治的、經济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或者甚至較为明确地說，这主要原因，在于穷兵黷武、行政腐敗、賦稅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民众的日益貧困和地主貴族的日益发財、資金的減少、庇护制的成长、公德的喪失、风化敗坏、奢侈成风、种族血統的混杂（强壮罗馬血統的破坏和奴役出身者在比例数字上的增加）、那使罗馬精神革命化的东方影响的滲入，諸如此类。但是，如果我們思索一下，就可知上面所提的每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他前在的原因或条件而得来的。

① 哈赤(Hatch)：《早期基督教会的組織》，第32頁。

人口的减少，是个原因，还是个結果？貧困，是个原因，还是个結果呢？亨利·緬因勛爵說过："再沒有比这种說法，即賦稅过重使罗馬帝国貧困化的說法，更加荒誕无稽。"城市和罗馬中等阶級上層的衰敗，是个原因，还是个結果呢？吉尔柏·墨累勛爵曾說过古代世界的衰落，因为"喪失神經"。但是这一句話，是什么意义呢？而且，为什么古代社会会喪失它的神經呢？农业的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級的賦稅負担过重和农村資本递减？是因为地主貴族占夺土地和农民淪入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盜賊横行？鄂图·西克曾說：基本原因，在于"优秀者的毁灭"(Ausrottung der besten)。在这項意見里，他反映出欧內斯特·雷南的主張：后者想要把犹太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看作一項历史規律的例証，依此規律，国家和文明，由于尽了給人类服务的責任，而变得衰老枯竭；它們死去，正是为了使一个新的文明得誕生出来。但是，如果說这意見是对的話，那末，"适者生存"这句話，无論在生物学上如何正确，决不是一項历史的規律。是不是說人类种族象果树一样，經过几代以后，就变成不結果的呢？

基督教道德家，从圣杰罗姆到霍治金止，都說，异端主义和不道德，是罗馬世界衰落的基本因素，对于这种論断，我們可完全置諸不理。把古代文明的消亡，归結到上帝的意志是幼稚的，而且是无价值的。归結到奴隶制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同样，我們也可不理睬下面所提的原因：黷武主义、暴政、日耳曼人的侵入。但是，不管它的原因如何，罗馬帝国的衰亡，总是一大悲剧。

庫兰杰及其一派的其他許多作家，在大地主貴族权势里找出了主要原因。他們爭辯說，罗馬皇帝由于增加元老的人数，由于扩大元老的特权，由于在上層阶級中細分社会等級，創造了一个具有高度貴族精神的社会。城市的中等阶級和乡村的小农被維持这龐大貴族社会的重負压得破产了。結果，我們看到工人团体被牵制

于它們的工作上，农民群众被束縛于領主的土地上；因此，罗馬社会不曾有那个象在近代国家里产生了商业、工业和自由职业的阶級——只有这些因素才可成为对抗大地主貴族压力的力量。

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使軍队成为一个放在元老院之上的政治力量，意大利历史家費勒罗認为这一行动是主要原因。辛科維奇看出古代文明的衰敗，在于經济原因，而这些原因，在它們方面，主要地是由土壤貧竭所引起的。伊杭廷頓認为农业收获递减律是主要原因，收获递減是由于古代世界土地日益干旱所产生的。罗斯托夫捷夫教授認为：这地力枯竭的論点是"完全不对的"，他还指出，"这一点无論对埃及来說，或对其他很多(即使非大多数)省分来說，都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农业的衰落，是一个表象，而不是一个原因。罗斯托夫捷夫的《罗馬帝国：社会和經济的发展》(1926年)，是关于这个題目的最近論著；据他看来，罗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在于政府的横征暴斂的政策。

我認为，罗馬帝国生活力的逐漸衰敗，可从……国家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情况得到說明……这种情况过去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东方各帝国和希腊各城邦的繁榮，那也是希腊化时代各王国，即罗馬帝国以前各国衰敗的主要原因。一旦国家最高地位成为决定性的，而又能使个人利益及社会集团利益屈从的时候，它必然对民众起着一种压制的影响，并使他們对自己的工作失掉一切兴趣。但是，国家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从沒有象在罗馬帝国統治下的那样使人覚得沉重。早在公元第二世紀时，这种尖銳的感覚已成为社会和經济生活中的最突出的特点，而且以后这种感覚更是有增无減……罗馬人……認为更价廉更便利的办法是：把有薪俸的官員人数減縮，把无报酬的、强制为替国家服役的人数增加起来；这样，就采用了一种替高官富人阶級做工作的强迫制度……在公元第二世紀的上半期，这項制度已获得了充分发展；在埃及差不多一切官职都屬于"公役"这一类……在財政管理方面，就是要对国家損失負責賠償的制度。如果有一笔税款还沒有收到，而不再能从納税人勒索出来，那么收税吏必須自挖腰包繳付。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他的財产就要被沒收出售了。

总之，这公役制，即由政府强制人民做无报酬的工作制以及“做国家工作者对国家的损失应負責賠償制”，是禍根所在，所有的其他禍害，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如果我沒有弄錯了作者的想法的話——就是，中等阶級的毁灭和与此俱来的工商业毁灭。罗馬帝国成为压迫的象征，它在破坏它的臣民的时候，也破坏了自己。

但是我們还是可以怀疑的。拜占廷帝国在它长期的全部历史中，是一个压迫人民并很貪婪的国家，和后期的罗馬帝国似乎沒什么两样。但是，它繼續存在到千年之久，而当它在 1453 年灭亡的时候，那也不是由于內乱，而是由于外来的暴力。我們怎样来解释呢？为什么罗馬帝国会灭亡呢？对这一問題，克力奥① 也沒有給予明晰的答复。

① 按希腊神話，克力奥(Clio)是保护史詩和历史的女神。——譯者

第二章　罗馬帝国和早期中世紀的教会

十九世紀对比較宗教史所作的研究，揭露了一項为过去学者所未認識到的历史眞理，就是，一切偉大宗教的創立，与其說由于神学，不如說由于社会原因和經济条件。佛教的傳布，不是因为它的“涅槃”說的受人欢迎，而是因为它主張取消种姓。当印度教的貴族和有文化的上層輕視它，拒絕它的时候，佛教在下層分子和无家可归的人中間获得了一批信徒。我們可用很多相同的原則，来說明早期基督教的傳布。在历史方面，沒有一个历史領域比“早期教会”的历史領域为近代的經济和社会的历史解释方法提供了更大量的新知識和新理解。教会史上的事实和世俗史上的事实，就种类說，沒有什么不同之点。社会上存在的力量，在教会历史里，和在其他領域的历史里同样起着作用。如果不先了解公元最初四个世紀中罗馬世界的經济社会状况和流行的理想，我們就不能了解基督教的兴起、傳布和影响。早期基督教是一种城市的宗教；它是城市性的，不是乡村性的。它从一城到另一城，从一省到另一省的傳布，是沿着水陆的通商大路进行的。“基督教曾适应着城市生活，而城市生活是在罗馬統治范圍內一切地方社会組織上的主要特征”①。

《新約全書》明显地指出了基督教的轉变：即从耶穌时代的一种加黎利省② 乡村农民的宗教轉变到保罗时代的城市宗教。耶穌所引用的說明例証，是大家熟悉的东西，如葡萄园、橄欖园、无花果

---

① A.J.麦唐納:《兰法郎克(Lanfranc)傳》,第100頁。

② 在罗馬，屬巴勒斯坦的北部。——譯者

树、庄稼、田間野兽、空中飞鳥、风、紅色夕阳。但是保罗所引的比喻，是有关城市、市場，和营帳的事情。我們只是按照保罗的遊跡所至，就可发現这个重要事实。正是“在安提阿城，他們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几乎所有保罗的使徒書，是写給城市礼拜会的：給以弗所人、帖撒罗尼加人、科林斯人、罗馬人。在“启示录”里所提及的“七个教会”都是在小亚細亚的城市中。在第二世紀基督教开始傳入非洲、西班牙和高盧的时候，第一批成立起来的基督教团体是在迦太基、加的斯、里昂各城；而且，初期的基督徒，无論皈依的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多是小手艺人、手工业者、店員、商人；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街区”，在那里，各种行业都有专設的街道。保罗本人原是西里西亚城的塔苏斯的一个制幕工。該城以制造幕布而享有很大的声誉，所以拉丁文中“幕布”这一个字，就是“西里西亚”(cilicium)。保罗在科林斯，寄住在亚基拉家里，“因为他是同行”。

吉尔柏·墨累勛爵，在他的一本出色的書里，曾指出早期基督教的这种城市性質。他写道：

我一向認为，从历史上講，基督教在早期几世紀中的性質，与其从它所宣示的教义中去找寻，毋宁从它所依靠的組織中去找寻；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些教义，在往昔希腊化时期的或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都找到其根源和极相似的东西。在我方面当我企图从大堆教义，如諾斯替教、三位一体說、一性論、阿利阿教派等的教义了解基督教的时候，我一无所得。后来，我試图把它作为一种互助的有着神祕的宗教基础，半祕密性会社来理解；起初它流傳在安提阿和利凡得的許多大商业和制造业城市的下層社会，然后由于本能的同情，它傳入罗馬和西方的类似阶層中間，并且，和其他一些神祕教派一样，由于特別感动了妇女，它的影响就扩大起来了。在那个时候，历史上各种的謎底，就开始被揭穿了。①

① 《希腊宗教的四个阶段》，第179頁。

古代微賤的人們，即奴隶或自由人中間辛勤流汗的群众，居住于大城市中人口稠密的街区，生活于窄狭的圈子里，做长时间的工作，領低微的工資，所以他們的生活状况是艰苦的，往往又是粗野的；对这批人，基督教所傳布的博愛的社会福音：“激发爱情，去做好事”以及所教导的經济的公平：劳动者应得他被僱佣所值的报酬，曾引起着强烈的共鳴。

然而，有时基督教的教义，也曾激起劳动阶層的憤怒，特别是在小商人遭受着生意損失的場合。不止一次地可看到，当宗教問題成为主要爭执的时候，經济上自私自利的动机，确是宗教上不容忍的基本原因。一般人是不会容忍那些有損他們利益的教义的，但是他們也不会就根据这些理由来攻击它們的。狄麦特琉，一个以弗所的銀匠，曾煽动同行手艺人起来反对保罗。那里的岱雅那大庙，是古代世界的奇观之一，也是来之东方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成千累万人参拜的一处圣地。那个城市的居民以及周圍平原上的村庄，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些旅行者和香客，靠着神庙的經济来过活的。那里有大畜牧場，专門飼养供祭祀用的牲口和綿羊，并有皮革制造、毛織品、硝皮、染色、紡織等各种主要工业。在城内有着云石、地毯、鑲木各种工匠以及“終生职业的工人”即金銀匠；他們靠着制造女神小象来維持生活。这些小象是售給香客，作为紀念品的。这批手艺人对保罗的“用手制造来的，不是神”的說法，极感憤慨，这倒不仅仅是由于他們的宗教偏見，而且是因为他們經济上的自利心。当狄麦特琉喊出“我們这項手艺行将完蛋了”这句話的时候，他一針見血地談出那項利益了。公元113年在俾斯尼亚城小普林尼面前审訊基督徒过程里，当地人对他們所控訴的罪状之一，是有关牲口芻秣銷路的跌落，而这些芻秣原是为飼养将作祭品用的牲畜的。这一点使人想到那原始控告是由附近牧养牲畜者所提出的。从俾斯尼亚的案件，我們还可看到有时历史会重演的一个突出例子。

"因为第一个公开攻击苏格拉底者，即喜剧作家阿理斯多芬，是阿提喀的农村各阶級的代言人；而苏格拉底成了商业祭司的犧牲品，也是今天叫做'均田主义者'的犧牲品"①。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訓誡，有时会产生經济上的困难。凡有关一个人职业的問題往往可成为一种严重事情。异教神庙为几千几万劳动者提供了职业：木匠、磚瓦和云石匠、石板匠、鑲木細工匠、黃銅匠、金銀匠、漆匠和装璜匠；所有的这些行业都对于誠心的基督徒关門；可是还有人，虽皈依了基督教，但仍从事制造偶象和宗教小飾品的。特图良抱不平地說，有些确已选任为教会职員的人們，以保罗的下列格言来作为护符："讓各人保持着他們原来所做的职业"，并援引摩西在荒野里制造过一条青銅蛇这一事情，作为辯解。禁止基督徒从事这样多的手艺行业，那当然会有力地促使罗馬帝国最后一二世紀的美术衰落。

一切文武官职，实际上基督徒也不得充任。因为他們如果担任这类职位，就必須出席甚至参与展覽会、庆典和祝宴，这些都是和基督教的教訓不相容的。担任地方长官者必須出席竞技場的比賽会，舞台上的比武角斗表演；他們也須招人承包神庙中那祭祀用的牲畜供应，以及监督庙宇收入。到了第三世紀，在生活的各部門中，在社会的各阶層中，都有基督徒，可是，他們除非和世俗相妥协——他們确是这样做的——否則不仅会难于謀生，而且，由于他們的超然和"不通世故"的态度，还会遭受群众的憎恶。

从古以来，在古代东方各帝国里，大城市里的下層劳动人民，已习慣于組成同行业的团体。这些組織从埃及和叙利亚傳遍于希腊和罗馬世界。一般說，这些团体有着慈善性質，是办理救济和殯葬事宜的会社。它們的成員，按月付費作为公共基金；它們有自己

① 賴納赫 Reinach:《奥甫斯(Orpheus)傳》，第90頁。

的集会場所，有一种仪式隆重的和半宗教的入会形式，也有他們自己的各种社会性的娛乐。在卡提林叛乱事件后，罗馬政府对这些团体变得惊恐起来，乃企图取締所有的秘密会社，因为害怕它們会变成为叛离或作乱的中心。图拉眞曾命令解散俾斯尼亚的一个秘密的火斗团体。但是，那結社集会的冲力，实在强大，压制不了，所以，政府只好不加刁难，准許了那些办理殯葬事宜組織存在。这些团体在早期基督徒的組織和傳布里，曾起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初期的基督徒本身就是来自罗馬社会的劳动下層，所以这些团体往往成为早期教会組織的所在地。团体所在地在所有的成員都成为基督徒之后，有时就是他們的集会場所，这种团体的宗教仪式曾影响着早期基督教的禮拜仪式；这是异教影响基督教的一个途徑。

基督徒財产所有权的最早形式是領有一塊墓地的形式。按罗馬法，死人的坟墓无論在什么地方，无論屬什么阶級，都受到严密的保护。甚至对被迫害的牺牲者，也不得拒絕給以殯葬。为死人举行葬仪是很普遍的事，所以墓地上的小禮拜堂往往成为当地基督教集团的禮拜場所。在受到迫害的时期，墓地常常成了暴徒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可是，另一方面，由于罗馬人对財产权和死人坟墓非常尊重，尽管基督徒的宗教是非法的，但他們对墓地的权利还是維持着。例如，亚历山大·塞弗拉斯(死于235年)拒絕了一个旅館主的申請：他要求破坏一塊基督徒的坟地，来在那里建造一所旅舍。当然，这种財产严格說来，虽然是为了教会的目的，但不是屬于教会的財产，而是屬于一个团体的或主教以私人資格所領有的財产。在君士坦丁以前，在法律的意义上，沒有教会財产这一回事，它只在事实的意义上是存在的。313年的“米兰詔令”第一次在法律上建立了教会財产，并把一种新的財产类目，即团体机关的財产，加入了罗馬法內。甚至在那时，領有財产权起初也只限于教

堂、墓地以及其他用作礼拜或类似目的的建筑物方面。直到 321 年，法律才准許基督教会享有收受贈与或傳給教会作为基金的財产之权。

現有一种广泛流傳的观念，說早期基督徒过着穴居生活，隐匿在地窖里、地下室里、墓洞里；那是一种荒誕无稽的錯覚。他們和別人一样，是同世俗人相混居杂处着的，“和世俗人一起生活着，他們的食品、服装、住所和用具，都是相似的；他們也同样常到公所、市場、浴場、碼头、市集等等，无可置疑：一个店員或商人在改信基督教后，一般地也不会改变了他的生活的外表。人們在街上或在公所里可以和他談談話，也沒有什么理由来怀疑他的基督教信仰。”

毫无疑問，早期基督教教义，在和罗馬世界当时的經济和社会制度相比之下，是非常激烈的；如果实行起来的話，那会顚覆古代文明中最稳定的状态。但是，不管早期教会所抱有的經济的和社会的观念怎样激烈，它却从沒企图把这些观念付諸实施。它把它的活动局限在实际条件內。博愛和慈善的福音，反映在施舍方面：如救济孤兒、寡妇、疾病殘廢者的苦难，救济第三世紀中那些被送到石場里、矿井里的基督徒囚犯，贖回那些被非洲摩尔人所擄的俘虜，賑济荒灾，維持傳教师的生活，照顧那些旅行途中的基督徒，因为款待客人的义务是神命的。在这些社会服务方面，早期基督徒的工作，都是慈善性的。可是，教会很少做那改进自己范圍以外状况的工作。它单純地根据宗教理由来譴責事业界中的很多活动，但是，尽管有批評和譴責，教会从沒提出过一个建設性的改良方案。在有些方面，

基督教团体，把他們原来要消除的灾禍，反而加剧起来。在一般的社会情况下，孤女将会出嫁，很多寡妇将会再醮。但是在基督教社会中，兴起了一种永远童貞和永远守寡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是由許多偉大傳教师培养出

来的。的确，出嫁并不是一种罪孽，但是它是一种弱点的招供；第二次出嫁，差不多被認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教会所供养的童貞姑娘和寡妇，在人数上与日俱增的比例，一倍倍地加多起来了。

如果認为早期教会，曾倡議过什么革命的社会性質的运动，甚至什么徹底改良性質的运动，那会是一个錯誤。在古代文明的最危急时期，教会在理論上和实踐上都接受了現成的制度。它可能會作过努力，来減輕奴隶阶級中难免的苦难，可是，它从沒否認过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它曾給奴隶以物質的和精神的慰藉；可是，它承認奴隶制是当然的事实。拉格坦蒂阿的常被援引的一句話是：“在我們中間，主人和奴隶沒有什么区别；要不是相信他們是和我們平等的話，沒有什么理由可以說明，我們可以弟兄的名义来称呼他們；”这句話，不是詞藻，便是单純教条主义。对主人和奴隶間关系的“公道性”，教会从沒否認过。关于古代世界賤視劳动方面，教会所做的，也远不如一般所相信的那样，它从沒主張过象那常說的“劳动的尊严”；它所教訓的是忠实劳动的义务，以及劳工应得他僱佣所值的报酬。所以，就作为社会主力量論，教会的偉大时代，不是在早期，而是在中世紀时代。

有些史家認为：早期教会拥护并实行了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經济的偉大綱領，企图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又新又好的社会。那些史家是被浪漫主义或虔誠情緒引入迷途的。而且，他們还漠視了許多异教思想，特别是斯多噶学派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糾正当时代的某些社会上的大弊病，曾产生类似的巨大影响。在第三世紀中改善罗馬法并使那些最不合于人道的特点趋于稳妥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斯多噶学說。斯多噶学說还教导了人生在世的价值，不管一个人屬于哪一个阶級，并灌輸了罗馬公民权的尊严和义务的思想。在人道主义方面，斯多噶学說比早期基督教有更普遍的意义。确然，它是对上層阶級而不是对下層阶級呼吁的。然而，那是

因为它不是一种情緒和感覚的福音，而是一种理性的福音。它是不象基督教所做的那样，訴諸阶級覚悟和阶級矛盾的。斯多噶学說，完全和基督教一样，規定了忠实劳动的义务以及对劳动的誠实报酬的义务，可是，它不象基督教那样，进行着一种积极的、物質的和表面的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它培养着一种內在的、精神的和理智的慈善事业，那倒是基督徒所不曾想到的。斯多噶学說，是容忍异端的；而基督教則反是，斯多噶学說是从不嘲笑异端的，而基督教則正是如此的。斯多噶学說教导着全人类的爱而早期基督徒所說的爱，則是只为了他們自己并只在他們自己中間的。用任何标准来判断，斯多噶学說是崇高而又是开明的学說；今天其中有些教訓，还是使人感动的，而且有助于人类摸索前途。现在，沒有一个思想家，不会对馬卡斯·奧理略和埃皮克提特①，肃然起敬的。

在有些方面，基督教是古代悲观主义的一个新的反映，就是說，它反映出在基督教时代开始前后几世紀里，那滲透着古代世界的悲观主义。它采用了，但变成这样采用了希腊罗馬悲观主义哲学中富有特征的思想，例如，藐視人性和对理性的不信任，以及寻求世俗快乐是徒然的一种主張；它依据这些学說，培养着禁欲、苦行和独身主义一类的实踐。对这种信徒来說，忍受痛苦，使来世可以享福；生活是苦恼的；事物的虛幻和不公平，是現实的标記，也是最公平的証明；失望是使人希望来世的一种新的原因。古代悲观主义通过基督教終于变为它的反面了。

在"前尼斯"②教会史上，就是說，在君士坦丁时代前的教会史上，一个重要的問題，是基督教直綫的扩展；即从奴隶和下層工人

① 奧理略和埃皮克提特都是属斯多噶学派的大学者，前者是罗馬皇帝，著有《默想录》(Meditations)；后者本人虽沒有著作，但其門人阿利安(Arrian)搜集其格言，編成《便覽》(Enchiridion)一書。——譯者

② 就是在第一次尼斯会議(公元 325 年)之前的时期。——譯者

阶層到罗馬帝国的富人阶層和有錢貴族的自下而上的扩展。基督时代的最初两世紀中，所有的皈依信仰者，差不多全部来自卑微的平民、奴隶、自由人、手艺者和商人。圣保罗适当地描写这些人說:“按世俗标准来看,沒有很多聪明的人,沒有很多有勢力的人,也沒有很多高貴的人。”神父作家們經常把一个富人或一个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之皈依信仰事件，作为特别庆賀的事件。关于本都城一个有錢的船主人馬桑的信教,即是一个例証。

直到第二世紀的最后时期，基督教才开始在罗馬社会的上層中間急剧地发展着；在第三世紀中，尽管已經开始普遍的迫害,但这項进展还是稳定地持續着。253 年受难于瓦勒里安的迫害的教皇哥尼流，是屬于著名的哥尼流氏族；它是一个罗馬最老的家族。瓦勒里安的詔令,用沒收財产、降低社会地位以及放逐来处罰基督徒;那就表明了在那个时候已有上層分子和有錢人皈依了基督教。当然,地中海世界的东半部比西半部,有着更多的基督徒。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叙利亚和小亚細亚。在本都,整村整村地皈依了基督教。可是，希腊长久頑固地保持着异教地位。特图良約在 200 年时著文，認为在迦太基的人口中基督徒占有 1/10。第三世紀中期，在意大利存在着六十个有組織的教区。251 年时，罗馬教会有着四十六个神父、七个管事、四十二个侍僧、五十二个讀經者，維持着一千五百个孤兒寡妇；由此可見当时罗馬也許有着三万到四万个基督徒。其中奴隶和自由人的数字是很大的。

在第三世紀中，罗馬教会的財政力量对于教皇权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各地教会和京都[罗馬城]間的頻繁交接来看，可知下列事情对所有的教会,尤其是在它們需要財政援助的时候，是极端重要的：取得和罗馬城教会的联系,接受它的支持，知道它对旅行的“弟兄們”的如何招待，以及有权替囚徒和矿場里做苦工的人們請求它的大力干涉…… 在帝国中，沒有一

个团体对和那偉大"罗馬教会"的关系，可以漠不关心的。甚至辽远地方的教会团体，也通过財政的援助……被束縛……于"罗馬教会"了①。

历史家們曾多次想要估計罗馬帝国內基督徒的数目，尤其是在第三和第四世紀基督教开始形成为一种力量时的数目。但是由于資料的缺少，这些估計，不过是一种猜想罢了。吉本估計帝国在250年时，有一亿二千万人口，其中有基督徒六百万，就是人口的1/20。这两項数字，当然过高。舒尔茨曾把同一时期的帝国人口，算作一亿，其中1/10是基督徒。哈那克在他的《基督教的使命和扩展》一書中，承認了关于这类資料的有限，而力避作出总括的論断。他說道："在戴克里先迫害(公元303年)以前的五六十年的时期中，发生了教会第一次的大扩展。"他依据所可得的資料来分析，区别出四种类型的省区：(1)基督徒在人口中約占半数的省区，在那里，基督教在第四世紀的初期，是傳布最广的宗教；(2)基督徒在人口中构成很重要部分的省区，在那里他們有着影响領导阶層的勢力；(3)基督徒零星地散布的省区；(4)基督教的傳布非常薄弱的省区。

有各种原因可以說明基督教的迅速扩展和最后胜利，可是，对这些原因的重要性，要作出决定，都是困难的。但是，經济和社会的勢力是在这些因素中的最有影响的因素。这里，再援引哈那克的下面一段話：

> 我們很难决定那作为基督教特征的各个勢力在产生推动力方面的比重：也就是确定：这种推动力有多少从它的一神論得来，从耶穌基督的教义得来，从它的永生希望得来，从它的积极施捨和社会救济制度得来，从它的紀律和組織得来，从它进行宗教上的混合主义的能力和輪廓得来，还是从它在第三世紀里所发展的技巧得来，而这种技巧超过了任何迷信的魔力②。

① 哈那克(Harnack)：《教义史》，第2卷，第159，164頁。

② 同上書，第2卷，第336頁。

另一重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异教徒和基督徒在人口繁殖率上有着高低的差别。因为在异教徒間存在着杀嬰的风气，而在基督徒間这种杀嬰的恶习，則被禁止的。

教会經过戴克里先时代最后一次的大迫害，比前更强。帝国政府的失敗，正是教会的胜利。可是，在精神方面，教会是受着损伤的。很多最勇敢、最优秀的人才已經死了。剩下来的，大多是屬于起碼等級的人，懦弱而少勇气，为了策略而竟愿牺牲原則；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財产，他們妥协了，甚至变节了。

十年之后，即在313年时，君士坦丁在米兰詔令里，准許了宗教容忍。于是基督教遂成为一种合法的宗教。基督徒的人身和財产获得了法律上的保护。但是，第四世紀基督教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付了极大的代价而获得的胜利。跟着君士坦丁之后，統治阶級、富人和奔走名利之徒，遂大批地涌入了教会，他們同时带入了他們的原有的道德品質和社会准則以及他們所习慣的行为方式。結果，教会和世俗的界綫被模糊，宗教从屬于政策和政治，"起碼"的男男女女侵入了教会，理想越来越低，突如其来的巨大財富，起着腐蝕作用，而精神也硬化了。

第四世紀中，教会历史上的突出事实是教会急剧轉变。它不复是一个由穷人和中等阶層的人所組成的宗教社会，而变成为阶層式和官僚式組織的团体，崇尚奢糜、爭权夺利的团体了。为了获得那有財有势的异教貴族的支持，为了取得他們的財产，教会向世俗投降了。教会权威的增加，是用喪失精神活力的代价来取得的。这种道德墮落的速度令人惊异，和它腐化的程度一样。墮落情况竟达到了这样严重地步，还不到一世紀已有不少重視道德的人士宣称：教会对它的兴盛所可歎息的理由，反而多于对它第三世紀所蒙受的灾难和迫害。試把原始基督教和第四世紀的基督教比較一下，所可获得的結論必然是令人沮喪的。历史的分析往往就是病

症的診斷。研究第四世紀教会的道德和宗教生理，不是研究它的健康状态，而是研究它的疾病；研究它的精神损伤、它的各种腐敗和弊端。

基督教僧侶，象异教教士、大学教授、雄辯家及医生那样，可以豁免稅役，即那些压在很多人身上的重稅。結果，为了免繳賦稅，有"一批不信上帝的人爭求圣职"，尤其是那負担很重的中等阶級的上層。那些寻求圣职和鑽营名位之流侵入教会职位；他們爭求登用，把政治"关系"、社会勢力、甚至賄賂，来影响教会和政府，以求实現他們的目的。

由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不到一年，政府震惊于它的进款的减少，不得不采取措施来限制僧侶的特权，以防止納稅人的逃稅。圣杰罗姆写道："我倒不抱怨这項法律，而是抱怨那些促使它成为必要的原因"。但是，当政府准許教会免繳象别的富人們必須繳付的所得稅的时候，当政府除道路和桥梁稅外不向教会征收任何稅款的时候，它怎样能够限制这种弊端呢？从世俗的和教会的立法的数量上看，可見政府对限制經济流弊的努力，沒有获得良好成就；我們可找到在整个两个世紀中，关于这一問題的立法，特别是在360—361年和398年瓦倫丁尼安一世、狄奥多西大帝及其兒子所制訂关于禁止授圣职給中等阶級上層分子的法律。在439年，瓦倫丁尼安三世在西罗馬皇帝中作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以求防止人們用成为僧侶来規避他們对国家的义务之流弊；他把圣职限于授給那些財产不滿三百苏里德(約合一千美元)的人。但是所有这些限制性的立法都沒实施过。这种弊端在罗馬帝国存在的整个时期中从沒糾正过来。第五世紀中圣奥古斯丁抱怨地說，很多人进入了教会，只是因为他們希望可获得某些世俗利益而已。查士丁尼为了解决这个問題，終于把政府的政策掉轉头来，以管理城市財政之权授給主教。在民政方面，主教的特权，甚至还要广大。他督察低級城市行

政官、行使从前由保民官所执行的否决权，监督公共建設和城市撥款，稽核城市帳册，最后他还亲自选擇城市管理員。很有意思，拉丁文“episcopos”(英文 Bishop〔主教〕是由此得来的)这个字，是有时用以称呼异教庙宇的財政官的。

主教的政治勢力和財富这样的发展，对教会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教会和世俗間的界綫比前更加模糊了。有人認为，教会是不贊成这种宗教和世俗職务間的密切联系的，它欢迎政府对阻止富人闖入它的教士团体所作的努力，“作为防止不足取的教士的办法。”但是，我是沒有办法来找出資料以証明这种說法的。教会一旦尝着权力的甜味之后，再也不愿离开那世俗筵席了。

关于限制主教追求帝国政治勢力的立法早已出現。阿塔內細阿对教会中剧烈爭夺有利可图的职位的現象，发出长歎。在撒狄卡会議(344 年)上，奧賽阿痛罵主教爭求“宮廷上世俗爵位和权力”，而这会議的第七項立法企图限制这种行为。半世紀以后，杰罗姆还是在指斥这同一的弊病。非洲的主教，由于这种恶习，变为臭名昭著。較小的主教，整个来說，是醜态百出地爭求帝国恩惠，来获得更有实利的登用。下級主教，往往力图使用宮廷勢力，来繞过京都教会，甚至长老为了逃避主教的管轄，也使用这同样的方法。

現有很好理由可以相信：第四世紀中教会官职在数目上增加，一部分当然是合法的，因为在新形勢下，給教会展开了更大的机会和更广的活动場所。然而，无可否認，高級教士所享有的榮譽和报酬，在吸引很多人加入僧侶等級方面，构成了一个有力因素。利希脫估計：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在帝国一百二十个省內，长老的数目达到一千八百个之多。儘管我們沒有什么象統計数字一类的东西，可資証明，可是那些保留下来的材料，儘足以使我們至少約略地計算出这大量增加的幅度。在教皇哥尼流时代(250年)，罗馬教会曾維持一百五十四个僧侶。如果說，在狄西阿迫害时期，大教堂

尙維持这样数字的职員，那末313年后这項数字該是怎样呢？据阿塔內細阿的估計，322年时屬于亚历山大城教会的，有着十六个长老和二十四个管事；甚至在阿利阿叛乱后，335年时，还有着十六个长老和五个管事。教会立法原早已力求把僧侣的不必要增加加以限制。可是，335年时阿塔內細阿还是带着五十个主教来出席太尔会議。400年时，霍挪留曾規定：教会应要求修道士帮助教士工作。但是显然，这种限制性的立法沒有达到了目的，因为生在第五世紀中期的索左門还說道："在很多教会里，流行着不同习慣……例如在叙利亚，許多城市只是共有着一个主教；而在其他地方，甚至一个村庄里，也委派了一个主教，象我在阿拉伯和塞浦路斯以及在弗里加的諾維細安人和蒙退那人中間所亲眼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是很不一致的。甚至在利奥大帝时代(440—461年)，我們看到还有教皇抱怨地說：在一个长老已是綽乎有余的教会里，竟然指派了主教。教会为了維持这种教士队伍，开支龐大，尤其是因为主教們仿效着省长衙門的豪华风尙和仪式。当我們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无怪乎巴錫尔对宗教行政上的浪費，发出长叹息了。

但是对教会紀律来說，財富的迅速大量增加比特权和豁免权甚至发生更大的破坏作用。第四世紀中僧侶拥有"寵幸阶層的特权和富人阶層的势力"。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而教会也是穷的。慈善救济事业几乎用尽了一切来自信徒的捐款。下層僧侣天天在市場里、商店里工作着，只求糊口，而不領薪給。教会的不动产，主要在于墓地以及冒充作工人团体集会的場所。这些建筑物往往又小又不牢固，所以时常从一个老的地方移到另一个新的地址。在瓦勒里安和戴克里先两次迫害之間长久和平时期(258—303年)，跟着基督徒人数的大量增长，他們的教会在数目和規模方面，都扩大起来。但是，那維持僧侶阶層和教会建筑物的費用，还是依靠着捐款。那时，沒有，也不可能有贈与基金的。

但是，在313年后，財富象潮水般地涌进来了。不仅发还了戴克里先时代所沒收的私人的、教会的、基督教財产，而且有大批新的丰富贈与，賜給教会。君士坦丁的早期詔令之一，命令把“基督徒过去时常集合的場所”，还給基督徒，不管这財产已經收入国庫，或已經轉移到私人手里。对于后一情况，所有人可从国庫获得补偿。君士坦丁甚至撥出公款，来修理老教会房屋并建造新教堂。但是，这些贈与也許是从皇帝的私人錢袋里拿出来的。姑不論它的来源如何，君士坦丁和他的母亲赫勒拿，的确，在給教会的贈与方面是很慷慨的。教皇西薇士德一世的傳記中，包括有一張长表，列举那些接受君士坦丁从国庫領地撥出来的土地贈与的教会，即在罗馬城以及在意大利别处的教会。罗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希力奥波力、尼哥米底亚、安提阿、伯利恒、迦太基以及其他城市，通过帝国政府的資助，都有着教堂点綴着。这些教堂好多不是新造的建筑物，而是象拉特藍宮殿那样，屬于皇帝的大厦；据說是由君士坦丁献給教皇的。早在324年时，已有一本收租卷册，里面特别注明：“在意大利、非洲和东方某些房屋、商店、花园和田庄是屬于罗馬三个教堂的，即圣彼德教堂、无墻垣的圣保罗教堂和圣約翰·拉特藍教堂。”到吉雷西阿斯一世时代(492—496年)，教皇領地显然是广大的，而且它的管理，是依照偉人格列高里(590—604年)書簡里十分詳尽地透露出来的組織方式进行的。

教会被賦予一种接受遺产的无限权力。“領受每个人在临死时愿意留給最神圣天主教会的产权証。”① 把遺产給教会，成为一种宗教义务的形式。为了使教会致富，許多基督徒剝夺了他們家屬的財产繼承权。好心腸的主教限制了这种贈与的流弊，但他們尽管指責流弊，还是坚持着原则的。圣奧古斯丁，在其一次講道里說

① “Habeat unusquisque licentiam sanctissimo catholico venerabilique concilio, decedens bonorum quod optavit relinquere”

道:忠实基督徒"应把基督放在他們的子女中間来考虑，并使他成为分得他們的遺产的一个人"。根据攸西比阿斯的話，君士坦丁曾命令，一切殉道者的財产，如果他們沒有繼承人的話，应給予教会。瓦倫丁尼安一世和狄奥多西大帝曾規定：凡死而不留遺囑的或沒有嗣子的教士或修道僧所遺留的財产，应归給他們所屬的教会或寺院。一項补充法令，还規定了一个死去的主教的全部財产，除非这些財产是在他升任主教前获得的，或者从他的父母遺傳下来的，应留給教会和救济事业。根据罗馬法条文，凡是关于叛教和异端的罰款或沒收的財产，都归入国庫；可是，在实际上，其中很多款子是流入僧侶的錢柜的。教会的不动产，曾被宣布为不可剝夺的，如果出租地产超过了三代的时期，那是教会的違法行为。

第五世紀中对教会的贈与增加起来了。关于这方面，宗教历史家掌握着丰富資料。索左門說过：要描写狄奥多西的姊妹浦尔契亚所建筑的巍峨壮丽的禱告厅，所創立的穷人和旅客的救济所以及修道院的房屋，那不是一个短时期所可做到的。"上帝、教士們以及一切罗馬帝国的臣民，都可作为她慷慨解囊的証明人。"她曾以精致地鑲嵌着黃金和宝石的桌子，贈給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索左門接着說，"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記述的話，讓他去查一查那公主的管帳員所保藏下来的帳册吧。"有一个西班牙的富裕的女繼承人米兰尼亚，十二岁出嫁，二十岁守寡；她的慷慨气魄比君主还闊綽。她的同时代的史家帕雷狄阿斯，作出下面的一段描写：

她曾把所有的絲綢衣裳，贈給神聖祭壇，她剪裁了她的其余綢服使它适合教会的别的用場。她曾把她的金銀付托給一个长老(他是来自达尔馬提亚的一个修道士)，并曾把金銀經过海路輸送到埃及和提貝易德去，数达一万个大流①；她送出一万个大流到安提阿去，但对巴勒斯坦，則送了一万五千个大流。她曾捐贈一万个大流給那些島屿上的教会，給那些被放逐的苦人，

① 大流是古代金币名。——譯者

而且，对西欧的人們，我指那里的教会和修道院內的人們，对接待旅客的招待所，对一切貧困的人們，她还曾亲手分发了她的贈与品。此外，她一定还曾捐出四倍上述数字的款子。

第四世紀教会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現象，是那爭造教堂的热情。教会遭受了一种强烈的"建筑热症"，这种活动，一部分固然是由于正当的扩展愿望，来适应人数越来越多的新需要，可是，一部分是由鋪張炫耀的病态狂热而产生的。連早期的寺院主义也遭受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尤西比阿斯写道，"許多教堂又从地面上巍峨地高聳着，豪华气象，远非过去被破坏了的教堂所可比拟。"在一个短时期內，这种狂热竟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头脑淸醒的教士象圣杰罗姆那样，提出了抗議反对这种无謂的浪費，而这种資金原可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的。杰罗姆不是沒有理由地抱怨說，教会变得太浪費了，教会对它們的外表裝飾比对管理它們的教士們的品質，給予更多注意。"今天，許多人建造教堂，考究它們的光滑云石墻垣、柱子，黃金閃鑠的天花板，鑲嵌着宝石的祭壇。可是，对于基督的牧师的选擇，則滿不在乎了。"

但是，这一时代的感情，却是和安布洛兹一致的；他写道，"教士应該特別以适当的华丽来裝飾着上帝的庙宇，使主宰的宮廷輝煌显赫。"杜森曾列举在 200 年时期罗馬城內新建的或修复起来的二十三所教堂，他还列举从西薇士德一世任教皇（314 年）到霍密斯达任教皇时期（514 年），在罗馬城外的五十所教会；而且他承認了这項資料还是不够完全的。从那些关于建造教堂活动的資料看来，結論必然是：这种开支一定是远超过正当的需要；其中很多是屬于奢侈和浪費的。尽管有私人的贈与和政府的資助，那几百所建筑物所需的經費必然是一个很重的負担。

另有一个弊病，教会必須予以对付的，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富人們鑽入教会队伍的情况，对他們来說，基督教已成为一个时髦的

东西。

基督教会被迫害火焰鍊得純洁的时候，对有野心的俗人来說，是沒有什么吸引力的。担任教士职位是太危險了；所以除了純洁而又热心的基督徒以外，再也沒有人要担任它了……然而，当教会的世俗地位，由于它在整个帝国中的优势，无可估計地提高以后，它遂成为实現野心的途徑；同时它的財富，对懶惰和荒淫之徒提供了淫乐放縱的前景①。

輕佻的、有时放蕩不拘的男男女女，在玩膩了崇拜埃西和奥賽烈司，或弗里加的神秘教，或其他一些在后期罗馬帝国占有勢力的，象克拉勒姑娘② 那样的无数东方宗教之后，在覚得厭倦于彷徨的岁月之后，为求得另一种新奇东西来鼓动他們的疲乏想象力，就力图在基督教里找寻一种新消遣。現在宗教迫害的危險已經过去，而且皇太后对新承認的信仰，又給予保护；所以社会上鑽营名利之流，群集于教会了。后期罗馬帝国貴族，在加入教会以后，完全未曾放弃他們的世界观、阶級和人生观以及他們的傳統和偏見。另一方面，由于教会已向世俗妥协，俗人在教会里也不覚得有什么不惯情况。第四世紀中这种基督教貴族的图景，不是一幅动人的图景。

当大批輕佻放蕩不做事的富人們，从上面来侵入教会的时候，在同一时期，另有乞丐騙子群，装成貧苦和忠誠的样子，从下面来涌入教会；他們是被基督教的新財富和救济工作所吸引而来的。大城市的貧民，原是惯于依靠公共救济度日的，現在发現了一个新的供应場所。在一种意义上，教会的这种腐敗阶層被抛棄了，而这一阶層原是几百年来由罗馬施行有害的社会經济政策培养出来的；但是問題是：教会是否曾把它所要解除的禍害，加剧起来，因为

① 李亚：《僧侶独身制度》，第 63 頁。

② 指意大利尼姑聖克拉勒(1194—1255年)；她曾建立"穷苦姑娘教团"，后称穷苦克拉勒教团。——譯者

它欺騙的慈善，提倡了一种大規模的乞食制度。圣安布洛兹不平地說，“乞丐的貪心不足，从沒有过比今天更甚者。他們鼓足勇气而来。他們之所以来，除了他們是在流浪的理由以外，再也沒有什么了。”圣巴錫尔抱怨地說，要在眞正貧苦者和騙子之間作出区别，是困难的。在教会圈子內，行乞已成为一种职业，象在外面异教世界里，有数以千計的人久已干着这勾当那样。到第四世紀末期，罗馬城的基督徒乞丐群，几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等級。安密亚那斯·馬塞里納記述了下面一件故事：“367 年时，当兰伯庞阿将軍举行某种盛大竞賽会而分发大量的賞賜的时候，因为不堪忍受那批群众往往夺取那些发給穷人的賞賜所发生的騷扰，为了表現他的慷慨和对群众的蔑視，他一怒从梵蒂岡招来了一大群乞丐；并給予大量贈品，使他們发財。”

毫无疑問，教会的財源，綽乎有余地可供給它在第四世紀中的正当需要。但是，僧侶阶層的貪得无厭以及市政当局把維持城市中流氓无产者的負担推在教会身上的傾向，两者都使教会急于爭取新的財富。在教会力求摧殘异教运动里，經济自利心确是一个因素。异教教士們，大多是有錢的土地所有者。僧侶阶層又垂涎于各种异教神庙所拥有的大量基金，这些神庙在罗馬世界里的每个城內、每个省內都可以找到的。在君士坦丁的兒子們时代，教会开始了那剝夺异教庙宇財产的运动。君士坦丁原来規定了帝国內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間的平等地位。异教信仰不受排斥，异教庙宇不受騷扰，它們的財产受到保护，它們的特权繼續維持。可是到 341 年时，昆斯坦斯禁止了城市內举行祭祀。君士坦都曾以亚历山大城太阳庙以及它的全部財物和进款，贈給亚历山大城教会。狄奥多西还把塞拉匹神庙的全部基金給它。約在 347 年时，有一个名叫馬脫那斯的作家（不要把他和那同一名字的早期异教作家混同起来），曾出版一本題为“异教的荒謬”的小册子，里面，他为了教会

的利益，曾拥护那没收全部庙宇的財产的主張，甚至提出了并辯护了劫夺异教神殿的要求。

皇帝的貪婪心理，被主張没收財产者巧妙地玩弄着。异教神庙的地产、黃金器皿和祭壇用具，代表着一項龐大財富。由于統治者的恣情揮霍，行政制度改組后的政府开支的激增，以及宮廷的奢侈风气，尽管把賦稅一倍倍地提高起来，但政府維持开支却越来越感困难了。有些騙取政府和宮廷官位的基督徒拚命要錢，慫恿皇帝走上这条掠夺的道路；他們曾指出皇帝有合法的权利，来夺取那些神庙的財产，因为依据罗馬法，所有的神庙土地，理論上是帝国的一部分，又因为皇帝对罗馬帝国內各种信仰，是世俗的当然首領，所以他可随意将任何神庙財产并入国庫里。各种异教的无組織性，又是它們的处境的另一弱点。这些异教，种类繁多，沒有共同信仰，也缺少象基督教那样的普遍性；这一事实，使它們容易成为这項掠夺政策的牺牲品。它們是不能团結起来的。

皇帝朱理安曾力图重振异教搖搖欲墜的勢力，因此，他在几百年中蒙受了誹謗，直到近时由于研究的結果，他的性質才从他所遭受的寃屈里拯救出来。他曾敏銳地看出异教信仰的弱点，努力使它們复活起来。他曾看出基督教由于它宗教的社会化性質而拥有力量；在他一封著名的書簡里，他指斥了异教教士阶層没有发放救济金、救助貧苦者和受难者，也没有維持医院和学校象基督徒所做的那样。他譴責了竞技場上的野蛮行动以及舞台上的淫猥表演。可是，异教徒没有能够响应皇帝的这項号召，使自己适应于那改变了的环境，使自己的宗教变为社会化起来。这是它的最大弱点，也許就是它之所以失敗的基本原因。那些怠惰的教士，实际上大多把神庙的財产用在世俗方面，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消耗它們，至于神庙，則任其荒廢。

从本質上看来，朱理安的下列措施，无論在理論上或实踐上，

是沒有什么不公道的地方的：他以立法来取消僧侶阶層所独享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从公共帳册上勾销了那批象水蛭般地纏住的領取卹金的基督徒；他禁止了主教們免費使用政府的驛站系統，他們享有别人不能享有的免費权利，由政府开支，在陆上海上来来往往；他强制了教会发还那些异教庙宇的財产，而这些財产是教会用賄賂朝廷方法所取得的，或者，是擅自掠夺来的；他要求基督徒和帝国的其他公民一样地履行着民事上和軍事上的义务。

但是，朱理安关于限制教会弊端的方法，非但沒有成为对教会的一种补药，来祛除它内部的一些渣滓和腐朽东西，反而使它更坚决反对异教。象英国亨利八世掠夺寺院財产那样，当时，掠夺异教財产，是一个逐漸的过程，历时好多年代。这項过程是由君士坦丁的兒子們开始的；据說，在他們的朝廷上，"有些人吃用着那从神庙劫夺来的財产，从而他們从最穷的穷汉而变成为富翁了。"但是，主教和朝臣們一旦尝着劫夺的味道之后，都渴望着更多的財富。在东方，亚历山大城主教提阿非罗，是这項偶象破坏运动的領导人。在西方，这运动的最热烈首領，是米兰城圣安布洛兹；他詳細引証了犹太人在安泰奥卡斯时代的行为（載在《瑪喀比書》中①），作为教会应該依循的先例。

这一問題，到狄奥多西一世时代，即在基督教升到帝国国教地位的两年之后，发展到最高峯了。392 年的詔令，在法律上沒有排斥异教，但是，异教徒从教会要求排斥异教的叫囂里，从皇帝的日益亲基督教的傾向里，已看出对他們的不吉之兆了。394 年时，罗馬軍队中一个法兰克軍官阿波卡斯特刺死了瓦倫丁尼安二世。該軍官因为不敢篡夺西方的皇位，乃立犹琴尼烏为皇帝。当时，异教徒就馬上拥护新皇，而新皇也立刻用恢复异教神庙的財产，使异教

① 瑪喀比是在安泰奥卡斯四世时代宗教叛乱的首領之一，屬犹太族；《瑪喀比書》就是《內經》中之二卷（瑪喀比書一、二两卷）。——譯者

徒重得收入，来求得他們中間的拥护者。这种措施以前格累細亚和瓦倫丁尼安都是拒絕采行的。在狄奥多西平服异教叛乱之后，跟着，发生了对异教的一般性取締，即对一切异教財产的普遍沒收。那时基督教取得了宗教上和物質上的全面胜利。我們很幸运还保存了一首为庆祝这事件的基督教胜利歌的手抄本。然而，神庙本身还是沒有一般地被搗毀；只是它們的財产被沒收，它們的神殿被封閉而已。当时，沒有象亨利八世时代英国教会所遭受的那样破坏景象。"从我們所可得的关于破坏特殊神庙的唯一記載里看，可知所有被破坏的神庙，都是有臭名昭著的仪式的神庙，或者是那些神庙，它們的存在使社会中基督徒观念受到特别的侮辱。"教会已經有着它所需要的足够房屋。而且，可能有人还会追悔曾把异教神殿改作为基督教圣所的举动。直到第七世紀重新建造教堂的时候，庙宇才被拆卸、破坏，它們的石头才被移作建造新建筑之用。潘提昂庙被保存下来，改作为一所教堂；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东方基督教比拉丁基督教在偶象破坏运动方面远远地更激烈，因为在那里，僧侶激起了群众的瘋狂并煽动了群众的暴动。君士坦丁堡的圣約翰·克立索斯吞和亚历山大城的息立尔(海派希亚牺牲在他手里的)表明了那些力主毁灭异教者的情緒。然而，甚至异教神庙在各省內已被封閉，祭壇已被搗毁，僧侶已被剝夺了进款而分散之后，异教崇拜还是在辽远地区，在沒有教士的状况下，偸偸摸摸地保存下来，直到第七世紀时为止。

毫无疑問，第四世紀中使教会腐化的最坏源流，是它大量而迅速获得的財富。这在教会史上，原是数見不鮮的。不幸，那时沒有象圣法兰西斯这一类人来号召教会离开它的粗野和物質的方式。"教会中的节約剩余"从来是不大的。但是，可以怀疑，基督教是否会象300年至800年之間的几世紀中那样堕落下去。当时高級僧侶們的貪得无厭、他們的力求猎取遺产、他們的世俗性、他們的揮

霍性、他們任用私人和詐欺取財的行为，都成为基督教道德家和諷刺家的好題材了。圣杰罗姆在400年时写的又詼諧又諷刺的“主教的日子”一文和朱来那尔及琉息安①所写的，是屬于同一类型的。

簡直令人喪气的，是在第四、五、六世紀中的宗教文学里，看到現在名义上基督教欧洲的大部分人会这样深深地沉溺于多神教的道德，异教的神話、习慣、风俗，拜物教，信仰符咒里。哈那克写了下面一段辛酸而确实的話：

神学家們經常在心里想着僧侣、官吏和“良好”社会……而一般人……的生活却不是按照这种信仰，而是按照那第二等級的基督教的；就是，那表現在聖徒故事里、在偶象崇拜里、在尊敬天使和殉道者里、在十字架和符咒里，在把弥撒看作魔术崇拜里的基督教…… 我們在偉人格列高里方面和在第七次宗教大会的最后決議里所見到的基督教，就是第一等級基督教，显示和那种隐藏的、徹底迷信的和多神教的“基督教”之間的最密切的結合，而从第三到第八世紀几百年的时期乃标志着这种融合过程上的各个阶段。②

为了和庸俗道德妥协，教会曾付出代价，也为了实施这种庸俗道德，教会拥有了一种为古代世界从沒有人知道过的工具，而这工具是有着特殊的社会动力的。吉本論及古代人民的时候，說过：“他們在現世生活里的行动，从来不以什么来世的报酬或懲罰的严肃信仰来支配的。”但是，在教会势力支配之下，社会上作恶的人們，会受到了那在来世生活中被处罰的威胁。基督教曾大力地引用宗教制裁方法，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警察力量，以求維持公共秩序和保护財产，而这种力量在古代世界里是从不知道的。虽然不可能估計通过教会紀律和懲戒制度对社会管理上所发生的影响究有多少，但是，这种制度的力量和效果，是无可否認的。

---

① 两人都是罗馬的諷刺作家。——譯者

② 哈那克：《教义史》，第4卷，第106，304—305頁。

整个来說，关于第四、第五世紀的教会，历史的裁判是一个对它不利的裁判。有一位生于或死在教会史早期里的最大学者，記載了这一种意見，作为他对教会的深思熟慮的判断：

基督教本身以最有效的方式，助长了社会的腐朽状态；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把群众提高，来建立一个按最中庸字义名实相称的基督教社会；相反的，它对群众的許多需要和愿望，一再地作出了讓步。有很多因素，促成了这最后結果，尤其是政治史上的冷酷的发展和經济上的困难状况。与此密切地联系着的，是撤銷貴族、自由人和奴隶之間的古老区别，跟着而来的，宗教上和知慧上的"野蛮性"透入了上層等級，而这种野蛮性在下層等級里从沒被克服过。①

"黑暗时代"的形成，至少，由于教会的腐敗不亚由于罗馬文明的衰敗，或"蛮族"的侵入。

在罗馬帝国內，教会所发生的影响远不是一个建設性的影响，而是一个头等重大的瓦解和分化的影响。在这点上，它所起的作用，象所有的东方宗教一样，是朝向摧毁古代社会的整个机构，但是，正因为它是东方宗教中的最大的宗教，所以它所发生的效果，也是最大了。詹姆士·弗雷泽勛爵，一位比較宗教史的卓越作家，写过下面一段話：

希腊和罗馬社会，是以个人屈从国家的概念作为基础的；它把国家安全，作为行为的最高目的，放在个人安全之上……所有这一切，由于东方的宗教傳布而改变了；东方宗教灌輸了灵魂和上帝間的感通的思想，而灵魂的永生作为唯一值得爭取的目的了；与此相比，国家的盛衰兴亡都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位。无可避免的結果……乃是吸引信徒越来越多地脫离了公共服务，使他們的思想集中在他們的精神情緒方面，培养了他們对現世生活的輕視；他們把現世生活，認为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和永生的生活所作的一个試練而已。在一般人的观感上，那聖徒和出家人对現世蔑視，对天国心移神往的生活，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而这种理想遂替代了那旧有的英雄和愛国主义的

① 哈那克：《教义史》，第4卷，第270頁。

理想;爱国者和英雄們愿意捨身为国，赴湯蹈火而不辞……所以，那生活的重心,似可說,从現世移轉到来世了;不管另一世界可获得了多少，但可无疑問,这个世界，由于这項轉变而招致了重大損失。政治机体的总瓦解就出現了。国家和家庭的联系,也放松了；社会的机构分崩离析，因而陷入了野蛮状态;因为文明只有通过公民的积极合作，以及通过他們把私人利益从屬公共利益的愿望,才有可能。当时，人們拒絕了保卫祖国，甚至拒絕了繼續生育。由于他們念念于自己灵魂的获救…… 他們滿意于摆脫了他們周圍的塵世而长逝,而这个世界他們原本視同罪恶的本原。①

尼斯会議以后，最早时期神父的著作滿紙洋溢着教条主义爭論的气氛，或充滿着对那批从加黎利派来的傳道师和护道师的态度和品德所作的輕蔑謾罵的激烈言詞,或放出迷信的气味,当我們逐頁翻閱这些著作的时候,我們就有无謂爭辯和幻灭之感。当时，在东方,有三个偉大的卡帕多細亚人:巴錫尔和尼薩·格列高里(肉体上的胞兄弟,又是精神上的双生子)以及納塞安曾·格列高里;在西方,有圣安布洛茲、圣杰罗姆和圣奧古斯丁；这六个人曾举起拚死效忠于基督教的旗帜；他們比任何别人是更多可敬而更少有可責的理由的。

蒙退那派,是曾建議給僧侣以規定工資的第一个教派。

因为僧侣阶層越来越多地变成为社会里的一个特殊阶層或等級,所以教会的老式經济制度,对新的条件已不复适合了。在使徒的时代,僧侣原是自己維持生活的,这种經济上独立的理想繼續存留，直到第四世紀时为止。最后由于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对教会所作的变革，一个新的原則就迅速发展起来，就是說,凡是在祭壇供职的人应依靠祭壇来生活。因此，教会負担起那維持僧侣生活費用的責任,教会的这一改变是重大的。

我們可合理地想象：从教会財产的大量增加情况看来，在 313

① 弗雷澤:«三神傳»("Adonis, Attis, Osiris"),第 1 卷,第 299—301 頁。

年以后僧侶的工資可以充分滿足他們的需要。这些工資，在大多数場合下可能是够的，即使僧侶們的貪欲不曾使他們大胆地从事外面的商业买卖行为，以图扩大他們的收入 我們有少数几个例子：在狄奥多西一世时代，有一个馬朱麻的主教芝諾能把麻布織工的生涯和他主教的职責成功地結合起来；另有一个在阿卡狄阿斯时代的梳羊毛工人利奥即卡帕多細亚的僧侶，巴錫尔曾使他經营着固定貿易。394 年时，圣杰罗姆写道："救济穷人，果然是一个主教的光荣，可是从貿易里积聚私人財产，却是教士們的耻辱。"圣安布洛兹，在他的"牧师的責任"一篇論文里，警告說，"应該扫除那爱錢的欲念。教士們不該从事貿易。利潤便是狡詐的标記。"他劝导了教士們从事农业，而不要做生意。教会里禁欲主义的培养原不是单单由于对独身生活卓越品質的信念而来的。它一部分是用作一种方法，来阻止僧侶中間肉欲主义和世俗性的增长，一部分也是为了防止那些荒唐的僧侶、教士或主教把教会資金挪作私用的弊端。

从第三世紀起，主教在管事协助之下，掌管着教会財产。不是每个主教，象那尼亚的約翰主教一样認眞地記载着所管的事务。由于流弊的不断发生，341 年安提阿会議就不得不規定了教士和管事应具备关于財政管理的知識。在加尔西頓会議上所提出的主教盗窃公款一案，使教会財产管理的整个事情有了結論。这里，正式决定了每个主教应指派一个僧侶，充当財政管理人員，在他領导下来管理主教区財产。教会关于限制由經商給僧侶带来的腐化影响的立法是卷帙浩繁的。僧侶不該常逛十字路口和市場，不該在旅館周圍徘徊着，不該出去"兜攬生意"，不該用别人名义来賺錢，不該充当財产的保管人，不該做遺囑的执行人，也不該去猎取遺产。451 年加尔西頓会議，把这种性質的一系列的立法明白地記录下来。但是，从几百年来形成的貪婪心理，已成为教会易犯的罪恶。僧侶們

恶劣地濫用"水能灭火,所以慈善能灭罪过"这一行著名詩句,来騙取信徒的贈与。这种思想,在中世紀的土地贈与或物品的贈与里,时常可以看出。原在神父时代，基督徒在他們貧困状态下——因为他們所有的財产，是很少的——进行着施捨，来扩大福音,救济病人,帮助穷人。可是,从第四世紀起,給教会的贈与,大多基本上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拯救施捨者的灵魂。这是一种表面上不自私而实际上自私自利的行为。到了一个时期，一个人在他的遺囑里,必須把他財产的一部分,遺給教会;如果沒有嗣子的話,他还須把全部財产遺給教会。这种图利的圈套，在398年迦太基会議法規第103条里表現得很明显;它規定:富孀必須热心替上帝服务。

安密亚那斯·馬塞里納是最后一个拉丁历史家,关于他是一个异教徒还是一个基督徒这一問題，原是可以爭辯的，但是,很少有人会否認他是一个誠实的作家。的确，在第四世紀中所有的作家中，他是一个最不偏不倚的观察家；他对当时的主教所作的描写,远不是阿諛的;这些描写証实了下列一項論斷:即这批基督十字架的正式代表們,不得認为是有道德修养的人。367年时，达馬薩和厄賽那斯在爭夺教皇位的冲突时，各从罗馬流氓无产者中間招罗了打手和暴徒。这是一个打到底的搏斗;当搏斗过后,有一百三十七个尸体横陈在西西尼那斯大廈前的大道上；"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安密亚那斯带着輕蔑口吻接着說。

你以为卡帕多細亚的乔治,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亚历山大城的掮客、銀行家和主教。第四世紀中，再也沒有一个主教，这样地抓住了那由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一世的新恩泽所提供的物質机会,把它更有利地利用着。他把基督教化作資本,把权力轉变成紅利，并使教会成了营业的工具，就效率和气魄論,今天华尔街的每只豺狼对他也将羡慕不止。他一度曾服务于帝国的財政机关，在

阿利阿教爭論中，他放弃了这項职位，轉到那由教会提供的經济剝削更广大范圍去活动。在阿塔內細阿流放之后，他担任亚历山大城阿利阿主教，他表現了一个工业巨头的卓越才干。他在小麦市場上干着投机生意，組成“托拉斯”来开发埃及沙漠的硝矿，“壟断”食盐貿易，占取广大沼泽地带，在那里种植紙草和蘆葦，来制造紙和笔，最后还組織公司，来独占亚历山大城的殯仪館生意。

卡帕多細亚的乔治也許是一个极端例子，幸而，当时也有抱着眞正責任感的主教。当帝国政府日益衰敗的时候，主教座，正是由于政府的放弃职守，被迫担任行使那些原屬于各省省长的职权。据記載，塞浦路斯的主教，提奧多里塔斯，从他的主教座的收入項下，撥出款項来建造两座桥梁，照管公共浴場，建筑通水道以供应城市的飲水。在这同一島上，另有一主教埃匹非尼阿，他先花掉了自己的祖傳产业，繼而使用了教会的財产，来救济穷人和遭船难者。有不少主教帮助那被压迫的罗馬中等阶級。在这类聪明而精力充沛的主教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主教，是息多尼阿·阿坡利那里，即第五世紀高盧的克勒芒主教。

他相信一种基督教，就是，和世俗相接触来革新世俗并支配世俗的基督教……在淸晨时間，他接待所有的来人，听取控訴，調解紛爭，办理很多屬于一个行政长官的职务……他有着和市議会有关的重要职务…… 他必須监督他教区內的土地耕种。第五世紀中不管在世俗事务或宗教事务方面，城市社会中的眞正首領往往是偉大教士。元老阶層尽管有着广大土地和富有教养，但他們的权力一般不会超出他們庄园內农奴之外的。①

在今天社会活动家中有誠实的人士，甚至有理想家，同时也有自私自利夸夸其談、言行不符的政客，第五世紀的教会情况也是这样的；在野心的、汲汲于名利的主教、鑽营官职者、社会上向上爬者

① 第尔：«西罗馬帝国最后一世紀里的罗馬社会»，第214—215頁。

中間，也有若干理想家。圣奥古斯丁在所有的这类理想家中，是最偉大的理想家，也是在这些早期基督教会中的最热心的基督徒。他同时是一个烏托邦主义者、一个理想家、一个傳統主义者、一个热情的天主教徒。他很少意識到历史远景，可是，对于教会历史的发展，在神父时代，沒有人，除偉人格列高里以外，比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奥古斯丁，由于情势的逼迫，由于天才和品質的关系，比别人适于向世界表明教会对人类的永久价值。在《上帝国》(De civitate Dei)一書里，他力求以下列信念来說服他的当代人：如果沒有理想，則人类的前途是破碎的；一切由人类設計出来的制度，連罗馬的国家和帝国政府在內，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即使是暫时的，也不能象教会那样成功的。在奥古斯丁看来，有机体的社会，是一个依照教会方式組織并加以管理的社会。奥古斯丁对第五世紀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正如卡尔·馬克思对近代国家社会主义那样。在他看来，高尙的灵魂和优越的法律都是从教会那里得来的。国家应是教会的仆役；民事和市政制度、商业、工业，簡言之，各种人类的力量，包括体質的和道德的在內，只有通过那作为指导力量和权威的教会，在服务里才可找到它对人类服务的方法。对社会服务，只有通过对上帝服务才行，而教会便是它的神圣工具。那幻想家所想象的社会职务，从沒有过一个比他更好的說明者。

但是尽管有着上述的美好指示，第五世紀的教会历史，整个說来，却表明了：无論如何，它的腐敗程度是在增长，而不是在减少。在 313 年以前，看来，未曾有过对教会的买卖圣职和僧侶的不道德行为的很多控告，因为当时教会中的一般貧困和危險的状况，阻止了这类恶习的发展。但是，当教会迅速积聚了財富以后，当鑽营职位者涌入了教会中以后，不久，买卖圣职乃成为一个严重問題了。在尼西亚的补充教会法里，規定了：“任何人不得从担任主教或长老职务者方面接受任何礼物；任何人有授予或接受报酬情事，将給

予剝夺圣职处分。任何人違犯上項教会法規者，宗教会議里的神父們应給他以开除出教的处分。”撒狄卡会議同样地制訂了法律。那些古老的使徒教規，有着相同的意义。巴錫尔在总主教的地位，給他屬下主教們的一封长信里，說明了僧侶在鑽营职位方面的各种非法行为。

下引一个例子，可說明那操縱教会职位醜事的性質和范圍。在400年春天，召开了宗教会議，那是由圣約翰·克立索斯吞担任主席的，大部分是由来自亚洲、本都和色雷斯的主教們組成的。在会議上，瓦倫第諾波立斯主教，尤西比阿斯，曾提出对他的总主教以弗所的安东尼那关于买卖圣职的控訴，当时，后者坐在会議席上。克立索斯吞曾指派三个主教組成的委員会，前往以弗所去調查。但是，安东尼那通过阴謀詭計拦擋了这項調查，不久那个犯罪主教，沒有受罰而死去。于是，有两个敌对的派别，起来进行着激烈竞爭。各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以求填补那空缺，而且，各运用了权力所及的各色各样方法以夺取位置。

正在教会胜利的那一世紀里，象蒙西諾尔·杜森所写的那样，“教会对于任何要过着一个眞正基督教生活的人来說，已成为一个不可能居住的地方了。”不可避免的反抗行动，是一定会来的。心地純洁的人，遂逃往沙漠中去。寺院主义連同它的理想化的貧困和禁欲主义，遂应运而生，作为对教会世俗性和粗野性的譴責。第四和第五世紀的教会历史，說明了歌德的一句意义深长的名言：“每一种思想，只要它受到公众承認以后，就会起着暴君式的作用。它所带来的优点，馬上就轉变为缺点了。”

在基督教成为罗馬帝国的国教以后，教会原来可能想到的无論什么社会、經济改革方案，都被抛在九霄云外了。由于掌握着財富和政治权，它变得保守了。而且，教会的整个精力差不多被吸引到教义爭論方面去。在今天的情况下，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一套改

革社会的理論而教会已成为一个这样活跃的社会力量的时候，很难理解那时为什么大家如此集中心思，来激烈地爭辯着那些象神学和教义一类的和平常社会利益沒有多大关系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思索一下，理由是很清楚的。那个时代，对宗教問題的討論自然日益热烈，因为政府对政治的自由討論加以压制以及正当的地方政治活动日益萎縮。結果，在当时的宗教問題上，人們就找到了討論和研究的領域。各阶層的人們对当时流行的神学論題，热烈地討論着，象我們今天討論着政治問題一样。这項討論的兴趣，从社会的最上層，延及社会的最下層。尼薩·格列高里有一篇关于群众对神学兴趣的有趣文章，流傳下来。他描写第四世紀的君士坦丁堡时，說：

这个城市布滿着手艺人和奴隶；而他們都是有学問的神学家，在店鋪里也在街道上，进行傳道。如果你要向一个人兌換一塊銀币，他会告訴你，聖子在哪些方面是和聖父不同的；如果你要买一塊面包，他就会告訴你作为回答說，聖子地位低于聖父；如果你問浴室已否准备好，他的回答是：聖子是从虛无中生出来的。

虽然这些异端邪說都带着一种教义的性質，但如果我們深入一層去观察，就可看出其中很多是染着經济和社会的色彩的。对近代人来說，初看，果然难于理解为什么这些枯燥乏味的神学爭論竟会激起了这样大的普遍兴趣。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就可获得說明。因为在教会反异教的运动里有着經济的动机，所以，在第四和第五世紀对异端的大冲突里，也可找出了經济因素。

教会的龐大財富（主教們日益成为这財富的唯一保管人和分配者）自然而然地保証了主教們的正宗信仰；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为了辯护一种可疑教义而冒着喪失这样一个有利可图的管理权的危险。"一切异端，当他們遇到有喪失权力的危險时候，是会接受信仰的。"沒有一个主教，会轉到异端方面的。那是沒有好处的。因

为政府所賞賜的特权，只是給予那些不同于分裂派和异端的天主教会即“大教会”的僧侶們的。正宗信仰对主教們来說，是一条有利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教会財富所具有的吸引力往往会激起其他僧侶們的野心和貪欲；后者力图排除主教而自己取得那些資金的管理权。对这样的野心家来說，可走下列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不是以异端罪控告主教，以求推翻他；便是开始辯护一种流行的异端，以期取得群众的支持。

有些异端，象弗里加的蒙退那派，西班牙的普立息力安派，从經济观点来說，反对教会財富所发生的腐化影响，反对主教們的奢侈风气，拥护簡朴严肃的宗教生活。另一类的异端，是留恋于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那时在若干教会团体內，流行着一种兄弟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类的激烈派和梦想家都是拥护一种教会新社会主义的。

教会中所流行的异端，特别是对阿利阿教派的激烈爭論，不仅扰乱了教会的教义，而且敗坏了教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組織。在选择主教时，大多不以德性，而以正宗信仰，作为标准。而且，由于有叛离正宗派的行动，僧侶的人数减少了，而教会为了补充它的空缺，使它的机构能照常工作，在选择新任人員里，就往往不能过分挑剔；另一方面，大批求职者，象近代鑽营职位者在一个党派胜利后的情况那样，涌入教会，来求职业。圣巴錫尔在給他的一个通信者的一封信里，伤心地写道，“教会的法律，是在混乱状态中。那些不敬畏上帝的野心家，闖入夺取了高級职位，而現在，象大家知道，高級职位已成为对不敬神者的奖品了。結果，凡是一个对宣誓愈覺有愧于心的人，大家反而認为是一个愈适合于充任主教的人。”

下列情况不是沒有意义的：那些正宗教会所要斗爭的最流行而又最强大的异端，都是在阿利阿教派的埃及、一性論教派的叙利

亚和多那特教派的非洲，就是說，在那些国家里，在那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或罗馬帝国的拉丁文化，原是一种由征服者所强加于上的外来文化。其中每一个国家，过去都有过独立的地位和一种比希腊或罗馬还古老的文明。埃及人、叙利亚人、迦太基人，尽管是基督徒，然而在罗馬帝国的机构內，是被压迫的民族；所以，这些民族，当帝国的羈絆逐漸松弛而重稅的負担和行政的腐敗增长的时候，就渴望着恢复它們的民族独立地位。那些关于教条和神学的爭論，遂使帝国东方国家內的离心的民族力量解脫出来。同时，国家和正宗教会的結合，使这一种反对勢力达到頂峯。阿利阿派、一性論派和多那特派都成为在这些有关国家內民众表达民族情緒的工具；也通过它們，民众提出了抗議，反对重稅，反对拉丁主人的大地产占有权，反对行政上的營私舞弊，或者反对那些象十八世紀英国的印度总督一样，有进行掠夺的特权的正宗派和統治阶級所享有的不公平的豁免权与特权。在这些国家里，虽然教会和国家是分不开的，但民众对僧侶阶層的憤恨，比对貴族还甚。其原因是：教会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并迫使农奴或眞正奴隶来耕种它的田亩。当历史家看到这些异端是由經济上的不公平和社会上的冤屈的意識所激起的时候，当他看到异端运动包含着土地社会革命的种子在內的时候，他对它們就会发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并了解为什么它們能够获得民心和在民众間能够拥有勢力。他还可了解，为什么穆罕默德教能够这样容易地征服了这些怀有貳心的地方。正宗教会徐徐替代了罗馬帝国，成为社会上的統治勢力；正象帝国那样，“正宗教会是坚决地反对民族区别的，而异端和分裂派，則是欢迎这种区别的”。

因为正宗帝国和正宗教会联合一起来加强它們的压迫政策，所以常有地方上异教徒和异端派合作事件的发生。社会上不公平状态和苛重賦稅也是促成这种合作的因素。政府和教会，由于事

怕农民的起事（这些起事可能是由某些驍貴的軍事长官激起的），在取締乡村异教方面，一向采取了稳健政策，直到407年时，才頒布严峻法律，命令搗毁祭壇神象，封閉乡村庙宇神殿。

当我們从第四世紀的历史翻到第五世紀历史的时候，那在教会里最足以引人注意的重大变革，是教会势力向乡村和农业区的侵入，在那里异教在大业主世襲領上的农夫阶層、农村奴隶和农奴人口中，还拥有很多信徒。原来象上文已指出过，基督教运动是在城市方面的。但是，到了400年时，教会已把城市异教几乎根除无遺了，于是它开始着那所謂“田野的福音宣傳”运动。这运动的第一步，是由教会哄騙劝誘皇帝給它以帝国領地內的广大地产，因而教会得插足于农村地区。这項企图是很有成績的，特别是在东方，所以，小亚細亚的很多新主教区就是过去帝国的大庄园。卡帕多細亚省主教領有几乎該省的全部土地。在西方，非洲主教对于皇室領地虎視眈眈，毫不躊躇地使用了欺诈方法，来夺取这些土地。我們看到历史家左息馬斯（当时的几个非教会作家之一）嗟歎国庫愈穷而教会愈富的情况。不久以前，大土地所有者，或者由于情感或者由于策略，也已开始以别墅和世襲領贈給教会。息多尼阿·阿坡利那里在第五世紀的中期所写的《書簡》里，指出：教会在高盧各省內，已是一个拥有过多土地的地主。的确，由于西哥特人的移殖的結果，教会的財产暫时被剝夺，因为西哥特人是阿利阿教徒；可是教会終究从天主教法兰克人获得了多于它損失的补偿，象我們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

基督教傳布到农村地区，在那里大地主在自己的龐大世襲領范圍以內几乎是个独立国王；因此就产生了庇护制或教会里的僧职授与权。乡村教区，往往和这些世襲地产同其大小，正象美国南方的“产棉地带”的牧师区和大种植园会同其大小一样。业主长久习惯于强迫农民信仰他們所信的同样的宗教，不管是屬于异教或

正宗信仰的，或屬于当时許多异端中的任何一种的 圣奧古斯丁的書信証明了：在第四和第五世紀里，世襲領主在他們的世襲領上，当場应用了"誰統治，誰决定宗教"这項原則，[1] 就是說，他們要求他們的农奴和奴隶接受自己的同一信仰。奧古斯丁在一封信里，曾祝賀一个領主，因为他强制了他的农奴信奉正宗信仰。在另一封信里，他指斥了一个領主曾强制他的农奴同他一起拥护了多那特教义。正宗信仰的皇帝的詔令以及宗教会議的立法都規定了下列条文：地主应以强制他們的农奴和奴隶信奉正宗教信仰一事，作为自己的一种义务。

領主們既享有了这样独立地位的傳統，当然願意和那些愿在他們領地上建立教区的邻近主教作有利的妥协，而主教們也愿承認这些条件。領主以"庇护人"的地位，指派教士，往往就指派他的因此而获得解放的一个农奴；他还为了自己的目的保留着权利，来使用那教区教会的部分进款，不仅是从贈与得来的，而且从結婚、殯葬和洗礼得来的收入。如果教会的財富由于获得忠实信徒的贈与而增长起来，領主还是保留按照原来比例取得进款之权；当然，經过若干年后那項收入会变成很大的。我們很詳尽地知道这些农村教会的起源和傳布的历史以及这些农村教区的組織。阿卡狄阿斯及霍挪留的一条法律，清楚地說到了这些領主的教会。在蛮族时代，农村教会大多落到領主阶層的控制之下。这种私人利用教会的情形，是由那跟着罗馬帝国的衰落而来的一般領主独立性所产生的結果。領主，即他的領地的主人翁，拚命从自己領地內排除自己的以外的一切权力，愿意有着自己的教会，有着自己的教士。他的領地有着它的地方教会，象它有着它的地方市場、它的地方磨坊、它的地方釀酒作坊一样。这种地方教会，是領主貴族的一个賺

[1] "Cujus regio, ejus religio."

錢机关。

哥特人、勃艮第人和倫巴人的国王，尽管屬于阿利阿教派，但也未曾特别禁止在他們王国內把財产贈給天主教会。然而，异端毕竟使对天主教僧侶的贈予縮減了；由于阿利阿教会在日耳曼各王国內所接受的那些贈予財产，天主教僧侶对阿利阿教派和日耳曼国王的矛盾愈加尖銳化。毫无疑問，这种嫉妬是那两个教派間所以仇恨的一个因素。所以，496年当法兰克国王克洛維斯（481—511年）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其他蛮族王国內的正宗僧侶阶層大为高兴。因而当克洛維斯进行征服西哥特人和高盧的勃艮第人的时候，当地的天主教僧侶曾給予热烈的贊助，而他們的出力也取得了报酬。因为那些被占据的阿利阿教会所屬全部財产，都分給了他們。

法兰克人的改信天主教，使在高盧的教会財产大量增加了。远在日耳曼族征服以前，僧侶已成为取得宗教性贈与的能手，又由于教条、崇拜和紀律的发展，那修行的"功德"得到提高，而教会財产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也建立起来了。这类說教，容易被新信教者接收；因为他們对懺悔形式的贊成傾向比对实行基督教的主要原則还大。在法兰克人占領北高盧后实行土地分配时，教会的財产已被尽力地保护着，而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也大量增加。墨洛温朝諸王，在对教会的贈与方面，原是很慷慨的。克洛維斯賜給圣里迈教会大量土地；多哥伯特一世（629—639年）曾把图尔的全部收入給那里的圣馬丁教会。此后，地主貴族遂相繼仿效了王室的行为。到了第七世紀，許多教会拥有了七千或八千处庄园；那些領有二千处庄园以內的教会，还只認为是小有产者。当本尼狄克丁寺院主义开始傳入高盧的时候，法兰克僧侶們对修道僧的来临，曾覺得討厭，其原因是，后者要同前者竞爭着贈与了。

教会所領有的土地，是大塊农田；它們在管理的形式和性質方

面，等同于罗馬貴族的"散布各地的世襲財产"，的确，它們就是原屬于这批貴族的地产。教会整个地采用了这些土地上原有的管理制度，事实上，正是从教会世襲領的管理制度中，我們可知道很多关于过去罗馬管理制度的东西。几百个有时几千个奴隶和农奴，住在这些大地产上人数拥挤的村庄里；他們在一个"指揮者"或管事的指揮下，耕种着土地，情形和貴族的大地产管理，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大农場构成了一个經济单位。在每个大地产上有着堆棧、谷倉、牲畜棚；在奴役的工作人中，除了种田者和牧人以外，还有着鉄匠、車輪制造匠、石匠，这样，每个农場在經济上是自給自足的。教会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用在支付僧侶的工資、建造教堂房屋、維持学校和医院、救助穷人等等。所有的剩余产物，則在公开市場上出售；为了这个目的每个主教有着一个代理人，有时有着几个代理人。由此可見，教会在土地領主的地位上，怎样变成了有錢貴族的竞爭者，也可見它的竞爭(由于它的特权而愈来愈厉害)怎样使掙扎的小农一蹶不振；因为小农在經济的竞爭里是站不住脚的。常常当他被迫典出他的土地的时候，当地主教接受了这抵押，并和富有貴族一样硬心腸地取消他的贖回权。

教会在經济上的巨大变革，即从穷困到富有的地位，使教会的精神和品質也改变了。僧侶还在宣傳着穷困的理想化，空談着"有福的穷人"和"有福的馴服者"，并傳布着慈善的訓誡；可是事实上，教会已成为一个有錢的貴族团体，它虽明白标出了它的宗教誓約，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开发它所有的資源的一个龐大机构。在第二和第三世紀，教会曾表現出眞正的人道主义，眞正的愿望，来救济貧病者，来改善奴隶阶層的状况。但是从第四世紀起，在教会里出現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一个是純粹宗教和仁慈的，另一个包括世俗性的貪婪分子，他們的慈善行为是为了夸耀、为了策略。这一集团灌輸着"馴服"的德行，为的要使那些不滿意的和被压迫的仆役和奴隶

阶層安心处于屈服的状态里。教会向中世紀欧洲的"賤农"和奴隶阶層詳細地講述着天堂上的幸福和极乐生活；构成了一个极好論点来說服他們听天由命地在社会經济制度的压迫下劳动着。在第十世紀中，維罗那主教拉特里那斯伪装神圣地确告农奴和奴隶說，一切人們都是弟兄，同时劝告他們遵守那項使他們受着束縛的神命，說"上帝慈悲地注定那些人要做奴隶；他看到，对他們来說自由是不相称的"。

为了开发它的广大地产的利益，教会現在已成为一个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支持者；它不仅反对解放奴隶，甚至把奴隶制扩充到原来沒有这种制度的地方。教会所宣称的对同胞的博爱和慈悲以及偉人格列高里所高談的"天賦自由"(但他沒有把它实施过)，是旨在講給虔誠信徒听的陈詞濫調，从沒騙得过精于斯道的人。

現在沒有資料，可証明：当时有很多人对上述言論中所表达的宗教見解，是怀有同感的。不管这些言論怎样影响着有些优秀崇高人們的心灵，但是，它們要反对大多数人們，是无力的，要反对那在中世紀世界有无可估計的經济重要性的奴隶制度，也是无力的。看不到什么遺跡，足以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过認眞的努力，要改变这些状况的。①

教会有时指斥过奴隶貿易，但沒有指斥过奴隶制度。原因是那时这种貿易大多是在犹太人手里，并使他們致富，后来又是在穆罕默德教徒手里。教会从沒有只字抗議过出卖基督徒为奴隶；更談不上出售异教日耳曼人和斯拉窩尼亚战俘給基督徒了。狄奥多·坎特布里的"悔罪录"里，曾提及准許一个父亲出售他的兒子，如果后者年龄已超过十四岁。779年时查理曼力图管理奴隶貿易，命令所有的出售必須在一个政府或教会的官吏面前进行，但是沒有一句話曾譴責这种行为。的确，按法律，每个教区的神父有权領有两个

① 比拍：《中世紀教会和奴隶制》，《美国历史評論》，第14期，第677頁。

奴隶，一男一女。寺院是大奴隶主。我們看到在整个中世紀时期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有着教会奴隶。主教不得釋放教会的奴隶，除非他們以自己的財产来补偿教会的損失。有这样一些例子：被解放的奴隶曾担任圣职而成为神父；后来被免职，又降到奴隶地位。最坏的，教会在原来按罗馬法沒有奴隶制的地方，創立出奴隶制。教会处罰叛逆背信罪，不仅使犯罪者本人变成奴隶，而且使他們的后代永远淪为奴隶。在西班牙，妇女犯有与人通奸罪者，被宣告为奴隶。如果貴族等級的妇女三次遺弃她的丈夫，她被判令苦修；即使她的丈夫死去，她也不得再嫁；但是如果一个平民妇女犯着这行过失，則她被出售为奴隶。按查理曼的法律，应把占卜星相者給教会作为奴隶。教会的避难权，有时拒絕給予奴隶。在法庭上奴隶不得做原告。連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也是沒有做原告的資格的。直到他們的第三代，这項禁令才可撤銷。至于对待奴隶的态度，僧侶的殘暴是和世俗主人一样。最可恶的，是教会的人常常把他們的奴隶切断手足或使他們餓死。倘使有屬于同一主人的两个奴隶已結婚而其中之一已获得自由，而另一个人不能贖出自由的話，那个人可以再婚。

第三章　蛮族世界和大移动*

在罗馬帝国的后期，比如說第四世紀，蛮族世界包括萊茵河以东、多瑙河和尤克辛海以北的全部北欧，并无限地延入亚洲。在这广大地区的人种、“民族”和部族的波动里，最重要的是日耳曼族、斯拉夫族和匈奴族的历史。

我們在日耳曼制度中可找出关于原始游牧和畜牧生活的遺风，尤其是在“百家村”制度中。“百家村”看来原是由畜牧条件所产生出来的土地分区；后来由于部落成为軍事組織，“百家村”遂变为一个募兵地区，也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有人估計，在畜牧阶段，一个日耳曼家庭需要三十头母牛来供給它牛奶、奶油和牛肉。在一个日耳曼平方哩（約合現今二十一平方哩）荒地內，能够养活的，不多于六个家庭，也不多于一百八十头牲口。所以，一个“百家村”作为能够提供一百个战士（包括父子在內）的畜牧区，也許是那足以維持二十个家庭生活的地区，它大約包括三日耳曼平方哩，即約合六十三美国平方哩的一塊土地，或多或少，按照畜牧的情况而定。这样，古代“百家村”就成了一个經济的、軍事的和政治的单位，比美国的“区”（三十六平方哩）还約大两倍。这区域内的社会生活反映出这种情况。

游牧营的牲口在荒野里，不能沒有牧人伴随而走来走去；它們必須分为畜群，而在畜群放牧的地方，必須由武装牧人来保卫，以防盗賊和野兽。产乳的母牛必須安放在妇孺的营帳附近，其他牲畜必須由牧人赶到远处；牧人在經过长久时間以后，才得回到营帳。又必須把若干数目的人員用于打猎；

---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45、48頁。

有些人还须保护营帳；一些耕种工作也必須去做。①

古代日耳曼人逐漸从畜牧阶段过渡到一个較多定居性質的阶段，因而发展了一种簡陋的农业，也許是从一个早期的零星耕种成长为經常的生产。这項轉变似乎是在凱撒(公元前50年)和斯特累波(公元1年)时期与塔西佗(公元100年)时期之間发生的。前两人曾描写苏維汇人、倫巴人和赫芒达列人大多是游牧的部族——“他們不专心于农业”②。在百年以后，塔西佗則描写他們都是有着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

关于早期日耳曼人耕种方法的性質以及它发展的程度，历史家們頗有爭論。这問題原本是困难的，而由于滲入了凱尔特人的和后期罗馬的方法，它愈加变为复杂化了。但是，我們必須試图了解这一問題，因为不管它是怎样复杂，它是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紀的經济历史和社会結构的。

当日耳曼人組成定居的农业住所的时候，他們好象起初經常使用一塊地作为牧場，另一塊地作为耕地。然而，他們漸漸发現了下列現象，虽然还不懂得其中道理：把同样一塊土地繼續耕种，会引起土質的枯竭。因此，由于很多年代所累积的經驗，他們采用了每年讓一半耕地休耕以及每季交換耕地和休耕的办法。这就是所謂“田-草”③制度，即交換的耕作制度。后来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谷物輪种制的必要，这一发現想必需要多年学习才获得的。

籠統地說明这些轉变，是一件易事。但是，想要作出专門性的說明，則难題就产生了。举一例說，在一段著名的文字內，塔西佗論及他当时的日耳曼人說过：“他們每年交換耕种”④。他所講的，是

---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12卷(迈肯的一篇評論)。

② “agriculturae non student”.

③ “田-草”(field-grass”)制度，即是一半地播种，一半地长草的制度。——譯者

④ “arva per annos mutant”.

指耕地和休耕地的交換呢？还是谷物的輪种呢？如果他意指前者，那末日耳曼人在公元100年时所达到的发展阶段，远低于后者的情况。其次，这些轉变，是由日耳曼人从自己的农业經驗里发現的呢？还是从凱尔特人榜样里或从罗馬人的榜样里学到一些东西呢？如果是后者的話，这两种影响中每一种的特殊性質和程度又是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些問題，所写的卷帙，已經汗牛充栋。

凡是农业生活必然要使每一个居住区有着确定的界綫。"馬尔克"(Mark)便是这样。可是，有一个麻煩問題就发生了：在早期日耳曼人中，有的居住于一个沒有圈圍的、即空曠的村庄(Dorf)，有的居住于一棟一棟周圍环繞着田亩的住宅 (Einzelhöfe)。日耳曼人这种社会聚居形式上的不同，也指出了他們在历史的影响上和接触上的分歧。关于这些，我們可深入中世紀中找寻証明，如在房屋、小舍、街衢、田地、籬笆、树木、土地丈量、地名方面，以及在土地登記、庄园測量、租册等等方面。就这些資料来說，那一去不复返的一个时代的历史，在欧洲地图上，还是留着痕跡的。

那种居住于村庄的制度，是在原始日耳曼人中創立起来的。它最早成立的地区和保持它最純粹形式的地区，正是日耳曼人的最老家乡，就是，薩勒河和威塞尔河流域的領土。当日耳曼人向外扩展的时候，他們带去了这种村庄形式，但是在别的地方，他們的居住制度由于接触了不同的种族和社会条件，曾有所变化。在西方，他們先后受到了凱尔特人和罗馬人的影响；在东方，受到了斯拉夫人的影响。孤单住宅是凱尔特人的一个居住形式。圓形村庄(Runddorf)是斯拉夫人的一个居住形式，从对称方面看，这种形式远胜于一个典型的日耳曼村庄，后者是由許多茅舍松散地集合起来的。結果是，在这"最古老日耳曼"以外，可找到社会单位的双重或混合的式样。当日耳曼人移动的时候，他們有时采用了凱尔特的式样，有时把带去的村庄式样，在征服地上建立起来。在"民族

大移动"运动过了以后，日耳曼型的地区，出現于高盧和意大利，同凱尔特型和罗馬型的地区同时并存着（这里，必須注意到它們和罗馬庄宅的接触）。而且甚至在日耳曼痕跡早已消逝的地方，象在勃艮第、薩伏衣和全部亚奎丹，我們还可知道，这样的集合是一度存在过的。在西欧，凡是經过日耳曼人征服的各地方（在不同的程度上遍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日耳曼人"把自己制度特征的烙印，盖在那些原来有着另一种制度特征的土地上"。

然而，我們必須小心謹愼，不要对这两种形式加以太明显的区别，也不要把每种形式的起源完全归因于不同的种族习慣。凡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家，如屬可能，必須經常判断什么是"某种种族型的經常伴随物"和什么是事物的环境和經济的来源。对于經济因素，必須予以重視。在日耳曼境內有丰富自然牧場的地区，畜牧业是胜过种谷业的，这种优势，可以造成一种日耳曼的住宅式样。有人这样地主張过的。可是，斯拉夫人的圓形村庄，当然是由于畜牧业的流行而产生出来的，据这一例証，似乎可爭論，在畜牧业占优势的地方，日耳曼村庄的圓形式样应該早已发展起来。在凱尔特人旧殘余不显明的地方，我們也可看到日耳曼人中的孤单住宅；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住宅，大多可能是由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所做的清除森林工作而产生的。在瑞士的日耳曼人区，我們可找出关于这方面的显明証据，在那里，岩石層和袋形谿谷是有利于孤单田舍的形式的。一般說来，在日耳曼境外的日耳曼村庄，在平原和可耕地上，在大公路沿綫地带上是数目較多，而在崎嶇的土地上，或偏僻的乡村区，或在清除了森林的土地上以及沼泽地上，我們所看到的，倒不是孤单田舍的占着多数，而是这种田舍比别处多些罢了。

每个日耳曼人村庄，包括有三类土地：(1)耕种的田亩，(2)草地，(3)森林和荒地，这就是所謂"公地"，即开放給大家而沒有开垦的土地；可是跟着社会人口的增加，有时也从中划出新地来耕种。这

里，我們要特別談談第一类的土地。

在村庄的每一塊耕种地或可耕地上，把地面划成为狹长条地，叫做"耕地"，再留一条未翻动的泥土或掘出两条对立的犁沟作成的田塍或阻格，使它們彼此分开。这些地带，是眞正的田地。它們的大小平均約有四竿(rods)闊和四十竿长（合二百二十碼或一富浪或1/8哩）。这些地带再分成为小耕地或小田地，后来叫做"竿地"(virgates)或"碼地"(yardlands)。大耕地叫做"海德"(hide)、"伊勃"(hube)、"伊夫"(hufe)等等，它的面积約有一百二十畝，那是中世紀所通用的田賦单位。"海德"可能原来是在粗放耕种流行时期所需的較大单位；而碼地和竿地的較小单位，是由于粗放耕种轉变到精耕細作，从海德分裂出来的，而加速这种轉变的，是象节約以及农夫子女的增多这一类的社会因素。每一个农夫的"田地"是他所領有的分散土地的总和。这"田地"不是由那些連成一片的田亩，而是由許多耕地汇集而成的。不管过去地产的原始性質怎样，現在这些条地已是农夫自有的土地了。我們不可能正确地說出，每个家庭所占有的田地平均究有多少面积。在这一点上，田地面积大小相当的程度不会超过今天美国的，在那里有着各色各样大小不同的田亩。一个农夫多些，另一个少些；那是取决于节約、勤儉、遺产、結婚等等的。

显然，早期日耳曼人的农业操作方法和田地制度，使所有的田舍必須互相接近、位于同一塊土地上。如果每个田舍主人住在自己的任何一塊条地上（在他所有的这样多的条地中，哪一个作为房屋基地最为合算呢？）他会远离了他的其他条地，正象他住在村內一样。而且如果他的田舍位于村庄之外，那末每隔一年，他会置身于休耕地的中間，而牛羊繞着他的田舍吃草。在这些情况下，我們看来不管怎样奇怪，"聚集"的村庄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这"聚集"的村庄，也可說明中世紀特殊的星形道路系統，从作为中心的

村庄放射到周圍田地去，再从干路分出小路到各塊条地去。

对早期日耳曼人土地占有制和耕种方法的了解，是很重要的。有些史家曾認为，这种田地的特殊安排是从过去公社土地制演化而来的，“这过程就是一个公有土地不断縮减的过程。”問題是重要的，因为再也不能想象出比土地私有权的起源更实际的問題了。在这些制度和方法中，我們会找出原始日耳曼人公有制的証据嗎？

沒有人怀疑，关于森林和荒地公有制是流行过的，但問題是：个人所有制，或者个别所有制眞的是从过去耕地公有制演化来的嗎？还是象有些人看来，由此足証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同耕作以及同一原始的村庄企业如耕种和收获一类的合作呢？即使在这一点上，公社精神也許强調得太多了，因为村庄的紀律（日耳曼人的管理一向是严格的）可能是使村民需要共同行动的一个統治因素。邻人做什么事，每个人就得做什么事。村民不得随心所欲地去耕耘、播种或收获。季节性的职业当然是循环的，但是地方当局特别强調了季节性的需要。这强制的集体劳动可能是支配的力量，不是公社的精神，更談不上共产主义了。

有些历史家企图从古代日耳曼土地所有制里，寻求原始共产主义的遺跡。此外，还有一种学派按照同一的証据，認为那爭取平等占有土地的热烈愿望，是早期日耳曼土地保有制的决定因素。别人看来，为求得平等而这样地分配可耕地这一观念，似乎是太唯理主义了。这种解释，也許把十九世紀民主平等观念套到过去历史上了。可是，这項理論比公社的理論，較可說得过去。因为平等的分配也能流行于或原来流行于一个自由的或者一个不自由的村庄社会里。

有一个极端的学派嘲笑着“馬尔克”的整个观念。依据該派的意見，原始日耳曼人旣沒有国家，又沒有村庄权利，又沒有輪种制，又沒有强制性的耕种。土地是很多的，因而沒有占夺土地的动机。

各个人得占据他所需要的土地，在收获之后，就把它抛弃来耕种另一塊新地，如果他愿意这样的話。那时沒有村庄社会，也沒有"合有制"，也沒有公共所有制，也沒有共耕土地制。"馬尔克"只不过是一塊界綫模糊的領土罢了；"公有权"(Allmende)也只不过意味着各人在集团所占地区的界限以內得开垦若干土地之权罢了。

我們姑不談这类問題：公社所有制是否曾先于个别所有制；或者認为这是否仅仅是共耕制即村庄合作制；"耕地的按期互相交換制是否曾先于私有財产制；"可是，当日耳曼人初次被罗馬观察者所知道的时候，他們确然已有着土地私有制度。但是这制度，不是象人們从簡朴的甚至原始的农夫情况所推論出来的那样单純，相反的，它表現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現在，我們来談关于早期日耳曼人另一个麻煩而多爭論的問題：日耳曼基本民众的地位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呢？对于这一問題的討論，已費了很多笔墨。中世紀历史軸心的角度，似可說正是取决于这个問題的答案。这是一回事，如果古代日耳曼人群众以自由民地位开始，而后来被压制到农奴地位；但那是又一回事，如果他們在日耳曼原在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下开始，而在遍布并占領西罗馬帝国以后几百年中，依然是不自由，直到十一和十二世紀农奴制衰落为止。

不幸，对这一問題的討論，經常不是平心靜气的。許多，甚至大多近代德意志历史家，由于过分受到民族自豪感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坚执反对上述的第二种解釋。他們把十九世紀早期盛行的自由民主思想，注入过去的历史里。另一方面，那些沒有被这些观念和偏見所歪曲的研究近代經济和土地問題的历史家，对民主-民族主义学派的論点，却也很少找出了直接的証据。他們并不否認有些自由村庄存在过，但主張，大部分村庄是由不自由人居住着，至于孤单住宅(Einzelhöfe 或 Salgüter)，它們是由农奴耕种的領主財

产。他們爭論說，日耳曼人中的貴族地主制度，远不是采自凱尔特人和罗馬人的办法的，而是日耳曼人中的旧制度；而封建占有制是由早期罗馬和日耳曼占有制延入中世紀上期的。大多数早期日耳曼村庄，不是从自由村庄而淪入庄園地位的，而是从不自由村庄而后来变成为庄园的。按我們現有的知識范圍，一个科学假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能的东西。但是，那主張日耳曼人的社会組織是基于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平等土地所有权的自由人集合体的理論，看来是已經粉碎了。

日耳曼人有一些堡壘，似乎象防舍那样，它們是用木头筑成，建造在險要而不易达到的地点，并环以木栅和沟渠。当有敌人侵犯的时候，它們用作躲避和抵抗之所。这样的一个建筑叫做"堡"(burg)。堡这个字是在后期拉丁文里所能找到的第一个德文字，在第四世紀中它出現于拉丁文。日耳曼人自己是沒有城鎮的；他們在进入罗馬帝国的时候，对罗馬人有城垣圍繞的城市，頗不信任。安密亚那斯·馬塞里納写道："城垣的圈圍，在他們看来似乎是捕人的罗网，而城市本身是埋活人的坟墓。"

从远古以来，日耳曼人和波罗的海区的人民以及地中海地区各国的人民之間已存在着貿易关系。早在公元第五世紀，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从辽远的北方，已获得琥珀和毛皮。在古代，琥珀是頗被珍視的，而波罗的海的海底樅树林，那时是而現在还是世界上琥珀供应的主要来源，这些琥珀經过大风暴而被冲到海滩上的。由于原在运輸中落下的零碎琥珀的"发見物"，我們发現了一条古代商路。这一条路是上行維斯杜拉河或尼門河，再从那里下行第聶伯河或第聶斯德河以达尤克辛海。伊特拉斯坎人和后来的罗馬人的琥珀是从同一来源获得的，一条路是上溯奥得河或易北河和摩尔道河，以达亚得里亚海的頂端；另一条路是从波罗的海濱到莱茵河，再經过摩塞尔河到罗尼河而达到馬賽(即希腊人所称的馬西

利亚)。普林尼在他所著的《自然史》中曾引述那生于公元前第四世紀的希腊地理家和探险家馬西利亚的皮特阿斯一句話：哥頓斯人(哥特人)是从事于琥珀貿易的。

日耳曼人和高盧的凱尔特人間的貿易，毫无疑問，在凱撒第一次記载它(公元前50年)之前，老早已經存在；日耳曼人以琥珀、毛皮、奴隶及战俘来交换馬匹。凱撒告訴我們說，涅徽伊人反对在他們中間出售葡萄酒，因为它有兴奋的作用，但是苏維汇人欢迎商人，因他們得有机会来出售从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战爭里所鹵获的战利品。罗馬商人跟着凱撒完成对高盧的罗馬征服之后，迅即进入日耳曼。公元前25年时因为有几个罗馬商人被杀死，一个罗馬将領馬卡斯·芬奇阿斯被派出征日耳曼人。在早期帝国，罗馬和日耳曼間貿易关系是密切的。一个重要的罗馬商人居留地，位于涅克河畔，近斯图加特的馬尔巴赫，曾維持几百年之久。除了琥珀、毛皮和奴隶以外，罗馬人还輸入甜菜(提庇留所喜欢的一种德意志蔬菜)、鵝毛、硬球般的肥皂以及头髮(因为南欧的黑髮姑娘曾珍視日耳曼人的紅黄色头髮)。当时，毛皮已成为罗馬的一种"时髦"东西；到了第五世紀，穿着日耳曼式袴子以代替罗馬式外衣，曾风行一时，以致皇帝霍挪留加以禁止。

在多瑙河上游区的几个罗馬城中，最重要的是奥古斯大·芬得力哥魯，即奥格斯堡。在奥古斯都时代，它仅仅是一个沒有城市权利的市場；后来，它成为一个城市。塔西佗說过赫芒达列人是日耳曼最重要的部落，它和"里細亚省的最宏大的居留地"有商业联系；当他說这句話的时候，虽然沒有提及奥格斯堡，但毫无疑問，他的意思就是指它的。

阿尔卑斯山外各省的經济，当然受着边疆情況的支配。木材、牲口和兽皮是从里细亚运来的。諾立克以产鉄著名，但也有其他金屬如白銀和黃金；还有兴盛的养羊业和养畜业。君士坦士湖东

端的布累根茨有一些商业。在班諾尼亚，卡能敦是和多瑙河中游蛮族进行貿易的地点，直至第三世紀为止。它毁灭于第四世紀中。可是，在这里甚至罗馬統治消失之后，罗馬商人的居留地还是在多瑙河畔的累根斯堡(勒齐那·卡斯特拉)繼續存在着。

罗馬文化影响、罗馬商业、甚至罗馬行政制度，的确深入到日耳曼的內地，深入到按正式边疆我們不会猜想到的地方。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已揭露出下列各种遺跡：一条从萊茵河下游到威塞尔河口的旧罗馬道路，美因河流域的几条罗馬道路，穿过沼泽地用木条构成的几条道路以及在西日耳曼罗馬建造的几座城堡，后者久被認为是墨洛温朝的建筑物。

从碑刻方面，我們可知道萊茵河和多瑙河之間商业的重要性。尽管这些地方不象南方諸省有着很多庙宇、戏院、凱旋門，然而，在那里罗馬遺跡还是重要的，如巴塞尔附近的戏院、罗提尔的精細鑲嵌物、巴登威勒的浴場。为了这样的奢华享受，大量的商业資財一定是不可少的。

萊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长期和平，約有二百五十年之久，使这項貿易繼續地扩大，并一定使日耳曼的西部和南部的日耳曼人部分开化了。碑刻提供了有趣味的証明：在奥格斯堡有一个富商，在卡薩尔有一个銀行家，在馬尔巴赫和累根斯堡有几处外商居留地。古币的发現也說明了这种事实。古币的大部分是屬于早期帝国的。因为在第三和第四世紀当罗馬貨币夹杂着銅或鉛而貶值的时候，日耳曼人精明地只接受那种純金的旧币。若干年之前，有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普力茨附近的泉水里发現了这些古币，显然是由在馬科曼族間經商的一个罗馬商人在那里鑄造出来，作为一种供神用品的。还在达克附近找出了青銅飾品，这些东西一度曾是小販的商品的一部分；为了安全，他們曾把它們埋藏于地下。的确，当时曾有一条可直达波希米亚的罗馬商路。

罗馬-日耳曼貿易的发展，如果沒有遭受着行政上的限制，决不会限于当时的情况的。帝国政府管制了边境上的一切交通路綫。多瑙河外的魁迪族、馬科曼族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被迫留出河的北岸若干哩領土作为无人地带；蛮族船舶不准在河上航行，罗馬水师还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上巡邏。显然，这种在边境上对商人和商品所实施的严格的警察管制延續了好几百年。边境市場設在規定的地点，并有着規定的时期；如果它們被封閉了，日耳曼人会痛恨这种剝夺行为的。这些市場的地点我們可从罗馬編年史上找出。甚至匈奴人也是重視它們的。这些地点，就是罗馬巡河水师的"碼头"。在日耳曼人开始侵入的时代，这項商业遭受着严重的影响，不仅因为日耳曼人的敌对行为而使它不安全，而且因为罗馬下令禁止了通商。举例說，公元 372 年，一群商人因不顧禁令而擅渡萊茵河，被皇帝朱理安的水师所捕获；因而他們的財产就被沒收。

亚基列是和日耳曼人貿易有着最密切联系的一个北意大利城市。它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頂端，伊孙左河口，約距現在的的里雅斯特德二十哩。亚基列也是意大利和达謝間商业的主要集散地。

"它[亚基列]运出酒、油以及地中海沿岸各省所产的名貴織品，越朱理安阿尔卑斯山和卡尼克阿尔卑斯山达到班諾尼亚与諾立克；在那里換取它們的牲口、它們的皮革、从波罗的海运来的琥珀以及它們从边疆战爭中所俘获的大批奴隶；这些战爭是它們和多瑙河外及喀尔巴阡山外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永远进行着的。"①

在四百多年的时期中——就是說，从公元前 27 年罗馬帝国的創立到公元 378 年亚得里亚那堡战役为止——罗馬帝国虽在它的威力下降着的时候，但也能維持对日耳曼人的控制权，在这长时期中，虽有着偶然的边境战爭，但大体上他們之間的关系是和睦的，

① 黎德：《罗馬帝国的城市》，第 337 頁。

有几万，也許有几十万日耳曼人和平地进入了罗馬帝国，并居住那里。現在，我們必須討論这項移民的性質和范圍，因为这必須認为是一个殖民运动。这項“和平侵入”終究深刻地影响了罗馬帝国的經济情况并更改了它的社会結构。

日耳曼人通过參加軍队，极其容易地进入罗馬帝国境內。在帝国的整个历史里，它繼續招募日耳曼兵士。馬卡斯·奧理略（死于公元 180 年）数以千計地挑选日耳曼人，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高貴出身的罗馬人竟拒絕在蛮族軍团里服役。可是，大体上日耳曼人却是优良的兵士。皇帝的卫队大多是由日耳曼人組成；在帕拉泰因山上皇宮守卫室墙壁上，还存留着由尼祿的一个卫兵所乱涂的一幅有趣味的漫画。奧理略·維克多論及第三世紀軍团时說过：“我所說的兵士，几乎都是蛮族。” 皇帝瓦勒里安在某一次重大战役之前，曾写信給他的手下大将，就是后来的皇帝奧利連，說道：“你应带着哈特多孟、哈尔德加斯特、黑尔德孟及卡洛維克出发”——这些人都是日耳曼軍官。皇帝格累細亚很欢喜日耳曼兵士，竟使其他士兵大抱不平。我們还可看到：日耳曼軍团不仅是駐在罗馬的各边疆上，甚至在亚美尼亚和阿拉伯边疆上，而且內地也有日耳曼人駐防軍，特别是在高盧省。第四世紀的《帝国要人志》(Notitia Dignitatum)指出：苏維汇人駐在巴叶、里曼以及在奧汾涅；法兰克人駐在勒內。406 年立比阿立法兰克人①曾竭力堵塞汪达尔人的侵入洪流。在第四世紀有两个法兰克人，阿波加斯特和包多，都是格累細亚的和狄奧多西大帝的亲信将領。在第四世紀中帝国軍队的統帅，也是日耳曼人，例如，斯底利哥、亚伊細阿斯、里塞默等。

---

① 按第四世紀法兰克人分为两支，住在萊茵河两岸者，叫做“立比阿立法兰克人”(Ripuarian Franks)，意即“河濱法兰克人”；另一支住在舍拉河(Sala R.)流域者，叫做“薩利安法兰克人”。——譯者

然而，还有比軍团中的日耳曼士兵人数远多而重要性更大的事情，就是各日耳曼部族以“同盟者”的名义居住于边境各省內。他們类似以前的罗馬退伍兵那样；他們在战爭时应服軍役的条件下，領取了土地贈与来耕种。这些日耳曼殖民者，如果住在罗馬业主的土地上，当然不得不应用罗馬人所用的同样的农作方式。但是，当他們住在他們自己的田地上，他們保留着日耳曼房屋式样、日耳曼耕种方式、日耳曼土地丈量制。罗馬省区的条件，果然深深地影响了那些移民的身分，但是对他們的旧习惯，却未曾妨害。所以，下列情形，特別是在高盧存在着(因为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少受到这种殖民运动的影响，直到第五世紀的眞正征服为止)：罗馬測量員所用的“百畝”法①，凱尔特人土地保有制的旧形式及日耳曼人的耕种和土地占有制的新形式都同时并存而又交叉着；当然，这些形式甚至象居民那样会漸漸混合起来。

另有一种异于日耳曼“同盟者”的日耳曼移民即是“隶农”(loeti 或 coloni)；他們移殖在人烟稀少或荒蕪的地区(法律上无主人的荒地)，由罗馬人給予田地，甚至谷物种子以及役畜，使可着手耕种。这一类移民后来和各省內罗馬奴隶阶級相混合，而形成了中世紀的农奴阶級。在这些隶农中，有很多人原是战爭中的俘虜，但是也有其他日耳曼人；他們从沒和罗馬交鋒过，由于他們背后部落的压力，从本乡被挤出来，力求在帝国內取得一塊安身之所。他們原不是奴隶，甚至也不是农奴，虽然后来淪落到农奴的地位。他們也被分配在皇室(国庫)的大地产上，或被分配給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富裕业主。早在帝国灭亡之前，罗馬人通过各省区內成千成万日耳曼人“隶农”的居留地，一定会熟悉蛮族的很多风俗习惯的。

日耳曼人每次几千人不断地滲入了罗馬帝国境內，因而罗馬

② “百畝法”(centuriation)，就是以百畝作丈量的单位。——譯者

人和日耳曼人間的相互影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第五世紀当日耳曼人以整个部族并在征服者的地位上涌入帝国境內的时候，他們发現在那里已住着很多他們自己的同种族人，后者已經采用罗馬的生活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經受到罗馬文明的同化。而且，甚至那些长久留在日耳曼境內的部族，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已接受罗馬的影响。这对哥特人来說，是特别正确；而对法兰克人和倫巴人来說，则是大为不然了。

这整个蛮族世界久已遭受深刻的不靖状态所激盪，而这种情况是注定要引导到第五世紀的“大移动”；就是，那被德意志历史家生动地称为“民族的漫游”。这里我們講到历史上一个最广泛而又最有力的現象——移民了。我們必須对这些声势浩大的移民的原因、方法和方式以及移民的路綫和影响，加以分析。

毫无疑問，这些移动的基本原因，在于粮食供給的不足。这可能是偶然的、暫时的現象，如在畜牧部族中遭到兽疫病时的情况，或如在农业部族中遭到旱灾时的情况；或者由于生产方法上的簡陋，也可能造成經常缺乏的現象。在古代，經常有着一种人口的压力加在生活資料的上面。为了減輕压力，乃采用了战爭和掠夺，就是，强的部族对弱的部族的排挤行为。这些运动变成了移民的原因，也是移民的結果。

有一个倫巴历史家保罗管事曾写道：倫巴人在斯堪的那維亚半島上，由于人数的增加，分为三組，并用抽籤办法来决定其中哪一組应該外移。日耳曼人有时由于旱灾和飢荒的影响，被迫进入罗馬帝国境內。罗馬地理家斯特累波曾清楚地看出：古代日耳曼人迁移的动机，与其說是由于他們职业上的农业性質，不如說是由于他們职业上的畜牧性質，以及由于食粮缺乏的經常威胁。凱撒曾探寻日耳曼人騷动和好战傾向的經济根源，在于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荒，并扼要地表达这思想說：“当时……由于土地荒和人

口的倍增，他們发动战爭。”① 他还說，当日耳曼人移动的时候，他們还有着未开垦的广闊地带。所以，引导日耳曼人进入罗馬帝国的原因，不是在于“因为国内缺少地盘”，象吉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在于农业的簡陋制度、在于因生产过低所产生的粮食供应的缺乏以及在于爱好掠夺的品質。他們常常把自己的地方遺弃。日耳曼的人口不是过剩的。依据两个最著名的近代历史家也是統計家的估計，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之間的領土上（这是到第五世紀留下来的唯一日耳曼，因为斯拉夫人已满布于所有的东半部，那里一度曾由哥特人、倫巴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馬科曼人、魁迪人等等居住过），总共有着不多于一百万居民，住在二十万平方哩的領土上。在这个地区之內，估計有二十三个部族，而其中沒有一个部族能有多于六千到八千战士的。由于他們的农业的簡陋形式，日耳曼人是营养不足的，象一切生活在窄狹范圍內的原始民族一样，他們迫切地追求生存資料。圣安布洛玆，也許是第四世紀所有的作家中对情况观察得最銳利的作家，他正确地写道：“里細亚已認識到自己土地肥沃的危險。它以它的富饒吸引了一种敌人的侵犯。”

移民果然可用和平伸入的方法来实現——这是在第五世紀前日耳曼人移民的方式——但多半是用战爭方式来进行的。然而，移民有时不采用实际轉移的方式，而采用扩展的方式以及征服或兼并新部族和新土地于本国的方式。举一例說，法兰克人征服了高盧，后来又征服了大部意大利和部分西班牙，但是他們沒有从西日耳曼的老基地撤退出来。我們很少找到整个部族移入一塊空地的实例，可是倫巴人的占領波河流域，象在下文所述的那样，是屬于这类性質的例証。然而，无論如何，新占領即意味着那强有力的种族的控制。

① “cum……bella inferrent propter hominum multitudinem agrique inopiam”.

这类变更所产生的結果，当然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間的血統的混合以及他們之間的制度的融合。关于血統混杂的过程，由于下一事实，一般是进行得很便利的：被征服人民中的大部男人已經死去，而剩留下来的主要是女人。在所有的混合中，我們应該注意下列重要因素：两种人口的和他們活力的比例、本地的和侵入国的制度的力量和伸縮性、混合的程度、时間的因素以及最后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我們不应由于上述抽象的事实和对移民史的冷靜分析，而看不見下列情况：它們果然是屬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可是，同时也是屬于最殘暴的历史事件；战爭、掠夺、屠杀、奴役、飢荒、破坏，是它們形影不离的伴随物。虽然如此，它們毕竟有着良好的后果，因为它們是历史上芟除劣等居民和腐朽文明的一种方法。

但是，遭劫的不是全在被征服者的方面。在德意志，特别在日耳曼的西南角，在那里来自亚洲的冲击和部族的压力达到了最大的激烈程度，弱小部族在部族"碾碎"的过程里，被磨得粉碎，而强大部族也只能用联盟方法来維持自己，象阿勒曼尼克和法兰克联盟的情况那样。正是这个压力，常常用以說明日耳曼各部族冲入罗馬边境的瘋狂行动，那終打破了这长距离的整个防綫。405 年时，拉特給薩斯的入侵意大利，不是屬于一个部族或一个"民族"的行动，而是屬于各部族的零星部分的行动，一群携带妻子兒女的亡命之徒的行动；他們要从所处的絕境里求得一个出路。他們的命运最后是被罗馬軍团餓死于多斯加納山区里。倖免的几千人都被出售为奴隶，价格这样低廉，每一个人只售一个奥勒斯(aureus)。当时，牲口的价格还高些。但是，这些可憐的牺牲者还是高价購进的，因为几千人由于遭受了飢餓的影响，不久就死去。

日耳曼各部族的大移动，不是一个暫时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連綿进行着的并早在入侵之前已經开始的行动。关于它們的起源，

我們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世紀的末期，辛布賴人的入侵，再到阿立奧維斯塔和苏維汇族的入侵。即在这遙远的时期，他們不是純粹的战爭队伍，而是正在行軍的部族：男人、女人、孩子，带着奴隶和牲口，全体移动，来找寻土地。这項移动沿着整个帝国的边境繼續进行着，但它的进展在一个长久的时期中被遏阻着。起初，那些駐防边境上的罗馬軍队有充分力量来捍卫多瑙河边界。在第三世紀，由于一次很猛烈进攻的結果，大批日耳曼人穿入了帝国境內，而且暫时摧毁了萊茵河上的罗馬統治；可是后来他們还是被伊立連族諸帝逐回。

第五世紀的“大侵犯”是上述大运动的最后一幕，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是因为那时罗馬政府已經沒有力量来对付日耳曼人的移民。即在那时，日耳曼人除了少数例外，还沒有以大队人馬，以征服者的地位而来。他們結成小队而来，漸漸滲入，定居于这里或那里，起初在帝国沿边境上人烟較少的地方，然后再从那里逐步向內地伸入。但是他們是作为殖民者和移民、作为农民进来的；只在他們的入境被拦擋的时候，他們才使用武力。現在历史家們对下列旧观念已經放弃：日耳曼人是象可怕的天灾般地进来的，而罗馬人被弄到走投无路的。事实上，日耳曼人的进入是常常被欢迎的，因为罗馬农民把日耳曼人看作反对帝国政府的吸血稅吏的保护人。由他們看来，主人的改变不能比目前更坏，可能是好些。里昂和罗尼河流域的居民，故意放縱了勃艮第人占領他們的領土。这些粗魯的蛮族，可能是粗暴无礼的，他們用牛油来整理头髮，有着制革所的气味，但是，他們是性質良善而豪爽的大汉，公平地对待着无防御的省民。

依据各种情况，我們很可以說，这种移民带着一种“大迁徙”的性質。正象美国人越过阿利根尼山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新西方”的“西进运动”的历史一样，正象那个运动后来越过平原沿着圣大非

和俄勒岡路綫进入"远西"①的扩大地区被这批开荒者的后裔所忆念的一样，所以在那些住在罗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中，对他們祖先在大迁徙时期中冒險、艰难、战斗和胜利的回忆，常留在心头，而且这类事件已成为他們种族的故事和民謠了。在第六世紀当約但尼斯进行編写哥特人的历史的时候，除了民間歌謠告訴他一些消息以外，他沒有关于这个早期的資料。在他的著作中的一章里，他描写哥特人在长期移民的过程中(至少历时一百五十年)，所遭遇的一些危險：他們从維斯杜拉河口前行，直到有一天他們看到"被深藍海水冲破了的靜寂天涯"，而尤克辛海的一片汪洋出現在他們眼前，这是一个历史的图片，描写着正在迁移的哥特人的先鋒怎样陷入第聂伯河各支流間俄罗斯的危險沼泽地带——那个广闊的普里柏特沼地，在面积方面和爱尔兰一样大小。他說：

> 这塊地方被关閉在动盪的沼地中，因而由于水陆两种因素混淆在一起，自然界使人不能进到那里。甚至到了今天，据說，旅行者还听到鬼怪野兽的叫嗥，还看到人的幽灵在那些危險的沼地里掙扎着。

按日耳曼人每次移民的历史，都可以有把握地說：虽然搶劫是一个动机，掠夺是侵犯的附随物，但是日耳曼人的推动力却是要找寻生活所依靠的土地。約但尼斯还告訴我們哥特人怎样終于达到了"所想望的土地"。408年时，阿拉列曾要求諾立坎、伊斯的里亚、威尼斯和达尔馬提亚各省作为他的人民的家乡。当这項要求被拒絕时，他把他的要求减低到上述的最后三省。

每次移民的成功，个别来說是由于各种特殊的原因以及由于各种情勢的特殊結合。然而我們可发現一般的事实，并寻出一个对整个运动的說明。但是，为什么出現了这种情况：那些在第一和第四世紀間曾被罗馬阻止的移民运动，到了第五和第六世紀，变成为

① 指美国西部沿太平洋各地。——譯者

这样的广泛和这样的成功？原因不在于日耳曼族的人数或权力的增长。那一定是由于帝国完整的破坏、内部机构的破裂、帝国抵抗力的縮減（对帝国衰落的因素和原因的考察，已这样地指出了）。“罗馬由它的仇敌看来，好象是一个硬壳，包藏着柔軟的核。”一旦外壳被戳穿之后，蛮族就可流入而充满了它的內部。日耳曼人已在罗馬軍团里充当士兵；他們已移殖于空地和荒地上，主要在边境省分，正因为如此，罗馬平民已向帝国中心縮退。

从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移入高盧的历史里，我們可获得关于上述后一現象的有力証明。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后，首先住在柔拉和发特地方，这些地方当他們进入的时候，很可能是沒有罗馬居民的。至于科隆下面的下莱茵兰、比利时及东北法的情况，我們有明显的証据，可說明罗馬居民已从这些地方退出；也有証据，可說明法兰克人在第五世紀渡过莱茵河而涌入了一塊无人的地区。

在近代时期，这些地区发現了几百处罗馬古币窖藏的“发見物”。这些事情的意义不言自明。因为古币的种类和“发見物”的数字都是和法兰克人的侵入有关的。情况当然是这样：当政权在边境省分崩潰时，罗馬人向內地迁移，但是因为盜賊猖獗，不敢随身携带錢币，乃把它埋藏地下，希望日后回来时掘出。在这些“发見物”中，很少找出第二世紀的古币，但是在第三世紀当边疆时被冲破而又經常修复的时候，就可常常找出古币。在第四世紀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使行政刷新以后，古币的“发見物”又变少了。但是第五世紀，就是“大侵犯”时期的窖藏是很多的。这些“发見物”的地理分布情况，也是有意义的。在下莱茵兰、比利时和东北法，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所发現的古币为多；这說明了罗馬人从这塊領土上的撤退，几乎是完全的。

历史上的沉默也証明了这一点。关于法兰克人的第一次扩充，我們沒有文字的記录，因为沒有罗馬人曾看到这事情。法兰克人

慢慢地迁入，并散布在一个荒蕪的土地上，在那里，甚至城市也已人烟絕跡。

在罗馬帝国另一部分，就是，在意大利的波河流域，在第四世紀我們可看到一个差不多无人地带的类似情况；在哥特战爭时期，意大利的人口可怕地下降，当时皇帝查士丁尼的軍队，在貝利撒留和那錫士两个将軍統率之下，破坏了由狄奧多理东哥特人所創立的兴盛王国，从而使北意大利变成为一个荒地。然而，那項衰敗在东哥特人占領以前已經开始，其原因是：賦稅繁重和行政腐敗已把当地居民逐出或毁灭了。

568年时，当倫巴人散布在波河流域的时候，这地区几乎是一片空地。这个最小的日耳曼部落的經驗，清楚地表明了“大移动”的性質。早在公元100年时，塔西佗論及倫巴人时說：“这批人却以他們的人数稀少而自豪，因为他們被这样多、这样强的部族所环繞，必須設法保存他們的生存，不用消极的服从，而用經常的战斗；在危險中找得安全。”倫巴人連續地移动，从他們被知道的时期直到568年进入意大利时为止。这一事件在历史家中成为一个很多爭执的問題，因为按照我們所有的証据，难以区别什么是他們的历史和什么是他們的傳說。但是，在日耳曼部族中很少比他們走得更远，搬迁得更多。保罗管事，一个倫巴族的历史家，告訴我們說：“他們遭受飢餓的大劫难”，在紆迴漂泊之后（显然从下易北河区开始的），“他們进入了魯吉兰（在多瑙河北岸、諾立坎的对面），在那里因为土質肥沃，他們停留了几年”。几年以后，他們再“从魯吉兰出发，定居于广闊的平原上，这平原在蛮族的語中，叫做‘斐尔得’(Feld)”，这只能是現在的匈牙利平原。在这里，他們陷入匈奴人的漩渦里，直到阿提拉死时为止，而后在一个时期中又降为日耳曼赫留来部族的附庸。在他們迁移的过程中，在某一地方，他們走到长着亚麻的一片綠野，錯誤地認为它是湖海。跟着，在多瑙河下游，

他們和吉比德人发生了战爭。那时，韃靼族阿佛尔人已冲过罗斯平原，侵入了多瑙河区，强迫倫巴人把他們牲口的十分之一交給自己。倫巴人从这危險的地位在568年侵入意大利，以求出路。由于他們人数的稀少，倫巴人已成为一个混合的部族，因为他們似乎在这些迁移中曾零星地吸取别的部族的因素，因而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制度也受到了这种混合的影响。

日耳曼人在罗馬人眼光中，既不是仇敌，也不是陌生人。在他們之間，沒有种族矛盾的存在。在多事的第五世紀之前，这两个种族彼此熟悉甚至互相混杂，已有四百年之久。当罗馬帝国象破屋一样地逐漸倒塌下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填补了那些破坏了的省分（它們好象是这大厦中的房間）并和本地居民并肩杂处在那里。罗馬人更加蛮族化了。同时日耳曼人更文明化了。他們和教会一起，制定了新制度的式样，并从罗馬制度的殘余以及从他們自己的更有活力的制度中形成了一种新文明。这两种制度跟着时間的进展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既不是罗馬式的、也不是完全日耳曼式的政府和社会。

蛮族人民在罗馬帝国内建立国家的历史后果，是很重要的。姑不計及那些消逝了的国家——汪达尔、东哥特和西哥特——还有由几个“部族”国家組成的集团，它們曾統治着整个中欧洲、高盧、德意志和北意大利；就是說，那些后来合并成为法兰克帝国的国家。在其中每一个国家里，罗馬帝国制度曾被一再廢除，但是，教会还是保存着罗馬傳統的。

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住着新人民的。这个事实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日耳曼人的来临更換了人口嗎？这一个极有趣味的問題，曾經过热烈的討論。当然，它不容有一个单一的或明确的答案，必須按照各国的情况来区别。关于进入帝国的蛮族人数，沒有文献可供給我們以直接的資料，但是我們可推論他們的人数和罗馬

的居民相比較，并不算多。从这一点，有人曾作出結論說，他們的影响是表面上的，他們沒有留下任何永久的痕跡。

这是一个极端的見解。事实上，我們知道帝国的有些地区已深刻地日耳曼化，在这些国家里，在中世紀时期，居民、私法、习惯、特别是造屋方法，甚至言語都指明了：日耳曼影响的优势是无可否認的。这些国家就是，英国、巴伐利亚、阿尔曼尼亚、北法和东法、萊茵兰以及倫巴第。可是，这些地区正是在帝国末期由罗馬居民遺弃最多的边境部分。起初，日耳曼人"隶农"和侵入的部族大批住在那里，象上文所講的那样。日耳曼人看到在这地方上只有他們自己人，遂有时間来繁殖并創造新居民。

在罗馬居民繼續存在的地区，发生了各民族間的混合。人口中原先的成分在数字上是占着优势的，但是蛮族的后代形成国家中的統治部分，朝臣、首长以及大土地所有者，一言以蔽之，日耳曼人对于新王国的組織和創立，具有一种眞正的势力。所以，蛮族侵入的影响在沒有冲突的地区比較大些，而关于这項历史的文献，在数字上是最少的。

因为罗馬帝国制度，无論在行政、經济或社会方面都是基于土地占有制的，而且因为日耳曼人移动的主要动机是在于求得土地，所以日耳曼土地解决办法的性質，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設想那項办法是整个地、粗暴地剝夺罗馬地主阶級的土地，那是完全錯誤的。

第一，日耳曼人口和罗馬省区人口相比較，在数字上，实在是太少了，以致他們不可能在任何大的程度上这样做，即使有此心愿。我們可按照在五人中抽一个战士的标准来計算他們的人口数，作出一个保守的估計：西哥特人不会超过十五万人，东哥特人不会超过二十万人，勃艮第人不会超过八万人；克洛維斯法兰克人当他进入高盧的时候，只有六千个兵士。这样的数字，在八百万人口的

意大利，在一千到一千二百万人口的高盧，在八百到一千万人口的西班牙，还算是什么呢？

第二，必須記牢，在日耳曼兵士寄宿民家的帝国制度里，久已存在着一个管理罗馬人和日耳曼人間土地的分配先例，按照这先例，一个戶主須把他的房屋和土地划分，自己保留2/3，把其余的1/3給他的不速之客，后者有时委婉地叫做“客人”。

日耳曼人有时把这种分配比例倒轉过来，但是他們中間从沒有人完全劫夺和剝夺旧主人的。勃艮第人(关于他們的居留地我們知道得較为詳細)，曾占取耕地的2/3，奴隶的1/3，每幢房屋及宅的附屬物的1/2，森林和未垦地的1/2。高盧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曾占取土地的2/3，可能按同样的比例，占取房屋及其他財产。意大利的东哥特人似乎只占取了屬于国庫的土地，而对于地主阶級的土地，未曾加以騷扰。如果狄奥多理的宰相卡息奥多拉的話可以相信的話，对东哥特人是沒有恶感的。因为他說：“土地的分配促进了地主們的和谐。”还須記牢，卡息奥多拉本人是一个罗馬人。汪达尔人在非洲的土地解决办法，是相似的。倫巴人是最兇狠的剝夺者，他們的政府对罗馬省民压迫得最厉害，而法兰克人最为寬大。

关于法兰克人，他們之所以有着比較緩和的政策，是因为他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主教能为居民訂出一个比别处寬大的解决办法。至于所有的其他日耳曼人，他們都是阿利阿异端派而被信仰天主教省民及他們的天主教主教所痛恨的。在这紧張局势里，可奇怪的是，阿利阿派日耳曼人就他們的土地分配而論，是和天主教徒同样地緩和。拍拉的坡来那斯的奇异經驗(他是奥索尼阿斯的孙子，罗馬詩人中的最后一人，住在波尔多附近的富裕业主)，表明了蛮族的解决办法是合乎一般情理的。他的地产由于哥特人的占领而变为烏有。他的很多余产又被一个硬心腸的亲戚所吞沒。在晚年，

他住在馬賽附近自己所有的一小塊土地上。有一天，他出乎意料地从一个哥特人手里收到了在波尔多附近他的庄园帳上的一笔結款，这个哥特人就是他曾被迫分給自己庄园的人。这忠实的人不愿无补偿地占有着他的土地。这一件事不得認为是一个例外。"所有的証据都足以表明罗馬大家族在蛮族侵入的过程里，很少曾遭受暴力或沒收財产的痛苦。"

应該指出，这些土地是由日耳曼人用抽籤方法来分配給自己人的，并在对蛮族国王服某种兵役的条件下，所有人得世世代代領有它們。在其他方面，他們是被豁免賦稅的。这里，我們至少看到那后来封建制度的一种萌芽。的确，那些領有原屬罗馬人土地的日耳曼人，采用了当地的經济制度，而变为完全一样的土地业主了。罗馬旧业主的田庄变为中世紀封建制的庄园。在进入的日耳曼人中間，占有本能发展得这样早、这样强烈，以致勃艮第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出售他們的土地，除非售給另一个土地业主。日耳曼业主对他的不自由的佃人是傾向寬大的——不管这些佃人是由他所带来的日耳曼农奴，或者是原在他的土地上的罗馬佃人——其原因是：他对罗馬的田庄管理制，不如旧罗馬业主熟悉，而日耳曼对奴役状况的管理不象罗馬人管理得那样严格。然而，我們一定可清楚地看出，"工业生活的樞軸跟着蛮族的进入而轉变了。"这类工业很多，甚至大多是屬于农业性質的。可是，罗馬商业在蛮族王国里并沒有消灭。我們就要多談一些关于日耳曼各王国的經济和貿易。

罗馬国庫所屬的富饒庄园，都被在意大利、在高盧、在西班牙、在非洲的日耳曼国王所占有；在非洲，这些庄园构成了汪达尔王国的全部省分。因为日耳曼国王沒有建立賦稅的一般制度，这些庄园遂构成了王室进款的来源，并和过去一样地繼續管理着。从它們得来的进款，用作政府官吏的薪給以及蛮族宮廷的維持費。然

而，其中有些庄园是分給那些追随国王的主要首长，后者因此就变成为最大的土地业主，即封建时代的地主貴族的祖先。

匈奴人及他們的首領阿提拉，在历史上不象日耳曼人那样，沒有产生过持久的影响，所以对他們的历史可以更簡略地談一談。他們的几乎是唯一的影响，是他們以无限压力給日耳曼世界最后的冲击力，这迫使各部族全部涌进了罗馬边疆。匈奴人所发生的影响，在欧洲的想象力方面远大于在欧洲的政治方面，因为关于他們的荒誕故事和关于他們的殘暴性，在第八世紀以前保罗倫巴人的著作中沒有出現过，而阿提拉的各种故事，还是后来經过馬扎兒人的来源而流傳于后世的。

从人种方面来說，匈奴人是屬于韃靼族，不是屬于雅利安族，他們和地中海世界的居民甚至連疏远的种族血統关系也沒有，日耳曼人却是有的。从社会方面来說，他們是野蛮人，而从經济方面来說，他們是游牧民族——"他們的国家是在馬背上的"。这句話就衡量出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的莫大距离了。公元375年时，匈奴人冲过"烏拉尔大門[①]"出現于欧洲地区；他們猛扑那住在南俄罗斯和近代罗馬尼亚的哥特人；当时，他們的进攻，使日耳曼人和罗馬人都充滿着惊惶情緒。我們还可看到同时代人描写他們的生动記載。安密亚那斯·馬賽里納說，他們是醜恶可厭的人，虽知道取火但很少用火来煮食，穿着骯髒的兽皮。

該族中每一个人日日夜夜在馬背上生活着；在馬背上他們做买卖；在馬背上他們飲食……其中沒有一人耕种过田地，甚至連犁鋤的柄也沒有碰过。他們都是漂泊在外，沒有一定的居住地，沒有家庭或法律或固定的风俗；他

---

① "我們認識到，这是一个怎样极无防御的欧洲边境，通过那里的空曠地点，所有亚洲的游牧部族，如匈奴人、阿倫人、阿佛尔人、保加利亚人、蒙古人进入了欧洲；他們的騎兵队馳騁草原，搜索敌人或战利品，他們的馬車載着他們的家眷和牲口跟在后面，除了有时受到有些大河的阻碍外，所向无敌；如果河流太深，不能跋涉，則他們乘着膨脹的皮囊渡过。"——布賴斯：《外高加索和阿拉拉特》("Transcaucasia and Ararat")。

們象永久的难民一样，以他們的馬車作为他們的唯一住所。

但是，匈奴人在居住于下多瑙河流域（近代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馬尼亚）的七十五年間，曾拾取一些罗馬文明的虚浮表面。“阿提拉的宫廷和营帳，从整个性質看来是富于肉欲的；但是，这肉欲性比那第一批横渡亚速夫海的匈奴人的肉欲性，还远不及其污穢与可厭，这批人的习性曾由安密亚那斯描写过。”阿提拉的“宫廷”是一个大木房，它的地板和墙垣都是用木板作成的；而墙垣和地板都用兽皮盖着，以御寒气。在它的附近，有着比較遜色的住所，在那里住着他的妻妾，其中最漂亮的一所，是他的爱妻克勒卡住所，可是連她也沒有毛毯和地毯。匈奴人虽然来自东方，但沒有采用东方的这些奢侈品。那些房屋全部連在一起，以打入地下的木栅来环繞着，因而形成了一个凹凸不平的广場。

阿提拉生活費用的大部是从那些在他的权力下被征服人民——罗馬人、希腊人、日耳曼人——得来的；他們被迫繳納牲口貨物。但是，他的最大的財源，是向君士坦丁堡軟弱无能的皇帝进行勒索。公元 423 年时，他从狄奥多西二世取得了 350 镑黃金的貢賦；次年，他勒索了双倍于这項数目的黃金。这皇室的常年“补助”，繼續了十五年之久，直到 447 年时为止，当时，这数額名义上已加了三倍，虽然同时阿提拉还要求一百二十五万（合美元計算）作为“欠款”。

为了征集这笔巨款，拜占廷帝国必須使用它那复杂的一切財政机关：

> 每一个元老被課某个数目的款子，往往大大地超过他的实际財产；但凡是列在他名下的数目，不管他有与沒有，是必須繳付的……在有些情况下，高貴妇女的家藏珠宝，或者那些一生过惯豪华生活的人們的家庭用具，就在市場上陈列出售。

普力斯克斯，生在这个时期的拜占廷历史家，伤心地說道：

国家的財富和皇室的宝物，不是花費于他們的正当用途，而是揮霍于可笑的鋪張、俗气的虛飾以及一切娛乐和一切荒淫无度的事情，在这方面，凡是稍有理性的人，即使国家已达到繁榮的高峯，也不愿浪費金錢的。

当普力斯克斯出使阿提拉而路过色雷斯的时候，他看到城市人烟絕跡，原野尸骨滿地。他曾把一幅生动的图景，流傳下来，描写这个蛮族宮廷，它的宴乐、它的吟唱詩人、王室小丑的嬉戏、一个醜形的侏儒、酩酊的祝飲、奇怪的服装、极为稀奇的語言，即混合着匈奴語、希腊語、拉丁語、哥特語的喧嚷；大汗沉默地但不无威严地坐在这喧扰場面的中間，由他的披着蓬松毛皮的卫兵和两个秘書在旁侍奉着；一个秘書替他办理希腊文件，另一个秘書替他办理和罗馬皇帝与帝国省长的通訊事宜。

这里，当普力斯克斯在接待室里，等待阿提拉接見的时候，有一个穿着匈奴服装的人，講流利的希腊語，来招呼他，而这个人証明是一个希腊人。可令人玩味的，是他們間所繼續进行的談話內容，而这談話曾由普力斯克斯全部紀录下来的。这位历史家兼使臣，从惊异中鎮定过来后，訊問这个談話的人他怎样会住在匈奴人中間，其实已是匈奴人的。这个人回答說，他原是个商人，而为了經商的目的，怎样来到多瑙河畔米西亚省的維那西姆，距貝尔格莱德六十哩；該省怎样被匈奴人襲击，他怎样被俘而作为奴隶送給阿提拉的寵臣叫做奥尼基希的，他怎样获得恩寵，被釋放为自由人，而娶了一蛮族妇女。当普力斯克斯表示詫异，不明白一个有文化的人竟能长住在匈奴人中間时，却获得了一个对帝国政府不公平的严厉控訴，作为答复。

他說道："我認为，我的現在生活方式比我过去好得多。因为当战爭过后，人民过着安逸的生活，完全自由自在，毫无顧虑。但是，在罗馬境內，人民在战爭中容易遭受挫折，因为他們把安全希望寄托于別人，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的暴君是不将容許他們使用武器的。"

这里，这个講話者埋怨道，內战和掠夺是后期罗馬帝国的臭名昭著的禍害。

他接着說，“而且，还应想到稅吏所干的一切殘暴行为、密告者的无耻以及司法方面的极不平等。如果一个富人犯了法，他总是可設法逃避处罰；但是，如果一个不明事理的穷人犯了法，他必須遭受严厉处罰，除非在宣判之前，他确已死去；后一种情况，从法院顢頇作风所造成的醜事看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認为最可恥的事情是，一个人必須付錢来获得他的合法权利。因为一个受害的人，如果不先付一大笔錢給法官和官吏，甚至不能获得法院的受理。”

他补充說，就是奴隶制在匈奴人中也比在罗馬帝国內要緩和一些。

这一事件是在多方面值得玩味的，它揭露了罗馬帝国內被賦稅压榨的人民，甚至看待匈奴人象他們久已看待日耳曼人那样作为救星，来摆脫那蛮干和殘暴的政府。这种揭露就不无意义。

阿提拉曾宣布，下多瑙河南岸罗馬方面的米西亚一带領土，一百哩寬，三百哩长——东自近代保加利亚的西斯佗华西至多瑙河湾是一塊匈奴的“沼地”或边境領土。在这里，有一个大市場，那所市場过去原是設在馬格斯的，那时已設立在納苏斯（即近代的尼西），距摩拉瓦河口一百五十哩。該河和瓦尔达耳河一起現在形成，过去几百年中已形成在爱琴海沿岸薩罗尼加和多瑙河流域之間的大商路。

阿提拉在453年死去，因此多瑙河流域被奴役的人民获得了解放，但是，他們已陷于絕境。当时，有一个历史家在阿提拉时代曾察訪过东哥特人那里，根据他的記載，我們可判断匈奴人对东哥特人所产生的退化影响；他說：东哥特人也倒退到游牧生活，竟至这样的地步，以致他們已把农业忘了。因为这个区域已被扫蕩得象打谷場一样地光滑，居民已陷于飢餓状态，这里或那里設着一个

有城垣的市鎮，在那里有着蛮族人和少数冒險的罗馬或希腊商人交換物品的地方性市場；这批商人很大胆地进入这一地区。《圣塞維立那傳》生动地描写了这种淒凉景象，这一景象由于阿佛尔人、保尔加人和馬扎兒人連綿的襲击，延續了五百多年之久。多瑙河交通路綫仍然是一个封閉的道路，直到十字軍东征时期为止。此后，所有的东方貨物經过意大利达到西欧，或者由海路运到馬賽及罗尼河口，从那里再散发到北欧去。

在意大利，这种商业的主要經营者，是威尼斯，它的兴起是和阿提拉的侵犯意大利密切地联系着的。当时亚基列被匈奴人化为荒地，这个城市和巴士亚以及許多小鎮的居民惊恐万分，紛紛逃至亚得里亚海礁湖內的泥濘淺滩上；这些低礁的最高地，即里发斯·阿尔特斯，注定要在后来时期成为威尼斯的里阿尔托①。巴士亚人居留区，是亚得里亚海未来王后②的核心。在这里，居民是依下列职业为生的：在盆里煮海水来制造食盐，捕魚以及逐漸和大陆及大陆以外各地进行貿易。在第六世紀，卡息奥多拉曾这样地描写他們的。威尼斯的两栖地位，也使它沒有遭受兇猛的倫巴人的侵犯，因而兴旺起来，二百年后，它的勢力强大，甚至能对查理大帝挑衅了。

---

① 里阿尔托（Rialto）——威尼斯城的一个著名小島，为商业活动中心；美国紐約“百老汇”的一塊地方，也称为“里阿尔托”，是游乐賭博的場所。——譯者

② 就是威尼斯。——譯者

第四章　罗馬帝国內的日耳曼王国*

西哥特的西班牙、汪达尔的非洲、东哥特和倫巴的意大利、教廷的罗馬和拜占廷的意大利*

关于那些建立于罗馬帝国內的大部分日耳曼王国的內部經济和社会的历史，我們只需簡略地談一談。因为除了法兰克王国和不列顚的盎格魯-薩克遜联合王国以外，所有的蛮族王国的寿命都是沒有延續到第八世紀以后的。

第一个日耳曼王国，是西哥特王国，那是建立在阿奎丹高盧和西班牙領土上的。王国的高盧部分，由于法兰克人的扩展，在 507 年被消灭。而它的西班牙王国在 711 年穆罕默德征服半島——半島的大部——之前傾复了。如果土魯斯而不是托利多① 还是王国的首都，而南高盧繼續是王国的領土，那末，西哥特人的命运也許就不同了。因为那里"存在着阿奎丹的吸引力，富饒、土質肥沃和优秀的罗馬文化傳統。"因为西哥特新政府的开支比罗馬旧政府的开支要少，賦稅的負担也比过去罗馬时代的負担要輕，所以沒有疑問，这政府的改組是人民所乐于接受的。

但是，西哥特人由于人数太少，不能有效地保持西班牙的辽闊地面。他們遭受着加里西亚和北琉息退尼亚（葡萄芽）的苏維汇人的敌对以及比里牛斯山脉里頑强的巴斯克人的侵襲。可是，这些禍害还不如他們政府的无能来得严重。社会的、宗教的分裂从沒被克服过。甚至他們已变为天主教徒之后，"古法"（"Antiqua"）依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0，52 頁。

① 土魯斯在南高盧，托利多在西班牙。——譯者

然是哥特人的法典,同时那仿效狄奥多西法典的"阿拉列簡明法"(Breviarium Alarici)是罗馬人的法律。而且,从一开始起,哥特貴族对国王就是一个威胁,而对下層群众是一个阻碍。貴族占有范圍极大的土地。他們的平均財富,估計在十五万和二十五万美元之間。另一方面,大省区俾替卡是由西班牙-罗馬貴族控制着的,他們从瑪約里安以来,就領有这个省,国王无力使他們屈服。

大地主由他的忠心的卫队环繞着,实际上,能够長期不理睬国王的命令,直到偶然国內发生革命时,他自己归依了失败的一方为止;其时,他看到为了胜利者的党徒的利益,自己被剝夺了土地,他和他的子女被降到被人輕視的"賤民"阶層……这些时代是不安靖的。国王远在別处,而大地主近在咫尺,实际上,在他广大的、往往非法占取的領地之內,已儼若国王了……經过若干代之后,那些毫无疑問在西哥特新社会制度內一定曾存在过的小土地所有者……已不复見了,而且在这国家的后期发展里,实际上我們看到只有两个阶級存在着——那些和王室多少密切联系着的大貴族……和他們的依附者,即乡下人、小人或賤人;后者虽在理論上若干方面异于不自由人,但实际上却已陷入和奴隶不相上下的地位了①。

在西哥特西班牙,象旧罗馬帝国一样,重稅的压力和司法的腐敗迫使日耳曼小土地所有者降到經济上依附和社会上卑微的地位;这批小土地所有者,本来在哥特人中存在着,象在其他日耳曼人中一样。隶农和奴隶在西班牙所处的境遇比在任何其他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国內所处的,也許更坏些。在城市里,也沒有力量与这种压迫状态相抗衡。因为系出罗馬的城市居民,人数上虽超过哥特人三倍,但都是胆小如鼠而且也已貧困了。

西班牙在西哥特人时期,尽管有国內的丰富自然資源,但却不是一个很繁荣的国家。他們的文化是一种半野蛮人的文化,他們在农业方面,似乎是特別落后。他們的情况既然是这样,我們就不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2卷,第221頁。

能希望他們把国家的富源順利地开发出来了。

哥特人的工业是承襲并墨守着罗馬文明傳入西班牙的工艺技术的。其中主要的是：开矿、金屬器制造、羊毛紡織和制革。但是，在开矿方面沒有什么成績可言。

然而，現有証据可以說明，西哥特人有着貴金屬、宝石和华丽服装的各种財富；就是說，王室和統治家族領有这些东西。那些叙述穆罕默德教征服的阿拉伯作家，盛称征服者所获得的丰富战利品，特別是从那些西哥特国王住过的城市，例如托利多、哥尔多华、塞維尔和美黎达各城获得的。这些战利品中，包括有无数的綉着金絲花紋的华丽外袍、精制的金鏈子以及长串的珍珠、紅宝石和翡翠。据說，在托利多，阿拉伯人曾找到一百七十頂純金王冠，鑲着珍珠、紅宝石及其他各种宝石；一千把国王所使用的宝劍；若干只放滿着珍珠、紅宝石及其他宝石的小箱子以及大批笨重的金銀制成的花瓶。在托利多，两个阿拉伯人曾发現一塊华丽毯子，交織着金綫条紋，装飾着純金細鏈。象这类的財宝足以証明，在西哥特的西班牙，有着物質的財富，至少屬于半野蛮性类型的財富。但是，那并沒有表現出人民的一般繁荣景象，也沒有提出关于工业或农业活动的什么証据。

在西哥特的法律里，有关商业方面的很少，而有关社会阶級的很多，几乎构成了一部单行法典；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王国內的主要經济活动以及主要社会阶級，即大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出，它和南高盧、汪达尔的非洲、特別是和东哥特的意大利各港口进行着若干数量的海外貿易。“簡明法”中說及“海外商人”和“商人”，关于后一个名詞，我們不能断定，它是指坐商，还是仅仅指販卖商人而言。但在拜占廷帝国征服地中海沿岸并在八十多年时期中控制它的时期里，这項海上貿易近乎被破坏而被縮小为只是沿海的貿易。因为皇帝查士丁尼在征服汪达尔的非洲之后，曾把他的矛头转向

西班牙。他的軍队果然从未能深入它的难于进攻的內地，但帝国艦队曾占領喀他基那、瑪拉加、塔拉科那、加的斯、巴斯塔尼亚、塞維尔和阿塞杜那各城市，并在544到629年保住了它們。当时，哥尔多华，即拜占廷帝国总督府的所在地，象我們即将在下文所看到的那样，已成为哥特亡命之徒和不滿意分子进行阴謀的基地。

塞維尔的以錫多对哥特西班牙的歌頌，已由事实証明为謊言。他贊揚"西班牙的富饒和繁荣"，說它是在印度和赫斯拍立第①之間的最美丽的国家，"是宇宙的珍珠和飾品；"这些自豪語是最无聊又是最似是而非的諂諛。"商业、工业和艺术从沒有过眞正的兴盛。"狄奥多理哥特人，曾以年幼国君的攝政地位，从哥特的意大利統治哥特的西班牙达十五年之久。当他諷刺地說："坏罗馬人模仿着哥特人而坏哥特人模仿着罗馬人"一句話的时候，他总結了西哥特西班牙的禍根所在了。

上述的恶劣情况，当国王由于害怕鬧事的地主貴族而投入僧侶的怀抱的时候，变为更糟糕了。因为西班牙僧侶的頑固性，在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僧侶无出其右。这样，西哥特西班牙遂成为历史上最受僧侶束縛的国家。

随着僧侶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出現了很多严峻的法令。非天主教徒連一个人也不准住在西班牙。犹太人特别蒙受着无情的迫害，而他們是国內唯一的冒險商人阶層。托利多的第九次宗教会議（655年）禁止犹太人举行他們自己的宗教节日庆祝，并强制他們参加基督徒的节日庆祝；第十二次会議（681年）重申这些禁令；第十六次会議（693年）禁止犹太人集合在港口城市的碼头上，即在"商人云集的地点"上，第十七次会議（694年）竟把每一个犹太人降为奴隶，或者屬于僧侶，或者屬于国庫。

① 按希腊神話，赫斯拍立第(Hesperides)是极西方之金苹果花园。——譯者

犹太人在他們走投无路的状态下，勾結了海峽对岸非洲的穆罕默德教化的柏柏尔人，在那里犹太人是享有伊斯兰教的保护的。697年当阿拉伯偉大首領穆薩来到柏柏尔人中間之后，他就把基督教西班牙毁灭了。

沒有疑問，薩拉森人的迅速成功至少一部分可归因于他們和犹太人的秘密諒解。在西班牙哥特領主脚下的基地，已被挖松，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可能都可找到一帮犹太人叛徒……在穷人中，特别是在奴隶和农奴中，也在犹太人中，[对阿拉伯的征服——譯者加]很少有抱怨的理由，因为他們的命运已显然有所改善。至于大批貴族和主教，他們象风扫落叶般地被赶到雷翁地区和阿斯都里亚山脉中去，而且被禁在那里了①。

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住了三百年之久，可是他們差不多沒有留下什么痕跡。在西班牙語言里，很少可找到哥特词汇；而581年利奥維吉德为反抗巴斯克人所建筑的堡壘維多利亚，是他們所建造的唯一的城市。

汪达尔人不象哥特人那样，虽然他們中有些战士曾在罗馬軍团中服务，但从沒在多大的程度上服从过罗馬的紀律。而且，在406年，他們进入高盧的时候，他們也不象好多日耳曼人一样，是輔助的部队，而就是侵犯者。在那个时候，意大利正在遭受着阿拉列的威胁，因而皇帝霍挪留不得不从不列顛撤回全部軍团，还从高盧撤回大部軍团。因此汪达尔人得在七年中横行高盧各省；那时，高盧是罗馬帝国中的最美好的、最繁荣的地区。从《圣巴特里克傳》里我們得以略知汪达尔人在那里所造成的破坏景象，因为巴特里克，当他从愛尔兰逃出的时候，可能曾在波尔多登陆，然后他上行格罗納河而抵达布罗温斯。413年时，西哥特人来到高盧，把汪达尔人逐出，429年时，他們又被西哥特人从西班牙驅逐，乃渡海峽而至

---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2卷，第221頁。

非洲。

应該知道当时的罗馬非洲省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对汪达尔人的来临以及汪达尔人在那里所建王国的性質，是有着很大影响的。迦太基非洲，在146年罗馬征服之前几百年中，本屬于腓尼基人或布尼克人，因为它是太尔城的一塊殖民地。但是，尽管罗馬統治了这国家几乎有六百年之久，曾建造城市，修筑道路，并令人惊异地发展了非洲各省的物質文化，可是罗馬从沒曾把那古老的血統或它的民风一笔勾銷。本地語言，直到最后还是布尼克語，而在乡村区域它竟是唯一的語言。而且，腓尼基异教的习慣，甚至把兒童献祭摩洛克神① 的恶习，还是偸偸摸摸地保持下去。在那里拉丁文化和罗馬行政只是虛有其表罢了。罗馬非洲省对罗馬的关系，正象不列顚印度对英国一样。所以，了解这在拉丁和东方种族与文化之間的根深蒂固的矛盾，便是了解429年汪达尔人从西班牙渡海过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之第一把鑰匙。

第二把鑰匙，是了解那罗馬在非洲所发展起来的土地占有制的龐大程度。关于农奴制和奴隶制的負担，在非洲是严重的；又因为这批不自由者大多是本地人，所以，尖銳的种族、宗教、經济和社会的矛盾，表現在反对罗馬的統治。

当基督教成为罗馬的国教并宣布"政教联合"的时候，事情益发严重起来了。因为那时正宗教会和政府对异教的战爭正在推进着。在非洲，异教的抵抗是很頑强的，还由于农民对教会的痛恨而获得了增援。农民之所以痛恨教会，是因为教会由于皇帝从国庫領里濫給土地贈与也变成为大地主了。所以，当多那特异端派发展的时候，它曾获得大批信徒，同时，由反叛的农民和奴隶所举行的社会和土地革命在非洲就应运而生了；这革命基本上是由經济压

① 摩洛克(Moloch)——閃族神，崇拜者以人身作为祭品，尤其是以初生的嬰孩。——譯者

迫和社会不满所推动，而又由宗教情緒的刺激所引起的。游僧(我們可叫他們"夜騎士")的武装队伍出沒乡間，燒毁田庄，杀死业主阶級和天主教教士。因为这些大地产各有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教士，而罗馬业主为了和国教教会有着极密切联系，曾强迫他們的佃人皈依正宗教会。

那被世俗的和教会的大地主勒索得发瘋的又被国税迫得破产的农民，那被剝夺了田宅的小土地所有者，那找不到职业的自由手艺人，这一切下層而失业的分子，把他們的信心寄托在多那特教派所提倡的社会革命方面。这一运动，开始是一个宗教分裂运动，而后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叛乱，而且越来越落入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控制之下。象在历史上很多别的时代一样，社会騷动和宗教热情的这一結合，反映在建立各种极端激烈的团体方面，而这些团体是从一般群众里形成的。这个革命曾以有力的速度蔓延开来。逃亡的奴隶、无力还債的債务人、破产的小业主以及游蕩无事的人們都归向革命。非洲各省听任遭劫。大地主恐惧万分；如果他們离开他們的庄园，他們就会碰到那些麕集路上的兇狠奴隶或农奴的队伍拦路打劫。放債阶層已无办法来收他們所放的債款；对征收人員，武装的暴徒帮会是以杀死来相威胁的。其中有些帮会有他們的首領，他們自称为"圣人队长"！

当努米底亚的首領吉尔多，一个罗馬化的非洲伯爵，企图利用叛乱来摆脫罗馬統治的时候，情势达到高峯了。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他趁着宗教分裂和社会革命的机会，占夺富人的庄园，并从各省騷动的而又强暴的暴徒中，找到了支持。最后，局势混乱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以致多那特教和异教中的稳健派开始傾向正宗教会，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唯一的方法，虽然多那特教派，作为一个党派来看，还是支持着吉尔多，以期使非洲摆脫那罗馬統治的压迫。

在391年吉尔多阻止了运粮船駛出的时候，帝国政府曾极度震惊。在以后的六年时期中，由于这項粮食供应的遭受阻撓，罗馬城里的人眞是做一天吃一天地生活着。政府被弄得走投无路．阿拉列正在威胁意大利，萊茵边疆正处在万分危急中。罗馬大将斯底利哥又不能从海外召回。在这千鈞一髮之际，不料，希望来自吉尔多的弟兄瑪塞茲尔方面；他曾遭受吉尔多的虐待而愿意为罗馬效劳。結果，罗馬以曾在日耳曼战爭中作战过的精兵七万人的軍队給他指揮。于是，吉尔多完全崩潰了。那失敗的首領曾企图逃到君士坦丁堡去，但遇到逆风，不得前行，最后自杀，使不落入他的弟兄手里。他那巨大的庄园被沒收而归入国庫，規模极大，以致要另立专局来管理它們。

于是，帝国和天主教的严刑峻法接踵而来。多那特教派的教会被捣毀，他們的財产被取去，他們的买卖和遺傳財产之权也被剝夺。地主們对他們庄园上的农奴和奴隶創立了恐怖統治。老的恶习也恢复起来。本地的布尼克人和努米底亚居民忧郁痛苦。最后，倒不是一个怨恨的罗馬指揮官的阴謀，而是这些不滿意分子的首領同西班牙汪达尔人的秘密談判，加速了罗馬非洲統治权的崩潰。429年时，汪达尔人以反叛的民众的同盟地位，渡过了海峽。在以后十年中，那整个非洲国家遭受了蹂躪，而迦太基城在439年終于陷落。

十年战事，使非洲人口大为减少，使无限广闊地带变为一片荒凉。但是最殘暴的事情，不是由汪达尔人所干，而是由狂怒而发瘋的本地农民和粗暴的努米底亚人所干的，他們焚毀了他們主人的村庄和別墅。吉本“未曾輕信，这是汪达尔人的通常行为：即在他們所要定居的地方他們把橄欖树及其他果树都連根拔去”。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所有关于汪达尔征服的記載，都是从失敗者方面得来的，而“汪达尔主义”这个詞在法国革命以前还未曾制造出来，作为破

坏性的形容詞。当时，高級天主教僧侶全被放逐，但对于屬于罗馬出身的或屬于正教信仰的下層阶級，“大部分人民群众，耕种广大皇室領地的被踐踏的奴隶，在沙漠边緣仅求糊口的飢餓隶农，甚至在吉坡和迦太基城的商人和手艺者，那有政治手腕的給塞立克对他們不曾企图使用迫害方法，来强制他們全部改信阿利阿教”。

关于汪达尔人的土地处理的性質，我們在上文已經講过。这办法和在罗馬帝国內各处日耳曼人所采用的办法，沒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就那些构成汪达尔王国社会的社会成分看来，它的性質就大不相同了。在意大利、在高盧、在西班牙所建立的日耳曼王国內，人口的大部是屬于一个消极的而又馴良的拉丁血統或拉丁化起源的血統。而在非洲，下層民众，主要是那些混合着努米底亚人和摩尔人血統和精神的布尼克人。而且，他們曾协助过汪达尔人的征服；也沒有象意大利、西班牙和高盧那样，有着宗教上的分歧，而使他們和汪达尔人疏远。因此这两个种族的混合跟着就开始，并迅速完成。結果，汪达尔人的日耳曼性質就很快失掉。所以，关于腐蝕了汪达尔人活力的原因，与其說是那炎热的气候及使人消磨精力的奢靡风气的影响，倒不如說是这种血統的混合，就是，他們和那远异于而又远低于欧洲日耳曼王国的农民血統的种族的混合。汪达尔人口的品質，由于和一个劣等的，而不是和一个平等的或优等的血統相杂交而降低了；他們变成为一种品質較低的而不是一种較高的杂种，象西班牙血統在热带的南美和印第安人与黑人相混合那样。汪达尔人在和本地人口比較之下，經常是少数人口——所有移居在帝国境內的日耳曼人都是这样的——按比例看，他們也許还少于其他迁徙的日耳曼部族。他們甚至还比西班牙哥特人更少使用自己的語言，竟至沒有一个他們的汪达尔文字留傳下来。

关于汪达尔非洲的商业，我們所知道的又少又肤淺。普洛科

匹阿說过，迦太基在汪达尔人統治下，和过去一样地是一个繁荣城市，这一說法，未可信以为眞。可是，也有証据可說明那里过去的商业，虽在程度上不及以前，却曾恢复起来。迦太基和罗馬食粮貿易的中断，使非洲失掉一个市場，而使罗馬經常陷入半飢餓的状态。值得注意的，在456年时，列塞默对汪达尔舰队作战获胜，使罗馬的麦价跌落。当貝利撒留出征汪达尔人的时候，他从那些和迦太基貿易的西西里商人方面曾探听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

因为汪达尔土地上的出产并无改变，又因为汪达尔人曾变为爱好罗馬的生活方式，似乎有理由可設想：汪达尔非洲的大宗貿易一定是和在罗馬占領时期不相上下的。我們还从普林尼知道，非洲的主要产品是羊毛、杉木、酸枣木、云石、宝石、一种类似肥皂的泥土、象牙、兽皮、黑人奴隶及馬戏場用的野兽。关于最后一項，狄奥多理哥特人是完全依靠非洲来获得的。汪达尔的最基本的工业似乎是制造刀劍。关于日耳曼人占領非洲的一个有趣味結果是北日耳曼貿易远及南方，因为琥珀、头髮和鹿角雕刻品，可在非洲和西班牙出售。

然而，汪达尔人主要是海盜。一种最稀奇的事情是，这原住內地的日耳曼部族，这样迅速地习惯于海上生活，他們利用了阿特拉斯山所产的木材以及罗馬人的造船塢，而变为海盜，变为对西西里和其他島屿以及对西班牙、高盧和意大利沿海进行掠夺的恐怖的对象。455年时，汪达尔的劫掠罗馬城，不象410年时哥特人劫掠罗馬城那样，乃是一件放恣而預謀的掠夺行动。他們的舰队甚至向东駛入爱琴海，蹂躪希腊各島屿。这些对商业上的掠夺行为，成为查士丁尼在533年出征汪达尔王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令人有輕松之感的，是从汪达尔人的骯髒历史轉到最高貴的日耳曼族——东哥特人的历史，轉到日耳曼征服中的最高貴的人物——意大利狄奥多理大帝(489—526年)的历史。

在第五世紀中，意大利的衰敗，又普遍又迅速，特别是在它的后半期；在476年时，凱撒世系在西欧归于結束。瑪約里安(489—526年)，唯一的值得怀念的皇帝所頒布的改革法，指出了那社会經济病根，它正在破坏整个西方帝国，也許首先是意大利。当时，人口数量曾这样地迅速下降，以致尽管有教会的禁欲主义，法律却禁止未滿四十岁的妇女們带着面紗，命令一切寡妇在五年內必須再醮，違者的一半財产将沒入国庫。生活費用曾这样地高漲，以致有些家庭强迫子弟們加入僧侶等級。稅吏的貪婪曾变成这样地厉害，以致为了保护納稅人免受行政官吏的勒索，曾設立保卫官署。城市居民逃入乡村，以求避免这些經济压迫。貨币貶値而又混乱。然而，这些改革都是具文，从下一事实，可以想見。根据这些改革減輕了最难堪的財政負担为理由，竟把稅率提高起来了！关于一切公德心的墮落，有一个最奇特的事例，可資証明，即用法律来保护公共建筑物，以防搗毀。在意大利各城市內，首先是在罗馬城內，充滿着古老的宏偉建筑物、浴場、公所、皇宮；它們那时久已荒廢而不复使用，所以石匠和造屋匠或任何需要云石的人，从这些建筑物采取石头，好象它們是天然的采石場那样。僧侶是在干着这种勾当中的最可恶的罪人，他們曾拆毁庙宇宮殿，来建造教堂。甚至云石雕象也被化作石灰。这种“汪达尔主义”在国內表現的形式繼續了千年之久。“古代罗馬的毁灭”，是由罗馬人自己造成的。

其时，意大利变成了那些来自多瑙河区的日耳曼軍事冒險家的掠夺物，他們不是殖民者，也不是侵犯者，而是眞正的佣兵队长，他們的兵士爭先恐后地夺取恩賜地，一般說，就是为剝夺財主或者国庫的借口。結果，在全意大利，地主开始在他們的乡村住所設防，建造堡壘以求自卫，那是中世紀城堡的先驅。恩諾狄阿斯留傳下来一篇关于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时全国慘象的記載。他說，滿地

荆棘，田野已大部变为荒蕪了。

可是，跟着狄奥多理(489—526年)統率东哥特人到达意大利的时候，它的一个新的好日子破曉了。狄奥多理名义上是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总督地位来統治意大利，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国王。他意图尽其力之所能，象罗馬統治者一样来統治；所以，东哥特王国，在一切日耳曼人所建立的王国中是罗馬化最强烈的。不象在高盧和西班牙那样，罗馬地主阶級似乎未曾被剝夺他們任何部分的土地。

如果那没收 1/3 的土地的办法行使于意大利，那末，那里的地主阶級会遭到劫难了，可是所有的証据都指出，哥特的征服是异乎寻常地和緩的。因为有着广闊的荒蕪地带，哥特人的居住区可能不是从剝夺土地所有者方面得来的。当然，在某种情况之下，一定会有强暴的剝夺行为的。例如狄奥达特的行为，他是一个哥特貴族，在多斯加納曾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公国。但是，貴族阶級没有遭受着普遍占夺土地的損害。貴族保存着他們广大无边的領地，即他們的巨大財富。哥特人曾以分取土地上的产物为满足。因此，罗馬业主得以仍然保有土地，这一事实在将来是很重要的。甚至那些在私人手中的国庫領地，也未曾加以騷扰。关于这些事情，卡息奥多拉①的証明是有力的。

对本地罗馬貴族的安撫，是狄奥多理的政策的一部分。的确，他对这一阶級的态度是太寬大了；他們濫用了所获得的特权，竟至率領他們的武装农奴和奴隶的队伍，互相战斗，互相越界来搶夺土地，最后他們还和查士丁尼携手，而毁灭了这个王国。为了取得大业主的支持，狄奥多理对待下層阶級比旧罗馬政府还严厉。他曾禁止自由人、奴隶以及隶农控告他們的主人；这項法律把农业人口

① 卡息奥多拉（468—568年）是狄奥多理的秘書和大臣，著有《哥特史》（“De Rebus Geticis”）。——譯者

中的大量群众完全委諸业主的司法管轄了。

意大利所遭受的一个最大的禍害，是由人口縮减所引起的粗劳动力的缺乏。狄奥多理首先所注意的事件之一，便是要补救这一缺点。在他和鄂多瓦战爭的时期中，勃艮第人曾侵入北意大利，擄走了几千人，作为奴隶。狄奥多理曾派遣巴費亚主教圣埃匹非尼阿，到阿尔卑斯山外，要求收回这批人。当时勃艮第人部分为了恐惧，部分为了取得赎金，乃放回了他們；于是，那荒廢土地上才重新有人居住。

对于罗馬留下来的財政制度，哥特政府未曾作出什么新的修改。罗馬度量衡制和罗馬驛站制繼續下去。各种旧直接稅甚至那在东罗馬已由阿那斯塔細亚取消的"金銀稅"也保留着。至于間接稅，它們在工商业的发展和中等阶級的形成受着奴隶制阻碍的社会里，原是无足重輕的。狄奥多理曾降低了进口稅，以期发展一个哥特的商船队，但是，对进口稅的征收成为麻煩的根源。当时，最失民心的賦稅是对各种买卖征值百抽四的交易稅，由买卖双方各付一半，这項稅收曾由瓦倫丁尼安三世和狄奥多西二世所建立而变成了經常化。当然，买方是实际付稅者。为了部分补貼，哥特国庫对有些供应糧食和某种工业出品給大城市和宮廷的商人，賜以特权，这特权取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名称，即壟断权(monopolium)。在意大利，哥特的賦稅不如过去罗馬賦稅那样的苛重。政府的开支更是少得多；教会和公共教育机关都沒有領到什么定額补助費；軍費的开支在和平时期原是很少的，而和平时期繼續了四十年之久。官吏俸給看来是远低于罗馬官僚制政府的官俸；而且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行政費內开支的。

上文已講过，在帝国后期，意大利农业情况是多么淒慘。对于这种情况，狄奥多理不曾采取什么积极挽救办法，因为他不能改变那大地产占有制和奴隶劳动的普遍状态。然而，农业也曾經复兴

过，因为所建立的政府已消灭那长久性的叛乱和盗风了。在四十年的和平时期，意大利的人口是在增加着。同时代的目击者，甚至那些不会被人疑心对异端政府有所偏袒的天主教徒，也承認恢复繁荣。我們可看几件重要的事实。有两个私人地位的公民，斯皮斯和杜密提阿斯(他們的名字听起来象罗馬人)，曾建議用自己的經費来抽干斯波勒陀附近的大沼泽地，条件是国家将把这干涸的土地的产权，給予他們。这一事件指出了，大部分荒地可能在哥特的統治时期已被占取。另有一个公民伊西厄斯，曾进行抽干逢丁大沼泽，而对于这一計划，过去帝国政府是从不能够完成的。

然而，在有些年内，意大利的谷物收获是不够的。如果說意大利曾輸出麦子，这只是对西哥特或西班牙而言，而且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般地說，麦子还需要不断地輸入；国王的命令不仅禁止谷物的出口，而且还禁止谷物从一省到另一省的轉运。如果說生活費用尽管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是在降低着，眞正貧苦的人还是須依靠公共救济而过活；而且粮食管理局在罗馬城和拉溫那所处的重要地位，还是象在过去时代一样。除了軍队谷倉以外，还有很多其他谷倉；常常在飢饉时期，将軍总督规定出粮食的最高价格；而地主們被迫接受这最高价格，不得拒絕出售。一个同时代人說过，在哥特統治时期，食品的价格减低了 1/3 。当时，谷物交易是一种用执照来管制的专利貿易。

在狄奥多理統治时期，单从农业方面来說，意大利曾得益不淺，可是資本的缺乏还是一項阻力。当时有着两种耕种方式，即由奴隶耕种和由佃人耕种。但是，在好政府之下，土壤的肥沃性部分地抵消了那方法上的缺点。谷物、葡萄酒和油脂是那里的主要产品。牛羊、馬匹和猪在南方諸省，出产很多；維罗那的葡萄酒是名贵的；布拉替安出产优等干酪。那些茂密地生长在山区的栗子树供給一种重要的食品。漁业欣欣向荣。波河上的漁夫組成为許多

团体，而政府从这里获得海員的供应。亚平宁山上的森林虽大部被伐除，但意大利并不缺少象松柏一类的木材供应。开采金矿业在布拉替安进行着，开采鉄矿业在达尔馬提亚进行着，但是，意大利还有相当数量的金屬从西班牙輸入，因为在这方面，意大利不是自給自足的。

至于工业組織沒有改变。富人們在自己家內有着作坊和手工艺人。有些旧罗馬行会，包括自由人或旁苦自由人在內，繼續存在，但是这些組織遭受严峻管理制度的压迫，象狄奥多西法典上規定的那样。兒子必須繼續他父亲的职业，行会的成員除了娶同行手艺人的女兒外，依法不得娶其他女人，这些規則都足以使工业結构成为一种等級制度了。

关于工业方面的唯一例外是制陶业。对这項工业狄奥多理似乎曾給予特別保护，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給三个元老恩寵；这些元老使用了他們的奴隶、自由人和旁苦自由人来經营这項事业。国王为保护制陶业所頒布的命令，是屬于这类性質的唯一命令，从而它有着双重的意义，因为它也暴露了罗馬元老在实业界里的活动。

在东哥特意大利市集中，最重要的是在琉卡尼亚的科索立那鎮附近的圣息普立安的市集；在那里南部各省人民常来交换谷物、牲口、衣服及其他商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市場。在狄奥多理死后(526年)，卡息奥多拉抱不平地談及某些“暴徒”的暴行；这批暴徒曾搶劫那些在圣息普立安节日集会的商人所携带的东西。因为圣徒的节日，是一个教会里的圣日，也是一个市場上的假日。

当时，意大利的經济只是比較繁荣，因为哥特政府对現行制度未曾进行改变。“专利”制度还是有效。工业管制条款还是繁杂的。征税制还是和內地商品的自由交换相抵触。狄奥多理，象罗馬皇帝一样，建造引水管和浴場，在城市公共建設和道路建筑方面花了

大笔款項;他还維持公共游戏場,虽然他曾企图取締这些剧烈表演中的不合乎人道的行动。度量衡和貨币制沒有变动。帝国驛站制还在繼續。狄奥多理的政府不象西哥特政府那样,对犹太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东哥特人的首都,設在拉温那,因为罗馬已迅速地变成为教皇城。这个"哥特和拜占廷时代的龐培"①是一个旧威尼斯,虽然早在第六世紀,那填滿礁湖的工程已使那些原为罗馬船只往来行駛的地方有开闢果园和花园的可能②。

如果东哥特人能安然繼續統治意大利的話,他們可能在式微的罗馬帝国之內,造成一种最合乎人道的、高度发展的罗馬-日耳曼文明。可是,它遭到了一个有力的阻碍:哥特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可能还不到 1/10,而大部居民都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他們以沉郁的仇恨心理,对待阿利阿教哥特人的統治,把它看作异端的統治。天主教僧侶和罗馬貴族又把这种仇恨情緒孜孜不倦地培养出来。特别是罗馬貴族,他們住在由几千个农奴和奴隶佃人所圍繞的設防庄园里,象封建主一样,力图建立地方政权,因而对政府所加的政治束縛,深为憤慨。

最后,正是在狄奥多理逝世的那一年(526年),当他的女兒担任攝政和他的孙子担任名义上統治者(一个微妙的政治局勢)的时候,东罗馬皇帝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登极;他决心消灭西欧的日耳曼各王国,来恢复旧罗馬帝国过去所拥有的广大地区,再使地中海成为一个罗馬的內湖。533 年对汪达尔人的征服及 544 年对西哥特西班牙沿海岸的占領,都是屬于这宏大計划的。

但是,在这个計划中,东罗馬皇帝所付代价最高而所遭困难最

① 龐培(Pompeii)——意大利的坎佩尼亚南部的沿海古城,于公元 79 年維苏威(Visuvius)火山爆发时被灰石所埋灭。——譯者

② 指新威尼斯。——譯者

多的部分是意大利的恢复。因为东哥特人不是象汪达尔人那样的一个堕落种族，他們的政府也不是象西哥特人政府那样一个軟弱而又腐敗的政府。帝国政府为恢复意大利的統治权，进行了十七年的长期战爭(535—552年)，而且只在差不多把全部哥特族歼灭之后才能完成。战爭是在535年从占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开始的，次年，意大利南部各省遭受了蹂躪。当貝利撒留的胜利消息遍傳各地的时候，意大利居民自发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从喀拉布里亚到多斯加納大地主，即使只用鐮刀和鉄耙，都把他們的佃农武装起来。在許多城市里，狂怒的民众屠杀了哥特的駐防軍。

我們无須詳細地追叙这长期而又殘酷的战爭，但其中有些事件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些年代里罗馬城曾遭受四次圍困，經此大破坏后，它的面貌已不复是一个古代式的，而是一个中世紀式的罗馬城；它所經历的轉变竟至这样的深刻程度。在536年貝利撒留一举占領了罗馬城；哥特人圍困了它一年(537—538年)，未得逞；后在546年罗馬城被哥特人占領，但不久被貝利撒留夺回幷加强防御；在549年，它第三次被哥特人进攻而陷落；最后在552年，貝利撒留的后繼人那錫士，为了帝国的軍威，收复了罗馬城。

从这些事件里，可以看到几种重要而突出的事实。在第一次圍攻里，查士丁尼对非洲的征服显然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从迦太基到奥斯替亚的运粮船可以粮秣供应罗馬城。可是，那糧秣的供应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城内凡是不用于战爭的牲口和馬匹，都被杀了。可是，这又引起了一个严重問題。原来，罗馬人用麦子磨粉，是利用馬或牛来带动磨石的。但是，在特拉斯特維尔，还有几所水力磨坊位于查尼邱兰的山坡上，面对着現在叫做彭特·西斯陀桥，在那里利用着图拉眞所建的高引水道所泻下的瀑布。可是，哥特人已把引水道割断，因而这些磨坊也停工了。在这危急状况下，貝利撒留曾把两只駁船幷排停泊在台伯河急流中，而后以磨轮悬挂在

两船的中間来磨碎麦子。这种异想天开的方法，沒有失傳。从那时起直到最近时期，台伯河上的水面磨坊已成为罗馬城的寻常現象。

在第二次圍攻里，哥特人截断了奥斯替亚港因而阻止那来自非洲的小麦供应。貝利撒留也不怕什么，把所有的非战斗員的居民都赶到城外去，并强制在这些空地上播种谷物。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过去罗馬城內稠密的人口現在一定已經大大地縮減，而且另从别的資料方面我們知道，在第三世紀建造的两座奥理略城垣之間的地面上已是人烟稀少。当时，麦价猛漲到荒年时期的麦价水平，几乎达到了一先令一磅的麦价，居民曾挨餓节食，来养活士兵；"战时面包"即用麸皮和切細的草根或青草制成的面包是家常便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那些随軍卖食品的以及軍官們正好投机詐詐，发了横財。

飢荒情况果然跟着战爭的結束而消逝。但是，罗馬城在很重要的一方面已由于这些圍攻而改观了。原来在几百年中，政府大廈、凱撒宮殿以及同样豪华的罗馬貴族住宅是建造在山丘之上的。卡匹托莱丘頂上，屹立着卫城、元老院大廈以及神庙；帕拉泰因丘頂上，高聳着巍峨的皇宮，其中突出的是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的堂皇的紀念碑；阿文丁丘頂上点綴着八十座私人宮殿。由于那些引水管的破坏，这批貴族阶級的分子被迫抛弃了他們的宅邸，到城市的平坦地方找寻住所；在那里，貧苦阶層住在台伯河的两岸，以淺井或河水作为他們飲水的来源。因此，那些被廢弃的宮殿經过若干年后，墙坍壁倒，变成为猫头鷹、蝙蝠和毒蛇的栖息所了。最后，它們失掉它們的一切原来面貌，傾倒而成为大堆泥土；而中世紀居民遂在那里放牧牛羊了。巨大浴場也已破毁。所以，罗馬不仅迁移了它的政府地址和它的社会重心，而且它的习惯也改变了。

現在，罗馬中心是在哈德良和圣彼得陵墓周圍的地方。哈德良陵墓在罗馬被圍攻的时期中，已改成为卫城，在那里它的原有性

質和外貌的各种痕跡几乎完全抹去了。在連續几次的圍攻里，哈德良的巨型云石象，安敦尼朝諸皇的坟墓，彩色的云石地板、梯阶、壁板、光滑的云石表門，一切东西除了大廈的坚硬磚石心子以外，都已被拆毁而破坏不堪了。当帝国守卫軍用尽了軍火的时候，他們"就使用那些装飾大廈的很多雕象，作为投彈，并把这些雕象向哥特人投擲。打碎了的艺术品，神象及皇帝和英雄的雕象，象落冰雹那样，紛紛大塊地落下。那些正在进攻的哥特人受到了神象身体的压力而倒斃；这些神象也許曾一度装飾过雅典的神庙，象坡力克利塔或普拉克息特利①的作品那样"。那著名的云石福恩神象②及哈德良象的巨型头曾在十七世紀被发現，它們都已經破坏，并已长久埋藏在城堡周圍的濠沟里。但是，那首先如此破坏古代艺术精华的恥辱，倒是不应加在罗馬人和哥特人身上的。因为塔西佗說过，維斯帕西安的一个弟兄，在那分裂罗馬的內战时期，曾在卡匹托萊丘頂上以云石象筑成障碍物进行防卫。

"哈德良石堤"象圣安极乐堡壘（偉人格列高里时代这样称呼的）一样，在千年以上的时期中，曾成为罗馬城的堡壘，的确，在名义上至今还是一个堡壘。与古代式罗馬城如此轉变为中世紀式罗馬城的同一时期，它也差不多擺脫了异教傳統的最后痕跡。虽然教皇住在拉特藍宫里，但大部分居民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周圍；那是新罗馬城的宗教和社会的中心。很早已有香客来到这里，而且在这里已有旅館和商店；在台伯河彼岸的特拉斯特維尔，住着工人群众，即手艺者和匠人。在圣彼得教堂蔭影下和在圣迈克尔即基督教战神象的銅翼下，罗馬民众后来居住了好几百年。

但是，另有一个后果，它也是从割断引水管产生而深深地影响

---

① 两人都是古代希腊的大雕刻家。——譯者

② 福恩(Faun)是意大利牧野神之一，具有人类的面容而有尖銳的耳朵，細小的角，有时并有山羊的尾或半羊半人的形状。——譯者

着罗馬城的生活的。我們还可看到这些破裂了的引水管拱門的遺跡，它們象史前的恐龙一样，还傲然横跨于坎帕納地方①。由于这些引水管的破裂，洪水曾泛濫于坎帕納，使罗馬城周圍几哩的广闊区域成为沼地；从这里蒸发出的带着傳染性的水气，在几百年中曾是"罗馬瘧疾"的根源。普林尼在公元前第一世紀里，曾以坎帕納的麦田而驕傲。但到了第六世紀，它們已成为瘧疾来源的沼地了。

由此可見，为了这一切原因并在这样的情况下，古代式罗馬城消逝而中世紀式的罗馬城就出現了。

現在，我們可簡略地談一談哥特战爭的結局。拉溫那在 540 年被占領。战事遍及了半島全境。到处发生着疫癘、飢饉和荒凉状态。一年复一年，很少田地有人播种，野生谷物苗长而沒有人去收获。城市居民餓斃于街道上，乡民逃往山区和森林中去。豺狼激增，它們找到了这样多的尸首来大嚼，以致它們在許多地方变成为一种恐怖。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行为。当战爭停止的时候，意大利一半已是坟墓了。东哥特意大利，对当时来說已具有价値，而对将来而言可望有利于文明的发展；所以，它毁灭的历史，是人类史上的最悲慘的一章。

人类的毁灭，由于疫癘的猖獗而增加起来；这疫癘似乎就是几年之前曾使地中海沿岸国家变为如此荒凉的黑死病。一本历史書上說："畜群独自留在牧場上而沒有牧人来照管。你可看到不久之前人烟稠密的农庄或設防地区，現已完全沉寂了：听不到田野中的人声，也听不到牧人的哨声。冬季已至，而庄稼沒有人去割，葡萄园內藤叶已落，葡萄已熟烂得光油油而无人去采。沒有过路人的足跡。人类的住宅已成为野兽的栖息之所。"

有很多哥特族人曾逃往阿尔卑斯山外阿勒曼尼部落中去。据

① 指坎帕納·第·罗馬（Campagna di Roma）——罗馬周圍的起伏平原。——譯者

一个近代史家說，“由于他們的被逐，文明倒退了一千五百年。”然而，不是所有的哥特人或者被逐出，或者被歼灭的。尽管有着长期的殘酷战爭和大規模的掠夺行动，在下一世紀里，我們还可看到为数不少的哥特人在帝国政府里和教皇政府里担任着行政职位，他們还是以显著人物或要人著称；这一事实表明了，有些哥特貴族在他們的国家复亡和他們的种族毁灭之后，想必是留存下来的。

查士丁尼的狂妄战爭，使他貪得无厭地搜刮金錢，在这殘破的意大利領土上設立了总督，駐在拉溫那，通过总督，他建立了拜占廷經济压迫的精密机构。亚历山大“剪刀”，即皇帝的臭名昭著的征税官，在任內大发其財。按法律，他应得所征税款的1/12，所以，对于他所能課征的范圍，除了民众的負担能力以外，再也沒有别的限制了。甚至軍队的餉銀，他也要窃取，对于破坏紀律的事件，他也要勒索苛重罰款。“一切意大利人，凡和哥特国王有过金錢交易者，或者在他們手下做过一官半职的，都必須交出一切所收款項的詳細帳目，即使这些款項是在四十年之前，即在狄奥多理統治的早期，由他們經手的。”

查士丁尼死于565年。他不及亲見他的工作遭到部分的破坏，为了这工作他曾消耗无可估量的鮮血和財物，并曾把沉重的負担横加在意大利的身上。568年，倫巴人即“大移动”中的最后一支日耳曼族，进入了意大利。整个意大利，由于哥特人的长期战爭，已变成这样地广人稀，以致倫巴人差不多进入了一片无人之境。北部的大多数城市已經破坏；米兰城不止一次地被蹂躪。虽然米兰后曾恢复起来，但那錫士① 沒有来得及完成了他的城市建造計划。

只有巴費亚城抵抗过。倫巴人迅速地蹂躪了整个波河流域包括威尼斯和利古里亚在內。当我們討論倫巴人的野蛮性的时候，

① 那錫士(473—573年)，在554年被东罗馬政府任为意大利总督，在567年被免职。——譯者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听不到殘暴的事实。也許很少有人能够进行抵抗。"实际上，除了佩魯查的一个例外以外，帝国所保留下来的地点，不是在海濱的象热那亚和安科納那样，便是由水流环繞着的象孟都亚那样，便是有航路可直达的，象格里摩拿和皮阿森扎。倫巴人对航海术一窍不通，所以留在內地；希腊公侯，即东罗馬皇帝的代理人，統治着沿海口岸：拉温那、安科納、那不勒斯、阿馬斐、索倫多、基泰和大兰多。"倫巴人所曾占有的唯一港口，是比薩，但那也是好久以后的事。

下面是一个有趣味而又重要的历史事实。意大利沿海地区缺少着农业富源，倫巴人已占領波河流域的肥沃腹地，威尼斯占有着海濱的位置，而且是东方貿易的自然通路；这一切因素迫使威尼斯比以前更加努力，来发展它的海上貿易。現在热那亚也出現了，它是一个无城垣的小漁村，从罗馬时代以来久被遺忘，可是注定要变成为威尼斯的最兇猛的貿易竞爭者。威尼斯在 603 年时虽然失掉巴土亚和孟都亚，归于倫巴人；但它的海島地位使它免去騷扰，而它的人口由于来自大陆上的难民而增加起来，这批难民逃避倫巴人，和早期居民逃避匈奴人一样。在中部意大利，罗馬城是难民的庇护所。坎佩尼亚的居民逃往逢廷沼地去；琉卡尼亚和布拉替安的居民逃往西西里去。主教們放弃了他們的主教座，僧侣們放弃了他們的寺院，城市空虛，田野荒蕪。在北部意大利有不少于十五所主教区，在好几年內沒有首长。

然而，我們不应夸大本地居民放弃波河平原的事实。可能有大举驅逐地主的行动，可是在几年以前已有各种势力，起着促使他們人数縮减或退出的作用。

中等阶層的貧困化，阿拉列、阿提拉、盖塞立克、鄂多瓦和他的赫留来族，狄奥多理和他的东哥特人的先后侵入（尤其是那标志着东哥特战爭后期的血腥报复），往君士坦丁堡的迁徙，所有高貴出身和有教育的人湧往官厅所

在地（不管在拉溫那或在君士坦丁堡）以求一官半职的趋势，有些人被教会吸引去，有些人被修道院吸引去……这一切原因，毫无疑問，产生了意大利乡村貴族可怖縮減的情况，甚至在倫巴人到来加速这过程之前就是如此①。

在意大利被奴役农民中，一定有很大部分頑强地依恋着乡土的。我們看到下一事实可資証明：罗馬的土地丈量制(百畝单位)曾遺留下来，的确，在倫巴第这制度从沒被廢除过。而且，意大利的地方名称，几乎全部都是罗馬的，而不是日耳曼人的，这表明了倫巴人人数稀少的情况和当地居民依恋乡土的性質。此外，倫巴語言或艺术对当地的影响，确是微乎其微，那也說明了这同一的事实．从本質上看，意大利的語言和艺术的发展，还是严格地循着罗馬路綫的。

从征服的性質上及从社会成分的程度上看来，倫巴人的居住区是不同于罗馬帝国內别处的日耳曼人居住区的；所以它深刻地影响了北意大利的历史，并在和法兰克高盧、东哥特意大利或西哥特西班牙比較之下，也不同方式地影响了北意大利的历史。倫巴人是以征服者地位而来，不象别的日耳曼族以帝国政府的輔助者而来的。他們統治着那怀有敌意的本地居民，还受到教皇和拜占廷帝国总督的威胁，他們在人数上这样稀少，永远不能遍布整个半島。因此，倫巴人使他們的日耳曼制度的外壳(如果可以这样說)强化起来，来防卫自己。再也沒有一个日耳曼族，象倫巴人这样頑固地保持着日耳曼人的本来面目，或这样长久地保留下去。但是，倫巴人的野蛮性，与其說是討厭的，不如說是古怪的。

我們已提过，那些在别处分割罗馬人土地給自己人的日耳曼人，叫做客人，这土地叫做“份地”(sors)，而这所有权叫做“客敬”(hospitalitas)。但是，倫巴人似乎不是把土地本身取走，而是取去

① 霍治金：《意大利及其侵犯者》，第6卷，第589頁。

土地上产物的1/3（是否为淨的或总的产物，不得而知），似乎讓罗馬业主享有完全占領权，即使說不是所有权。但是，这业主阶級的地位那时是怎样呢？这种繳納实物的形式，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呢？最早的倫巴法律，即《洛塔列（636—652年）法典》差不多是在征服一百年后出現的，不曾反映出原始解决办法条件，而第一个倫巴历史家还是生存在征服两百年之后的人；而且他的記載这样地模糊而混乱，以致难于理解。如果說大业主阶級被降到隶农或农奴的地位——倫巴屬民中的"长老阶層"（aldii）可能是这样的——那末，不自由阶級一定会比他处或比以前被贬到更低的地位了。有些历史家虽然否認罗馬业主被这样地降低身分，但是，大多想要給予不利的解释。然而，也有人主張說，这种严峻的政策只在征服的早期曾施行过，后来是把部分土地还給罗馬业主的，或者把征收1/3的地租改变为征收1/3的土地的；另有人主張說，当倫巴人习慣于他的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遂完全剝夺了旧地主的土地，从而消灭了他們产权的最后痕跡，因此长老阶層被降到和农奴一样卑微的地位了。无論如何，倫巴人的征服对罗馬居民所加的負担，确比他处日耳曼人的征服要苛重得多。如果說有什么高等罗馬人阶層遺留下来，我們完全不知道这一点。我們也絲毫不知道关于城市中工人阶級的地位和状况。但是，有趣味的，后来发現了显然屬于倫巴族的一个人数很多的中等阶級；这件事在西哥特西班牙最为少見，而在法兰克高盧也是不显著的。的确，城市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性，在倫巴第比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表現得早一些。

《洛塔列法典》是一种草率粗陋的法典，很少反映出罗馬法的影响。当然，它是用拉丁文写的；語法很不通順，但是其中包含有一种粗魯的正义观念，足証倫巴人是一个专横部族。法典中所列各种罪行是一个粗野甚至强暴的农业社会的証明，而这精神和制度正是屬于日耳曼族的。

在百年以后，盧易特普兰(712—744年)即最偉大的倫巴国王，頒布了一个新法典。試把这两种新旧法典作一比較，倒可以发人深思。現在，我們可看到关于产权、契約、典当等等的很多条文，也可看到文化提高了的各种象征。現在，有着旧罗馬居民，而且，和在其他日耳曼王国内一样，有两种法律同时通行着：一种是为日耳曼人的，另一种是为罗馬人的。当时，奴隶和农奴所处的境遇是平妥的。然而，动产的价值和土地价格相对比，还非常高；这表明倫巴人在第八世紀还沒达到那稳定社会所具有的安居状态。我們有极其有趣的資料，証明城市中存在着一种从事工业的阶層和小手艺职工，尤其是科摩城一个石匠师公会(Magistri Comacini)，他們的建筑技术后来創造了倫巴-罗馬式建筑；当时，法兰西和德意志都需要这批人来担任建筑师和石匠。还可找到資料，証明波河上及其支流上的商业接触和造船业。倫巴貨币是以拉温那的拜占廷币制为本位的；第七世紀中的金銀比价似乎是十八比一。715年时，威尼斯和盧易特普兰曾談判一种通商条約，規定威尼斯得轉运利凡得商品上溯亚达河及的斯諾河，經意大利湖，越阿尔卑斯山路而达德意志和法兰克高盧。

可是，从整个来說，倫巴人在这个时候对貿易观念很少发展，那不是因为他們缺少这一观念，而是因为他們的政治局势不利于这一方面。当时，他們的王国被虎視耽耽的敌人包圍着：拉温那总督、教皇、阿佛尔人以及阿尔卑斯山外的法兰克国王。商人可能是間諜。这閉关的和排外的政策，反映在拉特契斯(744—749年)和愛斯图尔夫(749—756年)所頒布的法律里。前者曾禁止任何倫巴人不得国王的准許即前往罗馬城、拉温那、斯波勒陀、貝尼温陀、法兰克区、巴伐利亚、阿勒曼尼、希腊或阿佛尔区，違者将处以死刑并沒收其財产。后者曾建立一种通行証制度，禁止和罗馬人的一切貿易。如果有任何倫巴人做了这种生意，他将丧失他的财产，須把他

的头髮剃成"罗馬人的式样"，并須游街示众，受人嘲笑。倫巴人"在头脑中还存在着他們祖先的非常魯鈍的野蛮性。他們还不象三百年以前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那样愿意和他們的拉丁邻人并居杂处"。

在罗馬-东哥特意大利的廢墟上，查士丁尼曾建立拜占廷帝国省行政制度，象他在汪达尔非洲所建立的那样。它是一种带着强烈的軍事傾向的文官政府。这一点，以及它的財政机构都是这制度最显著的屬性。但是，在第七世紀中也曾作过努力防止象亚历山大"剪刀"一流恶徒所干过的征稅舞弊情事。城市和乡村大地主貴族有向君士坦丁堡請愿之权，以求昭雪。起初，各省省长不是由上級指派，而是由地方紳士选举出来的，但是，这种寬大措施，在流行的軍事情况的压力下垮台了。貨币是稳定的，度量衡是被管理的，但十分奇怪，这些度量衡的标准，由教皇保管；这是如下文所述的許多証据中的一个証据，可說明教皇世俗权的徐徐成长。但是，省长和总督同样利用职权，竭力搜刮，他們在任期內，积聚侭量大的財产。

指出拜占廷的統治和希腊文明，在意大利半島的南部比起北部和中部，强烈得多，这是重要的。北方的焦点是在拉溫那。希腊-东方的影响仅微乎其微地滲入中部意大利，这地区頑固地保持着意大利和罗馬的特性。然而，在南方，象那不勒斯、撒列諾、巴利、大兰多、布林的西各城都被盖上了拜占廷文化和制度的烙印——西西里也是这样——即后来在那里建立的薩拉森和諾曼人的統治也沒曾把它們完全抹去。在这三个区域以外，另有威尼斯城，它在政治上是自由的，而在商业上是自有其一套政策的。

显然，拜占廷政府的目的，在于侭可能使意大利完全希腊化。当时，各省的省长是希腊人，僧侶大部分是希腊人；那里有几十所希腊修道寺院；甚至有几个教皇也是希腊人或希腊-叙利亚人。东

罗馬皇帝由于他們追求希腊化的热情，竟指望教皇座本身迁移到拉溫那去。他們曾清楚地認識到，教廷是罗馬文明的樞紐。这一梦想，在西欧拉丁文化衰敗情况下，似乎不是完全不可实现的。

当拜占廷帝国的財政主要由于埃及和叙利亚被穆罕默德教徒所占取而越发窘迫的时候，它在剩余領土上所实施的財政政策也越多掠夺性了。皇帝昆斯坦斯(663—668年)由貪婪的行为，使自己变成臭名昭著。在所有的东方皇帝中，独有他一人把大部时間消磨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意图或借口使用西西里作为反对那时正在蹂躪非洲北岸的薩拉森人作战的基地。他曾一度克复过迦太基。“西西里、撒地尼亚、喀拉布里亚以及非洲省的农民，长久記着昆斯坦斯的收税吏的压迫手段。他們的勒索竟至这样强横程度，以致为了满足他們的要求，丈夫被迫出售为奴隶而离弃其妻兒，兒女被迫出售为奴隶而离弃其父母。”沒有疑問，这些蛮横行为使已陷于絕望的西西里居民宁可欢迎薩拉森人的征服，以求改变主人；他們認为，这总可好些，决不会更坏。甚至罗馬城也不能幸免于搜刮。从第五世紀以来，沒有一个皇帝曾住过“永不灭之城”里。帕拉泰因虽在徐徐衰敗的过程里，但至少一部分还可住人。但是，罗馬城已处在一片淒凉景象之中。昆斯坦斯在他停留罗馬的十二天中，从潘提昂①屋頂上拆卸了鍍銅瓦片，如果他有胆量的話，可能将同样地拆卸了圣彼得大教堂的瓦片。事实上他曾把許多教堂內祭壇上的花瓶和珠宝連同积存的各省税款，一起运到西西里去。

昆斯坦斯的可憎的掠夺行为是由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这样富饒的情况所激起的。因为事实指出，在那里的港口上商业和貿易是活跃的。当时，穆罕默德教的海权还未曾兴起。第六和第七世紀所发的执照，揭露出相当繁多的职业类别：染师、縫工、制蜡工、毛

① 就是罗馬城的万神庙。——譯者。

皮商、絲商以及普通商人。我們在拉温那、俄特兰陀和那不勒斯还可看到旧罗馬行会制度或同业公会的遺跡。在各城市里都可遇到“叙利亚人”(其中必須包括亚美尼亚人和东方的犹太人在內)。在拉温那和罗馬城有一个叙利亚人的正式“居住区”。薩拉森对叙利亚的征服无疑地可說明为什么意大利有大量的叙利亚人。这批人是經营絲綢、香料等奢侈品的商业巨子，也是銀錢兌換商。在这項貿易里，他們所碰到的唯一竞爭者是威尼斯人，因为到第七世紀，威尼斯也已着手对埃及的貿易。

更奇怪的是我們看到色雷斯人的殖民地，他們被保加利亚人逐出，而由帝国政府移殖于帕諾馬斯和那不勒斯的周圍的；另有一个保加利亚人的殖民地，他們随后被阿佛尔人逼迫，而由貝尼温陀公爵引入他的公爵領內原已荒蕪的空地上居住的。在百余年以后，有一个倫巴历史家写道：“他們直到今天，还是住在这些土地上；他們虽然講拉丁語，[意大利語，当然，还沒曾形成起来。]但本国語言也未放弃使用。”

从意大利-拜占廷社会的横断面可以发現三个阶層：在底層，是奴隶和农奴的混合人口，包括乡村里的僱农和城市里的工人与小手艺者在內，其中很少人是自由的；其次，是小土地所有者和低級官吏；最后，是大官員和大土地所有者。尽管帝国政府有严密的机构，但帝国对大部居民的統治，却是半封建式的。自由的所有权还是存在的，但有着消灭的趋勢。僧侶和大土地所有者已变成封建領主，他們的“地产”虽常常是分散的，但加在一起，它們的面积却是很大的。奴隶制在和緩着，而农奴制在增长着。这类强大的貴族，稳步地力爭摆脫政府的全部控制；各种行政上的舞弊又使“庇护”制度得以扩展和傳布；而在封建制成长过程里，这制度本是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小自由农为了获得保护，自动地讓出他們的自由权利。有些人，因为貴族垂涎他們的土地，被压制到农奴地

位。另有許多軟弱而又无办法的人們，力求托庇于教会的护翼之下。可是，由于教会的严峻的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农民宁愿請求世俗地主的保护，而不愿請求教会地主的保护。偉人格列高里埋怨地說，教会农奴逃亡到世俗土地上去以求保护了。

現在，由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进一步来談在中世紀意大利第三个重要国家的历史，也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国家，"彼得的世襲領"，即教会国家的历史。在上文里，我們曾講过在西欧各地教会怎样变成为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和一个世俗权力。这个具有封建性質的过程，对世俗人說来，不是一件新奇的事，而对僧侶說来，这却是具有革命性質的轉变，因为他們的管轄权范圍原本是在精神方面的。每个主教，每个住持，都变成为地主，而教廷变成为最大的領主了。我們可相当正确地追寻教皇的世襲領和世俗权的成长过程；这过程历时好几百年，从君士坦丁时代起，当时帝国政府和私人开始以大批土地和金錢贈給教廷，直到在偉人教皇格列高里一世(590—604年)时代，教廷的封建管轄权已通行于意大利、西西里、撒地尼亚和科西嘉的辽闊地面上为止。按一个世俗統治者的地位論，在意大利或在任何别的地方，沒有一个教会是可与教廷相比的。过去，帝国的意大利領土曾巩固罗馬皇帝的权力，同样，現在教皇所領有的广大土地足以把教皇提升到国君的地位和权力。«偉人格列高里傳»的第五十三章內列举了二十三个教皇世襲領，須知其中有很多"世襲領"包括屬于教皇的很多省分或城市的大部面积。曾有人計算过，如果把在格列高里第一时代罗馬城和它周圍的隶屬于教皇的地产合并成为一塊接連土地，它会包含有四十平方哩的面积。

但除此之外，教皇在薩卑那姆、在匹栖那謨、在坎佩尼亚、在拉温那周圍、在波河流域、在喀拉布里亚、伊梨利根、西西里、在科西嘉，甚至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阿勒拉特，都領有土地，它們的总面积

估計达一千八百平方哩，它們所出产的收入，按現代貨币計算，約合一百五十万美元以上。虽然教皇在理論上，根据查士丁尼的諭旨，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比起别的主教所大无几，但是实际上他已站在大部意大利，尤其是中部諸省的事实統治者的地位上了。他的領地是广大的，他的教会是富裕的，而他又是圣彼得的繼承人。在罗馬城內，他是行政长官，也是教长。他指揮警察，管理市場，鑄造貨币，維持民事和刑事法庭，修建城垣和引水管，补助学校和医院，統率民軍，以及被攻击时捍卫城市。“那由教皇因領有广大土地而行使的权力，在帝国权力的衰弱时期，已差不多近于一个主权者的权力了。”

这些广大地产是作为庄园来領有的，在那里有几千几万人居住并劳动着。在这些地产中最富饒的，是西西里的麦田；它們过去曾屬于帝国国庫的。单单这些麦田，按照当时的十八比一的金銀比价，估計曾出产合八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倫巴人的侵入在好多年內使教廷丧失了所有的北意大利的世襲領——科替安阿尔卑斯山区，在那泥、奥賽摩、安科納、烏馬那和威拉·馬格那——直到盧易特普兰收复了这些失地为止。但是，作为对这些失地的部分补偿，君士坦丁五世曾賜給教皇撒加利一世諾耳馬和宁发尔的两塊富饒的領地，这两塊地在六百年以后，估价值五百万美元。

所有关于这些地产的行政管理，是依靠一个有权力的官僚机构，并完全按照过去罗馬皇帝管理庄园的办法进行的。中世紀統計文献，遺留下来的在数目上原是不多的。但是，幸而我們获得了格列高里一世时代关于管理教皇領的丰富資料；就是，格列高里的《通訊集》以及罗馬城居民的戶籍簿一册。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理方法的主要輪廓。土地分成小塊給农民，收取現款租或实物租。劳役未曾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象我們后来当庄园制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高度发展的經济和社会制度的时候所可看到的那样；

但是很显然，授田取租虽是主要形式，但种田須負担劳役的制度也已广泛流行。每个庄园交給一个管家来管理，管家須向教皇提交詳細报告；因为財产的处理权是屬于教皇的。格列高里一世是一个信仰坚定而又有慈悲心的人，也是一个富有办事才干的人。他是兼有宗教精神和实踐常識的一个杰出人才。他使用大部教会的資源作为維持費和慈善費，但是他精明地以余款購进更多的土地。他注意市場情况，出售木材給无森林的埃及，麦子給君士坦丁堡，撒地尼亚生鉄給东罗馬皇帝制造武器，出售橄欖和橄欖油于任何可能出售的地方。下引摘要，取自他給西西里的副管事兼教廷代表彼得的信里，是不言而喻的：

必須用心閱讀在你往西西里去的时候我給你的訓令……我們已查明，屬于教会的农夫对于麦价非常抱怨，因为要他們繳納的数目，在丰收时期，沒有保持在适当比例。我們的意思是，在一切时期，丰收也好，歉收也好，比例的尺度应依照市价。由于船难而損失的谷物，必須責成全部賠偿，但是，有一条件，即关于装运谷物在你方面并无疏忽之处。

这里所說的，是指从西西里运到罗馬城的麦子。麦子是在所有人自負危險責任的条件下装运的，但是，教皇供給那些屬于教会的船舶作为运輸工具。如有損失情事，有責任的一方須負責賠偿。

我們也已知道；在有些教会的庄園里，有一种极不公平的勒索行为，即农务管理人要求从七十升中抽取三升半〔田庄管家就是这样向农民敲詐的〕。这是可恥的，必須制止。

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看来已很不中用的公牛，应即出售，这样至少还可从它們身上撈得一些利益。致于牝馬群，养着很无好处，我愿把它們全部分散，为繁殖的目的，只保留年輕的四百头；这四百头应分发給我們田庄的管家，給每个人若干头，要使他們能在未来年代里从中获得一些利潤給我們。因为这对我們来說是很为难的：花費了六十苏里德給牧人而从畜群方面連六十便士也收不回来………

……应同我們整个領地內的牧人协商出一种办法，使他們能种地賺

錢。所有屬于教会的农具，不論在叙拉古或在帕諾馬斯，必須在它們因年久而銹成廢铁以前售出……应溫和謹愼地对待农夫…… 应把你所征集的全部繳款带来，連同你的全部帳册…… 前次你送給我一头可怜的小馬和五头良好的驢子。小馬我不能騎，它是这样的一只可怜的动物；那些驢子虽然不差，我也不能騎……应从其他谷物生产者或出售者，收集价达五十金鎊的本年收获的谷物，并把谷物儲存在西西里各地，不使它发生霉腐；我們将于二月中派遣尽量多的船只往那里，来装运这些谷物到我們这边……这里食粮已經这样地缺少，以致将有饥荒景象；除非蒼天保佑，能把西西里的粮食收集运来。

从上面所引的話可以看出，公元600年时，意大利和全部西欧相同，差不多整个地陷于自然經济的状态里，在这状态里，农产品和原料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商品。所有的工业也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簡单工业，例如紡織、制革、制造木器、打鉄、制草鞋、染色、制肥皂、烘面包等等。这些职业还保存着它們古代罗馬的行会形式，但是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稳步扩展，促使这类組織迅速地分化。我們偶然可看到鑲木細工、制玻璃工一类的高級技术工人；当然，他們都是由教会僱佣着的。

由于罗馬、拉溫那和君士坦丁堡間，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城間的接触，我們看到某种程度上的高級商业。在罗馬城和拉溫那有希腊商人和叙利亚商人居留地；他們主要是經营絲綢、香料、乳香以及教会所需的东方名貴商品。絲业工人是意大利实业界中的天之驕子，并自高自大地以特殊称呼(oloseri capratae)作为炫耀。为了进行国际貿易，在拉溫那和罗馬城，还有着銀錢兌換商人。

偉人格列高里，就他的才干、紀律性和坚毅而論，是一个眞正的罗馬人。当他贖回那些在倫巴战爭里被擄的俘虜的时候，他也曾提倡那作为一种剝削制度的农奴制；对于奴隶制，他沒曾作出什么改善的举动。教皇公庫的勒索，比起世俗領地上的勒索还苛重。教皇够聪明地曾看出他的征税权的强制性，并灵活地利用这

項权力。举一个例說,他曾发出命令說:"因为在教会的庄园里住着很多犹太人,我愿望:如果其中有人愿成为基督徒,他們的一些繳款可以还給他們,使别人受到这种利益的刺激,也产生同样的意愿。"其次,在第六世紀,在乡村低級农民中还存在着旧时异教习慣的很多殘余。格列高里就使用了他的地主的权力加以取締,象下文所指出的那样:

告卡格利亚里主教:由于你的疏忽,容許了那些屬于你教会的农夫到今天还保留着异教信仰…… 如果我在撒地尼亚島上能找出屬于无論什么主教的一个异教农夫,我将以这件事严厉責罰那个主教;但是,如果有这样頑固不化的农夫,竟拒絕皈依主宰上帝,他必須負担着这样苛重的税款,用重税的处罰迫他赶快走上正路。

教皇的大量进款,在使用方面和在征集方面,是同样地灵活的。教廷須供养僧侶,維持教会,照顧穷人,救济病人、医院、学校、孤兒院,不仅在罗馬城內的而且多少在意大利各省的。但是,因为教皇也是世俗統治者,他还須維持罗馬城及其附近的民事和軍事政府。格列高里一世曾企图恢复有些破碎了的引水管,抽干一部分教廷沼地,幷移民到荒地(agri deserti)去,象在他以前罗馬皇帝所做的那样。由于繼承了与过去皇帝差不多相同权力和地位,教廷必須負担过去帝国政府在罗馬城所負的一切責任。其中也許最麻煩而又最困难的負担是粮食救济,即按照习慣以麦子、橄欖、有时还以酒肉,賜給罗馬无产者。在罗馬城居民中这类懶惰、腐敗的渣滓,是由帝国罗馬傳給教廷罗馬的一項遺产,也是一項最大的經济負担;这个最麻煩的社会問題,在好几百年中教廷政府必須处理。为了維持这批流民的生活,教廷耗費了它的財富,教皇变成心神不安,幷且必須把原可用在其他有益事业方面的經費消耗在这方面。教会的救济事业是不健康的,它的錢款是浪費了的,象在帝国时期罗馬城,为了无产者发給面包和演馬戏那样。那在格列高

里一世死后不久所流傳的一件故事，指出了教廷的財政已陷入悪魔圈子內。据說，格列高里的繼承人薩卑尼那斯停止了他的前任所做的浪費的救济工作；理由是，麦倉已有近于空虛的危險，而罗馬城的忠实的民众已遭受着飢荒的威脅；但是，这“偉大主教”的幽灵曾在薩卑尼那斯梦中四次出現，警告他所采用的政策。不管怎样，罗馬城后来不久的确就遭受了一个严重的飢荒。

教廷的龐大收入，对倫巴人在意大利扩展統治来說，是一个巨大障碍。因为如果說东罗馬帝国政府以軍队供給拉温那总督，那末这些駐兵的餉銀大多是由教廷公庫支付的。其次，当主張宗教改革的热忱乃至皇帝利奥·愛索立安的粗暴促成了著名的“圣象破坏的爭論”（公元725年）从而产生了帝国政府和教廷冲突的时候，教廷的敢于抵抗，教皇的巨額进款当然是有影响的。教廷的这項抵抗政策，是由复杂的动机所引起的，即宗教的、政治的、經济的动机。但是，无可置疑，意大利的政治解放，至少罗馬城和中部意大利的解放，以及为教皇建立一个独立的世俗权，都是屬于这一計划之內的。在教皇和皇帝的冲突中，政治和經济的利益是和正宗信仰的热忱混在一起的。論性質这爭执是一个分裂叛变运动，也是要从东方帝国的控制下解放意大利——或意大利半島上尽量多的地方——的革命运动；它是一个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間的冲突，在同样程度上，也是一个矛盾的宗教見解上的爭执。利奥三世的“异端”是教皇反叛拜占廷的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原因。一句話說，“圣象破坏爭执”是两个敌对文化間的冲突，即“文化斗爭。”

我們可从下一事实，知道这項爭执是具有基本的政治經济的性質：教廷意大利点起“圣象破坏”的叛乱的导火綫，是帝国政府在意大利各省和西西里征收人头稅这一事件。在此以前，世俗的和教会的土地，都曾按习慣繳付地稅，当然，不是沒有怨言的。但是“戶口调查”是一种新型的稅，即人头稅。

沒有疑問，那主張改革的皇帝，当他制定征收人头稅及其附带的必要条件即戶口調查或出生登記的时候，曾意图把一个亏空很大的預算平衡起来；这項努力是聪明的。戶口調查，在巴尔干各省和在亚洲原已不受欢迎，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則更激起了双重的反抗；一方面它是一种新的不公平負担，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被群众所認为由一个异端統治者所加的征課。所以，抗拒这項稅收的激烈程度，就是当时人心的背离的标志。有人曾把利奥三世的命令，比諸埃及国王的杀嬰命令，另有人曾把这人头稅說成是穆罕默德教对非穆罕默德教臣民所征人头稅的模拟品。招致眞正怨恨的还在于超年度征稅这一事实，就是說，皇帝为了弥补他的收入的不足，曾企图預征下一年度的稅款，这样一来，就要在一年之內征集两次稅款。教皇对帝国的这一行动提出抗議，認为非法，并鼓动意大利各省起来反叛帝国的政权。

单就意大利和西西里来說，利奥三世对收集稅款的关心，甚于对实行他所提倡的那些不受欢迎的教义和宗教仪式。他很懂得，圣象破坏主义本身在意大利不能达到什么有利的目的。但正是由一个异端統治者来創立一种失民心的課稅，这一事实使天主教派在他們反抗中占得优越地位。教皇根据那所提的所謂异端为理由，对皇帝进行战斗；但他的眞正动机，是拒絕付稅，以及使意大利半島上佬量多的地方，尤其是中部拉丁各省，脫离帝国的統治。

由于拜占廷駐兵的軟弱无能，这种抵抗是相当成功的。教皇軍队是一批杂牌部队，包括作乱的地主，有罗馬人，也有哥特人、倫巴人；他們率領着武装随从，又以来自各城市的烏合民兵及动乱时代常有的流氓地痞，作为补充。“希腊人”和“罗馬人”即“意大利人”的队伍，在城市和乡村里互相战斗；胜者搶劫財物，以求自肥；敗者抱头鼠竄，冀免死亡。这批首領們除了自己招致的危險以外，在很多人的心头里，还时常恐怕被虐待以至于絕望的农夫会举兵反抗，

为他們所受的冤曲而报复；当时，还談不上要实現他們的权利，因为封建制度和农奴制都尙沒有发展到可制定“权利”的地步。

732年时，由于奉派討伐意大利叛乱的皇家艦队遇难，利奥三世的計划已部分挫折了。皇帝因为不能占夺在教皇控制下的中意各省，乃把西西里、喀拉布里亚、亚浦利亚、基泰、那不勒斯各教皇領沒收归入国庫，并使这些地区內的主教区脫离罗馬的管轄权。皇帝甚至企图切断南意和中意各省之間的貿易关系。一句話，他把南意的希腊即希腊化的各省与中意的純拉丁各省隔离，并使它們屈服于君士坦丁堡的压迫之下。教廷虽然失掉西西里的丰富麦田、喀拉布里亚的产木区和矿場、那不勒斯和基泰的橄欖林和葡萄园，可是它在威望和精神力量方面已无限地增长了。因为那对东罗馬帝国和对希腊文化的令人煩惱的屈从已被消除。教廷現在已站在披着宗教外衣的一个純粹罗馬的和一个全然拉丁的組織的地位，而崛起于中部意大利了。教皇已成为享有世俗权的国君，他的权力仅次于倫巴国王的权力。在下文里，我們将看到：这日子已不在远，那时倫巴人在意大利的統治，由于法兰克干涉而趋消失；教皇的世俗权因获得那消灭了的总督区的領土而增加起来，并从事实上的权力轉变到合法的权力，一个复兴的西罗馬帝国在800年时，通过法兰克王和教皇的合作而建立起来了，在帝国內，査理曼是皇帝，而教皇是最高主教。

第五章　寺院制度的兴起和傳佈

寺院制度的出現，是約在教会成立后两百年的时期。但是，寺院制度的根源在历史上可追寻到基督教紀元前很久。它的基本教規——禁欲主义和孤寂形式——可在以前的許多宗教里找出。在基督教前五百年时在印度創立的佛教，有着成千累万的和尙以及数以百計的喇嘛庙；在古代埃及有着信奉安蒙①的尼姑，在孟斐斯虔誠崇拜塞拉皮斯②，她們的信条在罗馬帝国时期曾傳布到希腊和意大利，虽然还找不出埃及境外的塞累匹斯教派隐居所的遺跡；在古代犹太人中，德拉倍太教派是禁欲主义者。虽然还沒有发現資料，可說明佛教和基督教間的实际接触，我們知道，在第二世紀佛教向西傳入帕提亚，可能也傳入亚美尼亚。使徒时期的基督教灌輸无我、禁欲和自苦精神。独身主义和童貞洁操曾由阿利振和息普立安③两人热心提倡过。

所以，当东方宗教在罗馬帝国內繼續伸展势力的时候，基督教是不可避免地要感受这些接触的影响的。起初，寺院主义的理想和教規是和基督徒格格不入的。特图良約在公元200年时著文抗議說，基督徒不是"擯弃世俗生活的婆罗門、赤脚仙④、森林隐士"，那表明在教会內寺院主义的趋势已經普遍存在了。在尼斯会議前好久，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团体在埃及已开始兴起。据傳說，"高

---

① 安蒙(Ammon)——古代埃及的主神。——譯者

② 塞拉皮斯(Serapis)——古代埃及神。——譯者

③ 阿利振(185—254年)是早期教会中很有学問和創見的人；息普立安(200—258年)也是教会的神父之一，于258年殉道。——譯者

④ 相傳亚历山大帝在印度遇見一个哲学派的信徒，他們裸体或半裸体游行，不肉食，专事冥想，他們被称为"赤脚仙"。——譯者

僧”圣安多尼于251年曾带領若干受狄西阿迫害的难民，逃往沙漠中去。索左門写道，在第四世紀，已有一本管理这些团体的規程書。无可置疑，基督教寺院制度是采自东方的异教信仰的。例如，“柱頂圣徒”[①]与圣西緬·斯替来特斯之流，都是仿效那些在希拉波立[②]庙中类似苦行僧的。

可是，教会的內在原因和条件所发生的影响，也許比起外在的暗示和接触还发生效力。寺院主义是以它的出世观念、它的忘我精神、它的严肃性来抗議那教会中已腐敗透頂的世俗性、財富和虛浮性的。“隐士是对宗教社会的一个活生生的批判。”在西欧第一个著名的异端，是西班牙的普立息力安，他屬于这一类型的一个清教徒。而且，那在后期罗馬帝国的紧張而虛伪的文明，造成了一种对新观感或新事物的渴望心理；而寺院制度就滿足了那种厭倦情緒，这种情緒正是縈繞着許多人的心头的。另有些人，对社会已覚得煩悶，对政治已覚得失望，对道德已覚得悲观；对他們来說，退隐到沙漠中去是“一个絕望的出路”。教会在这热情浪潮里，看到了一个新手段使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生活理想化。現在，殉道是不再可能了；那种火燒般的熾热情緒，固然曾在过去受苦的风潮时期激起早期信徒赴湯蹈火的决心，而現在却已逐漸冷淡了。

寺院制度起源于埃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埃及位于地中海角落，这一地位使它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間的接触地点。埃及的气候和地形又是最适合于寺院主义的生活的。在尼罗河流域，有着不很高的山岭，那里的无数自然洞穴，足供原始禁欲者以居住所。那干燥的气候和隐士自己的孤寂生活，使他不需要很多衣服，而且他所需的微少生活資料，即枣子和黍稷，也是容易获得的。第一批

① 指棲身於柱頂上的苦行修道僧。——譯者

② 在小亚細亚古代大弗里家的一个城市。——譯者

象圣安东尼①（約251—356年）和底比斯·保罗（約262—340年）那样的修道僧，当采取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不曾注意到别人也会去做这同样的事情的。但是，象这批人活得神圣和死得神圣的情况，那驅使成千累万人到沙漠去的宗教迫害，再加上瘋狂的热情，这一切使这运动大大地扩展，以致有人估計到第五世紀末期，埃及的隐士和修道僧，在数目上已几乎等于城市的人口了。

这批狂热者有时过着过度的自苦生活：他們由于把感覚和肉欲錯乱地混为一談，生活于污穢不洁的环境里，居住于蚤蝨毒蛇和昆虫之間，长夜不睡直至精神錯乱为止，吃那令人作嘔的食品，使自己半餓着，練习如癲如狂的柔軟操，象西緬·斯提里特斯所做的那样；这种状态已类似忧郁病甚至癲狂症了。从这些情况里，无可避免的会有一种組織形成起来，因而那沙漠中的隐士逐步成为修道院的修道僧。許多修道院是設立在旧庙宇或堡壘內的。图拉真在巴比倫（在后来的开罗附近）所建造的砲台，曾被派作这項用場的。差不多每一个沙漠中的綠洲都被占据着。在这些地方建造了防御工程，以防止盜賊的侵襲；而在第六世紀，帝国政府曾利用它們来保卫边境，例如，賽那山上半宗教、半軍事的著名寺院，曾扼守那里的通路，以拦阻那来自北阿拉伯半島的侵犯。

在瓦倫斯統治时期（364—378年），寺院已正式备案，并获得了領有財产之权。这些寺院以龐大社会集团的地位，又以領受大量基金的法团地位，曾作出一种社会和經济的改革；按当时的情况論，这改革是具有革命性的。在埃及这一运动达到了极端，但是，在东方的无論什么地方，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細亚、希腊、以及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島屿上，凡是寺院制度所傳布到的地方，都有着同样的效果。在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时候，罗馬帝

① 寺院制度的創始人，251年生于上埃及，隐居沙漠中修道，死于356年。按年代，和上文所引傳説中的"高僧"聖安東尼似乎不是同一个人。——譯者

国内有十五所寺院。在527年当查士丁尼登极的时候，有九十所寺院。到了第八世紀，各地村落变为人烟稀少，田野变为杂草丛生，荆棘滿地，其原因是当时有許許多多的人已离乡背井出家为僧去了。

巴錫尔高僧(329—379年)，一个有品格而能干的希腊人，曾在黑海附近的本都城，建造一所寺院。《巴錫尔規程》又規定了寺院范圍内外的生活細节；这規程后来曾以宗教会議和皇帝的許多决定，予以补充，并由查士丁尼把它們汇集編为帝国寺院的法規。"巴錫尔規程"遂成为东方修道僧团体的組織法了。

在埃及，有全城是完全由僧侶居住着的，象今天我們在西藏所看到的那样。海洛尼馬斯在《天堂篇》里，曾描写奥科倫喀斯克城的情况，他說：

[它]这样地布滿着修道弟兄們的住所，以致那里的城垣几乎被冲破了；弟兄們竟这样多。而且，在城垣以外还有环繞着城垣的寺院，它們的数目竟多到这样地步，使人会想起它們形成了另一个城市，城里的聖殿和那里的庙宇，以及它們周圍的牆垣和空地，充滿着僧侶們。那也会令人想起，僧侶在人数上不致比城里的普通居民少得太多，因为他們的人数是这样多，甚至連城門口的房屋也被他們住滿了，有些僧侶还住在城門旁的堡壘內。据說，住在城內的僧侶人数，达到五千人，而住在城垣周圍的僧侶，也有五千人。那里主教曾声称；他有一万僧侶和两万童貞姑娘受他的管轄。

根据帕雷狄阿斯的記載，在提貝易德的塔貝那附近，約住着七千个修道弟兄們，而在可尊敬的帕科密阿斯①住过的各寺院里，还住着一万三千个弟兄們；此外，还有其他寺院，其中每所寺院約有三百、二百或一百个僧侶住在一起；他們都是用双手来劳动并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在他們的服务周內，每天，有些僧侶起来后即去做他們的工作；有些人去做烹飪，另有些人去安排食桌，把面包、干酪、醋瓶和飲水瓶放到桌上。有些人，每周只吃一次。其中每个人是按照那給他的字条的指示去做工作的。有些人在"天堂"[果园]

① 埃及人，在公元340年在尼罗河的一个島上建立了第一所寺院。——譯者

里工作，有些人在花園里工作，有些人在鉄鋪里工作，有些人在面包房里工作，有些人在木匠間里工作，有些人在漂布場里工作，有些人把枝叶編成籃子和席子；有人是在編网，有人是在做草鞋，另有人是在抄写。这一切人，在做他們的工作的时候，都是依次背誦着讚美詩和聖經的。

帕雷狄阿斯遺留下来一篇文字，約写于390年，叙述尼特里亚山上的大寺院，在那里，除了几百个"世俗弟兄"以外，还住着五千个僧侶。这寺院在埃及領有几千畝冲积地的肥土。它出产大量谷物、橄欖、枣子、牲畜、羊、駱駝、馬、驢。从那里所得的一部分是用于維持埃及的教会，以及維持避难所、医院、学校等等。但是，它的大量剩余品，則是在亚历山大城市場上出售的，由于它的生产成本低和数量大，并在那里和大地主和小农进行激烈竞爭。大地主还能苟延殘喘，而小农却慢慢地破产了。

这些新状况产生了新的弊病。財富开始象潮水般地涌入教会基金內，同时由此带来了各种腐蝕的影响，在第四世紀它們竟达到了破坏教会的神圣的地步。从宗教方面看，僧侶們是激烈的狂热者，从經济方面看，他們已成为貪得无饜者。在第五世紀早期，亚历山大城曾被僧侶和游民群洗劫，这一事件对亚历山大城的貿易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那寺院数目激增的趋势，加上了僧侶們的有些奢侈浪費作风，到第五世紀中期已成为政府惴惴不安的一个重大根源。人們紛紛进入寺院，以求規避納稅，以求逃脫軍役，或者要找寻一个安逸的生活方法，依靠虔誠而又慷慨的基督徒的贈与而生活着。他們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藏匿在那里。逃亡奴隶、逃走农夫，有时也有犯人逃到那里找到庇护所。有野心的和輕薄的修道僧，杂处在忠实的修道僧之間。僧侶的个人安貧乐道的宣誓不曾防止由僧侶团体来获得共同財产，因而奢侈风气和下賤行为潜入寺院之內了。那依照寺院"規程"的生活，已成为办不到的事情。451年在加尔西頓宗

教会議上，教会和帝国政府曾共同努力糾正这些混乱状态，因而决定各寺院的基金須經主教的批准；各寺院須有适当的补助金，使它不致依賴捐款来維持；各种規程須严格实行；以及三年时期的修行学习——而这些規定，都曾被住持視若具文。

寺院制度无可避免会扩展到西欧的。第四世紀中，基督徒已采用古代异教徒到圣地进香的习慣。“圣地”和埃及，先后就成为基督徒进香的地点，而这些朝圣者乃带回了寺院制度的理想和习慣。寺院制度向西方扩展和两个重要人物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圣杰罗姆和卡息亚那斯。圣杰罗姆在他的晚年时期，曾在伯利恒为自己建造了一所隐居所，并曾以他的著作来促进寺院制度的傳布。他是一个严肃的清教徒，是第一批起来反对教会的世俗性和財富者之一。卡息亚那斯在馬賽附近的南高盧曾建立两所寺院，从那里运动遍傳于高盧全境并进入了西班牙。在第五世紀早期，那些在里維耶拉岸外的島屿，尤其是雷朗島，已由修道僧們移殖。不久，多斯加納海群島上，也群集着修道僧們。米兰·圣安布洛兹虽然从来不是一个修道僧，而他却以頌揚靜寂生活的幸福，来大力地提倡这一新运动。393年，有一个名叫詹姆士的，“来自东方波斯的內地”——請注意东方的影响——在坎佩尼亚曾建立一所离世絕俗的退隐所。在同一年，諾拉的保林，一个富裕的罗馬业主，曾出售他的財产“逃避煩擾的世俗生活，来消磨他的晚年岁月”。另有一个东方隐士，退隐在奥汾涅的山区里。当时，都尔周圍的下罗亚尔河区域已成为西欧的提貝易德①，因为那里有着大批修道僧的住所，他們在石灰岩上为自己所挖掘的洞穴，象在泥岸上的燕子窩那么稠密。都尔的圣馬丁(316—396年)这个名字和这僧侶殖民地是永远相联系着的。圣馬丁寺院的修道僧們曾力图訓練居民从事农业，

① 提貝易德，在埃及底比斯周圍的地方，为古代寺院制度的发源地。——譯者

幷分发种子給他們。

在圣奥古斯丁时代，遁世者或隐士的生活在非洲省出現了，在那里僧侶人数增加得这样快，以致奥古斯丁（由于他的拉丁秉性，他厭恶这种无秩序状况）随即着手管理这項运动。在汪达尔人来到的时候（429年），那里存在着很多寺院，常常位于大业主住所的附近。在那十年战爭的时期，这些寺院都成为避难所，因为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汪达尔人虽屬阿利阿教派，但却是尊重这些会社而不曾加以扰害的。他們之所以有这种容忍态度，是因为各地的僧侶会社，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都不是教士的团体，而是那些决心过寺院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俗人的团体。只要他們脫离世俗而对政治不进行干涉，他們在各阿利阿教王国是相安无事的。在教士生活和修道生活之間的这一区别是很重要的，应該記在心头，因为这区别一般人还不了解。

但是，西方寺院制度虽然是从东方輸入西方的，但在內容和实踐方面，根本上却不同于东方的寺院制度。东方专心于怪誕奇特的苦修形式，而西方則是重实际的。东方僧侶过着一种孤寂的生活，致力于无效果的冥想或致力于无目的的閑蕩；他們中間除了一些有志于研究学問而抄写手稿的人以外，都依靠着虔誠而不适当的捐款来維持生活。相反的，拉丁西方的僧侶們在他們的思想和行动方面，是誠恳、清醒、活潑、勤苦，幷依靠自己工作而生活的。西方人受不了象圣西緬·斯替来特斯或隐士那样的“柱頂圣徒”的行为：他們自愿流放于沼泽地上，讓昆虫刺伤，訓練他們的肉体受苦，他們或者在荆棘中禱告几天，或者弯腰曲背，繼續留在痛苦的位置上，或者大家一起在麻袋里坐几天；也受不了象圣安东尼的行为：他的皮肤“黑到象埃塞俄比亚人一样”积堆着皮垢，幷以“蝎子和野兽作为他唯一的伴侶”。

从西方和拉丁寺院制度的健全状态和效能来說，我們看出罗

馬精神和希腊-东方精神之間的基本差别。前者是重視条理和实踐的，而后者是傾向于淡而无味的神学論辯、不容忍的态度、无聊的白天梦想，以及夸大和过度行为的。但是，寺院制度在西方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严重的危險：东方影响可能占得上风。西方寺院制度依靠下列两个偉人而摆脱了这个危險：卡息奥多拉和紐西亚的圣本尼狄克。526年时，当狄奥多理大帝逝世的时候，他的一个著名大臣，也是一个富裕地主即卡息奥多拉，退隐到在喀拉布里亚的斯基拉西地方他的庄园去，把他的庄园房屋改成为一所寺院，并集合了几个虔誠信徒，他們在那里的花园里，讀書和研究，并間以温和而有益健康的运动。为了管理这个小团体，卡息奥多拉曾起草一种簡明規程，这規程和以前其他类似团体，不管在东方或西方所制定的規則是有所不同的，特别在要求劳动方面。

另有一个比起卡息奥多拉年輕，而对拉丁寺院制度起着更大影响的同时代人，就是安布立亚城的紐西亚的圣本尼狄克。据傳說，他的生存时期是約从480到543年，但是可靠的說法，只是他生存在第五世紀后期和第六世紀早期的意大利而已。在他的傳記中，我們难于区别出什么是故事，什么是历史。在那俯瞰坎佩尼亚风景秀丽的平原的突出的高地上建立的蒙特·卡栖諾寺院（520年?）是开始西方寺院制度第一次有組織运动的标志。蒙特·卡栖諾寺院曾成为意大利、高盧、日耳曼、英国和西班牙的几百所寺院的母院，所有这些寺院都是受《本尼狄克規程》管理的。依据那傳留下来的版本，这項規程是一个法典。但是，从批判的理性来說，我們有理由可相信：这原始的規程是一个很簡单的东西。它通过实际經驗获得了补充和发展；其中基本要素包括有“巴錫尔規程”，“卡息亚那斯的制度”，“阿尔兹的凱撒規程”以及爱尔兰的偉大圣徒圣科兰班的規定。凡是屬于寺院的职員，都是由住持来指派的。在有些盛产葡萄的寺院里，那看守酒窖的位置，是具有重

大意义的。按理論，住持个人只可支配着他所屬寺院收入的 1/3，应把剩余的进款，作为維持修道弟兄們的生活、发給服务工資、修建房屋、救济穷人等經費。但是，事实上住持只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負責罢了。

起初，本尼狄克制度是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約在 544 年时，本尼狄克的第一批信徒之一，格列高里·摩勒斯在罗亚尔河畔圣馬尔地方，建造了一所寺院。跟着偉人格列高里的接任教皇位(590—604 年)，情势乃迅速改变了。本尼狄克制度在意大利发展得最快。到了第七世紀中期，本尼狄克規程已通行于高盧。788 年时，查理曼在法兰克帝国內各寺院强制施行这項規程。至于它傳入英国的日期，我們不能确定，虽然据傳說这和圣奥古斯丁在 596 年到英国去傳教事件是有关联的。在西班牙，直到第十世紀才被采納。

毫无疑問，格列高里一世的偉大人格对本尼狄克寺院制度的傳布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但是，我們也須注意其他因素，特别是經济和社会性質的因素。在意大利，这运动正是在查士丁尼对哥特人进行可怕战争的同一时期。在法兰克高盧，它也是在第七世紀可怕的內战进行的同一时期。这些战爭的破坏性影响：几千几万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人，穷困、飢餓、疾病、不安全；这一切立刻产生了一个迫切的社会經济需要，各种救济办法也是由此而来的。对难民和穷人，寺院遂成为救济所、寄宿所了。

本尼狄克制度因切合于时代的需要所以应运而生，当时其他寺院因不能办到这一点而失敗了。那理由很明显。本尼狄克制度不象东方和希腊僧侶所做的那样，也不象若干西方僧侶集团似乎要做的那样，要依靠信徒的捐贈来过着懶惰的生活。从一开始，它就强調懶惰是罪恶之母，并坚持劳动的責任和自食其力的尊严性。規程中包括着下列一段：

懶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僧侶应經常做事,或者做手工劳动或閱讀聖經。这些工作时間按照季节排列如下:从耶穌复活节到10月1日,僧侶应从第一小时起,去做工作,劳动到第四小时为止,从第四小时到第六小时的时間应用于讀經……[第九小时以后]僧侶应再工作,劳动到黃昏为止。但是,如果由于地方的情况或寺院的需要——这些事情会在收获时期发生——要做較长时間的工作,他們不应認为受到不良待遇。因为眞正僧侶,应以他們的手的劳动来生活,象使徒和神聖教父所做的那样。

然而,应該仔細察看,不象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圣本尼狄克規程沒有命令、也沒有强制手工劳动,但只推荐它而已。象十二世紀的評注家第次·魯拍特所指出的那样:"劳动是容許的,或者是作为可以耐心考虑的意見提出的。"在同一世紀里,可尊敬的彼得,即克里尼的偉大住持,曾嘲笑僧侶需要用他們的手来做工这一观念,他說要僧侶做手工劳动是"不合适而又不切实际的办法"。

中世紀寺院制度为了規避安貧乐道的誓約,把龐大財产归于集体所有。不管从道德方面对这种办法給予怎样的批判,无可置疑,中世紀欧洲由于大寺院田庄的管理适当而获得了莫大的物質进步。农业是和早期日耳曼人的无定居的习惯相抵触的,而且日耳曼人的耕种方法,在和寺院田庄的精細經营制度比較之下,是粗魯簡陋的。甚至貴族的大世襲領,也沒有管理得那么好。有些中世紀寺院原有着伽图、瓦魯科琉麦拉和帕雷狄阿斯等所著的农业書;后来,寺院也編写了自己的农业指导和农业方法一类的書籍。大貴族地主也注意那些可使他們的土地开墾得更好的办法。最后,在十三世紀,当有力稳定的政府对西欧的封建混乱状况占得上风的时候,田庄管理手册以及根据这些手册所写的农业論文,开始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流行了。有一个近代作家告訴我們說:

每一所本尼狄克寺院,基本上便是一个模范田庄;它保存了罗馬田庄的

外表，并依照习慣的方法进行农作。关于谷物和畜种的改良，我們不可能区别什么是由僧侣們所作的，什么是由罗馬人輸入高盧和不列顛的；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教会殖民地在原来耕种方法有被全部遺忘的危險的地方，把它保存下来了。

我們知道，寺院制度曾把关于农业、牧畜、种果等等的罗馬科学方法通过中世紀保留下来（对于这些方法日耳曼人原不熟悉，后来他們也是从教会学来的），但是，除此之外，寺院当扩展它們的土地的时候，还抽干了沼地，清除了森林，并且开垦了中世紀欧洲的大塊荒地。英国格拉斯香柏立寺院的基地，原是一片茫无边际的沼泽地，經过好几百年它变为島上一个最富饒的农业区。东方諸州的"分兰区"① 原来全部都是沼泽地。当伊里大禮拜堂創立的时候，教会房屋是建造在寬广几哩的沼泽中的唯一的高地上的；因为那里盛产鰻魚(eel)，所以該地就叫做伊里(Ely)。今天这塊地已是青枝綠叶的田野了。可是，在一本古旧的《伊里志》中有一首短詩，指出在"諾曼人征服"之前，著名国王卡紐特是乘船到过伊里的：

"伊里僧侣快乐地唱着歌，
卡紐特王盪浆前进。
'朋友們，划船向岸靠近，
听听我們僧侣的歌声'"。

在开垦荒地方面，寺院制度在中世紀比起任何别的力量有着更大的影响。僧侣們由于自动找寻离世絕俗的生活，乃深入森林的深处；而这些森林地逐漸被清除而变成为可耕种的田野。他們又因力求山区間交通迅速，在鞍形峯巅上通过隘口建造道路；他們还抽干沼地，建筑堤岸。一句話来說，寺院制度基本的經济职能，在于农业和簡单工业以及在于殖民。在十二和十三世紀中，息斯脫西安教派② 的历史也是这样的。下面是給一个諾曼住持的通

① 分兰区(Fenland Country)，意即沼澤地区。——譯者

② 1098年法国僧人罗柏特(Robert)在息斯脫西安創立的教派。——譯者

告:“你正在建造房屋的那个地点,是不适合僧侣們居住的,因为那里既缺少飲水,而森林又远在他处。这两个要素是为一个寺院生存的絕对必要条件。”

寺院中每天的日程如下:在参加早晨祈禱仪式后,僧侶們集合在牧师会所。住持給每一个人分配当天他应做劳动的数量和种类。其次,举行几次簡短的禱告,祈求他們工作上的賜福。于是弟兄們拿了工具,两人一排地前进,不声不响地走到田地去做所分配的工作。从耶穌复活节到10月初,他們从早晨六时起这样地做工作,有时做到十时;有时做到中午,工作时間的长短是取决于季节的。圣本尼狄克不能容忍东方寺院制度所实行的各种过度行为和狂热的严肃方式,他是一个头脑明晰的罗馬人,不贊成这种事情的。伙食虽然簡单但是丰厚。吃肉是有限制的,当然在一个地中海区国家里肉类不是很缺乏的。对于魚类、葡萄酒或奶油沒有限制。僧侶每天吃两頓飯,每頓他可有八盎司面包、一品脫葡萄酒、两盆蔬菜加上水果。僧侶的衣服用羊毛制成,来适应季节。当然,当寺院制度傳布到北欧国家的时候,有些食品的更动成为必要了。最显著的是,在有些气候上不可能生产葡萄的国家里,遂以啤酒来代替葡萄酒作为飲料。

象古代耕种方法由僧侶保存下来的那样,古代文明的各种工业也是由他們的作坊保存下来的;他們所保存的,在程度上比起世俗貴族庄园所保存的还大。僧侶在制造啤酒方面,虽不能說是有所发明,但至少可說是有所改进的。制造响鈴是寺院的一种特殊工业;其起源可追溯到凱尔特人。制造鉛管是寺院的另一种几乎专有的工业。埃塞尔烏德曾构造一根放水鉛管,把它埋在僧侶宿舍的地下。寺院也是最早使用泥灰石作为肥料的。

在墨洛温时代,教会和寺院土地上也許很少出产釀酒的葡萄。那繼續不断的战争使葡萄园受到了破坏。而且葡萄酒的貿易,象

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随处会碰到阻碍的。在"罗馬和平"不复有效之后，大貴族在他們的土地上开始征收私人性質的过路税并从事勒索，这种情况在法兰克帝国的早期繼續存在着。他們在港口、渡头、桥梁——随便什么可能的地点——勒逼商人繳付捐税，使貿易受到摧殘。但是，教会和寺院早已开始获得了免税特权；这使它們在葡萄酒貿易方面取得巨大的便利，象它們在葡萄酒釀造方面所已享有的那样。大部分葡萄酒一般是在出产它的庄园里消費了的，可是，有些最好的葡萄酒（而最好的葡萄酒一向是从自寺院里来的）是在别处出售或甚至运到外国去的。波尔多、南特、盧昂、布倫周圍的各寺院和西班牙、爱尔兰和法里西亚进行着葡萄酒的貿易；在这全部时期里，英国人只知有法国的葡萄酒。葡萄酒在圣得尼斯市集上售給从全国各地来的商人，甚至从不列顛和法里西亚来的外国人。但是，那些长途跋涉、經营最名貴商品的商人，都是从教会和寺院里来的。在僧侶中間，禁欲主义甚至节約原則跟着財富和奢侈风气日益增长而已垮台；他們有着一种特殊商人，即"教会商人"，来替他們处理产品，来作为他們的商业代理人。其中有人为了这項貿易曾远到拜占廷和东方去；当时，在欧洲水陆沿綫的內部貿易方面，特别是在葡萄酒貿易方面，这种商人是占着重要地位的。現在我們有一項資料，可証明在墨洛温时代曾有大量勃艮第葡萄酒是由屬于吉美厄治、圣汪列尔和非坎普三所寺院的"商人"装运，沿塞納河下行，經过盧昂出海的。

然而，本尼狄克制度不是沒曾經过竞爭而取得胜利的。在公元600到800年的两世紀中，爱尔兰寺院制度就是它的劲敌，而这一运动是有很大意义和很大影响，所以我們必須在下面談一談。就爱尔兰的影响說，它的性質是奇异的，甚至可以說是独特的；其原因大多是由于这民族的純粹凱尔特作风。在所有的西欧国家和民族中，只有爱尔兰从来不曾成为罗馬帝国的一部分，虽然罗馬人

从阿格利柯拉在維斯帕西安时代周航不列顛群島以后，已經知道爱尔兰。結果，爱尔兰人发展了一种脫离外来影响的文明和文化。古代凱尔特部落曾达到它的高度发展。每一部落各有着在它的酋长統治下的自己的領土；部落就是它的政治和社会集团。在烏尔斯特的，有奥頓涅尔、奥尼尔、奥杜格尔多斯、奥汉隆斯各部落；在康諾得的有奥哈拉斯、奥克里斯和奥康諾各部落；在林斯德的有奥法勒尔和奥托尔斯两部落；在閔斯德的有奥德威尔斯、奥康尼尔各部落。这些領土原来都是小"王国"而后来变成为州县了。在这些地区，部落与部落曾进行着战爭来夺取控制权；它們也曾組成部落联盟，来夺取对其他部落領土的控制权。全爱尔兰"国王"大体上是一个傀儡；而他拉是一个想象上的、感情上的首都，不是一个政治上的首都。早期爱尔兰有着一部精密法典，即著名的"布里昂法典"。当时，社会差别已很显著。私人財产主要在于牲口。土地是屬于部落的共有財产，或者屬于部落的一族的財产。农业未曾达到高度的发展，因为这地区是滿布着森林和沼地的；但是关于工业技术，象編籃、制革、制造金屬器，特别是制造金飾品这一类，爱尔兰人表現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水平。古代爱尔兰人的歌謠、故事和詩有着高度想象力，充滿着神話和幻想，注定要对中世紀文学发生一种深刻影响的。

"布里昂"是执行法律的法官的名称。詩人的地位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常常附着于酋长的宮廷，他又是一个哲学家、編年史家和修詞学家。事实上，詩人就是布里昂。詩人或布里昂是执行法律的。部落的世系、部族的历史、君王的大財产和浪漫史，都写成詩歌来背誦的。准备做一个詩人，是一个長期而又艰苦的教育，并且需要一个专門化的教育。事实上，对一个兒童来說，获得所謂"文学的修养"意味着对他是很有好处的，是将来发达的机会。

尽管古代爱尔兰和大陆或罗馬帝国在政治上从沒有过联系，

但是在罗馬帝国的后期，它和它們在商业上联系的痕跡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在第四和第五世紀，罗馬商人似乎从高盧曾直接航行到爱尔兰島以及爱尔兰海面上的不列顛各港口。圣巴特里克曾乘那装运猎犬、陶器、貂皮、提籃开到波尔多去的一只船，从爱尔兰的俘囚里逃出。这項商业关系在罗馬帝国灭亡之后，还是存在着，而且，在蛮族王国时期，确曾更加活跃起来。在公元600年前时，圣科兰班也曾乘过一只上面所述类似的船渡过海峽到达布勒塔尼；当他被逐出法兰克王国而送至南特的时候，他在那里曾看到一只装着爱尔兰商品的船。圣菲力柏特是第七世紀的人，他在罗亚尔河口訥穆提尔島上曾建造一所寺院；他的傳記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一只爱尔兰船，“滿載各色各样的商品”怎样駛入了港口。

但是，还有一件比起这大陆和爱尔兰間的商业关系更重要的事情，即是基督教的傳入爱尔兰；这为爱尔兰的寺院移民和向国外傳教鋪平了道路。現已确切証明，基督教在第四世紀从不列顛傳入了爱尔兰。有一个罗馬傳說告訴我們，在国王里坎尔时代（429—458年？），教皇聞悉有基督徒在爱尔兰，乃派遣了帕雷狄阿斯到那里去（431年）。圣杰罗姆在高盧曾遇到过爱尔兰基督徒。图尔的第一位主教可能是出身于爱尔兰的。但是，帕雷狄阿斯的使命似乎是沒有成功的，也許因为他不懂得爱尔兰語。爱尔兰的真正基督教化，是从圣巴特里克开始的。他出生于不列顛西南部的一个罗馬化的不列顛族。他被爱尔兰海盜所捕获，在爱尔兰过了六年的俘囚生活（約405—411年），后来逃到高盧，在雷朗和奥舍耳讀書，而在432年时回到爱尔兰去。爱尔兰社会的部族性質立刻把它的烙印蓋在爱尔兰寺院制度上。在一所寺院之內所有的同伴，往往都是血緣的亲族，外族人是不得參加的。正是这种部族性質可說明怎样并为什么在爱尔兰人中，寺院組織比起主教組織要强得多。整个部族都住在寺院里，这些寺院看来就是市鎮。

关于爱尔兰在第六及以后的几世紀中所出名的学术，不能归功于圣巴特里克的。他缺少教育，他的拉丁文又是粗淺。在他的《懺悔录》里，他告訴我們，他不是一个有学問的人。几百年以前，有一个抄写員，即从《亚尔馬志》中抄写他的《懺悔录》的人曾說过，他以前所抄写的部分，是从"圣徒"亲笔手稿中抄下的，但他覚得手稿很难讀，因为它又古旧又写得不好。如果这是确实的話，那末圣巴特里克看来不会把佛吉尔和西塞罗的学問傳入爱尔兰的。任何伴随巴特里克的高盧人或不列顛人，会把古典学术带入爱尔兰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第六世紀末期，烏尔斯特的班哥和亚尔馬以及南爱尔兰的林斯馬尔，都是爱尔兰的最著名又最兴盛的寺院。那里的学术标准比起在偉人格列高里时代的罗馬城內的标准，或比起高盧的学院里的标准要高得多。这种学术是从第四世紀的学术无間断地发展而得来的。它怎样会傳入爱尔兰以及是誰把它傳入的，已是历史上的一个謎。但是我們几乎可以断言，我們完全不能設想古代爱尔兰的古典学术是由高盧的、或不列顛的傳教士带来或提倡的。問題的解决关鍵，似乎是約在公元400年时，也許由于406年汪达尔人大举入侵高盧的結果，有些高盧学者曾出亡到爱尔兰去。高盧的文法学家佛吉力阿·馬洛曾有若干著作流傳下来；他似乎曾是土魯斯学院中的一个屬于异端派的修詞学教师；他对爱尔兰的早期古典学术确是有影响的；可能他一度曾是逃亡到那里的一个难民。他生存在汪达尔人入侵和西哥特人征服南高盧的时代。

学术就是这样地傳入爱尔兰的——通过文人而不是通过傳教士的。圣巴特里克在他的《懺悔录》里曾說过，这些高盧文法学家，是"从高盧来的，他們是屬于异端派的修詞学教师，由于学术高超，自命不凡，以輕蔑嘲笑的态度对待着"不学无术的圣徒。这些高盧人一定多半是住在南爱尔兰和东爱尔兰的；換句話說，是住在閔斯

德和林斯德的;这两省由于它們面临大陆和不列顛的地位,毫无疑問,經常是爱尔兰的文明中心。这些难民正是来自一个罗馬化的凱尔特国家;也正是到了一个純粹的凱尔特国家。但是除了学者以外,似乎还有别种人从高盧逃亡到爱尔兰的。因为不久我們就可看到在爱尔兰酋长的支付俸给单上有着高盧傭兵。那带入了爱尔兰的新学术是屬于最好的学术傳統。正在大陆上古典学术开始消逝的时候,它被移植到爱尔兰去。在第六世紀末和第七世紀初,当爱尔兰僧侶傳教士开始涌入法兰克高盧和日耳曼的时候,僧侶的愚昧无知和教育的退化情况使他們感到惊訝。《科兰班傳記》中說,"在那个时候,由于主教的疏忽,国家里几乎不复有基督教的信仰了。"

都尔的格列高里所描繪的墨洛温朝僧侶的情景,是令人痛心的。有两个主教戴着軍帽,穿着甲冑,进行过战爭,而在和平时期他們則是不折不扣的强盜。有一次宗教会議曾罢免他們,但是,他們"表演悔过的滑稽剧后"重新复位。法兰克僧侶恬不知恥地干着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勾当。他們利用"救济灵魂"这句話来勒索金錢或騙取土地贈与。因为河水不会上漲到比它的源流还高的水平,所以我們不能期待法兰克的人民大众会升到高出于僧侶的或甚至等于僧侶的水平。法兰克人是披着一襲基督教薄薄的外衣的异教徒。当特德柏特为反对哥特人和拜占廷人而侵入意大利的时候,他的士兵曾以妇孺的身体投入波河作为人体祭品,向倭丁神① 献媚。关于傳教工作,墨洛温朝教会从沒做过什么。在些耳德河彼岸,在下謬司河流域,在国王有些庄宅外不多几哩的地区,异教还占着最高地位。

爱尔兰人的冲动的本性,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热情,以及那使

① 星期三(Wednesday),即是从倭丁神(Woden)命名的。——譯者

爱尔兰人足跡遍世界的爱好漂泊和冒險精神；这一切都使爱尔兰人象潮涌般地进入了苏格兰、英格兰和高盧。《圣加尔奇跡录》中正确地說，游历是符合爱尔兰人的本性的。有一个法兰克史家告訴我們說，从他的柳条編成的小袋，可在远处認得出爱尔兰人来；因为法兰克人所带的服装，是放在皮袋內的。

但是，爱尔兰人之所以向外迁徙，一部分是因为有着經济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爱尔兰人向来是一个繁殖力强的民族，我們有理由可認为，人口的压力連同与此俱来的飢餓灾难，也是一个因素。爱尔兰农业的落后状态以及它的广大森林区和沼地，使这情况更严重起来。圣科兰班傳記的作者描述了在圣科兰班兒童时期爱尔兰的和平状态。可是，我們不得不認为，他是为了圣徒的目的，加以理想化了。到第八世紀，爱尔兰确然是在部族对部族的連綿战爭状态中，各部族力求剁夺对方的領土，或者如果办不到这点，至少要赶走对方的牲口。爱尔兰基督教似乎不曾遏阻这种好战的傾向；相反的，爱尔兰僧侶們也参加了他們部族的軍事出征，甚至寺院和寺院也曾打起仗来。試看下面一段記載：

公元763年，克朗馬克諾厄寺院团和杜罗寺院团在阿卡莫因地方进行了战斗，在那里頓尼尔的兒子德尔莫德·达夫以及杜罗寺院团的二百人同被杀死。麦卡德的兒子布勒塞尔和克朗馬克諾厄的寺院团贏得了胜利。

另有一段記載，在816年时，科倫西尔的“寺院团”曾被打敗，后来他們到他拉，“咒罵国王”。爱尔兰軍队对别的王国內别的部族的寺院和僧侶們无情地进行洗劫和屠杀。克朗馬克諾厄、基尔得尔、克洛那德和阿尔馬各寺院都曾遭受过爱尔兰基督教部族軍队的搶劫，在那里僧侶和他們的部族弟兄們并肩作战。在第九世紀，閔斯德国君斐林，虽然是一个住持，也曾洗劫烏尔斯特的寺院，并杀死了它們的僧侶和教士們。

爱尔兰的僧侣，象东方的僧侣而不象西方的本尼狄克派那样，是傾向极端严格和严肃性的。爱尔兰寺院生活的特点，是对灵魂救济的热烈追求和內省方法，因而它成为傳布苦修和懺悔思想的主要力量。特別是他們的悔罪苦修制度，这制度通过英国教会傳入欧洲大陆，它和古代天主教会的制度大不相同，并对中世紀教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于爱尔兰懺悔制度的形式也是这样的。格列高里一世完全不曾注意到凱尔特型的悔罪苦修的鍛鍊。无須用言語来指出那对中世紀早期那样的一个貪婪强暴的社会所发生的节制影响；因为这制度一定会发生了这样的影响的。教会对社会性的和刑事性的犯罪所征收的罰款和所加的处罰，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不仅对蛮族法典給予了补充；而且它們常常在压制和懲办犯罪方面有着更大效力。

爱尔兰圣徒的《傳記》，特别是圣科兰巴、圣科兰班和圣加尔的傳記，是屬于我們所可获得的最生动而最有价值的历史資料。其中第一人是改变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信仰的人，其他两人是在大陆上的傳教士。圣科兰班的"规程"是从爱尔兰早期的僧侣制度流傳下来的唯一的爱尔兰寺院规則；它虽然不是在爱尔兰編写的，但无疑地是反映爱尔兰寺院傳統和习慣的。在第七世紀早期，爱尔兰寺院制度和本尼狄克寺院制度以竞爭者的地位，在法兰克王国內相逢了。这个或那个寺院制度不久替代了或吸收了圣馬丁的古老高盧寺院制度。但是，須經过两百年时期之后，本尼狄克派才能替代或吸收爱尔兰的寺院。在这一时期中，爱尔兰僧侣在佛日山脉、在瑞士、在南日耳曼以及在北日耳曼建造了寺院。阿尔卑斯山上的大山峰由于它們的荒野和隔絕人世的地位，特别吸引了他們。如果説正是爱尔兰寺院首先把基督教和文明带入了瑞士，那倒不是夸大其詞的。

《科兰班傳記》差不多可説明爱尔兰寺院在大陆上扩展时期的

每种特点和状况，为了这个原因，这里引述几段摘要。从下面一句話，可看出愛尔兰僧侣的热愛漂泊，其中也夹着傳教热忱。“他住在寺院好多年以后，向往到外地去，来服从上帝給亚伯拉罕的命令：‘走出你的国門，离开你的亲屬，离开你父亲的家，往我将給你指出的一塊地方去’……因此，集合了一群弟兄們以后，……他們乘船渡海，到布勒塔尼海岸去。”在法兰克王国，科兰班曾受到王后布綸喜德斯的欢迎。“在那个时候，有着一片广大荒野，叫做佛卡塞〔佛日〕其中有一座久已廢圮了的城堡，叫做安那格拉特〔安尼格勒〕，”在那里就建造了一所寺院。这里是孤寂荒野，岩石重叠，在它的周圍森林中狼熊时常出沒着。这城堡原是一座罗馬的砲壘，在第四世紀建造，堵塞佛日山脉的山路，以防阿勒曼尼人的侵犯的，当时他們已渡过上莱茵河而蹂躪着亚尔薩斯。这地区的地主貴族，态度和藹，給这小小居留地以粮食和种子，直至那里能生长谷物为止。

由于僧侶人数的增加，科兰班去找寻另一地点，而在盧索維姆他找到了一塊地方。“这里有着大批石象豎立在森林中，它們在古时是受到可怖的仪式崇拜的。”但是，这地址不是一所古老的异教庙宇的地址，象傳記作者所設想的那样。不是这样，那里在古时有一所罗馬浴場，而这些“石象”不过是那些一度曾装飾过浴場的破碎了的雕象。跟着罗馬文明的衰微，这地方已变成廢墟。盧賽威尔① 的起源就是这样。但是，这地区不久变为人口稠密了，因为有大批移民流入，他們清除森林，开墾荒地并建立村落。他第三次去找寻一塊新的孤寂的地点，而在上摩塞耳河流域的丰坦那（丰坦）找到了，在那里有泉水涌出。在那里砍伐树木，开墾土地，播种谷物。弟兄們中有四个名字是列出的，很有趣味。三个是愛尔兰人，一个是苏格兰人。但是这地区的地主的名字是瓦尔德倫，这名

① 法国上梭恩州的一个市鎭。——譯者

字表明了他是屬阿勒曼尼族的日耳曼人。有人告訴我們說，僧侶們在手工劳动的时候，是戴着手套的。“这些手套，高盧人叫做‘Wanti’,”这是近代法文手套“gant”这一个字的来源；他們制造了啤酒，“啤酒是从蒸煮小麦或大麦所滴下来的汁液来制成的，除了爱尔兰人以外，所有的北欧部族都喜欢啤酒甚于其他飲料。”僧侶們也建立果园和葡萄园，还制造鞋子和鞍具。

在关于科兰班的小松鼠一段記載里，可看出爱尔兰人那种在他們周圍豢养小野兽的嗜好。爱尔兰寺院照例飼养着小鹿、土撥鼠和大鴉（他們偸东西的伎俩是很有趣的）以及小熊。圣加尔有一只小熊，它习慣于搬运他的木柴，并从他的手里吃东西。在一首日耳曼人中最古的詩即《熊的生活歌》(Ruodlieb)中，說及有会舞蹈的熊。这首詩虽是用拉丁文写的，但正确地反映出日耳曼人的风俗和习慣。瑞士人喜欢小熊的风气以及伯尔尼地方的著名熊井，无疑地是受到阿尔卑斯山区爱尔兰僧侶的影响而产生的。

最后，对寺院制度，我們将作怎样評价呢？这制度曾被热烈地拥护，也同样被猛烈地譴責，但是从几百年的长时期看来，寺院制度应予拥护呢？还是应得譴責呢？象一切人类制度一样，它决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常常是腐化的；既不是不可批評，也不是可以不屑一顧。无可怀疑，它尽管不符合我們的时代精神——虽然寺院制度在基督教世界里还有其地位——却是中世紀精神和状况的一个自然表現。如果只靠着容忍，或濫用权力或欺詐，它不会延續了这样久长的。它一定能够适应时代的若干方面需要的，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它不会只是通过单純的慣性或者純粹消极力量的影响，而能够持續下去的。从近代标准来判断，寺院制度的根源是自私自利的，因为僧侶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用隔离世俗的方法来使自己的灵魂不受污染，用禁欲的方法来使自己的灵魂洗去渣滓。可是，寺院还发給救济品，給飢餓者以食物，給无衣者以衣

服，給孤独者以安慰，給孤兒寡妇以保护，給旅舍和学校以維持費。是否可認为这一切事情都看作“功德”去做，要使施捨者可在天堂获得光荣呢？还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着純粹的慈善心、眞正的人道主义呢？

不管寺院制度的基本动机怎样，很少人会否認僧侶在“黑暗时代”对社会的服务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第六章　东罗馬帝国(395—802年)
查士丁尼(527—565年)*

在上面一章里，我們叙述并分析了古代文明的衰落。在西欧方面，罗馬国家的文明遺跡虽然在它崩潰以后还得留存下来，而且在和教会的及日耳曼人的制度相混合下，形成了新社会、新文明、新政治集团，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看，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在东方，罗馬帝国經过整个中世紀时期，繼續存在着，按傳統和政治制度，它是罗馬的，但按語言和文化則是希腊-东方的或希腊化的。皇帝的正式称号，用“Romaikos”① 一字来表明这一双重性。大批日耳曼侵犯者曾經过它的各省領土內，但沒曾定居在那里。东欧和西亚方面，沒曾感受到那个长期的晦暗状态，即象西欧所知道的那个大倒退的状态。我們在东罗馬或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所看到的历史繼續性，是一个最动人的偉大历史事实。不是說，它的历史經过几世紀的悠长时期繼續停留在不动的或靜止的地位上。拜占廷帝国在几百年时期中，无論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是有着深刻变化的。但是，問題是政府和文明能胜利地控制着所有的反对勢力和革命，而无間断地“延續着”。拜占廷帝国对外来勢力的抵抗力或同化力以及它复原的力量是很大的。拜占廷是罗馬帝国在东地中海的一个延續。在这几世紀中，君士坦丁堡还是卓越的首都、国际的樞紐、东西交易的自然中心。尽管有战爭和外敌的侵犯，它的商业关系未曾中断过。由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

---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2頁。

① 这个字意即罗馬皇帝，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合成的。——譯者

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轉运的利凡得产品，甚至在最混乱时期，仍然能达到西欧的市場上。哲学理論、艺术、文学和法律也跟着商人的足跡而来。由此可見，商业是旧世界和新世界間的、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間的紐带，也是那些流傳下来的文明思想的轉运工具。

但是在这項活动里，对欧洲来說有威胁，也有利益。因为当欧洲文明陷于"大移动"剧痛里的时候，古代东方文明以及那差不多早已被亚历山大帝的征服所抹去了的古代文明的記忆在世界上重新抬起头来，开始摆脫"希腊化"的桎梏。薩薩尼王朝統治下的波斯人、叙利亚人和埃及的科普特人复活了他們对民族傳統的回忆；东方象在亚历山大帝以前一样，又成为一个反对西方思想的文明舞台。第五和第六世紀的叙利亚人是欧洲商业上的霸主，他們在意大利、高盧和非洲的各大城市里所建立的殖民地，成为他們的特殊观念日益向外扩展而且侵入西方的中心。在这时期，服装、风俗、信仰、艺术紀念品、故事，即人类活动的各种形式，都盖上了东方的印章。到第六世紀，东欧洲已屈从于来自东方的逐步侵犯，而它的后果是深刻的。在东方服装的采用方面，在东方风俗的滲入方面，在以法律推行东方社会制度方面，在消除那些不曾順利地生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罗馬-拜占廷制度方面，东方国家宣布了它們恪遵不变的东方。在一千年时期中，君士坦丁堡是反对这項从东方兴起来的潮浪的屏障。

現在，我們正在开始認識到，拜占廷帝国对西方文明所作的巨大貢献，从查士丁尼时代到十字軍东征时止，关于一个司法行政的偉大制度，关于希腊文学，关于商业、工业和艺术，在君士坦丁堡遺风犹存。尤其是巴尔干山之南和維斯杜拉河之东的文明乃是君士坦丁堡的产兒。我們开始在摆脫着西方資料，即图利的西方商人、有成见的西方教士、嫉視拜占廷文化的西方学者他們的著作上的

偏見。东罗馬的历史有它的雄强时代(即第八、九、十世紀及十一世紀的一部分)以及它的繁荣和力量,我們应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它。

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为什么作为拜占廷文化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当所有的其余世界受着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或阿拉伯人的蹂躪和侵扰的时候,还能保存文明并发展这样丰富的遺产?主要是因为它的沿海地位。君士坦丁堡靠着海生存,靠着海維持,最后也因为海而复亡。它的地位对于进攻退守两方面都是理想的。只要它的水师封鎖了博斯普魯斯和赫勒斯滂海峽后,它的三方面就成为不可迫近的地方,于是它可从容为那保护西北方的长城布防了。海面曾使君士坦丁堡成为牢不可破。而在进攻方面,海面給它向任何方面攻击的机会,向北也好,向东或向西也好。

但是我們应注意的,主要还不是海面对一个被圍的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而是君士坦丁堡的沿海地位对貿易上的影响。我們所以談及别的方面,只是因为在下面的討論中,不要把这个城市的巨大工商业即它的財富所在,看成它的力量的唯一源泉。的确,除了我們必須予以相当重視的一个有利的攻守地位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那就是在危急时期有出任艰巨的有才干的人以及皇帝在宗教制度中所占优越地位的重要性。象这个城市的軍事地位一样,这些因素是重要的。

那长城背后的权力,就是使帝国軍队如此强大的权力、給这城市以軍餉和給以世界地位的权力,是从帝国的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和工业的力量得来的。自从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的最有力量的和最輝煌的朝廷所在地后(这朝廷由于采取了东方的奢侈风尙,愈加輝煌),东方的商品和宝物集聚在它的城垣之內。从来不曾有过一个首都比君士坦丁堡占着更便利的地位,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商业城市。君士坦丁堡不仅是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島屿的市場;而且利凡得是它的屬地;叙利亚和埃及繳納貢賦;它的商业

利益远布到中国和印度。那条在亚伯拉罕时代已有几百年之久的大商路是从亚洲而来越过波斯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原是以腓尼基人的太尔港为它的西方終点，而現在它是以君士坦丁堡为終点了。那位于三大陆的十字路口的、紅海商路頂端的亚历山大城也把奥馬玆和印度的財富倒入了它的腰包里。东罗馬帝国各城市人烟稠密。君士坦丁堡至少有五十万居民，甚至号称百万。它的收入預算証明它有数量龐大的資金。有人曾估計，帝国政府的收入在它的极盛时期，达到了現代法国貨币三亿法郎，等于六千万美元。

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組織得那么稳固或那么精密。“地方城市的进取心和主动性由于中央政府的全能性質而消沉下去；而且那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制度引到同一的結果。各方面都向君士坦丁堡求得指示和保护。”社会組織被看作一个龐大的行政机构，里面每一个人有他的作用，即使不是同样重要的，也是同样必要的。各个公民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由他自己所选擇的、所提議的。国家对个人实行控制，指定他应站的地位，并尽力保持他站在这个地位。个人人格是不加考虑的；臣民只是在政府龐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輪罢了。个人由于必要和責任，甚至也由于宗教，不得不服从国家的管理。帝国的立法，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立法，都引到这同一的結果：把所有的社会活动集中于政府手里，为了实現这个目的，建立了各种机构，目的一旦实現后，則以不可更动的組織来保持这种情势。

这种制度是起源于政府的財政需要，在这一方面拜占廷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同于今天的那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后一种国家在它的活动里被看成是一个施惠的和开明的行政者。帝国为了获得必需資源来滿足国庫日益增加着的需要，为了祛除那由自由竞爭所产生的生产和分配上的波动方程式，为了便利政

府的行政工作，把一个大民族所有的各种社会和經济活动都縝密地管理起来。不幸，象柏立所說的那样，“在古代社会的历史上任何方面，就現有的紀录来說，再也沒有象它們的工业、它們的商业和它們的經济使我們那么样地如墜五里霧中。”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宮廷阴謀写了这样多，而关于它的文化和經济却写了这样少，这正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第五世紀，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是一个剧烈的过渡时期，可是在西方，正当天平的一端向下傾斜的时候，在东方，天平的一端在一度急降以后，旋即上升了。

在狄奥多西大帝死后(395年)，帝国即告分裂，此后七十五年間，对东方各省說来是一个衰弱、腐敗和悲慘的时期。它們曾遭受西哥特人、匈奴人和东哥特人的蹂躪；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无能，政府的腐敗，对处理日耳曼移民政府未能守信，它那使乡村人口減少、使經济破产的經济政策以及它那依靠以蛮族制蛮族的办法。虛弱和腐敗是第五世紀大部分时期的特色。当时，政府不能擋住蛮族侵入的洪流，因而出現了象芬雷所描繪的那幅慘象。多瑙河南岸的农业和人口几乎都被消灭。色雷斯和馬其頓人烟稀少到这样地步，以致那里开始不用本地古代語言。一般人已很貧困，因而商业蕭条，甚至以前希腊富商的生活标准也相应降低了。在若干省內，上層阶級已被肃清，因为在丧失奴隶和农奴后，他們就不得不放弃他們的土地，或者他們成为純粹务农者。由于普遍的貧困状态，城市也衰敗不堪。象公路和桥梁一类的国家財产，都是任其腐烂下去而已。

这些灾难固然很大，但在东方不象在西方那样地普遍流行着，从这里可看到东方帝国所以能有較大持久性的一个理由。特别是这些灾难的影响，不曾达到这样有力的地步，致使中等阶級破产，并使大的阶級形成起来。在第五世紀中，西方各省的工商业果然

已陷于破产，但地中海貿易还在希腊人手里，而从这項工商业以及从色雷斯矿业所集聚起来的財富，使皇帝常常能够賄賂蛮族，以求免除部分的侵犯。其次，在东方沒有象在西方那样存在着有勢力的异教貴族来破坏政府。“在希腊人社会組織中，民間党派曾和基督教联盟，給社会灌注了那种挽救东方帝国的力量。”还有一个事实，也是有助于这項挽救工作的，就是在狄奥多西二世死后(450年)出現了两个主張改良的皇帝：一个是利奥一世(457—461年)，他放弃了接受蛮族人参加軍队的政策，并开始从帝国内招募刻苦耐劳的本地人当兵。另一个是阿那斯塔細亚(491—518年)，他为了他的緩和的宗教政策，曾被宗教作家所歪曲；但是就他財政管理的成績来說，他是值得表揚的。他曾撤銷那对工业有破坏作用的金銀稅，減輕什一稅，并修改由市民团体負責收稅的麻煩制度①。“在他的領土以內凡是遭受过敌人侵犯的城市，他常准予免除七年的全部稅款。”他曾拒絕“波斯王中之王”庫波德的訛詐，庫波德向他要求补償那为反对“白匈奴人”保卫高加索山路而蒙受的損失；他声称，这項債务应由两个文明帝国共同負担，繼即发生战爭，他虽然沒曾贏得光荣，但至少也沒曾带来恥辱。凡是要懂得历史和地理的人，必須注意这些山路，因为它們是屬于历史上最著名的要冲一类。一条是达里厄尔山路或伊伯里安大門，通过高加索；另一条是德尔朋山路，位于高加索大山脉的东端，在山与海之間的狹路。在前一条路上，今天还可看到一个很古老堡壘的遺跡，据傳說这些堡壘是由大流士和亚历山大帝所建造起来的。阿那斯塔細亚的偉大建設工程，是那从瑪摩拉海到黑海五十多哩长的“长城”，这个城垣注定要在拜占廷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

当第五世紀过渡性时期的危險过了以后，帝国在查士丁尼

① 从市民团体(curiae)負責征收城市稅制(The curial system)改变为由总督委派的稅吏(vindices)收稅制。——譯者

(527—565年)的长期統治下，重新获得了坚固立脚点。我們很可以把查士丁尼看作罗馬帝国的重建者；他对內曾規定帝国結构的性質，对外曾树立帝国边境政策的路綫；他曾賦予帝国以形式和精神，而帝国曾繼續保持着这种形式和精神，直到它在千年以后灭亡为止。

查士丁尼的政策是一个复兴帝国的偉大計划，对外方面，它在西方采取了征服和扩展的策略，在东方采取了防守疆界的策略；对內方面，它采取了行政改革的措施以及对帝国各种資源采取行政奖励的措施。关于西方，我們已在叙述汪达尔、西哥特、特別是东哥特各王国的后期历史里講过。本章里我們将专講东方了。

东罗馬帝国是一个海洋性兼大陆性的国家。它包括有欧洲的巴尔干半島、亚洲的小亚細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非洲的埃及和利比亚。它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海上交通加上古代罗馬公路系統而成一整体。在这一切地区之內，帝国的政策是中央集权化政策，那就是要巩固它的行政制度，压制东方人民中民族的或宗教的地方分裂主义，并以鉄圈般的堡壘环繞边境，来防御欧洲的保加尔人① 和斯拉夫人，亚洲的波斯人。帝国的身軀和头部躺在欧洲，而它的四肢則伸展到小亚細亚和埃及。

埃及站在世界商业的十字路口。它位于紅海的頂端、东方和西方接触点上。它正是各大陆的大門，也是东方和西方的水陆交通綫的最密切連接的地点。境內有一条大河和規模宏大的港口，有平坦的原野和沙漠中的綠洲，足以招引游客商人来到那里。太尔的威廉論及中世紀埃及的时候曾說过，它是“两个世界的市場。”

到中世紀时期的开端，埃及已經受过五百年以上的罗馬帝国統治。在那里最重要的城市和港口是亚历山大城。在这时期中，埃

---

① 即保加利亚人。——譯者

及被波斯人征服(616年),不久被罗馬人重新占領(626年),最后被阿拉伯人长久占領着（642年)。阿拉伯人初以佛斯塔特为政治首都，而后来他們迁都于开罗。关于这些政治上的变革到时候再加論述。

从农业观点来看，埃及的地形有两个特征——那从尼罗河下游延伸到尼罗河上游的长約千哩的狭长条肥沃流域以及河口广大的三角洲冲积地。事实上，三角洲地带在早期曾向东西两方沿海伸展,虽然向西伸展还远得多。在整个中世紀里,从亚历山大城到施勒尼的整个地带是水利良好、土質肥沃、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地方。

这个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出产谷物，特别是在尼罗河流域。园圃蔬菜和园圃水果产量充足，所以园圃也列入拜占廷的和后来阿拉伯的地稅項目之內。上埃及的綠洲生产一些靛青，但它的价値不大。香膏树也許是从阿拉伯半島輸入的，在中世紀后期出产于下埃及的希力奥波力附近。尼罗河两岸及三角洲盛产着紙草蘆葦，而从它制造出来的紙張长久提供了埃及出口品中的一个重要項目。在中世紀的后期,三角洲上种植甘蔗，用以制糖,特别是在罗塞达和达米伊塔。糖是用牛拖的磨子来磨压甘蔗汁經过煎煮而制成的。埃及糖坚硬而透明，以整塊或碎粉的形式出售。在整个中世紀,麻布也是埃及的一項重要制品和出口物,但是关于亚麻的种植,我們所知的不多。牧畜是埃及农业經济中的一个古老部門。馬匹出产于利比亚。息里內易卡是以它的优良馬种和专家騎师出名的。在寺院农場上可看到駱駝群和猪群；无疑地这是埃及农业的一項特征。

米倫在論述埃及在帝国統治的时期所发生的情况时采取了悲观的看法。他說，根据稀少的記載可看出定額地租似乎增加得很多,而比例地租則依然不动，甚至下降着。他从閱讀所得的“一些

不很詳尽的資料"作出了"关于埃及在罗馬人統治的最后一世紀的一般情况的判断";他所得的印象是一个"絕望的貧困"的印象。現有很多事实足資証明寺院团和教会是当时大地产所有者。帝国賦稅的負担越来越重地压在埃及身上。查士丁尼进行征服意大利和非洲的时候,曾千方百計地用各种賦稅的形式来吸取埃及的富源。虽然农业劳动者和租种农民一定受过苦,但埃及仍然是出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

埃及的出产富饒，使它对君士坦丁堡每年能輸出二十六万夸脫[1] 谷物。610 年时,当弗卡斯听到了埃及反叛的时候，他就捕拿停泊在港內的亚历山大城运粮船的大船队。亚历山大城曾运送大量麦子到阿拉伯半島，"未曾影响它每年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数量。" 615 年，由于尼罗河未泛濫而出現的严重情况（向来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埃及全境发生了毁灭性的飢荒。教会的两只船从西西里装运粮食到亚历山大城进行救济。在同一年，我們也看到記載說，"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約翰在波斯人侵犯之后,为了重建耶路撒冷的教会曾捐献一千头騾子、一千袋谷物、一千条咸魚、一千瓶酒、一千磅鉄和一千个工人。" 据說,他也曾派人护送去"大量黃金、谷物、衣服等等"。

亚历山大城在罗馬帝国的极盛时期曾是埃及的京都。就文化和工业来說，世界上所出产的最好东西都輻輳于此。貿易象流水般地通过这个欣欣向荣的大城市。游历家曾把拜占廷帝国統治下的亚历山大城称做"忙城"。那里，沒有一个人閑着无事的。那里制造玻璃和紙,織造精致的麻布。这最后一項职业遍布埃及全境,除了农业以外,再也沒其他职业象那样普通的;但前两項职业大多限于亚历山大城內。其他职业也差不多，在各城市村庄里流行着

[1] 一夸脫,(quarter),在美国等于二十五磅,在英国等于二十八磅。——譯者

那作为罗馬世界特征的行会制度。其中列出的有銅匠、烘面包工、啤酒商、油商各行会。作为帕諾波立斯的寺院所存在的工业而被提及的,除了直接有关农业的以外，有金匠、烘面包、木工、浆洗布匹、編籃、硝皮、制鞋和裁縫各种行业。在阿拉伯征服时期中所經营的工业中，有陶瓷制造、金飾制造、金屬上涂彩色和象牙雕刻各行业。在奥科倫喀斯存在的行会中,有养蜂者行会;而在同一市鎮里,我們看到了一份关于售蛋章程,由此可見飼养家禽技术在古代埃及还是重要的。

在整个中世紀,埃及的麻布織造业占着一个重要地位,而在那个时期，麻布始終还是地中海世界所愛好的东西。三角洲市鎮的織工,甚至上尼罗河村落的織工，是以制造紡織品出名的;不仅麻布,而且絲綢以及金綫綉品都聞名于西方和东方。有些市鎮,由于制造为特殊場合穿用的稀有而又昂貴的服装而获得盛名。行会制度和严密的組織,使經驗的交换和新式样的迅速傳布成为可能了。

另一值得提出来談一談的埃及地方工业是造船业。亚历山大港和克列斯馬都是坚固的海軍港。亚历山大港是拜占廷舰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它的一个主要船塢。看来不是不可能的,阿拉伯人的征服"和下一事实的認識相联系:只在拥有一个舰队条件下才能长久保持新获得的領土,例如叙利亚沿海市鎮"。阿拉伯人曾繼續使用埃及作为一个海軍基地。

捕魚是个相当大的埃及地方工业，而咸魚是一种出口品。亚历山大运河的出海海道是"經常开放着的,不仅对那些从大海来的商船,而且对天天带着船貨到市場来的漁船"。据說，波斯人曾乔装着碼头工人乘着漁船而潜入亚历山大城的。

无論如何,埃及决不可称为一个矿业国家,可是它也出产了几种至少值得指出的矿物。那画家和硝皮匠所常用的明矾，出产于上埃及和努比亚，而亚历山大城成为它的巨大集中港口。天然碱

或硝石十分重要，因而曾有一塊地方以它命名。上埃及有綠宝石矿，从古代起那里开发出綠宝石和綠柱玉，直到1359年时才被最后开尽。在埃及还可找到紅宝石，但在品質方面它們次于从錫兰运来的貨色。

在一切工业和技术方面，本地科普特人即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似乎曾是那維持着埃及标准的阶層。做这工作的是他們，組織行会的也是他們。拜占廷人似乎一向曾占有着一个侨寓的、做官的上層地位，橫加在埃及社会之上。他們大部分在阿拉伯征服的时候就往他处去了。波斯人未曾长久居住在埃及，因而他們所发生的影响只是临时性的。

亚历山大城想必是一个很大而又很繁华的城市。它的美丽街道、它的灯光、它的公共大厦、豪华浴場以及很多其他景色，使到来的阿拉伯人不禁眉飞色舞，称羨不止。在三角洲上，还有其他几个城市，虽不太聞名，但却有很大重要性。达米伊塔和罗塞达位于尼罗河的不同出口处，是两个热鬧的、兴旺的城市。有一个最著名的制造业市鎮，就是那位于滿剎拉特湖中一个島上的廷尼斯；它在第六世紀变为一片大洼地，当时海水突破堤岸，淹沒了三角洲上一个美丽的、最肥沃的部分，把許多小村落、大量农場、园圃和果园的土地完全毁了。廷尼斯到中世紀后期还是以紡織业出名，就它織品的精致来說，只有达米伊塔和沙塔的出品堪与倫比；而在十一世紀还以制造刀业馳名。沿尼罗河上行的路綫上有塞易斯、希力奥波力和底比斯，它們对商业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性。珀琉細安(科普特称之为珀勒廖)位于东面的苏伊士的狹长地峽上，是从东方进入埃及的鎖鑰。它距海約一哩半，近尼罗河的珀琉細安港湾，并有一个海港。阿斯旺、阿敦里斯、貝倫涅斯、阿达布及其他地方都位于辽远的南方，是上尼罗河和紅海沿岸穿越沙漠的各商路的必經之地。

从上文所說的看来，埃及商业显然有着两种类型——起迄点都在埃及境內的商业和以埃及作为媒介或通路的商业。埃及的大宗自然貿易是谷物貿易，它是一种国內貿易，供应三角洲上大城市的粮食；也是一种国外貿易，运輸貢物給罗馬、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城市，并通过貿易商行供应許多地中海沿岸港口的粮食。亚历山大城和拜占廷帝国內其他城市一样，由于发放公粮的弊病而蒙受痛苦；当查士丁尼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总督霍比斯特斯为了增加帝国的貢賦停止发粮的时候，它已达到每年二百万蒲的数量。进口貨中除了木柴、鉄及其他低級金屬和琥珀以外，只有很少是从西方来的。亚历山大城及其他城市的特点在于它們的貿易大多是出口貿易。在进口貿易方面，埃及人对通过他們境內的許多东方物品征收了通行稅。从古代起，生絲就是从东方輸入以供廷尼斯、达米伊塔及其他市鎮的織工所用的原料。

查士丁尼为了使亚历山大城对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不受街上每次民众暴动中暴民的劫掠和破坏的危险，曾以坚固的墙壁为亚历山大城腓利碼头附近的谷倉設防。而且，因为船只常常停留在达达尼尔海口一个月等待順风，他在那里曾建造倉庫，以便需要船只另运谷物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船只就可立刻卸貨回到埃及去。

埃及的教会早已获得大量土地贈与，而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把眼前任何别的东西都紧抓在手里。

教会有着自己的商船队。据說，其中有一只船載运着二万蒲的谷物，途遇暴风，离开航路，远漂至不列顛，那里正在发生着严重飢荒。这只船載錫而返，后来，它的船长在彭坦波里斯售出了錫。另有一次，我們听到由三只船組成的船队，每只船載运着一万蒲谷物，在亚得里亚海中它們遭到颶风，丧失了全部船貨。它們都是屬于教会的，除了谷物以外，还載运着白銀、細薄紗及其他貴重物品。教会曾参加那項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間的大量谷

物貿易也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由查士丁尼縝密地改組了的貿易①。

埃及成为东方貿易通路的重要性,与其說是开始于罗馬时代,不如說是开始于查士丁尼时代以及在科斯洛厄兹統治下的新波斯帝国崛起的时代。到了第六世紀,地中海沿岸居民对远东奢侈品所形成的嗜好远甚于罗馬时代所流行的风尙。波斯所垂涎的正是这項龐大而又繁盛商业的控制权;而波斯处在这样支配的地位,不管那項商业是經过亚洲陆路而来的,或經过波斯湾和紅海水路而来的。拜占廷和波斯間的长期爭执基本上是貿易战爭,其中絲绸貿易是它們爭夺的主要对象。

有一个波斯故事中說,第一只蚕蛾是从約伯的疔疮里出現的。但确然无疑,絲織工业是起源于中国的,也許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已在那里进行着。最古的中国史籍說,絲織甚至在那时已是一种古旧技术。这工业差不多带着一种神圣工业的性質。几百年中,它局限于华北各省,并为了朝廷的利益而被壟断着;凡是图謀洩露生絲制造的秘密或輸出蚕子的行为都为政府所严禁。只有制成品容許越过边境。中国人运絲绸到土耳其斯坦和印度的市場;从那里它沿着早在公元前150年前已熟悉的商路即"絲路"②到达地中海。亚理士多德是希腊作家中第一个提及蚕蛾的人。从亚历山大帝时代起,东方商人把絲織品輸入了欧洲。但是,在古代世界里它一向是珍貴的商品。当凱撒穿着絲服出現于戏院里的时候,他被認为是显示了聞所未聞的豪华;在提庇留时代以前,貴妇是不穿絲绸的。早期帝国也曾禁止过男人穿着絲绸服装。甚至在第三世紀,

① 蒲脫勒:《罗馬統治下的埃及》,第49—50頁。

② "'絲地'(Land of The Seres)是西方人指称中国的一个最早的名称。'Ssu'讀作'Sz'是中国的名称,而蒙古人把絲称作'Ser',显然后一名称跟着这产品而进入了希腊和罗馬"。——苏特喜尔:《中国和西方》,第8頁。

絲綢的价格按分量是等于黃金的。

在运輸絲綢方面，中国商队从来沒曾越过土耳其斯坦的西方边境，虽然有些中国人的帆船曾行駛到錫兰以西。从中国商人所达到的地点，各种商人繼續着絲綢的运輸工作。但是，不管絲綢从陆路或水路运来的，波斯人总是首先获得它；他們疑忌地防范，使絲綢不致經过別人的手而只經过他們的手轉运到东罗馬帝国去。在陆地上以及在海面上，波斯人是东方貿易的主人翁。边疆上的有些城市曾被特別指定为两国間的絲綢貿易站，而且两国稅局就設在那里，来征收它們所課的关稅。那些开始于第五世紀而后由查士丁尼重行制定的严刑峻法，以罰款和沒收財产的方法懲办任何詐欺或走私行为。这些城市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克斯、美索不达米亚罗馬边境上的尼士比以及亚美尼亚的阿塔克薩塔。这样一来，波斯人得維持陆上絲綢貿易的完全壟断。他們在海上的地位几乎是同样坚强的。他們的艦队巡邏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他們是印度的貼近邻人，和印度王公維持着友好关系。有大批波斯商人在印度和錫兰經商。在那里，他們享有免稅权以及很多特权，并建立了范圍大、勢力强的居留地。所以在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几乎是完全依靠着波斯来获得那已成为它所必需的絲綢供应。按照罗马經济的突出壟断性和集权化組織，在一个商业团体监督之下，一切进口絲綢都被收購。在这种絲中，有的已經是制成品，很多还是在原料的状态，用以供給太尔和貝魯特的帝国制造工場。在这些城市里，也有一种經营重織和攙用中国絲綢的大規模貿易。

当528年波斯战爭切断了橫过大陆的絲綢貿易的时候，查士丁尼曾企图同阿比西尼亚国王阿克苏謨(530—531年)締結同盟，来发展那紅海和印度間的商路。但是，希腊和阿比西尼亚商人发現：波斯人在錫兰市場上由于享有特权，勢力已这样牢固，以致他

們的地位已成为不可进攻了。而且，波斯艦队的巡邏阻撓着他們在阿拉伯海上航行的船舶。532年的和約，使情勢回复到旧有的基础之上。540年时，第二次波斯战爭爆发了。东方商路的切断，又一次使工业陷入严重困难状态里。帝国政府曾用規定絲的最高关稅率方法来解决这困难，这項努力获得了应有的效果。私人制造者因无力支付那購买生絲所必須的价格，乃按法定价格出售。这法律是針对他們而实施的，而管理政府工厂的拉基塞斯伯爵却可以不予理睬。太尔和貝魯特两城的繁荣景象消逝了；它們的織絲工人不是餓斃便是逃到波斯帝国去，帮助敌人經营絲业。絲价飞漲到这样的程度，一磅紫色絲的售价在四千美元以上。在走投无路的状态下，皇帝查士丁尼在533年同意贈給波斯人一万一千磅黃金，名义上作为波斯人保护高加索山路来防止"白匈奴"侵犯所付的酬劳——那是以前阿那斯塔細亚所拒絕支付的——但是，实际上作为恢复絲綢貿易对波斯人所付的代价。此后边境上的商站又重新开放了。

但是和查士丁尼一样，波斯科斯洛厄兹大帝怀抱着帝国主义的和征服的野心；540年在哥特战爭中，波斯人曾蹂躪叙利亚、占領安提阿、渡过上幼发拉底河，而进迫亚美尼亚，也就是进入小亚細亚的大門。542年时，貝利撒留从意大利被召回来，收复了失地，于是和約再度签訂。然而，波斯人不遵守所規定的稅率，尽量征課絲綢貿易所可負担的稅款，甚至还超过这个范圍。君士坦丁堡遭到了尖銳的危机。私人工場关門，而政府工場是在亏本經营着。

在这个关头，中亚細亚的事变部分地拯救了查士丁尼。关于从中国到波斯的絲綢运輸方面，索格狄亚那的商人原是最重要的中間商。但是在第六世紀，一个广大而疆域不明的突厥帝国开始在中亚細亚形成起来，并扩展它的勢力于索格狄亚那。波斯因为害怕那和索格狄亚那的通商关系会被卷入和突厥人的战爭，所以

停止了这項貿易，宁願經由海路从錫兰和印度方面，来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絲綢。結果是查士丁尼以前和阿比西尼亚人所沒能办到的事情——繞过那波斯人所控制的东方商路——現在他和索格狄亚那商人可以办到了。于是，第一世紀中罗馬和帕提亚[安息]的历史重演了。那条古代商路，即从巴克特里亚下行阿姆河到达咸海，从那里繞过下里海越里海地峽到达黑海这条商路，重新开放。另有一条商路，也是上行阿拉克賽河，越亚美尼亚到达特勒比遵德，即希腊人所称的特拉比左斯(Trapezos，所以这样称呼它，因为这个城的脚下的岩層，形状奇突)，这是“屬于魔城一类的城，位于拉戚斯坦鋸齿状山脊和突出的峭角之間，在这峭角頂上据傳說有‘万人’紮营过”。在查士丁尼的最后一年(565年)，波斯人的控制就这样地遭受了側面的攻击。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阿拉伯人在西亚崛起时止，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上时常可看到索格狄亚那商人和突厥商人。

我們可以用最后一件事来結束关于絲綢貿易的故事。552年时，欧洲儌倖找到了一种方法，至少可以部分地擺脫对中国絲綢的依賴性，也同样地擺脫了波斯的殘暴行为。因为在那一年，有两个曾在东亚住过的景教僧侶，把蚕蛾子放在竹杖內偷运到欧洲来了。又經过多年的辛勤工作，希腊的絲业建立起来了；在希腊，桑树似乎长得很盛；但是西方絲业的开端，却在于这一事件。到了十字軍东征时期，絲綢制造业已遍傳于希腊、南部意大利和里維耶拉意大利① 以及西西里了。

現在，我們必須轉到討論东罗馬帝国的內部情况：它的工业、查士丁尼的行政政策和征稅制。在第六世紀的开端，东罗馬帝国的工业机构包括着在政府管理下的一大批排他性的貿易的和工业的

① 里維耶拉意大利(Riviera Italy)，指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风景区。——譯者

团体。这些团体起初为了它們成員的經济利益而自愿結合起来，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的工具，按照它的利益，来管理工商业了；轉变的过程，历时在百年以上才告完成。早在第四世紀初期，国家已使一个团体中的成員資格成为世襲的和强制性的。拜占廷帝国的經济組織，是一个最高度社会主义的組織；但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組織，因为它的管理方法是受統治者的和他政府的利益所支配，而基本上不是受社会的利益所支配的。工业是一項屬于国家范圍內的事务。

除了团体成員在私人地位上須付的賦稅以及他們工业上附带的捐稅以外，有些团体还須履行若干种有关政府职能的义务。那些大的即"批发"的团体，应监視某些稅款的征集，监督巨大公共工程的建造以及从埃及运輸食粮的供应。这些負担，叫做"非常公役"。那些小的团体負担着"微賤公役"：包括繳付地方捐稅、看守桥梁、公路等等。若干种需要技巧或技术經驗的职业，如染师、制車匠、珠宝匠等等，享有着免除"公役"的权利。但是，他們的团体也是受政府管制的。最后，可举出一个团体組織的极端例子，甚至在公路上和桥梁上工作的奴隶們也是屬于奴隶"公会"的。

除了管理工商业团体的事务以外，政府还直接經营着若干种事业。其中最著名的是捕骨螺或螺壳业、軍械局以及国家織造工場。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业品都是从这国家工場（扩展到帝国的各港口）里制造出来的。

第五和第六世紀东罗馬帝国內的主要工业是制造絲織品、有光泽的陶器、用于鑲嵌細工的彩色石和十字架。最后一种是一項主要工业，所用的材料是黃金、白銀、宝石、褐炭和象牙。刻花是这工业的附带部門。叙利亚是以它的彩色玻璃、精制織物和綉品出名的。

帝国政府所經营的規模較大的专利事业是：矿場、采石場、盐

井、造币厂以及制造武器、軍事配备和兵士服装的各工厂。有一时期，政府曾企图壟断絲織品的制造，但是由于不能滿足政府的需要，私人工厂重新准予設立。政府的补助和壟断性的控制，在一个时期內有着鼓励工业的效果；突厥大使曾参观查士丁尼国家工場，曾对机軸上的产品表示惊异。但是，查士丁尼的壟断政策也有着危險的效果，即迫使他的数以千計的最好絲織工人往他的商业敌人即波斯人那里去了。在他的沿海通行税站上和边境城市里，他設置了那些叫做"商务专員"的官吏，他們的責任就是在私商有机会收購之前，以低价来收購全部絲綢。他也曾制定严格的度量衡制、沿海港口章程，并曾建立一种港口征税制度；这种税率后由他的后繼者規定为10%。奈斯波拉斯对那些住在赫勒斯滂海峽彼岸的商人所購的家庭奴隶，每人征收两个諾密斯麦塔① 的附加税。采石場原来是依照契約出包于私人的，但是，由于条件的过分苛刻，承包人变为无利可图；因此，它們后来由政府收回經营。所有的其他工业都是私营的，但也受着国家的严格管理。国家对每一种工业都加以課税，而且硬要一切职业，除学术性的职业以外，負担公役或个人劳务。政府的工业管理，因为各种职业都已組成为行会而变为容易办理了。

至于农业，它是按照由罗馬帝国傳下来的大农場制度組織起来的。农奴制广泛流行着，而农奴的状况是苦不堪言的。除了在山区以外，实际上再也沒有自由农，只有屬于租戶阶層的农民；他們的状况也不見得稍优于农奴的状况。在边境省区內，还有成千累万的隶农即边境农民，論身分和状况他們接近农奴，但他們負担的捐税較輕。

埃及仍然构成帝国的大谷倉，每年供給君士坦丁堡食粮五百

① 諾密斯麦塔(nomismata)是拜占廷帝国的一种貨币名称。——譯者

五十万摩底① 。这項供应当然是由政府縝密管理着的。大量食粮的供应还来自附近的色雷斯、小亚細亚和黑海地区。主要食粮是小麦、咸肉、魚类、干酪、火腿、酒和蔬菜。大貴族地主阶層("有势力"的人)繼續着罗馬的特权傳統;他們不顧法律的規定,靠着牺牲无保障的小土地所有者和穷苦农民来扩大自己的地产。"地主不住領地制度"发生了各种弊端,一任土地上的劳工常常遭受管事或管家的虐待。这些"有势力"的人拥有武装的仆从,他們又富又强暴,在他們的地方上也是政府的大患;当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們就可发动一次革命。

那些构成国家收入基础的賦税是土地税、"金銀税"(这是加在商品上的苛税,曾由阿那斯塔細亚取消,而后由查士丁尼恢复的)、人头税、房屋税、商业团体税、海关和港口税以及市場捐。除此以外,政府还征取旧罗馬的"义务服役"以及那用以供应首都粮食并配备与維持軍队的各种捐税。这些税款的征收,大多出自富裕市民阶層和大商业团体的。但是,因为这个阶層越来越穷,他們的責任也就成为空談。收入最丰富的税是土地税,但是由于大土地业主的势力,土地税的負担大多落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

戴克里先所采用的財政制度,已把那寺院土地上的农奴制扩展成为农村經济和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制度。两百年以后阿那斯塔細亚以强制那些住在一塊土地上滿三十年的自由农永远不得离开他們土地的命令,創造了一个新的农奴阶級。拜占廷立法的目的,經常是要保証固定状态以不变为度。就这一場合来說,法律的目的是要防止弃田数目的增加。查士丁尼对农村財产无情地課以殘酷的土地税,叫做"联保地税"(epibole),依此規定,附近业主当附近土地被它的所有者遺弃的时候,或所有者无力付税的时候,应

① 見第2頁譯注③。

負付稅的責任。在疫癘流行的時候，当城市中的几条街的房屋和乡村中很多的田庄变为无租戶或无主人的时候，这种征稅方法造成了混乱局面。从理論上說，这項附近业主連带負責制应对富人和穷人同样地实施的。但是实际上，富人能够拖延繳納，甚至逃避这項法律的实施，因为他們往往是宮廷或政府的官吏，无論如何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朝廷的勢力。这样，这項义务就沉重地压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而政府对于他們的不滿，原是沒有什么害怕的。

眞正的問題是，从道德方面和技术方面来說，拜占廷的整个財政制度是不对的。正象柏立說过：

对近代学者来說，必要記牢两个事实：它們在熟悉近代国家土地問題的人們所不可想象的一种形式下，有力地影响着那項发展……这立法是完全以財政的考虑为基础的；而法律的直接目的，是要尽量减少国家方面的麻煩，来充实国庫：使国庫充实而不使帝国富裕的淺見政策；罗馬法上很不完备的信貸制度，即那阻碍了投資而使土地成为几乎唯一投机对象的制度，在土地問題上，如上文所說，在一种特殊方式下……起着反作用①……

沒有疑問，查士丁尼时代的賦稅是很重的。他使国家財力枯竭的长期战爭，他国內的龐大建設，他朝廷上的豪华风尚，消耗了千千万万的进款。而且賦稅的負担由于强征勒索以及由于上上下下几乎每个官吏的貪污腐敗行为而加重起来。查士丁尼不是一个守財奴；他的貪婪是为了鋪張浪費的。因此，在斂錢方面他是很少选擇手段的。他的官吏搜刮愈多，他的进款也会愈多；而且他还要留些不义之財在他們的腰包里。所以，我們可看到：卡帕多細亚·約翰或彼得·巴塞姆斯在主持一个龐大的蛮横賦稅制度的时候，曾用酷刑敲詐勒索，迫付稅款，同时他們卖官鬻爵，做小麦投机勾当，甚至尅扣軍餉，以求获得更大的收入。在各省內，我們也看到：約

① 柏立版，吉本，第5卷，第533頁。

翰·兹波斯在亚美尼亚曾实施商业壟断，他以低价購进一切商品，而后以高价强制居民买回它們。那綽号叫做“厚顎畜生”的約翰，曾使費拉得尔菲亚地方人財两空。这些例子并不是个别的。在新征服各省內，民众都是在賦稅負担和压迫之下呻吟着。无疑的，在查士丁尼的政府中也有良好忠实的人。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須获得金錢。查士丁尼的破坏性的帝国內政政策使外族易于侵入，远远地抵消了他为抵抗他們所作軍事努力的效果。阿那斯塔細亚的統治时期曾是一个帝国內部的复兴时期。他曾取消对工业有破坏作用的賦稅即“金銀稅”，并取消“市民团体征收城市稅制度”。但查士丁尼竟使新的征稅制度比起旧制度来成为还要巨大的勒索工具。为着首都和軍队而征收的粮食稅比以前多了十倍。那人为的貨物缺少和高物价是由商业上的苛捐杂稅所造成的，而壟断制度的建立又使工业破产。政府已成为一个极端专制的和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了。在查士丁尼統治的初期，市政机构还是有力量的。希腊城市在公共建設和学校方面还有地方自豪心理。但是他后来破坏了所有的这种地方自治权，剝夺了自由城市的收入和自由权，还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那占重要地位的希腊族的民族精神，因此，他把帝国的一个屏障撤除了。

“很难說，究竟是統治阶級間对一切經济和道德法则的藐視，还是中下層阶級的无可救葯的愚昧无知状态，构成拜占廷帝国使人更可痛心的景象。”我們看到，帝国政府濫征各种賦稅和关稅，征取粮食来維持軍队和首都，并强制运輸它們，以及发給专利执照（甚至面包）；到处是横征暴斂景象。听任士兵領不到餉銀而变为毫无紀律，村庄变为人去楼空，而田野不毛；边境砲壘无人防守，蛮族因而侵襲帝国。于是，帝国就不得不用巨金来收买他們（以及波斯人）。地震曾使几个整个城市必須重新建造，包括安提阿在內。542 年的疫癘又使帝国陷于瘫痪。558 年时疫癘又出現了。当时，

查士丁尼不用削减朝廷的奢侈费用，而用削减軍事撫卹金和谷物补助費来节約經費。最后他还采用了貨币貶值的办法。在他統治的末期，国內混乱、譁变、焚掠事件，層出不穷。帝国已陷于垂危状态了。

查士丁尼时代所建造的大廈（其中圣索非亚大教堂迄今还是令人惊嘆的紀念品）、石子路、港口工程、灯塔、息德那斯河两岸防止塔苏斯水灾的堤壩、达达尼尔海峽和亚历山大港口的設防倉庫和小麦棧房、为着招待到耶路撒冷去的过路香客而設的半旅館半医院性質的"公家接待所"，这一切建設，就事情的本身論，尽管是善良的，但曾消耗巨額金錢和千百万人的强制劳动，所以，就建造它們所付的代价来說，则是得不償失的。象法王路易十四那样，查士丁尼曾消耗精力于"好大喜功"的欲念，并为了追求"光荣"，他牺牲了不可計算的鮮血和資財。有一个拜占廷的大学者認为："他統治的主要缺点，在于財政管理上的腐敗。"

由于查士丁尼的不健康的財政政策和他的浪費行为，帝国从来沒能够产生充分財源以滿足他的欲壑。如果沒曾有巴尔干半島山中的丰富銀矿以及亚美尼亚的金矿，他的政府也許已經垮台，象西班牙政府在十七世紀当秘魯和波多西矿业开始失敗的时候所遭的命运那样。

在565年查士丁尼逝世后，帝国面临着一个持續多年的危机。566年时查士丁尼二世的一項詔令宣称："朕見国庫空虛，軍队如此混乱，以致国家处在蛮族的不断侵犯和侮辱的危險中。"然而，他由于沉迷于帝国主义的观念，对帝国的慘淡景象視而不見；及至破产和垂危状态迫近的时候，則以禪位了之。"分离的要素开始以全副力量起着作用；矯揉造作的制度已在垮台；現在帝国开始迅速而又明显地变質了。"在一般分崩离析的状态下，"不公平状态在首都和在各省內到处存在：富人为他們的財产而惶恐，穷人为他

們的生命而担心；普通长官都是无知或貪污的；偶然的糾正办法，看来都是蛮横而兇暴的，民众的不平之鳴不复能以一个立法家和一个征服者的动听名义平息下去了。”

正在这危急时期，由于受到亚洲突厥部落的压力，也許还由于受到巴尔干半島上肥沃土地的引誘，斯拉夫人进入帝国来找殖民地，象过去日耳曼人由于同样的形势所迫而进入帝国那样。

第四和第五世紀的蛮族侵入曾破坏黑海北岸希腊殖民地，但到了第六世紀，那早期游牧部族的地位已由斯拉夫族，即維尼德人、斯克拉維尼斯人和安特人所接替了。他們的原住地似乎曾是喀尔巴阡山和波罗的海之間的地区，但是他們逐漸散布于俄罗斯平原，最后南下尤克辛海和希腊殖民地相接触，因而和君士坦丁堡相接触；而君士坦丁堡的文明对俄罗斯曾在各方面发生过有力的影响。

关于斯拉夫族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定居于多瑙河南岸，这一問題还沒有定論。斯洛文人的确在阿提拉时代之前，可能早在300年已开始滲入到那里。他們一定曾参加过第三世紀的边境扰乱，而且由加理略所安插在米西亚和色雷斯居住的卡皮人，可能就是斯拉夫人。現有明确的資料可証明：斯拉夫人在第四世紀中是以隶农的地位居住于半島上的；在第五和第六世紀中有些罗馬軍官是斯拉夫人。在哥特人移入意大利之后，东方各省荒地上有斯拉夫隶农居住着。从这些事实我們发現一个和日耳曼人滲入西方帝国完全相类的事件。所有进入巴尔干半島上的少数日耳曼部落，都已轉移到西方去。斯拉夫人定居下来。因此，西欧洲成为日耳曼化，而东欧洲成为斯拉夫化了。

562年时，阿佛尔人对罗馬領土举行他們的第一次侵襲。斯拉夫人尽管好战，而却是寻求住所者，可是阿佛尔人，象他們的近族匈奴人一样是单純的掠夺者。不久，斯拉夫人和阿佛尔人的侵襲

变为越来越多，越来越狠；所以奥曼写道：在 570 和 600 年之間不是“夸大其詞地說……老的人口几乎消灭殆尽了”(在巴尔干山之北)，而在馬其頓和色雷斯则大大地削减了。这样，拉丁語的省民几乎全被消灭，除了住在达尔馬提亚群島和山岭要塞中的，从那里他們后来出现为瓦雷契亚人。577 年时，至少有十万斯拉夫人曾涌进色雷斯和伊梨里根省内，从那一时期起斯拉夫人可以認为是在巴尔干半島的人口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了。

皇帝摩里士(582—602年)曾拚命地抵抗那联合的敌人。他曾保住多瑙河畔的堡壘，但是在堡壘后面，只是“疏散地住着斯拉夫人的一片荒野而已”。罗馬居民向北移住，沒曾达到巴尔干山之外。然而，通商大路还是保卫着的。到了摩里士的統治末期，斯拉夫人已經定居在整个馬其頓和帖撒罗尼迦的周圍。至于他們在这样早的时期是否已到达希腊，这一問題还是有爭論的。柏立說現有一些資料可証明他們是到达的。

在这混乱局面里，皇帝摩里士是一个悲惨的而又是一个英勇的人物。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将領，战略論的作者，又聪明又有效能的行政长官。因为認識到絲业对拜占廷的重要性和突厥人支持的不稳固性，他努力和波斯取得妥协，因而給科斯洛厄兹二世援助，来干涉巴勒姆的叛乱。

但正是由于这位皇帝的聪明，就有了敌人。摩里士知道斯拉夫人和阿佛尔人的侵入威胁着帝国本身的完整，所以曾限制拉温那总督軍队的餉銀，因而触怒了偉人格列高里；对后者来說，阿佛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入巴尔干半島，在和倫巴人侵入意大利相比之下，是一件无所謂的事情。此外，摩里士也曾遭受希腊教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禁止了寺院接受新的成員，而加入寺院原已成为一个逃避軍役的好方法。这种逃避行动已成为一項公开的弊端。在每一次发出召集新兵命令的时候，大批“逃避者”就涌到教会里，要

求接受寺院生活，往往出資来購买这項特权。的确，那些不顧廉恥的住持們竟做着这样性質的好生意。摩里士在財政上和軍事上的百般苛求，在国家危急的时期原是必要而又有理由的，可是，这种措施使他失掉民心，終于使他被篡位者弗卡斯（602—610年）所推翻；后者的統治是集放縱、殘暴和奢侈之大成。当非洲总督之子希拉克略把这僭主最后推翻的时候——因为在君士坦丁堡沒有一个人曾敢反对这僭主——他把所获得的不义之財尽沉入赫勒斯滂海峽，留下了一个空虛的国庫和一条血路。

希拉克略的統治(610—641年)标志巴尔干半島斯拉夫化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驟。在他登极的时候，如上文所說，斯洛文人已定居在卡尼鄂拉，并在伊梨里根、色雷斯、馬其頓、米西亚，可能也在希腊，有着很多居留地。正在那个时候，他采取一个对半島前途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步驟了。希拉克略曾号召塞尔維人和克罗特人从喀尔巴阡山区移到达尔馬提亚和伊梨里根来。他們被給予的土地，也許就是由旧有的罗馬人和希腊居民所曾經放弃的土地，不过柏立認为正是在这时期，本地居民逃往达尔馬提亚海岸去建立了新的市鎮(拉古薩、加他罗、斯帕拉托等等)。

这些新部族，在德拉夫撒夫区的斯洛文人和半島上别地区的斯洛文人之間，插入了一把楔子。克罗特人散布在下斑諾尼亚、伊梨里根，并向东达到德里納河岸；换句話說，散布在克罗地亚以及在部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和达尔馬提亚。塞尔維人占据了这三个地区的其余部分，就是“老塞尔維亚”(即諾威巴薩州)、北部馬其頓以及在亚得里亚海沿岸，那曾包括門的內哥罗在內的一个地区。这些人便是所謂“沿海塞尔維人”。

这些新斯拉夫集团只是松懈地从屬拜占廷帝国而已，它們从开始时起，就在自己政府之下保持着大量的地方独立性。所有的斯拉夫侵入者，在他們的进入时期是在低文明的阶段，但是他們有着

不可磨灭的爱好独立和憎恨权力的情绪,因而他們沒有国王,但却有部落酋长,叫做"統領"(zupans)。在危险的时期,各統領在会議上推选一个"大統領"——那是国王的萌芽。斯拉夫人組成为公社,有着公有財产。公社首长是从主要家族中选出来的;他們形成了一个貴族阶層。斯拉夫人是从事农业的部族,变成为"固着于土地,那倒不是由于农奴制,而是由于种田者和业主間的情感上的联系"。

另一个闖入巴尔干区的外族是保加利亚人,他們在678年胜利地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尔人〔保加利亚人〕是屬烏格罗-芬尼克族。他們是从伏尔加河和頓河沿岸"老保加利亚"来的。到今天在喀山附近我們还可看到保加利亚人古都的遺址,即巨大而不成形的泥邱;这些泥邱現在是比任何俄罗斯公侯国还古老的王国的唯一紀念物;王国兴盛于第六和第七世紀,还在保加利亚部族侵入多瑙河流域使拜占廷皇帝寢饋不安之前的时候①。

在希拉克略統治时期,保加利亚人叛离了阿佛尔人,把阿佛尔人从他們在老达謝所占的地区逐出;而后渡过多瑙河,征服了米西亚的"斯拉夫七部落",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君士坦丁四世同他們签訂条約,把多瑙河和巴尔干山之間的領土讓給他們,并为了保全色雷斯向他們納貢。在那里,微賤的斯拉夫人被降到一种类似农奴的地位,而斯拉夫貴族得准予参加政府。这两个民族立即开始了血統的混杂,結果成为文化史上一个奇特的事实。那突厥系的保加尔人在語言和文化方面,在不滿两百年时期,已完全斯拉夫化了,所以在今天保加利亚人,实际上(除了名义上和血統上稍微混杂以外)象任何其他巴尔干民族一样,就可認为是斯拉夫人。至于保加尔人的語言,一点兒遺跡也沒留傳下来。这一事实可說明斯拉夫种族具有那令人惊异的同化力。

①布賴斯:前引書。

然而，保加尔人比起斯拉夫人拥有一种优越性。他們有着一种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得来的力量。他們的汗是一个絕对的专制国王,而以严格的东方仪式和人民隔离着的;他又是一支訓練精良的軍队主帅。这可說明他們为什么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王国并拥有偉大威力。直到中世紀后期,在純粹斯拉夫人的国家中,再也沒有一个国家在疆土大小和力量方面堪与倫比的。

关于各部族移入巴尔干半島的过程,还有一个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希腊的斯拉夫殖民地化問題。关于这項侵入和占領的范圍,在历史家中曾有过討論。有的人主張，在摩利亚和中部希腊的希腊人曾完全被根除，而近代的希腊人只是拜占廷化的斯拉夫人。这一理論是根据第九世紀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的說法的：希腊全国已变成斯拉夫人的和蛮族的世界了。芬雷說过，在希拉克略时代,斯拉夫人曾深入伯罗奔尼撒,不久遂占領它的大部地区，但那些設防的市鎮还是留在希腊人手里。柏立認为到第七世紀中期，希腊的乡村部分已經斯拉夫人化了，而各市鎮依然是完全希腊化的。他还以为斯拉夫和希腊人一定曾經混合过,因为我們沒有听說过什么冲突。在第八世紀，一个出生于希腊的斯拉夫人曾担任君士坦丁堡的教长。

現在,我們講到了第八世紀的开端时期,正是巴尔干历史上的一个轉折点。不仅从帝国的观点来观察,它是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异于罗馬帝国的开始时期，而且从巴尔干地区部族移动的观点——本节討論的特殊观点——来考虑，它也是标志着蛮族侵入和移入巴尔干区的終止时期。

我們現在来談一談帝国在四个世紀被蛮族侵犯之后，在欧洲方面的状况。它的实权，北以巴尔干山为限，西以斯特魯馬河为限，而帝国在希腊的势力是很不稳固的。名义上它在欧洲的統治权还伸展到旧有的疆界，除了保加利亚王国以外;但是实际上,它

在馬其頓、伊梨里根、达尔馬提亚和希腊的斯拉夫附庸国都是独立的。尽管希拉克略有很大才干，但他的統治时期却看到了这些領土的丧失。吉本說过，在希拉克略以后，“罗馬的名称已縮減到君士坦丁堡孤零零的城郊了。”甚至在第六世紀，拉丁的知識也越来越少了。400 年时，約有 1/4 的省民說着拉丁語；620 年时，不到 1/10 了。柏立說，到第八世紀的开始，“罗馬法，象拉丁語一样，在帝国内不复有人懂得了，帝国正在变为完全希腊化，当时它已經失掉叙利亚、非洲以及希馬斯半島① 上的北方各省”。

利奥三世所頒布的希腊文“法典”，使我們能够估价所发生过的一些經济变革。隶农制已不可复見了。再也沒有人被束縛于土地；但他們不是自由租戶，便是屬于有着公有土地的自由公社的居民。农奴制已經消逝，因为它是和斯拉夫人的风俗不相容的，也因为老的隶农阶層已被扫除。斯拉夫人不象日耳曼人那样，沒有什么符合于农奴制的东西，因而原在这里易于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沒有能建成。

第二个重要轉变是关于力量的比重，保加利亚王国扩展到一个可畏的程度，对斯拉夫人如此，对希腊人亦然。这一民族的人口至多不会超过三万至五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孩子在內。正是由于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他們才能統治着他們的斯拉夫邻人的，而从人种来說，他們自己是在被斯拉夫人吸收着。因为他們提供了政治統一的原則，所以“保加尔人的移入保証了半島上斯拉夫人的优势”。在整个第八世紀中，皇帝和保加利亚人进行战爭，因而在第九世紀初期以前保加利亚人不能推进到巴尔干山以南。

保加利亚跟着它的基督教化，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商业发展了。它成为亚洲的很多产物和君士坦丁堡的制成品轉运到日

① 就是巴尔干半島。——譯者

耳曼和北欧去的一个媒介。早在716年时，它和帝国已签訂一項条約，規定保加利亚边境上所征关税的数額，这項条約在后来每一次战爭結束时都曾予以續訂。802年时，由于破坏这項条約的規定，帝国和保加利亚立刻发生了战爭，而这一战爭是在帝国对保加利亚所进行的战爭中損害最大的一次。

其时，当帝国丧失巴尔干半島上全部腹地和希腊的大量領土于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时候，它在亚洲和埃及所丧失的領土同样巨大，而且有更多令人惊异的景象。608年时，波斯人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蹂躪了亚美尼亚、卡帕多細亚和加拉太。619年时埃及陷落于波斯人手里。查士丁尼的幷由他后繼者奉行的严格正宗信仰，使帝国內各种基督教派都曾蒙受迫害；因而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对波斯人的进展，遂以縱容或至少漠不关心的态度来报复。为了理解这种基督徒同非基督徒敌人的合作必須注意，象上文所述的，这些东方民族已以敌对拜占廷統治的新的民族精神而騷动起来；拜占廷的統治对他們来說在政治上是一个外人的压迫，在經济上是一个外人的剝削。他們自己的基督教特殊形式，原是表述他們民族独立愿望的工具。帝国統一和正宗信仰是携手幷进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和异端教派合在一起的。“芝諾所頒布的策略性的‘統一詔令’① 为东方的統一鋪平了道路；而查士丁尼的政策妨碍了和解，产生了分裂；那使波斯人以及后来薩拉森人的侵入变为輕而易举了。”

奇怪的是，君士坦丁堡居然还有力量度过这些重重的难关。拯救它的活力一定是从它的商船队得来的。城市的制造业还是繼續着。它同西欧洲还有着稳步增长的商业关系。埃及西部是在很繁荣的状态中，里比亚出产大量麦、稻和枣椰。希腊人因为他們独霸

① 芝诺是东罗馬皇帝(474—491年)，曾頒布“統一詔令”(Henotikon)，以期終止宗教上一性論的爭执。——譯者

海上，能控制对地中海(或尤克辛海)任何部分的联絡綫，在那里可能有着貿易，或可能获得必要的供应品。因此，大海和船舶挽救了这个偉大城市。610年时，推翻弗卡斯的力量，来自帝国中唯一的未曾呻吟于虐政和外患下的部分。商人阶層对希拉克略的出征可能是負着大部分责任的。后来，正是由于控制海上，他对波斯的出征成为可能。

希拉克略在击退帝国敌人和克复叙利亚和埃及方面，是获得成功的，但以鮮血和金錢以及領土的破坏付出了无量的代价。他之所以能够出征波斯，大多是因为教会給予了一笔借款，当时，教会已認識到这項危險，因而曾提供金銀器皿和宝物給皇帝。还采用了节約办法，例如取消谷物补助金。于是在紧張局面过去后，帝国安定下来，筋疲力竭，徐图恢复元气。一到有能力的时候，希拉克略要把教会的債款归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曾征收极其繁重的賦稅。当时，各省已經遭难，而国庫空无所有。希拉克略愚不可及地曾对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論教会征取貢賦，为的要归偿希腊教会給他墊付的款項。同时他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进行了迫害，因为他們被控告是波斯人的秘密同盟——也許是眞的。

希拉克略不曾亲見那在阿拉伯半島上空形成的穆罕默德教侵入的战云。那些还很少知道阿拉伯人名字的、也不害怕它們的各部族，不到五十年就匍伏在“信徒統帅”之前的塵埃中了。

波斯据它的内部情况而言，不見得比拜占廷好些。波斯国王从来没有力量能够消灭那里有勢力的帕提亚封建貴族；政府是殘暴的，它的征稅和查士丁尼的征稅一样地苛重，一样地恶劣；祆教僧侶靠着特权的保护，横行不法地对待着那住在庙宇地产上的不自由阶級；对于經常发生的地方居民的反叛，以极度殘暴的手段，以古代亚述人全部驅逐被征服者出境的方法来懲罰。象在下一章内所看到的那样，穆罕默德教对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征服，是一

件又快又容易的事情。

在第七世紀的末期，拜占廷帝国的情况已瀕于无政府状态了。从694到716年的二十二年之間，皇帝更換了六次。薩拉森人在亚洲已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亚美尼亚、乔治亚和卡帕多細亚；在非洲，已征服埃及、里比亚、的黎波里以及迦太基总督区；在巴尔干半島上，一个强大的保加利亚王国已建立于色雷斯和米西亚两个旧省中；斯洛文人、塞尔維人及其他斯洛文部族已滿布于半島上的西部，从瓦尔达耳河和摩拉瓦河直到亚得里亚海岸；希腊的希腊化文化已逐漸被消灭，或者被外来的斯拉夫人同化了。帝国的眞正权力已局限于君士坦丁堡，在它背后的亚得里雅那堡平原，薩罗尼加一类的港口以及小亚細亚、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在这最后两个地方內，从巴尔干和伯罗奔尼撒来的成千成万的难民以及从叙利亚、埃及、的黎波里和迦太基来的成千成万的其他难民找到了庇护所。在这些土地上，从希腊和东方来的移民变为这样地稠密，以致本地的文化和制度也改变了。

其次，象在百年前一样，海权是使拜占廷帝国免于灭亡的起死回生的因素。海权保存了那政治統一所遺留下来的东西，它保持了商业上的活动。可是，如果717年的革命不曾带来一个能阻止无政府状态的皇帝，帝国也許要早好多年慢慢地死去了。这位皇帝就是利奥，俗称伊索立安（717—741年）。他是一个主張改革的最偉大統治者和行政天才，是一个拜占廷帝国或任何别的帝国可引以自豪的人物。

实际上利奥是一个康瑪其尼的叙利亚人，不是伊索立亚的本地人。他系出帝国“边防区”內一个耐劳的山区部族；这些边境省区几百年来原是帝国边境上对波斯的防御屏障。好久以前，最賢明的皇帝早已看到这些勇敢而自由的部族的价值，按照一种封建保有权，曾把他們分駐于沿东疆的世襲的、不可分割的、免税的軍事

采邑上。在东方，那最后熄灭的异教是在小亚細亚的山岭地区內，在那里，由于以弗所的約翰即“异教徒中的使徒”的傳教活动，异教在查士丁尼时代終于被剷除了；約翰还在那里建立了九十九所教会和十二所寺院。利奥是一个名将，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的統治的第一年，他就击退了穆罕默德教軍队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三次大圍攻，而他的改組海軍还遏阻了在未来百年中穆罕默德教的海权成长，这样一来，帝国的統治和帝国的商业得以保持不墜。作为一个有力的立法家来看，利奥仅次于查士丁尼本人，而在公平和聪明方面則远胜于他。

利奥三世，在把混乱了一代的帝国复兴起来的时候，認为須有立法来适应当时变更了的情况。帝国各省內的外国人居留地——斯拉夫人的和瑪戴特人的——产生了一个土地問題，对这一問題他用他的“土地法典”来处理。斯拉夫人的和薩拉森的海盜行为的增长，使海上貿易需有更大的安全保障，对这方面他用“航行法典”来处理……对一般生活上的关系，他也用完全新的方式来制訂法律①。

我們可依下列各項来討論这位大改革家的工作：

(1)“法典”②，即民法和刑法的改革，反映出新穎而深刻的社会思想。

(2)土地改革和土地問題。

(3)商业改革——“罗得島航海法典”。

(4)教会改革特别是寺院改革③。

“法典”是在740年时頒布的，“可以称做一本基督教法律書。它是以应用基督教的原則来改变帝国法律体系的一項認眞的企

① 柏立版本，吉本，第5卷，第525頁。

② “法典”(Ecloga)是利奥三世所公布的法典，也称“伊索立安法”(Isaurian Laws)。——譯者

③ 为了闡明其中很多困难而錯綜的問題，我将擅自使用引語，大多引自柏立教授版本的吉本所附的精辟注釋。

图。”罗馬法由于它的剛性和无伸縮性，由于它的异教傳統，已变为过时了，已不复适应于改变了的社会状况和帝国内新人民的需要了。所以，利奥三世企图以更动那些管理私产、結婚和离婚、监护人制、未成年人的权利、遺产等等的法律条文，来消除旧法律規定和新情况之間的矛盾。一般講来，这些法律条文是寬大而又合乎人情的，举一例說，在婚姻关系上，承認夫妇共有财产权。

至于刑法上所作的改变，同样是不平凡的，可是恐有許多不妥之处。毁损身体第一次采用作为刑罰的一种方式，这办法在罗馬法里是沒有的。这种刑罰可能是受着巴尔干部族的著名殘酷行为的影响的。另一方面，“法典”取消了那按照等級和財产的差别而量刑的恶习，从而对社会上一切阶級的人，就实行同罪同罰的原則了。

关于土地問題和农民阶級的状况，如果利奥三世的立法曾变为持久的話，那末后来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将要另編一章了。

斯拉夫人的侵入、財政的压迫以及有时把大批省民从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强制移到一个荒僻地区的办法，这一切曾使社会經济发生了深刻的轉变。很多农奴已經逃亡，躲在侵入的斯拉夫人中間。所以，土地法的修改曾是必要的。但是，利奥三世，由于那种如此突出表現在他全部立法上的激烈主义，已認为那完全取消农奴制的时机已經成熟了。“农业法”中表明以租种农民来代替农奴；租种农民繳付什一稅，或按合伙制来耕种，即土地所有者供給土地和役畜而租戶則供給劳动力的办法。当然，这些改革在世俗的和宗教的大地主之間，曾引起很多的叫嚣。富裕的业主和富裕的主教和住持曾站在同一立場，反对这些改革。这反动势力，在第九世紀后半期当巴錫尔一世(867—886年)的立法恢复旧制度的时候，遂取得胜利了。

拜占廷的商业，尽管数額大、种类多，但在整个中世紀时期，由

于不良的信貸制度以及由于禁止希腊商人在帝国外部貿易的淺見政策而受了損害；这政策使所有和西欧的商业經营都落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手里了。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以外，还有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中海盗猖獗状况以及地中海中穆罕默德教海盗船的威胁。这些危險曾引导商人和船舶所有者来組織股份集团，他們共同分取了利潤，也共同分担了損失。意大利商人正是从拜占廷方面获得了那种組織股份公司的商业办法。

我們容易看出利奥三世許多关于土地的立法对教会土地上所产生的影响。教士阶層，特别是那些富得多的僧侶們，猛烈攻击皇帝关于改善农奴制的措施。他們的政策原是对他們土地上的农夫实行殘酷剝削的。这項憎恨情緒由于重新实施旧的人头税以及关于需要出生登記的法律而加剧起来；这項登記是为征收人头税当然所需的条件。教会曾庄严地声明說，这出生登記的立法，是世俗权力对家庭团結关系的侵犯行为；家庭是一个神授的社会制度，而教会便是它的主要保护人。他們还曾說，利奥的征收人头税是仿效着穆罕默德教徒的。僧侶最后一項不平的原因，是关于实施那阻止利用寺院保护逃避軍役的摩里士的法律。

寺院有力的宗教和財政影响，再加上它們所享有的豁免权和特权，使它們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威胁。僧侶可經常依靠着下層群众的狂热支持；大城市中的穷人，由于被現象所蒙蔽，認为僧侶是群众的朋友，因为寺院是以粮食和衣服的补助形式来分发救济費給这批穷人的。他們竟忘了下列事实：僧侶对寺院土地上的农奴劳动进行了又大又殘酷的剝削；僧侶所享有的免税权增加了別种課税；僧侶所誇示的施舍，从他們的龐大財富看来，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利奥三世認識到这种不公平和危險状态。但是，他所进行的寺院改革，也只是暫时性的，直到东罗馬帝国历史的結束时为止，

这种寺院舞弊和腐敗的禍害繼續存在着。从来沒有一个皇帝能够实現过有效改革的。

看来倒是有趣味的，在利奥三世的有些立法里，可以看出那类似公債的东西。

一个小有資本的人，如果愿意的話可以購买一种"終生年金券"，另外再加一种官銜。当然是虛名的官銜，甚至高級官銜①也拿出来出售，而虛名高位者有权領取一种年金，叫做"俸祿"，那給他所付款的 10%。还有很多帝国朝廷中有薪給的小官位可以公然購买，而購买者可把它們轉售出去，或傳給他們的后嗣。这些投資可产生約占投資額2.5%②的好处。

在几百年以后，西欧政府才从拜占廷获得了暗示，采用出售官职状作为政府債券的办法；而英国的"整理公債"③今天还是在出售着。

利奥三世对旧賦稅制度的改革是和他别的改革同样地彻底的。恶劣的"城市团体負責征稅制"予以撤消，征稅事宜改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担任。正是由于他的課稅制度的公平合理，賦稅的負担变为可以負担的了。跟着他的統治和他的改革，拜占廷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阶段。"无政府状态"过去了。政府已有充分力量来渡过各种难关。在 749 年的大疫癘里，死了百万以上的人口。这些缺口是以迁徙省区城市中和爱琴海島嶼上的居民来填补的。人烟稀少的村落，重新住滿了人。虽然被汚辱为"破坏圣象者"——"破坏者"——但利奥三世却是一个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和最勇敢的統治者，具有拿破崙的智慧和效能的統治者。

但是，他的改革中沒有一件是持久的。傳統，首先是教士和大

---

① 这里指 Prospathar 官銜。按拜占廷官銜共分十八級，本官銜是第八級。——譯者

② 柏立版本，吉本，第 5 卷，第 534 頁。

③ 英国整理公債(Consols)于 1751 年整理而成，年息为 3%。——譯者

地主貴族的旣得势力，是太强大了。恶劣的"联保地税"从来沒曾取消过。下文我們将回到这一問題，会看到它怎样影响了十字軍东征前的拜占廷帝国。

利奥三世于741年逝世。在此以后，"破坏圣象爭論"还是在变幻无常的状态下繼續着，直到842年由于情势所迫，不得不放弃这項政策时为止。毫无疑問，一大部分主教、軍队的将領和上層阶級是贊成那运动里体現出来的宗教和民政方面的改革的。但是，僧侶和民众都是拚命地反对；前者，是由于自己的利益，而后者，由于愚昧无知的原因。民众反对情緒在拜占廷帝国的欧洲各省內比在小亚細亚各省內还激烈。这一差别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为什么保加利亚人侵犯巴尔干半島比起穆罕默德教徒进攻小亚細亚較多效果。可是，那些主張破坏圣象的諸皇帝所作的努力，不是完全徒劳无功的。他們所作的民政改革，不是完全由反对派取消了的。僧侶所得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要是不然的話，那接下去的时期不会有那政治、軍事、文学和艺术复兴的特征；而馬其頓时期(867—1057年)之所以出名，即在于此。

第七章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要了解穆罕默德教的兴起和傳布，必須知道一些阿拉伯半島上自然地理。因为历史上也許再也沒有象阿拉伯族那样的一个种族，这样明显地是一个环境的产物，而有着由周圍自然条件形成起来的种族特征。

阿拉伯位于亚洲大陆的西南角的一个半島。但它是有着大陆大小的半島。从形状看来，阿拉伯是一个巨大的四边形，其中沒有两条平行着的边綫的。沿紅海岸約长一千五百哩，沿阿拉伯海岸約长一千二百哩，沿波斯湾岸約长九百哩，从巴士拉横过半島頂端到苏伊士約长九百哩。从紅海頂端到墨士卡特的长对角綫，約有一千八百哩。从表面的面积或平方哩的数目看来，阿拉伯半島大約占着美国的1/3大小或比俄国以西的全部欧洲还大。

从地理和經济来說，阿拉伯眞正是一个孤島，是和其余的世界由海岸或甚至更多隔离性的沙漠阻碍分隔开来的。在海岸，山脉逶迤；和叙利亚隔着移动的而又荒涼的沙漠地带，有一片广闊的荒野牧地向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延伸着。內部有更多的綿亘着的牧地，只在春雨之际，能生长东西；大山脉間有細长深谷；很少永远常青的綠洲盆地。也門除了交通不便以外，則显然不同，它位于半島的极南端，是一个古代文化和富饒的地区，也是河流众多、谷物丰收，具有城市和生活安定的地区。①

关于南部阿拉伯半島（也門）过去的繁榮景象，现在还有不少的証明。所有的古典作家，如希罗多德、普林尼和斯特累波，以薩巴或謝巴这名字，常常把它說成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它依靠

---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3頁。

① «民族»杂志，1917年11月8日，第505頁。

着大規模的水力系統，用笨厚的石墻来限制国內的水流。它有一个水庫周圍达十八哩，深达一百二十呎。在这条件优越的領土上，人口很稠密，有成百成千的城市和村庄；他們使农业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巨商派遣他們的商船队远达中国，还派遣他們的商队往来于叙利亚和非洲沙漠。他們为自己采購东西，也受别人委托做买卖。他們的貨棧堆滿那些来自各地方的物品——銀器、銅塊、錫、鉄、鉛、蜂蜜、蜡、絲、象牙、烏木、珊瑚、瑪瑙、麝猫香、麝香、沒葯①、樟脑及其他香料。也門盛产谷物，它的产量可供三十年之用。棉树、甘蔗和椰子树，枝叶茂密地生长着。麦加的香油、阿拉伯树胶、荆毬花树②濃汁以及出名的乳香是它的重要出口品；也有食盐、黄金和珍珠出口。在一个包括几百年而情况不詳的时期謝巴繼續处于繁榮状态中。在此之后它轉向衰落，而它的全部居民遂向外迁徙了。过去的天堂轉为一片渺无人烟的荒野。至于它衰落的开始时期和原因，則湮沒无聞。

那些住在半島內地而后来征服过世界的粗野部族的情况，則迥然不同了。他們眞的做一天吃一天，而食粮是他們的永远存在的問題。他們主要依靠着他們在家內飼养的駱駝乳以及他們从沙漠綠洲和沙漠边緣所得的枣椰来維持生存。沿海地区固然可貯藏麦子或稻子。以防无收入的季节或旱灾，但是駱駝乳是不能貯藏起来的。它每天依靠着青草的供給，所以內地部族繼續在移动，由于生活所迫逐水草而居，沒有一定的住所。

由于內地阿拉伯人的艰苦的經济生活，他們种族血統的自豪心更加强了，而这自豪心原是反映在阿拉伯政府和社会組織的民族性質方面的。綠洲的棕树以及他們畜群所产的乳和肉，是阿拉伯人生存資料的唯一来源。阿拉伯半島，如果沒有棕树的話，决不能

① 热带所产的树脂，一般是琥珀色，气香而味苦。——譯者

② 大多产于热带，树叶作羽毛状。——譯者

維持任何数量的人口的。

为了經济目的而組成部族組織……这种目的在于保卫他們产枣椰的綠洲以及他們牧地上的家畜，也是为了襲取他們邻人所有的同样东西……人口的人数太多，不可能由貧瘠的土地来維持……在不可計数的世紀中，那丧失了綠洲的部族可能在生活上遭受这样的困难，以致征服别的国家对它們来說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

沙漠是具有为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性質的。甚至在順利的年头，那日益增加着的人口也常常尽力之所能来利用綠洲的地面以及它周圍的草原，而在不順利的年头，居民則将被迫去侵掠邻近的部族或侵掠沿海的村落。如果遇到一个綿长的旱灾时期，則整个部族会被飢餓所迫而迁移他去了。

在阿拉伯人自己中間：

尽管他們承認(甚至在穆罕默德时期之前已經承認)，按語言的統一，按生活和文学的类型，他們都是屬于阿拉伯族，但他們分裂为个别的而且常常敌对的部族，住在地理上由山岭或移动的沙土間隔的地区。这样，他們过着和他們牛羊群相同生活，跟着他們部族界限以內的牧場而移动，或者草率地耕种着各人所可得到的小塊土地。他們的历史是一个掠夺牲口因而常常发生流血斗爭的历史，也是各种部族势力甚至霸权的消长、漫无止境的强凌弱的冲突的历史。但是在这历史的背后，一切都在培养着阿拉伯人的民族自覺心；而这自覺心是由一种奇异的、具体的可是主观的力量（它是至少在一个时期曾升为世界上偉大力量之一)所激发出来的，而且正在等待时机，来投擲一塊新酵母于世界各民族之間①。

这样看来，地势會把它的烙印盖在阿拉伯人的性質之上。由于情势所迫，他变成了不安定、浮动、漂泊和好战。也由于情势所迫，他实行杀嬰和进行战爭。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吃飯的人太多，而妇女不是好战士。在穆罕默德之前好久，阿拉伯部族已逐漸滲

① 《民族》杂志，1917年11月8日，第505頁。

入边境上的綠野。早在公元200年时，阿拉伯人已开始窜入罗馬帝国的远东各省內。在420年时，薩拉森騎兵曾出現于埃及的軍团中，而“狄奥多西法典”(439年)中曾提及他們是駐在东方軍事采邑內的边防队伍。在这里，这种部队在查士丁尼时代还是存在的(«法典»，第11卷，第59頁)。所有近时作家都同意，在穆罕默德出現之前，曾有着一个严重的旱灾时期；各部族都处在极端騷扰的状态之中，它們特別容易接受任何一个新的領导，只要它替他們指出一条生路，逃脫那沙漠中的苦恼生活。

不管我們是否接受那“悸动性变动”的理論，但在穆罕默德出現之前已有大旱灾却是事实。瑟拉拉特部族的殘余現在住于紅海东北的大沙漠中，既很穷苦又很衰弱；不言而喻，过去他們在一个时期曾是一个又大又强的部族。在穆罕默德时期以前，那里发生了大旱灾，在七年时期中沒曾下过雨。因此，食粮和飲水奇缺，几乎整个部落終于不得不迁移他去。他們經过埃及，向西移动而定居于突尼斯。这次迁移和穆罕默德教是沒有什么关系的。它发生在那新教出現之前，但却可証明那罕見的旱灾情势已这样严重，以致发生大批迁移和不安状态。第七世紀中的連綿的干旱証明了象帕尔迈拉一类的城市的甚至沙漠整个边地的完全破产。于是，阿拉伯人开始了从沒有过的迁移运动。不仅瑟拉拉特一个部族，而且很多部族开始感覺到貧困的压迫。他們的駱駝死于口渴，他們的羊群找不到牧場，于是空前規模的掠夺成为他們唯一的出路了。

必須注意，麦加城，即先知的誕生地，不仅是一个宗教的中心，而且是一个貿易和商业的巨大中心；那誕生于貿易环境里的新教，一定是会强烈地沾染着商业的色彩的。麦加城同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有着商业联系，尤其重要的，它是叙利亚和也門間一条大商队路上的中間站，而这一条商路是东方和西方間国际貿易所经过的孔道。在穆罕默德出現前好久，麦加居民唯一的餬

口方法是經营商业。該城位于汉志的晒成焦土的地区，在那里，海岸一带多疫癘而平原含盐質。它是长不满二哩、闊只有九百呎的一条狭窄地带，几乎是完全依靠貿易来維持的。商队的延迟到达就意味着城中居民的飢荒。由二千头駱駝組成的商队时常在街头上可以看到。每头駱駝平均载运着四百磅重量的絲綢、香料、象牙、金屬和香粉。在异教优势的末日，据說每年經过那里出口的东西，合一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半数是利潤。每年大商队出发到叙利亚去，满载商品而归，麦加人把这些商品按高度利潤售給附近的貝督英人。阿拉伯人被迫使用商队来經营商业，因为他們容易碰到强盗的攔劫、容易陷入苦难飢餓的境地。所以，在阿拉伯人中好客是个自然美德。古兰經明白規定了招待旅途中的商人，作为信徒的一項义务；它还宣称在沙漠中建立并維持水井和蓄水池以及維持休息所或商队宿舍是上帝所喜悅的事情。多年以来，麦加城又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中心。一个旅行者，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在卡巴庙里无数的神象中总可找出一个神象来献給他的祇品的。麦加城是朝圣者的集合所，也是商品的交換所，而且那些朝圣商人在庙宇內作为祭品而遺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一个很不小的財源。

伊斯兰教从它的开始时起就和工商业有着联系的。古兰經規定了鼓励并保护工商业作为所有信徒的义务。先知所出生的部族，是麦加城的統治者，也是神庙的保护人；差不多西阿拉伯半島的全部商业都是由这部族壟断着的。所以，先知当然也不会不認識到那一項职业的重要性；它是他部族人的文明和財富的来源。穆罕默德巧妙地調和了阿拉伯民族的两种傾向。对那些沙漠中的部族，他提供了进行战爭和获得战利品的机会；而对那些沿海市鎮中的部族，他提供了經营工商业的机会。阿拉伯人对外征服也是为着商业而进行的。商队杂在他們軍队中，毫无阻碍地来来往往；兵士尽力保护商人和他的商品，因为兵士誠心地相信，做这种工作就是履行一

种象粉碎不信神者一样神圣性的义务。

不管伊斯兰教可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宗教也可以，就阿拉伯和世界的关系上說，它却意味着阿拉伯人各部族从相互間的掠夺轉到对外地进行大掠夺的轉折点。从此之后不复有什么阿拉伯人部族，而只有阿拉伯人，即穆斯林人，非穆斯林人的对立；阿拉伯內部不复有很多血族的斗爭，而只有一个对整个外界的血族斗爭。在穆罕默德出現前和出現时，阿拉伯內部曾出現过一个經济和种族的危机也是相当明显的。阿拉伯人至少在百年的时期中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外来的影响曾起着作用；內心的力量曾放出花朵；人口增加起来，正在冲破着各种阻碍。誰也不能正确地說，其中每个因素究有多少相对的价值；但可說，一切因素都是在起着作用。而且，在它們的影响之下，阿拉伯人有一时期曾是一个民族，不仅是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踐上的①。

下面的說法并非夸大其詞：伊斯兰教所提出物質呼吁，就它的广泛的扩張来說，是和它所灌注的宗教观念起着同样的效用的。它对战斗者約許战利品，对死亡者約許物質的天堂。对沙漠中的野蛮部族来說，搶劫从远古以来就被認为是一种光荣的职业。所以我們不应指責他們热烈地皈依那种宗教；这宗教对他們約許了丰富的战利品，并使他們以他們那些只有可怜的生存資料的荒蕪、不毛、炎热的沙漠区，来換取波斯、敍利亚和埃及的富饒繁茂的原野。

內哈汪德的战役（641年）决定了西部亚洲的命运，波斯归入了穆斯林統治之下。沿波斯边境上的阿拉美易卡农夫曾欢迎阿拉伯人作为救星。阿拉伯人在一个长久的时期中，已从沙漠地区輾轉到边境上的綠野里，而且其中很多人已变为基督教化。但是，他們也蒙受着苛重負担和压迫的痛苦。当阿拉伯人推进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时，有成千累万的本地的阿拉伯基督徒名副其实的前来会合，来帮助他們对波斯的富庶城市进行搶劫。特息丰开

① 《民族》杂志，1917年11月8日，第505頁。

放了它的城門，神話式的战利品落入了他們手里。不久，他們占領了整个伊拉克。

最懇切地欢迎穆斯林教义者是：城市的下層居民、手工业阶層和手艺人；按祆教教义，他們的职业已使他們变为不純洁者……这样，从法律的目光看来，他們已是被遺弃者…… 因而热切地皈依了一种使他們在一个宗教团体中同时享有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宗教①。

跟着，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阿拉伯人同叙利亚一向是有着很密切的貿易联系的；叙利亚在阿拉伯征服世界的事业中是首先被蹂躪的国家。当时，它是世界上一个最富的国家；在那里，几乎无須耕耘就可产生麦子、棉花、大麦、稻子、桑树、橄欖、枸櫞和桔子。黎巴嫩山頂上复盖着最好的森林——橡树、条悬木、大楓树。它是一个景色奇异的国家；依据一个阿拉伯詩人的話，那里每一座山在它的頂上都带着冬天景色，在它的肩膀上带着春天景色，在它心胸里，带着秋天景色，而在它的山脚下則带着使人酣睡的夏天景色了。如上文所說，在第七世紀前好久，貪婪和飢餓，已驅使阿拉伯部族离开沙漠而进入了东方和西方的边境，对波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弱到怎样程度，他們已很熟悉。他們既徹底地認識到这一点，所以他們以停止侵掠为条件，向拜占廷政府要求并获得了經常的补助費。对波斯战爭也給东罗馬皇帝带来了龐大的債务；因而他被迫把財政的螺旋釘扭紧到极度。小亚細亚的居民負担着重稅，又由于宗教斗爭而苦不堪言。在基督教和异教人民中間，已为一个新教义和政府的变更鋪平道路。所以当皇帝希拉克略以虛伪的节約为借口，来撤銷帝国边境上异教貝督英部族的补助費时，不仅它們同新兴的穆罕默德政权締結同盟并开始以侵掠来弥补自己的損失，而且甚至很多犹太人、被压迫的基督徒、附庸民族以及奴隶

① 亚諾尔德：《伊斯兰教的傳教》。

都轉到新信仰方面去了。犹太人大开城門，而被压迫派别的首領們以財帛和武器来助战了。

看来令人惊异的是穆斯林很容易地占領了安提阿、阿勒波和大馬士革，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很多其他城市。其中一个原因是，叙利亚的居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希腊化，但还沒曾充分地希腊化以致同化于拜占廷的制度。阿拉伯人和西亚其他閃族間果然有着宗教上的分歧，可是正教的拜占廷人和"异端"的省民間的分歧更甚于此。而且在西亚方面，那些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永远不会遺忘罗馬曾使他們在过去时代蒙受着这样多的苦难；現在同一的罗馬，或者象他們所称的"以东"，在拜占廷的外衣下还在以基督教的名义对他們进行迫害。对他們来說，那些信仰一神的阿拉伯人在血統方面比起那些"企图以三位一体来劝說世界的坏以东人"当然还接近些。

穆罕默德教徒在征服叙利亚以后即进行征服埃及。波斯人的征服埃及虽为期甚短(616—626年)，但已揭露拜占廷政府在那里的无力和脆弱情况，而这項經驗对阿拉伯人来說是不会忘了的。从远古以来，在埃及和阿拉伯之間已存在着商业关系。穆罕默德也許亲自到过埃及。当然，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因为在古兰經里他說道："阿拉伯和埃及之間从沒有过仇隙。这两个国家是姊妹国。""阿姆尔·伊宾·厄尔·阿斯"即征服埃及者，过去原是一个在埃及經商的商人，对埃及的地理和居民已經熟悉。而且，象上文說过，在埃及边境上已有相当多的阿拉伯殖民地。616年时，在侵入埃及的波斯軍队中还有着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的騎兵，对这批人那些早已定居在埃及的阿拉伯人一定曾予以积极的同情。还須記牢，埃及的本地人为了异端曾受到迫害，而在財政上还被拜占廷政府穷凶极恶地剝削着。因此，象在叙利亚一样，他們对阿拉伯人的征服不是漠不关心，便是积极贊助。对他們来說，改变主人可

能会好些，决不会更坏的。最后那丰富的战利品也引誘着阿拉伯人的侵入。埃及甚至比叙利亚出产更多的牛乳和蜂蜜，出产更多的麦子。这种谷物已成为麦加城內很需要并大量需要的东西，因为穆罕默德已把到麦加朝圣的义务加在一切信徒身上。因为埃及在几百年中曾是罗馬的、后来君士坦丁堡的倉庫，所以現在它成为麦加和麦地那的倉庫了。經济的自利心、实际的政治和宗教的热忱，在穆罕默德教征服尼罗河流域时是互相結合起来的。那位可畏的埃及征服者曾向奧瑪哈里发报告說："埃及是一头产乳的駱駝，一棵綠叶的枣树，一粒白珍珠，一塊黃水晶，一方綠宝石，一幅彩色的綉品。"

尽管这些征服是巨大而迅速的，但穆罕默德教的扩展和推进的力量远沒有因此而耗尽。伊斯兰教新月旗，象大鐮刀割草般地向西穿过里比亚、息里內易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显然，在整个第八和第九世紀中，阿拉伯半島上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它所能够維持的数量。半島上那自然的高度生育率，又以伊斯兰教早期軍事成功所获得的財富和幸福而提高起来。但是，因为这些天外飞来的幸运不能显然提高它的內部生产，所以剩余的强壮人口，在两世紀中无間断地从边疆上向外流出，大部分向埃及方面去（因为抵抗力最少），直至下尼罗河的狹长流域里充滿着那些不法之徒为止…… 那不安定的群众，部分由于埃及統治者的勇气和手腕，部分由于他們自己要获得比起枯竭的尼罗河区域能提供更丰富掠夺物的地方，乃立即再向西推进，并以遙远的开溫作为目的地。的确，先前有很多阿拉伯人已立脚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們看到那里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和他們自己的很相近，曾定居下来，并且部分地柏柏尔人化了①。

穆罕默德教征服地中海的长距离海岸比征服波斯、叙利亚和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 14 卷，第 783 頁。

埃及所費的时間長得多。其延迟的原因，部分是在新征服地上必須組織伊斯兰教的政府，部分是需要时間来发展用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教海权，因为阿拉伯人是不习慣于海面生活的。他們在 648 年占領了塞浦路斯，在 653 年占領了罗得島；在 654—673 年間，多次进攻了君士坦丁堡；在 667 年对它进行了第一次大圍攻；在 672—673 年再度对它举行了圍困。其次，虽然非洲各省內本地居民，无論基督徒或异教的摩尔人、努米底亚人和柏柏尔人，都痛恨拜占廷政府，但有城垣的城市，特别是迦太基城，以及錯綜地布置着的砲台、卫城和軍用路网使征服的进展推迟了。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对圍攻战术和襲击設防城市还沒曾熟練。的确，塞普頓城曾維持到 709 年为止。

伊斯兰教徒原是具有沙漠居民天性的，尽管在他們不习慣的海面上已表現出他們的威权，但对海洋还是不信任的，所以他們决定以开温(建立于 670 年)作为非洲各省的首都；开温位于广闊而肥沃的平原上，从那里，阿拉伯政府的权力遍及非洲海岸和沙漠地区。当地居民虽屬于不同种族，但由于类似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共同之点；他們遂欣然接受了伊斯兰教。开温的位置，在突尼斯南一百二十哩，距加柏斯湾三十至四十哩；在埃及以西，北非洲再也沒有象它那样重要的其他地方了。由于这沙漠中的地位（虽然不是沒有飲水的），它当然可完整地保存着它阿拉伯人的性質，而沿海各城市以有罗馬和拜占廷居民以及历史上的联系，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的黎波里、突尼斯、波那和修达各城因此成为同地中海对岸的比薩、热那亚、阿馬斐等等进行貿易的沿海城鎮。不久，这些新征服者也冒險出海，而大海遂变为他們进一步征服的通路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各地都不能幸免他們的侵掠。他們对各島屿进行侵犯，西西里遂被他們占領。他們原是海盗，可是不久也認識到經商的好处。意大利各港口不顧教会的禁令，开始和异教徒建立了

通商关系。我們将叙述在十字軍以前中世紀商人怎样同薩拉森人做交易而常出現于他們的港口。

罗馬人从来沒曾能够粉碎柏柏尔和摩尔氏族，它們住在近代摩洛哥的难于跋涉的山地中。这些由本地首长統治着的氏族中，有五百十六个名字流傳下来。这些山中居民虽然强悍，可是对伊斯兰教的武力降服了。

698 年时，大馬士革的奥米耶朝哈里发曾派出那个可畏的穆薩，不久他的声名遂震动了世界。一个又一个部族很快地屈服于他的武力之下。他在山岭中对柏柏尔的战役眞是以人作野兽来打猎的。但是，在被征服以后，柏柏尔人成为所有臣服于伊斯兰教部族中的最狂热、最好战的部族。正是柏柏尔人在柏柏尔酋长統率之下，眞正地实現了穆罕默德教征服西班牙的計划。酋长塔里夫·伊宾·馬力克·阿布左拉是于 711 年 4 月在西班牙海岸那和他的名字永远分不开的地点——塔里法登陆的。

政治腐敗、經济压迫、社会不满以及对犹太人的蛮横迫害——这一切如上文所提过，在基督教西班牙都是結合在一起的——使西班牙民众象叙利亚和埃及的民众一样，把穆罕默德教看作救星了。另一方面，无限的战利品的前景对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也是一种引誘力。在西班牙有很多古城、富裕的教会、古老寺院，在那里几百年来积聚了財富。此外，它的平原满布着牲畜，它的矿产富饒得难于置信；安达盧西亚是个风景优美、土質肥沃的园地。

穆薩在热勒斯·得·拉·弗龙德拉的胜利（711 年 7 月）后，曾正式向哈里发报告关于征服的历史，指出他所得的掠夺品达到了怎样龐大的数量。他曾俘获成千成万的俘虏。穆薩写道：“我的营帳象在最后审判日各族人的大集合。”在开温市場上一个壮健的男人，只值几盎司胡椒。有挑选出来的基督教美女三万人被送到亚历山大城、安提阿和大馬士革的奴隶市場上去。教会几百年来所积聚

的財富都被占夺。犹太人从他們的压迫者的灾难中，特别获得了丰收；他們利用着兵士的无知，以微不足道的款子購进了祭壇上的神器、装飾宮廷美女的珠宝以及一切富丽昂貴的奢侈品。后来，犹太人在欧洲政治上和財政上所获得的优势，就是从薩拉森征服西班牙开始的，因为它使他們获得了莫大財富。

薩拉森人越过比利牛斯山对法兰克高盧的侵襲，由于732年时查理馬德尔对他們的胜利而告結束；这侵襲对法兰克地区沒有什么持久的影响。結果也沒有造成穆罕默德教的征服；的确，他們在埃波罗河外的出征，只不过是掠夺的侵襲而已。这一点可以下列有趣味的事实来証明，这些侵犯者是一貫地攻击寺院的，因为他們象諾曼人在下一世紀所发觉的那样，很快发現寺院是大量金銀器皿和珠宝等財物的貯藏庫，也是藏着錢币和貴金屬的地窖①。

在750年巴格达城建造的时候，穆罕默德教已控制着阿拉伯半島、旧波斯帝国以及除小亚細亚各省以外所有原屬拜占廷的亚非两洲的領土。它拥有着非常富饒的地区，全世界貿易的中心，并統治着千千万万最勤劳的农民、精巧的手艺者和狡猾的商人。它是所知道的陆上海上最古老商路的主人翁。

可是，在日益推广領土圈时，伊斯兰教的扩展力量还沒有被它的第一批龐大征服而耗尽；它的光芒放射到那些从来沒曾落入罗馬或拜占廷統治范圍的土地上。自从亚历山大帝时期以来，西亚从沒看到过象伊斯兰教所进行的那样一种变革。穆罕默德教依循那条从叙利亚越波斯而达中国的橫跨大陆的大商路，仿效那批景教徒的榜样（他們被逐出于叙利亚，后避难于亚洲中心并在那里

① 法兰克人在都尔胜利以后，奥斯特拉西亚軍队曾把大量战利品分配給自己，但是很多落到寺院里。下文曾提及一大批純粹阿拉伯黃金的寺院宝物；見《論味达斯特团体的报告》，第4章(Sermo de Relat Corp Vedast C4)。載《德意志古文献》，文艺編，第15卷，第402頁，第40—41行。

建立了基督教-东方文明)而达到并渡过了阿姆河，即亚历山大帝的"极东"。

可怪的是，阿拉伯人在商业上所具有的大胆和敏感性以及他們的傳教热忱，在早期沒曾引导他們沿非洲东岸来伸展他們的勢力。这項扩展沒曾大規模地发动起来，直到十三世紀为止，虽然据傳說，在"徙志"节①(622年)后不久，有一批阿拉伯移民队曾渡过巴布·厄尔·曼得海峡，深入阿比西尼亚，并逐步伸展它的勢力远达奈格耳河。然而，这項傳說很少根据，所以历史家們不予信任，而把穆罕默德教的深入西苏丹归因于埃及和努比亚的影响，并且認为这事件是在后来出現的。

現在，我們要討論关于穆罕默德教国家的內部經济、殖民形式、对被征服人民的待遇、行政組織，特别是它的財政措施。那認为阿拉伯人是无情的剝削者和暴虐的稅吏这种广泛傳布的观念是錯誤的；这是基督教欧洲对穆罕默德教仇恨心理的遺产，而这仇恨形成于十字軍时期，更通过奥托曼土耳其人而流傳下来的。

我們必須从原始阿拉伯人講起。他們尽管有些恶习，可是具有几种高貴而严肃的美德。其中最突出的是：

> 他們的偉大榮譽观念，在战争里或在家內，在对被征服者的寬大，在对陌生旅客的保护，在对妇女的尊重或在对部族和邻人的忠誠都有表現，連在可怕的血緣报复方面也表現出忠心…… 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說如果拒絕給陌生人保护，那是对全部族的一个无穷尽的恥辱，可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現，是很可怀疑的……黑夜一到，阿拉伯酋长的蓬帳近旁就点起了灯火，来招引那些徘徊在沙漠中的旅客到那里获得阿拉伯人的款待和保护…… 另一种榮譽表現，是在恪守所作的諾言。一个有榮譽心的人决不自食其言的；当阿拉伯人由于和希腊人及波斯人接触变为道德墮落的时候，他們才采用了宣誓的形式。

① "徙志"节(Hegira)另譯"黑蚩拉"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出奔麦地那的日子(622年9月15日)，这一年是伊斯兰教紀元的开始。——譯者

在这崇高的荣誉观念的基础上，穆罕默德建立了一个新的阿拉伯社会；他是一个偉大宗教家，也是一个偉大社会改革家。古兰經，象«旧約全書»在古代希伯来人中間一样，是一本宗教書，也是一本法律書。因为在每一塞姆族中，政府已是一种神权政府。这是塞姆族的創举。穆罕默德关于家庭、婚姻、父母和子女間的权利义务、禁止杀嬰、照顧孤兒、老人、穷人、病人、精神病者、奴隶以及关于財产的領有和遺产的种种立法，同“狄奧多西法典”及“查士丁尼法律汇編”的基督教和罗馬立法对比之下，在理智、公平和仁厚方面，当然是沒有什么遜色的。一切穆罕默德教徒在法律前的平等地位，穆罕默德教社会里沒有对抗的阶級差別，沒有什么教士的等級——因为在伊斯兰教里每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教士——穆罕默德教社会还摆脫了象拜占廷帝国內的主教和住持那样的有野心而貪婪的教士阶層所发生的弊病，——这一切品質使早期穆罕默德教盖上了一个新的和兴奋的活力的烙印。

穆罕默德教徒在战爭中固然兇狠，但却是仁慈的胜利者。他們对被征服人民所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古兰經、貢賦或宝劍”，使波斯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犹太人(作为“被保护”的民族)得自由保留着他們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风俗、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在繳付人头稅的条件下，可获得政府保护的保証。人头稅是在对一切穆罕默德教屬民所征正規賦稅以外的一种附加稅。它是对不信伊斯兰教的成年男人所課的稅。富人每年应繳四十第倫(第倫“dirhem”如果不管汇兌价值的波动或近代購买力的差別如何，按重量計約值二十分美元)，中等阶層的人每年应繳二十第倫，穷人每年应繳十第倫。但是，妇女和未成年者、眞正衰老者、眞正貧穷者是可免繳的。

由于征服的結果，穆罕默德教繼承了那灭亡了的波斯的領土以及“基督教国”的亚非各省領土。它从这些領土上获得了丰富資

源以及它們控制紅海、波斯湾和横貫亚洲商路的地位；可是除此之外，它从隶屬民族波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的稠密的人口中，还获得了甚至更大的資源；因为这些民族从远古以来就以經商本領和机械技巧而出名的。伊斯兰教采用了一項賢明的政策，即承認这些非穆罕默德教屬民是“盟約的人民”，准許他們保留他們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社会制度；这样一来，那些原来也許会倔强的屬民变为安靜而勤劳的公民了。阿拉伯权力之所以能均衡地发展起来，是可归結到这一政策的。应該指出，甚至当伊斯兰教本身的宗派主义使巴格达哈里发朝的政治統一破裂的时候，它的文化統一，无論物質的或精神的，还是保持着的。

那些曾呻吟于拜占廷帝国所实施的宗教迫害和財政压迫之下的千千万万人民，利用了这个新的宗教形式和社会自由，这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也得到好处。因为阿拉伯人需要农民阶層的心甘情願的劳动，基督教手艺者的精巧技术以及亚历山大、安提阿、大馬士革、阿勒波各大城市中商人阶層的商业进取心。

为了免付人头税，为了取得資格在軍队中任职（文官职位是公开地对非穆罕默德教徒开放的），很多人轉信伊斯兰教了。基督教徒对穆斯林在人口比重上的优势也慢慢地下降了，而且越来越有利于穆罕默德教，因为穆罕默德教人口的增加率在速度上远过于本地的基督教人口。这是由于穆罕默德教实行多妻制度的緣故。原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在阿拉伯半島的貧瘠土地上，人口一向是对生存的一种压力，而飢荒是一个經常状态；所以曾用杀嬰方法来消除那人口过多的景象。可是，跟着那已知世界上的最富饒土地落在他們手里以后，杀嬰已不再需要了。而且，如果阿拉伯人曾看到，象他們一定曾会看到的那样，那在他們的人数和稠密的基督教人口之間所存在的大不相称情况，那么他們自卫的本能就要使他們贊成多妻制了。史籍里指出，穆罕默德教人口是在稳定地增加着；

而这一增加不可能完全以那些脫离基督教的皈依者的增加来說明的。在上層分子中，通常是有着很大的家庭的。富人們以希腊人的、科普特人的和波斯人的奴隶姑娘，作为小老婆。阿尔·摩吉拉·伊布·秀巴有四个妻子和七十六个小老婆，据說有三百个子女。到832年时，埃及穆斯林对基督徒在人数上的优势已确立起来，因为那时阿拉伯人开始定居于村落和乡村里，不象以前那样只住在大城市里了。

阿拉伯征服者一步一步地并經过相当时期后，同皈依信仰的穆斯林人混杂起来，而那些被容忍的“被保护者”成为另外一个非穆斯林人的阶層。当时有着各种原因使对貴族血統不如以前重視——其中对私生子的一般容忍也不是一个最小的原因——不久，这些原因把新皈依者的地位几乎提高到和原皈依者相等，而“被保护者”也逐漸获得了屬于眞正阿拉伯人的大部分权利。

現在我們来講穆罕默德教国家的課稅制度。如果可把一个大国的財政状况作为它的繁荣或貧困的尺度和証据来看，那末，埃及、非洲、叙利亚的居民生活在新月旗帜下比起在过去拜占廷統治下要快乐些。古文献証明，課稅的标准是公平的，是依照納稅人的能力和状况而分出等級的。姑且不談如上文所說的由非穆斯林人所繳付的人头稅，我們只就財政問題可以看到，国家的主要收入（除了很重要的战利品收入以外）是“則卡”(Zekah)，就是規定的賑款稅；这是向极穷者以外一切穆斯林人所課的捐稅，有一定的比例，約占他們的駱駝、羊、金錢、土地上产物等等的2.5%；这笔进款用以发給軍队的餉銀、支付那些办理征稅官員的俸金以及救济穷人。最奇突的行政上的特点是，按照規定的比例把每年国庫的盈余分配給忠誠者。奧瑪尔曾命令就穆斯林的总人口作出詳細調查，把因出生或死亡所造成的每一增减随时正确地登記出来。国庫盈余的分配是从先知的家屬开始的。先知的愛妻阿适每年領取

一万二千法郎;他的其他寡妇領取一万法郎;那些曾参加过柏德勒战役的"助手"和"流寓者"各領取五千法郎;哈里发領取同样的数目。分配数目依次递减到每年三百法郎,那是給也門的某些平常人的。那些在穆罕默德出奔后离开麦加到麦地那的妇女們每年各得領六千法郎。那些在怀抱中的孩子們各得一百法郎;跟着他們的年龄可加到二百或二百以上的法郎;弃兒同样是由国家的公費来撫养的。这种財政制度对伊斯兰教帝国的統一和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想而知了。

这中央集权制,是由驛站制度补充的,驛站网遍佈全国,使各地都和巴格达相联系着。在帝国一切最重要城市和首都之間都有驛使路綫,中間还有換馬站。有一时期,这些驛站的数字在全帝国范圍內达到了一千左右。当时,傳递邮件的速度是眞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們看到有一个驛使在三天之內走了七百五十哩。鴿子傳信的方法也曾使用。政府划出一部分公款建造道路和修理大公路。政府贊助——差不多替代了——私人热忱来挖井、建造旅館、設置里程碑以标誌路程的距离。哈倫·阿尔·拉希德的愛妻祖巴伊达曾建造从麦加到麦地那的巴尔-沙基路,即东方大道,并沿着巴格达到麦加的整个路綫开掘水井,建立旅舍。她为麦加城建造了十哩长的引水管。在这些建筑方面,她总共用去了两百万金币的巨款.

关于政体,阿拉伯人采用了拜占廷的行政制度。甚至希腊語在以后百年多的时期中仍然是埃及的官方語,直至阿拉伯人口和皈依者人数的增加使阿拉伯語成为大多数居民的自然語言。近三十年来,在埃及出土的大量的"草紙"——官方报告、土地登录簿、租税卷册、丈量簿——对这問題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这些文件指出阿拉伯的征服埃及大部分是和平地进行着的;課税是公平而又輕微的;行政舞弊是严密防止的;生命、宗教和財产都是受到保

护的。

埃及有一个特設的灌溉行政部，每年并委派稽查水閘堤壩的专員。地方水閘由地方村庄来管理和維持。吉本說："曾撥出三分之一的貢賦作为常年修建水閘运河之用的。"藍-蒲尔說，"阿姆尔曾用灌溉方法来发展土地上的生产，并实施那从远古傳下来的劳役制度。在冬夏两季，保持着十二万劳动者在工作，来修建堤岸和运河。"偶然，象在615年时，尼罗河由于絲毫未发生泛濫，而产生了一向与此俱来的可怕后果。

亚历山大城固然还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但它不复是一个埃及的首都了。阿拉伯人太害怕拜占廷舰队的攻击而失掉它，也許有着太多的沙漠地区，以致不願以海口作为他們政府的所在地。阿姆尔曾确定以弗斯塔特为新首都，位于图拉眞所建造的古代罗馬砲台的附近。弗斯塔特繼續是埃及的首都直到969年开罗建立起来时为止。

英国的朝圣者阿基尔夫約在670年时曾遊历亚历山大城，說它是全世界貿易的中心，有"无数的人"到那里来購买东西；在法提馬朝时代，亚历山大城曾被算作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就制造业来說，它們几乎完全是拜占廷統治下工业的延續。織布业也許由于西欧和哈里发的共同需要（为了哈里发曾織造許多华丽的織品）曾有改进，而且在数量方面也大有增加。亚历山大城、廷尼斯和开罗都是又大又兴旺又富饒的城市。1047年时，波斯旅行家那塞里-庫斯兰曾訪問廷尼斯，看到它的繁荣景象，大吃一惊。他說及那里的"一万爿店鋪和五万个男居民"。在島上的港口內有一千只船停泊着，而該島并不生产什么东西，完全依靠着貿易来获得一切供应品的。尼罗河的漲潮冲去了那环繞着的鹹水流，并以淡水灌滿了地下"水池和水庫，够維持一年时期"。当时，科普特人所穿的好看的花布比以前要昂貴。在苏丹的織布机上所織造的布疋只是供他

自用的;一条头巾可值四万地那;但是这些織品是永远不拿到市場上出售的。除了这些王室专用的織品以外，織造一种叫做光滑緞(bûk alimûn)的綢緞，即光彩夺目的短緞，它織得这样精細，据說在白天每一小时內它会改变它的顏色的。廷尼斯的鋼刀业的出品和它的織机上的出品几乎是齐名的。

孜孜不倦的阿姆尔曾想用經济和商业的带子把埃及和阿拉伯联系起来。他的第一項努力是开掘在紅海頂端从尼罗河到克列斯馬的古代运河，約有九十哩长;跟着，埃及的麦子可从尼罗河啓运无須換船而直达阿拉伯海岸。阿姆尔还曾計划用一条运河来切断苏伊士地峡;但奧瑪尔禁止了这項計划,因为他害怕这条运河将会使拜占廷人进入紅海来截断朝圣路程并干涉商业。不久，克列斯馬运河开始淤塞了;約在761年时,它实际上已被破坏，为的是要迫使反叛的麦地那因断糧屈服。然而，这一条运河曾是从紅海到地中海商品运輸的經常道路。

可是，很多紅海貿易是通过紅海西岸的貝倫涅斯港的，从那里,用大篷車載运貨物越过沙漠而达上尼罗河,再把貨物装在木筏上,順流而下。这条經过沙漠的路程約需三十天时間。另一条,是横过苏伊士地峽而达到珀琉細安(法拉米西)的通路,在此之前,珀琉細安早已是有些历史重要性和富饒的港口。这条路程可縮短陆运时間約四至五天,而且，如果上紅海的港口曾有所改进，它的用处还会大些。

在努比亚战爭之后簽訂了一項条約,依据这条約,努比亚每年应进貢三百六十个奴隶給駐在埃尔-喀斯的埃及官吏；埃尔-喀斯距阿斯旺五哩，是埃及边境上的市鎮；另以四十个奴隶来交換小麦、大麦、扁豆和馬匹。条約和奴隶貢賦繼續有效达六百多年之久。

意大利和埃及之間的交通似乎从来沒有完全断絕过，甚至在阿拉伯的优势时期也是如此。722年时,威力巴德曾看到一只从埃

及来的船停泊在那不勒斯港口內；在第九世紀，亚历山大城的織品确曾通过威尼斯人的活动运到意大利来，虽然其中很多是經北非洲来到阿馬斐的。827或828年时，威尼斯人曾出現于亚历山大城，他們并携回了圣馬克的圣物，“他似乎已成为他們的守护神，因为他是基督教埃及的保护者，也是他們在到这个最早的远方市場去的又长又危險航程上的捍卫者”。

在查理曼时代哈倫·阿尔·拉希德曾派遣大使往法兰克皇帝那里去；大使所經过的旅程是先沿着北非海岸西行，然后渡海而到达意大利。当时，作为礼物贈給查理曼的一只象是由陆路牵到的黎波里，再从那里装船渡海而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港。即在那时，基督徒和穆罕默德教徒在对方的国家里显然都是可享有相互的安全保障的，也許商人們曾利用了这項机会。我們果然找不到条約来証明阿拉伯和基督教国家之間在早期已有着商业的关系，但我們不能援引这一事实作为那早在800年时没有商业关系存在一說的辯解。象瑪斯·拉特立指出的，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很可能所有的协定都是口头的，而商人們做他們的生意是没有什么正式协定的。直到进行規模相当大而需要保护的貿易时，才会意識到条約是必要的。

第八章　墨洛溫朝、喀罗林朝的法兰克高盧和日耳曼，查理曼(768—814年)*

在上文講到日耳曼侵入的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法兰克人怎样慢慢地渗入并扩展于下萊茵河和索謨河之間的地区，当时他們沒有遇到什么阻碍，因为罗馬居民早已放弃这一区域。单就他們达到索謨河来講，法兰克人的移动是一个移民性質的移动。但是，到了486年时，他們达到了有人居住的領土边緣；从那时起，法兰克人的扩展是一个征服性的移动了。他們迅速蹂躪了那名义上还在帝国統治下的北高盧、东南部的勃艮第高盧以及西南部的西哥特高盧。到567年时，法兰克人的統治在西方已达到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而在德意志，除了保持着在黑森的原有法兰克領土以外，他們还征服了阿勒曼尼人(496年)、瑟林吉亚人(532年)和巴伐利亚人(552年)。这样，不仅是那从日耳曼人侵入中誕生出来的最偉大而又最持久的国家建立了，而且是一个新型的国家形成了。因为法兰克王国是把罗馬从沒統治过的自由德意志和征服了的罗馬省分联合起来的唯一日耳曼王国。它是一个日耳曼-罗馬王国，和任何别的日耳曼王国不同而且远远地具有更大的意义。在法兰克王国內，两个基本种族成分即罗馬和日耳曼人的比重，势均力敌，那是在以前任何王国內所未曾有过的。

在另一重要方面，法兰克国家也和其他王国有不同之点。它是天主教的，而不是阿利阿教的，象其他国家那样。我們已講过，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3頁。

宗教分歧怎样成了东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灭亡的一个因素；它怎样成了西哥特西班牙大大衰落的一个根源。相反的，在法兰克王国內，教会成了政府的支柱，而且——也許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在罗馬天主教居民和法兰克人之間，不存在对立的情况。这一事实产生了政治上的和諧和效能，也促进了两族人民間的通婚。一句話来說，从开始时起，法兰克国家沒有內部不和景象。这种統一性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效果的意义，我們便无須費詞来說明了。

在法兰克人到达之前，高盧主教区原是富饒的。当教会被承認为国教以后，它就已由立法保証享有承受遺产权，获得贈品权及領有土地权。它不倦地灌輸着現世慷慨解囊的人們将来在天堂上可得丰富报酬这一观念。它的口头禪是“施舍将有好报”。法兰克僧侶狡黠地利用了一般对圣徒的热誠崇拜，以求增加教会的基金，那是第六和第七世紀的一个突出宗教現象。正是圣徒，而且往往仅是一个当地的被崇拜的圣徒，成了眞正的业主。当时所流行的强烈的人身和所有权观念，要求給精神的教会以一种具体的人身表現，即使保护神是一个看不見的人物。圣徒被看作精神上的教父和教母，而祈求圣徒的佑助成了一般的情况；因为圣徒会在天堂上为他們的被保护者說情的。一个教会施主的名字，是登記在教会登录簿上的。

施主可以分成为三类。那些越来越多的出身于地主貴族的主教把他們祖傳的土地献給他們所管的主教座。法兰克历史家都尔·格列高里曾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其次，富裕的世俗地主是慷慨地捐給教会地产的。最后，法兰克国王是最慷慨的施主，竟使王家土地縮减到損害墨洛温朝政权幷实質上促使該朝衰落的地步 法兰克教会为了使这些資源永不减少，按照398年迦太基宗教大会的决議，禁止了教会土地的割讓。

教会法規曾規定：四分之一的进款将用作主教家庭的开支；四

分之一将用作救济穷人；另一四分之一将用作維持僧侶阶層；最后的四分之一将用作維持原有的教会建筑物，或者建造新的教会建筑物。法兰克僧侶們曾是大兴土木者。也許在十一世紀宗教复兴之前，中世紀时期再也沒有别的世紀建造了这样多的新教会。当时，有些主教是有才干的理財家。据記載，有两个主教，在为教会用去了大量款子之后，死时庫存还有两万金币。

土地所有权，不仅提供了庄稼、水果、葡萄、木材及其他物質資源；它也提供了农奴作为这些庄园的耕种者。那領有三十所庄园的主教或住持，就是領有三十个村庄人口的人，因为每个庄园都有它的村庄；因而他就成为几千佃农的业主。其中每个庄园构成一个特殊的經济社会单位。在每个村庄里，主教或住持有着几座倉庫和谷倉、一所磨坊、一部葡萄汁压榨器或一間釀酒房。大部分佃农是从事农业的，但也有从事农业社会所必要的家庭工业、工艺和織布、硝皮、制革、制造木器、鍛炼金屬等业的。剩余的自然产物和超过需要的手工制品是拿到本地市場上去出售，而市場本身往往是在主教或住持控制下的。

以文明程度来說，法兰克人比其他日耳曼族野蛮一些。但是这文明侭管还显出野蛮的粗俗恶习殘暴，它比起哥特人的文明实質上还是健全得多的。的确，墨洛溫朝諸王几乎都是殘暴、无信、恶毒的，而都尔·格列高里的《法兰克諸王史》(約在600年时)看来大部分是記載着战爭、暗杀和謀杀事件的編年史。这些国王都是由幸运的征服慣坏了的不肖子；他們放縱了自己的野蛮恶习，同时还培养了他們所接触的那些沒落的罗馬社会的恶习。

但是这个国家的眞正力量，不是在于国王，而是在于大地主阶級，它屬于高盧-罗馬或新日耳曼或混合的血緣和傳統。这个統治阶級必然包括着主教地主；在它的下面，是基本民众，即罗馬人和日耳曼人，包括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在内；由于都是天主教徒，他們

还有着混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由此可見，法兰克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由种族成分混合起来的社会，不象在其他日耳曼王国內，是一个由不同的而又敌对的成分結合起来的社会。

意大利、南高盧和西班牙的宗教矛盾曾使罗馬人和日耳曼人分隔开来。在法兰克高盧，这种敌对状态是不存在的。而这产生了重要得不可估計的結果。教会曾大力促进法兰克統治的稳固和扩展。教会从沒有对这統治权进行挑战，象在阿利阿教国家內教会所做的那样。它安然保存着它所领有的广大地产，并順利地抵抗了墨洛温朝諸王几次对它課税的企图。主教們当然都是屬于高盧-罗馬世系的。直到第七世紀，我們才开始看到法兰克血統的僧侶。在高級僧侶中，很多是狂暴粗野的，因为他們也不能避免这时代的风气。可是，其中也有偉大而善良的教士，象法兰克最早的历史家都尔·格列高里那样。教会尽管縱容它的施主的犯罪行为，可是有时却成功地緩和了法律的殘酷性，特别是通过实現庇护权方法。尽管有很多僧侣放蕩不拘，盗用宗教进款，教会所做的实际慈善事业却是巨大的：在这內战几乎經久不息而下層社会遭受貧困和可怕灾难的时代里，它进行着救济穷人、維持医院和救济照顧孤兒寡妇的工作。教会作为社会机关来說，不是整个地不忠实于它的責任的。

至于高盧-罗馬貴族方面，他們由于安然拥有大地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压迫，已把法兰克的統治完全看作自己的統治一样。他們的行政經驗对法兰克国王来說，是无价之宝。墨洛温朝軍队中有些最好的将领，是屬于高盧-罗馬世系的。

在罗馬省政府崩潰的时期，高盧的至少是南高盧的城市生活已获得新的力量。在第六世紀中，我們还可看到"市議会"、城市"两人共职制"和"保护官"。所有的大城市以坚固城垣环繞着，甚至小市鎮也筑有防卫工事。城市間的爭斗——看来是由罗馬长期統治

沒有完全抹去的古代凱尔特氏族間或各部族間的敌对情緒所产生的叛乱——加深了墨洛温朝諸王子間的冲突。

法兰克社会果然是殘暴粗野的，但它具有一种剛直性、一种力量、一种生活力、一种純粹性，而这些都是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所沒有的。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是一个又自然又正常的社会，在性質上，不是一个造作的和变态的社会。为了这个原因，法兰克国家不仅是注定要成为所有日耳曼族中的最持久的、最有勢力的国家；也是注定要成为最有建設性的国家，是在罗馬帝国廢墟上建立一个新欧洲的新生和团結的力量。所有其他日耳曼王国，是太脆弱、太易破碎，不能維持久远。只有法兰克人連同教会，才是注定要完成这古代世界和中世紀世界間的过渡工作的。有些历史家說，法兰克人对罗馬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反抗力或阻碍力。我認为这种措詞不当的說法，是夸大的。在日耳曼制度同罗馬制度融合的过程里，无論在精神或职能方面，都有着为两种制度同时各起作用的余地。但是，要从墨洛温和喀罗林制度中挑选出什么例子来說，这是純罗馬的，或純日耳曼人的；倒是一个困难的工作。

如果我們来把法兰克社会研究一番，并把它同罗馬后期的社会对比一下，我們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一过渡。法兰克社会除了僧侶以外，还包括有四个阶層，而它們的地位，是以財富来决定的。最下層的是奴隶；在他們之上是农奴，按理論，农奴是自由的，而实际上，由于債务的牵累，已是固着于土地上的，自由人，即小土地所有者；最上層是大地主，叫做“貴族”或“显貴”。在法兰克人中間，沒曾有过种族的貴族。这貴族等級是通过做官和地主制度而兴起来的。法兰克政府曾是一个地主政权。由于征服高盧的結果，广大的帝国国庫領地，在法兰克人占領的領土之內的土地，以及也許在法兰克人已經定居而还未占領的一切土地，当然归屬作为征服者的国王或皇帝繼承人所有。这样，就把一个巨大的权力源泉，放入

国王手里。法兰克国王既然占有了帝国国庫領地，就成了一个大地主，的确，除了教会以外，是最大的地主。这些領地，不仅是作为进款的一个来源，而且是作为报酬他臣屬的手段。国王的賜給土地，在初期，看来簡直是贈与性質；但到后来，才完全認識到，王室土地在建立一个王室行政制度上，具有巨大价值，因而就发展成为一种封建式的庇护制度了。

我們有必要来談一談关于王国政府的支持者所屬的那些阶級。一般講，这批支持者原是国王所熟悉的人；国王在登位之前，就已依靠他們的服务。国王有着自己的侍从或卫兵；也就是，由于密切的个人联系而附着于他的人們。这些人在他領导之下去作战，分担他的危險，也分享他的光荣。国王从他們中間挑选那些在他的新地位上为他服务的人們，并以他新获的土地来报酬他們。这方面的最好例子，便是那由国王的战士队所产生出来的法兰克"亲兵队"。另有一种接近国王的人是他的半自由和不自由的奴仆，特别是那些管理他家务的人。国王从这批人中間找得他所需要的熟練于服务的人。墨洛温朝宮廷大臣的官銜"宮相"(Major domus)、"家宰"(Senescalcus)、"元帅"(Marescalcus)、"大法官"(Camerarius)，都是原来用于不自由奴仆的头銜；这一事实可指明这些重要官职的微賤根源。但是国王的侍从和王族沒曾供应王国政府所有的新官吏。人数越来越多的别种人，特别是地主阶級，認識到担任王室官吏所带来的益处，因而力图爭求那項职务；但是，在开始时，大多数的新官吏看来完全可能是从密切圍繞国王的人們中挑选出来的。

"庄园"或王室領地散布于全高盧和萊茵河区，总称为"国庫領"。其中有的是位于旧罗馬城市內的地产，象在巴黎、奥尔良、理姆、德里佛斯、麦次那样，但是其中大多数是大农庄，而国王所喜欢的是位于象克利奇、奇尔、乔济、埃皮內、馬倫海一类大森林附近的

庄园，因为法兰克国王是热愛打猎的。耕地、草地和牧場、森林、魚池、采石場、矿場可能都包括在一塊領地之內。庄园內的住宅区都有着一座高盧-罗馬建筑式的庄园大厦，一般是用木材建造在領地中最适合的地基上，两側并附有寄宿国王官吏的小房屋以及馬房、倉庫、儲藏室和仆役間。当时，国王是沒有固定首都的。随便什么地方，国王临时駐扎在那里，就是政府所在地，因为他的官吏、随从、服役者、卫兵和家奴的整个队伍，是跟他一起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去的；的确，那在一个几乎完全是农业經济的时代是必要的；当时商业和貿易既稀少，道路又窳敗，而現款税又是很少的。国王正象俗語所說，是"吃着穿着自己的东西"的。地方賦税，主要以实物来繳納，例如，繳納十五分之一的收获、十分之一的猪和牲畜，等等。所以，王室庄园成了国王收入的最重要的泉源。

墨洛溫朝諸王曾以土地贈与来报酬他們官吏的服务，而后来貴族地主就領会到下列事实：王室服务可提供有利可图的职业；而且一个懦弱的或年幼的国王可被哄騙或威吓从王室領地內无条件地撥出土地賜給他的寵臣。因为男爵、宮廷官吏和軍队指揮是以恩賜土地来維持的，自然而然地这些行政官員就会成为地主阶級；相反地，有勢力者或大地主勢必侵占行政官职。一种眞正的封建社会結构、一种眞正的封建政府形式，无論在理論上或形式上，还都是远在将来，可是以后的封建制度的根源，在墨洛溫朝时代，可以說是已經存在了。政府大員即男爵，或多或少已是不可罢免的，他們的任期已漸漸成为世襲性的，而大地主，世俗和宗教的，也有着脫离王室政权的傾向。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大多是由于內战；在內战里，国王力图以撥給国庫領的土地来取得支持者。的确，那完备的封建保有权——采邑制——是在喀罗林朝时代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墨洛溫朝的后期，王室土地的賜与已接近那种形式的保有权了。这种貴族地主的独立傾向，又由于給保有者以特权的

这种成长着的慣例而加速起来。“特权”原来是只給予宗教貴族，主教和住持的，而这特权所发生的效果是使僧侶的庄园脫离地方男爵的管轄范圍。国家官員往往是盛气凌人的，也往往是貪汚受賄的，因而他們被禁止进入这样的庄园内去审理案件，或去征集稅款；这样一来，特权享有者就只对国王負責了。但是，因为国王常常是远在别处，或者是懦弱的或年幼的，貴族很快就看出从这特权里可获得使他們的庄园享有更大独立地位的手段，因而他們从王室强取了各种免除权。由此可見，由于这項慣例，王室的权威和王室的收入同样蒙受了損失，地主貴族的权力急速成长起来了。在第七世紀中，宮相便是这个跋扈阶層的代表。

宮相这官职，原是一个卑微的职位，甚至是由奴隶出身的人来担任的。当时，每个王室庄园的收支，是由一个管事或管家来监督的；因为朝廷是从一个王室庄园移到另一个王室庄园的，国王的首要官吏宮相遂查核这些所在地的庄园帳册，这样，按一种意义来說，宮相成了国王进款的控制者，也是他恩賜的分配者。于是，这官职不知不覺地成了一个有政治勢力的官职，所以如遇到一个懦弱的或年幼的国王統治时期，宮相会成为眞正攝政者。在他的职权中，有着批准讓与王室領、給予或扣留王室恩賜、征集賦稅等各种权力。“王宮就是国家；誰在国王宮廷中勢力大，誰在法兰克王国中勢力就大”。由于这种情况的結果，613年时，地主貴族，采取使貴族領袖兰登·丕平永久占取宮相职位的方法，获得了王国的控制权了。

地主制度的成长，对自由人的状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第五世紀末期，当法兰克人进入高盧的时候，在他們中間可能有几千个日耳曼自由人，但是到了第七世紀，自由人的人数显然已大大地縮减了。地主阶級的压迫行为、官方的脅迫、由偶然飢荒和疾疫所引起的“艰难时期”，首先那两次长期的内战时間(573—613年和674—687年)的混乱状态，使很多自由阶層的人降到了农奴的地

位。那些在国王、他的官吏和他的朋友手里的大地产，在相比之下，使那些在自由人手里的自由地成为微不足道；这种情况不仅使自由人看来显然比新地主低下一級，而且也提供了机会可把自由人降到依附他們的有势力的邻人的地位。后一項过程，徐徐发展着，直到墨洛温朝后期才成为普遍。普通自由地和大地产之間在早期虽已显然有着差别，但是，大多数自由人，看来还是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長期內战，一方面对弱者和无保卫力者来說，是有破坏性的，另一方面对强者和拥有自然的財产資源和私人扈从的人来說，倒是有利的。这种小自由地，在簡朴的状况下，原足以維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可是，現时在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在重税負担的压迫下（大多由于无数次战爭的消耗而产生的結果），已不复能滿足土地所有人的需要了。又当安全保障实际上已經消逝的时候，自由人遂需要私人的保护；因此，头脑簡单的自由人不管什么条件，竭力取得有势力官員或富裕地主的庇护。由于屈服于这双重压力下，大批普通的自由人把自己的土地讓与一个附近的地主，然后依"請求方式"再收回这些土地，或者領取那个地主的别的土地。这样一来，地主在附近的村庄社会內贏得了控制权，而且有时竟順利地使整个一个村庄降到他的庄园附屬地的地位。自由人所以这样地放弃了他的土地，也許不是經常出于自願的。在国家官吏所提的他們屬民所遭压迫的例証中，常常提及"强占别人的土地"的事件。

另一类成为地主的佃农的自由人，包括着那些原来自己沒有土地的人。国王对未被占据的土地的要求，剝夺了农村社会向外扩展的机会。由此产生的結果是：或者把一塊全部仅足以維持一个家庭的自由地，分給几个繼承人，或者是使居民中的一部分人沒有土地。这些无地的自由人，在地主的大庄园上找寻僱佣工作而成了农奴。

在墨洛温朝时期，仍在使用“請求方式”的罗馬办法和罗馬名詞。其原因可在后期墨洛温王国內所存在的状况里找到。小土地所有者“委身”于大地主的保护之下，因而成了这个領主的佃农，正是在这一种关系中，我們可看到那封建时代的宗主和附庸間关系的开端；无地的人沉淪为农奴，因为不仅个別地而且整个自由村庄被大地主并吞了；这是第八、第九和后来世紀的庄园制度的起源。这批人遂和罗馬后期的隶农与“外来的隶农”相混淆了。这一过程的結果是：一方面使地主获得了一群忠心的随从以及一批管理他的庄园的职員，另一方面使那些沒有土地的人或者宁願以一种不安定的自由权来换取一种安全而更有利的依附地位的人获得了一个保护人和生存資料。自由小土地所有者之所以淪落到依附佃农的地位，可从墨洛温朝后期的經济困迫的状况里得到正确說明。

有必要指出，地主阶級在王国北部（在奥斯特拉西亚）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强大。村庄的名字一般地直到第七世紀才出現便是一个重要証明；那表明了从那个时候起，村庄和庄园生活才开始成为一个固定的經济单位和社会形式。这些名字往往是从地主豪族的名字得来的。但是，在罗亚尔河以北，一直延伸到日耳曼地区，可以看到象-海姆(-heim)、-豪曾(-hausen)、-因根 (-ingen) 这一类地方名字的尾詞；这可以使人相信，在这地区日耳曼人占領的地方比起南部要多；的确，从很多其他資料我們也可知道这一事实，特别是从一种語言学性質的資料。在这些不自由的庄园村庄中間，插入其他日耳曼自由人的村庄，后者保存了古代日耳曼村庄社会的社会性質和經济制度，直到被卷入封建制度圈子里为止。

在农奴阶級的下面，还有着大量奴隶人口，他們是从罗馬文明遗留下来的，但也包含着一些日耳曼奴隶。这些奴隶的大部分，也和农奴一样，是田地上的普通劳动者。其余部分，是在富有的业主的田庄上和庄园住宅內的家庭奴仆。从这个时候起，农奴和奴隶

阶級混淆起来了，或至少是界限不清了，而他們的命运也变为同样痛苦的了。主人对他的奴隶有生杀之权；尽管643年的夏龙宗教会議禁止了把基督教奴隶出售到王国以外去，然而国內和国外奴隶貿易仍很兴盛，释放奴隶的事情是稀罕的。在奴隶地位下降中，几乎只有一件事实，是具有进步性的，就是，准許奴隶結婚，以及不复把奴隶的子女認作私生子。从流傳下来的遺囑文献里，我們可看出这时代的社会态度：在文献里把农奴和奴隶并列作为財产，虽然严格說来，只是奴隶屬于动产范圍，并把奴隶和农奴的子女象小狗或小猪般地混合在一起，看作一窠之畜或一窠之雛。

撒利克法典，即法兰克人的法典及教会的立法，都指出：墨洛溫时代是一个艰难而又强暴的时代。在418条法律中，有343条是禁止犯罪的，主要是在农业社会里一般侵害人身的罪行。在侵犯財产的罪行中，盗窃牲口最为普通。刑事訴訟程序是按照下列三种方式之一进行的：

(1)宣誓証明制。按日耳曼旧法律，法律上的証明基本上是以用宣誓来証实的供詞的价值为根据的。被告无須提出証据，說明他对所控的罪行沒有犯过；但必須宣誓說，自己是无罪的，并必須获得若干其他叫做“証明者”的人来共同宣誓，不是因为他們知道他是无罪的，而是因为他們相信他所說的話是眞实的。

(2)神意裁判法，即用热鉄、沸水或投入深水的方法来审判。当宣誓証明还不够的时候，就采用神意裁判法；理由是神力会暴露出被告的声明是否眞实。凡是拒絕受这項考驗的人，当然，就是承認有罪。关于冷水的神意裁判法的心理是极其奇特的。如果被告有罪的話，水不会接受他，因而他会浮起；如果他无罪的話，他会沉下去。这的确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如果他浮起而免于溺死，他将作为犯罪論而遭受处罰；如果他溺死，他被信以为无罪者，而象正人君子一样地永远留名。当然，事实上，冷水的神意裁判法往往也

未曾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

(3)决斗法，即搏斗裁判法，有时叫做上帝的裁判法；理由是无罪者一定会获胜。这最后一項方法只应用于自由人和貴族中間；因为农奴和奴隶都是不准带武器的。

“蛮族法典”的一个特征，是赎杀金(wergeld)制度，即为犯罪而繳付罰金的制度，而这制度在法兰克人方面实行到过分的程度。这些罰款都分門别类地分成等級；对于一只手臂、一条腿、一只脚、一只眼睛、一个指头、一顆牙齿的損伤，各应罰付多少都有規定。这些都是古代日耳曼人的办法。对犯罪的类型，教会加上了瀆神罪、强姦(尼姑)罪、巫术罪；国王还加上了叛逆罪。在这些处罰里，社会特权是被愼重地保护着的。暗杀或伤害一个法兰克人比暗杀或伤害一个罗馬人处罰得要重；同样，杀害一个貴族比杀害一个自由人处罰得要重；杀害一个自由人比杀害一个农奴或奴隶处罰得要重。

由此可見，法兰克制度，在政府的形式方面和社会的結构方面，都包含着封建制度的要素；但这是初步的沒有常規化的封建制度。这些制度有的是起源于罗馬人的；其他是起源于日耳曼人的；虽然严格說来，它們产生于古代文明的政治、經济、社会的衰落状态多于种族的根源，因而它們是过渡性的現象。

墨洛温朝諸王曾努力保持他們在高盧所見的罗馬課稅制度，但成效甚小。罗馬人所遺留下来的財政制度已逐漸消灭。无論在征收老的照例的賦稅或建立新的賦稅方面，都有困难。两种在殘缺不全形式下留存的賦稅，是土地稅和通行稅。由于豁免权的存在，征集稅款大多已被弄到无法办理的地步。罗馬“关稅”原来是按値抽2.5%的稅，而現在蛻化为对一切商业运輸差不多是任意加稅了；商品和运輸工具都須繳稅，象下列法律名詞所指出的那样：桥梁稅、車輪稅、徒步或小販稅、河岸或登陆稅。关于土地稅，法兰克人接收了那保存于城市档案中的罗馬土地丈量册，但是它的征稅机构十

分复杂，以致法兰克人不能理解。从开始起，法兰克人自己已拒絕繳付土地稅，所以土地稅只在罗馬居民中才可征收。而且，当地主貴族不論罗馬人或法兰克人，变为更有力量的时候，他們就拒付这样的賦稅了。580年时，紐斯的里亚国王曾命令修改土地估价法，但是貴族起来反抗这項重新估价的企图；由于困难丛生的結果，契尔柏立克遂亲手把土地簿册付諸一炬。罗馬的土地稅不知不覚地蛻化为一种封建貢賦，那是由貴族以貢稅(taille)的名义对佃农的土地所課的稅；这样一来，它就轉入封建制度內了。这些古代的土地丈量册經过相当时間以后，失掉它原来的面目，以致它們和后来的寺院統計簿間有什么关系是可怀疑的。

关于商业方面，如果認为日耳曼人的征服高盧立即使商业归于破毁，那是錯誤的。罗馬帝国的物質文明对蛮族的影响，曾予抵抗。貿易、工业和城市生活慢慢地萎縮下去或变动了，可是，沒曾有过突然崩潰的情况。过程是一个逐漸衰落的过程。

在墨洛溫朝統治时期，高盧和东方的商业关系沒有中断。馬賽、那旁、阿利斯依然是南法的主要港口。东方和西方的商品交換看来还是相当頻繁。当时的資料指出，在重要城市里，还有相当多的商业活动。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延續着罗馬时代所存在的情况而已。法兰克王国政府毫无更动地接受了罗馬人的公路制度；我們知道在第六世紀或更早时期，阿尔卑斯山是經由大圣伯尔納德或小圣伯尔納德山路越过的；从馬賽到热那亚的全部沿海道路是經常使用的，虽然沒有疑問，当时的战爭曾产生一些混乱。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和南高盧保持着經常的联系，并由于罗馬道路的存在，比利牛斯山可在两处通过。除了罗馬大公路以外，还有很多次要一些的道路，来联系各个城市。当然，这个时代的商业，不及高盧-罗馬时代那样活跃，有些过去活跃的商业中心在蛮族入侵时期已經毁灭；但是也必須指出各个地方情况的特殊原因。北法

比南法农业发达，而当时的工业主要是农业的附屬品。

我們有文献可証明：法国的南部和中部城市的商业是很繁盛的，因为来自东方的船只把那些远方国家的主要产品源源运入。意大利、希腊、叙利亚和埃及商人云集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里，他們甚至远达高盧的北部。很多大商业是在犹太人手里，而他們在法国的南部和中部的人数，是很多的。看来很奇怪，这批商人似乎是很愚昧的。有人告訴我們，他們不会写字，他們僱用抄写員替他們写信和記帳。主要的进口物是小麦、酒、油、枣子、香料、胡椒、生薑、沉香、象牙以及絲織品，而很多絲織品是由僧侶使用的。关于高盧的內部商业和工业，缺乏正确的資料。可能，在帝国时代，有些城市的重要工业已經消逝。我們还知道一些关于比哥尔的紡織品以及加奥尔的亚麻布。

地方市集把乡村居民吸引到城市中去，我們知道，其中有些定期市集有着很古老的起源。关于巴黎市集、特罗伊市集以及加奥尔附近的市集，在墨洛温朝文献里，已經說及。629 年时，达哥伯特曾建立圣登尼斯市集。随着寺院数目的增加，市集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市集是在圣徒节日举行，有时还在紀念圣徒的教堂前面举行。由于道路不安全和各地通行税激增，商业經营越来越困难了。在罗馬时代这类通行税原是用以改进道路、建筑棧道、建造桥梁、修理公路的；但是，在法兰克时期，它們丧失了这些原有的特性，而公共收入归入了官吏或当地貴族的私囊。法兰克国王和貴族的无知与貪婪心理使这类課税增加了。的确，偶然有过一个官吏曾提出抗議，而至少有一次，克魯太尔二世曾被迫取消其中若干弊端，并恢复了古代的征税制度(公元 614 年时)，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地方的篡夺行为和特权繼續增加；教会和寺院遂得利用特权来征集税款。

由于盜賊橫行，路上往来很不安全，特别是当时散布在高盧的

很多森林边緣的道路；这种不安全情况曾迫使商人們結队或在护送下旅行。可是尽管不安全，这些道路显然还有工人、手艺人和小販时常来往；他們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現款藏于挂在他們頸脖上的小袋里。他們在夜里寄宿于那时城市內、私人住宅內或寺院內所設立的旅舍，如果他們幸而走近一所的話。有一个奇怪的事实：旅行者宁願走羊腸小徑而不願走罗馬的康庄大道；其原因是双重的，一来可安全得多，二来可少受通行税的勒索。这种說法可从发現古代遺物的路綫，获得証明。商人們喜欢走水道甚于陆路，而当时的商业使用着罗馬人所熟悉的船舶車輛，正象都尔·格列高里及福图內塔斯所說的那样。工业除了在南法以外，主要是那些附屬于农业的工业，象硝皮工、制革匠、木匠、織工、陶工各业那样，或者是附屬于宫廷的工业，象金銀匠那样。这些行业，都是用拉丁名詞标志出来的。文献还說及石匠和雕石匠。我們看到他們修理城市的墻垣、城中的引水管以及建造一所教堂。我們不能断言这些工人屬于那一阶級，他們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

在法兰克时代的早期，城市旣不是象古代城市，也没曾披着象它后来所具有的特征的外衣。尽管它是萎縮，但在城市居民中，还有着很多社会等級。法律虽把所有的等級混合在一起，然而我們也有可能把他們区别开来。除了高級王室官員以外，还有地方望族以及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从事工商业的自由人。在旧罗馬商业集团中，有的是势力雄厚的。600年时凡尔登城的公司曾向国王借得七千金币。叙利亚人、东方希腊人以及很多犹太人还是在經营商业。奥尔良城的闞特雷姆入口处指示我們：在高盧中部，甚至在一个城市中，要說各种不同的語言。

甚至在这早期，我們已可看出那些注定要改变城市生活性質的重大象征。那在帝国的末期已进行的經济革命，在第六和第七

世紀中还是在发展着。随着城內人口的縮減，我們开始看到市內有空地、花园和果园。文献証明了这些葡萄园、花园及果园和房屋同时并存。这一事实在战争时期，是一个严重的弱点。但是，在十一和十二世紀人口再增加的时候，这些空地必然是很重要的。

法兰克高盧的基本居民，屬罗馬世系的和从日耳曼起源的，是专門从事农业的。法兰克人大多从罗馬人方面获得了他們的农业知識；在庄园制度成立以后，在日耳曼村庄丧失了它們的自由并降到庄园的地位以后，我們看到庄园的耕种方法怎样影响了日耳曼村庄的耕种方法。罗馬的影响从植物、水果以及农具：犁、耙、貨車的各种名字方面，显然可見。葡萄是由高級奴隶来种植的，那保护他們的贖杀金，可資証明。牲畜牧养在法兰克人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尽管有豺狼为害，牲畜群还是很多的。香宾盛产羊，德意志盛产猪。乳酪的使用显出了一种拉丁的影响。德文 Cheese（干酪）一字是从拉丁文 caseum 得来的。“白脫”(Butter)也是从拉丁文派生出来的。几百年来，罗馬人遵守着耕种的“两田制”以及长方形田制，而日耳曼人保持着他們村社祖傳的田地“长条制”。甚至这些自由村庄退化到庄园村庄以及庄园制度的財政压迫都不能使这些历史悠久的耕作方法完全融合在一起或有所改变。

最专門性的、最精細的、最有利的农业形式，是葡萄种植。哥特人在第四世紀已从罗馬人学会了飲葡萄酒，并在他們占領西班牙和意大利时期发展了这种嗜好。法兰克人当他們进入高盧的时候，看到遍地都是葡萄园，特别是在罗尼河、瑪恩河、摩塞耳河和格罗內河各流域。

然而，在入侵时期，精耕細作在日耳曼人中間是非常少见的。据我們所得关于巴伐利亚人和斯瓦比亚人的资料，他們对葡萄园尙一无所知。“撒利克法典”曾提及那久已从事的葡萄栽培业，可是葡萄酒的釀造还是在低級阶段。罗馬人是法兰克人的导师。在

第四和第五世紀，当薩利安和河濱① 法兰克人住在莱茵河沿岸的时候，他們很少从事高級农业——只有少数花园和葡萄园。葡萄种植业，在河濱法兰克人中間，直到第六世紀当它在波恩周圍已变为重要的时候，仍不普遍；即在那时，薩利安法兰克人尙以为葡萄屬于奢侈品一类；約在 200 年后，他們才从事葡萄种植业。起初，葡萄种植业只是被看作一般农业的一部分，到后来才認識到它的特殊重要性。

当时，有人曾想出各种方法，使当地所产的葡萄酒味道美好，如燒煮、加香料等，可是，沒有疑問，其中有很多一定是很坏的。因为外国葡萄酒日益昂貴起来，貴族，世俗的和教会的，曾想法把葡萄带到他們的土地上种植。尤其是僧侶們，他們为了圣餐，需要葡萄酒；于是寺院象其他地方一样，变成了主要种植者。僧侶們开墾荒地，种植葡萄，并教导其他的人怎样去种植。凡是不用于自己消費的葡萄酒，便送往市場上去出售。不久，他們不但滿足了当地葡萄酒的需要，而且还給予商业以一种从来沒曾梦想到的刺激力。

从后期发展看来，莱茵河和摩塞耳河流域的葡萄种植业最为重要。但是，在中世紀时代，还有大批葡萄园在其他地区兴起；虽然为期不长，但这里也値得談一談。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瑙河沿岸的那些在罗馬时代开始培植的葡萄园。在斯瓦比亚，最初有葡萄酒是在 716 和 720 年間。在巴伐利亚，第一批长成的葡萄，是在慕尼黑附近的加斯太堡；那是由弗莱兴主教在 724 年移入那里的。在瑟林吉亚，葡萄最初是在 786 年生长在多道夫地方。最受欢迎的是夏龙、馬康、第戎以及摩塞耳河区所产的葡萄酒。貝稷亚的葡萄酒，也是受人欢迎的。西班牙葡萄酒甚至在南高盧都很著名，而薩拉哥撒产的葡萄酒，最受欢迎。意大利，甚至东方，輸出稀有名

① 河濱(Ripuarian)法兰克人，指第四世紀移居于莱茵河畔者。——譯者

酒，例如加沙的葡萄酒；喝这种酒一般是要加水的。法兰克人在冬季，常飲热酒。都尔·格列高里曾提及酒和蜜的混合飲料。在北高盧和德意志，啤酒是更受人欢迎的飲料，在那里法兰克人消費了大量啤酒。我們不知道，什么植物曾用作酵母，因为忽布球果直到第九世紀，才輸入那里。啤酒中也混合着蜂蜜。当时的作家还曾說及用芬芳植物，如玫瑰花和水果一类所制成的飲料。这是一种永远保存下来的古法。

儘管受到罗馬的强烈影响，法兰克人的社会生活，依然是很象日耳曼式的。男人只留上唇的髭鬚。大部分法兰克人繼續穿日耳曼式的服装。只有很少数的上層分子装出罗馬人的式样。甚至在富人中間，也很少有人能够买得起絲綢、金綫編带和綉花的奢侈品以及叙利亚的紅皮鞋。在房屋建筑方面，富人采用或模仿罗馬人的別墅式样，有寬敞的房間，周圍有花园和草坪为边緣，还有貨棧、馬房、谷倉、附屬房屋以及奴役間。这整个一組房屋叫做“田庄”(hof)。法兰克农夫住在树枝和蘆葦搭成的小屋里，但是罗馬血統的农夫一般是建造石头小屋的。孤单的石屋，往往用一条沟渠和木柵来圍繞着，构成一所“田舍”(curtis)，那在整个中世紀仍是小业主住宅的普通形式。今天德文中关于造屋的詞汇，都是从拉丁文得来的；例如，窗戶(fenster)、石灰(kalk)、房間(kammer)、柱子(pfeiler)、阳台(söller)、磚瓦(ziegel)。

当高盧的商业繼續沿着罗馬的老路进行的时候，东德意志的商业由于法兰克人連接了高盧和德意志，扩展到了超出以前罗馬帝国的范圍。当时还在野蛮状态的瑟林吉亚人和薩克森人經营着毛皮和皮革、蜂蜜和蜡的生意；直到第八世紀，他們才有高級的商业。瑟林吉亚人是以貂皮来繳付貢物的。当时，法兰克人的貿易甚至越过易北河及扎勒河而达德意志边境以外。

在这个时期，可以从亚得里亚海向北到丹麦划一条綫把欧洲

分为两部分，即斯拉夫人的东方和日耳曼人的西方。可是，尽管这两个种族互相敌对，看来从法兰克时代早期起，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間却存在着某种数量的边境貿易。日耳曼人希望扩大商业，这是他們向东扩展和征服斯拉夫人的一个重要动机。有人提及早在第七世紀上半期，已有冒險的法兰克商人曾深入斯拉夫人的荒野，来換取奴隶、琥珀、獭皮和貂皮。

在达哥伯特一世时代（629—639年），有一个被称为叛徒的法兰克商人，名叫薩摩的，同异教的波希米亚人、摩拉維亚人和克倫地亚人建立了商业关系；据說，他終于放弃了基督教，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蛮族国家；这一国家的領土从德拉瓦河和西利西亚起延伸到瑟林吉亚的边疆；勢力强大，足以打敗法兰克軍队，地位重要，足以使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来求它結盟。

从下一事件可以得知，法兰克国家和薩摩国家之間，在第七世紀中存在着頻繁的商业接触：631年时某些法兰克商人曾在波希米亚被杀死；于是，达哥伯特曾遣使到薩摩去，而这个不机敏的使者侮辱了薩摩，因而薩摩的确把他赶出了境外。此后，达哥伯特統率了由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甚至从意大利来的某些倫巴人所組成的軍队，来討伐这个国家；但是，在伏加斯提勃斯一役，遭到了慘敗。薩摩曾完全把异国作为自己的家乡，据說，他至少曾娶十二个妻子；如果我們相信弗雷德卡的話，他有二十二个兒子和十五个女兒。他統治了三十五年。在他逝世后，他所統一的領土似乎又按原来的构成部分分裂了。

在下一世紀的《斯图密的傳記》里（他是邦尼非斯的門人，弗尔达的住持，死于779年），曾指出一条經常的貿易路綫：从扎勒河越瑟林吉亚森林而达馬因斯。然而，这种法兰克权力的东进趨勢，主要并不是起因于商业上的冒險，而是起因于內部經济社会力量的扩展要求。因为地主制度日益发展，那些被剝夺和被驅逐的人

們曾避到森林中去，在那里开垦荒地，并建立一个新住所。森林成了穷人的家。但是，私有財产权的繩索也逐步纏繞着森林了。从勃艮第和西哥特的法典里，可以看出私人占有制侵犯了森林的痕跡。佛日山上的森林在都尔·格列高里时代（約 600 年），亚尔丁山上的森林在第七世紀早期，都开始被侵占了。

那种有勢力的地主貴族，即領主的兴起，是在墨洛温朝后期的一个发展，也是当时正在成长的封建趋势的一种表現。領主經常是某一地方的領主。这个阶層在奥斯特拉西亚力量最强大，是屬于法兰克族的而非屬于高盧-罗馬族的貴族。564 年时，他們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当时奥斯特拉西亚的息泽柏特同他的弟兄紐斯的里亚的契尔柏立克作战，他曾請求萊茵河彼岸的部族来支援他，并以塞納河沿岸他已征服的城市贈給他們，作为酬劳；那将会等于又一次日耳曼人占領东北高盧的战爭。但是，奥斯特拉西亚的貴族反对这样做，而他們的抗議获得了成功。在两个兇狠的女王，布倫希德斯和弗雷艮德斯之間的长期斗爭中，地主貴族扩大了他們的权力。613 年时，地主貴族，由兰登·丕平代表，占夺了宮相职位的控制权，于是他們成了控制王室的力量。这种新形势等于一次政治社会革命，使奥斯特拉西亚的大地主获得了对王室的控制权。此后，墨洛温朝諸王居"統治"之名，而沒有治理之实。除了 656 年和 687 年間的一段时期外（在这时期反对宮相擅权的行动暫时得到了胜利），奥斯特拉西亚的公爵一直控制着法兰克王国。赫斯塔尔·丕平(687—714 年)、查理·馬德尔(714—741 年)和矮子丕平(741—768年)依靠地主貴族并为了地主貴族，治理着法兰克王国；最后，于 752 年，矮子丕平廢止了契尔得立克三世而自己戴上了王冠；后来他的兒子查理曼使这个王朝非常光輝燦烂。

墨洛温朝的傾覆和 752 年矮子丕平的登极，不仅仅是一次政治和王朝的革命；奥斯特拉西亚族由于长期控制宮相职位，因而替

代了墨洛温朝。那也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和經济的变革，因为現在大地主貴族已經完全得势。法兰克的政府、社会和經济，在精神上，在形式上，都已成为半封建式的，虽然当时还未曾想出“封建”这个名詞，来表明这种新形态。喀罗林时代是以政府和社会确立在那可以称之为封建貴族組織的一个基础之上而著名的。这項改变是奥斯特拉西亚巨头的权力逐漸增长而必然产生的。

如果我們把弗雷德卡的門人对第七世紀世界的陈朽情况所发出的悲观論調和喀罗林朝早期历史家的証明作一比較，“我們就可認識到在第七世紀中欧洲达到了怎样的一个低潮状态，而奥斯特拉西亚的征服和改革带来了一个多么偉大的复兴”。

法兰克王国的眞正权力泉源和重心是在北部，即在奥斯特拉西亚。查理·馬德尔依靠奥斯特拉西亚巨头的支持，曾把奥斯特拉西亚、紐斯的里亚、勃艮第和阿奎丹各分裂的王国統一起来。而且，北方——不是南方——是一个眞正进步而有建設性的政策的中心。征服异教的法里西亚，贊助邦尼非斯在东德意志的偉大傳教和殖民事业，如創設弗尔达、赫斯斐尔德、阿莫尼堡各地的寺院以及建立弗莱兴、愛尔福特、弗里茨拉尔各地的主教区，都証明在第八世紀法兰克民族向外扩展和行政管理的力量都还很强大。

这过程由于薩拉森人的入侵高盧而加速起来；其中都尔战役(732年)和亚威农及尼姆的圍攻(737年)，都是主要的战事。南高盧各省的罗曼語居民，特别是在布罗温斯省的(那里的地主阶級不及北方的那样有势力)，早就憎恶法兰克人的統治。在这种場合，种族和社会的矛盾发展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以致有些南方的主要貴族对穆罕默德教徒的推进，竟視若无睹。因此，查理·馬德尔的軍队几乎全部是从講日耳曼語人数較多的北方，抽調出来的。752年的王朝和政治革命証实了法兰克地主貴族的胜利。使封建主阶級权力增长的另一原因，在于馬德尔运用了下列的軍事策略：征用

那些屬于教会主教区和寺院的大批土地，并把它們作为采邑来賜給他的支持者；这一措施保証了他們对政府的支持，也实質上造成了貴族的中央集权。这种行动是激烈的，但在紧急状态下，却是可以采取的，虽然教会曾指責它是“掠夺行为”①。

馬德尔所采行的这項措施，只不过是为了政府的利益而利用那教会久已使用过的办法而已。这是一种出借或租借的制度，把土地租借給人，取租的或不取租的，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承租人耕种它們并占有它們的用益权。这叫做恩賜地制度，而所以授予承租人耕地是为了恩泽。如果把土地授予僧侶以取得他們的支持，那是不取租費的，而这样贈与的土地叫做“农場”。如果租給俗人，那是收取租費的，叫做“恩賜地”，那成为后来封建采邑的起源。查理·馬德尔原作为紧急措施所采用的办法，后来成为喀罗林政府的一个經常制度。王室以教会土地和王室土地分封出去，这样，整个貴族阶層，世俗的和教会的，由于这些封地所产生的义务而受王室的束縛。

另一与这政策近似而会产生更多流弊的办法，是把教会官职从那时起越来越多地授給俗人——当然連带授給他們处理所屬教会的收入之权，为的要把教会資产用于世俗的目的。这类“俗人”住持和“俗人”主教，只在名义上是教士；他們所有的想法和愛好都是封建式的。这样一来，教会和世俗間的距离縮短了。教会封建化了，并且加入了当代的封建体系。作战的主教和作战的住持連

① “看来查理·馬德尔在遭遇到困难局势而做的事情，的确不是对教会財产一般地下令沒收。关于这点，他似乎曾受到不公平的譴責。但在許多場合，他曾使用那在理論上屬于王室的收回贈与的权利，为的要从这里的主教区或那里的寺院取得土地把它們贈給勇敢的將領；他派遣这批將領去統治辽远的省分，担任郡守或抵抗弗里西亚人或薩拉森人。在这样的許多場合下，土地的眞正使用权并不会变更，但这‘恩賜地’租种者被指令不把他們的地租（用我們的名称）繳給教会而应繳給郡守”。——霍治金，第七卷，第61頁。

同他們的扈从都被編入法兰克軍队里；軍事艺术成了主教一項重要才干。随着这項新政策，“兼职制度”的流弊接踵而来了。查理·馬德尔的忠实朋友和支持者迈罗，“只因剃去头发而是僧侣，”曾充任两所寺院的“俗人”住持。他的侄子雨果甚至还不止于此，曾担任五所寺院的住持。

如上文所說，那在后期罗馬帝国和早期蛮族时代成长起来的庇护制度，在法兰克人时代，获得了以前未曾有过的一种形式和固定形态。在这时期，封建制度胜过一切，并滲透一切。地主貴族一心要在庄园牧师区內保持教职授予权。地主委派他們所需要的人充任牧师，正象他們指派他們的管理員和管家一样；他們控制牧师区內的收入；他們保留对牧师区財产的所有权完全象对他們庄园上房屋的所有权一样，他們出售、遺傳、或随意用别的方式讓与它們。对这种弊端，查理曼无力管理，更談不上取消了。他曾七次尝試，而七次宣告失敗。所以，封建制度維持了多久，这弊病也繼續了多久。

但当法兰克国家这样地經受革命的变更，从而封建的政府形式、封建的社会結构、貴族的中央集权制替代了散乱而又无效能的墨洛温朝制度的时候，一个性質上迥然不同的外部革命，一个不利于西欧“基督教国”經济情况的革命，也在第八世紀中发生了。这是薩拉森人对地中海区的征服。759 年矮子丕平曾占領那旁，并把薩拉森人逐出高盧境外。但是在 697 年薩拉森人征服了迦太基，711 年征服了西班牙，于是他們获得了基地，来經常进攻西西里(664 年、740 年及以后常常进攻，直到 831 年占領巴勒摩、843 年占領墨西拿为止)、撒地尼亚、科西嘉以及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带；由此而产生的結果，使地中海区的基督徒商业破坏不堪，直到十一世紀为止。最近西欧获得了一个写在埃及“草紙”上的文献例証，那是屬于 787 年的，从这例証，我們可推論：那个时候阿拉伯人阻

碍地中海交通的力量已日益加大。到了第九世紀中期，伊斯兰教成了一个强大无比的地中海强国。

与伊斯兰教对西方商业封鎖地中海的同时，喀罗林朝国家形成为一个沒有外国市場即沒有过去繁盛的东方貿易的国家，一个由地主貴族統治的几乎全部是农业經济的国家；这两种事件的同时发生，絕不是一种偶然事件。两者之間是有着联系的。从經济观点看来，喀罗林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在墨洛温朝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講还有古代罗馬的商业和貿易习慣。在喀罗林朝，这些状况都已消逝了。到第九世紀，那原为高盧最富饒省的布罗温斯变为一个最貧苦的省了。在那里，叙利亚人的居留地已不复可見。科比的僧侶們曾长久享用从福斯港口所得的大量通行税的收入，到716 年，則錢袋里已是空无所有了。馬賽降为杂草丛生的港口，終于湮沒无聞約有 200 多年之久。除了貿易衰落以外，还有下列其他各种証据，說明法兰克境内經济状况的显著变动：墨洛温朝的人头税已經取消，城市已在萎縮状态，商品已不流通而具有地方性質。农业活动几乎已占压倒商业活动的上风，一种消費經济已代替以前（至少部分的）交换經济，关税已蜕化到地方的、专横的通行税，造币厂和市場已合并在一起，而墨洛温朝的虛金本位已引人注意的轉变为实际的銀本位；因为，如果喀罗林国家和流行苏里德金币的地中海地区保持着一些联系，喀罗林朝諸王会把貨币单位降低到它以前价值的三十分之一的。下一商业名詞的更动也足以表明喀罗林时代西欧改变了的經济和商业情况。古典拉丁字“emere”（“購买”）已不可复見，而代之以“comparare”，意即“物物交换”或“討价还价”。“mercator”“購买者”变成为“comparator”（“商人”），“forum”（公共集会場所）变成为“mercatus”（“市場”）。

法兰克人的貨币制度是一个复杂而又专門性的論題，这里无須深入討論，除非币制的改变反映出商业的逐步衰落和經济的逐

步轉变情况的地方。当法兰克人和罗馬人接触的时候，他們熟悉了君士坦丁所制定的罗馬币制；依据这币制，九十六便士合成一鎊。十七世紀所发現的契尔得立克的庫房証明了这一点。但这是貨币史上的一件奇事：墨洛温朝諸王旣然采用了罗馬币制而又放弃它，恢复旧的克尔特金銀貨币制，象凱撒所曾改动过的那样；对于凱撒的金币，从萊茵河到喀尔巴阡山，远达多瑙河区的日耳曼人，在入侵之前，已經熟悉。对这种貨币，法兰克人渡过萊茵河后，首先知道。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即墨洛温朝的苏里德币恰等于旧金币的一半价值，当然关于輔币的价值，也有相应的改动。必須知道，这变更不是一种貨币的貶值，而是認为使用小貨币作为購买工具比大貨币要方便；換言之，这証明了在公元前第一世紀和公元后第六世紀之間的700年时期中，貨币的購买力已大大地增加了——也許增加到50%。墨洛温朝政府已不是完全蛮族的，因为它能够察覺出在几世紀中逐漸发生的經济变革的性質，还能够实行这改变，并且使旧的日耳曼的贖杀金配合于新的情况。

撒利克法典里的和解費和罰款的等級表明白地指出，有一种旧的貨币情况曾一度存在过；罰款在第七世紀中必須予以修改，使它們配合于新的貨币情况。这說明了为什么經常重复这样的詞句，象“六百地那(便士)合十五先令”，“二千五百地那，就是六十二先令，”以及“一百二十地那合三先令”。一百头牲口定价为二百金苏里德。銀币是用以付小笔款子的。这种貨币是銀地那或銀币，四十銀币合一个罗馬金苏里德。黃金对白銀的比例是約一比十二。至于貨币在第六世紀中的購买力，則难于作出估計。如果說罗馬金苏里德約值五美元金币，而一头母牛，上文已提过，定价为二金苏里德，那末一头母牛在第六世紀的价值則将是十美元。今天甚至一头平常的母牛在市場上也許可售得一百美元。因此我們可作出結論：金錢的購买力在第六世紀比起現在至少要大十倍。

在墨洛温朝时代，黃金还是在流通，但是数量越来越少；部分因为它由于貿易而流到东方去了，部分因为时局的不靖引起了窖藏貴金屬的风气，还加上了有大量黃金"冻結"于神圣器皿和教会的飾品方面。到第八世紀，黃金不复出現于公众的眼前；这种情况一直繼續到十一世紀为止。关于这种改变的經济上的倒退性質，上文已經提过。黃金完全不出現的情况使喀罗林朝采取了一种新币制。墨洛温朝的貨币（苏里德），如上文所述，原是以四十便士作为一先令为基础的。矮子丕平发行了一种合十二便士的新苏里德，然而有理由可相信，这种貶价不象看起来那样剧烈，老先令經过腐蝕耗損，似乎实际上已經減值，而且，由于黃金流通量的縮减，白銀的經济价值已經提高。尽管老苏里德合四十便士，新苏里德合十二便士，而眞正的結果也許是：把新先令提高到老先令相等的价值或差不多相等。这第二次以白銀来代替黃金的币制变更，使改动"贖杀金"制成为必要，因而产生了法兰克社会上各等級地位的一个重要調整；而且，这改变証明了在貨币購买力方面此时有些突如其来的增加；因为象上文所指出，西欧的对外貿易被地中海上穆罕默德教的領海权所破坏。試以目前的情况来作一比較，如果說金錢的購买力在墨洛温朝可作为一比十，它在喀罗林朝也許可作为一比十二或还少些。农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工商业越来越趋衰落，"自然經济"越来越占着优势，所以罰款常常以实物即产品来繳付，虽然在帳上还記着实数現款。換句話說，一个人是用值多少先令的牛羊，用值多少先令的谷物等等，来繳清法院的罰款的。

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欧洲的著名币制是起源于第八世紀的經济变革以及早期喀罗林朝的立法；这种币制是：十二銅便士合一銀便士（即先令），二十先令即二百四十銅便士合一鎊。但是鎊不是硬币；它只是一种价值的标准。銀便士即先令是流通着的最大硬币。

喀罗林朝的賦稅制度，和它的币制一样，反映出当代改变了的

經济状况。上文已說过，墨洛温朝已看出不可能再征收罗馬的土地税。貴族拒絕繳納它，而僧侶享有它的豁免权。但是，貴族和僧侶把自己所拒絕繳付的税，却向他們的佃农征收；到了第八世紀，土地税已成为庄园化的税，即由每个庄园主从他的土地上的住戶征收的税。在同样情况下，虽然在第九世紀以前还沒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关税或商业税也已成为一种庄园主所征的税。簡言之，在喀罗林朝时代，几乎所有的进款都由地方当局征集，也由地方当局用去。很多今天認为屬于公共性質的服务，象道路、桥梁一类的国内建設，当时不認为是国家义务而認为是地方义务，作为强迫性的地方服务即劳役来执行的，并且是由业主加在他們的佃戶和依附者头上的。所有的軍役是由承担者自己开支。政府什么东西也不供应。“軍役税”也許是人民所負担的課税中的最苛重者；它的重負压得很多穷苦的自由农降到了农奴的地位。

19 世紀，当經济史观开始使用的时候，历史家有一种风气，即把欧洲商业的大复兴以及政治的深刻变革都归功于查理曼。但是，通过細密地、批判地研究文献之后，我們知道，商业在和农业相比之下，在喀罗林朝复兴里并沒起重要作用。的确，查理曼的立法对帝国内的商人表示关切。但关切所及的范圍是狭窄的。在查理曼时代，所有的独立經营的商人都不屬于法兰克人血統。他們都是外族人；市場制度是由于他們享有特权而兴起来的。建立市場原是屬于国王的权利，直到第九世紀，封建領主趁法兰克帝国的分裂，篡夺了这項权利为止。除几乎专靠商业謀生的犹太人和叙利亚人以外，很少有职业商人，直到法兰克人征服了倫巴意大利并合并这罗馬国家于帝国版图为止；这一事件看来曾使那些經营利凡得商品而富有冒險性的倫巴商人，越阿尔卑斯山来和北欧建立了通商关系。阿尔琴的一封信上曾提及一个“带着商品的意大利商人”，这些商人不是做普通生意，而是以奢侈品供应宫廷、教会以

及最富的貴族家庭。其中有很多人是国庫或寺院的仆从或随員，象下列公文程式老套語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某某寺院的应用和需要，"运輸地方产品和地方制成品往圣登尼斯、里昂、根特的圣巴伏和圣齐尔兹等地的市場和市集去，并在那里采購所需要的商品。寺院由于它們的財富和所享有的豁免权，是最活跃的貿易因素。它們的船舶往来于每一条通航的河流，它們的商队在各重要公路上都可遇到。圣登尼斯寺院在符騰堡的埃斯令根、在亚琛和芒斯特、在塞納河盆地的德勒和爱丹普斯，都有倉庫和市場，还在罗尼河畔的里昂有一所堆棧和市場，在偉恩也有一所市場。

关于喀罗林朝的工业，除了关于象織布、制革、鋸木、打鉄、制皂、釀酒这一类的地方性或家庭需要的工业可資証明外，象商业一样，其他証明是有限的。所有的高級手工业者象金銀匠、制玻璃匠那样，受朝廷和教会僱佣，来做建筑和装璜工程，这些受僱者，大部即使非全部，都是意大利的或拜占廷的手艺人。可見喀罗林帝国內一定很少有精巧的本地法兰克手艺工人的。

近代历史家以荒誕而宏大的經济观念套到查理曼时代；其实，这些观念是近代的而非中世紀的商业企业的反映，向后投射于中世紀时代的反映。查理曼曾徒劳无功地企图征服威尼斯，不是为了使法兰克人可控制威尼斯的有利可图的利凡得商业，而是要压止威尼斯的奴隶貿易，要扩展他的統治权于威尼斯，因为它是倫巴的謀叛者和拜占廷的阴謀者的庇护所。408 年时法兰克人征服了阿佛尔人，那曾被夸大地說成是因为查理曼希望打通到达君士坦丁堡去的那条下多瑙河道路；这条道路从蛮族入侵以来曾被封鎖；但事实上他的意图仅仅是要征服一个时常侵犯东日耳曼和北意大利边境的可怕的掠夺性仇敌而已。同样，查理曼和哈倫·阿尔·拉希德所建立的关系，是为了实現西方基督徒朝謁圣地和圣墓的要求，为了保护往那里去的朝圣者；在这些談判中沒有什么促进东方和

西方商业关系的观念，作为推动力。至多可以說，朝圣者往往沿途做些生意，而小販和走单帮者不时冒充朝圣者以求免付通行税；这种舞弊逃税在795年查理曼和奥法所訂的著名条約里受到了譴責，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对于为了敬愛上帝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愿訪問神聖使徒的出身地的香客，讓他們安然通行，不受任何干涉；如果有人不是为追求宗教目的而是为图利，杂在香客中間，就讓他們在适当的地点，繳付慣例的通行税。

查理曼立法中对公平交易和公平度量衡的注意，基本上也不是为了經济的理由，而是为了道德的理由。在794年，在“艰难时期”的一个年头，查理曼曾頒布他著名的限制最高物价的法律；这項法律的用意，与其說是为了經济目的，不如說是为了救济穷人的苦难，那是由教会制定的一种基督徒的义务。皇帝对于那些搶購小麦及其他食物而进行投机的商人的殘酷行为，果然深恶痛絕，但那并不是以他的經济意識为出发点的。很多历史家还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这項限制性的立法是用一个教会会議决議的形式，而不是用頒布詔令的形式发布的。

关于查理曼的注意于維护道路和桥梁，我們也可作出大致相同的解释。他的詔令都是带有这种性質的。但是在这方面，他的基本目的，也不是为了促进商业而是为了保証他的軍队又快又有效力的移动。有人异想天开地認为：建造那永未完成的“查理沟”（“喀罗林沟”），即那切断上多瑙河和上莱茵河間狭长分水岭（在弗兰哥尼亚柔拉山的威森堡附近）的运河是出于促进商业的意图。其实，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設置一条由北到南，并在亚琛和累根斯堡之間由东到西的完整水路；而累根斯堡是整个东南日耳曼的軍事基地。那在馬因斯跨莱茵河上的大桥，基本上也是一項軍事工程。甚至查理曼所爱好的居住地，即宫殿或大庄园宅邸的位置（象亚琛、赫斯塔尔、米尔森、英格尔亥姆、都尔內、狄顿霍芬、尼威根、基尔

賽)也是依据軍事急需而选定的。这些庄园都是沿着軍用大路,排列成为梯形,彼此間隔着适当的距离,在那里供应品的倉庫和馱物的牛馬,是經常准备好的。这些路綫沿着河流从亚琛以及从比利时的国庫庄园密集的地方輻射出去;人們按上述地点就可找出道路。

然而,我們不应因上面的概述而認为查理曼时代是没有对外貿易的。一个包括高盧、日耳曼、意大利以及部分西班牙的大帝国一定会有而且确曾有过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那些关系自然是和邻近国家发生的,而所交换的商品是屬于有关地区間的自然产物。意大利同拜占廷与穆斯林領土的接触,使它成为利凡得奢侈品的唯一进口地,因为东地中海区由于拜占廷的艦队,而不象西地中海那样害怕穆罕默德教徒的海盗船。但是,南高盧和西班牙"駐防区"的商业則微不足道。高盧的比斯开湾各港口,如貝云和波尔多,是西班牙橄欖油和西班牙栗子的进口港;橄欖油象《圣腓力培伯特》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西南欧方面,在寺院里用作食料,而在教堂里則用作点灯油。东方貨物尤其是絲綢,尽管穆斯林和基督徒間有战事,还通过伊斯兰教西班牙而进入了高盧。奥尔良·帖奥度尔夫詳細地描写了他所亲見的絲綢外套,"染着各种顏色",并有格外漂亮的式样;他还描写了来自哥尔多华的麻布、羊毛衣料和皮革物,白的、紫色的和大紅的都有。

布勒塔尼、波亚图和爱尔兰之間的貿易关系,上文已提过,早在罗馬帝国后期已經建立,而在第五和第六世紀爱尔兰接受基督教后,更增加起来了。圣科兰班曾搭乘往来于高盧和爱尔兰之間的航船,到达了南特,并带来了貂皮、提籃和陶器。查理曼时代对爱尔兰的外交和商业关系比在墨洛温朝时代密切得多。但是又有一件难事:要分别誰是沿路作生意的爱尔兰朝圣者,誰是眞正的商人。这些朝圣者几乎总是和商人們結伴同行的。

当然，我們所知道的关于奥斯特拉西亚、法里西亚和德意志的貿易活动，比关于法兰克帝国任何其他部分的要多，因为法兰克政权的总部是在奥斯特拉西亚。查理曼的首都亚琛对莱茵河和它的支流的整个地区来說，位置优越，处在北德意志(薩克森和瑟林吉亚)和北高盧間的交接点上。如果研究中欧的河流系統，我們可清楚地了解喀罗林朝及以后的各商路。因为几乎所有的大路，都是沿着河道的。

在第七世紀中，本尼狄克特派僧侶在法兰克王国的异教的边境上所进行的积极傳教活动，是后期墨洛温朝时代的一个破格，因为这一世紀原是有很多內战的混乱时期。当王国的本部已信奉基督教以后，异教还在边境上苟延殘喘着：在柔拉山和佛日山区，在上謬司河和摩塞耳河流域，尤其是在法兰德斯、不拉奔和法里西亚，在那里滿布着茂密的森林和广闊的泽地。在这些辽远的地方上，在600和680年間建造了拉克斯厄、斯达維洛特、麦尔默第、圣巴伏、圣奥麦、圣柏坦、圣里奎尔、圣汪列尔各大寺院，还依次建造了新教会。这些傳教团的成功是与它們的世襲領地的增长密切有关的。农业、牲畜牧养以及有关农业經济的技术和手艺曾大踏步前进；寺院成了当地的市場，并从水陆两路輸出了它們的剩余产物給其他市場。在这一方面，不容置疑，后期墨洛温朝和早期喀罗林朝时代，是这些地方的一个物質繁荣时期；这种繁荣状态繼續到第九世紀北欧人再使它們蛮族化为止。在僧侶指导之下，当地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寺院的农奴)排干沼泽地，清除了森林，并把荒蕪地区变成了牧場或良田。

在喀罗林朝早期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經济事件，是法兰克人的征服法里西亚。在罗馬帝国的盛世，这个地区，約当于現在的荷兰南部，曾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商业活动地区。法里西亚人在盐沼地上放牧了成千成万头綿羊(法里西亚羊毛是出名的)，他們曾是

下萊茵河和不列顛間横过海峽貿易的中間商人，也曾是罗馬高盧省和日耳曼人間的中間商人。从第五世紀中期到第八世紀上半期法兰克人征服它为止，从商业观点来說，北海几乎是一个法里西亚的內湖。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征服不列顛使法里西亚与下日耳曼同旧屬罗馬的不列顛的联系，比以前关系更加紧密；并扩大了法里西亚商业的活动范圍。普洛科匹阿，一个第六世紀的历史家，甚至說，法里西亚人曾参加过薩克遜人侵入不列顛的行动。当然，他們的商人在早期已出現于倫敦和約克城。

在同一时期，法里西亚人找到了斯堪的那維亚的国家，并深入了波罗的海，瑞典美拉湖畔的貝卡、瑞典大陆上面对哥特兰島的边谷、南芬兰的貝基奥、威堡附近的边谷、挪威脫倫典渡口的边谷安、后来的卑尔根附近的比耳克罗恩，这一切地方都曾是法里西亚人的貿易站。爱尔兰海被一个第六世紀的历史家称为“法里西亚海”。当法兰克人渡过萊茵河的时候，在科倫和馬因斯，已有法里西亚商人。所有这种貿易的力量是从萊茵河支流上近后来的烏得勒支的杜尔斯特德，发揮出来的。

在邦尼非斯改变法里西亚人信仰的計划里，兼有商业的野心和宗教的热忱，因为查理·馬德尔和矮子丕平的宝劍支持着这种傳教活动。在跟着发生的战爭中，法里西亚人作战是为了自己的貿易自由而防止法兰克人吞并它，在程度上相同于为了他們的宗教而作战。他們很快就看出：法兰克人的基督教意味着法兰克人的商业征服。正是查理·馬德尔最先預見到这个問題，并以征服法里西亚的方法来解决了它。早在753年的一件公文里，可看到在圣登尼斯市集上已有法里西亚商人。我們还知道，在第九世紀里，法里西亚商人曾在摩塞耳河区及亚尔薩斯采購葡萄酒。养羊已成为法里西亚沼地上的一种有利的事业，而法里西亚羊毛曾是喀罗林朝时代的一种重要的原料。杜尔斯特德是这地区的主要商埠，它

的市場和造币厂是名聞远方的。稍遜一些的是发尔赫稜島上的威特拉城。这两地在第九世紀中都被北欧人破坏，結果使杜尔斯特德的貿易上行萊茵河，后退到提尔和科倫，即向内地退到伊塞尔河流域，在那里兴起了德文特城。法里西亚的征服和那里羊毛貿易的发展，跟着使法兰克人和英国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比德提及在倫敦有过一个法里西亚商人。在795年，查理曼和麦細亚王奥法簽訂了一項条約，来互相保护在他們領土上的对方商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喀罗林政府所征唯一眞正的商业税，是在布倫附近克旺都維克的"海峽"諸港口、在什留塞斯(斯类斯)以及在杜尔斯特德征收来的。所有其他象桥梁或道路的通行税，仅仅是作为維持費的。

但是，报应是注定要跟着法里西亚"帝国"的傾覆而来的。法兰克人原不是善于航海的，因而那曾經由法里西亚人占領过的地方，在第九世紀就被"外侵团"① 占夺了。北欧人之所以能够兴起、扩展并表現出他們巨大的商业力量，是由于法里西亚人的勢力的毁灭。大北方的商业开发的遺业落入了北欧人而非法兰克人之手。

东日耳曼和斯拉夫人貿易关系的发展，上文已提过，早在达哥伯特时代便已开始，而在喀罗林朝还在繼續。在征服薩克遜之后，805年时(也許这年代是不可靠的)，查理曼第一次制定了法律管理这边境貿易，并且沿着从易北河口到中多瑙河为止的斯拉夫边境，建立了一連串的設防商站。这些商站是：巴杜威克和瑟塞尔(靠近后来的汉堡)、薩克遜的愛尔福特、易北河大湾的馬德堡、哈尔斯大德(靠近后来的班堡)、在瓦尔德·那布河和普弗賴姆特河合流形成的那布河畔的普弗賴姆特(在后来的奥柏普法茨)、福橑姆、罗耳士以及那布河口多瑙河畔的累根斯堡。

① "外侵团"(Vikings)即北欧人，在第八至第十世紀时期，侵掠欧洲西海岸的海盗。——譯者

尽管法兰克史料除了提及被禁出口的兵器甲胄以外，沒有說到这項边境貿易的性質，但我們可从其他来源知道：这貿易主要包括有毛皮、蜡（大量的蜡用以制造教会用的蜡烛以及用以封文件）、蜂蜜、亚麻（斯拉夫人种植大量亚麻）、大麻以及奴隶。日耳曼硬币在斯拉夫人中間开始流通之前，亚麻布条曾当作貨币，象在早期殖民地时代，美洲印第安人使用貝壳珠① 那样。織布、制陶器和木刻是他們的主要手工业。鹹水或淡水捕魚，是一种普遍的謀生方法。当时，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是海盜和販卖奴隶者。爱因哈德的《編年史》（808 年）說勒立克小港（靠近后来的威斯馬，这座城直到 1237 年时才建立起来）是丹麦商人所常到的地方。这些商人主要是什列斯威人。在东南日耳曼，巴伐利亚和"东方駐防区"很少有什么商业痕跡遺留下来。威尼斯商人努力穿过勃倫納山路，也許到过奥格斯堡，并冒險前行，远及累根斯堡，尤其是在阿佛尔人失敗以后。阿佛尔人的龐大宝庫，儲藏着两百年来从巴尔干和北意城市得来的擄掠品，数量惊人，象亚历山大帝所占据的大流士宝庫那样；当所有积聚的硬币和金銀器皿投入西欧的时候，它們的影响使法兰克貨币的購买力暫时跌落下去并使物价上漲起来，直到这些金銀在貿易中被吸引到东方去，或再度被窖藏为止。有人估計，在 779 到 799 年間，鎊的价值比 804 年以后的价值，要多三分之一。据編年史家的記載，胜利的法兰克軍队曾带走十五貨車的黃金、白銀、宝石和絲綢。

有人認为查理曼統治下的欧洲复兴，是以商业和工业的大复兴为特征的；这是一种証据很少的夸大之詞。决不是这样的。当时，农业状况凌駕于商业和工业活动之上是証据确凿，无可爭辯的。喀罗林政府的整个体系，社会阶級的各种类型，都是以土地占

① 北美洲印第安人以綫串着貝壳珠，当作貨币；貝壳珠有两种顏色，一系黑色，一系白色，黑的比白的貴一倍。——譯者

有制为关鍵的，就是說，少数人拥有大量地产而多数人則陷于依附状态。这个时期主要地是一个农业状态和自然經济的时代。欧洲的政体，欧洲的社会，都是屬于也产生于一种风行的土地制度，而查理曼最有建設性的經济活动，是和农业相联系着的。甚至在这一范圍內，他的努力也是限于使王室領（国庫領）的行政系統化和制度化。他的立法对僧侶和貴族領地的管理，沒有什么关系；这些領地的管理，完全和他自已的大庄园的管理相同，而且，其中有的比王室大庄园管理得更好；所以皇帝責成每个郡內的郡伯去考察这些庄园，以图改进他自己的土地。喀罗林朝的"盛世"是由于皇帝、僧侶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頑强努力，他們在庄园管理方面采用了优良的制度。皇帝做了什么，主教、住持和貴族也做了；主教、住持和貴族做了什么，皇帝也做了。但是，关于王室領地的資料，我们所可获得的，远多于关于教会世俗領地的資料；而且，皇帝的立法重要得多，因为王室領在数量上旣这样多，而在分布上又这样广。

有一个苦心研究的学者曾估計說：喀罗林朝的王室領包括有一千六百十五个单个的領地；其中很多和"县"甚至和"州"同样大小，村庄星罗棋布。它們包括无数的广大农場（庄园或村落），"宫殿"、葡萄园、森林、矿地和采石場。"領地"是由許多村落或庄园集合而成，組成为一个行政上的經济单位，每一个庄园或大农場受一个地方管事的监督，而地方管事则受地方郡伯的监督。这些領地中，有的是很大的，包括三十、三十五、六十三甚至七十所庄园。这个龐大遺产的核心，是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的家族領地（在近代的比利时）。由于喀罗林朝合并墨洛温朝的王室領，它大大地增加起来，而其中大部位于下莱茵河和摩塞耳河流域以及东北法。这一地区的面积可在地图上划出下列一綫来表明：从喀罗林朝旧都赫斯塔尔起，下行瓦茲河到它和塞納河的合流处，上行塞納河到瑪恩河口，上行瑪恩河到維特列·勒·法兰西——差不多是彭提昂的所在

地。即在墨洛温时代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的一所庄园——从那里到摩塞耳河的狄頓霍芬，下行摩塞耳河到科不林士，从那里下行莱茵河达烏得勒支，于是又回到赫斯塔尔。在这广大的梯形領地里(今天包括大部比利时、盧森堡、东北法、洛林和莱茵日耳曼)，是最大的、最富饒的、最密集的王室領。在和这一片广大的世襲領比較之下，其余的国庫領則是相隔很远地分散着的——在德意志、在意大利、在高盧的其余部分，而它們的收入也較差。后一类的庄园是用作維持当地官員的，而在遇到这些地区发生战爭时，則用作軍事供应地。上面所指出的那一片广大土地的中央地位、接連的性質、土壤的肥沃、如此适宜于种植葡萄的摩塞耳河和下莱茵河狹长温暖的流域、渾斯特列克的金屬以及可航行的河流网——这一切条件互相匡济，使这塊美好的地区得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核心。我們知道这区域內約三百所大庄园的名称和地点，还有更多的庄园現在已无从稽考了。

所以，显而易見，管理大庄园对查理曼象对中世紀其他的国王一样，是一件主要事情。查理曼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有才干的統治者，对他的財产，事无巨細，都亲自监督。每所庄园放在一个管事或管家的管理之下，管事負責保持它，还須作出資产和进款的常年报告。有大批这种庄园的帳册，流傳到今天。作为这些管事的指南，查理曼(他是方法的首倡者)亲自制定了一种庄园管理手册，叫做“庄园詔令”。这詔令包括有七十节，其中有的很长，使人惊异地得以窺見当时的农业經济情况。但在摘引这有趣味的文件以前，应先描述查理曼到他的一所庄园时所住的“庄园大厦”。它是由排成四方形的几幢房屋集合而成，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一層楼高。它聳立在用木柵来保护的广場的中央。入口道路的两側，种着树木。人們穿过外門后，再穿过內門，就立刻进入了寬敞的居室。在这叫做大“厅”的背后有別的房屋排成四方形，环繞着一塊种着花

的草坪；各幢房屋的外边用象廻廊那样的繞着方場的圓柱廊接連起来。在后边，但和建筑物的主要部分相連接的，是其他的建筑物，即廚房以及仆役与随从的房間。距这些房屋最远的是倉庫馬棚。

在广場之內有別的建筑物，象谷倉、畜栏和厢房等，还有一塊菜圃。高的木塔內包括有最好的臥室。它的阳台，在夏天是一个凉爽的地方。各种东西都是用木头制造的。在十二世紀之前，石头建筑物除了教会大廈以外，是罕見的。在1100年前磚头是很少見的。罗馬人原是出名的制磚者，但是这制磚的技术在“黑暗时代”已經失傳于北欧，而在好久时期內，沒有复兴起来。

在大厅的內部，摆着一張大桌子及几条櫈子，但是最舒适的坐位，是靠室內周圍墻壁放着的箱子，这些箱子用作保藏东西的。它們的上面盖着熊皮、狼皮和鹿皮的外罩。墙上挂着麋鹿的有叉角的头，或野猪的或熊的头。地板上在夏天鋪着沙土，或盖着柳条。唯一的爐灶装在廚房里（廚房靠近餐厅），廚房在冬天充作卧室之用。各种东西，除了面包外，都放在无遮盖的火焰上，在罐头里、在平鍋內或烤、或煮、或煎。烤东西是用鉄釬，由廚司把鉄釬轉来轉去，使各面同样受到火炙而不致有一塊地方被燒焦。爐灶很大，足以烤整个一头牛或者一头野猪。烘面包有时是在装着出烟管子的火盆里进行的。然而，在大多数場合下，烘面包的火盆是放在戶外的。木柴或炭是唯一的燃料。沒有火爐的房間，有时用燒旺的炭盆取暖，但是那时必須小心地注意通风。

一个法兰克貴族在大庄园住宅內的生活，果然是粗陋的，但并不有別于十七和十八世紀美国弗吉尼亚的大农場主的庄园住宅生活。差不多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就地生产出来的。制服装用的羊毛，剪割、清洗、梳刷、紡織都是在庄园宅邸內进行的。兽皮由农奴鞋匠来硝制并制成鞋子。兽肉是用盐腌、火燻、醋漬的。各种家庭和农业工艺都是由庄园上的农奴来做的——制鞋匠、硝皮工、染工、

織布工、鉄匠、制車輪匠和木工。但应注意，沒有說及在領地內存在着什么市場，就是說，商业还未曾高度发展。在“庄园詔令”內，只有第五十四节內提到了市場，命令管事应注意“朕的农奴不得遊逛市場或市集”。

下面从查理曼的真实訓令中引来的摘要，大部分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看来有需說明的地方，我加上了几句話：

每个管事应編制关于朕一切进款的常年报告；应記入：由朕的耕夫所赶的牛来耕种朕的土地，由朕庄园上佃农所耕种的朕的土地；应記入：猪、森林、田地、桥梁和船舶、葡萄园和应繳葡萄酒給朕的人、干草、木柴、火把、木板及其他类型的木材；荒地的范圍；蔬菜、玉米、高粱；羊毛、亚麻和大麻；树生的果实；栗树；接枝的树木；花园；甜菜根；魚池；皮革、毛皮和兽角；蜂蜜、蜡、牛羊油脂和肥皂；桑实酒、蜜酒、醋、啤酒；新谷和陈谷；母鷄和鷄蛋；鹅；金屬匠和金屬工人的数目、制劍者和制鞋者；櫃、箱和量器；小牡馬和小牝馬。管事应在聖誕节时，把上列各項分門別类，有条有理地报告給朕，使朕得知朕所有的东西以及每种东西的数量。

在朕的各庄园里，朕的管事应具备尽量多的牛舍、猪圈、羊棚和山羊舍，而且他們决不得缺少这些东西。加之，他們应保有由朕的农奴为了他們的服务所提供的牛只，这样我們的牛舍和耕犁无論如何不致由于朕庄园上的工作而短少起来。

朕的管事必須极端仔細地供应那些用手制备的东西：脂油、熏肉、鹹肉、葡萄酒、醋、干酪、白脫、麦芽、啤酒、蜜酒、蜂蜜、蜡、面粉；这一切，应制备得极端整洁。

查理曼曾想把他的大庄园变成为活象一个紳士的乡村別墅一样，請看下文：

每个管事在朕的每个庄园里，为了点綴园景，应經常保有鹅、孔雀、野鷄、鴨、鴿、鷓鴣和雉鳩。

詔令中有下列一項条文：

为使朕的妇女工作，应按照所指定的适当时間，来給予她們材料，如亚麻布、羊毛、大青染料、朱紅、茜草根制的顏料、理羊毛梳、起絨草、肥皂、潤滑油、器皿及其他必需的东西。

关于房間設备的条文規定：

在朕各庄园内的房間里，应具备床被、坐墊、毯子、枕头、床单、桌布和櫈布；銅的、錫的、鉄的和木制的碗盞；鉄架、鏈子、鍋鈎、手斧、斧头、螺鑽、小刀以及其他一切种类的工具，使无須到别处去拿或向邻人移借。

上面所引的詔令，尽管是这类規程中的最完备而又最重要的，但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在很多場合，这位皇帝显出他是重視王室庄园的有效能管理的，尤其是在指令开出詳細的帳单方面。很幸运的是其中一个帳单保存得完整无缺，还保存了另一張片断的帳单；这些都是中世紀統計文献中的最有价值的例子。

那流傳下来的关于查理曼的一所庄园的清单如下：

阿斯那帕領地庄园上有一所石头造的王家大廈，式样极好（显然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地方），有三間房間（大厅、餐室、廚房）；整个大廈四周，都有阳台，有十一間妇女臥房；下有一間地下室；有两条柱廊；在广場内另有造得很好的七所木房，还有同样多的小屋和附屬建筑物；一所馬房、一所磨坊、一所谷倉、三所棧房。庭院用密密的籬笆圍繞着，有一个石头大門，还有一个阳台。有一个內庭，也用籬笆圍着，种着水果树。

下面分别列举室內用具和工具的数目和类别；农产品計有大麦、小麦、裸麦、雀麦、大豆、豌豆、蜂蜜、白脫、猪油、脂肪和干酪；最后，列出牲口头数，包括有五十一头大牲口，五头三岁的、七头两岁的、七头一岁的、十头二岁的小馬，八头一岁的、三头牡馬，十六头母牛，两头驢，五十头带小牛的母牛，二十头小閹牛，三十八头一岁的小牛，三头公牛，二百六十头公猪，一百头猪，五头野猪，一百五十头綿羊，二百头一岁的小羊，一百二十头公羊，三十头带小羊的母山羊，三十头一岁的山羊，三头公山羊，三十只鵝，八十只小鷄，二十二只孔雀。从这項清单里，我們可看出家具以及家庭設备方面多么貧乏，而食粮与牲口的儲备多么丰富；这种对比明显地指出农业經济已达到一个高度发展的阶段。其次，对于貨币，沒有提及什么，这一事实也說明在查理曼帝国内，流通的貨币是很少的。

除了建立国内的普遍和平外，查理曼还在两个方面促进了葡萄种植业；和平对葡萄种植者来說一向是重要的，因为葡萄不能象小麦那样在一个年头里成熟。第一，查理曼在自己的庄园上有很多葡萄园，在那里，种植葡萄和釀葡萄酒，是在他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他对所有的地中海区人民用脚踏葡萄来榨酒的老方法，采取很自然的反对态度而命令以手压方法来替代它。他委派特别管事，接收葡萄园作为他們自己的，来培植它們。他从沒把制造葡萄酒当作王室的专利事业；相反的，他采用了各种方法傳布它。第二，他以很多土地、賦税权与通行税豁免权，賜給教会和寺院。因此，在这时期，教会和寺院的土地上的葡萄园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很多僧侣地主包括正規的和世俗的僧侣① 致力于深耕細作的葡萄种植业。所有的阳面斜坡都成了葡萄园。僧侣甚至把葡萄种植到那些收成不会很好的地方去，象巴伐利亚高原、瑞士以及瑟林吉亚的腹地。皇帝的这种榜样影响了世俗貴族；后者对葡萄种植业也感到兴趣；在这时期，还兴起了一种办法，即划出庄园来专种葡萄，并实行更精細的耕种方法。当时有一个阶層成长起来：他們尽管是不自由的，并向庄园主繳納他們的大部产物，但还是在租戶而非农奴的地位上种植他們的小塊土地或葡萄园。

由皇帝保护的犹太人，是在南法經营葡萄酒的大中間商。794年法兰克福的宗教会議通过决議，来防止壟断或搶購葡萄酒，并在葡萄收成不佳时防止葡萄酒出口。在查理曼和哈倫·阿尔·拉希德間的交往中，法兰克商人带回了那些用以釀造葡萄酒的香料，从而法兰克葡萄酒开始輸出到东方去。查理曼的征服开辟了到东北欧去的新商路；因而商人往斯拉夫边疆去做生意，以法兰克葡萄酒来換取从波罗的海来的琥珀和毛皮。

① 世俗僧侣，指非修道院出身而不出家的僧侶。——譯者

勃艮第葡萄酒是經过塞納河运到巴黎和盧昂的。萊茵河和摩塞耳河上屬于行会的船夫，以萊茵和摩塞耳葡萄酒来交換法里西亚羊毛，生意很兴隆。法兰克高盧境內一切河流上都大量运輸葡萄酒，这种运輸大多是在寺院控制之下。由于它們享有大量特权和免税权，也由于它們拥有各中心地点的許多碼头和貨棧，它們成为过去罗馬时代“海員”的眞正繼承人。寺院的代理人和犹太人分享葡萄酒貿易的近似专利的权利。

在上述的查理曼手册里，我們可看到大庄园上的农奴、农民和租戶农民之間的区别。按日耳曼法律原来的規定，每个自由人应有一塊自由地。但是，一般趋势迫使他失掉这塊土地。每个自由人必須服軍役，而战爭又是常有的；又因为这些战役經常是在春夏两季进行的，所以当他的田地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被召而离去了。如果他因此来不及耕种，或因为他的收获失敗，他这个自由人就要負債了。起初，他被迫抵押出他的土地的一部分，最后也許全部。一般来說是附近的地主或教会接受这个抵押品。同样的过程在古代罗馬曾发生过，現在又重演了。于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当抵押的土地被取消贖回的权利时，那自由人就必然要淪为佃农。如果他还是不能清償他的債务，他将失掉他的自由，而陷入农奴地位。当查理曼在世的时候，自由庄园的数目——所謂自由庄园，就是庄园內份地的权利由自由租戶所保有——似乎是大于不自由庄园的数目。到第九世紀中期，在查理曼的孙子时代，这項比例就倒轉过来了。

“軍役”即强制軍事服役这一項毀灭性的負担，强有力地迫使大寺院和大貴族土地上的自由人降到依附地位，甚至农奴地位；因此，那也成了毫无办法的人們往边境去謀生的一个原因。詔令中三番四复地指責自由人以自願淪为农奴作为逃避軍役的一种救济办法。

自由人委身于奴役，因为他們不再能維持自己；他們不是一两个人这样做，而是集团地或全村庄都这样做。約在820年以前的时期，在紐弗勒特有十四个自由人把他們的土地送給聖澤門寺院，而自己作了农奴，“因为他們沒有能力来滿足国王要他們为战爭服务的要求。”①

非常明显，“小自由人的确获得了他們劳动的新出路，但是这种出路必然要和他們地位的降低相联系的。他們以独立的地位来换取一个更有利的而又更好地被保护的依附地位。”庄园制度的扩展、采用更为完善的农作方法，特别是在国庫或教会庄园土地上，慢慢地使自由小农陷入原屬自己土地上的佃农或农奴的地位，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从他轉移到某一个附近貴族或高級僧侶的手里；要不然的話，那改变了的情况也会把他从他祖傳的土地上逐出使他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个浪人”。小土地所有者在当时正在进行着的經济社会的轉变里，是不能和大业主相竞爭的。有些历史家主张：一个比軍役更大的苦难，是喀罗林朝官吏的压迫和詐財行为。果然这是当时一个公認的弊病，可是对虐政的怨言，自从政府开始时起即已存在，可不必予以重視。

多柏特在他所著的一篇出色的专論《巡閱使》里，說得好：

我們有丰富的資料，可証明法兰克貴族的貪婪性質。我們看到他們无止境地靠着牺牲皇帝或者那些还殘存的自由平民，来扩大自己的財富……只有“巡閱使”才能够对这种趋势进行斗爭……貧苦的独立自由农沒有比当时的实际情况消灭得快，也許必須感謝这“巡閱使”的制度。

关于这种情况，查理曼晚年的立法是很清楚的。803年的《兰哥巴第詔令》中有下列一段話：

朕听到：伯爵的官員以及有些屬于他們的有势力的附庸，不仅从教会的奴仆（就是，住在由教会所賜給的采地上的人）方面，而且从其余的老百姓方

① 庫尔敦：《中世紀的村庄》，第108頁。

面，征收地租并强制使用劳动力，如收获、犁耕、播种、拔树根、装貨于馬車上等等；所有的这些弊端，必須予以停止，因为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在这样情况下已被压迫得苦不堪言，以致很多人由于耐不住他們的命运，背离他們的主人或保护人而逃亡，因而土地复归于荒蕪状态。

811年时在亚琛公布的《关于出征队的詔令》里，查理曼感慨地說：

穷人憤恨不平地說，他們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逐出来；他們受主教与住持以及其代理人的驅逐，也同样受伯爵及其“百戶长”①的驅逐。他們說，如果一个穷人不愿交出他的土地給主教、住持或伯爵，这些大人們就捏造出某种借口把他拖入法院；要不然，他們繼續命令他充任軍役，直至这可怜的人完全破产，不得不交出或出售他的土地。而在这同一时期，他的邻人由于已經交出自己的土地(因而成为一个农奴而非自由人了)得准予安居在家而不受煩扰。

这种小自由人和穷苦农民的逐步降低身分的过程，是和法兰克人向帝国边境的扩展密切联系着的。

我們看到，法兰克人的“东进政策”或向东挺进的政策，在墨洛溫朝时代已經开端；而到了查理曼时代，这項政策加速推行起来了。小土地所有者和被剝夺的自由人逐漸向东推进，到达扎勒河及上美因河那里的地曠人稀的盆地；为的是要逃避那些数目和范圍越来越大的大庄园对他們所加的压力(这些庄园包括世俗的和教会的，位于莱茵河以西及中莱茵兰)。而且，在第九和第十世紀，在下摩塞耳河和莱茵地区，已出現土壤枯竭的跡象。当然，关于中世紀时代的人口，是不可能有准确的統計的。但是，近代学者已作出一些相对的論断。在喀罗林时代，条件优越的地区象摩塞耳流域那样，似乎曾有相当稠密的人口。的确，沿着那些作为重要的貿

① 百戶长(centenarii)是隶屬于伯爵的小地方官，在最小的地方单位即百戶区內，主要办理司法事务。——譯者

易大道的河流，尤其是沿着謬司河，地名的数目那时比現在似乎是要多。从后期墨洛温时代直到北欧人的侵入时期，在塞納河和萊茵河之間，人口密度据估計，曾达到每平方哩三百人之多。在喀罗林朝后期，东法兰克王国，即日耳曼的人口据估計，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万人。800年时，上摩塞耳河、西格河和上美因河流域开始被日耳曼移民滲入，象扎勒河流域在查理·馬德尔时代曾被殖民化那样(这种移殖主要是由邦尼非斯派寺院进行的)。看来，沒有任何大量法兰克人跟着薩克遜的征服而涌到那里。

794年时，巴伐利亚独立地位的倾覆使东南欧空前地开放給法兰克殖民，主要是僧侶和貴族的涌入。他們爭先恐后地夺取土地，要想奴役当地居民来开发那里的土地。在多瑙河区，殖民化的特征就是在于僧侶和貴族的性質。

显然可見，这傳教兼殖民的混合运动，是直接受着法兰克朝廷的鼓励而进行的，比起北方来，是一个較少民众性和較少自然性的扩展。从亚琛入巴伐利亚的道路是經美因河穿上法兰哥尼亚的天然的——而非軍事的——道路；在那里，由邦尼非斯在741年建立的符次堡主教区，是喀罗林朝傳布福音和征服东南欧的基地。在这些教会农場上的艰苦劳动都是由被征服的和“皈依基督教”的斯拉夫人担負着。早在这个时期，“斯拉夫”(slav)这个名詞已等同于“奴隶”(slave)这个名詞；而教会以征收什一稅对那个种族来进行有系統的剝削，也已成为一个陈規了。

在未被占据的土地上的斯拉夫人的村庄維持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存地位，它們四面被新成立的寺院和来自辽远西方的日耳曼移民的居留地包圍着；日耳曼移民在森林中砍除树木，为自己开辟新土地。然而在这些日耳曼人中，很多不是自由人，而是隶屬于大业主的农奴；这批大业主把他們全部从人口拥挤的法兰克領地上迁移到他们的边境的新領地上。毫无疑問，同这些农奴混居杂处

的，还有喀罗林朝社会中人数相当多的下層分子，也就是789年《偉大詔令》第75条中所說的“客人”、“外人”和“乞丐”。他們被經济困难和社会压力逼迫得东飄西蕩。这批人由于沒有家庭或村庄的联系，乐于在某一个大地主領地上的茅舍里获得棲身之所，即使要丧失自由和付出艰苦劳动的代价。791年的大荒灾可能增加了这一阶層的人数，因而它可能成了促使日耳曼人向东南欧移殖的一个因素。因为薩克遜还未被征服，居民向那里东进的任何显著趋势还沒有表現出来。

从亚得里亚海的頂端到易北河口这一条边境上的斯拉夫居民，在日耳曼人征服和殖民的浪潮里，不是被驅逐，就是被淹沒。因此产生了不可遏阻的冲突，其中种族的优势、宗教、語言、貿易、风俗以及生活所靠的土地都成为爭执的問題。在日耳曼人方面，这斗爭变成为一系列龐大的傳教运动和殖民征服。僧侶傳教师深入斯拉夫人的荒野，致力于和平的或强制的改变汶德族①的信仰，而且伸出了半神权王政的宝劍来保护教士或替被汶德人杀死或逐出的教士复仇。但是，种族和宗教仇恨心理的背后，还有着居民渴望土地的强烈要求；他們爭取田地来耕种，以求餬口；因为在那时所实行的农作的原始状况下，欲求飽暖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所以，忧郁的汶德族农民清除了寺院周圍的森林，耕种了这土地幷飼养牲畜；因为这些边境上的寺院資产从經济观点来說，只不过是边界上的牧場而已。查理曼看出了在边境上寻找新住所的墾荒阶層所具有的意义。在他的詔令里，他曾两次指令他的官員說，“无論在什么地方找到有气力的人，就給他們森林地来开墾吧。”

但是，所有向东南欧的进展曾受到阿佛尔人阻止，甚至很多被他們破坏了。而在第八世紀末期之前，日耳曼人占領的范圍已經

① 起初居于日耳曼北部及东部的斯拉夫大族。——譯者

远达恩斯河畔。在791、793和796年，查理曼曾三次征討这些兇猛的劫掠者。以后还在803和811年两次討伐阿佛尔人，終于征服了他們。803年在累根斯堡会議上，皇帝曾正式組織"东方駐防区"(那在好多年后将成为奥地利公爵領)，并把它同从易北河口到亚得里亚海頂端的保卫东境的一連串"駐防区"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对阿佛尔人，象对剛被完全征服的薩克遜一样，行使了强制改变信仰的办法并加上了什一稅的重負，为的要使他們完全屈服。

当从人烟稠密的奥斯特拉西亚各省来的居民这样地泛濫于东日耳曼边境上的时候，南高盧的居民也在"西班牙駐防区"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出路，即在比利牛斯山和埃波罗河間的領土上；这領土由查理曼征服并建成为一个緩冲省，来保卫帝国西南側，以防止伊斯兰教侵犯。但是，在半島上，条件与政策基本上是(和东日耳曼)不相同的。东日耳曼的殖民运动本質上大多是自发性的，又是个人主义的。但是，在西班牙，法兰克的殖民运动是政府的一个周密考慮的政策。这領土，在711年以来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間的战爭过程里，几乎被蹂躪得一片荒蕪；这一征服地，全部被看作王室領，而按封建和庄园的条件，仔細地分配出去。这些封地，在数字上虽不多，而在范圍上一般却是广大的。它們大多是賜給法兰克的文武官員，但也有一些是賜給哥特貴族的。法兰克人移入西班牙而願永留者，人数不多，因为距他們的故乡实在太远了。但是查理曼切心要有一个有勢力的貴族小集团，住在"駐防区"內来代表法兰克政权的統治。所以，为了获得这样的一个集团，他把土地封給了在那里作战过的他的将士。这批受封的法兰克附庸召来了他們的部下士兵，也把土地封給后者作为亚封地。这些土地是按領主制度，由农奴来耕种，或者出租給佃农的。

另有一种賜地的形式是賜"宅地"(adprisio)，即賜一种自由地的特种形式，有些象美国过去的"住宅"慣例那样。同样的土地讓

与形式，在法兰克帝国的别的部分，可能也曾流行，但是这个名词似乎是独一无二地用于比利牛斯山区的土地让与的。

接受这种赐地者，并不都是西班牙人，但是其中大多数是西班牙人。诏令指出“为西班牙人”、“关于西班牙人”的字样。谁是这些西班牙人呢？有些人在阿拉伯人进入时，曾逃入山区而后来又回到他们在平原上的老家；这种“驻防区”内的居民，就是西班牙人吗？初看起来，这一种说法似乎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较多可能的是，他们是从法兰克征服地南方来的基督教西班牙人；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基督教政权已在他们的邻近地区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就逃出穆罕默德教统治而到了那里。这批西班牙人的移入不仅是为了政治和宗教的目的，而且是由于加达鲁尼亚、鲁息雍和塞普替美尼亚的富饶土地以及法兰克国王的宽大条件所吸引而来的。其中也有阿拉伯人中间的不满意分子。812 年时，这一类的土地所有者曾派遣四十人的代表团去觐见查理曼，在那一年的训令中列举了他们的名字。这一张姓名表是有趣味的，因为它指明了住在“驻防区”内的几个民族的性。其中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可分成为两类，即用罗马化名字的本地人和哥特人。但是，我们还可看到所举出的其他民族的性：伦巴人卡则勒拉斯，加斯科尼人亚达里克斯，左赖曼（可能是个摩尔人）。虔诚的路易曾说，这批西班牙人自觉自愿地接受了法兰克王国的保护。所以，他在赐他们土地时，曾给以良好条件。

除了这批拥有许多不自由的劳动者和自由的居民的大地主以外，寺院也成了在“驻防区”内广大土地的集体所有者。在这里和在东德意志一样，寺院是文明的开路先锋。正是在这一时期，建造了下列基督教西班牙的大寺院：阿尼尔、科尼斯、拉·格拉斯、阿尔兹·苏·德赫、蒙托留、提比里、圣喜拉尔、塞普替美尼亚的普萨尔蒙第以及里柏利、柏舍琉等等“驻防区”内的寺院。这些寺院组织很

快地蔓延开来。当一所寺院建立得很好以后，移民云集，于是僧侶們分散到新地点上去，建立了一所小圣所，在那里起初只有一所小祀拜堂和一所招待遊历者的旅舍。但是，这些小圣所不久便吸引了移民来耕种它們的土地，馬上这些地点成为一个小社会了。在魯息雍和加达魯尼亚的村庄中，很多是起源于寺院的。

关于西班牙穆罕默德教徒和南法人民进行貿易的最早的証据，是在812年时。在这一年，奥尔良主教帖奥度尔夫由于一个重要使命往法兰西的极南部去，參观了那旁和阿尔兹。在阿尔兹，有人为了报答某种恩惠曾献給他水晶和珍珠；有人曾送給他那些面上刻着阿拉伯文的金銀硬币，他曾看到有些人有雕刻着人象的花瓶以及"来自兇狠阿拉伯国家里"的染料和布匹、还有宝劍、哥尔多华皮革、珠宝以及各种显然由阿拉伯制造的布匹。必然要得出的結論是：除了战爭以外，在阿拉伯人和那个地区居民之間，还有着其他的关系。在这两个民族之間，尽管有着宗教分歧，但通商关系还是存在着；除非因为要交換貨物，阿拉伯錢币和阿拉伯貨物不会在那里出現的。当然也可能，这些东西是从掠夺穆罕默德教領土而来的擄掠品。

查理曼大大地增加了世俗僧侶的地产，但对修道士来說，他不是一个偉大朋友。在779年，他使什一稅的征課合法化（以前什一稅是由信徒們自願捐助的），虽然老早在585年，馬康宗教会議上已决定，凡拒絕繳付什一稅者，将受到驅逐出教的处分。这样一来，他使教会在它固定基金及从供献得来的浮动而又不确定的进款以外，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收入源流。查理曼又以被征服的薩克遜、倫巴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大量土地，分配給僧侶們。甚至最卑微的牧师区內的傳教士，也被給予一个完整住宅和男女农奴各一。在他811年执行的遺囑里，他把他所有財产的三分之一遺留給法兰克帝国內二十一个大主教，并命令：每一个大主教应保留那分配

給他所轄省的总額的三分之一，而把其余的部分，分給他的副主教。然而，查理曼对法兰克僧侶的慈善行为和忠实，并不怀着什么幻想。正在他写遺囑的同一年里，他对主教曾发出一个詢問形式的詔令，他問主教們：出家的僧侶和沒有出家的僧侶有什么区别。他諷刺地問道，“凡是沒有停止千方百計地想法增加自己財产的人——以天堂来約許，以地獄来恫吓，誘使老实人放弃他們的財产而变为貧苦，剝夺他們的合法繼承人的繼承权，以致他們不得不靠着搶掠过活——，是出家的嗎？凡是貪得无厭，竟至賄賂証人的人，是弃世絕俗嗎？”皇帝还譴責地主僧侶們所干的勒索勾当。他說，“穷人們大声叫罵那些剝夺他們的財产的人。他們埋怨主教、住持及他們的代理人，和埋怨郡伯及他們的部屬一样。”查理曼所譴責的这些弊病，注定要在封建时期越来越变严重。

教会对法兰克帝国的經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喀罗林朝比在前朝，还大得多。教会的会議上也討論过世俗事务并就世俗事务制訂了法律；若干有势力的俗人代表也曾出席会議；查理曼任用主教和住持充当外交官、巡閱使、甚至战爭中的司令官。但是，教会的最大影响——除了宗教以外——是通过它成长着的封建势力而表現出来的。上文已說过，教会曾获得大量的土地贈与，它并把这些土地租給人耕种，要不然，直接由住在教会地产上庄园村庄里数以千計的不自由居民来耕种。此外，还有很多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經济困难和社会压力之下，为求教会的保护，放弃了他們的独立地位，并把他們的土地“委托”給教会。有条件地把土地讓給主教区和寺院的这一項慣例于墨洛温朝时代已开始出現，但到了喀罗林朝时代，它就成了一个有組織而又有系統的制度；这制度的精髓，按性質和傾向，都是封建式的。在上述的“請求讓地”的交易中，很多是以贍养貧穷、疾病和无保护的人为目的的；它們有些象近代的“終身贍养費制”；依此，所投的資

本，在受惠者死亡时，归于发給贍养費的机关，使他的繼承人受到損失。其他很多类似的交易，对教会财产的增加与巩固是有帮助的；因为教会由此得拥有数目龐大的依附农田。社会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因为这种制度使它有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穷人救济的办法；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給教会带来了一种危險，即教会变得注意財产和世襲領的事务，多于注意宗教事务。而且，僧侶所得的土地捐贈迅速地增加着，那激起了世俗貴族的憎恶。从这时期以后的几百年中，我們看到高級僧侶和高級貴族間的冲突事件層出不穷，而这冲突的根源是屬于經济性質的。甚至僧侶阶層也分成为两个敌对部分。因为世俗僧侶憎恨修道士的較孚众望，后者的寺院通过信徒的捐贈和遺产一般拥有更丰富的基金。查理曼的同情显然是寄于世俗貴族方面。他似乎已害怕寺院勢力的过分强大。因此，他合并了許多寺院及它們的財产于国庫。他从来沒有鼓励过寺院制度，的确，在他統治的时期，很少寺院曾由别人建造起来。

这样地变为封建化的不单是宗教中心，象主教座和寺院等。而且，乡村的牧师区和地方教会也卷入了这种过程。由于流行的庇护制度，因而几乎不可能在脫离地主貴族的庇护下来建立乡村牧师区。一个当地的业主，在他的土地上建立了教会之后，就以庄园主的地位，要求有权选擇教士来为那里的教徒执行宗教事务，而这些教徒一般都是他的佃戶。此外，这保护者也控制着牧师区內的收入，甚至从送給牧师区教会的捐贈和遺产里，也取得利益。一个业主之所以建立一所当地教会的动机，往往远不是无私的或虔誠的。在封建时代，投資建造一所教会或創立一座寺院是最为有利的。

那建造一所教会或小祇拜堂于自己土地上的业主，就成为那所教会或小祇拜堂的所有者。他可指派一个奴隶或一个农奴去担任职务（叫做“牧师职”）。他可征收殯葬費和洗礼費。他可强制他的农奴去做礼拜。他可出售

或者讓与这所教会。他可罢免这牧师，或鞭撻他，或在指派他时，要他贈送禮物。他可使用他充当書記、管事或种田的仆人。他可使用他侍奉膳食、养犬、牵引地主太太的馬匹或看守羊群。①

“依靠祭壇生活”成了地主阶級尽力使用的一种剝削形式。

① 斐西尔：《中世紀帝国》，第1卷，第254頁。

第九章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
(814—912年)*

第九世紀中的最重要历史事实，是法兰克帝国的瓦解。瓦解的眞正原因是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經济和社会力量。大地主阶級原是查理曼政府所建立的基础，但在第九世紀中它获得了支配王室的力量。即在查理曼的統治时代，那瓦解的要素和过程，已可看得出来。在这样早的时期，他所建立的行政机构，已开始被地方地主的利益滲入而受到了侵犯；而且，地主的权力，由于吮吸着帝国的血液，迅速地变为日益强大。"恩地"①、采邑和免除权的制度終将引导帝国到毁灭的結局。

虔誠者路易(814—840年)的懦弱、父子間的斗爭、弟兄間的战爭(結束于843年瓜分帝国的凡尔登条約)、男爵們的謀叛作乱；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封建分裂主义的特殊表現而已。各种事情已变为地方性的了，沒有全国性的事情了。

那么，封建制度是什么呢？封建制度即由个别私人在或大或小的領土范圍內，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代表或占有，夺取或行使公共权力的制度。它是由地主貴族，俗人或僧侶，男爵或主教或住持在一定的領土范圍內，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执行司法、征收賦稅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政体里，政府的实質是分裂的。王座只保留了一个空洞的宗主地位(宗主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而国王被縮成为一个阴影而已。在第九世紀中封建制度的办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6頁。

① "恩地"(precaria)是由于請求而賜予的土地，即一种有条件的占有地。——譯者

法，还在萌芽状态，还在醞釀的过程里。这是潜在的封建制度，注定要在以后两百年間成长得更有力量，并随着它的成长，愈益巩固；終于形成了那封建时代的欧洲，而它的权力在1150和1250年間达到了最高峰。封建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結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經济制度。

喀罗林帝国的封建性清楚地表現在虔誠者路易817年时把帝国分給他的三个兒子的事件。他們是罗塞耳、路易和丕平。从这一項文献的序言里，显然可見，那分裂帝国的要求是由地主阶級倡議的。为什么？因为按当时流行的土地保有权制度，在国王死亡后，所有的"效忠"和"委身"契約都立刻失效，必須予以續訂。只有自由保有地(自由地)，不在此限。換句話說，所有屬于"采邑"的土地，都失掉产权。新王可依自己的意見，决定同原来业主重訂或不重訂契約。尽管习惯上有成規，法律上却沒有强制国王續訂契約的办法。显然，当整个业主阶級想到这样多的土地所有权或土地的財产会晴天霹靂般地破裂了时，他們自然会感到惴惴不安，因而为了避免这种灾难，他們請求皇帝立刻解决这未来的問題。因为法兰克帝国是由采邑和保护权集合而成的一个又广大又复杂的国家，所以，一旦皇帝去世，混乱状态必然会接踵而起的；除非是防患于未然，立即把領土分配給那些应繼承他的諸子之間。皇帝理論上的不可分裂性和实际上的統一性，遂因封建阶層的必然的利益而牺牲了；这一阶層遍布帝国境内，而它的忠誠当然也分裂在三个王子之間。法兰克帝国分成为几个王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幸的。

这一事件是封建制度的胜利。虔誠者路易諸子之間的殘酷斗爭即由此而发生。而且，每个貴族竭力以公平的或骯髒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产业。为了获得新的土地贈与，他們哄騙、威吓、或者背叛他們的宗主，为了剝夺邻人的土地，他們进攻他們。他們还强求別人承認自己对土地的世襲占有权。而另一方面撤回封地的权

力，是公共权力为防止私人篡夺政权和政府的瓦解的唯一保証。

但是，諸王子之所以互相仇恨，还有比这殘酷的領土竞爭和爭夺"忠誠者"更深一層的原因。各王子都拚命迫使皇帝分配喀罗林王室的世襲領，即国庫領，并为自己爭取其中最大的可能部分。国庫領本身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物質財产；而且国庫領还可用以賜給采邑、分发荣典、換取"忠誠者"的支持以及增加政治权力。这些王室領分散在帝国全境，从比利牛斯山到多瑙河弯曲处，从罗馬城之南到法里西亚；在面积方面，它們的大小不等，从小农庄或庄园到由成千成万农奴住着的广闊无限的可耕地带。从这些土地上得来的进款构成了王室最大的、最实質的財源。喀罗林国庫領的广布性質，連同其龐大的进款（由于查理曼所采用的有效能的管理方法的結果），使国庫領象广闊的网一般地籠罩着帝国。国庫領的分隔和分散的情况对法兰克帝国的解体所起的作用，比地主貴族的地方政治野心还要巨大。帝国的連續多次的瓜分，以凡尔登的瓜分（843 年）和米尔森的瓜分（870 年）为頂峰，根本上就是国庫領在皇帝諸子之間的分配。

国庫領的中心位于中欧这一历史事实，可說明第九世紀中欧分割的原因，并使这些地区成为諸王間的战場，这一战場后来就是那些从法兰克帝国廢墟上終于出現的各民族国家間的战場。未来法国和未来德国間的分界綫，在第九世紀已經划出，因为国庫領的最大的一塊，是位于它們之間的。东方和西方的国王都垂涎于843年創立的中間王国的領土，希望获得那里的富饒王室土地，因而分裂了这領土并瓜分了这战利品。如果喀罗林国庫領位于另一地区，或者从来沒曾分散过，欧洲那个历史上遺留下来的战爭，可能已經避免了。

有人說得好："如果喀罗林朝諸王曾能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們将会永远放弃了帝国的观念，退入米尔森条約所規定的广大

疆界之内，并在他們的世襲領上建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公国；他們将在事实上为自己要求了那正在出現的封建体系中的主要地位。”

查理曼曾清楚地看出，保存国庫領的完整在政治上和經济上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保存奥斯特拉西亚大中央区的国庫領的完整。在那里，他“实际上永远沒有”讓与过一塊領地。在他长久統治的全部时期中，只曾讓出九塊領地。他所贈送出去的領地——而它們的数目是很少的——都是从那些孤单的庄园中贈出的。他坚决保持着所有的沿軍事路綫或河流的領地，或在各省中形成了一片接連的領地。在和这富饒而又广大的一片中央王室領相比之下，其他的国庫領都是相隔很远地分散在日耳曼、意大利、南高盧和西高盧，并且在收入方面也較差，由于距离太远、位置太散漫、管理也太难，这些領地是沒有多大价值的。它們的用处，在于維持当地的官吏，并在这些地区遇到战爭时，作为軍事供应地；可是从經济观点来看，是不能和中欧洲的一塊領地相提并論的。国庫領是虔誠者路易的諸子所垂涎的对象，也是封建貴族所眼紅的东西。国庫領的瓜分是帝国分裂的基本事实；破坏国庫領的完整，就是毀灭帝国的統一。因为法兰克帝国的基石，便是国庫領。国王权力的丧失与封建貴族权力的获得，是以国庫領的分割或分散为比例的。国庫領的完整維持了多久，封建集合体就維持了多久，即对王室的封建反叛被阻止了多久。因为貴族的領地在数字上少得多，而在連接情况上也差得多。

但是，王室土地只是喀罗林朝又广大又富饒的領地的一部分。中欧这一地区有許多寺院，而这些寺院也都是大土地所有者。这些寺院有很多是喀罗林朝建造的，因而是隶屬于王室的。王室享有授予僧职之权；所以它不仅控制着这些“王家”寺院的管理，而且也染指于它們的进款。还有别的寺院，是从墨洛温朝落入喀罗林朝控制之下的，因此，很多寺院，在中欧肯定超过半数，同国庫領打成

一片了。这些寺院的土地和王室財产沒有差别。主教区也是这样的；主教的职位是在皇帝的庇护之下，而从主教的采邑方面，王室抽取大量进款。郡伯职位也是同样地授予的。总之，帝国政府是一个龐大的地主組織，而皇帝由于他的双重地位，即最大的地主兼地主政府的首脑，成为一个权力无限、財富无限的地主統治者。

上面所說的龐大財产包括有喀罗林朝的王族土地、王室土地、等同于国庫領的教会土地，由土地基金支持的政府和宗教官职（土地基金不仅提供进款，也构成保护关系），这一切对諸王子和那些支持他們要求的地主貴族来說，是値得爭取的。这一阶級的欲念在前一世紀里，是被査理·馬德尔所激起，当时他曾夺取大量教会土地并把它們分配于貴族之間；而在第九世紀中这种欲念获得滿足的机会了。

虔誠者路易的掠夺成性的諸子，各受一群渴求土地的貴族和高級僧侶的煽动，后者希望获得采邑，或获得一个賦予基金的教会或政府职位。主教和住持巧妙地以請求"恢复"那些曾由査理·馬德尔在 732 年所沒收的教会土地为借口，提出了这类要求。这位皇帝，好心腸而又懦弱，不能抗拒这压力。他的用意原是要保持国庫領的完整，可是，他的傳記的作者写道，在他統治的早期，他已这样地濫贈王室土地，"无論在古代史上或在近代时期（应注意'近代'这詞是指第九世紀的），王室都从沒有这样慷慨"。

一而再，再而三，进行新的而永远不会滿意的領土瓜分，可以說是分配封建化的土地——在829、831、833、834、836、837、839年。疆界的交叉、臣服关系的混乱以及由这些連續多次的瓜分所激起的封建的和个人的憎恨心理，这一切，終于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一种局面，以致只有走上內战的道路。在所有这些瓜分中，不容置疑的是王室土地經常散失。主教区、寺院和各郡的分配办法都是一样的。經济因素已成为这問題中的唯一因素。（"大家都了解：要分

配主教区、寺院、郡、国庫領以及一切在上面所說的規定范圍內的东西，連同附屬于它們的全部东西。")① 两个兄长不平地說，幼弟查理获得了最好和最肥沃的部分(的确，給了查理以最肥沃和最优良的部分)②。到839年这斗爭的經济性質显然可見了。在进行瓜分以前的会議上，初次使用了关于王室土地、主教区、寺院以及各郡的进款清单。但是，这些"財产統計文件"，对这項目的来說，是太少和微不足道了(因为缺少地方資料)③。

下一年(840年)，虔誠者路易逝世，那就成为各派党徒发出暴动的信号。罗退耳决意要获得并保持在萊茵河和塞納河間的和在阿尔卑斯山和法里西亚間的奧斯特拉西亚王室領的大中央区；路易决心要获得在萊茵河流域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富饒的产葡萄酒的土地(……萊茵河两岸的几个城市以及附近盛产葡萄的地方)④；禿头查理着眼于获得位于塞納河和謬司河間密集的王室領(……在謬司河和塞納河之間……給查理的……主要地区……他自己将坚决保持)⑤。三兄弟都"赶快以武力或以賜給采邑来拉攏忠臣"。很多人，或者由于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或者由于害怕丧失已得的东西，急不及待地委身于这个或那个弟兄。罗塞耳宣布，一切附庸，无論在帝国的什么地方，除非支持他否則就要丧失土地。有些謹愼的人观察形势，等待潮流的趋向，决心际会风云，飞黄騰达。在这微妙复杂的形势里，所有种族、乡土、語言以及旧臣屬关系的区

① Omnes videlicet episcopatus, abbatias, comitatus, fiscos et omnia intra praedictos fines consistentia cum omnibus ad se pertinentibus in quacumque regione consistebant, etc.

② ad Carolum vero plus fertilem et optimam largivit partem.

③ propter ignorantiam regionum.

④ …nonnullae civitates cum adjacentibus pagis trans Rhenum propter vini copiam.

⑤ …inter Mosam et Sequanam…ad Karolum …potissimam regionem …sibi debeat vindicare.

别，都弄得模糊不清。我們难以断言，在这混乱局面里，高盧大多支持査理，或者日耳曼大多支持路易，或者“中央地区”和意大利主要归順罗退耳。几乎全部阿奎丹都反对査理，东倫巴第拥护路易，萊茵兰——或者說是那里的附庸——分裂于路易和罗塞耳之間，一切都在个人利益或地方观念支配之下。在派系之中，再也看不出地理的或民族的决定因素了。僧侶阶層和封建貴族都分成派系。沒有一个社会阶層，象沒有一个国家一样，在它的臣服方面，是一心一意的。所有的喀罗林帝国旧时偉大統一的观念，都已化为烏有；只有少数失意的政客对帝国的瓦解，还感到伤心。无論什么地方，找不出分裂的直綫。欧洲是在混战的状态里。

对这項难解的糾紛，除战爭以外，再也沒有别的解决办法了。于是，发生了封特內战役(841年)，在那里罗塞耳对他的弟兄路易和査理英勇地作战——編年史家描写他怎样乘馬冲入战場，昂然站在馬鞍上，揮舞宝劍象舞打禾棒。因为丕平①現已死去了，弟兄中沒有一人肯承認他的兒子丕平二世对他父亲阿奎丹“王国”的繼承权。有一个当代的历史家一語道破了这大規模战役的封建性質。他說，“在这战爭里，每一个人或者为了扩大自己的領地，或者为了保卫自己的財产而搏斗。”封特內战役是一場派系之战。弟兄互相敌对。郡伯尼塔尔(从他的笔下我們看到这冲突的最清晰的历史)站在査理方面作战，而他的弟兄安吉尔伯特却站在罗塞耳的旗帜下。据說，在所有的繼承都依循男系的时代，香宾却有准許女系繼承的风俗，其原因是貴族在封特內战役里屠杀已尽。

可是，不到一年，罗塞耳同意了談判和平条件。在耶穌复活节时(842年)，两个弟弟会集于凡尔登，长兄罗塞耳的使节也来到那里，当时罗塞耳已有傾向談判的意思。两个弟弟同主教們經过四

① 丕平是査理、路易和罗塞耳的弟兄，死于838年。——譯者

天的商議之后,做出一項答复,即罗塞耳可保持他的旧領土,意大利、罗尼河流域以及“中区地”(但这最后一地不包括查理所要求的亚尔丁和喀波那里——“炭林”在內)連同那里的一切王室領,主教区、寺院及州郡。但是,罗塞耳拒絕了,他說这不够报酬他的党徒,特別是因为他必然要补償一切在別的王国內丧失了采邑的人。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在这一点上讓步了。

瓜分的一般性質,現在已經拟定,因而初步条約于842年6月15日,在梭恩河上近馬康的一个島上签了字。至于解决办法,委托給一个委員会进行。路易到薩克遜去鎮压那里的农民起义,查理侵入阿奎丹,来压制他的侄兒丕平,而罗塞耳則往亚尔丁山的森林去打猎了。委員們也把他們的会議地点迁移到科不林士的圣卡斯特教会去。他們早就知道他們沒有掌握十分完备的資料来作出公平的分割,因而在夏季时期他們派出了許多“調查員”去搜集有关的統計資料并作出有条有理的报告。可是,这項調查所花的时間,超过了預計的时間。的确,“調查員”和委員們在整个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里,共同进行了編輯資料的工作。正是这个季节的严酷气候,減弱了貴族們的貪婪欲念,再也沒有一个人叫嚣新战爭了。

讀者当听到中世紀政府、中世紀教会、中世紀业主是精明的帳房时,也許会发生惊訝之感。他們的档案櫃內塞滿地租簿、賦稅表、收支紀录簿、丈量册、財产清单等等。这全部管理技术可追溯到罗馬帝国时代,而中世紀僧侶和封建貴族就是从那里获得了这种技术的。上文已講过,偉大的格列高里所掌握的統計資料,一定非常完备。当日耳曼人定居于罗馬各省并建立他們的王国时,他們利用了各省政府档案中的土地丈量册来在他們自己和罗馬业主之間分配土地。据都尔·格列高里在580年关于契尔柏立克的記載,墨洛温朝曾企图修訂这些賦稅册,使之符合于当时的情况,但沒有

成功。契尔得柏特曾派遣官員往波亚叠去登記当地居民的資产。到了第六世紀已用“多頁簿”(“polyptichum”)这个名詞来称呼这类統計文件。查理·馬德尔在頒布他著名的«还俗令»之前,已作出教会土地的“估計”。邦尼非斯曾要他所建立的寺院保持詳細帳册。751年当丕平把他父亲所沒收的教会土地部分还給教会时,他在事先已做好規划書。765年时麦次·克洛杜岡进行了他的主教区內的戶口調查。查理曼的各項詔令和«庄园詔令»指出了,大皇帝曾是一个多么精明的管事員。对每一个派出去的“收税吏”,都发給一張征税表;他所征收的不得超过那張表上所認可的税款,違者将加以罰款和免职的处分。这类表册中,有些片断一直流傳到今天,特别是«簡明实例»。

有充足的証据来确定下列事实:喀罗林时代的盛世是以国家和教会方面力图整頓它們庄园的管理为特征的。喀罗林朝的复兴产生了大批規划,要把王室庄园以及从它們分出去的采邑的行政管理系統化起来。关于王室行政所作的这些努力,对安排宗教机关,不会是沒有影响的。兰普勒赫做得对,他以«簡明实例»和«普律姆租簿»相比較,来表明这两个領域間的联系。查理曼在777年曾命令进行薩克遜人的戶口調查。在他的妻子喜尔得加德去世后,在783年編造了关于她的財产清册。在787年还編造了关于圣汪列尔寺院的財产清册。在803年,对全部应服軍役的法兰克人,进行了戶口調查。808年时,进行了另一次戶口調查,調查所有領有少于三所庄园的法兰克人。812年时,对一切采邑,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在內以及国庫領,进行了一次詳細登記,“使朕得知朕有多少財产。”在这調查册內列出了个别庄园、建筑物、住宅房屋、家具、谷物、牛羊、馬匹、家禽以及按职业分类的人口。在第九世紀,这項統計資料的卷册大大地增加起来。829年时,虔誠者路易曾命令全帝国进行軍事戶口調查。846年时,主教們在摩城会議上曾向禿头

查理請願,"編造"(当时所用的术語)"一張表册要列入您祖父和您父亲时代屬于王室的領地以及那些作为采邑而保有的土地"。不幸所有这些世俗財产清册,已經失傳,但是还有两种寺院清丈册的实例:一种是在圣泽門寺院于811和826年間所編的«財产統計册»內,另一种是在圣勒米寺院的«財产統計册»內(約870年);它們都是第九世紀的两种无价之宝的統計古文献。我們知道,有很多这类寺院清丈册曾在这个时期編制出来。禿头查理,看来是由于貧困所迫,对这类財产清册,是頗感兴趣的。

从上面的証明看来,842年时派出委員会来登記一切有关行将分割了的王室領和采邑之举,不是一件空想的事情。亚琛的王宫各局以及地方档案局当然掌握着一切必要的資料,而每一个宗教机关也都知道它所有土地的范圍、从这些土地上所得的資財以及在这些土地上工作居民的人数和等級。

在843年夏季的后期,委員会又在凡尔登集会,在那里,委員們有着一切由調查員所搜集的統計資料,因而于8月10日签訂了最后解决条約。非常明显,在这領土的分割里,經济利益是占着最高地位的。土壤的肥沃、产物的种类、人口的多少以及地位的接連,都是主要考虑之点。这分割是把主教区、寺院、州郡和王室領划作三份来分配,对于它們的面积和它們的資源,也曾特别予以注意。路易曾坚持要法兰哥尼亚的富饒葡萄园,并曾以放弃科倫周圍的下萊茵河領地来換得了它們;而这下萊茵河土地給予了罗塞耳。这样看来,路易为了經济的利益,不惜牺牲了原来所主張的"語言区别"的原则。

显然可見,这样一种分割領土的形式,就是,把主教区、寺院、州郡和王室領象一把紙牌般地分出去,漠視了也違犯了任何关于自然疆界、关于种族、关于語言的区别,連經济的安排,也因此有所不便。王国間的界綫形成了一張杂乱无章的网;有的符合有的不

符合于种族和語言的区别，有的依循几哩的自然界綫，象河流那样，但多半是穿过河流、越过山脉的。每种財产，以那时所使用的話来說，是放在天平上权衡过的。如果一份財产証明是太大，不能作为单一的分配物，那末，把它弄碎或分裂开来。以二十世紀眼光去看，这样的办法似乎是令人惊异地不公平的。但是应該記牢：那时旣沒有种族感覺又沒有民族情緒存在。王国只不过是封邑的集合体。封邑是庄园的集合体。政治思想是完全屬于地方性的——屬于一省、一郡或一塊封邑。两个統治的集团，即僧侶和貴族是屬于同一阶層，屬于同一等級，在各王国內都是相同的。农民，即农奴和賤农，也是屬于一个等級，可是屬于一个微賤的阶級，被束縛于他們的地主的領地上。在各王国內，他們的身分和状况也是无分軒輊的。这样看来，人們的政治观念，是沿垂直綫起作用的；下面的人，无論貴族或农奴，仰視在他上面的人；上面的人，也无論貴族或农奴，俯視在他下面的人。当时旣沒有关于社会或領土幅度的意識，也沒有民族的或国家的情緒。

如果有人对第九世紀內战的經济性質还有怀疑的話，870 年的事件可完全証明这一点。不顧他們的侄子路易二世对洛林王国的权利，也不顧教皇的抗議，两个叔父于 870 年 8 月 8 日，在米尔森竟签訂了分割条約，按照“分裂而征服”的古老办法，把“中間王国”瓜分了。我們确切地知道，这次分割是怎样实行的，因为我們掌握着詳細的文献，而这些文献表明了过去在凡尔登是怎样做的。整个王国曾被認作“領地”。843 年的經驗还沒有忘掉，統計的清丈册和地图也沒有遺失。“那次分割是十分精密的，表册上列举了所有的点滴，象立契約者做的一样。”条約条文，先为路易，后为查理，列举出所有的主教区、寺院、州郡来归入各人所有。关于国庫的庄园，沒說出名字，但也包括入主教区和地方表册上，象一句老話常說的那样：“連同在它的范圍內的一切庄园，領主的和附庸

的。"①路易获得了两个大主教区、四个主教区、四十三所寺院、三十一个郡、四个"半郡"及两个"区"(郡的片断地区)。查理获得了三个大主教区、六个主教区、三十三所寺院、三十个郡以及四个"半郡"。里面,沒曾提及天然疆界,也沒曾說到人口的血統和語言的差别。就尽量努力分割得公平这一点上看,米尔森条約比843年所进行的有損害的領土分割已前进了一步。因为两个国王实际上各被授予了完全包圍于其他王国領域內的領土。封建制度眞的胜利了。

到了喀罗林朝諸王历史的末期,他們在东方和西方浪費了他們的世襲領,因而把自己的立脚地挖松了。甚至当他們幸而获得了新土地的时候,他們也把这些土地消耗淨尽。例如,906年时,有勢力的巴本堡尔族从法兰哥尼亚被逐出而它的广大領地归国庫所有了。当时,这些土地就分配給朝中受寵幸的貴族,而教会由貪婪的馬因斯·哈托为代表,也取得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財产和土地……归国庫所有而作为王室贈与分配給貴族"。②到了911年,日耳曼龐大的国庫領,除了分散的零星小塊土地外,什么也沒有了。国庫領在法兰哥尼亚有八十三塊,斯瓦比亚有五十塊,巴伐利亚有二十一塊,瑟林吉亚有十二塊,薩克遜有五塊,佛里斯兰有五塊。这些中萊茵的产葡萄地是最富饒的部分——"因为这些地方盛产葡萄。"③就这一方面看,西方喀罗林朝比东方喀罗林朝更貧困。

但是,瓦解的过程还沒有跟着帝国的分裂和国庫領的分散而达到終点。封建制度和瓦解的勢力,同样在各王国本身,也起着分

① cum omnibus villis in eo consistentibus, tam dominicatis et vassalorum.

② facultates et possessiones… in fiscum redactae sunt et dono regis ad nobiliores quosque distributae.

③ propter vini affluentiam quae in his locis exuberabat.

裂和分解的作用。因为帝国曾变为一个广大而无定形的封邑集合体，所以各王国势将分解为个别的封邑，而由于各省內地方上有着人种、語言和风俗的历史殘余，这种分解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这一过程在法国和在意大利比在德国，更走极端；其原因是：在“罗曼”語地区內①，两种偉大而不相同的文化，即罗馬文化和日耳曼文化，虽互相混杂而尙沒有徹底融合起来，而在日耳曼方面，人种、語言和制度的单純性較强。

当时，有組織的强盗帮会——而强盗們也是貴族出身的，編年史家称这批人为“邪教徒”、“盗匪”、“暴徒”，而称他們的帮会为“匪党”(herizuph)——横行全国，在国王、教会及其他貴族的土地上，进行掠夺。这批“恶魔党徒”，象大主教欣克馬尔有一次曾称呼他們的那样——理姆教会的土地上曾遭受他們可怕的劫掠——結成了一个帮会，其中成員以永不互相叛卖、經常共同行动的誓言团結起来。但是，所有的这些暴徒不是完全屬于俗人。若干主教正是一样貪財，一样强暴。主教凡尔登·哈托在封特內战后，变节投降了罗塞耳，由于他的肆无忌憚和貪得无厭的扩充主教領，变为臭名昭著。主教和住持之間存在着永恒的仇怨，他們象貴族一样地为爭夺土地而互相搏斗着，而且象狼吃狼一样地互相厮杀着。欣克馬尔的胞侄及同姓名的主教隆城·欣克馬尔，曾受禿头查理的委托来管理若干王室領，不料他們把这些王室領并入主教領內，并且竟以武力来抗拒国王收回它們的企图。

在这样互相攻击的状态下，并由于这种使用暴力的方法，喀罗林朝时代旧有的大土地占有制已漸漸地縮減为小土地占有制了。查理曼时代的广大領地四分五裂，分成为較小的領地，因而出現了一群小业主貴族。連农庄和庄园在这压力之下，也趋于瓦解。庄园

① 指拉丁語系地区。——譯者

分成为小塊地，即以前单一庄园的零碎部分。在第九世紀历史的紛乱实驗室里，喀罗林国家的要素分解为分子，而分子再分解为原子。各种东西——政府、法律、制度、社会——都是有着几乎无限的地方分化和分裂主义的傾向。第九世紀的分裂主义不是一个种族或血統的問題，而是一个家族的問題，因为这些家族的利益已变为地方化了。

然而，我們会犯錯誤，如果認为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只是一个破坏性的过程。一个改变和轉变的时代在历史上很少是一个完全衰敗的时期。第九世紀經历了新欧洲即封建欧洲的分娩的痛苦。按这个偉大意义来說，这是一个醞釀的时期。喀罗林朝的各种制度已不复适合于正在前进着的新时代，因为它們既沒有必要的活力，也沒有必要的伸縮性来在发展了的新条件下保持它們本身或帝国。封建制度的胜利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第九世紀中期，法兰克帝国已成为一个龐大无比的过时貨了。新的勢力正在与腐敗和分化的旧勢力并肩而同时起着作用，就是說，它們在一个更为符合时代条件和时代精神的新基础上，起着重行团結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从腐烂的旧东西所造成的土壤上，注定要成长出新的更为繁盛的封建欧洲。尽管大封建主掠夺王室領地和王室特权的行为是自私自利的，尽管他們的策略往往是殘暴、貪婪和不公平的，他們甚至干着篡夺和搶劫勾当，他們甚至常常使用暴力，可是封建制度的本質却是不差的，这从长期历史上看可以得到証明。

看来，有系統地使用主要从下級封建主募来的武装队伍，可归功于塞普替美尼亚·本哈特。可是，前途将是掌握在这些暴徒手里。他們将成为法国的貴族、附庸、十字軍队伍的祖先、公爵和显貴。国王柔弱，这批人强大，所以当地社会自然而然地傾向集結于强有力者的周圍。帝国制度往往和地方制度格格不入，并且往往压制它們。而地方男爵却懂得它們，反映它們，而且应用它們。

但是，这种地方自治的新精神，不一定是集結在最大的地方巨头和世襲領主的周圍。这类巨头多半屬于法兰克人系統，因而不足以代表当地的情緒和矛盾。其次，小封建主、低級貴族以及那些害怕自己的自由地被强大貴族并入封邑內的自由人，有时还有那嫉妒地方上俗人优勢的地方主教或有勢力的住持；这批人是反对大貴族的企求的。他們了解：这些野心貴族是披着"公共福利"的外衣，爭取他們自己的利益。他们对高級貴族抱着嫉妒和怀疑的态度。所以，当高級封建主努力反对王室或互相反对的时候，低級封建主和自由人則努力反对高級封建主。低級貴族不时贏得胜利，因而国王由于害怕大貴族的权勢，常常以他的勢力，来支持小貴族，甚至来支持一个地方上既孚人望又有力量的本地人，尽管他完全不是貴族出身的。法兰克老貴族，由于多次內战、"北欧人"的侵入以及薩拉森人在南法沿海岸劫掠的結果，已經可怕地縮減；这一情况使这新的男爵阶層更加容易抬头，而封建制度遂按照新貴族生根于土壤的程度而成长着。

在第九世紀，这批"白手起家"的草莽英雄的成长，是一个有趣味的政治社会現象，也是一个实例，可說明"补偿律"在一个紊乱的无政府时期，对挽救社会瓦解所起的作用（"这样，群众以习惯法来遏阻我所反对的盜劫和掠夺，好象依法行事一样"——給"汇合处"① 的通告，860 年）。② 担尼描写了这項过程：

在查理曼以后，各种制度都沒有了。但是在这时期，从国家的瓦解里培养了尙武好战的一代作为补偿。每个小首領稳固地立脚在他所占据的或他所保持的領地上。他保有这領地，不再在受托的地位或在使用的地位上，而是作为財产和遺产了。那成为他自己的庄园、自己的村庄、自己的郡邑了。

① "汇合处"(Confluentes)指科不林士城，因位于摩塞耳和萊茵河的汇合处而得名。——譯者

② "Istas rapinas et depraedationes quas iam quasi pro lege multi per consuetudinem tenent"—Adnuntiatio ad Confluentes, 860.

那不复屬于国王;他要求它是屬于自己权利范圍的。在这个时期，保护人,即保管人,就是一个能够战斗或能够保卫别人的人……貴族按当时的語言，就是战士即士兵……他的世系是无足重輕的。他常常是一个喀罗林朝的郡伯、一个国王的受封者、或新近无主人的領地上的一个强硬业主。在一地，他是一个尙武的主教或者一个豪勇的住持；在另一地,他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一个退伍的匪徒、一个发达的冒險家、一个粗暴的猎人……无論如何,这时代的貴族是勇猛的人,有权势的人,善于使用武器的专家；他不逃走,不付贖金,在队伍的前头挺出胸膛穩固站立,以他的宝劍,来捍卫寸土尺地。为执行这种服务,他无需乎貴族祖先的①。

必須認識到,由于封建制度的成长,欧洲人感觉到从后期喀罗林时代的愁苦状态里获得了轉机。尽管有弊病，封建制度比頻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总是好些；在男爵的法院里，連农奴也有了地位。“所以我們看到欣欣向荣的状态和成长着的文明,在野蛮、无秩序和暴虐政治的混乱局面里,醞釀起来了。”

老貴族对这些“暴发戶”的憎恶,可以說明当时貴族的傾向。当虔誠者路易提拔一个农奴子厄波充任理姆大主教职位的时候，高級貴族和高級僧侶都大声抗議;因为随着教会越来越封建化,主教也日益从封建家族里遴选出来。反宫廷派对塞普替美尼亚·本哈特所控的罪状之一是：他本人虽屬高貴出身，但靠攏低微身分的貴族，甚至靠攏平民出身的人們。844 年当禿头查理为了他被控叛逆而把他恶毒地杀死的时候,他的犯罪行为,事实上不見得比很多别的貴族要坏;他們也力求建立地方政权。但是,他犯了一个不可寬恕的“破坏等級”的罪行，因而大封建主把他徹底毁灭了。而在日耳曼，斯瓦比亚貴族仇視胖子查理的首相刘特华，并驅逐他下台，因为他是出身微賤部族的。当朱狄司公主和法兰德斯的鮑威尔淫奔的时候,康边宫廷大为震惊,因为在貴族的目光中，那是一

① 坦尼:«旧制度»,第 6 頁。

件下嫁的醜事。“有些大貴族无疑是从老根上生長出来的嫩枝，或者是老树干上的接枝，但大多数是不談，不注意，也不知道这种世系的。”在两三代之内，这些暴发貴族的地位就和旧貴族不相上下了。当法兰克旧貴族逐漸从地面上消亡的时候，新的白手起家的貴族遂取其位而代之了。王座不仅对土地巨头丧失了它执行司法、征收賦稅和征集軍役之权，而且对封建等級制之外的农民和手艺人，也丧失了控制权。它在这种社会和政治退化的状态下，依靠社会的有机性而获得了拯救。社会安排的新形式、政治权力的新形式遂应运而发展了。

为使旧庄园体系維持久远，一种象查理曼时代所流行的秩序是必要的。可是，当欧洲被北欧人、薩拉森人、匈牙利人所騷扰而又被內战弄得四分五裂的时候，則情况已經改变了。战爭破坏并分裂了領土。战爭已使人口移到設防地点、城堡庇护所或者有城垣的寺院去。这过程产生了重行分配土地的需要。村庄已被破坏或改变面貌。社会生活集中于村庄的或市鎮的集团，因而把它們联結起来的重要性也增加起来了。城堡和砲壘、設防的寺院和有防御工程的庵堂，替代了旧式庄园，作为庄园組織的中心。城寨成了領主的住所。領主的隔离状态需要以分封土地的方法来分裂領地，就是分裂旧領地并构成新的封建的和領主的“权利”。結果是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城堡的建造，最鮮明地表現出这个新时代的暴力和地方权力强大的性質。在查理曼时代，当治安权可以有效地行使时，当帝国全境有法律和秩序而只在边境才有战事时，业主阶級曾住在不設防的乡村住宅上而农民也住在空曠的村庄里。但到了第九世紀这项情况已经改变；当时的帝国境內战爭頻仍，盜賊橫行。安全，即保护生命和財产，是社会最急切的需要；当政府——特別在法国——显得无力保障安全的时候，大地主貴族阶層的成員就自行处

理事情，建造了城堡来捍卫他們的領地以防止北欧人的侵犯或防止他們周圍的强盜搶劫。可是，这种措施不一定是由于政府的疏忽所引起。貴族自然而然地認識到：替国王建造城堡将要加强王室，而这是他們所不愿干的。秃头查理曾不止一次地被迫中止那些为防御北欧人侵犯王国所必需的砲台工程，因为他不能获得守卫砲台的人。貴族是太爱疑心了。当路易三世在安得那赫战役之后企图在喀姆布莱附近建筑城堡，以防止北欧人侵入的时候，因为这个理由，他不得不放弃了这項計划。

建造城堡的权利，是一項主权，也是一項王室特权。現在这項权利被封建主篡夺了。在法国和意大利——但尚沒有在日耳曼，因为在那里国王的权力还强——这些建筑物开始兴起，那是封建制度的一个眞正表現。人們可以想象，这种建筑物无論在北方或在南方的沿海，都有需要的正当理由：在北方海岸，北欧人一年比一年更加猖獗起来，而在南方海岸法国和意大利的沿海城市遭受着薩拉森海盜的擄掠。但是，实际上城堡的建造也在国境的正中心进行着。因为随着領土的封建化，每个封邑都有它的边疆。連微小的地形差别，象一个小山脊、一条溪流那样，也成为一条界綫了。每一塊形势有利的地点，象一座峻峭小山、一个悬崖絕壁、一个两河合流的河湾（在那里成了一个自然可資防御的三角地带）那样，都被占夺而設防了。而在沒有这些地势的平坦空曠的原野上，則采用了粗笨的工程；堆起一个人为的土山，在山上建造城堡，而挖出了泥土的渠，正好成为城堡周圍的壕沟。

国王向这新的无可奈何的形势屈服了。862年时，秃头查理曾頒布一道著名的詔令；他先在序言里描写了令人可悲的混乱状态，然后在正文里承認了自己对保障安全的无能为力，因而指令：每个地主貴族应以建造城堡作为社会义务。这是一項多余的«罪己詔»，因为在他周圍，这些阴森森的建筑物已經高插云霄。“保护”多半

是一个空洞的借口。这些城堡成了强盗男爵的巢穴、匪帮的集合所；他們劫掠周圍的乡村，赶走农民的牲口，拦劫商人和旅客，敲詐主教和住持。无防御的自由人和农民，被劫的僧侶、香客和商人大声抗議。他們很古怪地捧着圣經說：北欧人的侵入是偶然的，在掠夺之后就走了，但是这批强盜們象旁人一样經常纏繞着他們。因此，在864年禿头查理命令拆毁城堡，而这些城堡正是两年以前由他認可而建造起来的。这項命令只是說說而已。国王对他提倡建造城堡的行为果然自認不当，可是，他沒有破坏它們的力量了。封建制度已到了可以不理会国王而站住脚跟的程度了。

然而，建筑这些城堡，从当时的需要来看是有正当理由的。在設防寺院的墻垣周圍，在上面造着城堡的山脚下，不自由的居民集結起来，感激領主的保护，即使它是殘暴的、蛮横的。封建早期的急切需要，是保护和安全。那是以付出自由的代价来获得的。农民的屈从农奴制，不是全部出于男爵的强暴；常常有乐于接受的。自由人的归入封建体系，也不是完全由于强者对弱者恐吓的結果。封建世界的委身制和附庸制，庄园世界的农奴制和賤农制，都曾是社会的需要。它們遏阻了无政府状态，它們保护了生命和財产；正因为这样，它們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現象而非社会衰退的現象。

在小說里，这些城堡被說成是石头造的建筑物，有城垣、城塔、吊桥、城門的格子吊閘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是在城堡建筑的后来的远为进步的时期所发展起来的。欧洲的这些早期城堡，是用木料建造的，形式上很象美国早期边疆上的砲台，例如芝加哥的皮特砲台、文森兹砲台、第耳本砲台以及后来的“远西”① 堡壘。它們仅仅是四方形的木头防舍，有寬闊的屋簷，陡峭的頂，还有几个洞口；如果使用浸着松香水的发火箭头使屋頂着火，或者敌人迫近城堡周

①指美国的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区。——譯者

圍的木栏或木栅放火燃燒墻垣时,可以从这些洞口,把水傾入。城池仅仅是一条沟渠,有横过它的弔桥。窗戶是窄狹的裂口。在由城池和木栅圍着的广場之內,有几所房屋,当警报发出的时候,有逃入城堡以求領主保护的农夫寄宿在那里,并且可以寄放牲畜群。每个城堡的不可缺少的附屬物,是一口水井。在第九世紀,城堡除非建造在平地上,必須依靠蓄水池和雨水。在一百呎或二百呎或三百呎高的山頂上,穿过坚硬的岩石来挖出一口水井,需要几百个农奴好多年的辛苦劳动。

城堡的兴起和它們的遍布欧洲,在生活方式和文明性質方面,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变革。它們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軍事占优势的时代,就是封建时代。在第九、第十、甚至十一世紀,即在封建制度已自覚有力并发展成为一个巩固的政体之前,生活对社会上一切阶級来說,是又困难又粗野的。只在封建制度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制度的时候——至少达到象人类政府在任何时代所可办到的合理管理程度——城堡里的生活才变为又文雅又舒适了。到那个时候,軍事建筑也已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城堡不复仅仅是木头防舍而变为寬敞甚至雄壮的石头建筑物了。坦尼生动地描写了第九世紀这种頹廢文明的情况:

在这战爭連綿的时代里,只有一种統治是合适的,即以一群人的統治来面对敌人,而封建制度便是这样;我們单从这一特征,就可判断它所防御的危險以及它所要求的服务。西班牙《編年通史》上說,“在那些日子里,国王、伯爵、貴族和武士,为了隨时作好准备,把馬匹放在房間里,在那里他們和他們的妻子一同睡。”子爵在他的塔楼里保卫着一个谿谷的入口处或一个渡头的通路,边境上的郡伯絕望地奔赴漫天烽火的边境去,枕戈达旦……他的住所仅仅是一个篷帳和躲避所;草稭和树叶鋪遍大厅的地板上,这里,他同他的武装騎兵休息着,如果他有睡覚的机会,他便卸下靴踵鉄;墻垣上的槍眼几乎連日光也不能透入;主要是防止被箭头的射中。

由于这些勇士,农民得享安全。他們不再被屠杀,不再被牽去作俘虏,

他同他的家屬不再被赶在牛羊群里走着，頸脖被架入叉耙里。他敢于出門犁田、播种并依靠自己的收获；他知道万一遇到了危險，他和他的谷物、牲畜能够在砲台脚下的木栅圈內找得避难所。由于需要，主塔①的軍事首領和曠野的早期居民之間，逐漸有了默契，而这就变为一个公認的习慣法了。他們替他工作，耕种他的土地，代他运貨，付他报酬，付若干房屋費，若干牲畜費，若干繼承或出售費；他們被迫維持他的部队。但是当他享受了这些权利之后，如果出于驕傲或貪婪心，他还收取超出他所应得的东西，他就錯了。至于游蕩的可怜人在普遍混乱和破坏状态下恳求他庇护时，則將遭受更苛刻的条件。土地是屬于他的，沒有他的准許，不能居住在那里；如果他指給他們一方土地，如果他准許他們单純住在那里，如果他要他們工作或以种子供給他們，那么，按照他所規定的条件行事。他們將成为他的农奴……

当我們清楚地想象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生活的状态之后，我們就能够了解为什么人們愿意承認最可憎的封建权利……人們生活于或可說开始生活于粗魯而又殘酷的統治之下；他們遭受粗暴的待遇，可是获得了保护。領主，即主权者兼业主，在这双重名义下，为自己保持沼地、河流、森林、一切野兽；这倒不是一个大害，因为当时的原野差不多是一片荒地，而他在空閒的时間进行打猎来扑灭大的野兽，尤其是狼。他独自拥有这些資源，只有他才能够建造磨坊、爐灶和釀酒坊；設立渡口或購买公牛，并为了取得补偿，他征收使用它們的捐稅，或强制人使用它們。如果他是聰明的善于管理人們的人，并且要从他的土地上取得最大的利潤，他会逐步放松或者准予放松那个网眼，因为网拉得太紧，賤农和农奴在里面工作，反而不能生利。由于习慣、需要、自愿的或强制的順从性所发生的效果，領主、賤农、农奴到底各自适应了他們的地位，由共同利益而团結起来，构成了一个社会，即一个眞实的团体。領主領，伯爵領，公爵領，成为世襲領；由于盲目的本能大家愛护这世襲領，大家对它效忠。領地同領主以及他的家屬遂混淆起来了，在这一关系上，居民引領主以自豪；他們乐于講述他的武功；当他的馬車队通过馬路的时候，他們拍手欢迎他，由于同情，他們为他的闊綽豪壮而欢欣鼓舞。如果他变为鰥夫而无嗣的話，他們將派遣代表团去請求他再娶，免得在他去世以后，国家將陷入因繼承权而战爭的局面，或受邻人侵犯②。

① 即中世紀时代城堡中之主塔或主楼。——譯者

② 坦尼：«旧制度»，第8—9頁。

正是在这世襲領文化和領主情感的基础上，中世紀时代的物質和道德文明建立起来了。

历史上罕有某种进步而不伴随着某种衰敗的現象的。关于喀罗林帝国灭亡的整个历史，便是这項眞理的明証。在第九世紀，北欧人的侵入破坏了布勒塔尼的农奴制，虽然也可公平地說，封建制度从沒在那里有力地流行过——倒不是因为在凱尔特人的心里对封建制度，有什么种族反感，而是因为那里土壤的多岩石、大森林和广闊的沼泽地和象封建制度那样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政体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在塞納河流域(在那里封建制度已是最根深蒂固的)，北欧人的侵入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农奴制，另一方面削减了农奴制。懦弱的农夫退縮到城堡的庇护之下，因而接受了奴役，作为获得安全的代价；勇敢的农夫以逃亡并参加北欧人的队伍而摆脫屬于土地的农奴地位。那著名首領哈斯丁斯不是一个北欧人，而是一个逃亡的法兰克农奴。

如果有什么方法能够确定資料的話，那么，关于第九世紀人口减少的历史是有趣味的，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由于資料这样少，除了概述以外，沒有别的办法了。然而，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在意大利、法国和日耳曼，都有严重的人口低落現象，也許在日耳曼人口减少得最少。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和北高盧，情况最严重，前者遭受薩拉森人的蹂躪，后者遭受北欧人的侵犯。可是中高盧和意大利内地，虽然逃过了这些盗匪的擄掠，但由于男爵和男爵間的冲突以及当时的混乱状态，也受灾深重。

第九世紀人口的移动，如果有可能追究的話，也是有趣的。这里，再一次可看出靜的和动的趋势。当成千累万的自由人落入农奴地位时，坚决而又耐苦的农夫，逃入森林深处居住，以避乱世；而在百年以后，当最混乱的时期过去以后，教会和封建主在那里发现了这些森林里的小村庄，于是它們又把这种居民抓入什一稅的圈

套里和庄园制度的罗网里了。象这一类的移动，是太难捉摸而不易追根究底的。但从下列两个例子里，我們可获得較多資料，来說明整个区內的居民从他們旧地方移到或被移到一个新地方去。在法兰德斯，大批居民部分由于北欧人的騷扰，而更多因为低海岸上遭受海水泛濫，离开了那里；关于他們的流亡記載，我們还可看到。烏得勒支的匿名編年史家早在第九世紀，曾描写这种居民說，“差不多象魚一般地在水中生活着，水从四面八方包圍着他們，所以他們除非乘船，很少同外界接触。”圣柏坦的編年史家曾記述839年的一次洪水，說洪水冲破了当地的天然堤岸——他称之为“堤壩”，溺死了很多人并驅走了更多的人。有的难民被赶到日耳曼去，有的溯萊茵河上行，另有人渡过海峽到英国去。

大批居民从一区到另一区的移动是殖民，虽然“殖民”这个名詞多半是用在比此更加严格的意义上。中世紀殖民史上著名的一章，是关于早在虔誠者路易时代对“西班牙駐防区”的殖民。查理曼战爭（在西班牙北部对穆罕默德教徒的战爭）曾使比利牛斯山和埃波罗河間的大塊領土，变成一片荒蕪。这荒蕪地带甚至蔓延到塞普替美尼亚。为使这破坏了的地区再有人居住，虔誠者路易把这些荒地賜給寵臣，而后者使用了不自由的佃戶来开发他們所得的土地。但更有意义的是按寬大条件发放大量自由地以利移民。在第十世紀，当罗尼河流域薩拉森人被逐出以后，所遺留的人口稀少地区，也行使了这同一的殖民方法。

在人口移动方面，战爭、盜刼、洪水和飢荒是四个最大的因素。单純飢荒，除非很严重而又为时很长，是不会迫使人口迁移到别处去的。然而，农夫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所遭受的痛苦，远非我們所能想象得到。一个长久的寒冬可以冻死他們的苗芽，一次旱灾，一个多雨的春季，一次谷象虫或蝗虫的灾害可以毁坏他們的收获。有的荒灾是地方性的，其他的荒灾范圍較大。我們看到，在第九世紀

中，有六十六次这样飢荒的記載。这一世紀是多灾多难的世紀。这种灾难对破坏社会禁忌的风俗、对疏松人和土地的关系、对增加无业游民、对恶化农奴的地位所产生的种种效果，是可以想象的。当然，这种灾难，即使在較小的程度上也使地主阶級受到影响，因为他們是从耕地上汲取他們的生活費用的。至于这种情况和不滿状态如何影响到貴族阶層的渴望土地，甚至他們的反叛和盗劫行为，我們只能推测，但可断言，决不是沒有影响的。我們确切知道：842—843年的严寒冬季曾影响凡尔登条約的签訂。

在第九世紀，犹太人問題初次出現于中世紀的历史上。看来，在此之前，他們大部分曾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但到了第九世紀，他們向北散布，而进入了高盧。显然，在法兰克人征服北西班牙和薩拉森人侵犯法国南方海岸时，是有一批犹太人随着他們去的，当时，薩拉森人从海岸曾深入罗尼河流域。犹太人掌握着大部葡萄酒貿易而他們又是利凡得商品——絲綢、香粉、香料等等——的轉运巨商。他們在法国的人数又因罗塞耳一世在意大利驅逐犹太人而增加起来，其中很多似乎是来到高盧避难的。里昂·阿哥巴曾发表一篇著名的《論犹太人的傲慢》的論文来反对他們，那是在中世紀文学里最早的一次反閃族主义①的表現。

但是，这大主教②的行为不是单純地一个固执人的行为，而他之所以进行爭論的动机，也是完全光明正大的。他正面反对一个罪大恶极的风俗，而这一风俗是由帝国中犹太人即大奴隶販子所独有的。他曾禁止他所屬主教区內的基督徒把奴隶售給犹太人来輸出到西班牙阿拉伯人方面，而且还力图用种种方法限止这两个种族間的接触。然而，因为皇帝支持犹太人，所以阿哥巴只能向宫廷上的大臣以及主教們热烈呼吁，以期使事态符合于教会原则……眞实的情况是这样：在虔誠者路易时代，特别在他續娶第二位皇后

① 犹太人屬閃族(另可譯塞姆族)，反閃族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譯者
② 指里昂·阿哥巴。——譯者

朱理司以后，犹太人的地位可以公平地說，已达到威脅基督教的程度。查理大帝曾容忍犹太人；而路易还加上了他个人的偏爱；所以在他的統治下，他們享有在漫长的中世紀时期中无与倫比的繁盛地位。他們在他的保护下成为一种特殊人物，同貴族和教会站在平等地位；他們的特权还由一个皇家大員，即犹太人的总监来保障着；——后者竟僭用犹太人国王的称号。他們不負担軍役，他們是帝国商业不可缺少的商人，又由于他們長于理財，普通以包稅任务委托他們。凡是足以滿足他們民族的或宗教的偏見的事情，样样都做到了。他們享有基督徒不得享有的权利，完全的言論自由，每周一次的市場延到星期天，使外族人得举行祇拜式①。犹太人建造他們的教会并保有他們的土地与牧場；他們完全安全地种植葡萄园并建立磨坊。在皇帝宮廷上，他們以特殊隆重仪式被接待。他們攜带妻子到那里，在人丛中只以他們的特别漂亮服装而引人注目。皇后朱理司对他們非常亲近，而朝臣也学时髦，竟出席犹太教集会，并贊揚犹太教傳道师的布道甚于自己僧侶的布道。然而，犹太人在法国，不能按照普通法律程序来收回債款。所以，他們必須上訴于皇帝②。

奴隶貿易，差不多全部在犹太人手里。奴隶是战俘，大部是从日耳曼边境上捕获的丹麦人和斯拉夫人。但是，在薩克遜的斯特林加的动乱被殘酷地平服之后，可能提供了一些薩克遜人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世紀，古典拉丁文"奴隶"("servus")一詞不再意味着一个作为动产的奴隶，而意味着一个农奴了；当时另有从日耳曼东部边境俘获的斯拉夫人(Slav)得来的"sclavus"这一名詞，成了指奴隶的通用名詞了。据十世紀的两个史学家的記載，我們知道，这些犹太奴隶販子的总部設在凡尔登，在那里他們有一个筑着圍墙的广場来圈禁奴隶。从凡尔登把这些奴隶装船，上行謬司河，而后他們上岸步行，横过陆地低分水界达梭恩河，再装船下行梭恩河达里昂，从那里下行罗尼河达亚威农，在那里把奴隶从船上卸

① 犹太人以一周之第七日(星期六)为祇拜日，基督教以一周之第一日(星期日)为礼拜日。——譯者

② R. L·蒲尔：《中世紀思想史的实例》，第47—48頁。

下，再走陆路前行，过卡卡遜、那旁、珀皮南和巴塞罗納，最后到达穆罕默德教西班牙。有时把奴隶从馬賽由海路运出。但是第九和第十世紀地中海中海盗很猖獗，所以这种海运是罕見的。这些奴隶的数目（其中包括有很多妇女，特别是斯拉夫妇女）一定是很大的，而这項貿易一定是很賺錢的。从西班牙史料，我們知道，哥尔多华的閨房用語是斯拉夫語。哈里发的卫队，也是由斯拉夫人組成的。我們有理由可怀疑皇后朱理司的寵臣塞普替美尼业·本哈特从贊助奴隶貿易而获得了利潤；阿哥巴的敌对他，可能除政治原因以外还有人道主义的原因。

但是，奴隶貿易不是第九世紀中法兰克高廬的唯一商业。有人說过，法国的盗风和混乱状态已經普遍存在，使商业的經营不复可能。可是，禿头查理时代的商业活动和商业幅度有力地反駁了这項說法。甚至北欧人侵入的破坏性，也无疑地曾被夸大。

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細节，我們愈深入研究便愈覚得必須以保留态度来对待十八世紀本尼狄克派学者所得出的总括性的旧論断；他們說，"至于文化、政治和商业方面很少有古文献可以教导我們。"資料虽然少，时代虽然艰难，但第九世紀所保留下来的文明遺跡，多于一般人所設想的。海上商业，由于地中海上穆罕默德教海权的阻撓，果然已經消逝，可是內地貿易还繼續保持着，在規模上比过去所猜想的要大。在下文，我們将看到連北欧人的侵入也不是完全对貿易有損害的。

有些著名史学家常常主張：在第九世紀——甚至在第十世紀——商业和貿易差不多已完全停頓，而这种說法曾广泛被人相信。但是，查理曼帝国的商业繁荣状态不曾跟着他的逝世而立刻消灭。他所創立的良好海防制度，只是逐漸衰落下去。一直到838年时，我們还可看到虔誠者路易恢复海峽艦队。在841年以前，北欧人对法国的侵掠还不算兇猛，而在禿头查理时代之前，薩拉森海盗船也

沒有成为一个严重的危險。法里西安布匹貿易，在虔誠者路易时代(814—840年)里繼續进行着。甚至在北欧人入侵的整个时期，这項貿易还得維持下去。下謬司河畔的馬斯特立希、提罗安尼的圣汪列尔寺院以及亚貝威勒附近的圣里奎尔寺院，都是布匹織造业的重要地点。甚至在第九世紀的晚期，虽然杜尔斯特德曾五次被北欧人侵犯，而两次被焚燒，可是法里西安布匹貿易还得存留着。829年时在瓦收可以看到法里西安商人的居留地；886年在馬因斯发現了另一居留地，在那里輳集着多瑙河商路及从倫巴意大利来的貿易大道，而在喀罗林朝和薩克遜朝时代馬因斯是萊茵区的商业中心。威特兰，位于謬司河口，重要性虽次于克匡都維克，但还被称为一个"商埠"，是一个小安特卫普①。

下萊茵河、謬司河和謝耳德河的地区，从罗馬时代以来一向是一个轉运的重要地点，就是，以北欧、不列顛、斯堪的那維亚的商品来交換南欧和东方商品的一个地区。可資証明的是有大量从别的地方来的貨币曾在这个地区发現，或者是有大量在"低原国家"造币厂制造出来的貨币曾轉运到别的地方去。第六世紀的法里西安貨币是模仿拜占廷貨币的。在墨洛溫时代，在杜尔斯特德、在馬斯特立希、在赫伊、在第南特所造的貨币，比在高盧本地法兰克造币厂所出的貨币，并不見得少。杜尔斯特德造币厂所出的貨币給瑞典和波兰提供了最古的錢币类型。虔誠者路易时代是以船为国徽的；克旺都維克貨币上也刻着这一图案，而克旺都維克是法兰克帝国的主要海峽港口。在第九世紀后半期，馬斯特立希被称为一个刻在它的錢币上的"港口"；都尔內和瓦崙西恩的情形，也是这样。

布勒塔尼的半島形状，在早期已使它容易遭受北欧人的侵犯；北欧人一定有时曾阻断下罗亚尔区同布勒塔尼、加斯科尼与爱尔

① 即尼德兰的大商业中心。——译者

兰之間的貿易关系，而这种关系从查理曼时代之前起已是相当深的。可是，波特芬沿岸的食盐貿易、比斯开湾魚业，甚至布勒頓—爱尔兰貿易，在整个第九世紀中，仍繼續下去。显然，布勒塔尼同南法海岸的海路貿易一定曾存留着，至少直到第九世紀末期为止。圣加尔的"高僧"不会是无緣无故地說，那些侵入那旁港口的北欧人船只曾被誤認为布勒頓船只。但是，要引述在后期喀罗林时代布勒塔尼商业的很多細节，是不可能的。最有关系的資料，是848年的一項特許状，規定在公爵諾米諾时代倍因斯的領主对商人以及运輸商人在烏斯特河上的权利。勒敦附近的巴隆寺院的僧侶及緬因的巴索林姆寺院的僧侶都要求那港口税的一部分；这港口税是根据一个早期賜給的而提不出証明的特許状对商人及烏斯特河上运輸征收的。公爵因为沒有書面証据，曾召喚四个有关牧师区的最老居民来証明，他們宣称：从很早时期以来，航运权是屬于倍因斯的領主，而不是屬于巴隆和巴索林姆的住持的。难道不可假定其他布勒頓港口和"閘壩"(而它們在数目上是很多的)有类似的商业活动嗎？

对南特和下罗亚尔区的商业来說，北欧人的偶然侵犯的确是个不幸，但更大的不幸，倒是法兰克人和本地布勒頓人为爭夺那里的統治权所进行的殘酷斗爭。伯爵藍伯特和布勒頓公爵伊立斯波各向北欧人乞援。这冲突当然把教会捲入了漩渦，公爵支持南特主教区的一个候选人，而国王支持另一个人。結果，国王的被保护人另外給予都尔的大主教职位(885或 886年)。而那胜利的主教阿克太得到南特港口税的一半，但后来他被伊立斯波的繼承人撒罗門逐出。他在被逐以后，进行报复，竭力破坏南特的商业名誉；造謠說該城在853年已被北欧人全部毁坏，并說它在868年还完全是一片荒凉，但事实上，北欧人在853年的占領仅仅是一个暫时現象，而868年时南特已恢复它过去的商业繁荣状态。布勒頓商

业的眞正遭受破毁，是在907年偉人阿郎死后才发生的。

对北欧人阻塞横渡"海峽"交通所发生的怨言，最早見于846年时盧普·得·菲利厄所写的第七十一封信里，在信上他抱怨說，"担心海上交通的中断"①。他所指的，是香客旅行的中断，但这同一怨言也可适用于商业方面。但是，直到840年虔誠者路易去世时为止，法国內地贸易，确是很少受到北欧人影响的。841年3月21日，秃头查理曾率領軍队，乘着二十八只商船，渡过塞納河出征，这次出征終于引起了封特內战役(841年6月25日)；当时，这些商船曾从塞納河口上溯到盧昂，而逃出了其他一切河上船只被罗塞耳的手下人破坏的命运。喀罗林朝諸王子內战的爆发，是在北欧人深入王国腹地的同一时期，在此之前，法国中部各城市大部还过着它們在查理曼时代享受过的生活。法尔康所著的《圣斐立柏特傳》写于第九世紀，書中說波亚叠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甚至在十世紀的起初二十五年中，沙脫尔城据說也是这样。圣登尼斯的住持喜尔杜因死于842年，在他所写的一篇圣徒的《傳記》里，有下列一句話，当然，他所描写的主要是他那个时代的巴黎，而不是皇帝多米蒂安时代的巴黎："京都巴黎城……人口稠密，商品富足，街衢縱横，河流环繞"②。弗勒里城的修道僧亚得里瓦尔德死于878年，說得同样生动："巴黎城是多么著名的首府，过去它以荣誉、财富、土壤的肥沃、最安静的居民而光輝燦爛；称之为富饒的城市与商业中心，是很适当的。"圣泽門·得斯·普勒斯寺院的一个修道僧爱蒙，在巴黎第一次③被拉格涅·罗德布洛克占領之后，曾描述巴

---

① "Intermissa transmarinorum cura".

② "Parisiorum civitas, ut sedes regia…constipata populis, referta commerciis ac variis commeatibus, unda fluminis circumferente".

③ "Quid Lutetia Parisiorum nobile caput, resplendens quondam gloria, opibus, fertilitate soli, incolarum quietissima pace, quam non immerito regum divitias, emporium dixero populorum".

黎說:“在过去人口稠密的……最出名的巴黎城內。”① 在上述两句引語中都有“过去”字样,証明該城已受到損害。可是,甚至在北欧人侵犯的高潮里,尽管有四次侵襲和一次又长久又猛烈的圍攻,巴黎的商业还是存留着。北欧人只有一次曾穿入城內。在 845、856、861、865、885—886 年,巴黎近郊曾受到严重損害。但是巴黎人向来是遵循同一战略的,即讓河的两岸遭受蹂躪而逃避到島上去。这里僧侶和教士、商人和手艺人都来寻求避难所。从下列情况,我們知道,城内商业并没有完全被破坏:861 年 1 月中,北欧人在立足于下塞納河維塞尔小島上之后,突然在隆冬之际,发动了侵掠,擄走了若干商人。战爭和对北欧人的貿易是携手并进的。在《圣柏坦編年史》关于 865 年这一年的記載里,有一段奇怪的消息,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一年,塞納河两岸有騎兵队巡邏。左岸的队伍执行了它的职責,把一支五百名北欧人的队伍逐出了盧昂,后者是正沿着旧罗馬大道向沙脫尔挺进。在右岸由于伯爵阿拉德的疏忽,有一支二百五十人的队伍穿入巴黎周圍,搜寻葡萄酒,可是失败而返。巴黎近郊的居民主要是手艺人和小商人,其中大多数也許是依附于下列寺院的:圣宅未、圣麦利、圣泽門·勒·瑯、圣劳郎各寺院以及圣馬丁·得斯·香普教会。可是在法国,还是有一些自由工人存留着。皮特里詔令(864年)指出了这一点,虽然这些工人无疑地在递減着。

差不多所有講述禿头查理时代的作家,似无理由地主張:国王的立法到处証明了政府的腐化和社会的瓦解。可是,有重要意义的是862年以前关于桥梁的立法,是純粹屬于商业性的,而无关王国防务的。查理关于市場、貿易等等立法,难道不可認为是商业复兴的标誌嗎?的确,僧侶阶層——特别是寺院——是这項复兴的主

① “Urbem quondam populosum... opiniatissimam Parisiorum civitatem”.

要受益者，因为大部市集和市場都是授給它們的。但問題是：法国在商业被一般說成是几乎全部破坏了的时期，还有活跃的貿易。

查理象他的祖父一样，認为商业是屬于王室的資产。可是，实际上，他們两人都曾賜給教会权利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立每年一次的、每週一次的或別的市場。在第九世紀，这些市場数目上曾大大增加，但我們不知其詳。僧侶們的貪財和男爵們的图利野心与掠夺行为，当然阻碍着商业活动，可是这些新的小市場的激增却标誌出：一种經济上自发自生的过程，假定可以这样說的話，是在起着作用。从一方面看，王室的特权贈予可認为是王室对商业控制权的衰落象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贈予証明了一个进步而非退步的过渡，因为它使社会适合于新的社会經济条件。第九世紀的突出現象，是城堡、木柵和墻垣的迅速增建；如果說仅仅是为了防禦，是不能完全說明这种新的現象的。

我們必須經常注意到：在中世紀社会里，各种有机的因素——宗教、軍事和商业的——在形成城堡和寺院周圍的这些"集团"里，曾起相互影响的作用。在十一和十二世紀里，关于政治組織和社会結构上的巨大变革，有很多根源。但是，这种丰饒多产的社会过程的开端是可追溯到北欧人入侵时期以及第九世紀的暴力时期的。对这两世紀的历史，我們愈深入詳細研究，我們愈多发現：这时代就社会变革的起源、社会对新条件的适应、新制度的进化各方面来說，是丰饒多产的。如果說有关的資料少，那不是因为时代不开化所以不曾留有紀录，而是因为紀录已被毁灭。然而，还算幸运，我們有足够的紀录来証明那个时代的有机性的生活。关于这些"新市鎮"的著名例証，可在法国的东北部找到。法兰德斯、布魯日、柏基、伊泊尔都是由于地方社会集中于一个城堡的周圍而产生的。但是，在很远的南方也可看出同样的情况，例如，在魯息雍。

然而，在这改变着的社会秩序里，教会，特別是寺院，所得的利

益，比城堡要多。在它們的城垣之下举行重要市集。商人們在它們的疆界之內并在它們雇佣之下作为經商代理人，往来于法国各河流上，进行活动，这些活动是早期中世紀和十一与十二世紀城市社会兴起时期之間的一个联系环节。盧普·得·菲利厄曾經描写有关制造寺院所使用的这一类船只的情况（在851—852年間的冬季）。这种船只往来于罗因、塞納和瓦茲各河流上。为了建造船只，他从松斯主教区內瑪納地方运来了二十棵大树。鉄似乎曾是最难得的东西。因为水运多于陆运，所以在沿河的适当地点上，这些主教区的和寺院的团体設有存放商品的倉庫或儲棧，叫做“庇护所”、“小舍”(希腊文“Kasela”)或“祭盆”(“Patella”)。甚至在北欧人入侵期間，寺院还在急切地申請沿河港口的特权；这一事实指明了法国內地貿易还是有利可图的。843年时，准予科米里寺院被免交罗亚尔、塞納、瑪恩、薩特各河上及“朕領土內其他河流上”的一切通行税；852年时，給与都尔附近的圣辛福林寺院这河流两岸的各一港口；859年时，免除圣泽門·得·奥舍耳寺院的各种通行税；同一年，免除标力修道僧的通行税，并給与他們“在叔尼克街上”的一个市場权；860年时，賜給烏耳赫尔教会从这主教区商业上所得全部进款的三分之一；862年时，圣烏尔班寺院获得国王的批准，建立了一个每週一次的市場；864年时，圣登尼斯寺院获得了彭他兹的市場权；867年时，圣瓦斯特寺院获得了“海峽”沿岸的并非不重要的柏尼瓦尔港。但是，圣汪列尔寺院似乎曾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原則，推行到最极端的地步，因为863年时这寺院实际上获得了塞納河下游的科德柏克作为儲貨港口，而这港口正是位于北欧人入侵的道路上。

商业情况如此，工业情况亦然。工业大部在寺院护翼之下繁荣起来。这里，我們无需討論这一麻煩問題，即罗馬帝国后期的工业团体，在蛮族入侵时期之后，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有助于中世紀

行会的起源。我們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第九世紀里，有大批手艺人的集团附屬于寺院，而附屬于世俗庄园的是較少的。有时，关于建造一所新寺院的消息吸引去大批这类工人，那里需要僱佣工匠、砍石工、木匠、制革匠、染工、染布工等等。第九世紀里，关于这种工业集团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圣里奎尔寺院的集团，但也有关于其他类似集团的例証如在苏瓦桑寺院、在圣登尼斯和它的附屬寺院以及在圣柏坦寺院的集团。

关于圣里奎尔和圣柏坦寺院方面，有詳細的資料可以表明：各种行业是集合在寺院周圍的"各街区"的——据圣柏坦寺院《編年史》記載，是"依行业集聚的"。在圣里奎尔，我們看到有馬具匠街、面包工街、皮貨业街、鞋匠街、葡萄酒商人街、漂布工人街等等，总共有十一个"街区"。这一文献表明了第九世紀一个市鎮的整个工业組織的情况。应該注意：虽然各行业看来是分得很細的，但沒有例証說明圣里奎尔手艺人間会社的內部联系。然而，关于苏瓦桑鞋匠这个例証中，我們曾发現一句令人捉摸不定的話："鞋匠保护同盟"（"Clientala sutorum"）。但这句話也只不过是指一个同业人結合的会社而已（也許是起源于日耳曼人的?）。那是喀罗林朝立法所力求取締的会社，也是欣克馬尔的著名条文法所提及的会社。

上述法国第九世紀里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例証，可駁倒当时的修道僧們的悲憤之談，所以我們必須以保留态度来看他們所描繪的那种可怕的混乱景象。当割讓諾曼底給洛尔夫的时候，盧昂还是有一小撮商人的。无可否認，寺院的困苦状态往往故意描写得过分，为的要說服国王来增加它的財产。当然僧侶們常常忍受艰难和愁苦，但这是在完全相对的情况下而言的。他們受的苦比老百姓少，而且他們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补償。布尔乔亚尖銳地說过，"僧侶們借助于伪造的証状，一般所得的比所失的要多。"

关于法国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我們可从“丹麦金”①的历史，获得其他有价值的例証。商人曾好多次繳納这种捐稅。860年时“国王查理对教会的倉庫以及一切商人住所，也对穷人征收了捐稅”②，在下一年，这些商人(或其他象他們一样的商人)象上文所說，突然遭受了北欧人对巴黎近郊的侵襲。866年时商人再次为了繳付什一稅而被估产。然而，关于那时法国的商人阶層，877年的康边大《征稅令》以及同年后来不久在基尔賽所頒布的对这命令的补充条例，都提供了最詳尽的資料。在前一項命令里，行商和坐商按照他們的财产都須繳納“丹麦金”。但征集这項捐款的手續証明是麻煩的，所以六週以后，在基尔賽于877年6月14日从王国的其他商人另征收一項規定的款額——从卡皮人(也許是叙利亚商人)和犹太商人征收十分之一(他們資本的十分之一?)，从基督教商人征收十一分之一。

弄清楚上述的商人集团的来历，是很有趣的。877年法令所提及的坐商一定是有关860、861和866年所提及的那些商人；他們以巴黎作为基地，利用河流作为交通大道，經过法兰西島和香宾，进行貿易；并且也許在塞納河上游察柏斯进行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貿易。在1121年路易六世所发执照里第一次正式承認了“巴黎水上商人”；他們是否就是这种水上商人的先行者呢？如果是这样的話，那么我們这里得到了証据来說明巴黎商人公会从第九到十二世紀已有一貫的即使是模糊的历史。

还应弄清楚基尔賽詔令里所提及的那些行商的来历。今天业已証明，在中世紀早期法德两国商业发展的历史里，这些“候鳥”③

① “丹麦金”(“danegeld”)是为防御或进攻丹麦所課的捐稅。——譯者

② “karlus rex exactionem de thesauris ecclesiarum et omnibus mansis ac negociatoribus, etiam paupertinis fecit”.

③ 按季节迁徙之鳥；这里是指行商。——譯者

从时間和重要地位来看，都走在坐商之前。在第九世紀，城市生活还未曾充分发展，市場权利很不明确，地方管理很不稳定；所以各省貿易不能同更有利的东方奢侈品的“过路”貿易竞爭。甚至迟至十一世紀，法国的情况似乎依然如此，如果我們可从“上帝休战”作出推論的話；它的条文旨在保护商人的人身，而沒有一句話說及固定的市場。試把康边的«征稅令»（那是向在巴黎設着店舖的商人們征稅的）同基尔賽詔令第三十一条对比一下，就可看出有三种行商——基督徒、犹太人和卡比商人。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已經周知，无須再事論述；也許只要指出在那个时期法国犹太商人的人数看来比平常要多，因为罗塞耳在855年曾把犹太人从意大利逐出。但誰是第三十一条所說的基督徒商人呢？那当然不是指巴黎的“水上商人”，因为他們已按康边«征稅令»付过稅。尽管沒有人敢于提出，但我敢說，这里所指的是意大利商人，虽然沒有特殊資料来說明这批人就是他們。

当然，这項信念的論据，是从推論得来的，但我認为是有可能性的。那有一部分是以禿头查理晚年时代法意两国間存在着很密切的政治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关系比一般所認为的更接近，更亲密。修道院院长度申当論及教皇約翰八世的困难时，曾中肯地說，“一个意大利人或罗馬人处之泰然地住在阿尔兹、偉恩、里昂，甚至象理姆、松斯圣登尼斯和都尔一类城市，对他来說，也不見得完全陌生。他在自己的語言中，已經熟悉它們的地方名称和风俗习惯了。”

第九世紀里，意大利人，特别是威尼斯人，是西欧最著名的基督徒商人，而在这一时期（877年），意大利和法国間的关系特别有利于两国的接触。罗塞耳一世和路易二世都在不久之前，同威尼斯签訂了条約，規定威尼斯商人在繳納慣例通行稅后得在水陆两路自由往来于他們的領土上。皇帝路易二世在854年还曾特别努

力保护到罗馬去的商人和朝圣者(从阿尔卑斯山那边?)使之不受騷扰。海德曾大胆推測:意大利商人可能早在这个时期,已經轉运利凡得商品到阿尔卑斯山之外,但他所援引的唯一論証是:在达哥伯特时代有人曾提及在圣登尼斯寺院市集上已有倫巴商人;那对第八、第九世紀来說是沒有道理的。849年时,盧普·得·菲利厄曾出使罗馬城。我們不知道他曾走什么道路,但他的書信(第六十六封信)是有趣味的。他带着几匹日耳曼麻布作为贈給教皇的礼物,并預先写信給意大利边境上一个主教,要替他准备好一些"意大利銀币"。舒尔茨說明了在第十世紀后期,阿尔卑斯山路在商业上的使用情况,并指出了威尼斯商人曾独占斐拉腊和巴費亚市集上的东方貿易。

但是克里尼·鄂多所著奧里腊克·吉拉尔德《傳記》第二十七章中的一节文字是涉及894年的。在那一年吉拉尔德为了他要建造一所修道院,曾往罗馬城去覲見教皇福馬薩斯。在回来时,他停留在巴費亚,即旅客走过圣伯尔納德山路的經常出发地点,在那里他碰到了几个威尼斯商人。这段文字是有趣味而又有結論性的例証,說明第九世紀在巴費亚市集上,已有經营东方商品的威尼斯商人。舒尔茨对威尼斯商人在这样早的时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这件事,有所怀疑。他認为法德两国商人在倫巴城,特别是在巴費亚和斐拉腊,找到了接触地点;理由是,"一般講,商品过手的人数,从古代以来,已大大增加了。"但据我看来,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貿易,与其說是由法兰克商人經营,不如說是由意大利商人經营的,而察柏斯是意大利人同法兰克人交换商品的地点。察柏斯的地位和它对商人的异常重要性,似乎証明了上項意見是不错的;而基尔賽詔令特别指出这些商人,是明显地不同于康边《征稅令》里被課稅的法兰克商人。

应該記牢:在这时期,阿尔卑斯山路是开放着的,还沒有被薩

拉森人騷扰，并且至少在政治和軍事事务方面是常常使用这条山路的。从意大利入法国的常走的道路，是由巴費亚、伊甫里阿、阿俄斯塔，越过大圣伯尔納德山路；从那里再分出两路：⑴經由圣摩里士和瓦雷达到里昂；⑵經由日內瓦湖、奥勃彭太里尔以及旧罗馬路达到貝臧松并从那里到隆格耳和香宾。另一条到里昂的路，是經由圣約翰·得·馬里安和錢伯里的。

可是，在禿头查理統治的最后几年里，法国与意大利間的联系是很密切的。那不久将在罗尼河流域建立勃艮第王国的波索，876年时，是查理的最有势力的附庸；查理曾娶他的姊妹黎契尔德为王后。870年时，国王曾賜給他圣摩里士·恩·瓦雷寺院、偉恩城的产权以及利奥納省；871年时授給他在罗尼河流域罗塞耳的全部遺产的管理权；876年时查理称帝后，把意大利政府付托給他；877年时他得收回布魯日郡。从战略来說，波索的地位，是无与倫比的，因为他在意大利与法国之間拥有两条要道——經由瓦雷和經由圣約翰·得·馬里安的两条大道，是阿尔卑斯山两側的主人翁。此外，他还占有罗尼河和罗亚尔河流域的两个重要地点，就是，里昂和布魯日。在他的最近的領土內，有阿列尔河和罗亚尔河的汇合处以及梭恩河和罗尼河的汇合处，那从交通观点看来，是法国由南到北、自西至东的焦点地区。

阿尔卑斯山两条主要山路和法国河流系統的中心都集合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事实，一定便利了意大利和法国之間的商业交往。情况一定是这样的。在香宾市集达到它們的极重要地位之前好久，这地方的商业在第九世紀，已預示着这国家的未来命运。上塞納河察柏斯的重要性，已可看出。但摩城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商人居留地，那里的居住区是在862年被北欧人破坏了的。的确，早在第九世紀，香宾未来市集的輪廓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所以著名的小說«加林·得洛厄倫»(“Garin de Loherain”)里所描写的已經一半

是历史，一半是故事；它把那里市集的建立归功于秃头查理。这些市集比过去所設想还要古老得多。963年时，弗罗杜尔曾明白提及瑪恩河畔夏龙的一个市集。

在第九世紀，察柏斯曾是香宾的主要商埠。今天，它是奥布州塞納河畔巴尔区内的一个穷苦村庄，約距特罗伊两公里。近代的历史研究不仅发現了这地方的巨大历史重要性，而且发現了察柏斯的眞正所在地，那是这种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例証。直到近时为止，只知道察柏斯是十二世紀中屬于香宾伯爵的一个城堡区，但它在这个家族的采邑中已是一个"看不見的星座"，因为它的地位已不为人所知。到了十二世紀，关于它早期商业上的重要性，已被忘得干干净净。

但是，察柏斯的商人是哪一类的商人呢？他們当然不是法兰克商人，因为后者如上文所述，在康边《征稅令》里已被課稅。也不是"基督徒商人"(見第三十一条)和犹太商人，因为"卡比人"("Cappi") 和这两种商人有区别。"卡比人" 可能是在法国的叙利亚商人。希腊字"Kapelos" 从希罗多德直到安娜·昆尼那时代是通用的。这个字傳入叙利亚，成为"Kapila"，意即"商人"；从那里这个名詞通过西欧的叙利亚商人，又收入在法兰克法律的詞汇里。

从史料来判断，到了第八世紀，那些原在墨洛温朝时代人数如此多的叙利亚人，已經減少，而在第九世紀，对他們竟沒有直接提及，除了一个例子，即一个叙利亚学者曾帮助虔誠者路易閱讀《新約全書》这一事。罗馬和君士坦丁堡間为了破坏偶象問題所发生的破裂以及查理曼和东罗馬帝国的磨擦，可能对叙利亚人的貿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查理曼时代，东方貿易的数量是不很大的，至少他和巴格达的商业关系是不密切的。然而，难于置信：叙利亚人在几百年中在西欧已成为东方貿易的主要代表人，竟会在这个时期完全被关在門外。說叙利亚商人在第八世紀以后不再常到西

欧这一論点，只是“从沒有記載得来的論点”。当然，法兰西国家的东方貿易已經縮减，但在查理曼以后并不是完全沒有的。

有当代的資料，可証明利凡得貨物在法国流通的情况。阿波描述北欧人圍攻巴黎(885—886年)的著名叙事詩里尽量譏諷了那些被东方奢侈品、豪华服飾、太尔紫衣、宝石及安提阿皮革腐化到精神萎靡的人。此外，我們还可获得圣加尔寺院高僧的証明，那是大家所熟知的；他表面上是在論述查理曼时代，但实际上是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文明。

上面指出第九世紀后期法国可能有叙利亚商人之后，就有一个問題发生了：他們是經过什么道路来的？他們是否象从前一样，取道海路，經过馬賽和罗尼河三角洲上的馬利亚納港而来呢？在那里，科比在716年曾被授予征收香粉和香料的关税之权。从查理曼时代到十字軍时代，在高盧著名城市中，再也沒有比馬賽的历史，更加模糊的了。848年时薩拉森海盜船曾劫掠馬賽，此后几百年中它被一塊紗幕遮盖着了。可是，尽管这些海盜在海上出沒以及多年中意大利和布罗温斯沿海遭受他們的騷扰，我們还找出了資料可証明基督徒船只运輸能順利地冲破这些危險关头。因为844年时禿头查理在給圣登尼斯寺院的特权証状里，豁免了屬于僧侶或僧侶商业代理人的貿易船只的一切捐稅。“他們(商业代理人——譯者)代表那些人的利益……不論通过什么不同的港口……为了經营貿易，来到馬賽。”① 其次，878年时，教皇約翰八世經由海路曾来到阿尔玆，从那里还旅行到里昂和特罗伊。然而，在这些年代里，关于罗尼河三角洲上商业的最饒趣味的叙述，是920年国王布罗温斯·路易給阿尔玆大主教馬拿西的一件特許状，內有一处直接提及希腊商人，也有一处暗指叙利亚和犹太商人。

① “qui pro eorum utilitate ad Massiliam··· seuper diversos portus··· mercatus negotiandi gratia advenissent”.

叙利亚商人之所以被逐出西欧，可能是因为威尼斯人日益激烈的竞爭；威尼斯人逐漸把他們从商业領域內排挤出去，虽然他們至少在整个第九世紀中，还能在察柏斯立住脚。因为，如果威尼斯人早在这个时期已經經營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貿易这一论点可以站得住脚的話，那么，他們的大部分商品一定是从利凡得得来的。象上文所述，威尼斯商人在查理曼、罗塞耳和路易二世时代已享有异乎寻常的便利，而且在第九世紀后半期，大部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由于薩拉森人在南意大利的侵掠，教皇約翰八世和皇帝路易二世都和皇帝巴錫尔一世签訂了盟約。

从上文所引的例据看来，显然，北欧人的侵犯不仅沒有象过去所說的那样，破坏了商业，法国在第九世紀商业的数量和种类反比过去所曾想象的还要大。虽然西欧和利凡得間的商业关系，随着罗馬帝国的衰敗而垮下去了，可是叙利亚人在高盧維持他們的商业傳統，比以前所設想的要长久得多。也許連在中世紀时代中最艰难的时期，法国也沒有完全回复到一个純农业的社会組織。有些經济史家認为，所謂庄园制度的"自給自足"是一种幻想；这項意見甚至从第九世紀的很少的資料里，也可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在本章結束时，我們可略为談一談关于第九世紀法国境內的旅行。毫无疑問，公路上的情形已經恶化，除了交通上大不便利以外，还有盜賊橫行，使陆上旅行比水上旅行更不安全，而且水路运貨比陆路要便宜。可是，不可能相信，不安全的状态竟会严重到象編年史家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虽然，如果一个有高級社会地位的人或携带貴重物品的人要旅行，途中保卫几乎是必要的。可是那时，即使在和平的时期，显貴人員和富裕商人也一向是在保卫下旅行的。在盧普·得·菲利厄的書信里，可找到一件关于旅行的危險的出奇的例子，生动地反映了第九世紀的生活状况。这封信是他写給他的朋友理姆·欣克馬尔大主教的：

我害怕把比德著《評注》一書送給你，因为書很大，不能藏在大衣內，也不能安放于手袋里攜带着；而且即使能够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还須害怕路上碰到流氓，他們看到这手抄本如此漂亮，一定会起貪心的；这样我和你就都将失掉它了。所以，最妥当的是我亲自把書交給你，承上帝佑助，只要我們能够安然在某处会面，我就这样做。

第十章　北欧人的扩展和殖民*

第九世紀北欧人——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的扩展，是中世紀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課題。正确地来說，它是一个向外迁徙、征服和殖民于新土地的运动；它和后来十六世紀欧洲人向海外扩展是相类似的。而且，象后来的那个运动一样，北欧人扩展的根源和动力，在于經济利益、社会条件以及冒險和发現的精神。

为了理解这些强悍的人們在第九世紀所以大批向外迁徙的原因，我們必須知道一些关于他們所住国家的性質以及他們原始性的生活方法。因为他們所处的自然环境，对他們的移动，曾起巨大影响。

丹麦半島，即丹麦人的老家，差不多是一片有沼地和茂密的山毛榉树林和橡树林的沙洲。只偶然在森林的空隙处，有一些可耕的地带。丹麦人住于海濱，住于海湾畔和通海的紫色水小河口畔的村落里；他們主要靠捕魚和海盜行为来維持生活。至于斯堪的那維亚半島，也不适合于居住，情况和丹麦差不多。試翻閱地图就可看出：縱貫半島軸心是一条層巒起伏的山脉；沿海湾峽众多，形成了鋸齿状的缺口，外緣还有岩石島屿；瑞典号称"千湖地区"；瑞典和挪威的可居住部分，都是一条窄狹的海边。这种貧瘠而又多沙石的土壤，这个面积窄狹的耕地，即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够維持当地的人口的。但是，在几百年以前，对一个从历史时期的銅器时代剛出現的部族来說，那不足的程度要有多大呢？当时，他們在制造武器和造船方面虽已有显著的技能；可是从物質文明观点来看，还

* 地图：本章沒有合适的地图以資說明，但可參閱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45，58頁。

是在一种簡陋狀态里。

从古代以来，北欧人一定曾是以航海为业的民族。他們好战成性，一遇机会，便很自然地放弃了捕魚和捕鯨事业而轉向海盜行为。起初，他們也許曾互相打劫，但当他們熟悉海上生活之后，他們就沿海下行，越走越远，終于冒險渡过波罗的海和北海，因而发現了新地。第五世紀，"下薩克遜人"、犹特人、盎格魯人在不列顛所建立的殖民地，預示了第九世紀丹麦人在英法两国所进行的事情。

战爭和海上劫掠是自由北欧人的职业。据一种古史的記載，他們讓村夫乡愚去"訓練耕牛、制造犂头、建筑房屋、鑄金屬器皿、造运貨車以及耕耘土地"。至于自由人，則从事航海、捕魚、追捕鯨魚、貿易、战爭以及在需要时还干海盜行为。但是，北欧人并不是經常以野蛮的海盜姿态出現的。他們常常也是和平的經商者，只在必要情况下，才采用战斗方法。这些商人不是海盜；他們購买东西，或者以物易物，可是他們一向是很有力量来保卫他們的貨物的。当时，在战士等級和商人阶層之間，还沒有划清界綫。我們看到，酋长本人也享受商业利潤，并不以此而覚得羞恥。

英国的东海岸与海峽沿岸以及法里西亚与法国的海峽沿岸，是最先遭受北欧人侵襲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东部和法国北部与西部的自然地势，使它們特別容易受到这批海盜的攻击；因为在英国，恒伯河和泰晤士河的湾口以及瓦士大海湾，在法国謝耳德河、塞納河、罗亚尔河各河口以及吉倫特河湾口，都把国家的腹地开放給北欧人掠夺。在法国，除了格罗內河以外，各河流象輻从軸心一样地放射出来；在它的中部，上塞納河、上罗亚尔河、上謬司河以及上梭恩河各水流彼此之間相距不多几浬；在这些地区，北欧人几乎可随心所欲地移动，深入河流的上游，甚至把他們的船只拖过陆地，从一条河上行，从另一条河下行。

按这些侵襲的激烈程度，可明显地标出各个阶段；而这些阶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們表明一个进步性的轉变，即从純粹掠夺到永久居住和最后大批殖民的轉变。在英国，这轉变出現于851年，当时，丹麦人第一次在湼特过了冬。879年的韋德摩条約把英国划分为两部分，从泰晤士河口到提兹河的整个东英格兰部分，割讓給丹麦人，以求和解；这就是丹麦人从侵犯到殖民的轉折点。

当"外侵团"的侵襲不复是英国海岸上的灾患以后，跟着"外侵团"龙旗而来的，是載貨的船只以及船上的和平商人。这些船只載运着挪威的毛皮和冰島的魚类来交換英国的羊毛、蜂蜜、麦芽和麦子。支斯德尔、布里斯多、雅穆斯、倫敦同丹麦、挪威和冰島的交往遂发展起来。这种交往一定曾是相当頻繁的，因为冰島曾制訂一种法律来处理死亡在那里的英国商人的財产。据《遺民史話》的記載，約在公元1000年时，有一只船从都柏林駛到布洛德斐司城的斯諾斐尔尼斯港；船上人員，有厄尔斯人、南島人以及少数北欧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赫布里底群島的叫做索尔比那的妇女，她带来的舖盖"都是精制的"——英制被单、一条絲棉被、床上挂帳、床上装飾物；这类的东西，在冰島是从来沒有見过的。

在丹麦占优势时期，到英国的丹麦殖民有助于促进英国和斯堪的那維亚国家間的商业联系。因为是主要商人，所以他們对于把新城市建立于适合商业的地点方面，也有着影响。卡紐特大帝(1000—1035年)和外国签訂了各种重要的通商条約。我們看到資料，可說明斯堪的那維亚商人在英国几个城市里特别是在倫敦的势力，无論在他們的人数方面和重要地位方面；在那里，他們有自己的教会、市場和法院。在約克城他們也有巨大势力。約克城的几条街道的名称，是以"迦特"("gate")作为尾詞的。在約克城，过去至少約有二十条这样名称的街道，几乎不可能曾有那么多的"迦

特"(門)。所以,"如果說'迦特'不是从老的斯堪的那維亚的'迦太'(gata意即街道)这一名詞得来,那倒是一个問題了,尤其是当它出現于复合詞时,象彼得迦特(petersgate)、曼丽迦特 (marygate)、斐雪迦特 (fishergate) 等等。这些名称和斯堪的那維亚街道名称是有显著的相同点的"。

在法兰克帝国內,丹麦人在850年第一次永久定居于法里斯兰。但是在此之前,他們曾兇猛地掠夺过法兰克高盧,比在同一时期掠夺英国更加兇猛。835年时,杜尔斯特德化为灰燼。836年时,安特卫普——第一次在历史上被提及——也被燒毁。845年时巴黎被劫,而857年时再次被劫。实际上,在第九世紀,所有法国沿海岸或沿大河的重要城市都被北欧人搶劫过;其中有的好多次被劫——例如,亚眠、盧昂、巴黎、南特、都尔、沙脫尔、布腊、波尔多;連那旁、馬賽和瓦倫斯也是这样。因为他們的船只已繞过西班牙而駛入了地中海。860年时,意大利的比薩城也被襲击。

然而,在法国,北欧人的侵入有另一方面的影响:看来奇怪,法国貿易曾被北欧人刺激起来,因而有新市場开設着;法国商业非但沒有縮减,反而进步了;北欧人的侵入还产生了深刻的經济和社会結果。丹麦人是法里西安人商业上的老顧客,他們以毛皮和蜡来換取日耳曼鉄、法里西安的布匹以及萊茵兰的葡萄酒。安斯卡是到丹麦人中間去的第一位北欧使徒,所以他的《傳記》是富于这类資料的。"北欧'外侵团'不单是野蛮的海盜,他們也是有企业心的商人,他們力图在各方面获得財富……虽然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資料是很少的,但我們却可从中看出,在第九世紀还存在强大的商业活动。"

現在我們还要追寻北欧人历史上关于下列重要事态的綫索:这綫索好久以前,曾由諾曼底第一位历史家达多所指出;当时,他借口于諾曼底第一位公爵洛尔夫,說出一句有意义的話:"我們爭

取貿易与和平的代价。”①

前一章里，我們已說过：在禿头查理时代，法国境內所进行的貿易总額比起平常所想象的要大。在有些地方，这項貿易看来确是被北欧人的侵入刺激起来的。查理的詔令曾多次而徒劳地禁止同北欧人交易，特別是关于出售軍火和馬匹的交易。冒險的小販和流动的商人尾随着他們的軍队来做生意。我們看到关于一个小販的例子：“他带了一头驢跟他們走着，从一城到另一城；不管什么东西，他在一处購进的，就以更高的价格，在另一处售出了。”

有时，北欧人的商业关系上所显出的文雅气味，大于海盜和掠夺的作风。例如，873年当路易日耳曼人駐在瓦牧附近的步尔斯塔特的时候，西格夫里，即丹麦国王，与他弟兄哈夫丹都是統治者——两人都是丹麦王霍里奇二世的兒子——亲自到那里去，“为的是要媾和，使彼此王国的商人可以和平地进行买卖。”② 同一年內，罗亚尔河的北欧人同意：如果其时他們的市場不受騷扰，他們将在一个規定的日子秋毫无犯地从南特撤退，而882年时，在胖子路易圍攻埃耳斯盧后进行談判的时期中，北欧人的营帳曾开放大門，而有些法兰克人为了做生意竟冒險进入。

看来，侵犯者所获得的大量贓物，常常使市場好象睡了一夜即跳跃起来。864年的《皮特里詔令》第19条內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一条文里，查理力图确定：什么市場过去已經存在，曾否获得王室的批准，什么新市場在近时期已开放出来。有一件关于一个兵士的事情：他占夺了村民为求安全而存放在教会里的葡萄酒，并在那里开設了一爿酒店——“好象在这教会里建立了一爿店，他同自己

① “Vendendi atque sequestram pacem petimus”.

② “pacis faciendae gratia··· et ut negotiatores utriusque regni··· mercimonia··· emerent et venderent pacifice”.

的伙伴开始出售它（酒）。"① 显然，在法国，不是到处的商业都受損害；相反的，在許多地方，一定曾被刺激起来的。北欧人当然严重地扰乱了秩序，可是他們常常把他們的战利品在当地出售。由于旧市場的衰敗，或者在旧地方太易遭到危險而轉移位置时，新市場一定会兴起的。关于这类事情，我們看到下列一个特殊例子：禿头查理曾以都尔附近罗亚尔河右岸的大量土地，賜給罗柏特"强人"，其中包括有布立加，在那里后来兴起了圣巴塞洛繆市集和圣辛福林教会，还有一个港口。那里的市場和港口稅曾是一个有利的收入源流。这是 861 年的事。

其次：北欧人以"丹麦金"形式从教会和貴族的資产里所勒索得来的数量无限的錢款，有时对于貿易也一定曾起补葯的效用。自从罗馬帝国衰亡以来，高盧和全部西欧一样，曾感到流通貨币数量上的大大縮減。大部貨币已被抽調到东方去，要不然，已被窖藏起来。現在，它又被迫出現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很多貨币果然已被剪去边緣，可是它似乎还刺激了貿易。法国还有自由工人存在着。《皮特里詔令》証明了这点，虽然他們在数量上正在递減。

我們可把 862 年作为法兰克人开始認識到北欧人侵犯的严重性的日期，这一年禿头查理曾命令他的北方全部省区，普遍地建造城堡。在那个时期，北欧人事实上已占有整个海峽沿岸，从那里法兰克地主阶級一定已被逐出，虽然有很多不自由农民一定还留在那里。"塞納河左岸，居民几乎已經放弃，因而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侵入者，有广闊的空地来移殖；看来，当地居民，特别是农夫对他們不一定是憎恶的。北欧人果然进行了搶劫和破坏，但是向来有很多人沒有什么东西可被搶劫破坏的。"到 912 年时，政府和教会都已看清楚：不能用武力来打退北欧人的日子已經来到，也不能用繳

① "quasi tabernam constituens in eadem ecclesia, paribus suis illud vendere coepit".

納“丹麦金”来买走他們。他們正是为了可移住的土地以及为了他們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进行自由貿易的权利而斗爭。在那一年，老实人查理讓給洛尔夫全部海峽沿岸地，从索謨河延伸到布勒塔尼边境上为止。这些土地按照北欧人的量地法，用繩子丈量出来，并分配給移民。諾曼底大封邑就这样地建立起来了。北欧人曾經建立的最大殖民地开始了历史的一章，从此，諾曼人的势力北越海峽而达到了英国，南至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而创立了王朝；在西班牙和“圣地”上，諾曼人还深深地留着影响的痕跡。

在整个第九世紀中，北欧人在越来越大的圈子里，扩展着。不仅法国和英国，而且苏格兰和法罗、謝特兰、奥克兰各島以及爱尔兰和冰島，都感受着哈夫尔斯湾战役(872年)的反冲影响，在这战役里，美髮者哈罗德粉碎了那些竞爭首領的权力。“很多酋长逃奔出国，携带妻子兒女、奴隶、自由人、臣屬、家具和飾物，也就是，一切可装在船上的东西。”在爱尔兰，他們早在830年已定居在亚尔馬，随即在都柏林建立了王国，而这王国延續到1014年为止。爱尔兰人称他們为“东方人”(Ostmen)。北欧人之所以能保持并伸展他們的势力，是由于爱尔兰在两百年中，氏族和氏族間互相殘杀的斗爭所造成。他們对芒斯特进行劫掠，直到“閔斯德全境，沒有一个港口，沒有一个登陆碼头，沒有一个丘阜，沒有一个砲台，沒有一个要塞，而不見丹麦人和海盗的船队为止”。然而，尽管他們这样活动，他們从来沒有能够把爱尔兰变成为一个“諾曼底”。

北欧人是爱尔兰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商业动力。由于不能征复全島，他們自然而然地退守沿海岸来发展貿易。都柏林、瓦特福德和里摩黎克，即使不是由北欧人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們的重要地位首先是从东方人方面获得的。这些市鎮不仅和象布里斯多与支斯得尔那样的附近市鎮，而且和遙远的国家进行着貿易。它們和法国南部产葡萄酒区，有很密切的联系。这項葡萄酒生意是如此

重要，所以900年时在芒斯特定有管理它的法律。在都柏林，有很多外国商人。挪威和冰島同愛尔兰都有密切的交往。早在第九世紀一个冰島人叫做旅行者拉丰·里摩黎克，因为他常旅行于冰島和里摩黎克之間。《史話》中还提到其他的冰島商人也到过都柏林。愛尔兰商人到过冰島这一事情，从《遺民史話》里获得了証明：“与基督信仰在冰島成为合法的同一夏天，有一只船渡海而来，駛到斯諾斐尔尼斯，那是一只都柏林的平底船。”

860年之前，文明世界实在还沒有知道冰島，虽然愛尔兰傳教士已先于北欧人到达了那里。870年时，有一个挪威人名叫英哥尔夫者，在冰島住过一个冬天后，为要料理他的財产，回到挪威；后来在874年，他定居于現在叫做雷克雅維克的地方，即今天冰島的首都。

这新地不久成了那些在美髮者哈罗德胜利下的牺牲者的避难所。但除了这批因流亡在外而侨居冰島上的失意酋长之外，据《狡猾的鮭魚野史》(“Laxdaela saga”)所告訴我們的，还有人受下列傳說吸引而来的：“那里可自由揀选土地，也无須購买牲口；”那里“有大量飄浮到海灘的鯨魚、鮭魚漁場、捕魚海灘，四季都好”。

不是全部冰島都由挪威人来居住的，試閱維格佛遜和鮑威尔合著《島民起源論》第一卷中所举出的殖民地表，就可知道移民是从多少不同的国家来的。除了从挪威来的以外，也許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不列顚群島、苏格兰和愛尔兰的移民，它們提供了人数較多的移民。赫布里底、奥克尼、謝特兰和法罗各島也提供了它們的人口；法兰德斯、丹麦和瑞典也是如此。不是所有从这些国家来的移民，都是屬于他們所移出的国家的国民。有很多是来自“西方海外”的挪威人；他們曾在一个很短时期內逗留在奥克尼或謝特兰或愛尔兰，然后再轉到冰島上的。例如，深思者奥特，挪威的凱提尔·法拉特尼布的女兒，都柏林王“白人”奥拉夫的妻子，曾住在凱司涅斯

若干年，"她請人在森林里祕密造了一只商船；当船造成以后，她装备了这只船，携带了动产財物，"終于在892年时，駛往冰島。奥特的弟兄东部人边恩曾从挪威到达赫布里底群島，住过两个冬天，又于886年时航行到冰島。那些从西方島屿上来的人們，大多定居在冰島的西部、北部和西北部。

殖民地一旦建立以后，它就迅速发展起来，到了930年时，島上大多可居住部分，都已被占据。在900年时，島上的优良地方已由移民居住着。"在那些日子(900年)里，布洛德斐斯全境都已住着移民了，"很多其余的地方也是这样。

在早期，当冰島还大部是一个无人地区的时候，是从船上抛出椅子腿的方法来进行选擇土地的。这些椅子腿飄浮到哪里的海岸，就在哪里設立殖民地。后来，这种慣例改变了；于是占取土地采用了某种契約形式。一般講，酋长"按照尊严的地位"占取土地，虽然有时也使用抽籤的办法。取得土地的所有权，是使用火炬来"祝土地屬于自己"的方法；就是，一个人手里举起火炬轉繞自己土地一週的慣例。为了防止一个人占取过多，国王哈罗德不久就制定了一項規則：占有的土地不得多于他和他的船員带着火炬能在一天之內所走过的范圍。显然，酋长占取了很广大的土地，而很有势力的酋长所占取的，包括着闊大无边的地带。酋长們把这些地带作为贈品，分給他們的亲戚朋友；这样一来，酋长和他的后裔就成为这土地的世襲首領。一旦占領土地以后，跟着就将建造房屋和庙宇；那是每个酋长的必要建筑物。

在建造房屋之后，甚至在此之前，移民必須努力为漫长的寒冬准备食粮。所以我們应来談一談島上的食粮和产物。主要的食品是肉类和奶类。所說的肉类，一般是魚肉和兽肉。魚肉包括有嘉魚、风干魚、鮭魚或鯨魚肉。冰島上并不盛产野猪，所以兽肉是羊肉、牛肉或馬肉。在奶类中，干酪和牛奶是最普通的。去壳的燕麦

是老百姓的主要谷物食料。

魚是冰島的最有利的产品。四面皆水，島民自然而然地成了漁民。海湾和海口众多，特别是在冰島的西部；它們給从事这項漁业的人提供了广大机会；有时，为了进行捕魚而使其他的职业遭受了損害。举例說，在第九世紀后半期，弗罗基人駛入瓦特尼斯海湾时，看到了湾內这样"充滿魚类"(魚、海豹和鯨魚)，以致"为了捕魚，他們对割草毫不介意，因而他們的牲口在冬季餓死了"。捕魚是家庭妇女为維持她們的家庭所从事的职业；也是有利的实业；有好多冰島人曾靠此致富；在第十世紀上半期，釣鱈魚者索尔斯坦因便是这样获得了成功。据《遺民史話》里所說，他"成为一个最大的富翁；他經常有六十个自由人伴随着；他是一个家庭用具的大搜集家，而且还一直繼續捕魚。"还有一个更加好的例証：奥德·烏斐格孙在十一世紀中期，离开家庭时只带了"一条釣絲……一組捕魚具以及十二厄尔①的羊毛粗布，向瓦特尼斯地方上的漁夫公司賒購了一副捕魚用具；經过三冬三夏后，他还淸了所有的欠款，同时自己还有好多营业本錢"。于是，他开始了轉运事业，購买了一只"平底船"的使用权，后来取得了这只"平底船"的所有权，而且，以捕魚及經营弥德斐斯和"海濱"之間的运貨生意而富有起来。最后，他拥有几只运貨船，能够航行出国，不久被称为冰島上的最大富翁。

除了捕魚业之外，最普通的实业似乎是养羊业。每个大酋长都有若干数量的閹羊；在夏天这些羊群被放出在山側草地上吃草，而在收获季节，由那些专管寻找它們的人赶回到低地和盆地的牧場上，在寒冷的几个月內可把它們飼养在畜棚里，或者，如果冬季冷得太厉害，把羊群赶到南方去，以便在荒地上获得更适合的牧場。約1000年时，比德人的羊群就是这样的。然而，那些管理羊群

① 厄尔(ells)是量布疋的尺名。——譯者

的人不一定能够把全部羊群赶回来。常常有很多只羊失踪，为了追寻它們，将劳累好多天。邻近酋长之間也常常为了丢羊而发生爭吵，一方怀疑对方应对羊的失踪負責任。

畜养牲口一定是普通的，虽然《史話》里很少提及它。島上到处都有各色各样的馬匹。有的在收获季节被宰杀，用作食品；有的用于馱載干草；有的叫做“木馬”，因为它們馱运象干草一样多的浮木。在早期，冰島上沒有大路，但是有很多馬走的小路，在陆地馬匹实际上构成唯一的交通工具；所有的陆上旅行，不是徒步，便是乘馬。家畜除了馬、牛和羊以外，主要还有家禽和小鷹。在野兽中，馴鹿和熊在数目上也許較多。

島上种植若干种谷物，但主要产物是干草。干草是一切牲畜所絕对必需的东西，特别是在冬季；又因为夏季很短，更加需要及时收割青草。收获时期一般是在八月中。如遇干草歉收，象有时在湿季中所遭到的情况那样，牲畜就将面临飢餓的灾难。在困难时期，藏着干草的人一般被迫售出干草，租戶当然是以干草付租的；在歉收时，把若干数量牲畜宰杀了。

上文講过，冰島商人曾到过英国。在十二世紀后半期，他們在赫布里底群島上的圣大地方，曾建立一座灯塔。在一个冰島主教的傳記里，我們看到記載，說冰島同英格兰的林尼及其他的港口进行貿易。1224 年时，曾有冰島船只停泊在雅穆斯港口內。

挪威人在冰島从事貿易的外国人中，占大多数，并越来越多地控制了冰島的出口物；而冰島对挪威的这种較大的經济依附性，引起了 1262—1264 年間两国的政治联合。那时卑尔根已成为冰島产品的市場。挪威到冰島的最短路綫，是从斯特德角到冰島东岸上的霍恩，但最通常使用的路綫是从謝特兰和法罗群島之北的卑尔根，繞过冰島的西南岸而进入它目前首都所在地的河湾那一条路。

《史話》所引关于北欧人和他們所移住的各国之間的联系，在这早期内，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史話》不止一次地只提及"那个夏季有一只船开往拉发哈佛穆斯去，另一只船开往达米尔尼斯去"，而沒有說出它是从哪里开出的或誰是它的駕駛者。可是，尽管《史話》的叙述不一定都正确，但却是够多，使我們得以了解北欧人商业上射出的光芒如何广大。看来，在斯堪的那維亚世界里，每一个港口是有市場的。

在第九世紀早期，在瑞典人（他們的港口貝卡現在叫做边谷，西距斯德哥尔摩十八哩）和什列斯威的哈德比及法里西亚的杜尔斯特德之間，已建立商业关系。在虔誠者路易时代，北欧使徒安斯卡同杜尔斯特德的几个商人曾旅行到貝卡，那里据《安斯卡傳》講，"有很多富商、大量貨物和金錢。"汉堡和哈德比商人常常来到貝卡那里。

瑞典向外扩展的天然路綫，是越过波罗的海，而不是向西方去。《安斯卡傳》还告訴我們，瑞典人曾征服"科立王国"（近代的庫尔兰）內的五个市鎮，其中提及都納河畔的塞列堡以及溫达瓦河畔的比尔登两个市鎮。在这里，也可看到"基督教商人"；他們也許是从杜尔斯特德或哈德比来的法兰克人，搜購毛皮和琥珀。

然而，瑞典人进入广大而界綫模糊的斯拉夫人領土之大門，是通过芬兰湾的；在第九世紀中期之前，"罗斯人"（"Rus"是个芬兰名詞，意指"盪槳者"，芬兰人原用以称呼瑞典人的，而后来由斯拉夫人采用了）已定居在伊尔曼湖畔霍姆加尔德；这就是后来叫做"老諾夫哥罗得"或"大諾夫哥罗得"。

諾夫哥罗得和下第聶伯河畔的基輔成了瑞典人在俄罗斯的軍事和貿易殖民地，象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和在法国的盧昂一样。这些都是强加在斯拉夫人方面的軍事商人殖民地。从諾夫哥罗得到黑海，开放着一条天然水路，即經过那由罗斯人不久发現了的伏尔

科夫河与第聂伯河的水路——这就是著名的“发兰琴路”①。虽然“发兰琴”这个名詞的意义相等于北欧人或斯堪的那維亚人，但它获得了一个經济的含义。发兰琴路成了北欧和东方之間的巨大环节。由于这条路綫，不仅拜占廷而且巴格达哈里发同波罗的海区連接起来了。因为伏尔加河把諾夫哥罗得的这批冒險商人，向下运送到里海頂端伊鉄尔（近代的阿斯脫拉罕）；在那里，他們同从巴格达来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商业联系。罗斯人不久又发現了黑海北岸拜占廷商人的殖民地，并对它們进行了殘酷的劫掠。在865年夏季，他們甚至威胁了君士坦丁堡，当时东罗馬皇帝正在同薩拉森人作战。由于向南扩展的結果，他們認識到諾夫哥罗得和尤克辛海之間有建立中間站的必要性，而这一需要由于北欧人在852年(?)的占領基輔而获得了解决，当时基輔是喀扎尔人的附庸。这日期作为俄罗斯建国的开始日期，看来是重要的。因为俄罗斯是瑞典征服者在斯拉夫世界的中心区建立起来的另一个“諾曼底公国”。

北欧人对中世紀历史的影响，是不可胜計的。他們把整个北欧从不知道的境界提高到知道的境界。他們在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連接了南北两方，并建造了一个比前更广闊更巨大的欧洲。尽管这些殖民地是彼此独立的，并脫离了产生它們的母国，然而有一个紧密的文化統一性在整个北欧流行着。人們可搭漁船、貿易船、商人的内河木船或乘馬自由往来于这广大的北欧人帝国内，从格陵兰直到里海和黑海为止。丹麦人、挪威和瑞典人的語言是差不多相同的，所以凡能說斯堪的那維亚語的人可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商人和軍事冒險家結队旅行，因而他們的人数和威力足够保証他們生命財产的安全。丹麦、瑞典、挪威、英国、北法、都柏

① “发兰琴”(Varangian)意即“北欧漂泊者”，特别是指約在第九世紀那些蹂躪波罗的海的北欧人。——譯者

林"王国"、冰島、奧克尼、謝特兰、法罗、庫尔兰、俄罗斯——甚至格陵兰——都可認为是屬于十至十一世紀中一个空泛而广大的北欧人帝国的省分；这帝国有难于捉摸的統一性，象今天的英帝国那样。

統一性中最具体的也許是商业的統一。自从罗馬帝国衰落以后，从来沒有看見过可与倫比的国际商品交換。北欧的毛皮、鯨魚和海象牙是在黑海口岸、基輔、諾夫哥罗得、阿斯脫拉罕出售，来換取东方的綠綢、糖、香料、碧玉、軟膏、化粧品以及各种奢侈品。从冰島来的魚类和从格陵兰来的鯨魚油都是在比斯开湾港口和西班牙港口出售。

阿拉伯海权封閉了西地中海区这一事实，如上文所說，阻碍了南欧的利凡得貿易，所以意大利西海岸和南法海岸港口市鎮象比薩、热那亚和馬賽那样，在街道上，变为杂草丛生，而它們的港口也凄絕无人。在很多年代中，威尼斯是西欧同利凡得直接联系的唯一港口。所以，龐大数額的东方商品乃由那些横渡里海和黑海并越过里海地峽的路綫而入俄罗斯，从那里把商品分配于波罗的海和北欧地区。这俄罗斯-北欧人的商业繼續是中世紀历史上的基本商业，直到十一世紀末期野蛮的庫曼人蹂躪南部俄罗斯而中断了这貿易为止，直到同一世紀意大利沿海城市肃淸了地中海区穆罕默德教海盗船为止，直到1099年后十字軍为了拉丁和日耳曼西方，确立了"門戶开放"政策，并对西欧商人开放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港口为止。在十一世紀，基輔有八所市場，它是一方面巴格达哈里发国、埃及、叙利亚、拜占廷和另一方面中欧、北欧与西欧之間的大中間商人。波罗的海和北海似可說成是一个北方地中海的双重盆地，而倫敦、不来梅、布魯日、汉堡、律伯克、斯德丁、維斯比、但泽都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区。那条經第聶伯河、伏尔科夫河和伊尔曼湖的发兰琴商路，是同那穿过欧洲腰际的萊茵河与罗尼河的南欧

和北欧間的老商路相竞爭的。諾夫哥罗得是北欧的一个威尼斯。成千成万的拜占廷、阿拉伯、埃及、庫斐克①、甚至印度的各种錢币，連同英国、丹麦、諾曼和日耳曼錢币，的确在这些路上已被发掘出来了。

还須指出，北欧人在商业冒險方面所具有的海員和航海家的技巧和大胆行为。他們的长型船和地中海大划船型的船，是不大相同的。这些船是按照情况，用帆或用槳来推进的，而它們的船主对气候和水流比南欧海員要熟悉得多。一个北欧海員能从海水的顏色、潮水的流动、甚至一陣順风，說出海岸可能是多么远并在什么方向。他們不肯从事那种胆小的航行：即从地角到地角，从島到島徐徐行駛，唯恐迷失了航行方向，或者在夜間抛錨停泊，象地中海水手所做的那样。重霧和暗礁使他們小心，但并不能吓倒他們。他們的技能也能够和他的勇敢精神媲美。南欧水手沒有一个人能知道搶风轉舵的技巧，象北欧人所知道的那样，虽然后者也許早在第九世紀还沒有发現这項方法。后来由英国和汉撒同盟的船舶在北方海上所发展起来的海权、海上法和航海技术，都是导源于北欧人的傳統。这是一种可貴的遺产。

① 即幼发拉底河畔的庫发城。——譯者

第十一章　薩克遜和薩利安德意志
(919—1125年)*

在封建德意志，經济向上发展很自然地成了一条曲綫，其中每一段大約相当于三个皇朝中一朝的統治时期。薩克遜时期（919—1024 年）几乎是完全屬于农业和土地經济时期。关于德意志在薩克遜时期的繁荣状态，是有許多具体証据的。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增加；人口在第十世紀增加得慢，而到了十一世紀就增加得快了。另一个是河道交通的重要地位，特别是萊茵河上的交通。沿着这条河流，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有一长列古代主教区城市，排成了梯形，象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它的主教埃肯巴德在 965 年制定了一項著名的法律，里面管理貿易的条文占着一大部分）、瓦牧、斯拜尔、馬因斯、科倫（著名而又富饒的城市）和烏得勒支。就經济重要性論，堪与这些主教区城市相比拟的，是王室領的城市，象科不林士、波恩、安特那赫、威斯巴登。西方沿摩塞耳河，东方沿湼克河和美因河的其他貿易从特累甫、法兰克福和符次堡也流入萊茵河流域。重要的貿易品是忽布花、亚尔薩斯的木器、法里斯兰的法里西安布疋；后一种生意，如此重要，以致在美因斯有一条街叫做法里西安人街。科倫是以鉄的貿易中心出名的，鉄塊是从瑟林吉亚矿山里运下来的。

在講到德意志薩克遜时期的一般經济社会历史之前，我們应当来談一談捕鳥者亨利为薩克遜本土所做的事情。因为薩克遜是法兰克人的最后征服地，所以，它在德意志王国内是最新的又是建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62—63 頁。

立最晚的公爵領。从薩克遜人放弃崇拜叨尔神和倭丁神① 而皈依基督教到这个时候，剛剛是一百年。法兰克政府原来是严峻殘酷的，然而没有能剷除古代薩克遜人的风俗、制度和傳統，也沒有使封建制度在薩克遜土壤上根深蒂固。当那由土地而产生的农奴制在教会的大庄园上或最高級貴族的大庄园上流行的时候，法兰克或半法兰克血統的貴族的地位在薩克遜，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社会等級，并不包含也不具有世襲領占有权的意义。很多薩克遜貴族耕种着自己的田亩而生活，象朴素的乡紳那样——薩克遜人認为：在虔誠者路易时代，瓦拉的做法是可嘉的——他們受到那些不及他們富裕的邻人的尊重和景仰，可是并不被他們害怕。

薩克遜族的基本群众，是自由人，以自耕农或者租戶的身分耕种田地；他們对天气所感的兴趣比战爭要多。除了爱尔福特以外，很少有市鎮。直到查理曼时代为止，历史上沒有明白提到过薩克遜的什么市鎮，虽然有理由可以設想，象巴度威克和麦則堡，甚至帕得鮑恩，是可以算作城市的。甚至主教区和寺院的所在地，也只不过是过度发展的村庄。汉堡、巴度威克、馬德堡、哈勒、爱尔福特原是对付汶德人的防御地点。自由农民象以前他們的祖先那样，住在沿河的或广闊平原上的散漫而空曠的村庄里。他們是农业人口，他們最引为驕傲的出产是馬匹，而薩克遜即由此而出名。查理曼为了防患于未然，曾破坏几个古代薩克遜砲壘，象霍亨士堡、斯塔特堡、伊勒斯堡（威突金的最后一个要塞）那样，而这些建筑物除了遺跡以外，已沒有別的东西留下了。

896年时，馬扎兒人，即古代匈奴人与后来阿佛尔人的近族，已在台斯河两岸定居下来，他們遍佈在多瑙河三角地带的大平原上。此后五十年时期，他們对东德意志和北意大利所进行的掠夺，都是

① 叨尔神（Thor）即雷神，倭丁神（Woden）即斯堪的那維亚的主神，星期四（Thursday）从前者得名，星期三（Wednesday）从后者得名。——譯者

恐怖行为。他們侵入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完全象北欧人在前一世紀侵入法国所曾发生的影响一样，就是，引起城堡的建造和市鎮加筑墻垣的活动。900年时，巴伐利亚的恩斯堡，是用旧罗馬的卡斯特拉·巴太瓦（巴苏）城垣的石头建造起来的。在德意志喀罗林朝的最后几年时期中，馬扎兒人的掠夺是限于南德意志地区，他們横行于南德的因尼河和莱茵河之間，而多瑙河盆地成为他們侵入的一个天然通路。于是德意志采用了建造堡壘方法来保卫自己。原来当这侵犯开始的时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区的古代罗馬城市的城垣早已頹廢，所有寺院的各种房屋，都是散乱无章地集合着，国王和貴族的領地都是空曠的田地，而各村庄也都是可以随意出入的田舍。

在又突然又普遍的灾难里，累根斯堡、奥格斯堡、喀姆布莱和麦次赶快修葺了罗馬旧城垣，成了第一批避难所。由于这些措施，以及由于重复搶劫使德意志旧省內所可获得的贓物数量越来越少，馬扎兒人逐漸把他們掠夺的矛头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区轉向薩克遜了。可自由进出的村庄、无城垣保卫的主教区市鎮和寺院以及薩克遜人原有的一切堡壘已經毀坏，使薩克遜受到馬扎兒人的可怕进攻。而且，薩克遜人象原始日耳曼人那样，还是用密集队伍徒步作战的，而这些入寇者則是乘馬作战的。薩克遜人侭管是勇敢的，但对这样的一种敌人却沒有战胜的可能。

亨利一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迅速地采取了行动。这与高盧在查理·馬德尔时代当薩拉森人侵入时，或第九世紀在禿头查理时代当北欧人蹂躪法国时，所遇到的問題一样。但是，其結果是不相同的。在法国，王室已衰弱不堪，它不得不讓私人倡議去建造堡壘，而这批建造堡壘的人不久就脫离了王室权力的控制。德意志的情形則相反，亨利一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虽然他統治的方法，象封建时代里的一般方法那样，在形式上是很封建的，但他的封建政府却是有力的。亨利一世曾批准并监督建造这种堡壘。为

了这項目的，他以納貢九年的代价来獲取馬扎兒人的和平对待，而在这期間，他在瑟林吉亚和薩克遜建造了那些著名堡壘来保卫扎勒河和維拉河之間的一条防綫，由于这一行动，他享有了盛名。

这些德意志的堡壘不是象法国的城堡那样的。它們不是建造在貴族私人土地上的孤单城堡。它們基本上不是屬于一个家族的砲壘，象在法国的那样，而是旨在保护全社会的砲壘。这是在不同的名詞里反映出来的。在法国，我們所看到的名詞，是"城堡"(castellum) 和"砲壘" (castrum)，很少看到"市鎮" (oppidum) 这一名詞。但是，在德意志，所用的名詞是"市鎮"(urbs)、"城市"(civitas)和"市府"(municipium)。这样設防的社会单位，是王室領地，往往是一所寺院或主教所在地，而它已成为它周圍人口的中心。由于这类社会性职能，德意志的这些堡壘既不同于法国的城堡，也不同于边境上所建造的防舍。它們不象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它們既不是城堡，也不是防舍，而是有城垣的社会。因此，魁德林堡、孟勒本、赫斯斐尔德、科維各寺院，曾經設防，而主教区城市：麦則堡、民登、哈伯斯塔特、凡尔登、不来梅、帕得鮑恩、喜尔得珊、瑙謨堡、馬德堡、瓦牧、科倫、喀姆布萊、利格，在薩克遜时代，都曾以城垣圍繞起来。有的主教区城，象諾德豪森、波厄尔德、杜德尔斯特德、格洛那，都是在公爵領上筑造了城垣的地点。这些城垣不是象所設想的那样，用石头来造成的。在第十世紀，中世紀的德意志切石和石工技术，还很落后，不能建造石头的建筑物。連教堂也是用木料建造的。所謂城垣就是木柵，由豎立于地面上的树干来造成的，牢固地联結在一起，在各个角上还有木头塔樓。有时，木柵是双重的，在外圈之内，还有一所更大的塔樓或卫城。

每九个自由人中，必須有一个人担任軍役一个年头，他是駐在堡壘戍兵的一分子。人民大众，和旧时一样，依然住在空曠的乡間，可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見，每一地区出产品的三分之一是貯藏在

堡內的；在堡內，也举行一切会議、大会和宴会。亨利一世，即使沒有建立"市鎮"，但由于在这些被保护的地方集中貿易和进行社会活动，有力地帮助了它們后来的发展。因为这类地点自然地成为大家愿意居住或住在它們附近的地方，从而在早期发展了商业的重要性。結果，过了不久，在有城垣环繞的窄狹土地范圍之內，人口就很稠密了，所以我們看到有过多的人口移住在靠近城垣的郊区。迈仙和麦則堡成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鄂图一世时代已有一个郊区。可是在第一位薩克遜国王的两代之前，汉堡已有郊区人口，而麦則堡，从它另一个名字阿尔騰堡（Altenburg 意即"老城"）来判断，在亨利一世时代，一定也是一个老城，而在它的旁边，发展了一个新城。

在亨利一世、鄂图一世和亨利二世时代，象一陣驟雨般地賜与市場①，通行稅和造币各种权利，証明了薩克遜时代的商业和貿易的发展。連在赫洛茨威撒②的一首詩里，我們也看到关于一个乡村市集的叙述。亨利二世（1002—1024年）似乎曾賜給寺院以市場权利，作为他把它們的土地沒入国庫的补償。还有六个主教获得了在下列主教区內建立市場的权利：薩克遜的不来梅、奥斯那布律克、哈伯斯塔特；法兰哥尼亚的符次堡、瓦牧、斯拜尔。穿越森林和山岭的大路把那些有利于貿易的地点連接起来。这項貿易輳集于作为城市特征的市場上。很多市鎮每年有一次市集，并有規模較小而次数多的市集来出售生活上的日常必需品。在每周或每天的市場上，肉类和谷物的买卖占重要部分。那些規模較大的每年一次的市場是經营工业出品的。单帮小販則在乡村里走来走去做生意。在大城市里，那些經商为生的犹太人，拥有貨棧和倉庫。任薩

① 在中世紀，拉丁文"mercatue"起初指"市場权利"而后来指市場地点，但很少指抽象的商业。

②赫洛茨威撒（Hroswitha，約 932—1002年）是一个修女、詩人。——譯者

克遜时代，整个德意志的地方貿易是活跃的，可是在古老的西部比在新的东部，它的意义要大得多。

关于范圍較大的貿易的明显特征，在于貿易由职业商人来經营。尽管有各种社会根源，它的基础无疑是犹太人。到处都需要并欢迎这些商人設立居留地。他們的最好保护人是国王。家庭所需的主要商品是：谷物、牲口、食盐、葡萄酒、魚类、布疋、馬鞍、武器、羊皮、鞋子、干酪、黃銅、蜡、烹飪用具和面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是：烏尔穆、累根斯堡、多瑙河畔的巴苏、馬因斯和萊茵河畔的科倫、不来梅、巴度威克、馬德堡、麦則堡以及薩克遜的哈勒·科倫，即德意志的大海港，早在十一世紀已有六百个商人。馬因斯，即“王室的黃金泉源”①有一个大市場，在那里欧洲各国的产品进行交換。甚至在第一次十字軍以前，可以說，有些地方的商业生活已胜过农业生活。

萊茵河上征集通行稅，是中世紀的一种措施，而在罗馬行政上是沒有先例的。罗馬人之所以征集賦稅是純粹为了財政目的，而不是为了經济目的。他們沒有征收过河道通行稅，而萊茵河是一条自由河道。但是，这一切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从第八世紀起，通行一項課稅原则，即通行稅是为了經济的理由而征收的，目的在于改进和維护航运。发給市場执照和控制商业的权利，原是屬于帝国的一种特权。薩克遜皇帝依据这項“关稅通則”，設立了萊茵河沿岸的通行稅站。这些收稅处一般位于河流上难以通过的地方，在那里船舶必須徐行或停駛。象其他的职位一样，收稅的职务也是作为采邑恩賜的。通行稅一般是以实物繳付的；就是，以船貨的几分之几来繳付的。最普通的征費是一斐特②葡萄酒，因为葡萄酒是貨运中的最普通的东西。在薩克遜和薩利安时期，这种稅收

①“aureum regni caput”。

② 斐特(fuder)为量器名。——譯者

是有利于萊茵河商业的，因为那些进款是用在維持萊茵河的航运；但在亨利四世以年幼而未执政的长久时期中，这些通行税站有很多被主教們及其他領主占夺，而它們的收入遂被归入私囊了。后来，亨利四世追还这些税站，他一方面获得了萊茵城市的愛戴，而另一方面引起了萊茵主教（特别是科倫·安諾）及住在萊茵河两岸的封建貴族的憤恨。

德意志的对外貿易，是集中在边境城市：对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的貿易，集中在累根斯堡；对波罗的海区的貿易，集中在哈勒和馬德堡；对北欧国家和英国的貿易集中在汉堡和不来梅。在邻近国家内，象在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商人是德意志人。在南德意志，多瑙河是商业上的自然动脉，而这里奥格斯堡和累根斯堡最出名。我們可以証明累根斯堡貿易是从罗馬时代繼續下来的。那里的商人殖民地似乎从来沒有消灭过，而在第十世紀，这殖民地变为强有力了，那是因为德意志国家的双重領土扩展：向多瑙河（特别是在955年打敗馬扎兒人以后）以及向意大利扩展。在第十世紀我們看到，它已被称为"商人城市"了。954年在巴伐利亚公爵反叛的时候，鄂图一世曾使用这些商人的河上木船来进行运輸。在1000年时馬扎兒人皈依基督教以后，君士坦丁堡和德意志間的貿易，在数量上大大增加。累根斯堡，由于它的幸运地位，曾成为中欧和拜占廷之間的一个分配站，并从这早期貿易，获得了它早期的繁荣地位和財富基础。在十一世紀末期，薩尔斯堡大主教愛柏哈特，論及累根斯堡时說，它是德意志城市中最富庶的一个城市，而历史家君士坦士·伯諾尔德夸大其詞地說，1094年时在十二周内那里有九千人染疫而死。奥格斯堡早在第六世紀，已筑起了城垣，而城垣建造者的行会正是最早的手艺人行会。在第九世纪瓦牧也有一个行会。

关于十和十一世紀德意志的工业，我們所可說的，比关于商业要少，倒不是因为工业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在創造性和广泛性方

面差一些。工业几乎全部限于一种基本上是农业人口所从事的手工职业。妇女們从事紡織、縫級，即在王室家庭內亦然。在世俗的和教会的庄园上，存在着各色各样的手艺工人。有鉄匠、車輪匠、馬鞍匠、鞋匠、肥皂工、啤酒工、葡萄酒工、編結网及其他工具者、鋸木者、木匠、盾牌制造者、硝皮匠、刻木匠、刀劍匠、漂布者、箍桶匠，等等。在每个庄园的貯藏室里，可以看到床架、床墊、羽毛被褥、罩单、棉衣、坐墊、青銅、鉛、鉄和木制容器，鍵、鍋鈎、鉋、鑽、斧、刮刀、手斧及其他家庭制造的工具。在教会的大庄园上，或在大領主的有些大庄园上，設立了"工場"，由职工来制造东西，这些职工与其說是农奴，不如說是手艺奴役。这些制品的剩余部分，是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的。例如，我們知道，关于主教君士坦士·革布哈的下列一件事：有一天(993年)他召集他的仆人，选擇其中最好者，指派他們分别充当廚司和烘面包者、店員和漂布者、靴匠和园丁、車輪匠以及各种行业的技师。所有的盐場原来都屬于国王，而現在他还保留着其中的大部分。著名的盐場，是位于哈勒、薩尔斯堡、賴肯哈尔、倫涅堡、图耳、弗尔达和哥尔兹的。玻璃广泛地使用在教会建筑方面。

在工业部門中，需要象工厂那样管理的，是磨坊、啤酒釀造厂、葡萄酒厂和盐場。在那里，工人是依附者。管理人有較多的田地来維持他們的生活；工人有分塊的土地和茅舍。这些土地的产权逐漸由原来所有者移轉到管理人或依附工人。工业工人在他們工作的时候，給予原料和一定数量的食品和飲料。在剩余的时間內，他們依靠他們的田地(工业田地)来維持他們的家庭；这些田地比一般份地(田地)要小。

然而，三种工人是有高級技术的，当然也是自由手艺者。他們是矿工、金屬匠和刻石匠。班堡和喜尔得珊的罗馬式大礼拜堂以及十一世紀早期城垣，是他們手艺的例証。喜尔得珊大礼拜堂的

精致的青銅門最明显地表明了从技巧手艺过渡到薩克遜时代所完成的眞正艺术的过程；这大祇拜堂是为主教伯华德(死于 995 年)而建造的。它的設計模型者，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意志人；但是它所用的金屬是在德意志开采并冶炼出来的。造屋匠的艺术以及有关宗教建筑的装璜艺术在十和十一世紀中使人惊异地发展起来。論及伯华德时，有人写道："以又精致又漂亮的图案，装飾着墻头以及天花板。"① 在这方面，班堡的亨利二世的大祇拜堂是一个历史性的紀念物。从記載的事实，我們可窺見那时曾閃現出一种近代式的微光，就是，建造这大廈的工人們曾"要求"較高的工資；那再一次表明了这种工人一定曾是自由人。

在整个这几百年的时期內，一个經济上突出而意义又日益增长的影响，是意大利的商业和貨币对德意志的重要性。阿尔卑斯山路，以前主要是为軍事和朝圣而用，但从 962 年德意志和意大利联合組成日耳曼民族罗馬帝国② 以后，这些山路获得了商业上的重要性，那和倫巴城市的兴起是有关系的。意大利是德意志黃金供应的一个来源。越来越多的与东方的貿易，使黃金源源不絕地向阿尔卑斯山外流出。意大利的一位編年史家索拉克特·本尼狄克論及日耳曼人时，伤感地說，"薩克遜人把他們在意大利所可找到的一切黃金白銀囊括而去了。"由于阿尔卑斯山路——大圣伯尔納德和小圣伯尔納德、斯普呂根、塞普替默、勃倫納各山路——落入德意志的控制，它在欧洲享有一种商业上和財政上的无限利益；而这一切山路是条条通倫巴平原的。

中世紀德意志有四条和东方連接的路綫：(1)經由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城市，(2)通过君士坦丁堡，(3)通过俄罗斯，或經由"发兰琴

① "exquisita ac lucida pictura tam parietes quam laquearia exornabat".

②腓特烈一世加上了"神圣"这一称号。

路"或經由累根斯堡到基輔,(4)經过穆罕默德教西班牙。这一切路綫都給德意志提供了东方的消費品。在第九世紀晚期，圣加尔寺院的修道僧叙述說，查理曼朝廷上的貴族习慣于在巴費亚从威尼斯商人購买价值昂貴的利凡得布疋。他也許把他那个时代的风尙，套到查理曼时代了。908年时,主教奥格斯堡·阿达尔柏曾贈給圣加尔寺院修道僧們以价值昂貴的太尔紫色长袍。鄂图一世曾派遣一个德意志富商,叫做琉特法力德者,往君士坦丁堡去,而在973年有一个拜占廷使节来到魁德林堡。科維寺院的一本市場帳簿提供了一張应用的香料表册，这帳簿也許是从十世紀开始的。里面的数字,可使我們了解中世紀时代对香料需要的情况。帳册中列出：蜡六百磅;胡椒和小茴香籽各一百二十磅;生薑七十磅；肉桂十五磅;丁香、薑根、大黄、香油膏、霍香、香树脂、乳香、沒葯和百里香各二磅。伊克哈德四世(死于1060年?)写道，圣加尔寺院曾在君士坦司采購过香料。

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加的东方貨物以及大量黃金源源流过了阿尔卑斯山路。阿尔卑斯山区的寺院和主教区，是这項貿易的特殊受益者和管理者。它們征收通行税,維持沿路的"站",供給运輸工具并保护道路和桥梁,尽管关于它們的勒索和疏忽方面,还有很多怨言。胖子查理給圣加尔寺院以位于馬格其奥湖畔的盛产葡萄和橄欖地区內的馬西諾礼拜堂。賴赫瑙寺院，除了它在科摩区所有的地产外，在朱理尔一塞普替默路上有倫茨以及在盧克馬尼埃路上还有塔明斯和特林斯。狄遜提斯寺院在馬格其奥湖区也有土地。这些土地的贈与可追溯到丕平时代,虽然在十二世紀之前,記載是缺少的。普非斐斯寺院在契維那附近有土地,并且早在998年时,据說"在靠近塞普替米山脚①处便已有哥登第宗教圣所"。鄂图

① "ecclesiam sancti Gaudentii ad pedem Septimimontis".

一世賜給圣加尔寺院以君士坦司湖畔罗尔瑟赫的市場权利。現有一張約 960 年时亚俄斯塔的稅率表。

但是,德意志也从新开放的下多瑙河路綫,获得了商业利益。这路綫几百年来由于"蛮族"即哥特人、匈奴人、阿佛尔人、保加尔人、馬扎兒人的連續侵犯,而曾被閉塞。在 1000 年,匈牙利国王史梯芬正式皈依了拉丁基督教,于是在 500 年时期中多瑙河路綫第一次开放,并直通巴尔干半島。几乎立刻有大批商人和朝圣者开始涌到这一条到君士坦丁堡和"圣地"的最近路綫上。"貝占",就是拜占廷的金币,偶然曾由史家和詩人提及,現在,有的已从埋藏的地窖里被发掘出来了。

但不是所有的希腊和东方貨币都是經由多瑙河而来的。因为如上文所說,"发兰琴"貿易路,也使德意志通过波罗的海和东方取得联系。有一个穆罕默德教旅行家塔屠寨在 973 年到达德意志,在馬因斯看到出售的絲綢、香料及其他的东方貨物以及看到从撒馬尔罕来的若干貨币时,感到惊奇。波兰的美士谷曾送給鄂图三世来自基輔市場的一头駱駝。

德意志-西班牙的貿易大部是奴隶貿易。我們已說过,远在第九世紀,在德意志和穆罕默德教西班牙之間,已存在着一种奴隶貿易,而凡尔登曾是犹太奴隶販子的基地。温德族奴隶是这項貿易中的最重要的貨品,但也有其他的东西,象非洲的象牙、羽毛漂亮的鳥类、豹皮和獅皮、活潑的猴子。从西班牙来的路綫,是渡海到罗尼河口,从那里再向北行。鄂图一世一心要終止穆罕默德教海盜船对意大利海岸的掠夺;为此,他派遣了洛林区哥尔兹寺院的住持約翰出使于哥尔多华。我們不知道这項出使的效果如何。但是,在 1000 年之前,奴隶貿易已趋萎縮,也許因为薩拉森人被逐出于布罗温斯,而犹太商人曾与他們狼狽为奸。在薩克逊时代,德意志对外貿易的另一扩充,是从科倫渡北海到英国的貿易。这些商人

是經营德意志的鉄和銅以及东方商品。英王厄特尔勒德(978—1016年)曾給予他們在倫敦經营商业的特殊权利。

就金屬——白銀、銅、鉄——和食盐而言，中世紀德意志是欧洲的最惠国。当地中海区居民必須辛苦地在海岸上用蒸发方法在盐盆里来制造食盐时，当其他北欧的国家被迫从南欧輸入食盐时，德意志有很多天然盐井。薩尔斯堡①这一名称，說明了这一事实。德文“哈尔”(“hall”)这一綴音，作为字头或字尾时，是用以指示当地盐場的一个地方名称，例子有：哈勒、哈尔斯大德、賴肯哈尔。洛林产鉄和盐；瑟林吉亚产鉄、銀、銅和鉛；上斯瓦比亚的諾立坎产鉄；薩尔斯堡产銅和盐。在十世紀之前，士的里亚、提罗尔和薩尔斯堡的矿产已經开采。但是在十二世紀后期之前，正当波希米亚的矿产，尤其是厄尔士山脉的矿产，开始开发的时候，哈茨山脉是欧洲金屬蘊藏最富的地方。不可能确定在罗馬和德意志的开矿事业之間有什么关系，因为現有的关于墨洛温和喀罗林两朝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們不能依据它們来作出什么論断。

关于中世紀矿业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說是从开发哈茨山脉的矿产开始的。因为約在960年，当哥斯拉尔附近的兰米尔斯柏山大銀矿被发現的时候，开矿事业里发生了一种类似革命的事情。德意志就因此一跃而居西方国家的前列，此外，它已享有由于銅、鉄、鉛的出产所获得的經济优势。在十世紀后半期，貨币使用的显著增加已可看得出来，而这些貨币除了上述的矿产以外，很少有别的来源。对于这些貴金屬的生产，还須加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貢賦；因为这些貢賦象易北河斯拉夫人所納的那样，是以金屬而不是以貨物来繳納的。

可是，必須記住：尽管有商业和工业，封建德意志，象当时的全

① 薩尔斯堡(Salzsburg)是从“salt”(盐)这一字得来的。——譯者

欧洲那样，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种田、种葡萄园、种花园、种果园，是通常的职业。中世紀日耳曼人爱好果园、葡萄园和花园。詩人瓦拉弗里特·斯特累波所列举的賴赫瑙寺院园圃內的蔬菜和花卉种类，几乎和《庄园詔令》① 所列举的相同。种田主要是按三田制进行的，但这項更好的、更多产的办法，还沒有完全代替那种旧的耕种和休耕交替的两田制。历史家的証明（他們常常仔細地叙述气候条件，象严寒的冬季、干旱的夏季、潮湿的春季）、寺院庄园紀录簿的資料、薩克遜时代的刑法，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一事实：薩克遜德意志按它的經济活动說，最大部分是屬于农业經济的。甚至累根斯堡，虽然它的位置适宜于商业并有罗馬的商业傳統，但在鄂图一世时代，它之所以重要还大部在于它是周圍地区的牲口市場。

到那个时候，萊茵区的葡萄园开始起重要作用。过去，摩塞耳流域比它重要得很多。在第六世紀威南塔斯·福图內塔斯曾以荒野的萊茵土地和耕种較多的摩塞耳土地相对照，后者是盛产甜葡萄的。在这个时期，只有安得那赫在萊茵河沿岸有重要的葡萄园；在那里葡萄种植是从第九世紀开始的。

摩塞耳沿岸的葡萄种植业，是从古代傳下来的；而萊茵河沿岸的葡萄种植业，是在中世紀时代傳入的。摩塞耳河由于它的許多弯曲、它的向阳斜坡、它的肥沃土壤等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德意志葡萄的最早起源地。从德里佛斯到科不林士一带，葡萄园很多。德里佛斯的大主教，在麦提奥兰納斯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葡萄园。奇怪的是今天著名的盛产葡萄的地方，在第九世紀还是未开墾的地方。霍克海默、策尔廷安和約罕湼斯柏安这些地方，那时連名字也还不知道。当时所选擇的地点，是天然的斜坡。今

---

①指查理曼的《庄园詔令》。——譯者

天的大葡萄园，种植在峻峭的泥土岩的台地上，而在早期那里太不易攀登或太不方便。这些土地，直到十一世紀，随着薩利安时代人口的增加，才被占据，而直到十四世紀，才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十一和十二世紀，人們不得不去开垦泥土岩地；很可能，他們偶然发現而不是預先見到这些土地对葡萄种植的特别适宜性。从十一世紀起，我們有越来越多的資料，証明这些土地作为种植葡萄之用；那逐漸轉变到了更合乎科学的“山岩地耕种方法”(Terrassenbau)。耕种得最精細的地区，是在阿尔河流域，那里的河流起于爱斐尔山，下流五十五哩后在辛西格地方注入莱茵河。在莱茵河畔，最早的葡萄园通常是在旧罗馬城堡的地基上或在城市的周圍，甚至在城内。迟到十二世紀，在馬因斯的城垣之内还有葡萄园和耕地。

由于自然地势的关系，业主的葡萄园土地不是单一的打成一片的广闊地帶，而是許多零塊的土地；如果要把它們作为一个經济单位来管理，象管理庄园制度下的普通农場那样，那是有困难的。而且，修剪葡萄藤工作在农作中几乎是一种精細的技能。这种工作者可以說是劳工中的貴族。因此，出現了下列情况：在摩塞耳河和莱茵河的产葡萄地区，农奴制不象在德意志的别的地方那么流行，而园地是由付租的而非由不自由的租戶耕种的。葡萄园有时出租給一个种葡萄人的集团，有时出租給一个人，园内产品按一定比例給于地主作为地租；但是經常訂明这項数額不是勒索而是地租。

然而，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盆地之外，当时的經济状况較为落后。必須記住：这两地区获得了罗馬文明的益处；在那里，罗馬的精神和物質的傳統都还沒有完全消灭。但是，在美因河上游的符次堡附近，在弗尔达河流域(那里有弗尔达和赫斯斐尔德的邦尼非斯教派寺院)，在多瑙河最高点上的諾高区，在那布河流域，在黑森和瑟林吉亚，还可看到新开的土地和农业情况。弗尔达和赫斯斐

尔德寺院是从事于牧畜业的修道僧会社。美因河上游的渡口的名称，“牲口津” (Ochsenfurt)和“猪津”(Schweinfurt)就表明了：那里的养牲口和养猪事业是一項重要活动。在瑟林吉亚森林里，农夫飼养几千头猪，它們吃山毛櫸等果实。在这里，兴起了一个新的边境市鎮，即瑙謨堡，在那里温德人同日耳曼小販交換貨物，那是查理曼所建造的一連串边境防御站的一个新环节。

鄂图时代的立法，大多是要防止有关土地的罪行，象盗窃牲口和侵占罪那样；由此可見，德意志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商业大部限于两大河流及其支流的范圍。工业几乎是完全不自由的，由庄园上和寺院里手艺人来从事的。在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象造币厂和鑄币权的贈与所表明的那样，一定有貨币經济通行着，而在那些較落后的地区，一定仍常常使用实物支付和物物交換的办法。

薩克遜德意志有这么广大的森林，看来，圈圍和私人占有它們是不可能的。在夏秋两季，牛羊和猪群差不多随便在那里奔走，牛羊群象鹿一般地吃着树枝，而猪群吃着散落在地面上的山毛櫸实、橡实或槲实。森林也供应了穷人們鮮肉(因为牲口太貴，非在必要情况下不宰杀)，它的湖沼供給他們魚类。木柴和木材在森林里垂手可得。可是，虽然森林的确是带来好处的，但它仍經常被看作是一种討厭的东西。它藏匿着豺狼，它占据了原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它切断了村落和村落間的联系；在森林里要指出一条羊腸小道，已有困难，更談不上康庄大道了。因此，到处的森林都被視若仇敌，被无情地削平了。在 1147 年，当康拉德三世批准贈給路恩林根寺院森林地带的时候，他另給一塊广大无边的王室森林地作为贈品并附着指令說：“这一寺院的僧侣們，应借助于他們的农奴拔除它(森林)，砍倒它，使它的土地可以耕种，并把移民引到那里去，直到它完全被砍掉，連根拔出为止。”在德意志，森林的迅速伐除，是一个可悲而突出的事件。在十一世紀，圣特罗杜寺院曾有十三处

森林；而在十二世紀中，一处也沒有了。即使在还留有森林的地方，象在公地上那样，它也終于被大貴族圈圍起来；在那里他們确定了他們的領主狩猎权利，出售木材和租出牧場的权利。

在萊茵河和摩塞耳河領土范圍以外，大部德意志是一片很广的森林和寬闊的沼泽地，人口稀少而又很分散。在三百年的期間，勤劳的农民一代又一代地斬伐着森林，弄干涸洼地，直到十三世紀薩克遜和中多瑙河地区克服了荒野状态为止。即在那时，还留存着大森林地帶，其中"黑森林"和奥登森林只是萎縮了的殘余而已。我們需要以相当的理想力来想象封建时代后期德意志自然外貌的大概輪廓。麋鹿、野猪、熊常常来到茂密的山毛櫸、橡树林里；有多至包括着三百只强壮的狠的狠群，在一个隆冬时期，象在845—846年的冬季那样，使村落陷入了恐怖。与森林相提并論的，还有捕魚业。有趣的是在萊茵河和摩塞耳河上，存在着人为的养魚业，它是导源于罗馬人时代的。为了养魚的目的，池塘、河流和湖沼到处被使用着，而有时还特别建造了池塘。捕魚所用的工具有：网、圓簍和魚梁。

总而言之，关于德意志在薩克遜时代物资繁荣状态的历史例証，是广泛的，也是一致的。在諾曼諸王使英国安定之前好久，在法国的卡佩朝王政开始摆脫混乱局面之前好久，德意志薩克遜諸王不仅在中欧已建立有秩序的政府，而且也已把坚强而又有力的手伸到北意和中意方面，使那个富饒而多战爭的地方初次尝到眞正和平和繁荣的味道。而那是意大利从东哥特王国在第六世紀灭亡之后从未享受过的。德意志不需要教会以"上帝和平"① 的形式来行使警察权的干涉。因为德意志的王室能使法律和秩序通行无阻。德意志僧侶們游历法国时，看到那里的强盗男爵和无政府状

① "上帝和平"另称"上帝休战"是在1027年由教会所制定的；規定从星期三晚到星期一晨以及在若干宗教节日，軍队間及个人間不得有敌对行为。——譯者

态，感到惊异；而这种混乱局面构成了沿洛林的法德边境上糾紛的一个永存的根源。

在一百二十年的时期——从955年打敗馬扎兒人到1075年“授爵权战爭”爆发为止——德意志外无敌人的侵犯，内有封建时代后期无与倫比的和平和繁荣的状态。

在薩利安时代（1024—1125年），我們看到关于德意志繼續繁荣的两个肯定的例証：人口的显著增加以及市民生活初次活跃的表現。当然，絕对的統計数字，連想都不要想，可是近代学者已作出相对的估計。在喀罗林时代，象摩塞耳河流域那样特别良好的地区，似乎已有稠密的人口。在第九世紀，据估計，德意志人口是在二百五十和三百万之間。在薩克遜統治时期，人口一定會增加到三百万甚至三百五十万。在薩利安統治的世紀中，尽管有着从1075到1093年間所进行的长期內战，人口却繼續大大地增加着，可能在十二世紀的开始已增加到五百万。在薩克遜朝国王登极的时候（919年），可以称为城市（这是在自由城市之前）的地方不超过三十处。二百年以后（1125年），有一百五十个城市，有的是自由的或部分自由的。其他有关人口增加的例証是：居民繼續移入新地方去①；乡村教长职位，跟着人口从乡間流入城市的趋势而衰落下去；而城市本身也扩大郊区和組織新教士区来适应伸展着的城市面积的需要。这些新城市中，很多是在王室土地上兴建起来的，因为这些土地往往在有利于商业的地点上，象法兰克福、亚琛，哥尔馬耳、哥斯拉尔那样，而且，在那里国王的保护比别处要坚强。其他的新城市是在主教所在地，居民或者通过緩慢的解放过程获得了市民自由权，或者由于反叛而取得了它們。例子有：馬因斯、科倫、瓦牧、斯

①茨威发尔登（Zwifalten）的編年史說及居民称牧場为“Alb”，意即山側或山坡上的高地牧場。在南德意志，直到今天，还可听到“往高地牧場去”（auf die Alb gehen）这一句話。

特拉斯堡和馬德堡。

德意志和意大利間的越来越亲密的商业关系和作为貿易地点的市鎮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以及市民阶級的兴起，无疑是在薩利安时代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經济、社会事实。萊茵城市当然站在領导地位。就先进城市地位說，科倫由于它接近法兰德斯，胜过馬因斯，它的財富在那个时期，一定是巨大的。我們确知：它在1074年有六百个商人。它的力量已够强大，在五十年时期中两次反叛了大主教，一次在1074年，另一次在1125年。在两世紀中它两次被迫扩大它的边界，并入了新的外圍村庄并建造了新城垣。馬因斯位于美因河和萊茵河在法兰哥尼亚中央的汇合处，在繁荣方面，稍微相形見絀。科不林士的1104年的通行稅表，是按照商人所来的城市排列着的，列举了君士坦士、巴塞尔和苏黎支。而在五年后的稅率上又包括了遙远的罗馬城在内，并为罗馬人制定了一种特別稅率。亚琛和喀姆布萊发展得很快。不来梅在賢明大主教阿达尔柏統治下，成为整个北欧的大商埠，在那里德意志、俄罗斯、丹麦、冰島、英国和法兰德斯各地商人进行着貨物的交換。巴登的弗賴堡，是1118年时由扎林根族建立起来的，成为“黑森林”的商业中心，也是巴塞尔和符茨堡之間的、哥尔馬耳、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和紐倫堡之間的分界点。哥斯拉尔的发展是惊人的。它的靠近哈茨山矿場的位置再加上它优良的地势，把它提高到这么重要的程度，亨利四世如果不曾有1075年的薩克遜大叛乱和授爵权战爭的爆发，也許将永久定都在那里。就东西和南北的交通来說，哥斯拉尔的地位确是幸运的。通过它的有那条旧喀罗林朝公路，这条路从利普河口的杜易斯堡起，过帕得鮑恩，渡威塞尔河，再过哈伯司达而抵馬德堡，而它的支綫延入勃兰登堡。无論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容易和这条大路相連接的有：多特蒙德、威尔、索斯特、德的摩尔、喜尔得珊、民登、布倫斯威克、魁德林堡。其次，哥斯拉尔是縱貫中

德意志大路上的一个分界点，这条路从奥格斯堡起向北經过紐倫堡、班堡、爱尔福特、哥斯拉尔、布倫斯威克、倫涅堡、巴杜威克而达汉堡或不来梅。在多瑙河流域，累根斯堡，就重要地位說，赶过了奥格斯堡。那里有一个倫巴侨居商人的殖民地，在1038年初次見于文献里；多瑙味特出現于1030年。而最重要的，是在王室領地上的紐倫堡，于1050年时提升到一个城市的地位，虽然它在1163年前，还沒有領得特許状；它发展得这么有力量，在1105和1127年，它能够抵抗霍亨斯陶芬族的两次圍攻。它的貿易，胜过了班堡的貿易。

保护商人和奖励貿易，成了薩利安諸王，尤其是亨利四世的主要目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公安条例»（“landfrieden”）及1093年的«巴伐利亚和約»保証給商人們特殊保护。授爵权战爭和薩克遜叛乱（1075—1093年）几乎使国家破产，但在和平恢复之后，繁荣景象接踵而来了。亨利四世傳記的作者，告訴我們說，“現在，船夫在河流上可安然无恙地划过那些强盗貴族的城堡，而他們以前原是靠掠夺財物而自肥的；公路上不复充斥着劫人的匪帮；森林不复成为盜匪出沒之所；公路开放給商人旅客，使他們安全地来往；于是以劫掠为业的匪徒也陷入潦倒貧困状态，象他們曾这么长久地使别人遭受的那样。农民、手艺人和商人都歌頌国王，而他們从他的德政，获得了这种宝貴的安全；因为現在，土地的耕耘者、勤劳的手艺人、节約的市民，有些把握可以想望将来享受他們从劳动所得的成果了。”烏拉赫·伊克哈德在1104年写道：“到处安宁。和平和繁荣同时存在。①”

亨利四世确应获得市民所給予他的軍事支持。一本編年史里說，“他的軍队的最大部分是从商人方面来的。”② 在亨利四世和

① “Undique terra **satis** quievit, pace simul et fertilitate”.

② “Maxima pars ejus exercitus ex mercatoribus erat”.

格列高里七世冲突的时期中，德意志市民和手工业者阶層有着左右局势的力量，他們成了特殊宣傳的对象，无論在教皇党人或帝国党人方面。貿易利益影响了主教們在这冲突中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决定。巴塞尔主教的情况，正是这样的。

当我們看到：哈森堡·柏嘉特主教在1080年占有了布赖根的时候，試一翻地图，就可知道，他因此获得了对两条山路——哈汶斯坦因山路及由亚尔入奥尔騰的山路——的控制权；那使他可抵达那給巴塞尔城和阿尔卑斯山区間交通路綫的瑞士大道。主教为争取普非斐斯寺院，曾进行長期的斗爭；当我們想到这一寺院給主教利用塞普替默山路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一斗爭遂具有一个完全新的意义了。主教还从国王取得了柔拉山路，作为对塞普替默山路的支撑点。这一切表明了：他的一切努力都朝向使他的商业賺錢的目标。这些贈与的重要性告訴了我們，主教在拥护帝国政策方面所获得的代价。由于想要获得阿尔卑斯山路的控制权(对他商业的成功，多么必要)，柏嘉特遂成了皇帝亨利四世的一个最忠心的支持者。正是由于他的經商精神，再一次他参与廢黜格列高里的阴謀，他同那些被选把命令送往倫巴各主教那里的人們站在一起，他也不得不伴隨亨利四世往卡諾沙去，并反对皇帝的竞爭者。所以，皇帝給主教的贈与，經济方面的重要意义越大，主教对帝国的政策也越多显出它的商业性質，就是説，这政策构成了他的商业計划鏈条中的一个环节①。

低級阶層、在領主的封建压力下激憤的小貴族、市民、甚至农民(薩克遜以外的，薩克遜的情况完全特殊)②，对亨利四世的忠心是个显著的事实，那指明了在十一世紀，德国的社会机构和經济状况已有深刻的改变。

---

①基林：«巴塞尔城的貿易和工业»(1886年)。

② 薩克逊人反对亨利四世的根源，在于薩克逊人反对德意志其他部分的封建制度推行到薩克逊。因为在薩克逊，封建制度尙属很初步的性質。在那里，差不多沒有什么“軍人等級”，“帝国官員”也是很少的。宗主和附庸的关系在薩克逊，不象在巴伐利亚或斯瓦比亚那样正式，而劳役也不那么繁重。虽有許多貴族，但也有大量自由农民。而且，在这些貴族中，大土地所有者人数也不多。他們有少数附庸和比較少的庄园。他們的並貴身分，是一个社会地位，而非政治的优越地位。薩克逊貴族与其説是一个大男

理財的能力是薩利安王族的一种特长。它的創始人康拉德二世，在这方面，是卓越无比的。康拉德的孙子亨利四世在这方面表現了眞正的天才。关于这項才干，再也不能比他在管理王室土地方面表現得更好了。他培养出一群有訓練的官員，即"帝国官員"来管理它們，規定須有詳細收入帳册，企图用貨币經济来替代实物支付的老方法，改革稅制，改进荒地，恢复——或者用法律术語，"追还"——大量国庫財产，这些財产在他未成年时期被貪得无厭的主教和貴族們非法地夺去了。但是，他追求效能的欲望，不止于此。巨大森林和广闊荒野是王室土地，然而，在此之前，王室从来沒有利用过。亨利四世企图把这些土地并入国庫，开发它們的資源，他圈圍它們，停止在那里濫伐树木和燒炭的行为，禁止沒有执照而在那里漁猎，并且以出租磨坊基地等等，来使它們成为政府收入的一种来源。这些措施所引起的反对是很激烈的，因为这行动違反了一切傳統。过去几百年中，森林曾是穷人的住所。可是，自由农民阶層，从这些新办法所遭受的損害不象封建主和僧侶——主教少些——所遭受的那么多，因为后者曾侵占公家土地。所以，从这些"特殊利益"阶層所发出的抗議，比从民間来的抗議多得多。亨利四世的政策包含着某种近代性的气息。他的政策至少有些象罗斯福的政策，后者曾努力停止矿业和石油公司和經营畜牧場主开发

爵，不如說是一个富裕业主，他使用租戶的劳动力来耕种他祖傳的田亩。他的生活是簡陋的，而他的活动是屬于乡村性的。他以他的阶級而驕傲，但并不穿貴族服装。薩克逊貴族憎恶亨利四世，因他要采行新式的封建法律和封建制度，如象領主和附庸間关系的硬性規定，相續稅——繼承采邑的遺产稅——新的司法程序、新的賦稅种类以及国王对森林禁令的扩充。他們是剛直的保守者，而农民和他們也有同感。他們以最粗暴的薩克逊法律自豪，憎恨那要剷除古老的血統复仇制的努力，反对"上帝和平"；他們拘泥于法律屬人主义的旧法观念以及他們的旧风俗，恪守薩克逊社会的等級差別，可是同时在阶級內部有民主；他們嫌恶任何种类的外人——斯瓦比亚人、巴伐利亚人、佛萊銘人等等——而且，他們仇恨亨利四世的"帝国官員"，因为这些官員既是出身微賤，又是外地人。自由农民的憤恨，主要是由于亨利四世的圈圍大荒地所引起的。

美国西部的政府土地的行动。我們現代的“男爵”是商业和工业巨头；在封建德意志，他們是貴族、主教和住持，也是大土地业主，有扩充他們地产的野心。“我們知道貴族的怨言和薩克遜农民的怨言以及薩克遜种族要求独立的果断精神，是糾纏在一起的。”

正是屬于这一富裕的、有勢力的而又貪婪的阶級的人們，趁着亨利四世幼年未执政的長久时期，使自己发了財；而格列高里在他和亨利四世的冲突里，千方百計地想取得他們的支持。教皇有些惶恐地看到：国王受到市民和平民的爱戴，同时大住持和大貴族憎恨他的又廉洁又有效能的整个行政綱領。他成功地遏阻了王室官吏的勒索行为，他曾使他的公爵、伯爵、軍事长官（边境上的守备軍官和知事）以及貪得无厭的辯护士或宗教基金的保管人对他們自己的行为負責。他改革了司法，改組了賦稅制度以及限制或取締了几种最恶劣的封建慣例。这一切改革、追还、强制賠偿制，激起了犯罪者的狂怒，而教皇正是向这一个有勢力而又有野心的阶層呼吁求助。

地理上的地方性和由授爵权战爭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分裂与矛盾，在德意志造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跡，并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民族精神和它的物質条件。所有日耳曼生活中的要素，象在一間沸騰的实驗室里那样，在斗爭的火焰中都已融解，并按新的比例化合而成了一个新的混合物。政府更动了，社会結构改变了，不习慣的社会和經济情况出現了。从物質方面看，德意志几乎已陷入破产状态。全国已被各党派扫得空无所有。王室庄园、教会和貴族的土地、农民的田庄都再三被蹂躪。盜賊横行。早在1078年，薩克遜与其說象一塊人住的地方，倒不如說象一片荒野为妥。主教班堡·鲁伯特在1093和1095年之間說过，在薩克遜有大片土地寂无人烟。敌对双方及一切派系都以占夺王室土地、教会土地、貴族土地，并把它們分贈出去来收买自己手下的人。地方情感和集团利

益的魔掌紧握着国家的命脉。城堡开始在一切山头上竪立起来。瓦特堡在1030年初次被提及。波克海姆的城堡在1105年出現。十二世紀的一个作家說道，城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現，象在十一世紀的教会那样。在这些堡壘中很多是强盜窠。

的确，薩利安王朝从这反对教廷和懲罰反叛封建貴族的斗爭里，赢得了胜利，并使德意志又一次恢复了和平秩序。但是，在十二世紀中期，霍亨斯陶芬起来統治的德意志，是一个变了样的德意志。十一世紀，正是薩克遜德意志从畜牧业和物物交换制过渡到一个更加安定的农业制度和一个覚醒起来的貿易的时期。教皇和皇帝間的战爭，給了薩克遜这么严重的打击；它开荒的質朴状态与单純的社会結构都已改变了。薩克遜按照法兰哥尼亚、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的式样，变为封建化了。結果是：有刻苦耐劳精神的人們向东"流散"到新地方去，讓那些替代了薩克遜自由农的教会和貴族的大庄园由佛萊銘和荷兰殖民来更細密地从事耕种。这批殖民在"低地国"的硬土地上原本习慣于深耕的。他們是由獅子亨利和霍耳斯敦·阿多夫移往薩克遜的。

第十二章　十字軍前的法国
(877—1095年)*

法国喀罗林帝国衰亡以后，到处还遺留着它的行政、社会和經济制度的遺跡；就在这廢墟上，那些强暴而有势力的地主貴族，使用武力、篡夺和詐騙的方法，逐漸建立起完全屬于封建类型的新的政体、新的社会状态、新的經济制度，这是合乎时势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第十世紀开端，法国瀕于混乱局面。在查理曼帝国領土范圍內，再也沒有一个国家象法国那样接近瓦解。喀罗林朝末代帝王已成为无力而庄严的幻影，力图苟延殘喘，在有势力而粗暴的貴族面前，仅居于有名无实的統治地位；这批貴族已到处建立了地方王朝政权。法王在110年时期的有名无实的統治之后（从877年禿头查理逝世到987年查理五世逝世为止），終被休·卡佩族接替，因为在一个只容忍大領主存在的封建国家里，他們既沒有土地来統治，也沒有土地来分封。

关于封建法国的历史，我們必須从它的大省分的历史，甚至从它的小領主的历史里来找寻。法国的政治地理原来沒有象一个蜂巢般的对称形态，可是它的結构倒是有些象一个蜂巢那样；因为它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州，大多独自过着和邻人不同而又分隔的生活的。人民的整个政治、經济和社会生活在这些封建蜂房里并通过它們起着作用。到处流行着封建的和庄园的双重統治制度。封建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69頁。

国家經过分裂再分裂后，成为一大批間隔地区，而居住在那里的人們不是統治者，便是被統治者。

在这些紊乱状态之下，法国的文化情况在第十世紀退到衰落的最低程度。布勒塔尼和加斯科尼已濒于野蛮状态。这是一个粗魯、艰难而又好战的时代。据說，柏立((Berry)省的名字，是从那意指“荒地”(beria)的一个古詞得来的。除了这些隔絕状况和貴族經常私斗的灾禍以外，还有就是：道路不良(因为古代罗馬的公路已經毁坏，很少修理，而有很少建筑新路)、各地对外来人的怀疑甚至敌对，以及流行种类繁多的語言和方言。甚至在十二世紀中，圣伯尔納德对語言上的不便还发出怨言。

这种地方分裂的情况，还由于种族成分的复杂而大大地加劇了。布勒塔尼差不多純粹是由凱尔特人居住的。海峽沿岸是由北欧人占領的，然而，他們因为在与当地血族和当地制度同化方面有特殊能力，很快就成为法国人了。在法兰德斯，有两个当地的种族：日耳曼血統的佛来銘人以及瓦倫人；后者在血統方面，和佛来銘人虽然沒有多大的不同，但在語言方面是屬于罗馬語系。加斯科尼的居民，主要是巴斯克人；南法和罗尼河流域的居民，基本上屬于强壮的罗馬血統，夹杂着日耳曼血統，即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塞普替美尼亚的本地人口是哥特人，稍微夹着一些外来血緣。在第十世紀中，法国人口中血統最純粹的是在塞納河盆地——法兰西公爵領即法兰西島。这塊領土位于从奥尔良到波未一条直綫和从理姆到沙脫尔一条横綫的交叉点上，恰在王国的中央；而它的中心便是巴黎城。这一切自然地形和文化与历史条件，都有助于使法兰西島成为封建法国的核心，并成为一个偉大民族王国的首都。

但还有比上述各种地方分歧更广更深的分歧，就是那区別整个北方和整个南方的文化上特出的二元性。罗亚尔河构成了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分界綫，这一条界綫，甚至在十三世紀当法王已征服

了南方各省,破坏了它的文化,消灭了它的政治独立地位，因而南法的破碎地区已可被北方政府同化的时候,还是沒有完全被抹去。

在第十世紀,法兰西島的这种同国家的其余部分隔离的状态,通过下列两种新势力的活动，具有了一种有力的新焦点地位。一种力量,是卡佩王朝崛起于巴黎；另一种力量,是理姆的宗教和文化的优势。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格伯特有理由把理姆說成是“法兰克王国的首府”。塞納河和瑪恩河流域的主教区：巴黎、盧昂、沙脫尔、松斯、波未、瑯城、夏龙、奥东、奥舍耳、甚至里昂和布尔日,在整个混乱时期中,仍然象蜜蜂般地紧密地依附理姆,把它看作法国教会的母亲和头脑。在这样情况下，法国公爵領和从那里出現的王朝,享有双重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文化上,法兰西島是所有那些破碎、分裂、散漫省分中的最健全而又最有力量的地区;而这些省分集合在一起的空泛关系总起来說,就是第十世紀的法兰西“王国”。

上述隔离状态由于环繞这区域的自然条件而加剧起来。封建冲突的混乱局势和北欧人的侵犯，实际上曾使这公爵領在北方和西方被一片荒蕪地带环繞着。彭替安、安如、下布勒塔尼、拉·馬士都是荒凉的，以至几乎渺无人烟。在頹廢的寺院和城堡的断垣裂縫里,荆棘丛生,村庄已不可复見。那些受惊和破产的居民，紛紛逃到中心地区,以求安全,逃入了塞納河的盆地，在那里还可找到一些安全,还有公爵、住持或主教来維持一些法律和秩序，虽然可能是粗暴的——佛罗杜尔德的《編年史》里常常提到理姆大主教的民兵。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法兰西島因它的邻省的遭难而获得了利益,从而在物質和精神生活方面,能够显出活跃的力量。甚至早在第十世紀中,我們已可看到关于法兰西島、香宾和勃艮第范圍内的物質繁荣的資料。当时,巴黎还局限于島上,在富饒和人口方面都比不上瑯城和康边;可是我們已看到它被說成是“紐斯的里

亚和勃艮第王国的头和口”①。未来香宾大市集的輪廓，可在夏龙看得出来；麦郎在巴黎上面的塞納河弯曲处，是一个內河港，扼守着香宾-布里和罗亚尔河之間横渡塞納河的渡口；弗勒里和費里厄寺院的船只，当然还有許多别的寺院的船只，往还于河流之上；弗勒里寺院甚至有羊群，那在森林茂密豺狼众多的时代是一种稀有的财产；葡萄种植几乎到处都在进行；在平安的寺院周圍集結着农业劳动者的村庄，在有些寺院里，尤其是在圣里奎尔寺院里，象織布、硝皮、制木器和制肥皂这类工业技术已是这样大規模地进行着，以致手艺人在寺院的周圍集成了街区。

在一个普遍从事农业的时代，法兰西島公爵領、香宾和勃艮第在和王国的其余部分对照之下，是比較繁荣的，只有諾曼底可作为例外。塞納河和瑪恩河流域，那时和現在一样，是欧洲一个最丰富的产麦区；厄坦普周圍的地区是一个完善的谷倉；勃艮第和香宾富于葡萄园和牲畜；除了从洛林輸入盐鉄以外，这三个毗連的省分几乎是自給自足的。教会所需要的、富人所渴望的少数利凡得商品是通过阿尔卑斯山路，主要經过日內瓦或里昂运入的。那插入諾曼底和法兰德斯之間的小港口，即海濱蒙特里伊尔港，是通海峽的出路，也是卡佩王朝唯一的海口。在萊茵河湾近烏得勒支的杜尔斯特德被北欧人破坏以后，幷在盧昂复兴之前，蒙特里伊尔在第十世紀中是北方沿岸的最重要的商业据点。它的商业規模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和英国的商业，而它的港口收稅很重（因为有很多运輸船只发出了怨言）②。

必須指出：在从謬司河延伸到罗亚尔河幷由塞納河和瑪恩河所灌溉的領土內，就是，法兰西島、勃艮第和香宾这一范圍內，第十世紀的生活狀况比法国别的地方要好过得多。的确，封建貴族的

① caput et introitus regnorum Neustriae et Burqundiae.

② eo quod ex navium advectationibus inde plures questus proveniant.

斗爭和家族的冲突是数見不鮮的，但是它們所发生的影响，不象我們所設想的那样大，是只限于一塊地方的。991年时，黎舍尔曾經长途旅行，从理姆到沙脫尔，只有一个童子伴随着，他所遭遇的沒有什么比不良的道路、破坏了的桥梁和簡陋的旅舍更坏的事情了。

諾曼底公爵在他們的領地內，早曾建立有力量而又有效能的政府。这些侵入者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接受了基督教和封建法国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在两个世代的时期之內，北欧人变成为諾曼-法兰西人了。洛尔夫給外来的移民开放了他公爵領的大門，使人烟稀少的地方重住滿了人。大批破产的自由人、被第九和第十世紀早期的混乱逼得离乡背井的难民以及逃亡的农奴都紛紛投奔海峽沿岸的公爵領內，那可証明"諾曼和平"的效能了。当时在諾曼底，法律就是公爵的法律，附庸們不得横行无阻，而私爭也是被严厉地取締的。

在十字軍之前，封建法国与地中海一带断絕了貿易，而它同日耳曼和意大利的联系也很少。但是，它和外界有一項注定要有巨大經济重要性的接触，虽然很少历史家曾注意到这事件的政治意义以外的意义。这就是諾曼人的征服英格兰，因此，英格兰被拖出"它的独立地位而和大陆国家取得了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事件发生前的百年，978年时，厄特尔勒德二世对来自科倫的日耳曼商人居留地以及来自盧昂的商人居留地都曾賜給貿易特权；后来，懺悔者愛德华还扩大了盧昂人居留地的特权，以倫敦丹尼门附近一塊地方，賜給他們，专作儲貨之用。

大批商人，主要是佛来銘人和諾曼人，跟着威廉的胜利軍队渡海登陆，定居于英吉利海峽各港口和倫敦。有一个近代作家把征服者威廉描写成"一个为征服英国而組織的巨大股份公司的总經理"。一本編年史上說，"有些人是为土地而来，有些人是为金錢而来。""那个时候，在英国的城乡市集上，可看到法国商人和商品。"

威廉敏銳地意識到貿易的价值；这种貿易曾使他的諾曼祖先出名，并使“外侵团”成为海盜兼商人。英国的征服在全部諾曼底，也在全部海峽各省刺激了商业。盧昂的“資产阶級”成为一种力量。关于貨币經济和活跃的汇兌，有着种种資料遺留下来。在渡海之前已經开始建造和配备船队的工作，把成百成千手艺人吸引到諾曼底，其中很多人一定是自由手艺人；大批冒險者和要发横財的兵士（他們作战不是由于封建服务的需要而是由于雇佣的关系）获得了大量必要的現款。諾曼底的財富不久便为安如、法兰西島、毕加第、法兰德斯邻近各省所嫉妬。随着横跨海峽的貿易的大量增加，海峽两岸的盎格魯-諾曼統治者的收入也扩大起来。那些来自巴黎、毕加第、奧尔良、沙特累因和波亚图的貿易，都是通过盧昂的（虽然很多波特芬貿易經过拉·洛瑟尔出口）。但是，盧昂不能处理这一切新的运輸，所以在諾曼海岸，仅仅是漁村也发展成为新的海峽市鎮，那是我們所看到的一种有趣味的現象。其中最著名的是第厄普，威廉在 1067 年回到大陆时，曾在那里登陆。这城市是由于和英国通商而建立起来的。其他的例子是彭特-奧德麦、厄塔普尔、索謨河畔的圣瓦勒里。甚至象科德柏克（圣汪列尔寺院的旧港）一类的內河港口，也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沿英国南部海岸也可看到同样的发展情况。“五港”①、溫契尔西和扫桑普敦成为热鬧的港口。在扫桑普敦和盧昂之間的葡萄酒貿易早已打下了基础。

通过亨利二世（1152年）和亚奎丹·埃利安諾尔的結婚而获得了法国省区之后，英法商业史上揭开了更大的一章。那个时候，控制泰晤士河、恒伯河和塞汶河的河口的国王，就是控制塞納河、罗亚尔河、格罗內河和阿杜尔河口的国王。大量貿易管理章程表明，

① “五港”(Cinque ports)指多維、散德維区、洛謨尼、哈斯丁斯和亥司；因为它們的位置是在英国最接近欧洲大陆的部分，所以在很早时期它們已被称为“王国中五个最重要的港口”。——譯者

甚至早在十一世紀，扫桑普敦已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在它的进口貨表上法国葡萄酒已占极其显著的地位。普里穆斯原来被称为"骯髒地点，漁民的住所，"而在十二世紀里，已成为西南英格兰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了。我們知道，盧昂在这两方面的商业，是多么繁盛，"商人的帳册上沒有一頁不是写得滿滿的，商人象諾曼底的領主一样地有势力。"这是亨利二世时代的情况。当时，法国的主要出口品，是葡萄酒和明角石磨石；它的大宗进口物，是皮革、鉛、鉄、錫和羊毛。盧昂和都柏林間商业上的密切关系，使人有趣地忆及往昔"外侵团"时期的情况。实际上，所有爱尔兰的出口貿易：貂皮、筐籃、著名的爱尔兰猛犬、咸鮭魚，都是經过盧昂的。諾曼底西部的岡城在采石和輸出造屋石方面，享有特殊有利的貿易。那里的采石場是出名的，使很多有技术的自由工人获得了职业。所有用于建造"战役紀念寺院"的石头(这寺院是1066年由征服者威廉建造在战場上的)，都是用船下行奥綸河渡海峽达哈斯丁斯，从那里再轉运到內地去。岡城的大量石头也运往法国的其他各省去，因为当十一世紀宗教热忱的浪潮正在横扫欧洲的时候，大批教会的建造工程极需要这种石头；在这种建筑的高峯上，起初兴建了罗馬式的教会，而后来还兴建了精致的哥特式教会；迄今我們还可在北法和英国南部看到这种壮丽的建筑物。

海峽两岸港口的大宗貿易品是魚类，包括干魚、熏魚和咸魚。第厄普有一个"养魚池"，屬一个住持所有(这事实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而在同一城里青魚是以盐醃的。在附近城市有醃魚場；第厄普、彭特-奥德麦和菲坎普各城是以醃青魚場聞名的。在十二世紀后半期，盧昂出口的魚是：海豚、鱘魚、海鰻、鯖、緋鯢、鰹、鰈，最多的是青魚。后一类魚是諾曼底工业中的主要原料，也是在海峽及在别处的商业中的主要商品。捕魚和醃魚业是盧昂最重要的地方实业。盧昂还以硝皮业出名。有大批諾曼寺院，位于海峽港口地

区；僧侶們一定是对捕魚和醃魚业很感兴趣的。研究寺院位置的結果，揭露出寺院在海岸附近多于在內地这一事实。在塞納河口，不滿五十哩的距离內，寺院多至十七所；在布勒塔尼极西端和俄斯坦德之間的海峽沿岸，有五十多所寺院。

醃魚用的盐所占的重要地位，与寺院也是有相当关系的。寺院进款的一部分，是用盐和魚来繳付的。亨利二世接受用青魚、鯖及其他魚类所繳的稅款，并以此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北法用的盐大部分是从下列各地的盐井运来的：第厄普、阿夫勒、翁夫勒、罗尔、科德哥特、土克、奥达尔、奥舍尔和瓦拉維尔。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和通达盧昂的大小商路連接着的。諾曼領主經常把这些盐井看作他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盧昂商人是以盐来繳付塞納河上的通行稅的。

諾曼貴族在海峽两岸所占有的地产，設在英国境內的大批法国寺院（所謂外来的修道院），貴族和主教的时常往返，朝圣队的此往彼来，英国人往罗馬城或康波斯提拉去，法国人和佛来銘人往格拉斯吞柏立寺院去（这寺院在圣托馬斯·阿·柏剋特墓沒有出名以前，是英国的最受尊敬的神殿）；这一切对于貿易都起了促进作用，并使金錢在海峽两岸之間无阻碍地流通着。下列两事，可資証明：1114年，瑯城大禮拜堂的某些修道士，为要募款修建他們的教会，渡海旅行，“因为英国又富又繁荣。”他們在威桑搭船，在船上碰到几个佛来銘商人出国去采購英国羊毛。在英王約翰时代，有一个諾曼人，叫做布里奥茲·威廉，“管理着一个大型商业机关，它的分店散布在英国、爱尔兰和諾曼底……他的小船从法国各地下行罗亚尔河，而他的大船往来于英国和諾曼各港口之間”。

在英国，佛来銘人几乎和諾曼人一样地多。其中很多人是在1066年跟着威廉的軍队去的。威廉的王后是法兰德斯·瑪的尔达；这一事实也許可部分地說明他們人数所以多的原因，但是更加有

力的影响是貿易。在征服英国之后不久，佛来銘沿海岸的一次大水灾驅逐了大批居民往英国去避难。法里西安人的古老織羊毛业在第九世紀北欧人侵犯时期，看来差不多已被破坏，而現在，法兰德斯接替了法里西亚的織布业。原来，这批难民定居于林肯郡，但是由于民众的坚决反对，亨利一世把他們的居留地向下迁移到威尔士边境上的彭布魯克郡去。然而，英国和法兰德斯間的这項經济联系还是經常保持的。

在十二世紀早期，法国息斯脫西安教派出現于英国。在这时期，英国最肥沃的耕地久已被两个古老的寺院团，即本尼狄克派和克里尼派所占去。他們所可以获得的土地，只有在諾森伯兰的一片广闊荒蕪地带內，就是，由“征服者”的殘暴“掠夺”所破坏的廢墟。息斯脫西安教派就来到这里，幷不是十分不愿意的，因为他們的教規命令他們要在人跡罕至的地方找寻居留地。在他們从事养羊以代替耕种之后，塞吐① 的僧侶們馬上发現了：灾难是象隐藏在蟾蜍头里的珍珠一样。不久，这地方羊群密布，滿地雪白；羊毛之对息斯脫西安教派，正象牲口、谷物和葡萄酒之对古老寺院那样。但是，英国当时只是出产羊毛原料。为了織成毛布，必須把羊毛打捆运过海峽到根特、伊伯尔、喀姆布萊及其他佛来銘城市去，这些城市到了十二世紀末期，都是欧洲著名的織造业中心。我們早已窺見一些关于英国和法兰德斯間这項羊毛貿易的重要性。因为在英国的长期內战时期(这內战在1135年后曾使英国分裂)，即在布腊的史梯芬和金雀花朝亨利爭夺王位的时期，史梯芬的拥有东部各州，使他能够控制这項跨海的羊毛貿易，幷使他获得了經費的供应。这还可部分地說明他为什么在英国使用了佛来銘雇佣兵。

在第十世紀，由于封建的混乱局面，西法的全部省分，从布勒

① 塞吐(Citeaux)是息斯脫西安教派的創立人。——譯者

塔尼到加斯科尼，都是情况恶劣。在布勒塔尼，关于經济生活复兴的最早象征，出現于阿郎·巴布-多尔特时代（938—952年）。《南特編年史》里指出，在第十世紀中期，南特还保持着它同爱尔兰和西班牙貿易的旧关系。沿海貿易还由那些往康波斯提拉去的朝圣者所进行的交易补充着；这些人是在南特搭船的。罗亚尔河口和吉倫特河之間的整个海岸，是一片沼泽地，直到十二世紀，才有人在那里垦荒。在北欧人侵犯、封建战爭和寺院土地强制“还俗化”的时期，基恩和加斯科尼存在着野蛮状态，直到十一世紀为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上帝休战”最早出現于利穆威省。1004年，当弗勒里的阿波恩参观卡塞伊尔（即虔誠者路易的出生地，在拉·利奥尔附近）的时候，他看到它是一片荒凉。

总的来說，法国南部，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在制度发展和文化方面，比法国北部落后一个世紀。法国地中海沿岸各省和意大利的全部西岸一起遭受了薩拉森海盗的蹂躪与实际占領，与北欧遭受諾曼人和东欧遭受馬扎兒人的破坏同样严重。穆罕默德教侵入者終于被逐出，而諾曼人和馬扎兒人皈依基督教并且加入了日耳曼-拉丁欧洲的国家里；这一事实曾使我們遺忘在第九和第十世紀他們侵犯的兇恶性質。810年，薩拉森人立脚于科西嘉和撒地尼亚。820年，他們蹂躪从尼斯到土倫的里維耶拉地区。到842年，他們穿过布奇杜倫进而劫掠了阿尔茲。有一个穆罕默德教徒軍营在若干年內駐在下罗尼河的伊得卡馬克，从那里它威胁着阿尔兹、奥倫治、亚威农、尼姆。幸而，这些城市原来是罗馬所特别注意的城市，因而它們富于罗馬遺跡、城墻、引水道、拱門，从这些廢墟里容易取得石头来建造城垣。这样一来，它們不久便能够捍卫自己，象北欧城市为防御諾曼人所做的那样。但是，馬賽似乎沒有能够及时地这样做。虽然也許沒有被薩拉森人长久占領，象芬提格里亚、尼斯、海耶耳、弗勒查斯、土倫那样，然而馬賽已經破坏不堪，并和水

陆交通隔絕，所以，它繼續留在湮沒无聞的地位，直到十字軍东征时期才成为地中海沿岸的大港。

在第九世紀后半期，布罗温斯历史上的黑暗状态，由于魯息雍的杰腊德和阿尔兹的罗兰的半历史性、半故事性的功績，而被部分地消除了；其中一人，在阿尔兹附近的“大山”上，打敗了薩拉森人，另一人，在卡馬克肃清了他們，并在那里建造了堡壘来保卫下罗尼河。穆罕默德教徒的兇猛侵略，可能是促成879年組織波索的勃艮第“王国”的一个因素；如果历史对波索象对魯息雍的杰腊德那样有詳細的記載，那么关于他，我們就可以比現在知道的更多更透徹。波索的死在888年，正是穆罕默德教徒侵入布罗温斯的最兇狠的扩展时期，不是沒有意义的。在那一年，他們的占領弗累克塞納特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布罗温斯統治的开端，这統治繼續到972年为止；在这时期，他們的侵襲向北推进，远达格勒諾布尔。他們只由于格勒諾布尔和西斯特倫的两位主教的英勇抵抗，才被阻擋住，而这两位主教还获得了下列人員的支援：布罗温斯的威廉伯爵及他的弟兄拉特波尔德、卡斯特兰的邦尼非斯伯爵和格里馬第的吉巴林伯爵，后者的家族迄今还存留在里維耶拉地区。看来很使人惊奇，薩拉森人在好多年內占据了从地中海到日內瓦湖的每一条阿尔卑斯山路。他們甚至横越阿尔卑斯山，洗劫了皮德蒙特意大利的城市。苏薩薩流域变成了一片荒地。原来，商人和朝圣者从北欧越阿尔卑斯山而达意大利；这时这条交通路綫已告中断，情况严重，以致所有的旅行都須轉到日耳曼山路去。我們从奧热丹麦人的故事，可領会到薩拉森人的恐怖行为。故事告訴我們說：他怎样成为摩赫寺院的一个修道僧，并把他的战馬交給寺院的石匠用作馱馬；薩拉森人怎样来圍攻摩赫；他怎样挺身而出，領导群众来抵抗他們；他所乘的每一匹馬怎样在他的巨大重量之下，不支倒下，直到把他的老战馬牽来給他，以及他怎样終于冲散了薩拉森人。

最后，972年，弗累克塞納特的薩拉森人的巨型砲壘被攻克，而里維耶拉地区摆脫了穆罕默德教徒的占領，虽然地中海还是在他們手里。接着，在布罗温斯全境发生了在中世紀移民史上一个最有趣味的运动。那些逃亡到山区去的殘留下来的本地人逐漸下山，回到故乡，开始在荒地上进行那艰苦的复兴农业工作，他們連那里的山和水的名字，都已忘掉。其时，当地貴族擅自占取了大片的領地，作为他們奋勇抗敌的代价，往往毫不顧及过去所有人的权利；他們招募外地人移入。这样一来，以前为下布罗温斯几乎不知道的封建制度，現在就建立起来了。于是，地主貴族和地主僧侶、主教和住持在以前是自由小土地占有制流行的地方，在庄园制度还沒有根深蒂固的地方，撒下他們的罗网。直到今天，布罗温斯的农民还时常用犁头或尖鋤掘出薩拉森人精制的磚瓦片，而且在居民的面貌上、在房屋的建筑式样上、在地方甚至教会的节日上，还可看得出当年薩拉森人占領的痕跡。

从上面看来，在第十和十一世紀里，法国的經济图景象一件拚湊补綴的棉衣，里面每一省是一方分隔的塊子。一省和一省的情况，都是不相同的。

可是，第九世紀法兰克帝国的灭亡到十一世紀末期(就是，随着十字軍的开始，新日子的曙光出現于欧洲的时期)这两百年的时期中，法国的物質进展不是不大的。物質生活情况和社会經济惯例編成为法律了，这些法律在我們看来虽屬粗魯并带有野蛮性，但对第九世紀和十世紀早期所存在的混乱状态来說，必須認为这是个前进步驟，并且应該看到証明其进步的例子很多而且是多种多样的。我們可看到一項較之其他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农业繁荣的指标。在封建时代，葡萄种植和酿造葡萄酒傳遍法国的大部地区这一事实，也許就是它經济发展的最明显的証据。葡萄象橄欖一样，需要多年的培植，需要精細适当的經营和防止战爭的破坏；它是一

个相当重要的文明的指标。葡萄对中世紀一切阶級的人来說，連最低下阶層的人在內，是飲料，也是食品。北欧人和馬扎兒人很快地学会愛飲葡萄酒和种植葡萄园。885年，公爵哥得弗立德，即法里斯兰的征服者要求查理胖子应把科不林士、安得那赫、辛西格以及在下莱茵区的其他国庫庄园讓給他，“因为那里盛产葡萄，而法里西亚的地方不会产生用以制酒的葡萄。”有人反对說，葡萄不得認为是測驗进步的适当尺度，因为它要依靠某种气候和土壤的条件。这項反对的意見，只在很有限的范圍內才是正确的，因为中世紀的人們不懂得葡萄的性質所以毫无顧虑地到处种植葡萄。而且，在高度封建时期的社会隔离状态里，一个人必須种植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又因为每个人需要葡萄酒，而教会还必須有它，所以在法国和日耳曼，种植葡萄的地方比今天还多。在第六世紀，圣本尼狄克可能劝慰那些由于当地土質而不能获得葡萄酒的僧侣們說，“祈禱上帝，不要埋怨，”可是不久，僧侣們就不复讓什么当地的土质来干涉他們的行动了。

在法国，正象在日耳曼一样，种植葡萄园傳布到各种不适宜的地方去；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缺少商业和普遍隔离的状况的結果。在第九世紀后期，尤其是在第十世紀的社会不安定的局势下，貴族很不愿意把葡萄酒运出他們的領地，并采取了强硬措施来禁止运出葡萄酒。因此，葡萄园出現于象諾曼底、布勒塔尼和毕加第那样不适宜的地方上。巴黎周圍种植着一些葡萄，因为圣泽門·得斯·普勒斯寺院所征收的部分地租(在800和826年之間)是用葡萄酒繳付的，可是在这寺院的土地上的葡萄园是例外。

然而，到十一世紀中期，隔离状态大部已告破裂，商人可平安地来往于各省之間，而貴族停止窖藏他們的葡萄酒，开始在这項貿易上謀取利潤。一旦良好葡萄酒在市面上流轉以后，北方的这些葡萄园大部就荒廢了。可是，这时，在条件较优的地方上仍有很多

葡萄园，它們繼續繁荣着。在第十世紀波尔多以北的地方，現在叫做美多克，开始了它的葡萄生产的著名历史。900年，基云好人波尔多伯爵，以布朗克福附近圣喜拉尔教会的土地和葡萄园贈給圣克拉·得·波尔多寺院。在十一世紀早期，据紀載，还有其他贈与，而古文献也証明在英国統治的整个时期，在那个地区的很多寺院里有葡萄园。977年的圣利奥尔的“习惯法”提供了关于种植葡萄的詳細情形、关于种植葡萄的指示以及关于繳給住持的实物租。980年时，在扎斯，982年时在拉·利奥尔，各有一个葡萄酒市場。

葡萄酒，在法国和在日耳曼一样，成为一种主要的消費品，甚至在下層群众間也是习惯的飲料。船主們必須供給他們的水手葡萄酒。田地劳动者常常領取若干数量的葡萄酒，作为他們工資的一部分。在第十、十一和十二世紀，香宾、勃艮第、摩塞耳和莱茵地区的編年史里，常常提及葡萄园和葡萄酒，那表明了对葡萄种植的重視。理姆的佛罗杜尔德写道，“就在这一年(976年)，七个德那[1]可購买一摩第[2]葡萄酒……就在这一年(977年)，葡萄酒的产量如此丰富，所以卖者出售每一摩第葡萄酒只能从买者收取五个、四个或三个德那了。”[3]再也沒有别的丰收象葡萄丰收那样受到如此欢欣地庆祝。葡萄的荒年或者甚至收成縮減是一个灾难。葡萄是人們乐于生产的东西，并且經常支配着国內或国外市場。而且，由于河流网的分布和船舶在河上的往返航运，运輸葡萄酒也很容易。

十一世紀在諾曼人征服亚浦利亚和西西里(1016—1090年)之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葡萄酒輸入了法国。高盧葡萄酒輸送到东

① 德那(denariis)是古代銀币，也可譯作便士。——譯者

② 摩第(modius)是古代量器，約合英国的两加侖。——譯者

③ “Ipso anno (976) septem denariis emebatur vini modius… Ipso anno (977) magna fuit copia vini in tantum ut non amplius pro uno vini modio venditores nisi aut quinque aut quatuor seu tres denarios ab emptoribus accipiebant”.

方去。热那亚人把希腊和西班牙葡萄酒运到作为分发中心的法兰德斯；他們是那些轉运南法葡萄酒到那里的許多代理商中的一部分。波尔多商人經由海道运送他們的葡萄酒到法兰德斯和日耳曼去。事实上葡萄酒是法国輸入法兰德斯的主要商品。据說，阿努尔和罗多尔弗斯弟兄，在巴坡謨城堡，以拦劫那些往阿拉斯去的酒商而变为富翁。

然而，法国葡萄酒最重要的是輸往英国。的确，那运到法兰德斯的大量葡萄酒，是轉运到英国去，因为佛来銘人和法里西亚人都是这項貿易的大中間商。盧昂也同倫敦保持着經常的商业关系，以勃艮第和法兰西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商品。在1152年后，大量葡萄酒从法国西南各省，經由波尔多港，直接运到英国去。英王賜給法国商人特权；直到亨利二世时代，才賜給日耳曼商人和法国人平等的巨大貿易特权。

法国葡萄酒的另一市場，是在斯堪的那維亚国家里。在第九世紀，严格說来，这項輸出不能算作貿易——它所采取的形式可以說是繳納战利品和战爭賠款，其中葡萄酒向来是一个主要項目。但在这个时代以后，就有某种数量的交易，即以北方的毛皮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而在十一和十二世紀，它变成了一种兴盛的貿易。

环繞着葡萄酒商业，形成了一种賦稅、通行稅和捐款的复杂制度。关于葡萄酒生产所征的捐稅如下：一定的“地租”，即实物稅，是交給領主的：这种稅叫做“葡萄稅”或“葡萄园稅”。“劳役”是农奴每年在領主的土地上(在这場合，就是在葡萄园里)做若干天的工作。“酿酒稅”是迫使領主土地上所有的居民使用領主的酿酒机和量器；这种稅是以实物繳付的。“葡萄酒稅”是由領主土地上的一切酒店主或其他售酒商人付給領主的一种稅。領主保有“禁售”的特权；就是，当他們的葡萄酒已經准备好的时候，他們可以禁止任何别人在他們領地上售酒一个月。然而，由于这項专利而可抬

高的价格，比别人的酒，不得超过每甏两便士。領主有一个总管替他照管所有这些权利和捐税；总管不領工資，但分享利潤。这种方法也可能导致相当大的舞弊和压迫。

領主特別提倡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設市場，从而获得大利。他們可从来往于市場的商人征税，并从出售的葡萄酒征收一种“市場税”（每桶約六便士）。大量捐税加在葡萄酒的运輸上。国王所有的古老的“捕获”权，是港口、市集和市場通行税的根据。这权利原在捕获葡萄酒的形式下保持着，但后来逐漸改变为規定的数量或現款支付。在路上和桥头，还征收通行税。“車輪税”是对进出巴黎的葡萄酒所征的税，每車两便士。在巴黎，还有一种面包和葡萄酒税，每隔三年課征一次——每出售一大桶，征收一便士，不論批发和零售。塞納河上和瑪恩河上“运酒税”是对每船葡萄酒征四鎊的税。法王在葡萄收获时期，对每船葡萄酒有权征收六十个苏①直到路易六世时代为止；他在1121年以这权利賜給巴黎商人公会作为一种永久的特权。

巴黎有一种古怪的风俗（也許当时酒肆主并不認为是古怪的），就是雇佣葡萄酒叫卖人的风俗。这批人組成了公会；每个酒肆主至少必須雇佣公会中的一个人来叫卖他的酒。他們打着皮鼓走来走去，給路人看葡萄酒的样品并喊出它的价格。

① 苏（Sou）是古代法国的銅币。——譯者

第十三章　十字軍前的意大利
(887—1095年)*

第九世紀中意大利和法国与日耳曼相同，已成为一个地理名詞。半島已分裂为大批封建公侯国，它們經常从事战爭。

王室呈現了破坏性最大的浪費景象。敌对的国王不仅把土地和官职分封出去，而且把今天我們所称的"公共财产"范圍內的几乎全部东西——街道、桥梁、广場、公共建筑物、城垣、城門、城塔、砲壘等等——都讓与出去；这批国王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收买支持者或获得經費。891年，貝倫加对維罗那的旧罗馬圓剧場的处理，就是这样。

最健康的政治生活是在城市里，而"城市"这个名詞意味着不仅大城市，并且也包括多斯加納小山上的市鎭和倫巴平原上的大村庄。在意大利，封建制度和庄园制度，除了在某些地方以外，从来沒有获得象在欧洲其他地方那样的势力。总的說，我們可把甚至早在第九世紀的意大利，看作比西欧任何别的国家較少封建化的地区。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性的差别。当意大利封建制度达到高峯的时候，倫巴第遍布着大庄园网，偶然在这里或那里被农村公社冲破。"每一庄园看来是一个自足自給的整体，同时也是各种較小的經济单位——奴隶、半自由人或自由人的保有地——的一个集合体。在这里，一塊保有地中的可耕地带也不是构成一个孤立的整塊地，而大部分是分散于田野中間的。然而，在多斯加納，大庄园以及它們所征的劳役和租款是比較少見的，因为城市市民运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54頁

动的活力已把封建制度压倒。在塞亚那附近，的确有大庄园，但在佛罗倫薩周圍，則土地的占有权已操在城市手里，而农奴已轉化为根据自由契約或租賃关系的农民了。”

意大利的城市精神，比欧洲其他各地，出現較早，而且更有活力。自由人与不自由人的比例在那里高出于阿尔卑斯山之北。下列三种影响有助于这种公社現象的保持：公地的經济影响，倫巴人血統的活力（屬于这血統的阿列曼人是意大利自由农民阶級的祖先）以及后期罗馬帝国遺留下来的制度。在欧洲各地的城市运动初次出現之前好久，意大利社会的公地的存留——必須記牢，公地不仅包括村庄內的“草地”而且包括大量森林、牧場和荒地——以及村民对这公地的管理，已产生了北意大利的农村自治公社。世俗和教会的地主阶級，也不知不覚地助长了这种精神；因为他們对那些願意淸除荒地的垦荒者，給与自由保有地的条件。一般說，他們把一半土地或一半产品給与垦荒者。因此，北意大利比法国、日耳曼或英国，有着更有活力、更多独立性、更自由的农民阶層。这种自己靠自己的精神，还由于城垣所提供的安全感而加强起来。

貴族間的战爭和馬扎兒人的掠夺，曾迫使城市修理它們的古老罗馬城垣或建造新城垣。这样做的城市是：摩德拿、貝加摩、格里摩拿、巴費亚，特别是米兰；对米兰城斯波勒陀的藍伯特曾圍攻八个月而不得逞（896年6月—897年1月）。924年被馬扎兒人焚燒的巴費亚，在下一年就能抵擋住馬扎兒人的又一次圍困。在同一年，摩德拿能从它新建的高城垣上抵抗馬扎兒人，后者破坏了周圍的乡村而去。到第十世紀中期，有一个意大利历史家說过，北意的大部城市是有城垣圍繞着的（确实，还有几个最坚固設防的城市）①。甚至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的难民也避难到这些意大利城市

① oppida vero cum nonnulla cum munitissima.

里。这些普通的市民，早在第十世紀里，已表現出市民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就是說，他們要求波河及其支流上的貿易自由权，在那里，封建主教設立了木栅、鉄鏈和关卡。他們在那些深受大封建主压迫的小附庸以及自由农民中間找到了支持者。1036年，这些集团一起发动了反对大貴族的起义，声势相当大，以致皇帝康拉德为了它們进行干涉。

因为意大利沒有达到象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的高度封建化，所以它的商业和工业也活跃得多。的确，罗馬在几百年中对商业和工业来說是一个死城，但是，威尼西亚、倫巴、利古里亚、南方諸省和西西里，都是商业活跃的地带。至于这种商业优势之所以形成，第一，因为意大利拥有活跃的商船队和海軍力量，尤其是象威尼斯、热那亚、比薩和阿馬斐那样；第二，因为意大利拥有大量資金，这些資金是从意大利的从未完全停滯过的貿易里积累起来的；第三，因为意大利和拜占廷、埃及与叙利亚港口之間的密切而又有利的联系，从那里运入东方的名貴商品；第四，因为在工业方面，它繼承罗馬帝国时代的工业技术遺产和傳統。

意大利半島是地中海的鎖鑰，从希腊时代起这“地中之海”，已是商品的巨大分发站。埃及、腓尼基、希腊、迦太基和罗馬都是由于位在它的沿岸而变为富饒。薩拉森人在好多年中曾控制西部地中海地区，但是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从来沒有被他們封鎖过。因此，威尼斯、拉温那、大兰多、巴利、布林的西以及波河流域的倫巴人城市，經常能够維持和东方的接触。至于意大利西岸的城市，則情况有所不同了。在这里，热那亚、比薩和阿馬斐的商业的发展被堵塞住，直到諾曼人在罗哲尔二世时代(他死于1090年)把在阿拉伯人手下的西西里征服为止。当时，意大利的資本主义較为发达；这一情况，可从下列事实看得出来：意大利是在欧洲反对犹太人經济勢力的第一个国家，而且，在德意志和法国反对犹太人之前

好久，它已这样做了。早在855年时，皇帝罗塞耳一世把意大利的犹太人驅逐出境，其中很多人迁移到法兰克高盧去，在那里，上文說过，他們在虔誠者路易的朝廷上享受恩寵，因而获得了巨大好处。

这里，在談到意大利的区域經济史时，我們必須从威尼斯开始。威尼斯的起源，在于阿奎里亚和巴士亚难民建立的殖民地；他們在第五世紀中为逃避蛮族的侵犯而来到亚得里亚海中的礁湖島上。威尼斯人开始依靠捕魚和煮盐过活，在600年前，他們已从事航海和貿易，起初在亚得里亚海，后来在愛奥尼亚海，不久还冒險到拜占廷各港口和亚历山大港去。象天然运河般的亚得里亚海，位于东西方的中間，又通地中海，弯弯曲曲，使南欧海岸呈現鋸齿状；它就是决定威尼斯历史的最大的单一因素。在亚得里亚海上，从外面深水来的潮水，在海岸和沿达尔馬提亚岸的一长串島屿之間向上流，而后再折向南，沿意大利海岸下流，复注入地中海；这一水流对向外和向内的船只，都是有帮助的。

威尼斯人的商业和航行史上的一个重要点，是他們和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与交易。从剛开始时起，他們已看出从这关系所可汲取的利益。他們曾大胆进行那些有利的冒險企业，而情势也帮助了他們。在狄奥多理时代，卡息奥多拉曾談到威尼斯船的长距离航海。由于缺少历史文献，我們几乎不可能正确断定：威尼斯和拜占廷的商业联系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并怎样建立起来的。威尼斯发展成为利凡得商品輸入地；这一地位，早在715年盧易特普藍同威尼斯和科馬奇奥所签訂的通商条約里，已可看出。这項条約是后来查理曼及其繼承人所訂条約的根据。依照这些条約，威尼斯得在帝国各城市中享有貿易的自由，只須繳付正式批准的通行税。威尼斯由于它在島上的安全地位以及它和拜占廷的密切关系，能够压倒它的竞爭者科馬奇奥，后者衰亡于第九世紀。毫无疑問，威尼

斯和东方貿易的开始，比所知的最早記載还要早，因为屬于第十世紀末期的記載上(992年)說，这是一件久已存在的事情。有一个与查理曼同时代的編年史家說：当皇帝駐在弗利河里的时候，那些从巴費亚来的他的隨从人員，穿着五色繽紛的豪华絲織服装，并披着各种珍奇的毛皮，因为威尼斯人新近曾从海外把一批东方宝物运入了巴費亚。这一記載証实：威尼斯人和君士坦丁堡已有貿易关系，因为在那个时期君士坦丁堡是独占絲綢貿易的。而且，两国間的政治关系和相互需要，对巩固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也有不少帮助。威尼斯人为了避免象查理曼那样的西方征服者的統治，为了能够抵抗薩拉森人海盜船，力求东方皇帝的支援；而东方皇帝也毫不輕視威尼斯人的联盟，因为威尼斯的强大海軍，大可帮助他們来反对阿拉伯人。在第九世紀初，东罗馬口吃皇帝迈克尔，曾向威尼斯人求助来反对共同敌人。

查理曼曾企图征服这个新兴島国并把它并入他的倫巴王国，因为威尼斯是倫巴难民和拜占廷反法阴謀者的总部，同时他也想要制止威尼斯和埃及間的奴隶貿易；但查理曼这項徒劳无功的努力促成了共和国的团結。在日耳曼-斯拉夫人边境上不断进行战爭的时期中所获得的大部分战利品和一半被捕获战俘，都被集中到威尼斯去了。“威尼斯販子在供应穆斯林世界的閨房婢妾和奴隶方面，看来优越于所有的竞爭者。有人提及伊斯的里亚的波拉城是他們交易的基地；我們还知道，在第十世紀，哥尔多华的哈里发有一队匈牙利奴隶的卫兵。”

虽然威尼斯沒有正式脫离东方帝国，我們却可認为它已构成一个独立国家。威尼斯的財富和独立地位，由于它的商业和君士坦丁堡与穆罕默德教地区的联系，由于它的地位构成东方帝国和西方欧洲間的中間站，大大地增强了，尤其是在第九世紀法兰克帝国分裂以后。当西欧的其余地区正忙于冲突和侵略而不复想到大

量貿易的时候，威尼斯却灌注全副精力于貿易方面。匈奴人、阿佛尔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后来馬扎兒人，当他們侵犯多瑙河地区中部或者巴尔干腹地时，封閉了下多瑙河的通路，这样，所有的利凡得貿易都轉入威尼斯人手里。当下多瑙河和撒夫河通路，在匈牙利人皈依基督教（1000 年）和巴錫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人（1018年）以后重行开放的时候，威尼斯在通东方的海路上已立脚很稳，不在乎新的竞爭者了。所以，这些蛮族的入侵中多瑙河区，对北意大利产生了商业革命的影响。威尼斯从来沒有企图发展陆上运輸的貿易。

968 年，格里摩拿的盧易特普藍在被鄂图一世派往君士坦丁堡时，曾看到威尼斯商船停泊在"黄金角"①內。992 年，巴錫尔二世曾賜給威尼斯特权，并証实它已遺失的早期特权状；这样一来，威尼斯几乎完全壟断了从君士坦丁堡与小亚細亚港口向西方运輸的貿易——这是一項极其有利的貿易，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东方的奢侈品，象絲綢、貴重的木材、染料、香料、香粉、葯膏、宝石和珠宝这一类。而且，为了报酬威尼斯供給船只把軍队运到仍在拜占廷勢力下的南意各省去的这項諾言，东方皇帝准許威尼斯商船繳付低于其他船只所付的港口和碼头捐稅。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居住区是在斯坦波尔。这居住区是所有君士坦丁堡商站中的最古老的一个（商站是在外国土地上享有儲棧特权的商人殖民地）。管理这殖民地的长官，是由威尼斯的統領②委派的。在这城內，威尼斯后来至少有四所教堂和一位教主。由于这項条約的結果，威尼斯船只实际上常常往来于希腊、小亚細亚和黑海的一切优良港口。

摩尔孟提說道，在君士坦丁堡从威尼斯人和从搭乘威尼斯船的倫巴人所收到的出口稅，比在同一时期所收到的进口稅，要多八

①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譯者

②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譯者

倍。他認为威尼斯商人可能是依靠信用来領取貨物，然后把它們在威尼斯、倫巴及其他欧洲国家里出售。当君士坦丁堡的出口数量这样大的时候，在君士坦丁堡东方商品的“轉装出口”的重要性已屬显然。在十一世紀，諾曼詩人亚浦利亚的威廉曾以雄壮的声調歌頌它，“威尼斯的商业洪流已这样壮闊。”当时，热那亚和比薩在拜占廷帝国内，沒有获得什么立脚点。

威尼斯早已和法提馬朝埃及組成一項有利的商业联盟。我們看到，828年在亚历山大港已有威尼斯商船，从那里运回了圣馬克的遺骨。和埃及进行的主要是奴隶和武器貿易。东方皇帝和罗馬教皇都反对这項貿易，認为这是供給基督教国的敌人的貿易；尽管如此，它却几乎毫无間断地进行着。这貿易的利益实在太大，因此舍不得放弃了。利潤大得惊人，因为除了奴隶和武装以外，威尼斯商人还經营别的东西：他們把达尔馬提亚和士的里亚的鉄和山坡上砍下来的木材出口到沒有金屬、沒有木材的埃及去，把那里的絲綢、香料及其他“豪华东方”的奢侈品运回来；这些东西的价格很昂貴，而所占的地位却很小。据估計，一只商船往返一次，有时可获得多至1,200%的利潤。这样看来，威尼斯人是在君士坦丁堡和在亚历山大城，通过中世紀世界的两个最富饒的首都来和东方接触的。

直到十字軍东征时期为止，威尼斯和拜占廷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这对双方都有利。威尼斯艦队不时补充帝国海軍的不足，特别是在1082年，当时，威尼斯前来支援皇帝亚历修，在都拉索港口消灭了罗柏特·基斯卡的艦队。罗柏特是下意大利的諾曼統治者，抱有征服拜占廷帝国的宏图。由于这項功績，威尼斯获得了酬劳：在全帝国范圍內，威尼斯商人的一切营业，都可免进口税、售貨税、港口税和船塢費。

威尼斯滿足于成为西欧利凡得貨物市場的地位；至于轉运这

些貨物到內地去，它自己不干而依靠别人，起初，主要是依靠犹太人。他們是威尼斯和它的最自然的市場日耳曼之間的中間商。在860年的严冬里，当亚得里亚海結冰的时候，我們看到这批商人越过坚冰而到了威尼斯。1017年，有四只載运香料的船到达威尼斯的时候，麦則堡主教第特馬把这一消息記入了他的《編年史》。然而，对非洲阿拉伯人的貿易方面，威尼斯却落在巴勒摩、那不勒斯、阿馬斐后面。根据穆拉托里的話，在第八世紀中期，威尼斯商人曾在罗馬城开設市場来購买大量奴隶，为的要把他們販运到薩拉森人那边去。

現在我們从威尼斯轉到拉溫那的历史。它是罗馬帝国在西方的最后首都，早期也是一个主教区的总部和狄奥多理东哥特人的首府；所以拉溫那的历史，比任何其他意大利城市，除罗馬城以外，表現出更大的历史繼續性，而較少支离破碎情况。在威尼斯賽过它以前，拉溫那是北意的主要商业中心。在西欧，再也沒有别的地方在第九和第十世紀这样早的时期就有了工业行会，就是有也不会象拜占廷与后期罗馬帝国的行会有这样明白的联系。从沒有記載而得出的論断，長期以来一直否認在十一世紀以前西欧存在什么行会，而从拉溫那工业历史看来，使用这項論断似乎是有危險的。

对波比奥大寺院，即北意最富的寺院，倫巴国王和喀罗林朝諸王在第八和第九世紀都曾慷慨捐贈基金；这寺院对工业情况給了有趣味的闡述，同时也指出了这些工业团体不一定是出于一个根源的。波比奥的住持华拉（834—836年）的記載里，詳細地告訴我們关于监督和使用那些附屬寺院的很多不自由的手艺人如象裁縫、鞋匠、木匠、皮革匠、刷毛工、織工等等的訓令。所有这一批人按他們的行业技术来分門别类；他們都住在寺院墙垣周圍的"各街区"內。

北意大利的这些大寺院給我們提供了关于經济方面的有趣的資料。从土地制度，可看出罗馬丈量法的殘余，丈量单位是从罗馬“百畝制”得来的。例如，在波比奥，寺院位于領地的中央，由它的农业和工业的不自由的依附者环繞着；这一形式很清楚地是与古代罗馬别墅相同的。領地的其余部分划分为小塊土地給自由租戶耕种，繳付庄园税；但按性質論，这种关系是契約性的并可重訂。自由农民的地位当然优越于純粹农奴，这一阶層的广泛存在表明：或者在第六世紀，倫巴人的征服沒有象一般所設想的那样起降低农民身分的效果，或者是北意大利从那时起已出現巨大的經济社会复兴，二者必居其一。

北意大利的城市和寺院，至少在第十世紀中期以前，似乎大多經营农业，而且几乎是自給自足的；它們生产谷物、牲畜、羊毛、皮革等等来滿足自己的需要。波河及其支流，同平原上很多运河相連接；它們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运輸路綫。很少城市或寺院不是位于这河流网道范圍以內的，而这些水路比陆路重要得多。因此它們猛烈地爭夺水道，就是，占夺課征象通行税、碼头捐一类河流捐税的权利。在喀罗林朝后期，寺院曾是这些特权贈与的主要受惠者，包括市場权利在內。但当城市随着馬扎兒人的侵犯而建造城垣和貴族为了保护自己而建造堡壘以后，它們也开始設立市場并課征商业税。最可获利的是盐税，盐是在波河三角洲上，特別是在科馬奇奥周圍的沼地上，用蒸发方法制成的。盐販子是屬于一个特权阶級的；从倫巴国王时代起，已是这样；他們是商人中的驕子，因为在文献中他們被称为“武士”，好象他們几乎已屬于武士阶級那样。

倫巴第的良好水道系統、接近阿尔卑斯山路的地位以及稠密的人口（可能在第九和第十世紀它的人口超过西欧任何别的地区的人口），引起了不平常的商业竞爭。內地商人和从亚得里亚海岸

来的商人相竞爭；寺院（它們的船只来往于每一条河流上）、主教和貴族，是这些世俗商人的劲敌。如上文所說，甚至早在第十世紀，已有資料可說明城市对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主横加在商业上的苛捐杂税进行反抗；这是十一世紀倫巴第城市起义的先驅。

有人說得对，倫巴城市的兴起，就是“一个民族的傳記”。这民众运动的根苗，不是象曾經設想的那样，在于什么古代罗馬市政制度的殘余，因为沒有这些殘余存在；也不是在于什么日耳曼起源的有机的結合；也不是在于商业或工业行会。行会是在城市出現以后形成的。倫巴城市的眞正起源，象欧洲别处很多其他城市一样，在于农村或城市的牧师区。中世紀的牧师区，远远超出一个宗教单位。它是一个有机性的邻人組織；这些邻人具有共同的社会水平、共同的經济生活；对于牧师区內地方性的、微小而并非不重要的事务，象審理邻人間的地界爭执、修建道路、取締小偸等，他們都很感兴趣①。

在这类城市社会里，这些集团后来很自然地落入工商业分子手里，于是，較雛型成熟的城市政府就出現了。

那些密布在富饒的倫巴平原上的大批城市，由于962年鄂图

① “在牧师区內所結合的小集团，漸漸認为自己已构成一个实际的社会单位。那些爱护他們牧师区教会的簡朴老百姓………將討論有关道路、牧場、牲畜、河流这一类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至于城市里，街道与牧师区的邻人，也將同样地注意于有关水池、泉源、公共卫生、教堂的維持和修葺等各項問題。从牧师区成員中所选出的正直人士，審査那些交給他們的各种乡邻問題，并可能甚至立刻被召来充当判官来解决有关同一牧师区人中間的糾紛。这种平凡的、几乎看不見的自发活动，在几百几千个小中心里，在城市里，也在乡村里，到处出現；又由于中央权力的衰敗而加速展开；还因为这种活动实在健全，能够滿足最急切的而又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它不仅注定要存留下来，而且要成长并从当地擴出………封建制度………到十一世紀，我們看到有选举的代表，叫做‘好人’；他們同封建地主签訂契約；審判他們的同胞，很象一个常規法院；还同其他‘好人’开会討論毗連牧师区，甚至更大地区的共同事务。至于城市里，人口住得較为稠密，必須依靠互相合作；所以，共同行动的需要甚至比在乡村更加迫切。”摘自什維尔：《塞亚那志》，第48—50頁。参閱法·司乃得：《意大利城市和乡村的牧师区》。

一世的統一日耳曼和意大利而获得了极大利益。薩克遜朝和薩利安朝諸帝从开始起就看到：城市的友誼是有助于制止封建主的敌对的。虽然在十一世紀之前很少把皇室特权状賜給它們，但皇室的态度是毫无問題的，因为所有的特权状都提及并認可以前的惯例。

日耳曼的統治有双重影响。第一，它建立了意大利和日耳曼之間的密切联系，給那些扼守阿尔卑斯山路的意大利城市以新的軍事和商业的重要地位，因为它們变为——特别是米兰城——东方貿易和日耳曼之間的重要中間站。第二，日耳曼的統治，由于在那里建立了强固的政府而終結了在倫巴第、多斯加納和罗馬納百余年来的封建混乱局面。在薩克遜朝和薩利安朝統治者給倫巴城市的保护里，在給它們的特权里，可以看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后来促使倫巴城市发展市政制度的因素。巴費亚、帕馬、阿克奎、罗地、諾瓦拉、格里摩拿、勒佐、波倫亚、巴土亚、科摩、貝加摩和佛罗倫薩各城市，从鄂图一世，或者获得了不受伯爵管轄的特权，或者获得了它們原有特权的批准。米兰、阿奎里亚、拉溫那和皮斯托雅的特权，都是从鄂图三世取得的。鄂图諸帝系統地推行了一种在未来将有巨大成果的賢明的投机的計划。全部上意大利，由于这变更而改換了面貌；因为即使很多城市的情况已經沒有証据可資証明，但結果还是証实了事实的真实性。

倫巴商业，主要是中間商业。倫巴城市是利凡得貨物的“清算所”，这些貨物从东方輸入，由米兰、巴費亚及其他城市的商人轉运并分发給北方諸国。

如果不注意到倫巴第的位置和地势，是不可能来研究它的經济史的。关于地理对历史的影响，再也沒有比倫巴城市的兴起更为明显的例子。倫巴第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之間的一个肥沃的冲积平原，約略地說，是波河及其支流的大平原。在中世紀

时期，欧洲再也沒有別的地方，象倫巴第那样密布城市和村落的。其理由是无須远求的。理由在于那供給城市食粮的大平原的肥沃土質，在于那交通便利的河流网，在于波河流域通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在于阿尔卑斯山南側的水道是东西欧往来的天然公路这一事实，最后在于一項幷非不重要性的条件，即差不多全部越阿尔卑斯山到法国或日耳曼去的山路都在倫巴第控制之下。塞尼山及小圣伯尔納德山路，使倫巴第連接多非內和罗尼河流域；大圣伯尔納德山路，即向西北方的唯一山路，使倫巴第連接日內瓦、里昂、香宾市集和巴塞尔；或者可走另一条道路，即从圣摩里士繞过日內瓦湖东端，上溯罗尼河以至終极处；意大利的湖沼还提供了其他的通路。馬格基奧湖通到新普倫山路；盧加諾湖通到圣哥特哈特山路（然而，这一山路直到十三世紀才开放）；科摩湖通到斯普呂根山路。东倫巴第，包括它的最主要城市維罗那[①]和孟都亚，主要使用着勃倫納山路，即最低的一条山路。果然每一个倫巴城市都从阿尔卑斯山路获得了好处，但米兰是所有山路的集中点（除勃倫納外），是一切跨越阿尔卑斯山貿易的自然焦点。阿尔卑斯山路象手指头一样，从米兰的手掌伸出去。米兰掌握着全部北欧的商业鑰匙。虽然勃倫納山路在所有的阿尔卑斯山路中是离中部最远的，但它却是最出名的；因为它是最低的一条山路，也是在1387年塞普替默山路放寬之前，唯一的寬闊可通馬車的山路。在所有其他的山路上，必須使用騾馬来馱运貨物。在950和1250年間，德意志軍队曾有四十三次通过勃倫納山路。而在德国帝王們一百四十四次越过阿尔卑斯山中，有六十六次是取道勃倫納山路的。

倫巴第爭取市民自由和貿易自由的斗爭是和对貴族、封建和乡村的勢力的斗爭联在一起的。在这斗爭里，城市巧妙地挑撥主

---

① 維罗那隶屬日耳曼，是附于巴伐利亚的一个"边防区"。

教和男爵之間互相敌对,从而坐收漁人之利。当时,有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正在形成;有一大批从前压在底下而現在翻身起来的群众,决心要从封建統治阶級爭取政治和社会的地位。这項漫长的斗爭,也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旧財产形式和以工商业收入为基础的新財产形式之間的斗爭,就是,不动产和动产間的矛盾。城市的財富对封建城堡的財富进行斗爭,而在这斗爭里,封建制度失敗了。市民战胜貴族,城市战胜乡村,动产战胜不动产,工商业战胜农业。早在1106年时,佛罗倫薩城曾招請它周圍村庄的全部农民离弃他們的領主而来到城內。有些城市为了吸引农民移入,允許在几年时期以內,从一年到十年不等,給予市民自由权;有些城市允許他們在某一期間內享免稅权。在意大利,乡村农民流入城市这項趋势,特别是在十字軍开始震动全欧社会之后,是一个极其突出的現象。封建主曾企图限制他們的农民移出,但他們都是枉費心机。領主在被他們的农奴遺弃以后,就沒有人来耕种他們的土地,所以他們除了也移入城市外,沒有别的办法了;要不然的話,他們只有在荒蕪的土地上,过艰难而凄凉的生活。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使人口从田野流入大工商业中心之前,我們在欧洲沒有看到过一个与此类似的运动。这种从乡間移入城市的人口,到十三世紀已这样众多,以致很多城市变为人口过多。1247年波倫亚頒布法律,禁止新的移民入城。

关于多斯加納和多斯加納的城市佛罗倫薩、塞亚那、勒佐、費勒拉、摩德拿、帕馬的历史,在偉大女伯爵瑪的尔达的时代(1046—1115年)之前,我們知道得很少。就后来佛罗倫薩和塞亚那的重大經济地位看来,这事实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是容易說明的。古代罗馬人曾破坏那里的伊特拉斯坎文明,而沒有在它的廢墟上建成一种罗馬文明。在罗馬帝国时代,多斯加納是意大利的一个最落后而未发展的省分……"由于違反經济原則的地主制度,那里的人

口一向是稀少的"。这种落后状况和这地方的山区性有很大关系。封建制度在多斯加納生根需要很长时間，因为封建制度显然是农业制度，它只在广闊的平原或肥沃的流域，象塞納河盆地、摩塞耳河与萊茵河流域那样，才容易达到高峰。在中世紀早期，多斯加納的土地，落在它的很多寺院手里，大多是用在养羊和种植葡萄。又因为这些寺院是自給自足的，所以，多斯加納和外面世界很少有經济接触，直到十二和十三世紀由于欧洲对內和对外的大規模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发生的經济革命为止。在此之前，多斯加納城市仅仅是个大村庄而已。甚至佛罗倫薩的历史，在十一世紀之前，也还是湮沒无聞的。上述的偉大女伯爵似乎是这領土上的第一位要改变現状的統治者，也就是說，使多斯加納擺脫它的經济昏睡和隔离状态。但甚至她的企图，也显然局限于改进交通方面；她建造道路、桥梁，并在佛罗倫薩的阿諾河上建造水壩来防止春汛。当意大利的其余地方已感觉到新活力的时候，多斯加納还是处在經济落后的状态里；我們从沒有发現过一个女伯爵瑪的尔达的貨币这一事实，就是明証。

在第十世紀前的中世紀史上，几乎沒有提到过利古里亚湾沿岸城市，热那亚、比薩和盧加，而在十字軍开始之前，它們沒有什么經济重要性。比薩在860年遭受那些地中海上橫行的北欧人的劫掠；热那亚及其整个海岸在931和935年两次慘遭北非穆罕默德教海盗的洗劫。甚至972年，在薩拉森人被逐出于布罗温斯之后，沿海城市还是繼續遭难。因为科西嘉、撒地尼亚和巴利阿利群島还是在穆罕默德教徒手里。比薩在1004和1011年又两次被搶劫。此后，1016年，当热那亚和比薩的联合艦队进攻撒地尼亚的时候，它們从历史的黑暗里一跃而进入光明的历史了。在这壮举里比薩是更为大胆的。这是有意义的，比薩的最古編年史是从这一年的胜利开始的："比薩与热那亚和摩吉多（摩吉德·易寅·阿

达拉，海軍司令，瑪約喀的穆罕默德教总督)在撒地尼亚作战；承天佑助，战胜了他。"① 1050年卡格利亚里港內的海战終使穆罕默德教徒从島上撤退。跟着，科西嘉和撒地尼亚也被征服②。此后，比薩和热那亚两个城市成为西地中海貿易的激烈竞爭者，它們的船只和商人云集在布罗温斯、西班牙以及非洲北岸各港口。

有一个中世紀詩人，在1063年写作时，描述比薩說，它是"一个富饒的城市，它的船只航行到西西里和非洲各港口；在它的街道上，可看到許多国家的商人，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有"。但在十字軍开始之前，热那亚和比薩似乎都沒有冒險进入东方的更富地区。讀者应該注意下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十一世紀中，热那亚、比薩和阿馬斐在西地中海日益增长的海权，开始推翻了伊斯兰教在那里曾称雄二百五十年的优势。欧洲从庄园状况和几乎完全农业的生活中觉醒过来的时期，恰恰正是它再向东方开放商路和在地中海恢复海权的时期。比薩人和热那亚人首先是商人；他們所有的战爭和他們所有的航程，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經济理由。

罗馬城的历史，从第九世紀末期到十一世紀教廷复兴时期，无論在政治或經济方面，都是沒有重要性的③。

在1084年諾曼人搶劫并焚燒罗馬城之后，"罗馬公所及其周

---

① "Fecerunt Pisani et Januenses bellum cum Mugieto in Sardiniam et gratia Dei vicerunt illum".

② "撒地尼亚富于牲畜群、谷物和奴隶；它的沼澤提供了实际上取之不竭的盐源。它的山岭藏着貴金屬矿苗，而它的海岸多海綿和珊瑚。比薩和热那亚都想在商业上利用它。两雄不并立，当薩拉森人被打敗之后，胜利者立刻就掉轉武器，来互相攻击了。"黑胡德著：«比薩志»，第23頁。

③ "社会和經济情况"〔布賴斯說道〕"已是这样；新制度只有在宗教的体系之內才能兴起………市民分为三个等級：軍事等級，包括留剩下来的旧貴族在內；僧侶等級，即隶屬于不可胜数的教会和寺院的一群教士、僧侶和修女；以及所称为平民，即无职业、无手艺的貧困群众………在喀罗林帝国瓦解之后，罗馬城陷入一种放縱野蛮的状态，甚至在那个时候，欧洲也无与倫比；它承襲了文明的缺陷，而沒有承襲它的优点。"

圍的东西完全不可复見，几乎也不复存留于活人的忆念中了。”所有殘留下来的居民，都聚集在利奧奈因城垣之內① 。从历史上看，罗馬向来是一个消費城，而不是一个生产城。有趣的是在北意大利城市中，我們可看到商人和工业行会，而在罗馬城，只有园丁、畜养牲口者和种植橄欖者团体。在十二世紀以前，我們看不到关于手艺人的記載，而就是在十二世紀，也只有关于編草鞋者和制革者的記載而已。

然而，教皇通过征取“彼得便士② ”和朝圣者的礼物，获得了金錢来縱欲于利凡得奢侈品，象絲綢、香料、珠宝这一类。阿馬斐人和尼亚波利人是这項貿易里的主要中間商。因为奧斯替亚港已經破坏，台伯河口的港口工程已經毁坏，所以，这些进口物大部須經由基泰港口而运到罗馬城，而基泰名义上是象阿馬斐和那不勒斯那样的沿海小共和国，而实际上在教皇世仇塔斯邱兰男爵的統治下，因而使罗馬付出巨大代价。直到 1153 年，教皇才能摆脱塔斯邱兰的負担，当时这一有势力的家族，由于財产的分裂、債务和家庭仇怨，已陷于貧困。当他們把他們的土地出典的时候，尤金三世就聪明地購进了这抵押品。

但是在經济活动的一种形式——金融和銀行业方面，罗馬教廷在十二世紀中掌握到势力。从十二世紀以后，喜尔得布兰的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教皇权力的增长，使黃金源源流入圣彼得教会的錢柜里。此外，教廷的教使制度，通过勒索的方法，經常也使教廷发財，或者使教使本人发財。教使的視察往往很象古罗馬总督的巡視。“教会隐匿它們的財富、埋藏它們的宝物，或者致送賄賂，以求免除檢查。”圣伯尔納德关于控訴大主教的教使約但·得·厄息尼的勒索的一封信，生动地闡明了教廷的財政政策；对这些舞弊，

① 罗馬城的一部分，在台伯河西岸。——譯者

② 中世紀北欧諸国繳給罗馬教廷的年税。——譯者

教皇除了間接負責以外，不一定負什么直接責任。中世紀教会的橫征暴歛政策，是从十二世紀开始的。在金融和汇兌方面，罗馬和威尼斯或热那亚相匹敌。罗馬最富的銀行家，是一个犹太家族，姓彼尔利奥尼。这个杰出家族的創始人，是彼尔，他在利奥九世时代曾任过类似教廷銀行家的职位（1049年）；利奥还說服了他皈依基督教。他的兒子为了紀念教皇，把"利奥尼"加到姓名上，因而叫做"彼尔利奥尼"；在"授爵权战爭"时期，他是教廷的热烈支持者。他的孙子彼尔利奥尼是中世紀罗馬城的革拉苏①，因娶罗馬貴族的女兒而成为貴族。他是古老的馬塞拉斯戏院的所有人；他把它改成了一个砲壘。他死于1128年。他的墓上碑銘迄今还保存着，讚揚他是"一个举世无匹的人物，財物无限，子孙滿堂"——那确是犹太人的特点。烏尔班二世死于这个中世紀教皇的債主和朋友的宮殿里。彼尔利奥尼的一个兒子曾任教皇，另一个成为"罗馬元老"，据說，有一个女兒曾嫁給西西里王罗哲尔二世。

有人說得很对：南意大利是"注定要从南方接收文明而要从北方接受主人的一塊地方"。关于文明方面，它是一張羊皮紙。古代希腊人、罗馬人、哥特人、倫巴人、拜占廷人、最后諾曼人，先后蹂躪过那里，并在它上面盖下了烙印。西西里的历史，除了日耳曼的影响以外，和南意的历史有很多相同之点。在几乎三百年期間——九、十和十一世紀——下意大利是由四个不同的种族居住着，由四个不同的法律体系統治着，并且在它的疆界以內，除伊斯兰教外，还有两种不同的基督教形式。希腊人、拉丁人、倫巴人和阿拉伯人分割了它的宗教和統治。从政治上說，自从第六世紀以来，南意各省屬于拜占廷帝国，其中最重要的，是亚浦利亚和喀拉布里亚两省。

---

① 罗馬最大富翁。——譯者

拜占廷帝国通过亚浦利亚、喀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同西欧洲取得了直接的接触，而且，从这一源流有不少物質和精神文化經由意大利傳到日耳曼、法国、甚至英国去。在封建时代，西欧文学和艺术生活上所有的一些希腊文化的色彩大多是从拜占廷意大利来的。

在第九世紀早期，从开温总督区(近代的突尼斯)来的薩拉森海盗开始騷扰第勒尼安海，使意大利处于危險状态中。利奥三世，即为查理曼加冕的教皇，被迫于罗馬沿海地带建造守望塔。813年，維奇亚城被攻。在827和895年間，整个西西里曾遭受阿拉伯人、柏柏人以及亡命的西班牙穆罕默德教徒的蹂躪。846年，罗馬被攻，所以，后来不久，利奥四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周圍筑造墻垣来保护它。这項危險十分严重，以致南方海港如阿馬斐、基泰和那不勒斯(所有这些海港都是靠着和君士坦丁堡的貿易而兴盛起来的)組成了同盟，并在849年，在奥斯替亚港口外贏得了一次海战胜利。薩拉森俘虜被用来建造梵蒂岡城。876年，坎帕納遭受了可怕的破坏。其时，薩拉森人，虽然在海上被英勇的教皇約翰八世暫时遏阻，但却已从西西里渡海到意大利本土；象北欧人在法国那样，薩拉森人不久发現：寺院是財物的主要貯藏所；所以殘酷地搜劫希腊和拉丁寺院。使事情更恶化的是，教皇垂涎南方諸省而計划兼幷它們于教皇世襲領內；他們的这項阴謀策略以及那里的倫巴居民对拜占廷的潛在的敌意，使伊斯兰教的傳布获得了便利。当时，拜占廷的統治机构集中在巴利，在經济上，是横征暴歛的，在行政上是貪污腐敗的。因此，在希腊人、倫巴人和海港之間，經常有冲突。

然而，尽管处在上述的不利条件下，南意大利生活中坚定的經济社会因素：喀拉布里亚尤其是亚浦利亚的肥沃土質(今天这两地已一半被瘴气破坏了)、广闊的牧場、茂密的栗树林、葡萄和橄欖园、喀拉布里矿产(从那时起已經枯竭)、居民的辛勤工作(当时这

些省內的人口比今天也許要稠密)、大批航海和刻苦耐劳的人員；这一切使那里的居民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以至兴盛。在十一世紀之前，西欧在經营东方进口貨的种类和規模方面，除了威尼斯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城市堪和巴利、阿馬斐、那不勒斯、撒列諾、大兰多各城并駕齐驅。因为这些城市里的商业人口，由于牟利心重，不容宗教偏見来阻碍他們的貿易行为。利奥·馬塞坎那斯，即蒙特·卡西諾的編年史作者，在第九世紀中曾痛罵阿馬斐人和撒列諾人，因为他們把营业放在宗教之上，而同穆罕默德教非洲进行貿易。

在南意所有的这些沿海商业城市中，阿馬斐最富于企业精神；它和威尼斯竞賽，并赶上热那亚和比薩。它是非洲和穆罕默德教西班牙之間的貿易的主要仲介。早在第十世紀，阿馬斐商人在亚历山大城与开罗、在叙利亚、在君士坦丁堡已建立他們的殖民地。当巴錫尔二世击潰保加利亚人势力的时候，阿馬斐和威尼斯商人都在都拉索开辟了竞爭性的貿易区。研究一下阿馬斐的繁荣怎样受拜占廷繁荣的影响，并怎样反映出拜占廷海陆权力的兴衰是很有趣的。拜占廷金币作为地中海地区交換的媒介这一优势，又是一个显著的經济事实。在十和十一世紀，除銅便士外，不复有倫巴人的地方貨币。只有阿馬斐和撒列諾还有自己的貨币；而耐人玩味的是这些貨币上面刻着阿拉伯字；显然是为了便于在埃及和北非穆罕默德教国家內进行貿易而制造出来的。当西欧，包括除威尼斯和南意以外的一切地方，还用銀币計算的时候，伊斯兰教西班牙和非洲、西西里、南意大利、拜占廷帝国、叙利亚和埃及，是按金本位来交易的。这一事实雄辯地証明了：和东方国家对比之下，西欧在經济发展方面是落后的。

西欧长期的經济落后，很大部分是因为穆罕默德教占着地中海地区的优势。热那亚和比薩、阿馬斐和撒列諾的兴起，部分地弥补了这种逆差。可是，只要薩拉森人一天占着西西里而控制了地

中海的"海腰",基督教欧洲的航运和商业就要仰伊斯兰教的鼻息。西欧的經济解放要依靠基督徒推翻伊斯兰教的海权并征服西西里,即地中海的鎖鑰。

至于阿馬斐和撒列諾,它們同西西里、突尼斯的薩拉森人訂立了一項"临时措施",使双方互有利益;因此,西西里在穆罕默德教手里,对它們来說,是沒有什么关系的。相反的,它們甚至因此获益。但比热那亚更前进的比薩,在第十世紀后期,曾企图推进到东地中海更富饒的地区,以求扩展貿易;对这項企图,拜占廷,甚至威尼斯,表示欢迎,因为阿拉伯人对屬于拜占廷的南意各省,是个經常威胁。975年,拜占廷和比薩的联合艦队进攻墨西拿。1006年,在勒佐港口外拜占廷在比薩的帮助之下,又对阿拉伯艦队进行了一次大海战,而贏得了胜利。为了酬劳比薩,拜占廷給予在东方帝国各港口內自由貿易之权,这一贈与惹起阿馬斐和撒列諾的深刻嫉妒,因为它們痛恨对抗性的竞爭。1011年,阿拉伯人为了报复比薩在1006年支援拜占廷,而劫掠比薩,这是他們最后一次进攻意大利。

上述南意和西西里的复杂的政治、宗教、商业竞爭,在十一世紀由于諾曼人的征服亚浦利亚和西西里,一定变为簡单化了。諾曼人的宝劍斬断了这一癥結,并在地中海中部建立了一个統一政权的强大优势。諾曼人的征服南意和西西里,原来是作为冒險行为开始的,但轉化为象后来1066年的征服英国那样的殖民运动了。他們終于建立了一个有創造性的光輝燦烂的文明国家;这一国家历时两百年之久。

这些諾曼"騎士"并不是那些由扈从圍繞着的发財貴族。1016年第一批騎士离开他們的本土諾曼底而到南意,因为他們穷苦——据編年史家杰弗里·馬拉特勒的話,他們在諾曼第看到:由于各子平均繼承遺产的法律,他們所可获得的土地太少了。而且,

在他們中間,还有很多因为違犯禁止私战的国法而被放逐的男爵。事实上，这些想发横財的士兵只不过是冒險傢伙和匪徒而已。为求胜利,他們不擇任何手段。他們从山頂城堡冲下,劫掠平原；背信弃义,破坏城市;引誘敌人陷入埋伏陣地——这些就是关于意大利第一批諾曼人首領，即湯克勒德·得·豪特維尔的諸子及其伙伴們的家喩戶曉的故事。在第一批諾曼队伍到达意大利之后，他們占有了城堡;为求分享一份战利品,新的队伍源源而来了。

这些冒險傢伙在下意大利的富庶省份內所得的財产，是数量惊人的。他們之間有一个人向他的伙伴們說:“你們可以統治这些肥沃平原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象老鼠那样在洞里过活呢?”关于这塊良好地方的消息傳回了諾曼底,此后的五十年間,諾曼騎士貴族源源不絕地涌到南方去,最后,这个中世紀里进行征服和殖民的最大种族，在地中海地区創立了另一个諾曼底。这一个意大利諾曼底是在1053年由这批冒險傢伙中的最勇敢者,可畏的罗柏特·基斯卡(“狡猾者”)所創立。1063年的一次战役使諾曼人占有全部西西里,除巴勒摩以外；后者在1072年被占領。到1090年,罗哲尔一世(基斯卡的最幼兄弟)把諾曼人对西西里的征服全部告成。

諾曼人的征服南意和西西里，使地中海地区发生了一次經济革命。就是說,穆罕默德教徒的商业霸权已轉入基督徒手里,現在后者扼守着地中海上交通綫的軸心。諾曼人的征服西西里，給基督徒的商业开放了墨西拿海峽。基督教海权替代了穆罕默德教海权。現在有一个賢明而又有力量的政府在商业上监督并指导几百年来素以經商著名的人口的活动，其中包括有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所有过去竞爭的敌对港口:阿馬斐、撒列諾、巴利、大兰多、巴勒摩，都联合在一个統一政府的治理之下。巴勒摩成为一个商业輻射的中心；它的活动路綫,向西远至加的斯,向东达到亚历山大城、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

但是在打敗伊斯兰教以后，胜利者自己之間不久便开始了激烈的商业斗争。地中海局勢的轉变对拜占廷、威尼斯、比薩和热那亚，仍是一个很大威胁，象过去阿拉伯人的海权和商业冒險对它們的威胁那样。因为雄才大略的諾曼国王在商业上和在領土上与政治上一样是有野心的。他們以"最惠国"特权給予开溫商人。諾曼国王由于扼守意大利和非洲之間的航路，計划迫使比薩和热那亚以及后来馬賽和巴塞罗納的一切船只与貨物在通过这航路时，不論向东或向西，都須繳付通行稅。为要使威尼斯降到商业附庸的地位，罗柏特·基斯卡在 1081 年企图自己占有都拉索，从而控制亚得里亚海入口处，即仅五十哩寬的窄狹海峽两岸的桥头堡——俄特兰陀和都拉索。但由于諾曼人艦队被威尼斯艦队所毁，这項大計划終告流产。諾曼人对威尼斯和拜占廷帝国通商的威胁，使两国締結了密切联盟。希腊人把罗柏特·基斯卡及其兇狠的两子，波希蒙德和罗哲尔，比成毛虫和蝗虫：这个沒有吞掉的东西，那个来了就一扫而光。基斯卡并不因为他的早期失敗而灰心，在 1084 年又認眞准备去征服君士坦丁堡本城。这項大胆計划使人有些困惑不解。如果这計划能成功的話，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整个商业会落在他的控制之下。經过三次海战，又遇风暴和疾疫，他的大計划終告失敗；結果威尼斯获得了从这事件所产生的一切利益。因为"亚历修害怕再被攻击……从威尼斯共和国求得一項重要援助；包括有三十六只运輸船、十四只大艇、九只大帆船，即特别坚固的巨型的船艦。为酬报威尼斯人的援助，亚历修慷慨地賜給他們营业执照，即貿易专利权，还贈予丰富的礼物，即君士坦丁堡港口上的很多店鋪和房屋，还給圣馬克寺院一份献礼；最后一項是最受威尼斯人欢迎的，因为这是从他們的竞爭者阿馬斐人所征的一种稅款得来的"。

这些海陸軍的出征、这些意大利人、希腊人和穆罕默德教徒海

盜船的冒險行动、这些激烈的商业竞爭,都是准备十字軍运动的象征,而且每种对那个大运动都曾起它的作用。欧洲地中海港口,特別是意大利港口,在十一世紀末期,云集着形形色色的冒險人物,他們来自好战而又扰攘不安的社会的各阶層——依长子繼承法被剝夺了繼承祖傳土地的封建家族的幼子們、想发横財的士兵、商人、小販、走私者、貪图名利者、游僧、逃亡农奴、逃犯、碼头夫役、犹太高利貸者和收受贓物者。从所有这些人看来,利凡得的穆罕默德教地区似乎是一个黃金世界。十字軍将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混杂在一起的,各自抱着不同的动机。

第十四章　十字軍前东罗馬帝国 (802—1096年)*

从 802 年主張改良的偉大愛索立安王朝的終止，到 1096 年十字軍使帝国受到致命打击这一时期的东罗馬帝国的历史，是一个国运起伏不定的历史；有时瀕于破灭，有时声势煊赫；其間还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宮廷革命。在这时期，我們看到下列事件：第一保加利亚帝国的兴亡，罗斯对拜占廷的威胁，拜占廷对薩拉森斗爭的延續和它在曼西克特战役后（1071 年）丧失亚美尼亚及全部小亚細亚于新兴而强大的塞耳柱土耳其人。可是，在这多事之秋，帝国一直是照常过去，它的不知不覺而緩慢的变化起于內部有机的改变，倒远多于外部事件的影响。

奈斯波拉斯一世推翻女皇愛里尼后即位。他的統治（802—811 年）是以財政和賦稅的强硬措施而著名。这新皇帝不是一位不做事的国庫长官。他精密地修正田賦制度，使大地产也包括在內。为使国內土地不致荒蕪起来，他迫使大地主負責耕种他們附近的土地。愛里尼曾豁免寺院和教会財产繳納那代替人头稅的爐灶稅；而教会由于这項寬大待遇，便肥壮起来。現在，奈斯波拉斯强制教会繳納爐灶稅并使用强硬措施来征集欠稅。他还恢复 5% 的死亡稅（象近代的遺产稅那样）。对不劳而获的增值，也課以賦稅；那是近代拥护单一稅論者会覺得滿意的一种稅。

还有有关商业的措施：修改收入稅，比旧稅提高$\frac{1}{12}$；对取道赫勒斯滂的家庭奴隶，課以新稅。那些做生意的小亚細亚居民被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9，67 頁。

迫購买地产。在各項法律中，最令人沮丧的——也是极其奇特的——是禁止收取利息的法令。当然，貿易会受損害。为了补救这項情势，奈斯波拉斯貸出国庫黃金，每份十二鎊，利息从$16^2/_3$%到20%不等。

在奈斯波拉斯时代，賦稅是繁重的。常常有人企图暗杀奈斯波拉斯这一事实，証明他是不得民心的。而且，当代的历史家竭力把他描写成为一个貪得无厭的殘暴流氓，以昭示后世；因为他的措施打击了曾由爱里尼豁免爐灶稅的寺院；也打击了那些已經富裕而力能付稅的大地产和大商业利益。如我們所預料，教会对他特别痛恨。但除了禁止利息这項不吉的法令之外，奈斯波拉斯的措施是計划得好的。他需要現款，而且的确迫切地需要現款；但他是把賦稅尽力加在有負担能力的人們的头上的。近代研究拜占廷的最偉大学者写道：“奈斯波拉斯是一个賢明的国君、一个有才干的理財家，即使他不得不占夺教会的財产，也是为了弥补国庫亏空的目的。”

总的說，第九和第十世紀是东罗馬帝国的外患严重的时期，直到巴錫尔二世(976—1025年)扭轉局势为止。小亚細亚，由于阿拉伯人的侵襲，經常处于不安靖状态；还加上了农民反对大地主压迫的零星而无效果的起义——象821—824年的起义——这些起义使亚洲的小土地所有者消失了。巴尔干各地遭受保加利亚人的侵入；他們在半島的腹地建立了一个强大帝国，而这帝国繼續存在到1018年。諾曼人征服南意大利。薩拉森人蹂躪西西里。罗斯人征服黑海殖民地，并多次威胁君士坦丁堡。

可是，尽管拜占廷遭受这些外患，但在这一时期，它的商业却是很繁荣的。以前或以后，从来沒曾有过世界上这样广大地区的商业这样集中于一个城市里，象在第九世紀集中于君士坦丁堡那样。可以看出，帝国的財富在于它的貿易。当时，关稅率是适中

的，特权是被譴責的。有一个皇帝，甚至禁止他的朝臣从事貿易，免得他們奢侈成害。拜占廷貨币，价值稳定，声誉卓著，以致它成为全欧洲的貨币标准。我們看到，第九世紀拜占廷商业，經过陆路，远达东方各地；同阿拉伯人的貿易很繁荣；同北方罗斯人的貿易也日益增长；同时，在西方，拜占廷的商业也达到这样的繁荣状态，使它的統治者得积聚大量現金窖藏。在浪費的提阿非罗（829—842年）时期和在他节約的妻子提奥多拉为兒子攝政的时期，国庫除开支之外，还积儲了二千五百万美元巨款（其中也得助于若干新矿的发現）。試把这数字同英国王室在1431年亨利五世征服法国之后的收入，比較一下，可看到英王每年二十五万美元的收入是小得可憐的。当时，拜占廷的海軍和商船队称霸于世界。对商人发給措詞审愼的特許状，使他們在指定地区內进行貿易。皇帝的政策是要維持貿易路綫的現状。提阿非罗禁止他的朝臣从事船运事业，因为害怕他們使交通运輸离开老路綫。这样一来，商人在他們經营貿易地区內所得的利潤，大到象壟断的利潤那样，即使在那里壟断是不存在的。我們看到希腊商人的記載；他們曾到过保加利亚和多瑙河地区、赫尔遜以及伏尔加河和里海地区。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曾繪制一幅地图，指示下第聶斯德河的航行路綫，并标出罗斯人拖运他們的小船繞过急流的地点。

当我們研究君士坦丁堡的工业制度的时候，我們就可看到：对于一切商品，无論制造的或进口的，都有精密的监督。第四世紀由罗馬政府加以仔細监督的行业团体制度，在君士坦丁堡还是維持着。那里有很多行会，象絲业商人、紫色染工、香料商人的行会；它們控制着大量原料并在政府监督下进行制造。皇帝制定关于一切商品买卖的詳細規程，而国庫收入的大部是从征收行会的捐稅得来的。《总监便覽》一書是由〔聰明人〕皇帝利奥（886—912年）所編

訂的，表明拜占廷工业組織得如何精密①。

这种組織看来可能是麻煩透頂、甚至干預过多的限制。但应該指出：在两点上，它比过去的工业情况，已有进步。第一，对于行会团体，不再課以公役。第二，行会的会員資格不再象在罗馬帝国那样，是强制世襲的。

在君士坦丁堡，叙利亚人、阿拉伯人、罗斯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都可进行貿易，但他們的往来和交易須受到严密的监視。一个外国商人在城内逗留的时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在三月以内，只要付了进口稅以后，就可随意自由交易，不需要再交付别的捐稅。

---

① 君士坦丁堡的工人組織有城市总监作为它們的头脑。凡关于新会員的加入、职員的推选、各行会团体間的关系、团体的整个有机生活，事实上，都是掌握在他手里，由他决定。他处在行会和政府之間，在大多場合下还站在行会和外侨之間。正是他，审判并处罰一切違犯規則的行为………《总监便覽》所显露的君士坦丁堡，乃是壟断、特权和家长主义的乐园。不仅不同行业間的通路为法律严密地封閉着，而且任何一个团体的活动都須受千百条款的限制。国家干涉一切；控制一切；随意进入什么地方，店鋪和儲棧，并查核帳目。它規定工人的工資、每一种貨品出售的日子、地点和价格、制造者不得直接采購，甚至选擇他所需要的原料，对于存貨的質量，甚至数量，也从来不能有何煩言。在有原料运入城內时，購买本行业所需要的原料，是制造者所屬的組織的事情。他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付出在总成本中他所占的比例数，和領受社团分配給他的部分。各种行会成員的增加，遭受极严厉的限制；僱主无权支配他和工人所签訂的契約，甚至也无权支配他們認为必要的学徒人数。国家的干涉还不止于此。为了保持城市对某些工业技术的独占地位，把陌生人看作間諜；严格限制他們的居留的时間。他們被幽禁于旅館內，由警察在外看守；如果他們采購的商品价値超出規定的最高限度，就要受到重大处罰。一般人只准經营一种行业不得兼做其他行业。他們必須在指給的地点上营业。僱主預僱工人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預付工資也不得多于三十天。凡違犯者即将其超出部分沒收。所以，这制度对个别技工还很妥善；但是这批人必然是为数有限的，而且当西地中海区日益发展的城市吸引职工的时候，也不可能留住他們。这一詔令所規定的精密偵查办法，需有大批官員在总监指揮之下进行工作。总监的代表、他的官員、他的稽查員、他的下屬不停止地往来查察，而所有行会的会长，必須尽力予以援助。总监还利用一大群輔助人員，包括君士坦丁堡所有的工人和商人；关于这方面，他应用很簡单而又很便宜的方法——互相告发方法。事实上，法律把“互相告发”作为城內每个行业团体的每个成員之强制性的义务。法律的条文規定得越严密，处罰就越多而越严厉。大量罰款、沒收財产、放逐、鞭打、削髮——这一切总监都經常使用，借以提醒在他管轄权下的那些人注意自已的缺点，尊重他的权威。最后两种处罰方法，鞭打和削髮，尤其是家常便飯。

但是他的貨物,当售給行会采購員时,必須經过檢查。他所收取的貨价,可能不合乎自然的市場价格,因为皇家官吏掌握平衡主要商品价格的办法。不論运入的谷物数量多少,价格必須一律。在市場上銷售的数量,是按照現貨供应的情况和規定的价格来調节增減的。

阿拉伯人和希腊人間的宗教反感,不久化为烏有。基督教的朝謁"圣地"在阿拉伯統治下还在进行。象阿拉伯人和希腊人这两种这样爱好貿易的人民,而又住得如此靠近而不进行貿易,那是难以想象的。利奥五世(813—820年),因为伊斯兰教徒对"圣地"有一种褻瀆行为,曾禁止希腊船只駛往叙利亚或埃及去。但是宮廷需要埃及的織品,而在第九世紀宮殿里已有很多阿拉伯制品。我們把希腊-阿拉伯商业的兴盛时期放在第十世紀中,那是不会錯的。皇家工場所制造的絲綢,在数量上不够供应宮廷中的需求。因而其他精致的織品須从东方輸入。由于需要这些华丽織品以及香料、胡椒、医药品和香粉,希腊人突破了一切政治和宗教的障碍,同穆罕默德教徒进行直接的貿易。海德指出:在第九世紀初,已有关于这項貿易的第一批明确的資料;而到第十世紀,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間的商业获得了巨大发展。

但是,因为阿拉伯人已完全控制紅海、波斯湾和横跨大陆的亚洲商路,而巴格达和埃及的穆罕默德教哈里发又使这有利的运輸貿易尽量負担苛重的捐稅,从而西方消費者付出高价,所以,拜占廷帝国努力使那条經过中亚細亚而不受阿拉伯控制的北方商路开放着。这一条商路,起自特勒比遵德,越过里海地峡,繞道里海南岸,从那里穿过韃靼汗領土:麦尔夫、撒馬尔罕、布喀拉等等达塔什干,再从那里前往印度或中国。

历史再一次地重演了。因为这是和在波斯薩薩尼朝时代罗馬帝国的策略,在科斯洛厄兹大帝时代查士丁尼的策略相同的。这

样，黑海的东方口岸在第九和第十世紀中恢复了它們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勒比遵德,除君士坦丁堡外,是拜占廷帝国的最大商业城市。这边疆城市成了亚美尼亚人、穆罕默德教徒、希腊商人間的交换商品的中心。在第十世紀,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斯特拉第写道,“特勒比遵德是希腊人的边疆城市，我們商人都往那里去；所有希腊制的精美布匹、所有輸入穆斯林領土的錦緞，都是經过特勒比遵德的。”

然而，这条特勒比遵德横跨地峽的商路，也有它严重的不利的地方。亚美尼亚，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冲突时期，一直是个緩冲省份,象过去它在罗馬和波斯冲突时期的地位那样。亚美尼亚人自己强烈地希望独立,常常挑撥那两个竞爭的帝国互相冲突；此外，高加索和埃耳柏兹山区的野蛮部族，象庫尔德人那样，动輒劫掠商队。所以,后来我們看到,人們便逐漸地使用另一条比第一条更北的北方通路。这条路綫,来自印度和中国，沿阿姆河順流而下,到咸海,繞里海頂端,过烏拉尔河口的薩拉坎谷达伏尔加河口的伊鉄尔或阿斯脫拉罕,从那里上至薩来，于是,下行頓河到亚速夫海的罗斯托夫。这里，在大草原陡峭的斜面上位着克勒諾伊(Kremnoi)或“悬崖”；这名詞是希罗多德用以称希腊商人的貿易中心的；几百年前,希腊商人也曾到过那里,同西徐亚人进行貿易。这条路除了不受穆罕默德教徒的阻撓，并能避免山区野蛮部落的搶劫之外,还另有一項优点,就是它几乎全部是水路。

这条新商路的开辟，使一个叫做喀扎兒人的古怪部族在商业上有了突出的地位;他們原来住于德尔朋上面的里海大草原上,并一般被認为是同突厥族有血緣关系。早在第八世紀，君士坦丁五世曾娶喀扎兒族的一位公主,就是著名的皇后爱里尼。那时,喀扎兒人已經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部族；他們經营魚类、毛皮、奴隶、羊毛、蜂蜜、蜡、脂肪等相当数量的貿易。他們的首都，是在

伊鉄尔(阿斯脱拉罕),但是"他們王国的領土范圍是从高加索起向北到伏尔加河并远抵該河的下游;它包括頓河盆地,西至第聶伯河两岸,达屬叨立克族① 的刻赤人的地区"。

喀扎兒人采用犹太教作为他們的宗教这一个特殊的事实,比一个韃靼部族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覚奇怪。但这是一項聪明的措施,因为喀扎里亚位于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和基督教拜占廷之間,它遭受双方根据利害关系发出的巨大压力;它就用这种妥协办法規避它們;同时,还有另一种利益,即吸引犹太商人到阿斯脱拉罕市場来,以便特別促进喀扎兒人的商业。阿拉伯历史家易宾·庫尔达达巴在第九世紀告訴我們說:甚至西班牙犹太商人也經常来到阿斯脱拉罕;当然,他們途經薩罗尼加和君士坦丁堡时,一定会停留的。但是拜占廷和西班牙的商业,不都是单方面的。«阿欣麦兹編年史»告訴我們說:在第十世紀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曾派遣使节到哥尔多华的阿布的拉曼三世那边,以求促进穆罕默德教西班牙和东方帝国間的貿易关系。"因为当亚历山大城对西方哈里发国的商业开放停止以后,它的臣民从君士坦丁堡經常受到欢迎,而获得了巨大的补偿。"

刻索的古代希腊殖民地上的商人,現在开始惹人注意了;刻索是北方和克里米亚居留地商业的中心。关于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刻索、狄奥多西亚、欧巴托里亚、番那哥立亚、坦納、索尔德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哥远征队"的故事②。这些地方在第四和第五世紀的大混乱里曾遭受严重的破坏,而在查士丁尼时代,曾部分地恢复;在第二次亚洲蛮族即阿佛尔人和馬扎兒人侵犯的高潮里,它們再次被蹂躪;到第九世紀,正在它們第三次开始繁荣的时

---

① 叨立克族(Tauric)是古代克里米亚半島上的穴居人,可能就是克里米亚人。——譯者

② 希腊神話:哲孙(Jason)率其党徒,到科尔奇斯(Colchis)求金羊毛。——譯者

候，侵入俄罗斯的瑞典人又使它們遭受了危害。

現在我們必須相当詳細地追述罗斯人和拜占廷帝国間关系的历史。第聶伯河是罗斯人国家(現在的俄罗斯)的主要經济动脉和最重要的商业通路。第聶伯河的源流接近那通波罗的海的两条最重要的水路，就是西德維納河和伊尔門湖的整个盆地；而伏尔科夫河則将俄罗斯中部和拉多牙湖接連起来。

斯拉夫人的居住区大部分在中第聶伯河的盆地上，特別是平原的多树林的地区。这个地区給他們提供了貿易的商品，因为他們打猎可以获得生皮，养蜂可以获得蜂蜜，而新开垦的森林地能出产谷物和大麻；这地区迄今还是俄国著名的谷倉。所以，从早期起，生皮、蜜和蜡就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物；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斯拉夫人就开始集中地开发森林的富源；一直繼續了几百年之久，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斯拉夫人沒有貨币，而代之以兽皮，特别是貂皮和松鼠皮。所以，古代俄罗斯貨币“基尼”(Kunic)这名詞是从貂的名称“基尼察”(Kunitza)得来的。他們以兽鼻或小塊兽皮作为小輔币。某种数量的兽皮被作为一个“格里夫納”(Grivna)；但这数量是按照市場情况而波动的。

斯拉夫人居住在互相隔离的宅院内，周圍挖沟，并在附近森林里設置蜂房和陷阱，并开垦小塊田地。这些宅院起初分布于第聶伯河及其支流地区，到后一时期，斯拉夫移民才开始住到伏尔加河上游流域。他們常常把宅院圍以矮墙，以求自卫，并保护牲口免遭野兽侵害。城市就是从这些宅院逐漸形成的，其中最早聞名的是基輔。

俄罗斯經济生活的最早的类型是猎人、养蜂者和商人，由于商业可以提供巨大的利潤，斯拉夫人直到第十世紀末期，才发展农业。他們侵掠周圍的部族，因而积聚了大批奴隶；他們便把大量奴

隶輸出到“东方帝国”，因为他們农业很缺少，不需要这些奴隶的劳动。

罗斯的貿易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当时的外面局势的帮助。約在斯拉夫人移居第聶伯河流域的同一时期，住在黑海和里海之間的喀扎兒人已成为波罗的海和西亚間的重要商人；因而他們大有助于阿拉伯与俄罗斯之間的貿易的发展。从第聶伯河盆地所掘出的大批阿拉伯“第倫”币，就可看出在第七和第十世紀之間这項貿易的范圍了。

斯拉夫商人在第聶伯-伏尔科夫商路上的繁荣状态，使設防的宅院变成了貿易站，并有很多城市建造在第聶伯河及其支流沿岸。关于基輔、佩里雅斯拉夫尔、斯摩稜斯克、諾夫哥罗得及很多其他城市之起源，沒有可靠的記載。时常有捕鳥兽者和养蜂者来到这些地方，以求交換他們的兽皮、蜂蜜和蜡。其中有些地点或村庄市場成了其他工业地方的分配站。

一般把瑞典人在852年(?)立足于基輔这一件事，作为俄国历史特别的开始日期。但是有資料可以說明，流动的罗斯人——因为侵入者这样地称呼自己——实际上远在第八世紀已經深入罗斯中部。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証据說，約在787年諾夫哥罗得的罗斯人曾企图占夺克里米亚；这比以前所知关于罗斯人要占有黑海領土的企图要早。在法兰克高盧的《圣柏坦寺院的編年史》里，保留下来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也許稍可闡明这一問題：839年那一年的紀录談到罗斯人国家的某些使节来到君士坦丁堡，他們的目的是重訂一項通商条約。但是，他們害怕比瑟尼格人，所以不願再循原路回国，这时，比瑟尼格人已征服和罗斯人友好的喀扎兒人。皇帝便派他們带了一封給虔誠者路易的信返国，結果路易发現：他們是斯堪的那維亚人，即发兰琴人。

这些罗斯使节是誰，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問題。第聶伯地区

城市和拜占廷帝国已有一項通商条約，可能是历时很久的条約。他們所代表的是这些城市的斯拉夫人呢，还是他們自己的国家呢？可能是代表前者，在那种情况下，他們之所以被选为斯拉夫人使节，可能是因为发兰琴人对于水路具有优越的經驗和知識的原故。

上文已經說过，比瑟尼格人的侵犯大大阻碍了喀扎兒人对斯拉夫人在第聶伯河貿易的保护，并切断了基輔同黑海和里海的商业中心的貿易关系。因为喀扎兒人不复能够保护商人，第聶伯盆地上的重要商业城市認为必須由自己起来保护商路。所以，从那个时候起，那里的商人就开始在他們的城市設防，并派遣雇佣兵来武装护送他們的船只。这样一来，那些貿易中心和原料堆儲所便成了設防的城市。而且，对雇佣兵的需要也更大；当时的发兰琴人的在軍事上的优良品質与这項工作正是十分适合的；因而他們大批受雇于部落酋长来护送商船。此外，还有那么多的罗斯人，以商人的地位定居于城市中，以致这些城市人口的性質往往由斯拉夫人的变成发兰琴人的了。所以，据古代編年史所載，諾夫哥罗得城起初是斯拉夫人的，但后来，由于罗斯人特别是在842年路列克統率下的罗斯人之大量流入，它就变为发兰琴人的城市了。在阿斯科尔德和狄尔抵达基輔之前，那里住着的斯堪的那維亚人是那样的多，所以，这两个首領一到那里，就感到从当地斯堪的那維亚人中就可募集一支充分有力的軍队从喀扎兒人手里夺取这个城市。后来，他們竟敢于用这支軍队进攻了君士坦丁堡。

所以，显然可見，第一批来到俄罗斯的发兰琴人，或者是到拜占廷富饒市場去的路过的武装商人，或者是在第聶伯地区城市营业的商人，或者是自願充当雇佣兵的人。从下列事实，可說明：发兰琴人一般是被看作商人的：直到今天，“发兰格”① 的意义还是小

---

① “发兰琴人”(Varangians)这名詞是从发兰格(Varyag)得来的。——譯者

販或者跑单帮的商人。但是，不久以后。发兰琴人便由斯拉夫人同行商人，或者为斯拉夫船只充当武装护送队的地位，轉变为統治者的地位。在第九世紀后半期，在諾夫哥罗得的路列克的領地、在比洛奥塞罗（白湖）的息尼厄斯的領地、在易斯巴斯克的特魯伏尔的領地、在基輔的阿斯科尔德和狄尔的領地，就这样地形成了。

然而，在上述各个罗斯人的領地中，享有卓越地位的幷不是諾夫哥罗得城，而是“罗斯城市之母”基輔城。这是大部因为基輔在商业上的便利較之其他一切城市有一定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俄罗斯的商业交汇之处；从伏尔科夫河、从德維納河、从下第聶伯河及其支流来的船舶都云集于此。这样看来，俄罗斯城市在經济上依靠着基輔来进行南方的貿易；而这項貿易則占国内总貿易的极大部分。誰能統治基輔，誰就享有对俄罗斯商业的卓越控制权。这可說明：为什么俄罗斯王公为夺取这个最重要的中心而进行冲突。关于这一点，还应順便注意：当奥列格进行从阿斯科尔德和狄尔手里夺取基輔的时候，他冒充为一个发兰琴商人；显然因为經商是罗斯人的最普通的职业，因而不会引起絲毫怀疑的。

阿斯科尔德和狄尔，还占有基輔的时候，在 865 年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第一次进攻。湼斯脫和总主教福細阿斯（后者曾目睹这項进攻）告訴我們說：罗斯人趁着皇帝迈克尔三世离京的机会，确曾深入博斯普魯斯海峽，圍攻了君士坦丁堡。我們对这进攻的詳細情况，虽不感兴趣，但却应注意这一事实：据福細阿斯說，这項出征的原因，是为了有些罗斯商人遭受侮辱因而进行报复。这侮辱可能是起于希腊人企图賴掉他們所欠的債款。这次进攻是一系列冲突中的第一次；罗斯人企图用冲突来迫使希腊人恢复他們与希腊人的通商关系；显然这种关系大約由于希腊人的主动而不时中断。所以，这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最早的历史資料，可說明：甚至在 866 年之前，在这有关的两国之間，确实有通商关系，而这种

关系是由一項外交条約来建立并保障的，其中基輔是条約的当事人之一。

当奥列格接替阿斯科尔德和狄尔的基輔王位之后，他繼續保持前人对拜占廷帝国的貿易的政策。我們知道：奥列格在巩固基輔的防务以后，进行另一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征伐；結果签訂了另一次的商业条約。显然，前次的进攻所建立的关系，早又被希腊人置之度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斯科尔德和奥列格两人之下，参加进攻的都是第聶伯河沿岸大商业城市的代表人；就是，那些对东方帝国的貿易有着切身个人利益的人們。举例說，906 年奥列格用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軍队中，有諾夫哥罗得人和基輔人、白湖的芬兰人、罗斯托夫人、克力維奇部族、賽維立安族、波力安族、拉提米奇族、杜力伊比族、科尔瓦提族以及提維尔茨族，当然还有发兰琴人的队伍。奥列格拥有两千艘輕快船；每只船除一队騎兵外，还配备着四十个步兵。奥列格使用这种兇猛的軍队而贏得了一次大胜；因此，帝国政府被迫同胜利者进行媾和。結果，两国签訂了一項和約。然而涅斯脫告訴我們說，有两項条約：一項条約是 907 年当奥列格軍队还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时签訂的，另一項条約的日期是 912 年，由奥列格的特别使团所签訂的，这两項条約的关系是含糊的。907 年的条約本質上是完全屬于通商性質的，包括下列各款：

I. 除付賠款給一切奥列格所統治的城市之外，还应对胜利軍中的每一个士兵付給賠款。

II. 每一个罗斯客人或商人到君士坦丁堡后，希腊皇帝必須供应他們面包、酒、鮮肉、魚类和水果，为期六个月；他們也得自由进出公共浴場，并可領到归程所需的各种食品、船用絞艫錨、捲索、帆以及其他一切必需品。

希腊人虽然是失敗者，但仍能要求作了若干的修正，而将修正点同样地載入条約。他們的要求如下：

I. 凡是非为經商而为其他目的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罗斯人，无权領取按

月补助費。

Ⅱ.（俄罗斯）公爵应禁止他的臣民损害希腊地方和城市的居民。

Ⅲ.罗斯人得居住在城垣和博斯普鲁斯之間的聖馬馬斯区，他們必須向市政府报告他們的到达日期，向市政府登記他們的姓名于登录簿上，并按下列顺序发給他們每月补助費：基輔、徹尔尼谷夫、佩里雅斯拉夫尔及其他城市。他們并且必須由靠近帝国港口的一个城門出入，不得携带武器，而每次結队入城的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然后，他們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城內自由經商，不付任何捐稅。

912年的条約是关于两个国家間的关系，但是除下列第Ⅶ和第Ⅹ两条規定以外，对貿易关系，沒有特殊的意义。

Ⅶ.如在希腊購买的奴隶中找出任何罗斯人，或在俄罗斯購买的奴隶中找出任何希腊人，这种奴隶将按商人为購买他們所付的原价，予以贖回。战俘付二十苏里德贖金后得回祖国。然而，那些自愿为皇帝服务的罗斯人，应准予留在希腊，他們愿留多少时間，就留居多少时間……

Ⅹ.如在希腊境內的罗斯商人或其他的人中，发現有国內緝拿的犯人，即使其本人反对的話，基督教皇帝也須遣送其返国。关于在俄罗斯境內的希腊人，应实行同一程序。

所以，从这些俄罗斯和东方帝国間的早期通商条約中，我們可看到国际公法的发端。

奥列格不仅貫徹了一种有利的对外貿易政策，而且他的成功对俄罗斯的內政上，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們已提过，第聶伯流域的商业城市曾帮助他进攻君士坦丁堡，因为他們貿易利益和奥列格計划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現在，由于奥列格的卓越战功，使所有的这些城市都入于基輔統治者的領导之下。这不是一种强制的征服，而是一种自愿的臣服；从而把基輔提升到第一个全俄罗斯政权的地位。所以，把路列克的短命的諾夫哥罗得侯国作为俄罗斯国家的开端，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俄罗斯斯拉夫国家的政治統一的光芒不是从諾夫哥罗得而是从基輔放射出来的。而这个結果

是由于共同的商业利益通过自然而和平的团結方法产生的。

另一促成斯拉夫各部族团結在基輔主权下的因素，是需要防止比瑟尼格人的侵犯。这些掠夺者盘踞在通黑海和里海的各商路上；所以俄罗斯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来阻遏他們。正是基輔如此有力地承担了这一角色，所以其他商业城市認为接受那个侯国的控制，是对己有利的事情。

現在，不仅职业商人和販子，而且首先公爵本人都在經营商业，因为商业通过奥列格条約已在稳固基础上建立起来。由于向来是半商半兵的罗斯人，掌握政权之后沒有放弃其經商性質，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他們还是繼續經营商业。事实上，他們几乎是由于必要而不得不然，因为公爵对臣民征集的貢賦都得用实物支付的。在冬季，公爵带着卫兵，从一省到另一省，征集这种貢賦，而在夏季，则以这些征集来的实物进行貿易。这些卫兵从这貢賦里領取了一部分实物，作为工資，因而他們也被卷入商业圈子里了。

皇帝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905—959年)① 曾描写罗斯船只每年航行到希腊的情况如下：

他們是从諾夫哥罗得、斯摩稜斯克、琉比契、徹尔尼谷夫和維希哥罗得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在罗斯人統治下的斯拉夫人——例如，克力維奇族、盧察安族及其他部族——在冬季从他們的山上砍下树木并建造船只；我們称之为"独木船"，因为它們是用一顆树干造成的。在第聶伯河不結冰的时候，斯拉夫人来到基輔，把这些船只售給罗斯人；后者从他們的旧船上取下的橈架和划桨来配备它們。在4月中，整个罗斯船队集合在維提奇夫，从那里船队前駛到急流。当商人們抵达第四急流处(叫做涅雅西斯提亚，那是最危險的地方)的时候，他們便把貨物全部卸到岸上，牽引被牢固地鎖着的全部奴隶上岸，并沿河步行走去，大約要走六千步左右。比瑟尼格人，則按照他們的慣例，在急流之外，在那叫做克拉立斯基渡头的附近，埋伏等待着(在这地点，刻索希腊人从俄罗斯回来时曾渡过第聶伯河)。击退了这些盗匪之后，

① 君士坦丁七世合法繼承人的在位时期应是913—959年。——譯者

他們前行到聖格列高里島，在那里献祭他們的神；此后，他們脫离了危險，直到他們抵多瑙河的支流薩利納河。在那里，如果偶然被暴风迫上岸的話，他們再一次須同比瑟尼格人战斗。于是，最后他們通过卡諾普、君士坦查；在渡过保加利亚的伐那和狄兹那两河口之后，他們达到麦森布利亚，第一个希腊城市。显然，他們的貿易一定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大財源，因为他們冒着这样多的危險，并且費了这样多的劳动；又因为他們同帝国所簽訂的一切和平条約，也都是为了这一目的的。

这些大胆的商人冒險家，并不以和保加利亚、希腊和喀扎兒区进行貿易为滿足；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君士坦丁的話，他們曾冒險远行，到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某些地点，甚至到达西班牙。他們的船舶經常来往于黑海上，所以黑海获得了俄罗斯海这个名称。至于希腊商人，他們却从未到过第聂伯急流之上的。看来，只有刻索希腊人可能曾經在基輔經商；在基輔之上，似乎沒有希腊商人的足迹。

罗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貿易，与其說是一种現款交易，不如說是一种物物交换。他們以俄罗斯的生皮、蜂蜜、蜡、奴隶来交換絲綢和紫色衣料、豪华装飾的服装（然而，从伊哥尔条約以后，在数量上，不得超过买价五十金苏里德的限度）、麻布、皮革、黃金飾品、酒、香料和水果。

伊哥尔在繼奥列格登上基輔王位之后，又进行出征帝国（在935年）。虽然他的武装部队人数很多，結果却遭受了慘敗，尤其是因为遭受"希腊火炬"的攻击。为了进行复仇，兇狠的伊哥尔召集了另一支軍队，而在944年发动了另一次出征。这次出征非常成功，伊哥尔获得了另一項通商条約，945年的条約；这条約进一步規定并加强了两国之間的商业关系。与这問題关系較密的規定，有下列条文：

I. 罗斯人的大公爵及其卫兵，可自由派遣他們的搭乘使节和客人的船

只进入希腊境內。客人象过去所規定的那样，应携带銀印，而使节則应携带金印，但从今天起，他們还須隨带一封公爵的公函，以証明他們的来意是和平的，幷証明船队所包括的人数和船数。如未携带这种公函，他們将被扣留看管，直到我們把这事情通知俄罗斯公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們抗拒我們因而丧失生命，俄罗斯公爵不得归罪于我們。如果他們逃到俄罗斯，那么，我們希腊人把他們逃亡的經过通知公爵；至于如何处理他們，公爵得酌量办理。

关于俄罗斯人到君士坦丁堡后居住地点及其每月补助費的規定，是和奥列格条約內的条文相同的。然而，也有若干附加条件，內容如下：

俄罗斯客人将由一个皇家官員隨行保护；如与希腊人发生爭执便由他們解决。凡俄罗斯人所購买而在数量上超过五十苏里德价値限度的所有的絲綢，必須交此官員驗看，由后者在絲綢上蓋印①。当他們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将按本条約所規定，供給他們各种食品以及他們船上所需的一切东西。但是，他們不得在聖馬馬斯区过冬，而必須在保护之下返国……

V. 如果有罗斯人偸窃希腊人的东西，或有希腊人偸窃罗斯人的东西，这类罪犯，应按其本国法律处罰；他須归还所窃的东西，幷須照它的价値加倍償还。

VI. 如果罗斯人把希腊战俘带至君士坦丁堡，他們每带来一个强壮年輕男人和女人，可領到十苏里德，带来一个四十岁的人可領取八个苏里德，带来一个老人或少年人可領取五个苏里德。如果希腊人將罗斯人購作奴隶，如屬战俘他們可以領取十苏里德，如系販买来的奴隶，所有人須宣誓声明原付的价格，然后照这一价格領款……

罗斯人对在第聶伯河口捕魚的刻索人[希腊人]，不得加以損害。而且，罗斯人沒有权利在第聶伯河口过冬，也不得在比洛、貝里格[白海岸]、在聖爱特立厄斯[現在第聶伯河口的貝利贊]过冬，而应在秋季来临时，回到他們的国家俄罗斯去。

---

① 这表面上奇特的条件可由其他証据来証实：例如，盧易特普蘭本人在获准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必須把他的行李呈驗，某皇家官吏即未批准他保留某种特別貴重絲綢衣料，而償还給了他原付的貨价。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希腊人在財富和知慧方面，胜过其他民族；所以他們在服装华丽方面，也应胜过他們"(見《盧易特普蘭教使傳》)。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約提及一些过去的办法（“象过去所規定的那样”），依这些办法，客人应呈驗一顆銀印，使节应呈驗一顆金印，以取得合法的地位。所有流傳下来的条約对任何这样的办法都沒有提及过。是否在《編年史》所紀載的以外，还有其他条約呢？看来，根据上面的引述，至少还有一种这样的条約，而这条約的条件，已如此明确地知道，所以只要提及它，就認为已經足够。这样，我們可以作出結論說：俄罗斯和东方帝国間商业关系的发展情况和它們用条約所規定的明确关系，在程度上超过我們一向希望从保留下来的史册所可找到的消息。

在伊哥尔时代之后，还有一次出征帝国的事件（972 年）；那是由好战的斯維雅多斯拉夫进行的。但是，結果他被有才能的皇帝翰翰·朱密斯克斯击潰，并被迫簽訂了一項条約；从我們的观点来看，这条約并未包括什么重要的东西。1043 年，因为有几个罗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遭受虐待和毆打，其中甚至有一人被杀，雅洛斯拉夫派遣其子率領艦队，进攻希腊人。然而，在这两国之間，并未再訂任何条約；或者至少沒有关于任何条約的記載流傳下来。可是，在立法者雅洛斯拉夫的时代（1016—1054 年），尽管有上面所述的軍事出征，俄罗斯和希腊人的商业来往，显然大有增加。

在此之后，还有几种关于通商情况的記載；它們都可作为商业活动的証明。每年有商船队从君士坦丁堡到达基輔；这些船队对整个国家的福利和公爵的私人財源，都是如此丰富，如此重要，以致公爵慣于派遣兵士远至卡涅夫，为的要保护这些船上的名貴船貨，以防止波洛夫茨之类的搶劫部族的掠夺。从基輔到黑海这一段的第聶伯河，当时俗称为“希腊通路”。除了上文說过的商品以外，俄罗斯人还扩展他們的营业活动范圍；他們在陶里斯購买食盐，把它轉运到苏达克（克里米亚半島上的索尔德亚）——連同他們旧有的大宗商品——来換取絲綢衣料和东方香料。

这样，对外貿易使基輔接触了外国文明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文明。当时，貨币大量地流通着。到十一世紀末期，据記載，有一个小貴族从他的斯摩稜斯克省，收到了一笔巨款，不折不扣地等于今天的十五万盧布。基輔显出了一个世界都市的性質，因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日耳曼人、摩拉維亚人、威尼斯人在那里并肩杂处着。这些外国商人之所以被吸引到那里的，是因为这城市提供了极其良好的貿易条件，还因为俄罗斯人有着好客之风。麦則堡·提特馬在1018年認为基輔确有四百座教堂和八所市場。

从雅洛斯拉夫去世到基輔灭亡(在1169年)为止，出現了一个混乱、内战和逐漸衰敗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商业状况，沒有特殊文献可資稽考。但可以妥当地說，尽管在这混乱的时代里，貿易还是繁盛的。

上面对俄罗斯历史的討論，已使我們的叙述超过了拜占廷历史的范圍。

在962到968年間，皇帝罗曼納斯二世和奈斯波拉斯二世弗卡斯，对西里西亚和北叙利亚的薩拉森人，进行着几乎連綿不息的战爭。这战爭純粹是侵略性的。在东方偉大哈里发国家分裂为大批軟弱的总督区以后，皇帝看到机会，可以收复失去已久的，特别是叙利亚方面的領土。傳統和偏見使他們閉眼不見这一事实：越过托魯斯山脉之后，他們是在走出一条优良的軍事界綫，去攻取一塊絕难防守的領土。因为这地区滿布着設防良好的城市，所以战事必然拖长；又因为它远离供应基地，战爭的消費是非常浩大的。結果是：获得一些光荣和占有安提阿(它的一部分商业希腊人已經享有)，另一方面，消耗的軍費一定是可怕的。

叙利亚战爭是一个不必要的行动；而俄罗斯战爭和扑灭保加尔人的危險的战爭，則是为保卫帝国安全上所必需的。这些战爭

都是劳民伤財的。在前一次战爭里，为弥补軍事預算已不得不增收稅賦；又因遭到严重的飢荒(927—932年)，事情便更加复杂化。最后，甚至采用了可恥的办法，把优良的拜占廷貨币贬值。后来接着的战爭(除了巴錫尔的亚美尼亚的冒險行动以外)，則更为必要，但亦无法比第一次战爭消耗的少。这些战爭沒有經費是不行的。

而且，正在这一时期，土地向一小撮大地主手里集聚的长期过程，却进行得很快，尤其是在小亚細亚方面；在那里，自由小农淪为租戶、甚至农奴，而农业也衰落。柏立教授在他出版的吉本著作所附的一篇精辟論文內，描述了这項过程：

小农阶層的衰落，包括以下的两种原因：修道理想的影响和当时經济条件的缺陷。寺院生活的吸引力誘导了很多地主参加寺院，并以他們的土地贈給那些接受他們的寺院；或者，如果他們是十分富有的話，就建立新的寺院的或教会机构。这样，土地就移轉給教会，因而这些土地的耕种，也从自耕业主轉到租戶手里了。健全信貸制度的缺乏(因为不懂政治經济学)以及从而产生的商业蕭条，使土地成为唯一可靠的投資資本；結果，那些拥有資本的土地所有者，便經常力求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他們利用各种机会来引誘左近的穷人，那些做一天吃一天毫无积蓄的人在窘迫的时候抵押或出售土地。农民这样地出售土地以后，往往成为他們自己原有土地的租戶。政府对大地产的增长，是抱着不贊同的怀疑的看法的。922年，罗曼納斯一世开始了反对大地主的运动；当时，他在規定优先購买权的法律里，禁止大土地所有者土地購买或接受小农的任何土地，除非有亲屬关系。还規定：凡如此获得的土地，只在占有十年之后，才可永远成为他自己的財产。但是，几年以后，巨头碰到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因而他們不能抗拒那利用这机会的誘惑力。在长时期中庄稼繼續歉收，又遇着严寒冬季(927—932年)，因此整个国家陷入大灾难状况。小农貧困万分，在飢餓綫上掙扎；他們为了自己和家族購买面包，除抵押他們的小块土地給富裕邻人以外，别无办法。因为抵押土地是他們唯一可以得到放款的条件。在罗曼納斯的时代，这些年代的飢饉构成了农民所有制历史上的一个紀元。显然，那些把自己土地抵押出去的农民，在十年期限之内，沒有机会来贖回他們的土地，而在十年期滿之后，他們的土地將是不可贖回的。小农阶層將来势必整个消灭，所以，罗曼納斯又企

图以直接立法来预防这項灾难。他在934年頒布《附律》說：在过去几年中对农民不公平的处理，应予以糾正；而在将来也不准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后繼的皇帝遵循了罗曼納斯的政策。他們力图阻止小农阶層的消灭，禁止富人从穷人取得村庄和农田，甚至禁止宗教机关接受土地的贈与。关于这个問題，曾公布一系列法律(947年、959－963年、964年、967年、988年、996年的法律)；这些法律表明：地主因为他們的利益遭受危險，对帝国的政策，曾进行过頑强的抵抗。虽然这項立法从来沒有廢止过，除了有关教会利益部分以外(由巴錫尔二世撤消)，虽然廢止发財地主取得农民的土地这項条文，仍然是帝国的法律，但毫无疑問，这項法律等于具文，而在帝国的末期，自耕农的土地确已成为凤毛麟角。在十一世紀，小亚細亚大部已是大庄园的地区。

上述过程，經过相当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下列情况：由农奴耕种的大庄园制、城市人口的急剧縮減、工业和制造业的萎縮和經济的停滯。这样一种极端情况，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情况。然而这項发展不得不由于出征时期的消耗和重税而加速起来了。

巴錫尔二世在他反时代趨势的斗爭里所获得的成功，只是暫时的。当时要有一个品質非凡的和有經济观察力的人物，才能把帝国恢复到健康状态。这一情况可充分証明：国家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已走下坡路了。而登帝位者，是无能而又放蕩的查士丁尼八世。他把各省交給他的貪得无厭的寵臣，并貪婪地征集已由巴錫尔取消的賦稅欠款。

但是，尽管有各种損害，拜占廷的經济磨盘(当然特別是首都，它比各省所受的損害較少)还能很好地轉动；所以在那二十九年时期中(在这时期中的統治者都是从和君士坦丁的女兒們的婚姻关系而得来的皇位)社会还能够“酣睡于繁荣状态里”。这是酣睡，虽然是危險的貧血症酣睡。

只要一考查东罗馬帝国的經济政策，就可看到，如上文所述，它对政治經济的愚昧无知的状态几乎令人难于置信。財政立法几乎完全基于財政的理由和国庫的急需，而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其

次，帝国信貸制度的缺陷，对商业必然要起不利的作用；同时如上文已述，它的危險影响也加强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勢力。

帝国政府的盲目性，即自滿于一种"消极"性的商业和准許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如威尼斯、阿馬斐、比薩、热那亚来壟断到西欧去的运輸貿易的政策，不仅剝夺了帝国臣民那原来自己可获得的利益；而且激起西欧人貪得无厭的欲望达到一种危險的程度，这一欲望由于十字軍东征而激增，并注定要在 1204 年毀灭帝国才能求得滿足。

当 1081 年諾曼人圍困都拉索时，威尼斯人已控制亚得里亚海并对利凡得商业深感兴趣。皇帝亚历修为了获得威尼斯人的援助，把帝国內不下于三十个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本城在內的免稅权利贈給威尼斯商人。无怪乎这一行动被說成是"經济癲狂"的行为。

希腊教会也須对帝国的衰敗負担一部分責任。在譴責东方帝国时，在說明它毀灭的原因时，历史可公平地把很大部分的責任归于希腊寺院制度。在东方宗教史上，再也沒有一章比它更令人鄙視的了。964 年奈斯波拉斯·弗卡斯曾禁止建造新寺院，并諷刺地提醒僧侶們注意：寺院理想和它們的規程所教导的，是禁欲主义和貧困。这禁令不久就有明文規定了。巴錫尔二世虽曾征服过保加利亚人，但旣沒有勇气又沒有力量来取締寺院制度的弊端。988 年奈斯波拉斯的受人反对的詔令被正式廢止。在十一世紀的紧張局勢时期，伊撒克·昆尼諾斯和后来他的兒子亚历修·昆尼諾斯有一时曾大胆夺取寺院的剩余財物；但是由于瀆神罪和破坏圣象的呼声，他們不得不停止进行。在 1158 年，麦紐尔·昆尼諾斯又重申反对新寺院的詔令；結果，城市由于瘋狂群众的搗毀而破碎不堪，乡村由于被僧侶煽动的一些暴怒的农民的掠夺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們燒毀皇室領上的田庄、倉庫、干草堆和谷物。东罗馬帝国在十字軍前夕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十五章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擴張*

在上面的一章里，关于东方穆罕默德教文明的历史，我們曾講到750年巴格达的建立为止；現在再从这个时期起，接續講到1096年十字軍的开始。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在它的最盛时期，領土辽闊，从阿姆河到非洲的黎波里，从阿拉伯沙漠到高加索。可是它的核心是在阿薩西德和薩薩尼波斯。埃及、里比亚、的黎波里、巴勒斯坦、叙利亚、亚美尼亚和乔治亚，都可認作藩屬，因为这些地方的主要的人口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罕默德教徒。这些地区可以說构成一个外圍，构成西亚穆罕默德教世界和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間的一个屏障。当然，我們将按照这項差别来叙述哈里发国家的商业和工业；然后討論它的对外貿易。

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包括八个省(几乎每个省可称为国家)：(1)美索不达米亚，即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它的地面上"确实散盖着古代所遺留下来的瓦礫……屬于巴比倫时代的碎磚……穆罕默德教还正在孩提时代所燒成藍色的瓦片"。在这历史性的低原省內有下列主要城市：巴格达、瓦塞特、庫发、巴士拉、摩苏尔和勒卡。(2)阿达尔拜疆。它的主要地区是：塔布里士和阿达貝尔。(3)米太，阿拉伯人称之为阿尔·朱巴尔。那里的大城市是：柯尔曼、哈馬丹、雷和伊思巴罕。(4)庫昔斯丹位在阿尔·朱巴尔之南，有塔斯太和阿瓦兹两城。(5)法斯，即"古代波斯和波斯王国的搖籃"，綿亘

* 地图：錫培德：《历史地图册》，第53，102—103頁。

于庫希斯坦之东，濒波斯湾。法斯的最重要城市是：歇拉茨、栖拉夫和雅兹德。(6)法斯的东面，即柯尔曼的一片荒蕪地区，有柯尔曼和赫尔馬茨两城。(7)塞斯坦省跨越沙漠，对着柯尔曼。(8)哥拉森，即“波斯的东方大省”位在塞斯坦的西北。这里有4个重要城市：尼沙普尔、麦尔夫、赫拉特和巴尔克。

每个省有着某种形式的地方企业——农业、紡織业和制造业，使它获得經济的重要性。下美索不达米亚以地上天堂著称；因为土質肥沃而又有很多灌溉运河。易宾·霍卡尔是一个商人，也是第八世紀中的一个旅行家和作家；他說过，那里有着多至十万条灌溉运河，其中有两万条运河可航运的。巴士拉城周圍，是富饒的牧場，牧場外还綿亘着枣椰树林，这里生产的枣椰子就其重要性来說，占到哈里发国家出口物的第二位。枣椰子收获的时节，好象乡間的节日，所有邻近的农場上都是采集熟枣椰的人。有些人对捕魚有兴趣，有些人从事于編席，还有些人在玻璃工場做工，制造那些嵌着藍色装飾和題詞的雪白玻璃灯之类的东西。在巴格达，制造出彩色玻璃和花紋玻璃，昂貴的散金框子是用这种玻璃造成的。其他出品还有：水壺、碗、杯、碟以及各式各样的玻璃瓶。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勒卡有着优良的市場，是大量貿易的中心。它是以木瓜、橄欖油、肥皂和制笔蘆葦著名的。阿密德是以它的羊毛和麻織品出名，而首府摩苏尔，是以棉織品(薄棉紗布)、谷物、蜂蜜、炭、干酪、奶油、水果和鹹肉聞名的。阿达尔拜疆富于水果园，并有出名的养羊牧場和葡萄园。然而，主要貿易在于馬匹和牛羊和制成品，而在制成品中，有絲綢、綿羊毛衣料、麻布和羊毛。这些东西染成深紅色，然后制成为腰带、起稜的被单、毛毯、地毯、椅墊和幕布。

在通过米太或阿尔·朱巴尔的哥拉森大路上，有以干酪和番紅花，也以狐皮和貂皮、錫和造船著名的哈馬丹。在这地区內，棉花紡成紗，然后染成藍色；雷的条紋外套，是出名的；針、梳和大碗

是为出口而制造的，后两种东西是用塔巴里斯坦森林的細紋硬木来制成的。雷还以桃子和甜瓜、干枣椰和鹹肉出名。另有很多其他物品，例如，大衣、皮囊、射手用的弓、馬勒、踏蹬和挂鎖是从那里出口的。

庫昔斯丹的土壤，特别适于种植甘蔗。在第十世紀后期，穆卡达塞写道，在他的时期，唯一出口的糖是从这个省内运来的。其次，在这个时候，阿瓦兹有着大型儲棧，从内地城市来的商品，在轉运到巴斯克最后出售和出口之前，堆儲在那里。塔斯太周圍有着园地，在那里盛产葡萄、桔子和枣椰子。本城出产世界聞名的錦緞、地毯和精致布匹。庫昔斯丹的运輸甚为簡便，因其河流和运河均可航行船舶。还有起自巴斯克及其他附近城市而集中在阿瓦兹的陆路。

法斯省一向是以玫瑰油精出名的。易宾·霍卡尔說过，玫瑰水从这里运到印度、中国、哥拉森各地去，也运到非洲西北部、叙利亚以及埃及。棕花水、香油以及用芹菜、睡蓮、水仙、素馨、桃金娘、甜薄荷、甜瓜和桔子各种花所制成的軟膏，輸出到东方去。此外，法斯还以出产毯子、綉品和錦緞衣料著名；这些东西是专为供苏丹使用而制造的。这些产品上織有代表苏丹的縮写花字。另外还有用金綫織成的、綉花的孔雀藍和綠色的毛織品，也是专供王室使用的。从首府歇拉茨运来的有：薄紗、錦緞和生絲原料以及制外套用的細布。波斯湾上的栖拉夫城，在商业上和巴士拉城相竞爭。据說，在第十世紀，它曾是波斯的主要港口。它制造品質优良布巾和亚麻幕布。作家伊斯塔克里說过，法斯最富的商人是住在栖拉夫港口。他們用从森杰地区运来的麻栗木所建造的那些巍峨大廈便是一个証明。有一个商人甚至用了三千第那建造他的住宅。

在商业方面，柯尔曼的地位远遜于法斯，虽然当地有棗椰子輸出哥拉森，靛青运銷法斯，谷物运往波斯湾上的赫尔馬茨。关于塞

斯坦的出产，穆卡达塞只談到棗椰子簍（Zanabel）、棕繩和蘆席。庫希斯坦以毯子、跪拜墊氈及棉麻織物商品著名。易宾·霍卡尔說过，哥拉森最著名的出口貨是来自尼沙普尔和麦尔夫的，后者尤其是織造一切絲綢、棉布及各种幕布的地点。在那里的市場上，还可看到綿羊、駱駝和突厥奴隶；那里也制造象头巾料子、麻布、呢絨、錦緞、羊毛布、外套、細綫这一类的东西。来自尼沙普尔的藍宝石是很有名的。

为了維持这些产品的交換，阿拉伯人曾設置出一种从大商路分出来的精細道路系統。这些道路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到麦加进香的便利；但是，阿拉伯人把貿易和宗教結合得十分密切，所以对其中一項的改进便等于改进了另一項。各省中最著名的道路，是哥拉森大路。这一条路以伊拉克的巴格达为中心，向东北到赫尔文，向东到柯尔曼沙，前行到东朱巴尔的雷，越沙漠到尼沙普尔，經塔斯和麦尔夫，再經布哈拉和苏格第亚那的撒馬尔罕到印度和中国边境上。上面所提的几个城市——柯尔曼、雷、尼沙普尔、麦尔夫和布哈拉——是通达其他城市的支路之交点。

关于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工业，柏香写道，“各种行业在各自的首領（政府对于他們是管制不多的）之下，分为若干行会和工业集团。它們……管理各个行业，奖賞勤劳者，处罰狡詐者；正象今天我們在开罗还看得到的那样，他們有作为个人为其成員申辯的义务。”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工业活动，和它的农业生产与商业企业，并駕齐驅。对于制造金屬和紡織花样繁多的織品，它具有特殊的专长。各地的棉花产品以及摩苏尔、阿密德和尼西柏所制造出来的麻布，聞名于全世界。高价的紅色和黃色“摩洛哥”皮革，也同样出名。巴格达城以珠宝、金銀花瓶、陶器、綉品、絲綢等产品著名。东北方的斐加那輸送大量生鉄到巴格达来。从柯尔曼，沿着波斯湾，运

来熟鉄以及武器和盔甲，而这些东西有着很大需要。宝劍是从叙利亚运来的，但大馬士革的宝劍在較后期才出名。現在，从所找出的遺迹来看，穆罕默德教徒在煉鋼方面曾达到高度的优良技术。

关于織布业，各省有着自己的特征。在伊拉克，有很多东西，用羊毛、棉花和駝毛制造出来的。柯尔曼出产很精美的布匹、头巾料子以及边飾美丽的头巾。巴格达在織品方面变为这样出名，以致其他省分制造贋品，来冒充巴格达絲綢或棉布出售。南阿拉伯半島，象在后来的时期那样，以錦緞、麻布和絲綢出名。在亚丁，制造并輸出外套。棉花、絲綢或麻布用在縫制漂亮衣服，而羊毛和駝毛大多用于制造粗糙的外套、大衣、毯子、帷幕和被单方面。

縫制这些服装的料子总是很美观的；阿拉伯人之所以重視精巧手艺，是因为古兰經推荐它作为上帝所喜悅的事情。在这方面，东方的成就是卓越无比的。阿拉伯人对这种美观衣料的需要，起于亚洲人愛好文雅和仪表漂亮的旧风俗，起于波斯人嗜好閃閃发光的顏色、漂亮衣服和黄金色；所有这些风尚，阿拉伯人在和这些民族的接触中感染了这些喜好。这項需要的另一原因，是宫廷中奢侈风气的日增。衣服越来越昂貴，而当时还流行着那种波斯旧风俗：統治者在举行隆重典礼时，应以皇家衣袍賜給王公大臣，而这些衣袍的价値应相称于王公的官位；此外，贈給大使的礼物一般也是奇珍而又昂貴的。不仅对于哈里发本人，而且对省长和他們的女眷，也贈送礼物。为了使礼物更加珍貴，执政的哈里发把他的名銜用金綫綉在或織入所賜的衣袍上。这类事情如此重要，以致設立特别店鋪来办理，并委派一个最可靠的王公主管其事。庫昔斯丹的一个省长設立了这类店鋪达八所之多。

有錢有势的阿拉伯人，不仅穿着昂貴的服装，而且用眞正的东方奢侈品来布置他們的住宅。所以，除了織造服装料子外，織机上还需出产大量帷幕和毯子之类的笨重产品。庫昔斯丹的塔斯太城

出产有特别艺术性的挂布和帷幕，綉着金綫人物象。据說，塔斯太城曾供給麦加城卡巴庙的帷幕。

关于东方毛毯編結的历史，我們知道得很少，除了它在穆罕默德教兴起之前已經存在这一事。在第六世紀，波斯薩薩尼朝諸王已有这类毛毯，象在特息丰科斯洛厄兹王白宫里那一条毛毯那样。

然而，伊斯兰教由于严厉禁止一切偶象画片的緣故，毫无疑問使艺术的表現集中在这个特殊領域里，而又加強起来。它鼓励在毛毯編結上表現自然界的形象。这些花样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部族和种族里，逐漸成为常套。有些部族严格模仿它們原来的模型发展图案，另外一些部族轉向純粹几何画的形式。后一种，主要在于原来和蒙古人血統强度混杂的部族，而雅利安族則保持常套的花卉草蔓的模型，早些时候，还保持走兽形象的模型……

毛毯編結的艺术，在它傳入城市之前……已在游牧部落中兴起。这种工作起初是由妇女兒童們来做的。漂泊的牧人在荒野上牧放牛羊，在帳幕下躺在空空的土地上时，欣賞着到处遍开有如毛氈的花草；这自然风景在春季的几星期中，形成了一幅奇异的鑲嵌細工；但好景不长，在夏季烈日之下，它們迅即消逝，只剩下一片枯草和塵块。这一单調的风景，沒有别的景色可以調节；其他的季节中，不是滿地布着干枯褐色，便是一片白雪。可是，这短暂的开花季节，在漂泊于亚洲大草原上的部族的理想里，不失为难忘的一段日子。他們渴望把这风景永远保持下去，使它在干燥风塵的日子里，在霜雪滿地的日子里，也能够留在他們的周圍；由于这一愿望，他們就用他們周圍沙漠植物，煎出色水，染出五彩的綫，装飾那些黑駝毛帳幕的粗席……

中世紀阿拉伯作家，尽东方幻想的能事，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波斯薩薩尼朝国王科斯洛厄兹的著名“冬毯”。“冬毯”的目的，是要使国王在严冬的几个月里忘掉滿园春色的消逝。当时，他的园丁致力于編結这条毛毯，模拟春季的花壇、潺潺的溪流、紆曲的小路和青枝綠叶的树木。我們看到后来的毛毯还竭力模仿有溪流、花树、花壇和小路这一种花园图案。由此我們可略知这类毛毯的起源。城內居民象草原游牧人一样，也渴望春天的回来。他們企图使那轉眼即过的嫵媚季节永远存在，长駐左右不离。所以，很自然的，中世紀具有高度文明的波斯人逐漸改进了毛毯的編結艺术，直到它們成为手艺上的眞正奇跡，而对后来的一切图案影响很大。这类毛毯表明了：艺术

和文明同登了最高峯这一事实①。

制造幕帳跟着挂帷和毛毯的編織而发展起来。幕帳对东方人說是必需的，因为他們常常去麦加城旅行，而且在漫长的旅程中，他們很少宿处。幕帳可用以避日光和风雨；而且輕便而易于携带。其中有的是很奢华的。哈倫·阿尔·拉希德在旅行时所携带的幕帳，是用黑緞制成的。柱子是鍍銀的，环圈是黄金的，繩子是用各种顏色的羊毛或絲綫編成的。幕帳的內部鋪有昂貴的肩巾布。有的幕帳是圓形的，有的是方形的；旁人所常用的幕帳有一个頂和两个側面；还有一种式样非常簡单的幕帳，仅仅是一方帆布，張在两根柱子之間，作为避日光和风雨的場所。

阿拉伯人随着他們奢侈风尚的增长，逐漸注意珠玉宝石；波斯湾內有采集珍珠的地点，而波斯的山区里出产宝石。他們还使用粉刷术来装璜墙壁和屏风。馬克立西告訴我們，在斯拉的有一所繪图学校，还有两个住在宰相巴苏里家里的画家，他們的作品表明繪图和粉刷术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哈里发国家本土上这些工业的活动，大大地受到外来思想的鼓舞，而这些思想是从有交通联系的外国傳入的。珍珠和宝石来自錫兰；用亚麻造紙的思想自中国傳入。这种工业最早在撒馬尔罕发展起来的。有一时期，东方的麻造紙和西方的棉造紙有着很大的竞爭，虽然麻造紙直到十三世紀上半期才輸入欧洲。当然，在很早的时候，关于桑树和养蚕的知識，已从中国傳入。桔子、檸檬、甜瓜、稻子和靛青，最初是从印度来的。

哈里发国家另一种自然产品是香水，那是用阿拉伯和波斯的香草、花朵和水果制成的。还有玫瑰油和芹菜、柳兰花、素馨和甜瓜等油。阿拉伯以产乳香和沒葯出名。穆罕默德教徒还以他們的

① «活的时代»杂志，1925年11月14日。

蜜糖、蜜漬果脯出名。其中最基本的是农业——种植甘蔗、番紅花、指甲花(专供制造化妝品的)、棉花、亚麻和桑树。棕树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为阿拉伯人把它看作上帝的一种礼物，而这种礼物只賜予信徒。这些地方的居民很喜欢种植葡萄、花草和果树的花园。他們知道怎样生产各种品种的水果、香味葡萄、形状异常的桔、梨。他們懂得怎样接枝和接芽。他們通过玫瑰和扁桃树的杂交，长出稀奇美丽的花卉。而且，他們知道怎样訓練良馬、飼养小鳥、鴿子和家禽。

"巴格达繼承了巴比倫、塞琉息亚和特息丰各古城的光榮傳統。巴格达看来眞象一座地上天堂:它位于阿巴斯帝国最富庶地区的中央;由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及其无数支流很好地灌溉着;四周有花园环繞着，在那里既有自然风景又有巧夺天工的設計; 此外还有水陸两路与外界密切地相联系……在城中之城內住着数以千計的王公大臣;哈里发宮殿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庭院寬广，寺院聳峙;周圍林立着那些依靠供应宮廷奢侈品来維持的各行业街区。河东岸上，有时髦的住宅区，埃耳·馬第所造的宮殿，巴米賽大族的宅邸和花园。数不淸的寺院尖塔象高高的塔心草般地高插云霄。"①

巴格达历史，从那豪华放蕩、揮金如土的王家浪子哈倫·阿尔·拉希德时代(763—809年)到蒙古人劫掠巴格达城止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記載着几乎神話式的富饒和非常繁荣的状况。

由哈里发亲自督察而管理良好的进貢和納稅的程序，国內河流和灌漑运河网的密布、附有棧道、桥梁、商队宿舍的公路系統以及使用乘馬信使的驛站制度;这一切使它(巴格达)能够把外界的財富源源不絕地吸收进来……在鉄一般的行政管理下，农业和商业，即国家繁榮的两个砥柱，必然会欣欣向榮的。由于科学的运河制度和从古代留傳下来的灌漑工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为"凱密"，即"黑地"(埃及)的竞爭者。在那里种田的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获得利潤，不象那些純粹靠天吃飯的人們，必須依靠变化无常的雨水。

① 柏吞:《天方夜譚》，第10章，第167頁。

广大矿場的遺址證明:公共富源沒有被忽視；航运法律鼓励了运輸和交通；捕魚的命令，旨在发展阿拉伯人的一項新的实业部門。黃金从世界各地的源源流入、豪华奢侈宮廷的存在，以及那样一个文明所需要的新艺术和新工业曾給予貿易和商业、制造业和手工业，以实質的鼓励①。

在薩第的«花园»一書里②，我們看到一幅出色的图景，描写在哈里发国家盛世一个巴格达商人的广泛兴趣。

我認識一个商人，他有一百五十头馱貨的駱駝，四十个跟从的奴隶和仆人。有一天晚上，他在波斯湾凱希島上他的住宅內招待我，我們接着談了一整夜；他說："在土耳其斯坦，我有这样一个貨棧；在印度斯坦我有那样一批貨物；这个是某某大庄园的抵押契单；那个是某某个人商号的債劵。"接着他說，"我想到亚历山大城去，那里的空气，对健康是有裨益的；但不能办到，因为地中海并不安靜。啊，薩第，我想再作一次旅行。这个願望实現以后，我就从此退隐，不再經商了。"我問道："什么旅行呢?"他答道，"我准备把波斯的硫磺运到中国去卖，据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得高价；然后我再把中国的陶器运到希腊；把希腊的或威尼斯的錦緞运到印度；再将印度的鋼带到阿勒波；把阿勒波的玻璃器运到也門；然后带着也門的条紋衣料，回到波斯。此后，我将放弃国外貿易而退居于一所大商店里。"

叙利亚和埃及一样，主要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披着伊斯兰教文明的外衣，这一件外衣在叙利亚內地比在沿海岸要厚得多。叙利亚所感受的政治上的变迁——十世紀叙利亚在一个地方王朝統治下脫离巴格达国家而独立，十一世紀埃及法提馬王朝統治它，繼在1086年塞尔柱土耳其人推翻法提馬朝統治而占有它——对它的商业繁荣，影响很少。我們必須清楚地区分东方或內地叙利亚和西方或沿海叙利亚；在沿海区叙利亚人口比較稠密，还加上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在內地，主要城市有:北部的阿勒波和南部的大馬士革；在沿海还有安提阿、太尔和的黎波里各重要城市。

---

① 柏香:«天方夜譚»,第 10 章,第 173—176 頁。

② 薩第是波斯詩人，生于 1184 年。«花园»(gulistan)是他的最著名的作品。——譯者

阿勒波位于一个众山环抱灌溉充足的平原上，濱沙漠边緣；从远古以来，它就是从波斯湾到幼发拉底河的商路，和来自中亚队商路之集合点；貨物都从那里轉运到地中海各港口。十世紀中叶以前，阿勒波隶屬于巴格达哈里发国家，但在948年，被一个地方王公所占夺。他的竞爭者請求拜占廷干涉；因而在961年，在短期內它被罗馬帝国占領。但甚至在帝国退出之后，拜占廷商人在阿勒波仍保有商业上的特权。在双方所签訂的条約里，有一項条文規定：保护那些在阿勒波經商或偶然經过阿勒波城及其領土的希腊商人。希腊商人在阿勒波境內不受騷扰；希腊队商从希腊領土轉入穆罕默德教領土后，給予充分护卫直到他們抵达阿勒波城为止。列在应課稅貨物表上的有黃金、白銀、希腊絲、生絲、錦緞、棉布衣料、麻布、宝石、珍珠、牲口等等。从这一条約，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为商业中心的阿勒波的重要性。它是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也是队商从小亚細亚和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巴格达、波斯和印度的一个集合地点和在地中海和亚洲內地之間的一个停留站。阿勒波在十二世紀曾三次被毁于地震（1114、1139、1170年），而三次重行建造；在十三世紀它曾两次被蒙古人破坏（1260、1280年）。

大馬士革比阿勒波更大，位于叙利亚灌溉最充足的平原上。的确，它是这么富饒，这么秀丽，以致初到那里的阿拉伯人看来，它几乎眞象一座地上天堂。大馬士革正象阿勒波一样，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重要商路縱横交会之处，而且从辽远的历史时代以来就是一个大商业城市。如上文所說，它是穆罕默德教政权在阿拉伯半島以外的第一个首都；甚至在哈里发国家的首都迁到巴格达以后，大馬士革还保留着它的重要地位。它很早脫离了巴格达而落入埃及手里。大馬士革的鋼在十字軍时期馳名于全世界，但大馬士革的布匹的名气也不遜色。大馬士革与埃及的貿易很盛，尤其

是在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的时期。它也有自己的聪明而又辛勤的工人。他們織造各类的絲綢;所出产的金綫綉緞織造得非常好,仅次于伊斯巴罕和尼沙普尔的出品。它的蜜餞和染料也是著名的。它是为到麦加去的队商而設的主要供給站。在这一方面大馬士革胜过了近东任何其他城市。

阿勒波和大馬士革作为內地城市来看，是面向东方的。但安提阿和的黎波里是地中海城市。安提阿,位于风景秀美、土質肥沃的奥倫梯河平原上,它不是一个海口,但邻近海岸。它位于两条商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从幼发拉底河到海岸的重要商路;另一条是在黎巴嫩和安替力巴那之間广闊盆地上的商路，經过西里西亚大門而达小亚細亚。安提阿是拜占廷和伊斯兰教間爭夺得最激烈的一个城市。

从 638 到 969 年的时期,安提阿是在穆斯林統治之下,从奥米耶朝經阿巴斯朝到法提馬朝,直到 969 年皇帝奈斯波拉斯·弗卡斯克服它为止;而在 1081 年,正在十字軍开始之前,它又落入塞尔柱土耳其人手里。在这四百年时期中,安提阿的历史,是一段衰敗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地震破坏了城市，而拜占廷和波斯間以及拜占廷和伊斯兰教間的长期战爭,又使它周圍的乡村遭受蹂躪,程度十分严重，使得农村居民回到半野蛮的状态。匪徒，甚至獅子,侵扰了道路,以致它和阿勒波与幼发拉底河的交通路綫受到損坏。另外,必須記住:安提阿不在沿海岸,只依靠着圣西緬小港,所以它从来沒有从地中海沿岸貿易获得了多大利益。

在阿拉伯占优势的整个三百年时期中，两帝国(阿拉伯和拜占廷帝国)間的和平时期是很少的,因而交通是困难的。事实上，在較早时期，是有一条寬广的备受破坏而无人占据的地带，通过阿拉伯屬叙利亚和“拉謨区”即小亚細亚之間。拜占廷船只駛入罗馬海的沿岸的几个协議的港口……在这些世紀中,由于安提阿的从屬地位，我們不可能作出任何有关的叙述。历史

家很少提及它，我們的資料大部是从阿拉伯地理家和旅行家得来，而他們所描写的是这地方的自然形势、它的貿易和物产……商业是相当活跃，也有少数新工业傳入。甘蔗从波斯傳入，种植于沿海岸上；在十世紀，桔子也从印度傳入，桔树林种植在安提阿周圍及其他城市里…… 紡織业在全境內都很活跃，因而阿拉伯文“安提阿”（Antakiya）这一名詞，获得了“被单”或“毯子”的意义。織造絲綢及其他貴重衣料的技术，已經有了高度的发展；并已能制造棉造紙，此外，在戴克里先时代已首次提到过的一所兵工厂，还繼續存在…… 不論对阿拉伯和拜占廷文明各自的优点所抱的見解如何，几乎无可置疑，它的地位，由于一个穩定政府的建立(969年)，已有所改进，因为在前些年代里这个城市曾遭到各部族的冒險傢伙輪番的劫夺。然而，从人口的性質(利凡得人种族混杂，他們略知希腊文，但更熟悉阿拉伯文，他們信奉基督教，但浸沉于粗俗的迷信和聖跡的崇拜）来看，也談不上有什么复兴的①。

十一世紀后期，当阿馬斐和威尼斯商人开始常到圣西緬港口的时候，安提阿开始复兴。到了十字軍东征的时候，安提阿又变为一个重要市場了。

太尔位于突出海面的峻峭地角上。因此，它在穆斯林統治时期較之安提阿繁荣。在它的旧工业之外，又添加了制糖业。但它的商业因有海盜的騷扰而遭受損失，直到奈斯波拉斯·弗卡斯在十世紀后半期，由于征服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而恢复了拜占廷海权为止。在下一世紀，阿馬斐、威尼斯和比薩商人的来临，进一步帮助了太尔的复兴，而在十字軍的前夕，它已是“一个风景优美、工商业兴盛而財富富足的城市”。正是在叙利亚港口，西欧人首次接触到砂糖。砂糖在出口品的地位上，几乎和絲綢相匹敌。絲綢制造业，由于获得种类繁多的染料而有所提高；紫色染料来自海里，而茜草根和靛青植物則在奥倫梯河流域培植。

亚美尼亚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之北，向北延伸到高加索和黑海南岸，向西延伸到小亚細亚和希腊帝国。阿拉伯人和这一地区，有

① E.S. 鮑徹：«安提阿簡史»。

着广大的貿易。境內虽多山岭，但它的河流盆地是很肥沃的。山中出产木材和金屬。养羊是一項重要行业，而貿易上对亚美尼亚羊毛的需要是很大的。象在古代那样，亚美尼亚一般通过幼发拉底河，来供应美索不达米亚的食粮。得比尔是亚美尼亚省的主要地点；它所产的大部羊毛，是在那里进行加工的。著名的紫色地毯就是用这里的羊毛制成的。这种顏色是从常見于阿拉拉特山周圍的一种虫得来的。

兰恩省，即現在的乔治亚，位于亚美尼亚之东，靠近里海。它的首府是梯弗利斯。在这里，大規模地进行养蚕。这一省通过伏尔加河与里海北岸的斯拉夫居民貿易——主要是同喀扎兒人及保加尔人(他們住在喀扎兒地区之外)貿易。这些部族是独立的，但受到阿拉伯人的商业影响。他們有着几个城市和某种政治組織，从事农业，同北方和东方居民并与波罗的海区有广泛的貿易。

埃及在 866 年脫离了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在 969 和 1171 年之間受法提馬朝的統治。从阿拉伯征服后 330 年时期中，埃及人口的混合过程进展迅速，产生象今天这样的埃及人；穆斯林占人口中的大部分。在早期良好国君的統治下，埃及的人口和商业都有所增加。

《地方志》(雅庫比所著的一本地理書，約在 891 年出版)告訴我們說：在那个时期法斯塔特約占亚历山大城面积的 1/3；亚历山大城是埃及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上埃及的阿士曼納，以大規模織布厂著名，提尼斯以織布和金綫綉花著名，亚历山大城、达米伊塔(达馬亚特)和沙塔以錦緞和金綫綢布著名，法雍以帆布著名，息烏特以毛毯著名，阿克民以草席和皮制品著名，大哈以陶器著名。在那个时期，象在古代一样，埃及的大宗出口品是谷物(麦子)，主要是运往汉志去的。①

这新王朝的权力，在十年以內，扩充到叙利亚；現在埃及的版

① E.W.雷因：《中世紀时代的阿拉伯社会》。

图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細亚延伸到巴尔加①。这新政权的創始人，阿默德·易宾·图倫是一个賢明而又有才干的統治者。"尽管需要大量經費来支持他的宏偉計划和豪华建筑以及他的宫廷浪費，他不仅沒有提高賦稅，反而取消新稅；他提倡农民占有土地制，用近代术語来說，即自耕农制。所以他的进款与其說是从勒索，不如說是从改进农业得来的。他給国庫遺留下一万第那。"埃及所达到的富饒和繁荣程度比以前要大。然而，这种繁荣表現在商业方面的比在农业方面的多。阿拉伯人，作为农民来看，从来沒有什么了不起，但作为商人来看则一向是出色的。这一事实，我們从他們农业的衰敗上看得出来；阿拉伯人对农业以及农业亟需的灌溉制度的毁損，是漠不关心的。地稅的减少，也可說明这一点。

但是，埃及这种农业的衰落，从法提馬朝时代的商业和工业的大量发展，获得了部分的补偿。国家的物質財富增加得駭人听聞。有一位埃及公主，死时遺下五袋綠柱石，其他宝石不在其內，此外，她还遺下三千只銀器、三万方西西里綉品、九十只水晶瓶。另有一位公主，临死留下一万二千件絲綢衣服。埃及的織品、玻璃和陶瓷品傳遍全世界。福斯塔特所制的陶器的透明程度，使一个人能透过它看見自己的手。开罗和亚历山大城所織的絲綢如此細密，以致整个一件衣服可以穿过一只指戒。阿塞厄特織造头巾布，貝特尼薩制造白色呢絨，达米伊塔成为斜紋布的名称。

然而，法提馬朝不能长久維持在868年和969年間所获得的优势；在这时期，埃及艦队把西西里和非洲沿岸控制在它的勢力之下，甚至侵掠摩尔西班牙的沿海岸。但在此之后，埃及的商业和造船所都衰落下去。埃及和非洲各地間的联系瓦解了。叙利亚企图叛离。965年的时疫已使埃及受到大損害。而在埃耳-哈金时代

① 巴尔加(Barca)在北非洲，位于的黎波里之东。——譯者

(996—1021年)尼罗河又連續三年沒有泛濫。另一灾难,是国王的瘋狂行为,他的暴政竟至封閉市場和驅逐商人出境。1025年,尼罗河又一次沒有出現泛濫,所以国家在貧困和暴政的夹攻之下,走到毁灭的边緣。"公牛价格漲到每头五十第那,还必須严禁宰牛,以防灭絕。馱物駱駝很少,而作为埃及人普通食物的家禽,却連找也找不到了……老百姓由于飢餓而生病以至死亡,壮者变为盜匪,搶劫队商,甚至朝拜圣地者;道路上盜賊充斥……国庫空虛,賦稅拖欠,奴隶暴动。"①

后来,埃及从虐政和天灾里获得了轉机。1046年,有一个旅行家,在埃及看到繁荣和安宁景象。有魄力的宰相厄尔-雅苏里(1050—1058年)大胆采用了改进农业的措施:他禁止小麦的投机交易,取締高利貸者的可恶行为,即买进谷物青苗与屯貨居奇勾当。不幸,这些措施遭受阻碍;1050年,尼罗河的汛信又未至,而时疫和飢饉还接踵而来。1055年埃及政府曾企图从克里米亚購买二百万蒲式耳谷物,但拜占廷政府坚持要和埃及签訂攻守同盟来反对巴格达哈里发国家作为一項条件,因此,这計划作为罢論。这正是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巴格达得势(1058年)的时期,也是十字軍东征的前夕。但是,更大的灾难,方兴未艾。在七年的长久时期中(1065—1072年),尼罗河沒有出現过一次泛濫。于是,1025年的混乱局势重演起来,并延續了好多年。土耳其和黑人队伍喧变起来,它們的散兵参加了普通股匪;沙漠中的貝督英人又来侵扰边境。开罗和福斯塔特的接济被割断。水壩坍倒或被破坏。飢饉到处流行。乡村中已看不見一头家畜。在哈里发可容万匹馬的厩舍里,只剩三匹馬了。街上行人时遭暗杀而被吃去;人肉甚至公开出售。連最富的富翁也变为穷汉;他們出售珠宝、家具、房屋以換取

① E.W.雷因:«中世紀时代的阿拉伯社会»。

食物。当时有三个总督充当浴室堂倌。宅邸和宫殿遭受洗劫；所有珠宝、器皿、絲綢、家具、貨币都永远散失。藏書十万卷以上的王家图書館被毁，而这图書館是代表伊斯兰世界的智慧的。这項損失，仅次于第五世紀亚历山大图書館被毁的損失。埃及居民紛紛流亡出境，那些最富的家族都迁往巴格达。

最后，在1073年，尼罗河回复了慣常的泛濫，因此得到了一次丰收。哈里发因为被土耳其人卫兵逼得走投无路，召来了一个前亚美尼亚奴隶并委派他为宰相。这个人在叙利亚战爭中已升登高位，并以敌对土耳其的压迫而出名。他恢复埃及的法律和秩序，修建水壩和公路，于是开始征討黑人和沙漠部族(1076年)。"农夫在他的强大、公平和仁慈的統治下，不久就享受到好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安全和繁荣。1090年的一个賦稅报告里指出：埃及和叙利亚的稅收，从通常的二百万或至多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一十万第那。"所以，当十字軍开始东征的时候，埃及在政治上是有力量的，而在經济上是繁荣的。隶屬于埃及这样长久的叙利亚，初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領，后被十字軍占領。这項損失，对埃及来說，实在是"塞翁失馬"。

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和埃及的开罗是穆罕默德教世界的商业首都的时候，正象有关伊斯兰教早期扩展的一章里所提及的那样，商业的企业曾把阿拉伯人带到天涯海角去。阿拉伯人在他們征服的过程中，接触到希腊、罗馬世界的地理論文；这些論文激起了他們对地理发現和商业冒險两方面的兴趣。阿拉伯人的地理著作是中世紀文学的一个重要部門。但是，更可奇怪的，是阿拉伯人竟然和古代希腊人或諾曼人一样容易地熟練了航海事业。过去阿拉伯航海家还編写了关于紅海和非洲、阿拉伯半島、波斯、印度海岸的許多引水手册。

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出現了一类新的探險家…… 他們寻找新的商业航路。現在，我們所要講的，就是关于这批探險家及其商业冒險活动的奇异成績。在海上主人翁甚至陸上主人翁中，所有曾經指揮各民族命运的海陸軍优势，再也沒有象阿拉伯人的优势那样，在地理探險領域中，如此遍布着的。全世界就是他們所探險的全世界。他們的船只远涉重洋来寻找新航路，甚至象他們的哈里发在陸地上开辟新通路一样；而他們所有这些活动的根源，在于閃族的商业本能……伊斯兰教的宝劍威力，只是为奴隶主和商人打通道路来跟隨着走而已……在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阿拉伯人在亚洲、非洲和西欧迅速展开的征服，更可令人惊异的事件了。甚至在英語中，至今还存在着阿拉伯海員所使用的航海名詞。我們的"海軍司令"（"Admiral"）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海上司令""Al—mir—ul—bahr"的来源以外，或者我們的"船舶"（"Barge"）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战艦"（"Barija"）的来源外、还有什么来源呢？①

下面我們将开始綜述穆罕默德教在北非領地的状况。

第十世紀，法提馬朝在占得北非沿海岸上优势之后，再向西推进，而到了公元 991 年，所有北非沿岸，远至摩洛哥止，都并入他們的版图。在进行征服的时候，西方的阿拉伯領土，包括北非海岸和西班牙在內，叫做"馬格勒布"或"西方"。后来，"馬格勒布"这一名詞，用以指現在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而"伊夫力基亚"用以称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为了方便起見，非洲領土可分成为：(一)非洲本部，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直到塞替斯；(二)摩里得尼亚，包括費兹和摩洛哥两省；(三)內地。

在这里，和在別处一样，商业是尾随宗教而到的，因而非洲能恢复它古代的繁荣状态。內地是一片炎热的沙漠，但沿海地区是肥沃的。牲口飼养业到处兴盛，因而埃及从这一地区，每年获得大量羊、馬和牛。巴尔加輸出小麦。再向西并在亚特拉斯山脉之北，位着伊斯兰教的最富饒地区之一。农业伸展到辽远的南方，上至亚

① 霍耳狄奇：«印度的大門»。

特拉斯山脉雪水所灌入的河流盆地。农田通常种植着甘蔗和棉花，到处都种植棗椰子；在这地区內，用力少而出产多。山岭出产木材，还蘊藏着銀、鉄、銅各矿。阿拉伯人比伽太基人更懂得怎样利用这地区；后者因为在那里找不出矿苗，曾往西班牙去寻找貴金屬。

到了第九世紀，非洲的穆罕默德教徒，因占有西西里、撒地尼亚、科西嘉各島，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經商民族；他們发展了海权，并希望使地中海成为穆罕默德教的內湖。跟着，发生了他們和意大利与南法沿海城市之間的激烈战争；在阿馬斐、比薩、热那亚各城艦队的兴起之前，在諾曼人逐出阿拉伯于西西里（1060—1090年）之前，优势屬于穆罕默德教徒方面。非洲沿岸上的突尼斯、波那、布吉亚、奥倫、修达和丹吉尔各港口，有着相当大的进出口貿易。这些港口，是非洲产品的倉庫，也是轉运到西欧去的亚洲商品之集散地点。在这里，叙利亚和埃及商船以它們的船貨交換西班牙和西西里商船的船貨。伊伯里安半島被卷入阿拉伯文明和商业圈內，而摩洛哥是深切感受到这項密切关系的好处的。它的首都費茲，对那些从西班牙放逐出来的人們，提供了避难所。这批难民把塞維尔和哥尔多华的各种工业技术傳入这里，其中包括把羊毛和馬革染成紅色和黃色的技术；因而費茲成为很兴盛的皮革市場。那叫做"費茲"的无边紅色帽子，就是在这里起源的。費茲的染色、肥皂和香油是聞名的，它的金屬器也同样聞名的。

在以后几百年中，由于政府統治的稳固，很少发生战争，因而在非洲和意大利与南法城市之間存在着互相友好的关系。柏柏尔人需要欧洲的很多产品，而欧洲国家也是他們很多剩余产物的銷售市場。所以，通商条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南法或意大利城市，时常同北非和西班牙的統治者，締結了这类的条約。

海盜行为，在非洲国家所訂的通商条約里，一向是明文禁止的；然而，海盜行为照旧繼續着，而基督徒所干的最为頑强。希腊人、撒地尼亚人、馬尔

他人和热那亚人，象条約本身所証明那样，是海盗帮会中的最最坏的傢伙。在十字軍的刺激下，商业的增加引誘了这种冒險行为①。

在893和911年之間，非洲各省脫离埃及統治，象埃及本身曾脫离巴格达的統治那样；它們組成了独立国家——巴尔加、的黎波里、突尼斯（开温）和馬格勒布（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古代努米底亚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是驃悍成性而不受羈絆的。甚至他們的宗教，虽然在形式上还是伊斯兰教，但实际上已脫离了正宗的穆罕默德教。从来沒有过一个哈里发，有足够力量来統治这整个区域的。其中以开温为最强。

开温位于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緣上，那时住在沙漠边緣上的人口比今天要密，所有的綠洲比現在还多。阿拉伯历史家易宾·卡尔頓的著作是“在阿拉伯文学中独一无二的历史杰作”；書中記載說：在穆罕默德教征服的时期中，“茫无边际的丛林，散布在的黎波里和丹吉尔之間的广闊地区上，在它的蔭影之下，兴起了互相接連着的小村落。”但今天，这塊土地已变为沒有树木、几乎沒有青草的平原，在那里常可看到，古罗馬油坊的殘破遺址，而現有人口不到从前它所能維持的人口的1/10了。

阿拉伯宗教和商业影响之从东海海岸滲入非洲的中心，是很緩慢的。但是，这些影响从地中海滲入时却并不緩慢。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伽太基曾同撒哈拉沙漠的黑人地区和奈格耳河区，建立貿易联系。但我們不能断定：伽太基商人曾否越过沙漠到那里；这些商人是不是来自乍德湖地区的本地人；努米底亚人和柏柏尔人是不是中間商人。据布尼克人的傳說，有过一个叫作加拉曼德的部族，带了一些馱着东西的公牛，穿过了撒哈拉大沙漠；我們还有公元第二世紀的一段罗馬銘文，指出碎金、象牙和駝鳥羽毛从中

① 兰·蒲尔：«巴巴利海盗船»，第7頁。

非洲輸入了罗馬屬非洲省。但是，我們关于撒哈拉和苏丹历史的眞正知識，是从阿拉伯对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馬格勒布的征服以及駱駝的来到开始的。

阿拉伯人在征服地中海沿岸后不久，就开始伸入沙漠腹地。斐贊王国① 是在徙志节后五十年內征服的。我們有确实的資料知道：斐贊人在第九世紀后期，和科华进行貿易；不久商路从科华延长到乍德湖。但是开温因有过通突尼斯与波那达地中海的出路很快在乍德湖商路上和的黎波里相竞爭，而且，在第九世紀末期前，还在更西的地方，开辟了一条新路，穿过撒哈拉沙漠达奈格耳河弯曲处的桑盖。

开温成为阿拉伯人軍事、宗教和商业扩展的主要基地；他們深入并穿过撒哈拉沙漠，和中苏丹人有了接触。这項成就，按重要性說，堪与諾曼人把北欧国家提到历史舞台上之功績相提并論。阿拉伯人第一次把中非洲(苏丹)和地中海与欧洲取得密切联系。只要記起：撒哈拉沙漠連同它的火热的沙土、山脉、多石高原和分散綠洲在內，按面积比美国还要大这一事实，我們就可領会这項功績的偉大性。我們看到：在第十世紀，另有一条跨越沙漠的道路，即“西方大路”，从摩洛哥經奥杜卡斯特达廷巴克图。这样，就有三条穿过撒哈拉的貿易动脉了。东方和西方两条路标志着沙漠的最狹部分，因为在每一条路上，那肥沃的沿海地象长舌般地伸入这干燥地带內。但那从开温起点的中間一条路是很长的。这些商路的路綫，几百年来都是由綠洲和水井的位置来决定的。甚至战爭也沒有把它們抹去。在綠洲上，有着商队寄宿所，同时也有休息所和儲藏所。这些沙漠大路的长度眞使人吃惊：約有一千五百哩、一千八百哩和二千哩。貨物从乍德湖或廷巴克图运到海岸上，需时九个

① 斐贊王国，在北非的黎波里之南。——譯者

月。貿易的項目包括：奴隶、碎金、树胶、兽皮、象牙、天然碱、駝鳥羽毛(使突尼斯奇怪的是有一次竟运来一头长頸鹿)，用这些商品来交換食盐、棗椰子、珊瑚、絲綢、香料和沙糖。在十字軍东征时期，还有由阿拉伯商人从巴勒斯坦运来的鎧甲衬衫轉运到苏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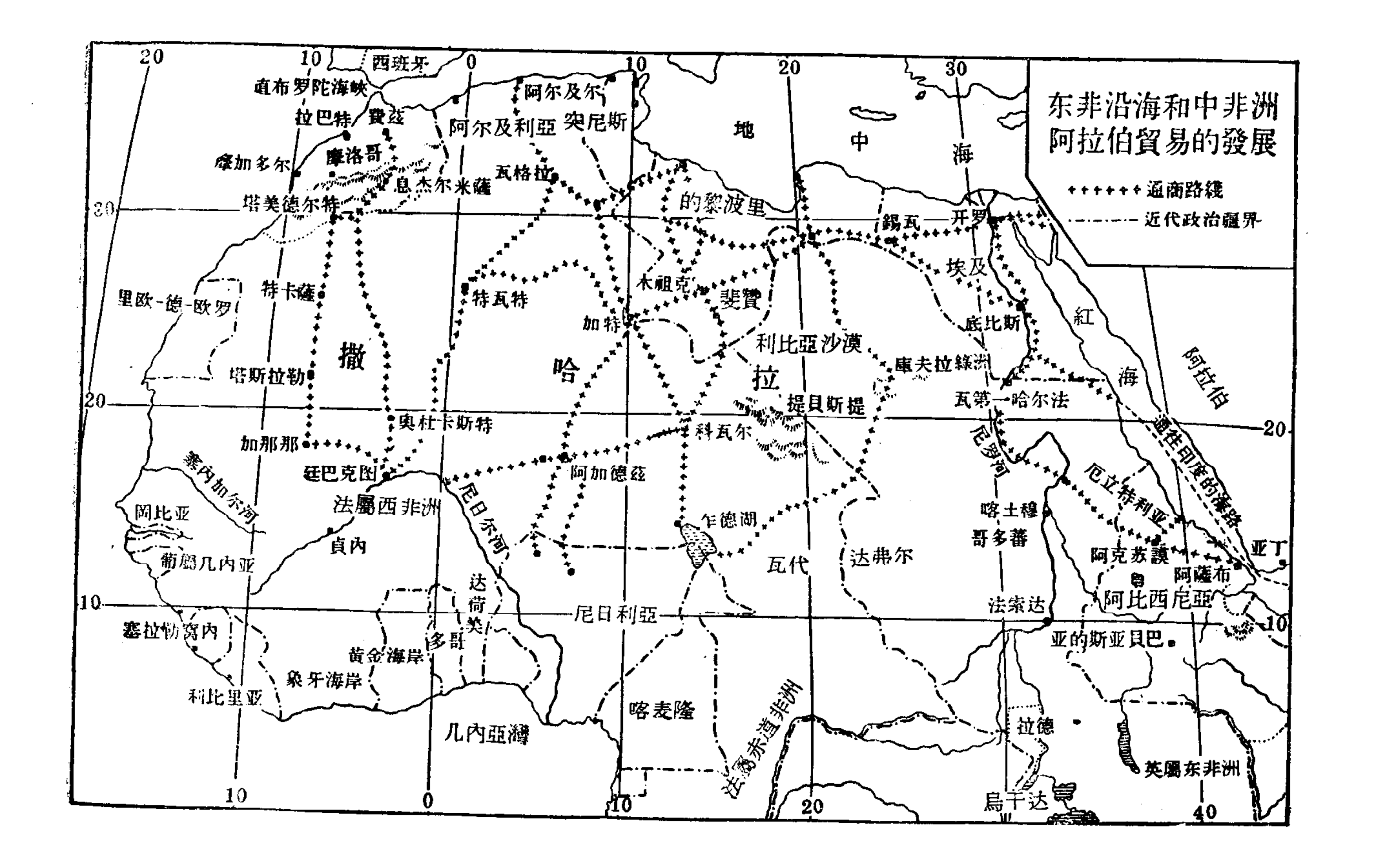
必須清楚知道：苏丹过去不是，現在也不是沙漠地。苏丹的气候分为两个季节：七个月的干季和五个月的湿季。在湿季里，下降的雨量充沛，注入当地的河流：奈格耳河、巴勒加扎尔河、沙立河和塞內加尔河。在这广大无边的地面上，黑人和似黑人的居民，那时和現在一样，也不同于住在更南的較低級的种族。豪薩族人①住在用泥墻圍繞的市鎮里；他們基本上是牧人；他們的工业，是基于牧养牲口和山羊业的，例如，硝皮和制革业(为了这項目的，他們使用一种本地产的植物紅染料)。他們也織造一种粗糙而优美的布匹，用本地产的靛青来染色，在的黎波里、費茲、突尼斯和开溫各市場上出售。“当穆罕默德教商人約在公元1000年来到苏丹时，他們看到一种井井有条的商业制度”——豪薩文化——阿拉伯人把自己的文化盖在豪薩文化的上面。“自从有历史記載的任何时期起，苏丹的北方一带已由比似黑人較高級的种族所占据着。当阿拉伯人在公元第八和第九世紀，經由西方路綫，第一次达到黑人区的时候，他們看到加那黑人国王正是在他們的极盛时期。”②

阿波的·哈金死于870年；他是第一个提及“黑人区”的穆罕默德教作家，但是他沒有关于黑人区的知識。約在一百年以后，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易宾·霍卡尔，关于黑人区还是知道得很少；这足以証明：阿拉伯人的滲入那里是在公元1000年以后。

易宾·霍卡尔死于968年。他逝世一百年之后，在1067年，有人写出了

① 豪薩(Hausa)族，住在尼日利亚北部的似黑人种族之一。——譯者

② 盧加德女士：《一个热带屬国》，第84頁。


东非沿海和中非洲
阿拉伯貿易的發展
通商路綫
近代政治疆界
西班牙
直布罗陀海峡
拉巴特
費兹
摩洛哥
摩加多尔
塔美德尔特
息杰尔米薩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亞
突尼斯
瓦格拉
地
中
海
的黎波里
開罗
錫瓦
埃及
底比斯
紅
海
阿拉伯
里欧-德-欧罗
特卡薩
撒
哈
拉
特瓦特
木祖克
斐贊
加特
利比亞沙漠
庫夫拉綠洲
瓦第-哈尔法
提貝斯提
塔斯拉勒
加那那
奥杜卡斯特
科瓦尔
阿加德兹
廷巴克图
法屬西非洲
塞内加尔河
冈比亚
貞内
葡屬几内亚
尼日尔河
乍德湖
瓦代
达弗尔
尼罗河
喀土穆
哥多蕃
通往印度的海路
尼立特利亚
阿克苏謨
阿薩布
亚丁
阿比西尼亞
达荷美
多哥
尼日利亞
法索达
亚的斯亚貝巴
塞拉勒窝内
黄金海岸
象牙海岸
利比里亚
几内亞灣
喀麦隆
法屬赤道非洲
拉德
英屬东非洲
烏干达

一本書，書中的描写生动，和易宾·霍卡尔的枯燥描写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書名一般譯作«道路和王国»。他叙述整个北非，但关于"黑人区"，叙述得特别詳細；所記載的直接的知識足以指明和苏丹交接的发展……埃耳·貝克里出生的正确日期是可疑的，最有权威的說法是在1028年……埃耳·貝克里的記載，显然可見：苏丹和西班牙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貿易，在长时期內都是重要得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兴趣的……塔非勒特，即阿拉伯人所知道的并經常說及的"息傑尔米薩"，是在到苏丹去的道路上离开摩洛哥肥沃領土的最后一个站……据埃耳·貝克里所說，这市鎮是在公元757年建造的。他說，它位于平原上几条溪流的交接点上，在那里，土壤充滿着食盐，而且非常肥沃。居民种植谷物，其中有"中国麦"……那里还盛产葡萄、枣椰子以及各种水果，此外，它还以制造葡萄干出名。有着一种金币，很奇特的是息傑尔米薩金币的收付，是按照数量而不是按照重量的……息傑尔米薩……是許多条道路的汇合处：这些道路，有的来自瓦吉倫以及巴巴利国家內苏丹貿易的市場所在的其他地点；也有来自摩洛哥、特倫坎和沿海岸的。这市鎮由于有着这些道路的交通綫，成为到沙漠去的最西入口处。在"黑人区"，从息傑尔米薩到加那止，需要約两个月的跋涉，来横过实际上渺无人烟的沙漠……他說，沒有市鎮……除了距息傑尔米薩有五天路程的瓦德·特拉①。

在滲入中非洲的同时，阿拉伯人也沿东海岸經由海路，从大陆的海湾，扩展他們的势力直到哥連德角(南緯24度4分)。紅海与波斯湾都是入印度洋的出口；它們成为这項扩展的基地。波斯湾內的巴林群島以及那些引入紅海的亚丁島与湾內的索哥德拉島都是路上的重要海軍和商业站。馬加多克索、布拉瓦、索发拉、最重要的启尔窝(就是，后来葡萄牙的魁罗阿)、蒙巴薩、彭巴、馬飞阿、哥摩罗以及莫三鼻給都因此而建造的。貿易的項目是：奴隶、碎金、象牙、树胶、龙涎香。阿拉伯人向內地推进到多少深，是一个可疑的事件。有些作家把建造罗得西亚的神秘遺迹，归功于阿拉伯人。馬达加斯加是否由阿拉伯人发現，也是一个問題。在那里，找不出什么中世紀居留地的証据。莫三鼻給海峽的激流及哥連德

① 盧加德女士：«一个热带屬国»，第16—17頁。

角外的可怕波浪，也許阻止了阿拉伯航海家这样远距离地出海航行。

阿拉伯人伸入亚洲大陆和伸入非洲一样，从陆路（中亚細亚和印度）也由海路进行；他們的双重热忱，宗教的和商业的，引导他們几乎到天涯海角去。

我們将先叙述阿拉伯人由陆路伸入中亚細亚的历史，而后再描写他們由海路向远东的扩展。上文已說过，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与叙利亚以及建立巴格达哈里发国家时，已控制横貫亚洲的大商路，而这商路的最初历史在古代已經散失。早在亚历山大帝时代，通印度的产棉区和中国的产絲地之道路，已經开辟。这一条路以美索不达米亚为起点，越环繞西波斯的崇山峻岭——拔海五千呎——經雷、尼沙普尔、麦什特以及麦尔夫的富庶綠洲、布喀拉、撒馬尔罕，达喀什噶尔；最后两地在711和714年由伊斯兰教征服的。这一地区在中世紀比在今天灌溉得好些。从第八到十五世紀，这些地区是在阿拉伯統治下的繁荣都市。它們的衰敗是从帖木兒时期开始的。

从麦尔夫或撒馬尔罕起，这条商路就分成两条了，干路通往中国，支路折向东南往巴尔克和喀布尔，續往印度去。在撒馬尔罕和喀什噶尔間，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商路穿越两座大山脉而后进入“天朝帝国”，沿和闐（当时富庶的地区，而現在一片沙漠）的南边，綠喀拉科隴山脉的峭壁而行，經喀什噶尔与和闐（城）而达肃州，即中国的极西城市，从那里起黄河流域流入了中国中心地带①。

中国在第七世紀时期，正在极盛时代，由于627年登极的唐太宗皇帝的寬大而又有野心的政策，它和西方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

① 从中国到西方，有着三条路綫：(1)西北路綫，(2)經过西藏的路綫，(3)經过肃州或四川和云南的路綫。第一条路綫，由于游牧族的搶劫，是危險的；第二条路綫，由于需越过高原及无数山岭，是困难的；第三条路綫是最安全又最便利。

以前的时期更为密切。他的首都长安开放給景教徒和穆罕默德教徒。基督教于634年由一个景教徒傳入了中国；638年第一所基督教会在中国建造起来。使节源源不絕地从印度、尼泊尔、波斯和拜占廷来到中国；因为在波斯和拜占廷两个敌对国家間的最后搏斗中，双方都曾向天朝皇帝乞援。最后，哈里发奥瑪和哈里发鄂斯曼也派使节到中国来。

薩拉森人善于利用中亚細亚的政治局势来扩展他們的版图。在瓦利德統治时代(705—715年)：

在德兰索西阿那，住着伊朗人和白匈奴人(嚈噠人)的混合种，他們也被突厥人征服……在庫太巴的征伐时期，在德兰索西阿那，出現了穷人对富人的反叛运动。薩拉森征服者，极其巧妙地利用了这两派的分裂……征服法加那所費的力量比征服索格狄亚那要多。这里，薩拉森人和西藏佛教徒相接触，后者新近反叛了中国的皇帝。这些西藏人的队伍越过了南部大山路，来在阿姆河和查克薩提地区掠夺。他們和薩拉森人結成友誼关系，而薩克逊人也在喀什噶尔偵察形势。对薩拉森人来說，控制中国的南部大門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能扼守住一条由东方到西方的新商路。但是那将夺去突厥人的买卖，因为突厥人以前已是中国和西亚間的中間商人，控制着北方大門，并阻止任何別人来控制南方大門。因此，突厥汗遂进行干涉①。

但是，在这突厥人抵抗的背后，还有中国政府；它决心不讓穆罕默德教部族竄扰中国西部省区，象他們涌入波斯、埃及和叙利亚那样。可是，中国不能关閉西方門戶。到第八世紀中期，穆斯林商人和傳教师从德兰索西阿那、布喀拉和撒馬尔罕，大批流入中国西部諸省。到742年时，陕西省会建起了一所伊斯兰教寺院。

但是，进入远东的眞正"大門"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海上。象前面一章里所談到的那样，波斯和中国間商业关系早已存在；在巴士拉港口，常見从中国經过馬六甲海峽、錫兰和印度的馬拉巴沿海

① 吉本：《罗馬帝国衰亡史》，柏立版，第5卷，第414页。

而来的帆船。但是，如果中国帆船能冒險航行这么长距离的海路，阿拉伯帆船当然也能这样航行的。

在阿拉伯海岸上，有着一种出海的商人；从古代以来，这种商人已經熟悉印度西岸的港口。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內的西拉夫和赫摩兹开船，沿海而行，达印度河口，再前行抵薩皮拉和卡貝；要不然的話，他們甚至从他們在奧曼的加尔哈特和庫拉雅特的港口，大胆直航到科利庫特及其他馬拉巴海岸各港口①。

他們沿馬拉巴海岸航行到錫兰，从那里他們横渡孟加拉海湾达馬来群島，并在安达曼群島、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門答腊及中国建立了殖民地。

我們有理由相信：早在公元300年时，阿拉伯商人已在广州建立居留地。到了第五世紀就肯定有了，而在第八世紀，这个包括阿拉伯人和穆罕默德教化的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团体是龐大而重要的。700年时，广州对外商开放，在外商中阿拉伯人一定是首領。758年时，阿拉伯人和当地叛徒联合一起，燒毀了城市。在795年的中国革命之后②，他們主要通过坎富港即現代的杭州③，进行貿易；但为謹愼起見，把他們的主要基地移往馬来半島的喀拉。

在九、十、十一和十二世紀的整个四百年中，坎富的阿拉伯殖民地和中国人間的政治关系，除了将近第九世紀末期一度微有裂痕外，繼續保持着和睦状态。在第九世紀中，阿拉伯在东方的貿易达到了它发展的最高峯。关于这方面，商人索来曼提供了最好的証据。从这个商人的記載里，我們可获得关于中国情况和貿易性質的很多消息。索来曼清楚地指出了一个事实：中国內地貿易和

① 罗灵逊：《帕提亚帝国》。

② 指黃巢起义。按黃巢起义的爆发是在875年，不是在795年。原文誤。——譯者

③ 按关于坎富之位置，有两說：一說，是在广东广州，一說是在浙江杭州。孰是孰非，迄无定論（参閱桑原騭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馮仪譯，商务印書館1929年版，第16頁）。——譯者

商业在这些年代里是很安全的。他說，除了在国内从每个人按照他所有的財产課税外，并不从土地征收什么稅；阿拉伯人及其他外人的納稅，和本地人相同。在中国境内，内地来往是不禁止的，但在严密监督之下的。凡是要从一省旅行到另一省的人必須取得护照；护照上注明旅行者所要走的路綫，詳載他本人及其他随从者的情况，并标出他的职业和所携带的現款数額。由于这种精細的办法，商人或旅客的人身和貿易受到了保护；毫无疑問，那是有助于东方和其他国家間的商业关系的。而且，穆斯林人在中国是受皇帝所委派的一个“番长”即法官的管轄，而这法官的权力很大。关税章程，虽然严格，但公平而又寬大。当商人的貨物到达中国之后，貨物立即提到貨棧内并在那里保藏六个月。其时，对每种商品課以3％到30％的稅，其余的貨物概还給所有人。皇帝一向是保留优先購买权的，但是他付給“最高的代价”，所以“交易立即办好，沒有絲毫不公平之处”。在索来曼的时期，广州的穆斯林居留地的重要性，可从下一事实来判断：“中国当局委派一个穆斯林人負責維持他的教友間的秩序并执行伊斯兰教的法律。在斋戒日子里，他唸禱告詞，背誦古兰經，并为哈里发祝福。”然而，在875年，在中国发生了一次叛乱，商业关系因此大受阻碍。当中国皇帝恢复了政权之后，地方官吏仍横行不法；由于这种事态的結果，阿拉伯人把他們的总部迁往喀拉。这里，他們运入印度支那的产品，象樟脑、丁香、沉香、苏木、檀香、椰子、豆蔻这一类。在这一世紀里，輸入中国的主要商品，据索来曼所說，是：鉄、乳香、黃銅、龟貝、樟脑和犀牛骨。

在以后的五世紀中，我們看到很多关于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間关系的記載。在十四世紀，易宾·巴托塔詳述：他在中国的极东部分，会見了他的一个少年朋友；这朋友出生于广州而是做生意的。

与此同时，阿拉伯商人也由陆路到达印度。我們看看亚洲地图，就可知道：曾由英国統治过的俾路支斯坦是波斯和印度間一个

联系的环节。这海岸的沿海貿易，也許比陆上的队商貿易要早，但是水陆两路的貿易都是在古代亚述与波斯时代开始的。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塊領土，正确地說，它的沿海地带，叫做馬克兰，而它的內地被称为塞斯坦。这一条从波斯到印度的陆路在穆罕默德教历史的早期，已經开辟。因为商业的推进在公元 712 年历史性的入侵印度之前，一定已經存在。阿拉伯商人云集在馬克兰，那里有着良好道路、良好旅舍。河流是用小船搭成桥梁来摆渡的。在同一时期，阿拉伯和叙利亚侨民也居住在塞斯坦。我們可看到：它的古都扎林治的遺迹，散布的面积很广。在平原上，密布着一片雪白的棉花；遍地盛开着紫紅的罂花。山側舖設阶石，直到山岭；而現在已經消失的运河灌溉网，当时是从山上分配水流的。"有着数不清的运河，并經常有着风和风車。"塞斯坦的貿易能够找得通路；不是通过沿海道路，便是經过横断陆路；这陆路，虽多困难但可通行，向西北延伸到波斯的麦什特为止。

今天，几乎所有关于这当年的偉大文明的遺迹，都已不可复見。它的破坏，与其說由于战爭（虽然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曾干过破坏工作），不如說由于后来季节风向的奇怪轉移；这轉移使这一地区喪失了从印度洋吹来的雨水，使它陷入半干燥状态，即使不是真的沙漠地①。

値得注意的是：关于穆罕默德教权力在亚洲这种大扩張，阿拉伯地理学家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料，可資稽考。第一，他們有着引水手册、旅行记、战役記、商人和朝拜圣地者的記載。第二，他們引用了埃及人、科普特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資料。而且，航海家本身也

① 那些不受人注意的港口，象厄馬拉、格瓦达尔（屬于穆斯喀特）、沙巴及查斯克，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們的时代老早已經过去。現在，它們只是印度—波斯間的电綫站或漁村而已。那里的居民是混血的部族，他們依然保存那在尼阿科斯时代以食魚为生的习慣——霍耳狄奇：《印度边疆志》，第 315 頁。

从过去文明中汲取了很多关于航海的知識。地理学家伊德里西写道，“船主常常坐在船尾楼上，装备着很多有用仪器的船只的船尾”——这些仪器中間一定有观象仪、测深錘、也許还有罗盘針。

穆罕默德教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写了大量著作，叙述阿拉伯人同印度、非洲和中国所进行的貿易情况。《辛德巴德史話》是根据《两个穆斯林旅行家》的遊記和类似的記載，例如米薩·阿尔·杜拉夫(他于942年到中国)的記載，編写而成的；还以希腊神話、亚历山大帝的傳說、印度故事以及波斯野史作了补充。那是欧洲《約翰·孟第維尔奇聞录》① 的一个东方形式。辛德巴德所举的地点，已証明为日本(?)、中国、婆罗洲、苏門答腊、錫兰、卡鲁滿德海岸和馬达加斯加(?)。阿布-泽伊德的記載，較多可靠性，他叙述878年时坎富的遭劫。在第九世紀，易宾·科尔达柏記載印度、錫兰、东印度、中国的坎富、揚子江口和黃河口，似乎还有关于高丽和日本的一些消息，也許从中国商人方面得来的。在同一世紀里，易宾·霍卡尔知道非洲和印度，但还不知道远东。在十世紀中，馬庫第也是这样；他知道波斯、印度、錫兰、从斐加那到里海的中亚細亚、北非和西班牙，但还不知道馬六甲海峽或中国。在十二世紀，偉大地理学家伊德里西，遊历了很多地方并作了广泛的研究之后，定居于巴勒摩的罗哲尔二世的宮廷里，編写了一本关于已知道的阿拉伯世界的有价值的地理書。

但是，在阿拉伯旅行家中，易宾·巴托塔最为著名；他是十四世紀的人，出生于摩洛哥。甚至馬哥波罗也不能和这位不倦的旅行家相提并論。他无間断地旅行了三十多年；两次从大西洋穿过非洲到紅海；四次朝謁麦加城；到过埃及、“圣地”、叙利亚、小亚細亚、君士坦丁堡、俄罗斯——在那里他走到辽远的北方来看午夜的

① 孟第維尔(John Mandeville)是編写一本著名游記者的笔名。这游記出版于1357和1371年之間，原文系法文，曾譯成所有的欧洲文字。——譯者

太阳；他在往中国的路上，經过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大多数省分，远至喀什噶尔；越过兴都庫什山的可怕山路而入印度；遊历印度、錫兰、馬来半島、婆罗洲、爪哇、苏門答腊；住在中国若干时期——在那里，各种工业，特别是制陶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碰到一个他在德里認識的老友；他搭船往阿拉伯半島，第四次到麦加去朝拜；然后渡紅海，第二次走过苏丹，遊历廷巴克图和奈格耳河地区；在苏丹的中心区，他碰到他的胞兄弟，他兄弟告訴他，父亲已在十五年之前去世。这样，他便回到費茲的故乡，用其余的岁月写了一本在任何語文中最令人惊异的旅行記。他的著作，是关于穆罕默德教徒的世界貿易的知識宝庫，也是关于穆罕默德教帝国偉大性的文献証明。“旅程上的危险，比可能想象的要少。虽然易宾·巴托塔偶然陷入危險的境地，但一般看来，他的旅行是悠閑而舒服的，而且，穆罕默德教的一种可佩的互助精神，就是使一个穆罕默德教徒从直布罗陀到广州止受到欢迎的精神，給他（易宾·巴托塔）保証了一种衷心的款待，只要他是在伊斯兰教流行的地方。”

中世紀时代，在整个东方，穆罕默德教的流行和阿拉伯語的傳布等于是商人和小販的通行証。阿拉伯語在中世紀东方的地位，象今天英語在那里的地位那样。阿拉伯人，是中世紀东方世界的英国人。吉本說得对：“阿拉伯偉大勢力的一帆风順地伸展，必須归結到这个民族的精神。”他們是一个商人的民族。在中世紀时代，所有那时已知道的非洲，就是，从地中海到赤道止，所有的西部亚洲、印度的一半和大陆的整个海岸以及印度洋上各島屿都在穆罕默德教权力和文明之下，那是一个可惊异的事实。历史上除了近代大不列顛帝国外，再也沒有象它一样的帝国，而两者都主要地是商业帝国。

穆罕默德教商人甚至侵入了罗斯，而阿斯脫拉罕、薩里、基輔

以及黑海港口，都是他們所熟悉的地点。阿斯脫拉罕的商业来自河流和海上，就是，伏尔加河广闊流域的进进出出的貿易；此外，它还和更远的地区，有着貿易联系。罗斯南部的产品——水果、酒、香料、細布、香粉、奢侈品——交換罗斯北部地区的产品——主要是，奴隶、毛皮、皮、蜜、蜂蜡、脂肪、大麻、繩索和木材。在鄂图大帝时代(936—973年)至少有一个野心的穆斯林旅行家塔西佗到过日耳曼；他在那里因見到在馬因斯所出售的东方香料和絲綢而感到惊异；还有人曾拿撒馬尔罕的貨币給他看过。

在巴格达哈里发国家的領土和罗斯与波罗的海区之間，高加索地峽是天然的桥梁，而里海是天然的水道环节。高加索外的喀扎兒人成了阿拉伯貿易的中間商。伊鉄尔是喀扎兒人的首府，但阿拉伯商人对伊鉄尔市場上从第三者采購东西并不完全滿意。所以，他們搭船上溯伏尔加河，前进到保加尔城即旧保加利亚的首府，但他們不敢再向前行。在保加尔城，阿拉伯人从来自諾夫哥罗得的罗斯人直接購买他們为东方朝廷所竭力爭求的价値珍貴的毛皮：主要是，貂皮、銀鼠皮、黑貂皮、海獺皮、黑狐皮；而这些东西是东方宫廷所急需的。此外，罗斯人还以奴隶和黃色琥珀售給他們。

現在已經从下列地区发掘出印着阿拉伯国王肖象的大量貨币：在伏尔加河上游和中游、在第聶伯河上游地区、在波罗的海的北部沿岸以及在芬兰湾畔、在芬兰和瑞典之間的各島上、在挪威的南岸、在丹麦的各島上。在日德兰和什列斯威境內，也已經发現从第七到十一世紀阿拉伯国王所鑄造的很多貨币。其中最多的，是屬于第九世紀末到十世紀中期的貨币。这些古錢的标本，总数达一万三千多枚，耐人寻味地証明了阿拉伯的貿易范圍如何广大。連在梅喀稜堡、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魯士，也巳发掘出一些阿拉伯古币。

第十六章　十字軍(1095—1291年)*

在十一世紀之前，西欧人大部过着一种农村生活，每一地区和它的邻近地区分隔着。他們同穆罕默德教徒很少发生关系，除非遇到他們的侵入或者冒險的基督徒参加对东方的战爭。穆罕默德教徒所占領的是那些保存最高度的古代文明、工艺和科学的地区。地中海地区和西部亚洲的穆罕默德教国家走在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前面。十世紀阿拉伯文明在东方和在西班牙发展的最高峯，正是西欧最野蛮而又最貧困的时期。但是到了十一世紀末期，这种隔离状态結束了：这两种人民間已建立恒久的接触，主要在下列三个地区：十字軍所建立的公国、西班牙和西西里。

十字軍是最有趣地也最偉大地表現那在十一世紀中覚醒着的集体意識，或集团心理的运动。这种意識已如此多样地显示出来：集体进香、圣迹崇拜、教堂建造、教会命令暫时停止私斗、农民騷动、經济上的不滿、商业冒險、异端集团、共产精神最早时期的鼓动。十字軍运动鮮明地印上集体性質的烙印。对这一点，当代的銳敏作家已經看出。曼茲柏立·威廉写道(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不管多么辽远，多么偏僻，沒有一个国家未曾出过力……土地荒廢，无人耕种，房屋无人居住，竟有整个市鎮一起迁移的。"也許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象这种暗示作用傳染性的例証。从心理来看，十字軍表明了大批群众怎样在强烈的情緒刺激的压力下，竟会一起染着神經錯乱症或瘋狂症的。

十字軍象任何其他偉大历史运动那样，是由于好久以来起着

---

* 地图：錫培德：《历史地图册》，第66—67，70—71，73頁。

作用的复杂力量所产生的結果，也是由許多个别运动逐漸汇合而成的頂峯。十字軍的根苗已深植于中世紀的历史土壤里。其中最长而又最深的根苗，是朝拜"圣地"的慣例，这是早在第四世紀已經开始的慣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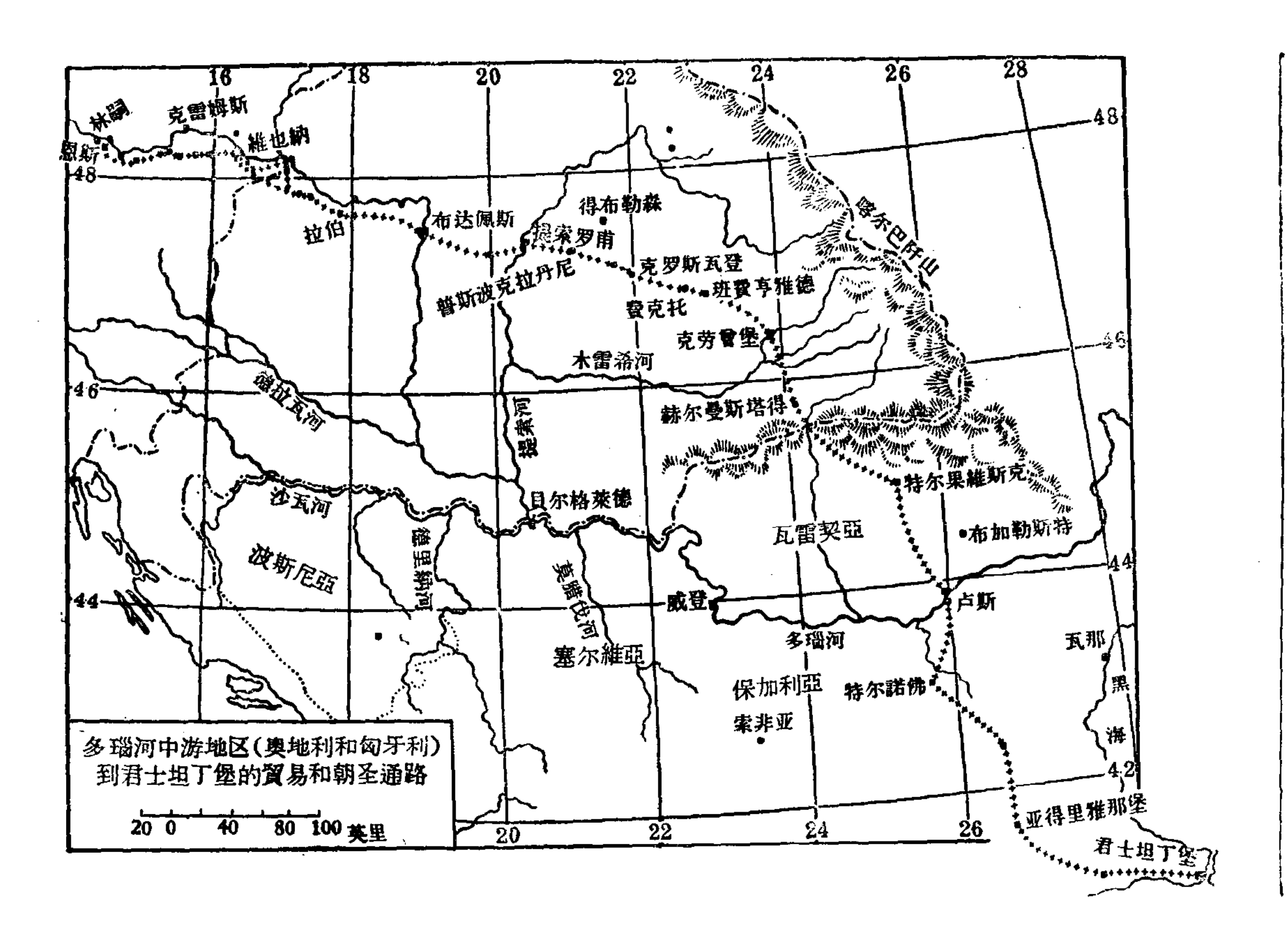
教会也要求以朝拜圣地作为懺悔某种罪行的行为。因为朝拜圣地是一个路途遙远、艰苦、用費浩大、有时还冒着危險的旅程。关于这种贖罪行为，有着两类方式。大朝圣，是到罗馬城、康波斯提拉、圣詹姆士寺院以及耶路撒冷圣地。小朝圣，是到距离較近地方的神殿去。可是要从象漫遊僧侶、逃亡丈夫和私奔妻子、托鉢僧、走江湖者这一类的遊蕩者中区别出忠誠香客，向来是不易的。747年，圣邦尼非斯向坎特布里·卡司柏特訴說，"臉蒙面紗的妇女們正在往罗馬城去；"跟着他还說，"在倫巴第、在法国或在高盧，很少城市沒有一个屬于英格兰族的娼妓。"未婚的妇女以及沒有丈夫陪伴的已婚妇女都被禁止出去朝圣。其他一些离奇的社会道德糾葛也发生了。有时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朝拜圣地的人出門已久，妻子認为他已死去，因而再嫁，但后来那个远遊的丈夫回来了。即使那个朝拜圣地的人不曾回来，在那个时代也难于証明他是否已經死亡，特别是因为出門朝圣本来是一个遺弃配偶的好方法。我們可看到一批諾曼妇女在1068年写給她們离家丈夫的一封信，里面說，如果他們不立即回家，她們就要另嫁了。

朝拜圣地者数以千計地来来往往，所以大路上的寺院里早已附設旅舍和招待所，特别是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各山路上寺院里。弗尔达的寄宿所是出名的。哈德良一世曾向查理曼恳切地說明关于阿尔卑斯山中需要旅舍；虔誠者路易在塞尼山路上曾建造一所旅舍。855年皇帝路易二世曾下令修理所有阿尔卑斯山中的旅舍。在十世紀中，薩拉森人和匈牙利人的掠夺破坏了很多

旅舍，可是下一世紀的建筑狂和朝圣热使这些旅舍很快地修葺起来，而且有新的旅舍建造起来，例如，著名的圣伯尔納德旅舍。在匈牙利人接受基督教(1000年)后，当到东方去的多瑙河路綫开放的时候，有很多寺院和旅舍，象麦尔克旅舍，为了接待香客而出现于沿途了。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近代是落后的，但我們不該就認为它們在过去一向是如此的。奥托曼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紀中几乎破坏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密、条件最优的国家——叙利亚。它在希腊人、罗馬人和早期拜占廷帝国的統治下，在工商与农业方面，是一个繁荣的省。正是由于这項財富，使它成为哈里发国家和拜占廷帝国的一个战場。在那里，小地主的数目比别处多得多。帝国法律說明：在十和十一世紀，皇帝曾竭力保护小地主防止大地主和教会的兼并过程。大庄园是由农奴和奴隶劳动来耕种的，但是大量土地却由实际的所有人，就是，自耕农、橄欖和葡萄种植者来耕种的。

第七世紀阿拉伯的統治，在风暴过去以后，尤其是在阿巴斯时代，是和緩而又公平的。的确，教会和大地主曾丧失他們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归于穆罕默德教国庫、伊斯兰教寺院以及高級文武官員所有。但是，当地的基本民众很少遭受騒扰。阿拉伯政府所課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和过去拜占廷帝国所征的，沒有什么不同之处；新的变更是所有的貢税都由非穆罕默德教臣民来繳付的。可是，叙利亚人的繁荣和工业的发展足以使阿拉伯人的課税不成为一种負担。叙利亚的自由农和农奴，在穆罕默德教的統治下，都沒有感受过什么过度的痛苦。我們可以适当地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阿巴斯朝統治下的內部和平与繁荣，优于在拜占廷統治下的情况。在耶路撒冷曾由奥米耶朝所建立的年市集，吸引了大批西欧商人和朝圣者云集东来。在《圣阿丹南傳》里，对下列情况表示了惊訝：“来自各国的无数商人群众，常聚集于耶路撒冷来互相进



多瑙河中游地区(奥地利和匈牙利)到君士坦丁堡的貿易和朝圣通路

行买卖。"①

給圣地送去定期的捐款，早已成为西欧的慣例。在这方面，法王虔誠者路易实現了他父亲的愿望；他从王室領土的每一庄园征收少量捐税来支持圣地；他还同耶路撒冷主教长通过信。在870年，約翰八世趁着耶路撒冷三个修道士来到罗馬之便，贈送一笔捐款；他还抱歉地說：因受"异教徒的破坏"，捐款的数目微小。另一方面，耶路撒冷教长也沒有錯过机会来請求这种帮助，他所派遣的代表"遍走欧洲"。他們走到英国，又走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們領取了君士坦丁"合法繼承人"的礼物。881年，教长赫力阿斯三世曾給"查理曼世系的全体国王和西欧僧侶們"写信，介紹吉斯柏特和雷拿德两个僧侶作为收取补助金的代表，为的是要弥补耶路撒冷教会由于重建很多圣殿而造成的財政亏空。十世紀中，在西欧捐贈基金給圣地寺院的慣例已經风行；耶路撒冷的僧侶們从这些基金里获得了收入。下面就是993年时多斯加納侯爵休格和他的夫人朱丽德所捐給圣墓的礼物。奥微亚托、索瓦那和阿奎彭登特三州中的岁入，用来維持耶路撒冷的圣馬利拉丁寺院的僧侶們以及他們所招待的朝圣者們。在这时期，查理曼所建立的教会还存在着。諾曼底公爵理查二世也把类似的礼物贈給圣墓，也給賽那的几个寺院。每年有几个僧侶从巴勒斯坦来到盧昂，他們带着礼物而返。在十一世紀初期，圣墓的教会在意大利和南法拥有大量土地。

从上述的事实，可看出：在十一世紀之前，阿拉伯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沒有遭受騷扰。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在869年写給君士坦丁堡的同僚易格那提阿的信里，讚揚了薩拉森人的寬

① "diversarum gentium undique prope innumera multitudo… in Hieresolymis convenire solet ad commercia mutuis venditionibus et emptonibus peragenda."

大政策，因为他們准許基督徒建造教堂并依照他們自己的法律过活。信里說，"他們是公平的，因而我們在任何方面沒有遭受到压力。"那些朝謁圣地的西欧人只要經常注意承認当地的法律并向所路过的城市当局呈驗通行証后，可无阻碍地繼續通行。高僧伯尔納德从866到870年曾住在东方，他的記載是很有代表性的。在离开意大利之前，他和两个同伴曾到巴利去(从840年起它已隶屬于薩拉森人)，領取了一張正式通行証；証內載明他們的情况以及他們旅行的确定目的。他們从他林敦搭船啓程，到达亚历山大城，在那里，他們为了登岸必須繳納六个奥莱。他們每次进入一个新市鎮后，必須調換新通行証，为此每人須付十三便士。如果遺忘或昧于这种規矩，他們将在"巴比倫"(开罗)受到短期禁錮的处罰。这种征税果然是苛重的，但比起在同一时期西欧所征的税要少；由此可見那里是事态正常的。在下面一段文字里伯尔納德盛称旅客在这些国家里所可享有的安全。

如果那只馱載我疲瘠身軀的租来的馬偶然死于路上，又如果我把我行李拋在那里无人看管而到附近村庄去找另一只乘馬，在回来时，我会看到一切东西都完整无缺。这就是他們所維持的太平状况。但如果有人在城內、在海上或在路上无論夜里或白天遊蕩着而沒有一張蓋着那里某王公或某长官的印章的証件或通行証，他就要被禁錮，直到确定他不是一个間諜为止。

从十世紀初期起，到圣地朝拜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史家所記載的，只有世俗的或教会的大人物。这些行动是和封建社会的冒險精神相符的。有的是由于在危險情况中起誓許愿的結果；其他是由于想要瞻仰圣徒的遺迹；有时，他們想看看东方国家的好奇心里夹杂着宗教的考慮；有时，他們把朝圣作为必要的贖罪方式。試把这一时代的重要香客列举出来，那当然是乏味的，但足以表明西方和巴勒斯坦間接触頻繁情况。約在920年，君士坦士主教康拉德曾三次朝謁圣地；965年，北方大侯爵格洛的姊妹，斯瓦比亚女

伯爵喜尔达，在朝圣的时期，死于耶路撒冷；970 年，鄂图大帝的弟妇朱狄司也作过同样的旅行。帕馬・圣約翰到过耶路撒冷六次；阿利热摩斯的弟兄、卡西諾山寺院的住持利奥，从圣地携回了一个眞十字架；貝尼温敦的約翰，后来是这同一寺院的住持，也参謁过圣地；阿梭斯山寺院、斯达維洛特的住持波波在 990 年到圣地去朝圣；凡尔登伯爵腓特烈在 997 年去；可畏的安如伯爵佛尔克・涅拉的第一次朝圣是在 1002 年；非基克寺院住持罗哲尔的第一次朝圣是在 1005 年。所有这些朝圣者的旅行似乎都很順利而沒有遇到什么大的阻碍；他們也沒有組成大队，但只結合着几个同伴偕行而已。所以在十世紀末期在穆罕默德教国家里，那使高僧伯尔納德感到惊奇的安全状态，依然存在着。当时，很多西欧人的脑子里縈繞着到圣地朝圣的思想。那些无力作长途旅行的人們采取下列办法聊以自慰：閱讀全欧风行的遊記，瞻仰由耶路撒冷带回来的圣物；在按圣墓圓型教堂式样所建造起来的欧洲教堂里做禱告。朝圣运动，連西欧的极远地区，也被波及。在十世紀末期，我們看到第一批从斯堪的那維亚来到圣地的朝圣者，其中还有来自冰島的。

在十一世紀中期以前，朝圣行动是屬于个別朝圣者的，至多是小集团的性質。然而，在这以后，情况改变，我們所看到的，不是少数人的朝圣集团而是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旅行集团。1011 年当罗馬和君士坦丁堡間关系还是和睦的时候，安如伯爵佛尔克　涅拉随身只带由教皇写給拜占廷皇帝的一封介紹信，作为他的全部安全保証。在君士坦丁堡，那里供給他向导来引导他到达圣地；在耶路撒冷，他必須繳付捐税，那是穆罕默德教徒对那些愿意进城的基督徒所課的貢賦；他还援助了一批穷苦的朝圣者；他們因为缺少現款进不得城。約在同一时期，特累甫的大主教迈因哥尔德，只由一个人伴随着到耶路撒冷去，那个伴随，就是隐士圣西緬；他是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由于常到东方，成为一个优良向导。在十一世紀中

期，烏尔立喜，后来担任泽耳寺院的院长，同他的仆人往“圣地”去，两人同乘一馬；每天他在上馬之前，背誦一首讚美詩。1058年，編年史家赫斯斐尔德·藍伯特曾不告住持而离开了他的寺院。他横越大陆，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回到原地。

匈牙利人在圣史梯芬时代(997—1038年)皈依基督教，經由多瑙河的一条路对朝圣大为便利。因此，未来十字軍所穿越的大陆道路，已經开放；在这条路上已有許多显貴为了供給朝圣者的休息所建造的旅舍。奥得里克·維塔利斯举出一所这类的建筑物，位于“巴伐利亚人和匈牙利人之間的边疆上”，据珀茨的話，位在奥地利的摩尔克，由一个已受圣职的諾曼騎士掌管，名叫安斯哥特；他是托厄尼·罗哲尔的一个亲戚。所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已开始有了一种新組織。

但是除了上述个人个别所作的旅行之外，我們还看到开始組織远行队；这些队伍横越欧洲和东方，有时已被卷入同当地居民的敌对行动里。第一批这类朝圣队之一，是圣瓦內寺院住持理查所率領七百个朝圣者的朝圣队，其中包括很多諾曼騎士。这一队伍是在1026—1027年間出发，由諾曼底公爵理查二世出資；而后者对有关圣地的一切事情，都是很热心的。同一年，安科賴伯爵威廉，由很多西法兰西住持和一大批貴族跟着，經过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到达了耶路撒冷；这批朝圣者曾受到匈牙利国王的款待，并顺利完成了他們的旅行。下一年，若干西欧貴族，由于受到他們例子的鼓舞，进行了一次新的旅行，波亚蒂尔和里摩日主教以及安如伯爵佛尔克·涅拉又一次前往圣地去。据劳伊尔·格拉伯的話，1033年时，圣墓上朝圣云集，人数比起以前所可看到的任何朝圣群还要多。各阶級和各等級的人，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老百姓都有人参加 “那是从来沒曾有过的事情：有些貴族，大批貧民，同时进行这种旅行；其中有許多人宁愿死去而不愿回到他們的故乡去。”若干

年后，在 1035 年，著名的諾曼底公爵罗柏特魔鬼，在湊集为置备礼品所必需的金银以后，啓程到巴勒斯坦去，“带着他的大群臣民”同行。他在返国途中死于尼西亚并埋葬在那里。但在所有这些远行队中，最著名而又最重要的，是 1065 年南部日耳曼的若干主教和騎士在班堡的主教岡瑟領导下所进行的远行队，人数达一万一千多人。为了这大队的旅行，曾在事先准备好寄宿所。

显然，在眞正的第一次十字軍前的二三十年中，我們已可看到一个新的現象。統計数字还会使这一事实更加清楚。第八世紀有六次朝圣，第九世紀有十二次，十世紀有十六次，十一世紀則有一百一十七次了！这些都是有記录可查的。到了十一世紀，圣地从作为一个朝圣地点来看，已經开始代替康波斯提拉城古老的圣詹姆士圣殿和罗馬城。巴勒斯坦旧的遊覽指南，数量激增，而新的指南書也編写出来，以便利旅行者，甚至也为便利来自冰島的朝圣者們。很多朝圣者把做生意和宗教連在一起，沿途做着买卖。扎克·得·維特里曾写道，“有些人为了做生意，别的人为了宗教热忱与旅行；”① 太尔·威廉也說过，〔他們〕“具有宗教热忱或商业动机，或两者兼有”②。十二世紀的歌曲和记事詩，“并不象人們一度所曾設想的那样，是依据中世紀早期的詩歌和英雄故事而来的，当时的文学，大部分是为了……在朝圣大路上的旅行群众，即朝圣者和市集常客而編写的。既然是由旅行者并为旅行者而編写的，所以，它們必須就罗馬城和康波斯提拉城的情况，予以解釋；同时，原来被認为显有差别的社会阶層，在旅途上却表現出极其密切的合作精神”。

这些远行队，还不得算作十字軍。它們除了参加者人数較多

① “Alii causa negotiationis tracti, alii causa devotionis et peregrinationis.”

② “Devotionis aut commerciorum aut utriusque gratia.”

之外，同普通朝圣沒有什么不同之点。然而，它們在十字軍起源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們使西欧人熟悉到巴勒斯坦路上的各站；那有助于决定后来十字軍所采取的路綫；它們还鼓起了欧洲人对圣地的狂热心理。

但是，我們看到另有一批把宗教和貿易紧密联合着的朝圣者。他們是意大利商人；其中最早的是阿馬斐商人。在十世紀末期，阿馬斐商人利用拜占廷帝国給他們的保护来建立了他們同埃及与叙利亚的商业关系。摩里和判塔里奥尼的两富族，在意大利同拜占廷的經济关系上起着巨大作用；从它們在安提阿和在耶路撒冷建造旅舍方面看来，它們已表現出对圣地的热忱。在 1080 年，它們曾建造圣約翰医院，那就是后来十字軍救护騎士团① 总部所在地。这医院不加歧視地接待所有来自西欧的朝圣者。西欧的捐款或多或少定期地送到巴勒斯坦去，而在 1083 年后，东方的这类新組織在南部法兰西，尤其是在阿尔比的主教区，获得了固定的土地贈与。

在同一时期，地中海上海权的比重已有轉变，过去将近三百年間伊斯兰教国家的海上优势，现在由于热那亚和比薩舰队的海战胜利而失掉。这种形势，又由于諾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 年)而肯定下来，因此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国的商业野心受到了有力的刺激。烏尔班二世在第一次十字軍队伍出发之前，已向热那亚呼吁使用它的船舶，这不是沒有意义的。

已經說过，虽然这些运动还不是十字軍，但应指出：在第一次十字軍之前，即在十一世紀中，欧洲事实上已有过三次具有十字軍性質的行动。在前面几章內已經提过：卡斯提尔的反摩尔人战爭(1072—1099 年)、諾曼人征服亚浦利亚和西西里(1016—1090 年)和諾曼人征服英国(1066年)，这些都是眞正的十字軍；它們的动机

① 它是在十字軍东侵时期所組織的騎士团；它的主要目的，是看护十字軍兵士中的患病或負伤者和接待从外地来的朝謁聖墓者。——譯者

和后来促成大規模的正式十字軍的动机大部是在程度上的差别。这三件大事，以它們的榜样和影响感染力，曾刺激西欧民族的好战精神和經济欲望。有大批参加过上述事件中某次远征的冒險分子，后来也参加了十字軍的东征。

在十字軍兵士的行为里或他們的信件里，很少可指明，他們已經一般地放弃那些其他中世紀战爭里所反映的动机和慾望。誠然，他們的幻想由于朝聖者的艱苦景象和神聖地点被污辱的情况而燃燒起来；可是他們也热中于下列傳說(似乎是更起作用的一点)，东方神話式的財富、黃金、白銀、美女正在等待掠夺者的手，諸如此类的故事……人們愈加乐于接受这項号召，因为欧洲人口尽管有时疫和战爭，却已增加到这样的程度，收获递減律已开始使人們遭受痛苦。那成为以后五百年中一个严重的社会問題，即幼子問題①……已經出現。在土地繼承权已經确定而又沒有荒地可开辟为新庄园的地方上，幼子被迫用他的宝劍来寻找生路了。在实施土地再分割慣例的地方上，封建主所保有的土地，越来越小，以致他們不再能維持他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因而他們加緊压迫农奴，使农奴貧困化来弥补自己的亏空；但尽管如此，許多封建地主还是負債累累，陷于絕境。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发生了社会騷扰和不靖状态；于是，无土地的和貧困的各阶層的人們，准备干着任何危險的事情，只要有希望免除苦难的話。对所有这些人来說，十字軍看来确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号召了②。

皇帝亚历修在曼西克特慘败之后，向法兰德斯伯爵請求西方援助的"呼吁書"，可能是眞的，也可能是伪造的。但是我們不能不重視其中所說的"爱好金銀和喜欢美女"的誘惑力③。

在产生欧洲好战精神的这項过程里，我們不該忽視停止私斗运动对十字軍精神发展上的影响。当这个运动力图抑止私斗恶习的时候，那些提倡的僧侶們同时也認識到：封建社会对战爭恶习已經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战爭完全压制住。为使战爭的矛头轉向于

① 按当时的法律，长子享有繼承遺产权，而幼子沒有繼承权。——譯者

② 《政治学季刊》第15卷，第600頁。

③ "amor auri et argenti et pulcherimarum feminarum voluptas."

外，教会，尤其是克里尼教派，把反对伊斯兰教战爭理想化为正义战爭。西班牙是这种新性質战爭的第一战場。“吉拉特·得·魯息雍”歌曲清楚地指出了在十一世紀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十字軍运动由于給貴族提供了无可限量的前程，会做到停止私斗运动所未能做到的事情。

早期教会曾反对一切战爭。从罗馬帝国和教会結合之后，它承認了：那些保卫国家和財产的战爭是合法的。但从查理曼征服薩克森人时期起，反对异教——不信上帝的——人民的战爭，也被認为是正义的。在封建制度发展的时代，欧洲是一个內战的世界，而停止私斗以及对西班牙和对圣地的十字軍运动，大有助于它摆脫这种局势。十字軍把战爭看作神圣的，而这观念最后約在1150年的格累細亚“詔令”里确立起来，“当时，軍事精神和宗教狂热混淆在一起，僧侶和軍队汇成为宗教-軍事团，而上帝战爭代替了上帝休战了。”而且，迟至第二次十字軍时期，圣伯尔納德还抱怨說：“根据什么任性的决定把我推选为这次出征的将領和領导人呢?我为什么竟来負責一营，走在武装兵士的面前呢?”

把封建貴族中大批最殘暴倔强之徒轉到外地去，使西欧社会免于劫掠，那无疑地是僧侶們之所以提倡十字軍的一个动机。为了这个目的，在十字軍开始前的好多年，西班牙半島上的战爭曾受到一种灵巧而又有組織的宣傳的支持，而这宣傳方法，当十字軍兴起的时候，也得到更巧妙的利用。

剛在十字軍之前和十字軍时期中，宣傳品泛濫欧洲；其中包括有教皇的訓諭、傳閱文件、外交文件、官方布告、十字軍战士的信札、記事、傳說、詩歌，数量龐大。这些宣傳品很多是純粹虛构的、临时捏造的，旨在鼓起兴趣；例如，教长西緬写給烏尔班二世和西欧諸王公的信件，叙述污辱圣墓和对朝圣者的暴行，又如，所謂关于发現神枪的故事。所有这一切，不管眞伪如何，都屬于所謂“鼓

动文学"这一类型，并且是富于詞藻的文章。

从西欧到东方的朝圣者們，对于所受到的待遇，沒有正当理由来发出怨言。在969年前，他們也沒有发出过怨言。在那一年，由于战爭的变化，叙利亚再度轉到拜占廷統治之下，于是帝国政府为了增加財政收入，对朝圣者課征了特別捐稅。在这以后，直到1071年土耳其人占領叙利亚和耶路撒冷为止，所有西欧人的訴苦，都是完全針对着拜占廷的。

在塞尔柱土耳其人的統治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地位，沒有多大变动。他們主要的新負担，就是加在土地上的新稅，以維持土耳其駐防軍的經費，而这些軍队是用以保卫国土，以防御拜占廷从小亚細亚或从海上来进攻的。正在十字軍运动爆发之前，关于朝圣者在东方遭受土耳其人虐待的痛苦之大部分流行的傳說，是由于反伊斯兰教的宣傳而起的；这种宣傳利用了群众的輕信心来煽起群众的狂热。的确，小亚細亚的基督教居民受苦深重，但那是因为拜占廷帝国还在和土耳其人爭夺那些省区的控制权的緣故。在那里，連綿的战爭和劫掠状态繼續存在，直到曼西克特战役慘敗之后拜占廷在小亚細亚的权力崩潰为止。但是在圣地和叙利亚的情况則不同；在那里土耳其的統治，已是一个旣成事实。

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寬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統治他們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見的拜占廷历史家，也隱約談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統治而不愿受皇帝的統治……在塞尔柱統治下的基督徒比在拜占廷帝国中部的基督徒，要幸福些，而最苦恼的，是拜占廷边境上的居民，在那里他們蒙受繼續不断的侵掠。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沒有一点痕跡……我們也不可能不作出結論：許多基督徒已成为穆罕默德教徒①。

我們来分析研究一下，第一次十字軍的开始时，教皇烏尔班二世在1095年所发表的演說，是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了教皇怎样

① 拉姆塞：《弗里加的城市和主教区》，第1卷，第27頁，《当代評論》第90期。

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以鼓动的动机。教皇的演說，是由四个听講的人記录下来的，所記的不是教皇原来的話，而是他所講的大意；我們还有其他沒有直接听講的人所記的演說詞。演說中所引基督徒在东方的痛苦、土耳其人的"暴行"以及狂热的語调和完全赦罪的允諾，当然可打动一切人的情緒；冒險的愛好、战爭的希望以及采邑的前景，感动了封建主阶層；商业的机会和貿易的扩展，虽然在演說中沒有談到，但在教皇为請求海上援助写給热那亚人的信里，却是明白地說出了。最有意思的，是教皇在講到法国的領土时說：它"太狹窄不够容納它的稠密人口；它的財富也不多；連它所产的食粮也几乎不够供应它的种田的人們。因此，你們互相廝杀吞噬，你們进行战爭"。

在第一次十字軍时代的历史家中，不止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曾观察出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动机；宣傳者花言巧語，是瞞不过他們的。

因为有些人由于好奇心而到东方去；其他的人由于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对基督教的仇敌也好，朋友也好，以此来終止他們的貧困状态；还有别的人要逃避他們的債务，要逃避他們应該履行的义务，或要逃避为了他們的罪行而应得的处罰。只有少数人，沒有屈服于流俗所崇拜的东西，而是由一个神聖目的所激动起来的。

十字軍，对欧洲的尤其是法国的农民，在經济上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大批平民以非常的热情，投入了运动。基柏特·得·諾根特，一个目睹的人，在下面一段精彩的文字里，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法国人在这时期遭到飢荒；接續而来的歉收，使谷物价格飞騰上漲。唯利是图的商人們，按照他們的慣例，靠着一般人的苦难，还在进行投机买卖。食粮又少又昂貴，穷人吃树根野草来充飢。十字軍突如其来地喊声一起，立刻到处得到响应，倉庫的大門打开了。于是，原来价格貴得不得了而无人能买的食品，而現在当大家被激发起来而要出发远征的时候，就不計什么价格出售了。我們曾看到七头羊只售五便士。飢荒情况消逝，富饒景象接踵而来

了。因为大家都急切要走上十字軍的道路，大家赶快把旅程上所不需要的一切东西轉換为現款；于是出售的价格，不是由卖者而由买者来規定。最值錢的物品是旅程上所需要的东西，但其余的东西，則不計什么价錮而卖掉了。

在分析这一段記載之后，我們清楚地看出：法国这种飢荒情况，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是由于糧食商投机行为的人为原因所引起的；十字軍的号召打破了这項壟断居奇行为，因而价格暴跌；那使行将要离去的人們受到严重損失，而使留下的人們获利。在这一时期奥拉·伊克哈德住在德意志，他写道：法国农村遭受着私战的痛苦；国内发生了飢荒，而与此同时，德意志在亨利四世有力而又賢明的統治之下，則是繁荣的。他还扼要地說，“他們〔指法国封建主——譯者〕荒廢了自己的土地来貪得无厭地爭夺別人的土地。”基柏特·得·根特在他的《圣战史》里写道，“在这个时候，騷乱使整个法兰西王国四分五裂；到处有盜劫、交通阻断和放火行为。”在西欧，尤其是在封建暴力最强横的法国，当看到这批穿着盔甲的搗乱分子向东方馳騁而去的时候，人們一定会立刻深为庆幸的。好战的本能，已由停止私斗运动部分地压制下去，而現在又找到了新的活动場所。关于这种庆幸情緒，我們从苏哲尔簡洁的信里，获得鮮明的証据；他是法国的宰相，当路易七世为了第二次十字軍东征而长期留在东方的时候，他写信給国王請他返国。信里說，“亲爱的国王陛下，我必須請您听听全王国的呼声。当您王国的男爵和貴族們已經回来，您为什么还逗留于野蛮人〔穆罕默德教徒〕中間呢？您王国的搗乱分子又进入了王国，而应捍卫王国的您，反而象放逐般地逗留在外。您把羊群交給了豺狼，把領地交給了暴徒。我們懇求陛下，我們本着对您的忠誠提請您注意，我們祈求您憐惜，我們請求您恩寵。請勿逗留在外。請即返国，要不然的話，您在上帝的目光中，将犯有破坏您登极时的宣誓之罪了”①。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27期，第767頁。

第一次十字軍空前地需要現款，这一点終于打破了这个时代的“自然經济”状态。当然，对一个要到东方去的十字軍士兵来說，完全不可能把足够的物品随身携带来在路上維持自己的生活。結果是那窖藏了好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貨币，由住持、主教、貴族、甚至农民，拿出来得重見天日；数量可观，足以駁倒西欧貨币的缺少是由于貨币外流到东方去之論点。眞正的原因，是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和早期封建的不靖状态所发生的混乱局势，曾使人們把他們的貨币窖藏起来。

参加十字軍須先准备現款，也就是說用抵押財产或用出售財产来获得現款。“神聖道路”不是供穷汉走的。为此，很多貴族、很多自由人負債重重，无以自拔。凡愿参加十字軍的人，貴族也好，农民也好，无論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必須获得行装和現款；所以，他們出售或抵押財产，或掠夺犹太人。基柏特所描写的十字軍士兵出发前的情况，表明了經济上的明显混乱。

当时，出現了一个奇特的經济現象。凡在路上可以应用的現款和动产是“高价的”，而不动产和不可搬运的財产，尤其是土地，是“廉价的”。因为十字軍兵士的財产几乎全都是土地，所以他們必須用不动产来换取現款。因此，地产的价值跌到远在它的通常水平之下。在十字軍热忱最高的地方，房屋和田亩几乎售不出去。普通貿易陷于停滞。那些有現款的地主，特别是寺院，在有利的抵押条件下，攫取了这种財产。福伊克斯伯爵把他的部分土地讓出来以应付开支；黑諾特·鮑尔文把他的大批庄园抵押給利格主教。摩雷斯姆寺院所做的交易例子，有意义地表明了領主为了到耶路撒冷去怎样获得必要的經費。有一个地主出售他的土地給僧侶，获得二十七鎊，两个弟兄出售他們的財产，一个获得一头騾，另一个获得三十先令；另有一个抵押他的庄园，获得十六鎊。我們很有趣地注意到：在这种財产的轉移中，有很多是和小土地有关系，完全

是自由地的范圍。"我們不致作出結論說：宗教机关依靠十字軍兵士的需要来大发其財，或十字軍运动使土地变为市場上的滯銷貨。但是明显的，十字軍造成了对現款的新需要，富裕的人們由于拥有多余的錢，得从这运动里获得利益。"法国腓力一世以一千五百銀馬克，从布尔日伯爵那里購得布尔日郡。罗伯特·柯托斯把諾曼底抵押給他的弟兄，英国威廉·魯佛斯。

很多农夫利用空前需要現款的机会来从农奴制中贖买他們的自由，或者想法使麻烦而变化无常的庄园租稅改成为固定的貨币租；許多村社整村整村地受到团体精神的鼓舞，从它們的領主那里購取了特权状。

这些交易对于那些手中有現款，又够聪明而留在家內的人們，是有利的，因为他們利用牺牲他們邻人的宗教热忱来获利。可是这变动对犹太人是不利的。在这以前，犹太人曾是社会中被輕視而又受到寬容的成員。在十字軍之前，大部商人可能都是犹太人，而犹太社会，在很多城市里，尤其是位于象莱茵河和罗尼河商路上的城市里，是富裕的。因为法律禁止犹太人住在乡村里或購置土地，他們曾完全依靠貿易和放款来过活。所以，在十字軍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是欧洲唯一出名的有相当数量現款的阶層。由于这个緣故，在这以后，西欧犹太人成为經济上广受妬嫉的牺牲品，因为这种妬嫉心理，由于当时的宗教狂热，更加厉害。反閃族主义是在十字軍运动里誕生出来的，起于經济的妬嫉多于宗教的仇恨。于是犹太人到处受苦深重。群众痛打他們，屠杀他們，都成为家常便飯；我們可把这个时期作为中世紀城市里犹太人区的开端。

烏尔班二世原来計划：第一次十字軍队伍完全由欧洲武装騎士来組成。但是，他沒預見到下層群众在这运动里已經大大地覚醒。教皇委派一批正式傳教士到欧洲各地向騎士阶層宣傳十字軍运动，但除了他們之外，还有自告奋勇的、无知而又狂热的馬路演

說家，象臭名昭著的彼得隐士那样；他們跑来跑去，在市場上，在十字路口，向农民鼓吹十字軍运动。結果，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法兰德斯及萊茵兰，出現了农民的自发队伍；而他們原来是順服地忍受着农奴的命运的。当十字軍的号角一声响起，成千也許上万农民群众离开了他們所附着的土地，摆脫了他們所負担的庄园义务，离乡背井，走上了十字軍道路。由于这自下而来的压力，封建社会的陈腐外壳迸裂了。基柏特·得·根特以下面的話，生动地描写了这些組成所謂"农民十字軍"的可憐而又受迷的徒步旅行群众。他說道："再也沒有如此令人伤感的事情，象我們看到这些可憐人的情况那样：他們以牛羊当作馬用，沿途拖着双輪小車，車上堆着破碎行李和他們的孩子們。每經过一个堡壘，一个城市，孩子們伸出他們的手問道，这是耶路撒冷嗎?"在中世紀社会下層群众間这种大騷动中，古老的民間傳說、旧日耳曼的异端邪說、法国古老的督伊德教迷信① 又重新出現了。有人告訴我們說：农民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寻找圣地；他們除了用繩牵着的山羊或雌鵝(条頓神話中的神圣禽兽)作为响导外，再也沒有別的响导；农民还把灯籠挂在橡树枝上来占卜吉兇；那是导源于督伊德教崇拜橡树的仪式的。

然而，对于农民队伍混乱状态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大其詞。必須記牢，几乎所有的編年史家都是僧侶或貴族；而他們无例外地是敌視任何农民的行动表示的。那些跟着彼得隐士和华尔特穷汉走的群众，在开始时一定曾带着現款，因为保加利亚人曾在尼西附近，劫夺彼德隐士的錢箱。当这队伍不复有錢来購买食品而开始沿途掠夺田舍农庄之后，紀律遂蕩然无存了。这些农民"軍队"沒有一队曾經到达耶路撒冷那里。这队伍由于貧困、疾病和毆斗，在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已死伤很多。这些可憐队伍的殘余分子，又

① 督伊德教是古代高盧人的信仰。教徒認为五点花样 (Druid's foot) 具有奇效；現在欧洲咒語中还使用它。——譯者

由于飢餓和土耳其人的进攻，大部死在小亚細亚。

在农民队伍出发几个月之后，武装貴族和騎士也走上了征途。但他們一到君士坦丁堡，就以貪婪和妬嫉心理来注視这个大城市。的确，在西欧方面，再也沒有一个城市，如此寬广，如此富饒，如此富于壮丽的宮殿、教堂、广場、街道、浴場象君士坦丁堡那样。沙脫尔·富耳奇惊歎地喊着，"多么偉大的城市，多么华丽，那里有这样多的寺院和富丽堂皇的宮殿。这城內的制造业，使人一看就感到惊奇。如果我把城內一切好东西，黃金、白銀和貴重衣料怎样丰富的情况叙述一番，那会令人吃惊的。它的港口时时刻刻有船进口，满載着一切为人类所需用的东西。"这些情况使十字軍兵士油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首都竟落在宗教分裂派的希腊人手里；从而他們很快就对这些人显露着輕蔑的态度；另一方面，希腊人也把西欧人看作可怕而粗暴的野蛮人。法国人的饒舌，还使他們感到惊訝。波希蒙德是那个曾阴謀占領黃金角畔城市①的可畏罗柏特·基斯卡的兒子。他最垂涎欲滴地注視着这偉大首都，并在六年之后曾白費心机地企图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之志。

关于十字軍軍队在小亚細亚的进軍以及圍攻安提阿（1097年10月20日—1098年6月28日）时所遭遇的艰难情况，我們无須論述。但在这里应提及十字軍兵士第一次尝到甘蔗这一回事。曼兹柏立·威廉写道，"在圍攻过程中，霪雨連綿，困苦突增，很多可憐人冻死，因为他們沒有衣服可換，又在連續好多天里不能找得避风雨的地方。当时，帳幕和木头都感缺少。但他們为了稍减飢餓，經常咀嚼他們叫做'蜜莖'的甜蘆，即甘蔗。"亚斯·艾伯特还說道，"这一类草，是每年費了巨大劳力来种植的。在成熟以后，他們把它放在石臼內搗碎，絞出它的汁液，再把汁液倒入鍋內使它凝結而硬

① 指君士坦丁堡。——譯者

化，直到状若白雪或白盐为止。他們把它的碎屑調入面包內或溶解于水里。这种莖，他們称之为“苏克拉(zucra)”。

十字軍相繼蹂躪了叙利亚、以得撒和巴勒斯坦；1099 年 7 月在占領耶路撒冷之后，即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国。这是一个奇特的現象。在历史上我們第一次看到欧洲封建制度扩展到它本部以外，而在很古老东方的領土上建立了一个基于封建原則的国家。在那里輸入了古怪的官銜，象安提阿亲王、的黎波里伯爵、以得撒伯爵，半寺院性半軍事性团体，象圣殿騎士团和十字軍救护騎士团；外国封建制度的政治組織，外国法律、外国风俗、外国习慣、外国語言等等。

从地形上看来，耶路撒冷王国是地中海东岸的一条又长又寬的地带；它原来是一系列有古老历史的省分(現在叫做男爵領或封邑)。它最寬闊的地带，是在北部，在那里以得撒連接着上幼发拉底河；在南部，它的保护权扩展到賽那的寺院和紅海畔阿利亚小港那边。但在东方，十字軍兵士始終未能占領阿勒波、哈馬，尤其是大馬士革；后者象矛头一样，对着拼凑成的王国領土中最脆弱的环节。附屬于安提阿侯国的，有西里西亚，即小亚美尼亚。耶路撒冷王国所处的危險地位，从来沒有被解除过。在东边，有一个敌对的穆罕默德教世界；在南边，埃及不断地进行威胁；在西边，拜占廷帝国一向对它抱着半敌对的态度。

从經济社会史的观点看来，十字軍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試驗，也是一次又龐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險行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軍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在地理大发現时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中，欧洲更大規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張，只不过是跟着十字軍开始的运动之延續。

諾曼人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英国所获得的經驗和那些支援西班牙基督徒而定居在那里的几千法国人所获得的經驗，作为先例看，对十字軍解决叙利亚和圣地的殖民問題，都是沒有多大帮助的。因为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諾曼人及其他法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居留地，迥然不同于南意大利和英国的諾曼殖民地，也迥然不同于 1204 年巴尔干半島上和希腊的法-意殖民地。因为在这些地方尽管在种族、語言、风俗和文化上分歧很大，但所有被征服的居民，总是基督徒。然而，在东方則不同，穆罕默德教和基督教的欧洲文明沒有什么共同之点。它是敌視西方文明的。至于他們所看到的当地基督教居民，主要是叙利亚人，虽对十字軍士保持外表的中立，但实际上他們和穆斯林人是友好的。

上述封建政府的建立，使土地的原主遭受剥夺。在封建等級制里，穆罕默德教地主和叙利亚地主都沒有什么地位。这項措施的不智和不公平，注定要成为耶路撒冷王国在不到百年期內归于毁灭的一个基本原因，因为这批被剥夺的地主(其中很多是基督徒)被迫投入穆罕默德教陣营，而成为十字軍的死敌。十字軍使这种敌对情緒更剧烈化，因为他們把本地基督教居民和“异教徒”相混淆，一概加以屠杀。这种殘暴行为，注定要在叙利亚种下禍根。有一篇論文里說，“的确，异教部族逃到山上和荒野里，离开住宅、茅舍与充满各种財物的堡壘。”① 富裕的叙利亚財主，是主要的受难者。小土地所有者在新地主的土地上淪为农奴，或潛伏于港口城市內，在那里他們設法充当夫役和手艺人以求餬口，直到征服的初次风暴过去为止。

农奴不是叙利亚人，便是阿拉伯人；但其中极大部分是叙利亚人。农奴的境遇比西欧的还要困难，因为在西欧，到了 1100 年时，

① “Pagana vero gens fugiebat in montes et in valles et dimittebat domos et casales et castella plena omnibus bonis.”

由于租税的規定、实物租改为貨币租及有关农奴的法令和农奴的釋放，使农奴的生活状况达到可以容忍的地步。农奴不复是一个“可任意被課稅”的人。但是在东方，我們看不到这种减輕負担的特征，这一事实自然使叙利亚的不自由阶層回想到拜占廷或阿拉伯时代是个黃金时代，并使他們成为东方边境外穆罕默德教政权的秘密朋友。而且，教会土地上的叙利亚农奴的命运也不見得比世俗土地上的要稍微好些。教会在亚洲和在欧洲一样，是硬心腸的稅吏。

基督徒和阿拉伯人通婚所生的子女，被称为“杂种”，象印度的“欧亚”人或半种姓的人那样。“法兰克語”是一种混杂語，包括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象中国的洋涇浜英語一样；它是商业用語。在非本地人和非奴隶的人們中間，希腊人系最低阶層。十字軍輕視希腊人，因为害怕他們同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有所勾結。但他們的营业技能、他們的熟練語言、他們的和藹态度，使他們成为有用之人。亚美尼亚人的地位較好。小亚美尼亚还保持着它的独立地位，它的国王又是十字軍的同盟者。亚美尼亚人善于做官，而且經商也是非常成功的。在整个王国内，有着好几千亚美尼亚人；他們的望族和十字軍的望族互相通婚。叙利亚和圣地的犹太人，人数不多，但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差的；和这个时候他們在西欧所經受的待遇相比，有天淵之别。这批犹太人是商人、手艺人和手工业者(染色业几乎完全在他們手里)、貨币兌换商、征稅員、庄园的管帳員和管家。他們保存了他們的宗教集会和学校。犹太人虽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也得到容忍。

王国的东境上的貝督英部族是很活跃的；他們飼养无数的牲口群，馬匹、羊、駱駝；他們不断地从一个牧場移到另一牧場；碰上他們敢于或能够行动时，他們对基督教領土进行掠夺侵襲。他們当中有少数部族比其他部族較少遊牧性，但它們都是“强悍而冒險

的部族"，并对基督徒的敌人，有默契的傾向。薩拉丁在1187年举行大进攻时，善于利用这些部族；因而占領了耶路撒冷。

欧洲人的源源流入，对耶路撒冷王国的軍事力量，是很少稗益的。因为其中大部分是朝圣者、旅行家、僧侶、商人。王国經常急切需要有力的軍队；軍队力量不足，显然是十字軍为什么未能征服叙利亚內地、占領大馬士革和阿勒波的主要原因。在占領"圣城"之后，很多十字軍士，認为他們的任务已經完成而遄返本国了。还有更多的人，离开那里，因为他們的幻想已經破灭，或者因为他們在大規模的占夺土地中，运气不佳。因此，不多年以后，只有一小撮貴族留在那里。如果这支軍队不是不时地由十字軍的新队伍来补充，耶路撒冷王国的軍事效能将会十分减弱，連征服加黎利和那普魯斯也将成为不可能了。除在非常紧張的时期，象在1146—1147年和1187—1190年穆罕默德教的威胁达到頂峯的那样，眞正十字軍对固定人口的增加，所补无多。他們和朝圣者一样时常来来往往。眞正移入境內而永久居住的人，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来的商人阶層。因此，商业兴旺起来，但这是唯一的繁荣象征。政府无能，政治腐敗。然而，另有一批人，蜂涌而来，而他們是最坏的分子；就是，西欧社会的渣滓：碼头流氓、海岸上拾荒者、陆上小偷和水面小偸、乞丐、走江湖者、亡命之徒、得到假釋許可状的犯人、逃犯、釋放犯。扎克·得·維特里曾写过一篇精彩文章来描写这一批傢伙。

为了移民于受到破坏的地区，国王鮑尔文一世曾力图吸引一部分住在約但外部的基督徒移入。在1182年，馬倫教派① 虽在安提阿教长面前宣誓要放弃他們的旧信仰，但拒絕离开他們在黎巴嫩山上的要塞。在耶路撒冷王国內，亚美尼亚人、查科拜派②、希腊

① 由叙利亚僧侶馬倫(Maron)所創立；这一派基督徒住在黎巴嫩山側。——譯者

② 即一性派，由查科布斯(Jacobus)所創立。——譯者

人和叙利亚人消极地接受了拉丁統治，但是他們沒曾宣誓要放弃他們原来的基督教宗教形式。这些居民在城市里构成了又活动又聪明的中等阶級；他們享有保持財产之权，并在他們自己长官(叫做“雷斯”)的管理下，享有行政自治之权。

叙利亚的基督教殖民地在十二世紀时，尽管它們的政治組織是不稳固的，但还是欣欣向荣地发展着，这一状态对欧洲的一般文明是有貢献的。主要是因为大批意大利移民从事于經商的活动。在占領的初期，港口各城市民阶層被禁止占有土地。但这項禁令不久廢止了。要阻止聚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法兰西人、意大利人、佛来銘人、日耳曼人、英国人在城市中获得小塊土地作为花园、葡萄园、果园和住宅，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东方形成了一个专心致志于貿易而不能作战的市民社会，这一社会很快地抓住太尔、西頓、凱撒利亚、亚克、貝魯特、扎发、亚实基倫各城的商业。这里，由于需要和环境关系，还不得不撤銷封建法律，因而不事战爭的人口日益成长起来。貴族阶層，尤其是在軍队任职的騎士，由于高傲的习气，不愿同平民軍队并肩作战；而在同一时期，西方的市民軍队在作战方面已表現得很好，象倫巴城市的市民軍队，1176 年在累格納，1214 年在布文所表現的那样。

連被輕視的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到后来也象从西欧来的有錢者那样，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在这一类的居民中，有着甚至比意大利人更为銳敏的商人，因为他們是本地人；但是他們在軍事方面，比西欧商人更少有影响，因为他們被疑是同情于敌人的；他們固然不愿意去作战，即使他們愿意去的話，在战場上，也不会被信任的。这个市民阶層在东方頗有勢力。当十字軍队到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們已看到拜占廷政府的大批民法依然有效，因为阿拉伯人曾很聪明地保留它作为臣服基督教徒的法律。这种法律后来大量地并入一种特别法典，叫做“市民法院法令汇編”，这

是在 1173 和 1180 年間編訂的。这一法典值得一提，因为当这类法律在西欧方面，还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时，它已是一部完备的市民法典。当时，在西欧所有的少数城市宪章，还远不能認为是市民政府的完备組織法。只有 1183 年倫巴城市的大宪章最为近似。

十字軍队的侵入“圣地”，原来是經由陆路的，所以必須获得海口来維持通达欧洲的交通綫。意大利城市的艦队之所以帮助他們这样做，不是由于什么宗教的观念而是由于要获得商业利益的动机。对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来說，十字軍似乎是替它們“开放門戶”。它們从开始时起，即抓取这种机会；当十字軍使用它們的艦队，不論用在战斗象在进攻太尔城那样，或用在西欧的运輸时，它們就要索取大量报酬。意大利城市艦队曾給予很多极其有效的帮助。1101 年 4 月 25 日，鮑尔文一世曾和热那亚人締結了条約，規定热那亚在每个由于他們援助而占領的港口城市里，可获得一个“居住区”和1/3的战利品。于是，十字軍立即开始对叙利亚海岸港口的进攻，而且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被占領——1101 年占領阿苏夫和凱撒利亚，1106 年占領阿帕米亚，1109 年占領雷奥狄西亚，1124 年占領太尔。甚至还在征服之前，他們已对这些土地作了瓜分！热那亚首先援助了波希蒙德，即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来占領的黎波里；因此，它在安提阿、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各获得一个“居住区”。比薩因援助耶路撒冷国王而获得了扎发的一个“居住区”。威尼斯也曾帮助过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

拉斯金在《圣馬克墓》① 一書里，生动地描写威尼斯在有力的总督多米尼谷·迈克尔領导下，怎样在太尔获得了最大部分的战利品：

① 拉斯金（1819—1900 年）是英国艺术家与文学家；他所著《聖馬克墓》（“St. Mark's Rest”）是叙述威尼斯的历史的。——譯者

总督留他的兒子負責国政，自己率領四十只大艇及二十八只有鉄嘴的战艦，啓程往"聖地"去……每只有鉄嘴的战艦各有一百支槳……它們引誘薩拉森艦队出海，而后予以猛攻……在这次战役之后……跟着召开了軍事会議，会上激烈辯論：应圍攻太尔，还是应圍攻亚实基倫。因为意見紛紜，莫衷一是，这事情提給上帝判断。他們把这两个城的名字放入一只籤筒內……太尔中籤……当时，它尙是一个光荣的城市，尙是海上財宝的王后；它主要以玻璃和紫袍出品而出名，它控制一个富饒的平原，水量充足，灌溉完善；它也以出产甘蔗而著名……为了援助这次大圍攻，威尼斯人提出条件：在每个隶屬耶路撒冷国王的城市里，威尼斯人应获得一条街道、一塊广場、一个浴場、一所烘面包房……以及飲水和面包的适当控制，全部免稅；他們应使用自己的天秤和度量衡……于是，法国十字軍士和威尼斯人就分段圍攻太尔城；前者从陆上，后者从海上进攻……其时，他(总督)所带发給水兵的餉銀，已經用尽。但他并不想要依靠汇款来接济。他制造一种革币，上面盖着聖馬克和他自己的盾牌印章。他允諾他的士兵說：每个这样盖着印章的革币将来在威尼斯可換兌一个金币……这样，圍攻繼續进行，直到太尔人絕望而乞降时为止。于是太尔人获得人身和財产的安全保証；但这使基督教兵士深为憤怒，因为他們原来想要劫掠太尔城的。后来，太尔城分为三部分，其中二部分給予耶路撒冷国王，而第三部分則給予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在他們所得的部分內指派了一个文官来管理民政，一个武官来負責軍事……这样一来，威尼斯国家在亚洲建立了一个穩固的殖民地……而殖民地同薩拉森人能保持着和睦的关系。

在十字軍之前，馬賽似乎已是在南部法兰西富有商业冒險精神的唯一城市；它名副其实地是意大利城市的勁敌；它把十字軍早期的部分貿易拉到自己的港口。历史沒有告訴我們关于馬西利亚人① 在拜占廷帝国內有过什么机构的遺跡，我們也找不到有任何馬賽商人在君士坦丁堡获得特权的記載。但我們有着各种資料，說明馬賽在巴勒斯坦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它参加十字軍的情况。1117年，鮑尔文二世曾認可馬西利亚人在耶路撒冷組織一个由他們单

① 即馬賽人。——譯者

独居住的"居住区"。国王鮑尔文的繼承人佛尔克，因为他們对他服务有功，准許他們在耶路撒冷王国全境內豁免捐稅。1152年，鮑尔文三世賜給他們巴勒斯坦各港口的商站，連同慣例特权在內。在"圣城"失去以后，在1190年，盖羽·得·拉西格南回复了馬賽人的所享有的特权；他們的船只，不論大小，一概豁免港口稅；他們在圣貞德城設立了自己的法院。这些事件，說明馬賽在亚洲的商业里所有的活动和所有的利益了。1190年，馬賽已有充分的海上权力，能够运輸大批跟着獅心理查到东方去的十字軍队。

在所有的王国港口內，意大利城市获得了大量的完全特許的租讓权和封建义务的豁免权。这些权利表現在"居住区"贈与方式上，"居住区"是母国在"圣地"領域內一塊脫离王国管轄权的領土。每个集团有着自己的官吏、郊区、貨棧、浴場、教堂，并使用自己的度量衡。在这些西方商人集团中，有的甚至还撈到一批地方稅收。例如，热那亚人在太尔、亚克、雷奥狄栖亚和圣西緬，征收1/3的港口稅。馬西利亚人在1117年得到耶路撒冷的一塊"居住区"，后来，在1152年得到太尔的一塊"居住区"；在这两塊"居住区"內，他們享有征收捐稅之权。意大利商人殖民地，太忠心于它們的母国，太不信任耶路撒冷王国政府的封建性質，太愛錢若命，因而他們不容許它們的丰富收入被課稅。它們要求完全脫离王国政府終于如愿以偿，因为十字軍极需依靠它們的舰队，所以不能拒絕这項豁免权的要求。这样一来，在叙利亚和"圣地"港口上出現了独立的"商站"即外侨居住区(Fondachi)，北京的使館区和上海的租界区，就是这些商站的近代抄本。"Fondaco"(单数)这个名詞从希腊字"Pandocheion"(意指一个貿易地点，或者象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商站"的旧意义)得来；这个名詞阿拉伯人改为Funduk，而意大利人改为Fondaco。

"商站"是一个基本上为了商业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但它

在外国領土內保留着它的居民在母国所享有的社会利益和活动。在圍墙內，往往占有面积很大而經常沿着河边的地方，有一所教堂、一条街道或一所市場、一塊广場、几所浴場、烘面包房和釀酒作坊、一所办公室以及其他住所，还有几所儲藏貨物的大儲棧。这种居留地有时竟包括一个市鎮或一个城郊的整个地区。外国商人在他們自己法律的管轄下住在那里。这項治外法权經常載入特許状里；有时还有一項条文：凡本地人和外人間的訴訟案件，概归外人法院并按外人法律审理。意大利商人依靠这种特权的保护，易于壟断利凡得的商业。除經营商业之外，殖民地上的行政，是由母国政府派专員来掌管，叫做"領事"(热那亚人和比薩人)，或叫做"监督"(威尼斯人)。这些职位由意大利最大望族来充任，在尊严和財富方面，堪与近代英屬印度各省的总督相等。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港口上，"三巨头"——威尼斯、热那亚、比薩——不是完全势均力敌的，但象在太尔和亚克这一类的最重要海港上，它們都有"居住区"，其中亚克城最为重要。威尼斯人在愛琴海、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細亚各港口的商业活动，比在"东方"还要大；在叙利亚和"圣地"內，热那亚占第一位，比薩占第二位，而阿馬斐占第三位，直到馬賽赶过它为止。利凡得港口是古代商路的終点；这些来自波斯湾一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商路，自古代以来，都輳集于地中海沿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构成一种类似亚洲和地中海間的緩冲国，經过这里，它們和欧洲維持接触。从海岸向后，有两座平行的山脉，两山之間是又深又寬的盆地。这双重的屏障，有时被横截的山路所切断，主要是在阿勒波和安提阿之間、在霍姆斯和的黎波里之間、在大馬士革和太尔之間；商路就是通过这些地点的。象哈馬和波斯特拉这一类的內地城市，因为成为从穆罕默德教腹地来的商路上的中途站而获得利益。后来，无孔不入的意大利商人，滲入这些內地市場；甚至在阿勒波

和大馬士革也設立了支店。我們也应談到有些象米丹和伊布林那样的季节市集。在拜占廷和阿拉伯統治时代很出名的耶路撒冷九月市集，仍由十字軍繼續举行。从香宾市集来的商人們都会集在圣貞德城里。

东方流通的貨币，和人口的复杂情况一样，种类繁多。当十字軍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們看到那里不仅使用着拜占廷帝国貨币，也使用着穆斯林人貨币，为的是使貿易关系不致中断。此外，十字軍也从西欧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大量貨币。耶路撒冷国王和王国的大男爵不久也建立他們的造币厂。但市面上最流通的貨币，还是拜占廷和阿拉伯貨币。主要金币，是希腊“貝占”币(値一百八十銀便士)和阿拉伯地那币。銀币中，有希腊銀币、法国图尔銀币、的黎波里銀币以及安提阿銀便士。十字軍国家沒有鑄造过銅币，只把自己的图案刻在拜占廷和阿拉伯銅币上面。“耶路撒冷宪章”列举“貝占”、“地那”、“銀馬克”、“苏”(即苏里德，等于十二便士)各种貨币；还有小輔币：阿拉伯第倫 (dirhem 从希腊文 drachma 得来)、卡洛布 (kharoub 从希腊文 cheration 得来)以及拉波因(rabouin)。銀馬克不是一种貨币，而是一种計算价值的标准，象今天英国的基尼① 那样。貝占、地那和法国圣路易金币是差不多等价的金币，它們的实价約合十先令或美元二元五角，但它們的購买力在中世紀时代远超过这个数額。銀币折合美国的五角币，或者約合英国的半皇冠币(二先令，六便士)。但是，也須注意到購买力方面的差別。在十三世紀中，威尼斯和热那亚百合币②和佛罗倫薩百合币出現于利凡得。为了便利內地貿易起見，曾鑄造出一种特別貨币，叫做“薩拉塞那”(sarracenat)，一面刻着基督教象征和文字，另一面刻着穆罕默德教象征和阿拉伯文字。这种

① “基尼”的价值規定为二十一先令。——譯者

② 百合币(florin)是表面上印有百合花紋的金币。——譯者

湯克勒德① 所发行的貨币，今天是世界上最稀罕的一种貨币。

这种东方貿易中所包括的商品，有当地产品和进口貨两种。叙利亚在农业方面出产橄欖、葡萄酒、食糖、枣子、无花果。黎巴嫩的杉木提供有价值的木料。叙利亚棉織品和絲織品是很珍貴的。生絲出产于安提阿、的黎波里、托托薩；安提阿的錦緞、太尔的玻璃器和金屬器、灯盏、杯盆、陶器、珐瑯品，都是出名的；金綫布和帷帳在亚克制造；有很多染坊，設在的黎波里、拉塔奇亚、薩基塔、希伯倫和耶路撒冷；太尔是一个制糖业中心。在約但河出口处气候近于热带的冲积平原地，我們还可看到十字軍制糖厂的遺址，但現在已荆棘丛生。肥皂在安提阿、托托薩和亚克制造；甘露酒、果浆到处都有；耶路撒冷有一所制造一种叫做啤酒的釀酒坊。食盐是在死海沿岸煮炼的。

利凡得商品，主要是屬于奢侈品的貿易。关于这一点，有保留下来的稅册可資証明。这些商品中包括有棉織品和絲織品、金銀綫織成的衣料、太尔玻璃、陶瓷器、錫兰珍珠、印度宝石、象牙、染料木、葯材、阿拉伯香粉、香料、香味及香料酒。还有装飾品、香粉、調味品等等。这些产品除在利凡得外，不能从任何别的地方找到。象胡椒、丁香、麝香、肉桂和生薑这一类的东西所可获得的唯一地方，是巽他群島。所以和利凡得进行貿易是必要的；所轉运的商品，容量小而价值高，但可有巨大的利潤。

在交換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下列原料之外，再也沒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出口：谷物、奴隶、羊毛、皮革和毛皮。所以，所有貿易上的差額，經常用金銀的出口来抵消。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十二世紀中引起了現款的巨大需要，因而刺激了貴金屬的流通。由于这个緣故，封建欧洲的自然經济遭受破坏；而它的地位开始被貨币經济所

① 第一次十字軍中諾曼人的領导人。——譯者

接替;这样,在十二世紀中,欧洲的整个生活上发生了复杂的革命。

我們容易看出:什么东西需要最大,而这种需要的动机是西欧对那些有吸引力的奢侈品之慾望。但是,我們不能很容易地确定:这种慾望在十一世紀末期是否完全是新的,即是否是由十字軍所創造并刺激出来的。换句話說,历史家在討論这一段重要历史并企图就有关的力量作出相对的估价时,茫然不知: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結果。十字軍是造成这种慾望呢?还是这慾望刺激了十字軍呢?对于这个不能理解的問題,沒有明晰的答复。

我們很惊异地发現:耶路撒冷国王沒有好好利用他們周圍的这些財富而获得了利益。他們所拥有的物質財源,确然比当时西欧君主所拥有大得多。从本地人用阿拉伯文字所写并保存着的关稅章程看,各港口所課的关稅,似乎已給他們很龐大的进款。还有向队商征收的通行稅,以及按拜占廷先例而在工业方面所实施的很多专利事业。鑄币权完全屬于国王、屬于安提阿亲王、屬于的黎波里和以得撒的伯爵。国王有权訂立或撤銷賦稅,他占有港口最有利的关稅(亚克的关稅包括一百十四項东西);他課征船稅和队商稅;他收集穆斯林人和犹太人的人头稅;王室領地,范圍广大,包括森林、葡萄园、果园、矿产、采石場。可惜国王不善于使用这笔大財产,而把它浪費于教会和軍事寺院团方面;不使用它来僱佣兵士保卫王国而讓它从他的手指間落到貪官污吏手里;甚至讓唯利是图的資产者也分沾其中一部分。

教会在东方所得的利益最多,而所給予社会的报答却最少。当十字軍进入巴勒斯坦后,希腊教会被推翻。希腊教长逃亡在塞浦路斯島上。新建立的寺院收到大批土地贈与,因而在东方和在西方早已存在的情况那样,僧侶也成了大地主。他們甚至在欧洲也拥有龐大数量的地产。1178年时,耶路撒冷的郇山寺院所拥有的財产包括:郇山及其附屬地,城內的一个完整的“居住区”和开放一

个城門的权利，叙利亚、亚实基倫、扎发、那普魯斯、凱撒利亚、亚克、太尔、安提阿的乡村地产，太尔的若干房产和一所教堂，西里西亚的阿达那河上航行免稅权。此外，在欧洲下列各地区内，都有教堂和房产：西西里的格尔真提和喀大尼亚主教区内，意大利的亚尔巴諾和巴費亚的主教区内，法国的奥尔良、布尔日、波亚叠、瓦倫斯等的主教区内。

几乎所有的东方寺院以及軍事寺院团在西方也有規模很大的領地，这是在十字軍首次热潮里象陣雨般地贈給寺院的捐贈；拉丁圣馬利寺院、郇山寺院和約瑟发特圣母院所收到的特別多。那为保护朝圣者而建立的意大利圣雅科波·达尔托帕沙寺院团，在巴黎拥有財产。关于这种領地的巨大規模，我們可以十字軍救护騎士团的例子来說明。它們在西方所占有的土地，数量上这么多，以致把欧洲划分为七省，叫做“方言区”，再分成为修道院区。这种按方言的划分法，不是沒有意义的。遺留下来的文献資料包括产权証、租簿、什一稅簿、登录册、地产帳簿等等形式以及关于这些財产的管理，数达几万件之多。单就奥汾涅“方言区”来說，这些文献有四万多件。在这些卷册内，列滿着騎士团的采邑表。下列事实可說明对軍事寺院团的热潮达到了多么高漲的程度：亚拉崗和納瓦尔国王阿尔凡索一世在 1131 年逝世时，把他的整个王国留給圣墓教会、神庙騎士团和十字軍救护騎士团；这一贈予由于国内各等級的反对而未曾实行。

与其說教会是王国的一个砥柱，不如說它是王国的一个弱点。教会的財产，包括土地、葡萄园、果园、市場权利、港口特权已这么多，后来虽欲用法律来限制給教会的贈与亦屬徒然。这些財富激起了貴族和軍事寺院团的貪得无厭心理，因而王国的統治力量比前更加分裂而互相敌对。而且，教会采邑在“圣地”不象在西欧那样，是不負担軍事服务的。这些土地租給小农、园丁等等，或者由

不自由的劳动力来耕种。教会的領地日益靠着牺牲貴族和国王的領地而增长起来，但男爵与国王是王国的当然捍卫者。

軍事寺院团，虽是王国外部穆罕默德教敌人的可畏仇人，但它們却也是一个內部衰弱的根源。它們完全脫离政权而独立，只对教皇負責，好象純粹的寺院团那样；它們保有土地而不負担軍队服役义务的。实际上，軍事寺院团和教会一样，已构成国中之国。它們的財富是龐大的——整区的領土、广闊的領地、城市、堡壘、要塞、葡萄园、果园、羊群和牲畜場、矿場、采石場、市場权利、港口豁免权；此外軍事寺院团在基督教欧洲每个国家里还拥有类似的贈地。然而，据說，它們的土地比僧侶的或男爵的土地管理得好，耕种得精細。它們从欧洲土地上的收入，大部送到东方去，来建造宏大的城堡；这些城堡的遺址，今天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旧边境上，还使遊客們惊羡不止。

其时，当东方出現上述的事情时，在西欧方面，第一次十字軍也产生了一些奇怪而又出乎意料的效果。封建欧洲的整个社会被投入了一种流动的状态里。旧的情况开始迅速消逝，而新的事物也接踵而来。普遍浮动状态滲入所有的阶層，部分由于宗教的激动，但大多由于新的不习慣的經济和社会条件所引起。自从罗馬帝国时代以来，欧洲从沒看見过有这么多貨币在流通着。成千上万的农奴已得到自由，而那些仍被奴役的人們則滿腔不滿而有貳心。騎士和貴族繼續押出他們的土地以求現款；寺院以及那些窖藏現金的狡猾之徒因此获利；高利率到处流行；抵押期滿还款拖延；因而債主拒絕承認贖回权而占取了抵押品。城市正在要求特許状；市民阶層成长为一个人数众多而突出的阶級。僧侶阶層势力膨脹，世俗君主大为震惊，因而对教会改革者所竭力提倡的“教会自由”，比前更加側目而視。参加十字軍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因为热心的亲戚朋友往往以金錢、馬匹和盔甲等禮物，慷慨地饋送

給行将出发的十字軍战士。

在上述的影响和因素里，所謂“十字軍的特权”产生了一种又新又不調和的状况。烏尔班二世对十字軍曾允許消除罪孽，也許还曾允許物質利益。确然，物質利益不久就給予那些参加十字軍的人們；可是这也发生了不得人心的反射作用。这批人在离开的时期，不得因为債务而受到控訴；他們終身或在某一时期內豁免付稅；他們无須領主的同意可轉讓他們的土地；他們不得被傳喚到世俗法院去受訊，而在法律程序方面，获得僧侶特权。十字軍战士的妻子、兒女、財产和所有物，受到每个主教区主教的保护。这使封建主阶層深为憤慨；他們認为：他們的监护权遭受了侵犯，而这监护权对他們来說是有利可图的。在十字軍战士返国前，或在死亡未証实前，对他們的財产，不得提起任何訴訟。教会曾宣布一項十字軍战士延付債款的命令。1145年尤金三世曾发布命令說，“如果任何欠債的人愿誠心走上神圣旅程，他們得不付已經到期的利息；又如果他們或別人曾宣誓过付利息的話，我們以我們使徒的权力来解除他們的誓約。如果他們的亲戚或他們所住土地的領主不能或不愿供給他們必要的現款，他們无須获得他們領主的同意，得把他們的土地及其他財产典当給教会、僧侶或其他的人。”

当然，教皇这种高压手段的立法会触怒世俗王公的，因为那是对宗主的封建特权，进行了大胆的侵犯；而且，这种立法从經济观点来看，也是不公平的，因它剝夺了債主阶層的合法进款和收入，也沒有按法定程序而取消了債务者阶層的义务。准許附庸沒有获得他們宗主的同意得处理他們的土地这一办法，动搖了封建政府本身的基础。除这些怨言之外，还有农奴要求自由作为走上十字軍道路的报酬，如果受到拒絕，他們就一走了事。

腓力奥古斯都，剛在1190年第三次十字軍离国之前，制訂了法律来取締这种債务上的流弊；規定未来的十字軍战士可展期两

年清償他們的債务;但附有一項条款:1/3的債款必須在出发前交付,1/3在一年后,最后一批在第二年底。凡有土地的債务人,可把土地轉交給他們的債权人;領主对此行为,不得加以阻撓,除非他們已和附庸的債权人亲自協商妥当。僧侶和騎士,沒有土地或其他財物作抵押者,在出发往东方之前,必須提出保証人。在債务人离开的时期,債主不得对他提出訴訟,除非訴訟在債务人参加十字軍前,已經开始。如果有任何十字軍战士抵押或轉交他的土地,定期若干年,債务人在第一年应收取土地上的产物或收入;但債权人为了取得这一年的补償,在这抵押或轉交的产业滿期后还可繼續保持一年。然而,如果債权人耕种这抵押的土地,他得收取收获的一半作为劳动的报酬。

可是,教廷繼續恪守那早期不公平的和破坏性的政策,即照顧債务人而損害債权人的政策。1215年时英諾森三世規定:所有的十字軍战士概将豁免捐稅、关稅及其他的賦稅;如果有人对十字軍战士的財产进行訴訟,将处以宗教譴責的处分。到期的利息积累,連利息的欠款在內,都被专橫地取消。"如果有債权人勒索利息,应以宗教懲罰方法迫使他退还所收的利息。"犹太人当然由于这不利的教会立法而倒霉。"我們命令:世俗政权应責成犹太人退还利息;在他們退还利息之前,一切忠实基督信徒不得和他們来往,違者将处以驅逐出教的处罰。世俗政府为无力归还犹太人債款的人,規定一个有效的延付时期;使他們在啓程之后不将为了付息而蒙受不便,直到对他們的死亡或回来已經确实知道时为止。还应責成犹太人在扣除必要开支之后,把其时从抵押的財产所收到的进款算作归还的本金,因为这一种偏袒,即延緩归还而不撤銷債务,看来不会产生多大損失的。"

毫无疑問,教廷所頒布的这种橫暴而不合商业常規的立法,使欧洲的統治阶級、拥有产业的阶層以及愛錢若命的中产阶級对教

廷的不滿情緒大大地加剧起来。教廷所采取的措施，就是那項声名狼藉的財政政策的一部分，后来流弊丛生，以致較稳健的分子都起而反抗。1303年，邦尼非斯八世的垮台，是这些弊端的累积所引起的。教皇的財政政策对欧洲有产者和債权人是不公平的，对商业又是有破坏性的，但穷人，負債者阶層当然是欢迎的；因为这批人乐于一笔勾銷了他們的債务或减去了他們債务的一半。教廷以这种措施来献媚于群众，但它对商业的稳定性和任何稳固的社会来說，是有破坏性的；所以教廷終于收获了它淺見的、詭詐的、不公平的政策的果实。

其时，在十二世紀后期，东方的形势，更为恶化。1144年，以得撒的丧失加速了第二次十字軍的东征，但完全失敗了。只有在圣伯尔納德到过的地方，才对第二次十字軍有着狂热。他的火焰般的激烈演說，使成千上万的听众陷于情不自禁的状态。当他講話的时候，听众从他身上撕下布条，做成十字架。他写道，“我張口講話后，城市村庄頓变荒地。大家到处只看到寡妇，而她們的丈夫还活着。”情况更恶劣的是，在大馬士革有一个新的可怕的穆罕默德教国家形成起来，在那里总督努勒丁脱离了巴格达哈里发国家，自立为一个独立的統治者并不久控制了巴格达勁敌埃及法提馬朝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和埃及的这一联合使耶路撒冷王国陷入老虎鉗口当中了；因为过去当埃及和巴格达互相敌对的时候，圣地可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努勒丁的繼承人，是庫尔德族酋长薩拉丁；他是十字軍时代最偉大的穆罕默德教首領；在1187年他占領耶路撒冷，并蹂躪了“圣地”；但对基督教叙利亚沒有进攻。他是个公正而又崇高的人物。

薩拉丁在占領耶路撒冷的时候，准許基督徒携走他們所有的财产，并給予四十天期限使他們揀选所愿意拿去的东西。阿拉伯作家举出例証来說明这項准許曾被利用到什么程度。易宾·厄尔·阿提尔說道：“法兰克人的大

教长离开城市的时候，携带教会的财宝数量惊人，只有上帝才知道这財宝的总值。”伊馬德丁当看見教长带走基督墓上的金銀飾物时，向薩拉丁諫諍說，墓上“現有价値二十万金币以上的东西。您給基督徒的安全是为保障他們的財产的，而不是为保障他們夺去教会的飾物”。薩拉丁回答道：“讓他們去吧。要不然的話，他們会指責我們的背信。他們不懂得条約的眞正意义。讓他們有机会来讚揚我們宗教的寬宏大量吧。”

为要了解耶路撒冷王国的不幸的来由，我們必須从比王国內部衰弱和分裂更远的根源来寻找其原因。王国的保卫，不仅依靠軍事寺院团、騎士及其他軍事附庸的力量，而且依靠那由十字軍所产生的海权之維持与完整。但这項海权，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在商业上是激烈的竞爭者。

显然，沒有充分的財富可滿足所有这些貪得无厭的商业城市的；它們各想要求壟断地位；結果，比薩人对威尼斯人开战（1099年）；比薩人劫掠阿馬斐城（1135年）；阿馬斐的商业权力从此垮台；热那亚和比薩在叙拉古作战。圣伯尔納德在第二次十字軍前对热那亚和比薩的冲突的調解，暫时得告成功，但不久以后，它們之間又爆发敌对行动。1155年比薩人和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打过一次仗；在1156—1158年間，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薩之間在亚克打仗。参加这些冲突的还有：加达魯尼亚人和圣約翰騎士团，他們是支持热那亚的；布罗温斯人、教长、圣殿騎士团和条頓騎士团，他們是站在威尼斯方面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是主要竞爭者。威尼斯享有最大部分的对通过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廷帝国各港口的貿易，而对埃及的貿易几乎获得壟断的地位。太尔的威廉說过，亚历山大城是“两个世界的市場”。重要性次于亚历山大城的是达米伊塔，也在尼罗河三角洲上。

威尼斯在埃及多年来所享有的壟断地位，不能持久。在十二世紀后半期，热那亚人和比薩人滲入了亚历山大城和达米伊塔，在

那里，他們也获得了商站。至于个别的商人，他們从各地蜂涌而来。西班牙犹太人杜德拉·本杰明(死于1173年)，遊遍东方各地，他举出有二十八个国家或城市的商人出現于亚历山大城的商站和商場上。由于商业竞爭的緣故，海权国家間互相分裂对峙；这就是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大弱点。威尼斯和埃及祕密勾結，来阻止亚实基倫的占領；这一事件表明一个基督教国家多么严重地背叛了十字軍的事业。

耶路撒冷的陷落加速了第三次西方对东方的大出征。英国理查一世、法国腓力奥古斯都和德王兼神圣罗馬皇帝紅鬍子腓特烈这三位国王联合行动。可是，虽沒有象第二次十字軍那样遭到大失敗，第三次十字軍也未获成功。皇帝溺死于西里西亚。法国腓力不久返国，理查在表現惊人的勇敢以后，即使不是失敗而归，也是狼狽返国的。所有第三次十字軍所真正完成的，只是克服亚克而已。

在第三次十字軍的历史里，我們得窺見一种屬于經济性質的有趣味情况。叙利亚、小亚美尼亚、小亚細亚和君士坦丁堡，对于“圣地”的丧失，并不和西欧一样地感到遺憾，因为这事件使貿易稍微移轉到它們方面。威尼斯过去对于亚克的丧失，曾庆幸热那亚所受到的打击，因为在那里热那亚比它更有勢力，現在亚克的克服使它感到憤怒。其时，威尼斯在太尔的勢力比热那亚要强。至于拜占廷皇帝，在这个时期由于很怕威尼斯人在黃金角的傲慢态度，1189年同薩拉丁进行談判。在第三次十字軍里，十字軍队勢力的集中点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沿海岸城市，因为它們对意大利城市是很需要的。由此可見，城市的經济自利心超过十字軍宗教动机。克服“圣墓”和“圣地”，不复是主要的目标了。

据一个阿拉伯史家的記載，当腓力奥古斯都和獅心理查来到圣貞德城的时候，圍攻已进行了两年之久而未有結果，虽然在那里集結着六十万大軍。在基督徒軍队中，紀律和統一指揮一向是缺

少的。在盖羽·得·拉西格南和蒙斐拉侯爵之間，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他們各想把新来的人拉入自己方面作战。另一方面，十字軍营陣，以其全部长度，已成为一个大市鎮，建造得几乎象一个永久性的城市一样，有教会并有陈列着一切东方商品的市場和商場。按兵不动是对軍队紀律的一个致命伤。在初冬，那完全經过海道送来的軍粮供应中断了，因而对十字軍队来說，开始了一个飢餓受苦时期。在1190—1191年冬季，他們不得不宰杀軍馬作为食物；有些基督徒甚至逃入土耳其人营陣，而成为穆斯林，以求一飽。他們搜集树皮草叶来作湯羹。当时有两个中士所有的財产，只剩一个安泽芬便士；他們商量好久之后，决定用它来买一些蚕豆；商人給他們十三粒蚕豆来換取他們的便士，他們发現其中一粒是虫蛀的；一个中士不惜走了很长的路程来調換它。还有疫疾，跟着飢餓而来；冬季雨水泛濫营帳，并引起了流行病。“每个人开始咳嗽而变成声啞，两腿开始浮肿，而头也如此。牙齿脫落。”最后，到了春季，有几只运粮船开到，而在下一天，麦价就从每担一百貝占猛跌到四貝占了。

在这长期圍攻里，获得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結果，就是在战斗間歇期中，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徒之間建立了几乎是亲密的关系。他們彼此懂得尊重对方，有时他們还互相开开玩笑。“圣战史”的作者，尽管害怕薩拉森人的宗教，但情不自禁地讚揚他們。商业关系也依然繼續着；貴重的奢侈品，經过双方协議，得通过战綫；这一交易使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徒都得到好处。

在一次停战时期，薩拉丁同理查一世約定：商业契約和商业应繼續进行。1191年7月13日，亚克被圍的穆罕默德教守兵觉得沒有什么希望乃投降。依照下列条件，守兵获得自由出城的权利：薩拉丁应付二万貝占贖款，归还“眞正十字架”和释放基督徒俘虏。关于条約执行，規定四十天的暫时停战期；被圍者交出二千人質作

为执行条約的保証。热那亚人和比薩人恢复了他們原先的“居住区”。一个当时代的历史家写道，“兌換商人及其他做生意的人，在城內公开市場里获得了营业所；这些营业所是在他們每年繳付适当租金的諒解下，由国王官吏配給他們的。”

显然，到这一时期(1190—1192年)，十字軍已有深刻的变化。基督徒的进攻，不是針对耶路撒冷，而是針对意大利城市所殷切需要的港口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的商业利益和商业競爭已成为左右局勢的最高力量。

在十字軍队中間，新的不睦不断发生，使进軍耶路撒冷的每次企图成为不可能。比薩人和热那亚人互爭霸权，而蒙斐拉侯爵和勃艮第公爵之間还公开打起仗来。

在这个时期，业已迁到亚克城的耶路撒冷王国又延长了寿命，并經历着“海上的又丰富又奇异的事物的轉变”。理查一世在他的前进途中，已占領塞浦路斯島，在那里有一个叛乱的拜占廷省长曾建立政权，而自称“皇帝”。这項占領，在理查看来，似乎是沒有什么用处的。他把这个“地中海上的产銅王后”售給圣殿騎士团，換取十万金貝占，其中四万貝占当即支付。但圣殿騎士团无力續付其余的款子，因而理查按同一条件再度出售这个島給盖羽·得·拉西格南，即那被逐的耶路撒冷国王。他約定：支付六万金貝占給英王，并归还四万金貝占給騎士团。

盖羽·得·拉西格南頗有見識，在塞浦路斯島努力吸引殖民来到島上；他用慷慨贈与土地和賜給封建性与商业性特权的方法，成功地吸引入了那批被薩拉丁的征服而弄得无家可归的移民。太尔的威廉的門人說道：“我們看到穷苦的制鞋匠、石匠以及那批只依靠代書謀生的公共代書人，突然在塞浦路斯島上成为騎士和大业主了。”不久，法国殖民遍布島上，他們在本地居民中間，构成了关系紧密的集团。法文成为整个島上的通用語，甚至上層希腊人也

說法文，而希腊文反而降到一种土語的地位。法国建筑师把他們的地方性的建筑式样，傳入塞浦路斯島上，而教堂和城堡似雨后春笋地出現島上，这些遺跡今天还可証明西欧人的影响。

十二世紀中，使意大利顫动不已的激烈、复杂、競爭和商业的生活，到了下一世紀，精力充沛地表現出来了。那是从它过去一切活动自然地产生的一个給人印象极深的高峯。在十三世紀，教廷正在极盛时代；当它对半个欧洲政治命运揮舞威风凜凜的大棒时，威尼斯控制着大部分意大利和利凡得的商业命运。

1187 年"圣地"的丧失和第三次十字軍恢复"圣地"的失敗，对意大利沿海共和国的商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威尼斯、热那亚、比薩都受到了損失。但威尼斯很現实，并不徒然悲伤，因而它鼓足勇气要取得比以前更大的利潤来回复元气。于是它着眼于征服拜占廷帝国，因为皇帝亨利六世，于 1190 年兼任西西里国王后，重温起罗伯特·基斯卡和罗哲尔二世的大胆夢想，要征服黃金角的城市，它就更加兴奋；这項計划差一点就实現了(1197 年)。

拜占廷帝国，在一个又无能又腐敗政府下，又在叛乱时起的状态下，急剧地趋于瓦解。海軍已衰敗，貿易已落在意大利人手里并远比以前大大萎縮了。因为叙利亚、小亚美尼亚和"圣地"在第一次十字軍后所經历的"繁盛"已把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拉去了。西欧商人，宁愿通过利凡得的較多特权的港口来进行貿易。据估計，在十二世紀，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比原来数量跌落了 1/3 到 1/2。拜占廷貨币的貶值，也与此有重要关系，而且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因为拜占廷貨币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是欧洲和世界上最稳定的錢币。由于它的貶值，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金币和后来佛罗倫薩的百合币逐步取其位而代之。昆尼諾斯朝末代諸帝不是很弱就是很坏。这皇朝的权力原来是依靠着地主貴族和威尼斯的友誼的支持。但安德洛奈卡皇帝(1183—1185 年)改变了政策，轉而依靠那

些憎恶威尼斯商业优势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和商人阶層。更坏的，他殘暴地削减封建貴族的力量，而建立了恐怖統治。安德洛奈卡曾企图改革行政，象制止官場的賄賂、整頓各种賦稅、采用省长定額俸祿等；但这些改革所产生的良好效果，都被他所树立的敌人打消了。甚至当他由于害怕諾曼人的攻击再度向威尼斯人請求締結联盟并給予新特权的时候，威尼斯对他尙未釋然于怀。威尼斯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計划在它的实行之前二十年已經制定。

另一方面，尽管帝国政府又衰弱又腐败，但帝国内有些省区城市还是兴盛的。底比斯在諾曼人劫掠之后，已恢复元气，它的絲綢制造业又恢复了重要地位。哈尔米洛斯，是一个大商場。薩罗尼加位于瓦尔达耳河口的海湾，是在多瑙河貝尔格萊德和愛琴海之間摩拉瓦-瓦尔达耳河水道之終点，它的重要性不見得亚于君士坦丁堡本城。拉里薩出产无花果和葡萄酒；帖撒利平原是首都的谷倉。地峽上的科林斯和阿克洛科林斯，以靠交叉貿易而兴盛起来，而科林斯还是出产生絲和小葡萄干的中心〔小葡萄干 (currants) 就是从科林斯城 (corinth) 这名詞得来的〕。在伯罗奔尼撒的西岸上，佩特拉斯的商业相当发达，并有范圍很大的犹太人殖民地；它的重要地位可从下列事实获得証明：威尼斯人在同希腊帝国最后签訂的一項商約里，曾要求那里的貿易便利。斯巴达附近維发那六月市集，每年吸引着希腊和巴尔干半島上大批人到那里。威尼斯垂涎于黑海和愛琴海的有利貿易。当时拜占廷帝国困难重重：新保加利亚政权被英諾森三世所煽动威胁着它；威尼斯越来越多地要求商业特权，剝削着它；內忧外患同时并发；在这样的情况下，看来它已瀕于瓦解。在所有的希腊省內，在各島屿上，在小亚細亚区内，地方权力繼續扩張，对于它們，中央政府已束手无策。

按照教皇所拟定的計划，第四次十字軍的目的地，原来是在埃及；通过征服埃及，西方国家希望获得軍事基地来对占有“圣地”的

穆罕默德教徒进行战斗。但威尼斯，关于它所要扮演的角色方面，有着自己的秘密打算。在1201年，有六位使臣来到威尼斯同总督亨利·丹多罗談判运輸条件，其中包括有第四次十字軍未来历史家維里哈道在內。我們知道，丹多罗又瞎又老，但狡猾得很，他迫使法兰克人接受苛刻条件，"如此不利于我們方面"①。他无需乎取得"資本家的精神"，或从任何人吸取剝削的經驗。依据1201年3月簽訂的条約，威尼斯政府同意运送四千五百騎士、九千騎兵和二万步兵連同九个月的軍粮到东方去。而十字軍承担对每匹馬付出四馬克，每个人付出二馬克的費用，总共八万五千馬克，幷把所有未来可能征服的領土的一半移交給威尼斯。但十字軍的人数比預計的要少得多。因此，不能付出条約上所規定的总額。于是，威尼斯总督提出了一个新建議。他提議"延期支付三万四千銀馬克的欠款，直到上帝保佑我能靠征服来获得这笔款項时为止"。他的意思是：十字軍应帮助威尼斯克服扎拉；这是在亚得里亚海上威尼斯的竞爭对手，位于达尔馬提亚沿岸，屬于匈牙利王国的。于是簽訂了条約，1202年11月，远征队乘船出发。扎拉遂被征服。

十字軍的征服慾，由于这次胜利而加剧，因而他們成为威尼斯詭計的順服工具。威尼斯急于要使原拟定的出征改变方向，不往埃及去，因为在那里它和穆罕默德教徒有着巨大商业利益与和平交接。正在这一时期，它为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很感焦虑。君士坦丁堡新近所发生的革命，已严重地損坏了威尼斯在拜占廷帝国內的优势。亚历修三世袒护比薩人；他不仅限于違反和威尼斯所簽訂的条約条款，还对威尼斯商人課以新税。另一方面，威尼斯支持一个皇位覬覦者②来对抗他。

---

① "tant con nostre compaignie durra."

② 指亚历修·安澤拉(Alexius Angelus)，爱撒克二世的兒子，他从獄中逃出到西欧請求援助，以求爭夺拜占廷的皇位。——譯者

威尼斯与十字軍間的合同,直到征服扎拉之后，才正式簽訂。阴謀家公然不顧教皇要把进攻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人們驅逐出教之警告,加紧进行他們的計划。十字軍总司領蒙斐拉的邦尼非斯,虽未参加出征扎拉之役，但不久就到达那里的十字軍营幕里。于是，威尼斯舒展了巧妙的手腕。它使皇位覬覦者允許付給十字軍士二十万銀馬克巨款，亲身参加十字軍以求恢复"圣地"并在那里維持一个五百騎士的队伍。这种安排是聪明的，因为威尼斯可披着十字軍的外衣来掩盖它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計划，虽然教皇已識破这項阴謀，并断然禁止了十字軍进攻希腊帝国的行动。

1203年6月12日，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峽口外。維里哈道在他的出色一章里①，描述帝国首都对西欧人所产生的深刻印象。1204年4月13日，这个大城市成为十字軍的牺牲品。搶劫情况，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君士坦丁堡原来是基督教国家中从古希腊时代以来一脉相承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質文明的一个大城市代表。現在，几乎全部珍奇遺产都被破坏无遺。我們知道，在这以前,大部分古代希腊文学和很多希腊艺术品还是存留着的。物質的毁坏虽比不上人类所遭受的文学和艺术上的損失，但也是令人痛心的。图書館、宮殿和浴場化为瓦礫場所。維里哈道是一个目睹者,又是一个軍队的指揮官;他写道,"所得的战利品,多得不得了,沒有人能够告訴你究有多少。黃金、白銀、器皿、宝石、錦綉、銀綫布匹、长袍、灰鼠皮、銀鼠皮以及各种最精致的东西，散乱在地上……。自从世界创造以来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城市,可获得这么多的战利品的。过去的穷汉,現在又富又豪华了。"

在1204年3月，剛在第二次圍攻之前，威尼斯和男爵們間所簽訂的合同上,有着下列的規定:在占領之后,战利品将平均分配;

①指他的名著《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內的一章。本書叙述1198—1207年的事件。——譯者

由六个威尼斯人和六个法国人所組成的选举团将推选一个新皇帝，而新皇帝将获得1/4的征服地和君士坦丁堡的两座宮殿。在分割的拜占廷帝国內其余3/4的土地中，威尼斯将获得一半，所剩下来的部分，将按照西欧的模型，用封邑的形式来分配給軍队的将領。后来"拉丁"皇帝获得了君士坦丁堡城的5/8，威尼斯获得了3/8和圣索非亚大教堂。蒙斐拉的邦尼非斯获得了帖撒罗尼迦和馬其頓；法兰德斯的亨利成了阿德拉米兴的領主；布腊的路易成了尼西亚的公爵①，勒尼尔·得·特列茨成了菲利波波利的公爵；圣波尔的休格成了迪狄摩太春的領主。小塊封地，按照每个指揮官的等級和随員的人数，分成100个、60个、50个、40个騎士封地等直到十个騎士封地来分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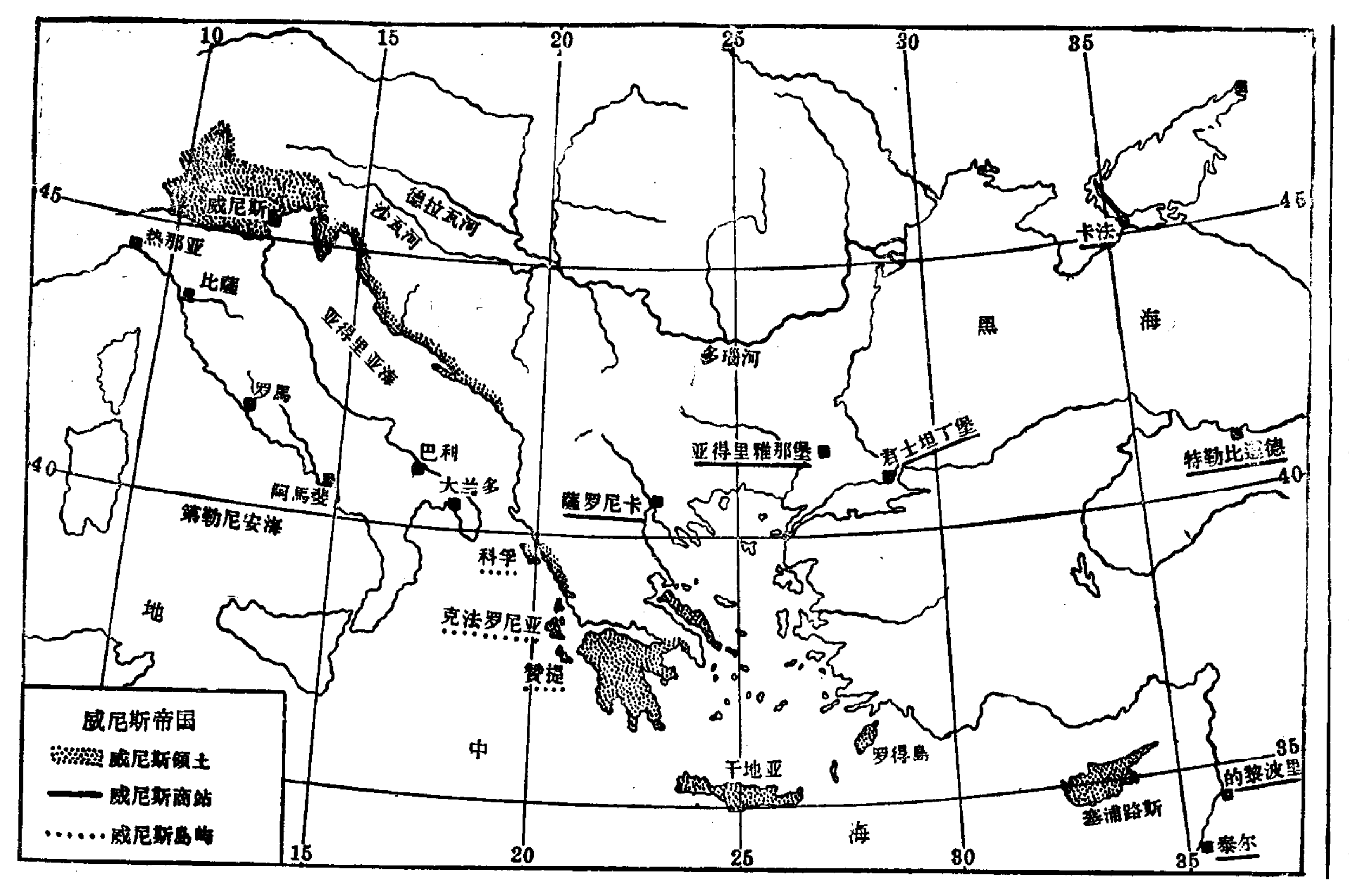
威尼斯人为自己的共和国，保留了那些可保証它的海上优勢的部分領土——摩利亚半島上的摩敦和科隆港(以洋紅出名)、伊庇魯斯、阿卡內尼亚、愛奧尼群島、伯罗奔尼撒、愛琴海中島屿、科孚、过去叫做优卑亚、現在叫做涅格勒湊的大島、色雷斯港口（就是，加利波利和罗多斯陀），連同內地的亚得里雅那堡。根据1204年8月和蒙斐拉的邦尼非斯所簽訂的祕密条約，威尼斯还获得了将要占領的克里特島的产权。

威尼斯人由于他們商业上的狡猾成性和由于他們較多熟悉地方情形，在瓜分条約里，曾获得所有利凡得的最优良港口、島屿和市場。几乎沒有一只战艦，沒有一只商船，在駛入"多島海"②、黑海或亚速夫海时，不被科隆和摩敦港口上的威尼斯守兵所看到的；这两港很合适地被稱为"共和国的眼睛"③。

① 他从未获得过这塊領地。

② 即愛琴海。——譯者

③ W.密勒：«拉丁人在利凡得»。


威尼斯帝国
威尼斯領土
威尼斯商站
威尼斯島嶼
威尼斯
热那亚
比薩
德拉瓦河
沙瓦河
亚得里亚海
罗馬
巴利
阿馬斐
大兰多
第勒尼安海
科孚
克法罗尼亚
贊提
多瑙河
亚得里雅那堡
君士坦丁堡
萨罗尼卡
卡法
黑
海
特勒比逊德
干地亚
罗得島
塞浦路斯
的黎波里
泰尔
地
中
海

在伯罗奔尼撒半島之上，象百年前在巴勒斯坦那样，施行着拉丁的封建統治。法国語成了宮廷上的談話用語和法律用語。在希腊所建立的"新法兰西"（用教皇霍挪留三世写給王后布兰奇的信里所用的确切說法，和威尼斯政权并肩而立。鄂图·得·拉洛士夺取了雅典；赭弗理·得·維里哈道曾征服了摩利亚。威尼斯的优势增加了。它从"禁海"里逐出每个商业竞爭者，尤其是热那亚。它对本地居民所进行的徹头徹尾的剝削行为，需要武力的支持；所以它利用了往东方去的十字軍士和軍事冒險家，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209年，威尼斯借口教皇已批准十字軍出征克里特島，征服了它。馬立諾·薩紐杜自己出資組織一次海盗式出征来征服昔加拉第群島；他夺得那克索斯并充任該島的公爵；他把邻近島屿以封邑的形式分給他的战友們。优卑亚起初是以蒙斐拉的邦尼非斯的名义获得的；但威尼斯却派遣一个官吏去統治。

十二世紀，是中世紀希腊在商业上非常活跃的时期。帖薩罗尼迦几乎堪与君士坦丁堡爭雄。它在10月市集里，最为热鬧，屆时，在它的街道上拥挤着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看来，这些人在城內可能是保有財产的。克里特和罗得西亚島的港口，是到东方去的路上的半途站，它給一切国家的船舶提供避风暴所这就更不待說了。

从罗马衰亡到1498年到印度去的航路的发現之时期，第四次十字軍对利凡得貿易史上进行了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使威尼斯成为近代第一个殖民帝国。意大利沿海共和国，在叙利亚和"圣地"，已形成这一种制度的要素，但一个商业帝国还需要更深更广的基础。

威尼斯所获得的新領土，对"共和国"来說，似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元老院竟想要总督迁居到君士坦丁堡去。对比薩，而非对热那亚，准予保留它的旧"居住区"以及在希腊皇帝統治时期所

享有的权利。阿馬斐殖民地在拉丁帝国时代也勉强維持着。倫巴人、丹麦人、布罗溫斯人、西班牙人和安科尼坦人也去补充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但所有这些人，都靠着威尼斯的恩賜而留在那里，現在它的一句話等于皇帝的一道詔令。威尼斯是城內的支配权力，它享有絕对的貿易自由，并收取从这些商业区所得的3/8的进款。

威尼斯人由于占据坚固設防的加利波利，由于占有博斯普魯斯海峽和君士坦丁堡的3/8面积，获得了黑海航行的壟断地位。到1223年时，他們在克里米亚半島上已建立若干“商站”。

那些濱黑海北岸的地区，是君士坦丁堡的谷倉。而且，还有一部分印度和亚洲的貿易达到尤克辛海(黑海)。威尼斯人熟悉黑海地区的資源。他們的航海家有的已侵入那里，因为1196年威尼斯曾派遣一个艦队开到亚密苏斯；在克里米亚半島上，它也設立若干商业机构。他們的国旗飄揚在多瑙河、頓河和法息斯河各河口上。他們在頓河口曾建立一塊殖民地，命名为塔那，这就是今天的亚速夫。这塊殖民地成为亚洲商业的一个主要商埠。商队轉运印度商品，从恒河口横穿广大无边的大陆，达奥克斯河(即阿姆河)岸，从那里貨物用船装运到里海，在阿斯脫拉罕卸下——因为在十三世紀奥克斯河流入里海，而不是注入鹹海的。从阿斯脫拉罕，貨物用駱駝轉运到塔那，从那里把貨物分散到黑海各港口去。威尼斯和亚洲內地的蒙古族王公所签訂的条約使威尼斯人得和这些遊牧部族进行有利的貿易。

但当威尼斯人举杯飲胜利酒的时候，杯中有着一滴苦酒。他們还沒有占領小亚細亚。拜占廷帝国的殘余分子在下列两地建立了政权——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亚洲尼西亚和在黑海畔的特勒比遵德。征服尼西亚，为在陆路上取得和叙利亚的交通綫是必要的，而特勒比遵德把一大部分横穿亚洲的貿易拉到它的港口去，这样，使威尼斯共和国在尤克辛海上本来可完全壟断的貿易受到了阻

碍。正是在 1215 年，当拉特藍宗教会議禁止基督徒和穆罕默德徒通商时，威尼斯同爱科尼安苏丹签訂了同盟条約来反对狄奥多·拉斯卡立斯。1219 年同爱科尼安苏丹阿拉丁签訂了另一項条約，依这条約，威尼斯商人在苏丹所有的省內获得了一般的安全保証，并对某种物品所征收的关稅也明确規定；而且特别指出：珍珠、黃金和精細羽毛不在此限。

威尼斯虽然不能占領特勒比遵德，但它成功地壟断亚美尼亚商业也可作为部分补偿。据史載，亚美尼亚国王和威尼斯之間签訂了两次通商条約：一次在 1201 年，另一次在 1245 年。亚美尼亚的葡萄酒貿易是相当大的。亚美尼亚首都陶利斯，是一条通东方商路的終点（这一条路經过伊思巴汗、巴尔克和布喀拉），也是那些沿底格里斯河折向南方商路的終点。1229 年，威尼斯还同阿勒波苏丹签訂了条約；由于这項条約，它得吸取横貫亚洲大陆的队商貿易。这項条約还賦予威尼斯人在阿勒波享有一个商站、教堂和領事裁判权的权利。

威尼斯在获得君士坦丁堡和壟断爱琴海和黑海貿易的輝煌功績，使热那亚的仇恨达到瘋狂程度。这两个海洋国家为爭夺利凡得的貿易控制权而起的冲突，是十三世紀地中海世界的突出的商业事件；几乎所有大海沿岸的国家，都被捲入漩渦。

教皇的野心、路易九世的十字軍、安如·理查的成功或亚拉崗諸王的成功，都是依靠并集中在这两个大海軍国家身上；因为它們，也只有它們，是地中海的主人翁。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作战的时候，要进行十字軍的出征，是不可能的，因而教皇費了无穷的时間、加以耐心劝解和恫吓以求和平的实現。路易不能从亚格-摩特开船，除非获得这个或那个竞爭者的帮助。亚拉崗国王的登陆以及同理查的冲突是依靠热那亚的帮助的。可是，对于这些事情，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毫不介意。它們各专心致志于遏制对方，如屬可能，还要粉碎对方。什么能使它們眞正感到兴趣的是：它們的海軍司令，象它們所曾做过的那样，将携回亚克的热那亚塔上的石头到威尼斯来，携回君士坦丁堡

的威尼斯宫殿上的石头到热那亚来。达达尼尔海峡口，对它們来說，比"聖墓"还要宝貴得不知多少倍。

热那亚痛恨威尼斯，因为它被挤出于黑海之外。威尼斯也极其担心于丧失那項貿易的可能性，所以尽其全力来維持它。这两个国家的竞爭震动了每个港口。在这斗爭里，比薩因为和热那亚在利古里亚沿岸有着商业竞爭，成了威尼斯的同盟，因而热那亚对它憤怒的程度，几乎和对威尼斯不相上下。可是，威尼斯毕竟是更可怕的仇敌，所以热那亚就以战爭来迫它。

1255年，在圣貞德城，情势发展到一个危急关头。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竞爭占夺那里的一所宫殿和一所教堂。热那亚人在战斗里，击沉了几只威尼斯船，并占領了一座屬比薩人的塔。威尼斯艦队不久即出現于亚克城前。它們燒燬了三十二只热那亚船。热那亚人遭到慘敗而被迫退到太尔城。十字軍救护騎士团站在热那亚方面，而圣殿騎士团站在威尼斯方面。据說，有二万人死于这次战爭里。亚克被看作一个征服的城市；从那里所夺取的战利品，不可胜計。教皇进行干涉，也无效果。最后，1258年6月24日，热那亚艦队在亚克停泊处全部毁灭，而被俘的热那亚人被迫宣誓：三年之內不回到叙利亚。亚克的热那亚"居住区"，分給威尼斯人和比薩人。后来，这两个交战国繼續苦战；这項战爭扼杀了十字軍运动并終于使"圣地"完全丧失。

1261年1月，热那亚晴天霹靂般地反攻威尼斯。尼西亚的皇帝迈克尔·巴列奥洛哥欣然接受热那亚所提关于签訂反对威尼斯同盟的建議；在奈法昂条約里皇帝允諾：如値拉丁帝国推翻，热那亚人得享有威尼斯人1204年前在拜占廷帝国內所曾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当威尼斯艦队正在圍攻黑海畔的一个城市的时候，迈克尔的将軍亚历修·斯特拉特哥波洛，在1261年7月25日，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魯斯，威尼斯的权力被推翻，迈克尔实

行了条約上所規定的条件;給予热那亚人圣母教堂、威尼斯人的卫城以及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的墓地。热那亚人得意洋洋地拆毁这个卫城,把它的石头作为战利品运到热那亚去。热那亚人还在下列城市內获得了“居住区”:士麦拿(因为土耳其人的侵入,存在不久)、阿德拉米兴、卡散德拉、凱奥斯、列斯堡、克里特和涅格勒滂。直到1267年迈克尔和他的同盟間发生了齟齬之后,热那亚人才获得加拉塔①“居住区”,那里的塔楼事先被毁坏,作为一項預防措施。1303年以后,安德洛奈卡·巴列奥洛哥二世,扩大了这个“居住区”。迈克尔只給热那亚人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峽的商业自由。从这个时期起,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占着优势,而威尼斯则永远不复能恢复它以前所享有的最高权力了。热那亚繼承了黑海的貿易,虽然它没有能够維持象威尼斯所曾享有的严密的壟断地位。从这事件开始,标志着热那亚在利凡得的优势。

通过1317年的法律,我們还可看到关于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居住区”城垣內所过生活的大概情况。由热那亚所指派的长官,对所有住在希腊帝国境內的热那亚公民和領事,有着最高的管轄权。他对皇帝举行宣誓,并参与宮廷的活动,好象他已是一个大使。他的行政責任,由一个大会議和一个小会議分担着。除了特殊少数案件外,他对所有的热那亚公民間所发生的糾紛,进行判理。对貿易是有限制的,因为黄金和白銀不能輸出。热那亚人在帝国境內不得經营食盐或乳香的貿易;从1304年起,麦子的出口也被禁止。他們得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在“考古家”时代,其他参加君士坦丁堡貿易的城市有:安科納、巴利、特拉尼、阿馬斐、拉古薩、巴塞罗納、馬賽,也許还有蒙特皮列和那旁。

在黑海,热那亚的主要基地是在克里米亚半島上古代罗馬狄奥多西亚城旧址的附近;在那里他們曾建立卡法殖民地。这殖民

① 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譯者

地后来是很兴盛的。它建立的准确年代，已不能确定，但可以断言：那是在希腊人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不久的时期，也許是在 1266 年时。起初，卡法只不过是用木栅圍繞的一个市鎮，为了建造它，非得韃靼汗的特殊准許状是不行的。后来，用城垣和城池来圍繞它以防当地部族的搶劫。它隶屬于以一个領事为領导的市政府；領事从热那亚派出，任期一年。从这一地点，热那亚人把他們的商业活动扩展到利凡得去。卡法成了外国产品的交易地点。在那里有皮貨市場，也出售波斯制造的絲綢和棉織品，也出售經过阿斯脫拉罕运来的印度产品。热那亚人甚至在高加索地区，也建立了商站，那里的丰富矿产对他們是有吸引力的。即在今天，我們还可看到他們在山間所設立的工場遺跡。据称这些工場，在卡法于1475年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領之后，还繼續了三百年之久。

关于黑海上冒險、探險和殖民的荒誕而浪漫的故事，有乘阿哥船远航覓金羊毛者的故事的情調。在这地区，热那亚和威尼斯繼續着它們的冲突，它們也許甚至認为这是它們的主要战場。在这一地区，除了特勒比遵德帝国以外，大部分是在希腊势力之外，和韃靼人保持接触。世界上很少地方的历史，能比黑海北岸的这些港口的历史更激起人們的幻想。这些地方从前是古代希腊人的殖民地，他們称之为克索尼薩斯；后来它們是米斯理帝国的首都所在地；再后，它們落入罗馬手里，后来又落入拜占廷手里，而在查士丁尼时代，它們成了重要的貿易地点。在第九世紀，基輔和諾夫哥罗得的瑞典人占領了它們；此后，它們轉入比瑟尼格和庫曼蛮族之手，后来由拜占廷帝国克服，而在 1204 年，帝国对那里的貿易又丢給威尼斯，而在 1261 年热那亚又从威尼斯夺得了那里的貿易。在克里米亚半島上，这些古代世界的很多地点还有留存，虽然它們的名称已經改变。例如，近代的巴拉克拉瓦是热那亚的塞巴洛和希腊的帕拉开昂；英克曼是古代的狄奥多罗；俄国的非奥多西亚是古代

希腊的狄奥多西亚；近代的克契是中世紀的伏斯波罗(或博斯普魯斯)，也是希腊人的帕第克比姆。第聶斯德河口的塔那以及塞科，是在中世紀建立的。在所有这一些地点或在它們的周圍，今天还可找出热那亚人的城墙、堡壘和塔的断垣殘碣。

几乎在它丧失君士坦丁堡的优勢的同时，威尼斯赶快同埃及苏丹馬列克-厄尔-阿达尔签訂了一項新条約。这类性質的許多条約也跟着产生了，但加上了各种补充条文。所有以前条約中所确定的主要条款，也都予以重申。在这类条約中，第一次条約所注明的日期，是在1262年，正是威尼斯被逐出于君士坦丁堡后的下一年。这項条約包括二十八条款，給予威尼斯人关于人身和財产的安全保証，关于他們享有房屋、貨棧、教会和浴場的权利；还規定他們所应付的各种賦稅。后来的一項条約，在1303年签訂，扩充了这些規定条文。在威尼斯人方面，他們保証不再騷扰苏丹的运輸。关于在这个时代埃及和威尼斯間商业的状况和性質，在馬立諾·薩紐杜所著的《忠实信徒的私議》一書里說得最为淸楚；該書是献給教皇，作为克服埃及和"圣地"的計划的。在其第一部分里，作者以一个目睹者的身分，詳細叙述了亚历山大城及其他港口的貿易情况。从印度，由海道运来胡椒、生薑、白桂以及一些絲綢和棉織品，虽然大部分絲綢是由陆路运来的。还有从馬拉巴沿岸和錫兰島运来的珍珠、香木等等。其他大部分香料、香草、豆蔻实、华澄茄，似乎是經由巴格达运来的。紅海口的亚丁，是印度貨物的第一貿易站。特别有一种作香料用的珍貴树脂，是从阿拉伯半島运来的。威尼斯船只把这些貨物以及谷物、枣子、糖和棉花从埃及运往欧洲；而威尼斯方面运去生鉄、来自达尔馬提亚的建筑木材以及来自德意志北部的而不象从前那样来自罗斯的毛皮，作为交换品。

威尼斯在不断找寻新貿易和新貿易路綫的过程里，甚至侵入巴巴利沿海港口，而这些港口是几百年来为热那亚和比薩商业活

动的特殊場所。而且，这些大胆的威尼斯商人还不以这些港口上的商业为滿足。他們的商队曾冒險冲入內地；在1320年同突尼斯王馬索斯所签訂的一項条約里，他們获得了下列权利：他們的商队得自由出入境內，如遇劫掠可获得賠偿，他們的牲畜可得免費牧場，任何威尼斯的信使不得被扣留或躭誤，此外，还約定：穆罕默德教政府依据他們領事的要求，对他們的商队給以保护。关于这些商队所經过的路綫，我們只能作些推測，因为沒有什么正确資料。意大利城市对巴巴利海岸的这項貿易，至少可以說，是十字軍的一項間接后果。

現在我們必須回到叙利亚和"圣地"来研究它們在十三世紀的历史。所有上述的龐大无比的商业，是十字軍的丧鐘。教廷咆哮如雷地曾頒布禁止同穆罕默德教貿易的命令，但无效果；它終于廢止了禁令，除了那項絕对禁止的奴隶貿易以外。然而，連这項禁令，也是具文。到了这个时候，十字軍已蛻化为单純的冒險行动，或者成了悲慘的出征，象"兒童十字軍"那样；或者在絕望的冒險中，一敗涂地，象圣路易在埃及的十字軍(1245—1248年)那样。由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之間的商业竞爭和海軍战斗(在这些战斗里，比薩最后和威尼斯結成同盟)，每次为进攻伊斯兰教所作的軍事努力，变成无效。当时，太尔是在威尼斯的控制下；馬西利欧·佐哥在1240年充任全叙利亚的威尼斯行政官；他留下关于威尼斯在太尔周圍所占有的二十四个庄园的帳册，这些产业从海岸延伸到高地，呈現一片广闊无限的田野、菜圃、葡萄园、橄欖园、无花果园以及大塊甘蔗地。这些土地是由叙利亚人来耕种；他們取得2/3或3/4的收获——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此外，所有太尔港口捐稅的1/3，也归于威尼斯所有。

但是，亚克还是占着太尔的上风。在这里，安科納似乎第一次在东方有着一塊独立的居留地，包括教堂、貨棧和宮殿。在这里，在

十三世紀也可找到佛罗倫薩人、盧奇塞人、塞亚那人的居留地。亚克的商业，非常兴旺，所以欧洲銀錢业在那里設立了分号。在这个国际性城市里，馬賽和蒙特皮列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和教会，并享有豁免納稅之权。这个城市还庇护一个英商的居留地。从下一事实，在这个时期从基輔到大馬士革，到处都有亚克商人的足跡，可見亚克勢力之大。在安提阿，热那亚和比薩，他們仍保持着"居住区"，1264年的一項文件表明：热那亚人还控制它周圍的地区。約在1222年时，热那亚人由于比薩燒毀他們在亚克的居住区而未能获得賠償，憤而离开該城往貝魯特去；后者在1197年已由基督徒重行占領，并注定要比亚克和太尔維持得更为久远。而且，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兒子曼夫勒德給热那亚人在西西里的許多特权，他們在島上享有最惠国的待遇。甚至在威尼斯勢力很强大的希腊，热那亚人在雅典和底比斯也有"商站"(1270年)，在那里他們有一个公所，受自己領事的裁判，并經营絲織制造业。

法兰西南部諸城市在十二世紀中在叙利亚已得立脚点，而在十三世紀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馬賽在布罗溫斯伯爵統治下很繁盛。"紅皮書"(1255年?)內容包括有該城的法律，它談及不仅和叙利亚而且和非洲的貿易。在利凡得的各城市里，它沒有什么巨大"居住区"，只有貨棧。虽然关于馬賽情况我們所知的很不够，但似已看清楚，只要叙利亚繼續在基督教統治下，馬賽在那里的財产和特权，能够維持下去。次要的城市是圣齐尔兹、那旁和亚格-摩特。

西班牙人很少参加十字軍，但在十三世紀中巴塞罗納的商人却在太尔出現。然而蒙特皮列甚至比巴塞罗納更加重要。在这个时期，它受亚拉崗国王的統治，而亚拉崗的商业是很大的。在亚克和的黎波里，它享有特权并委派一个領事；虽然它来得最晚，但它可与任何竞爭者并駕齐驅。

远在十三世紀中期以前，已可清楚地看出基督教东方摇摇欲墜征象。甚至早在1201年，耶路撒冷的救护团团长在写給英国的騎士团采邑区的信里，說道："我們由于薩拉森人的无限資源而感到战慄，当他們財富又由很多商人运来的商品而增加起来的时候，这种感覺就更强，这一情况使我們异乎寻常地感到震惊。"

当十字軍的失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欧洲哀訴式的宣傳达到歇斯底里的状态；荒誕无稽的"殘暴"故事到处流傳。在1245年，連一个最博学的历史家馬太·帕理斯，也記載了那种讕言："薩拉森人在运到西方的胡椒中放置毒葯，因而很多法国人被毒死。"另一荒誕的謠言是：商人自己捏造反对新运来的胡椒的傳說，因为他們的貨棧里还堆儲着尙未出售的陈胡椒的。1245年时，里昂会議枉費心血地繼續咒詛一切同穆罕默德教徒做鉄、造船木材、战爭机械等禁品生意的人們，或咒詛一切象很多基督教兵士那样替穆罕默德教政府的艦队和陆軍服务的人。会議的命令說："教会的怀抱，不会給这样的人們敞开，除非他們以从这种該死的貿易所得的全部利潤，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財产的相等数量来援助圣地。"

在这个时期叙利亚的各个公国，实际上已被西欧抛弃而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它們越来越加危險了。沒有西欧的支持而它們再能繼續半世紀之久，只是因为穆罕默德教政局的动盪。大馬士革的苏丹同埃及的曼麦琉克朝发生冲突。后来，蒙古人在征服巴格达(1258年)之后，跟着又征服阿勒波和大馬士革(1260年)，于是，蒙古人在这斗爭里，构成了第三种势力。在阿勒波和大馬士革的陷落之后，小亚美尼亚国王就承認蒙古人的宗主权。如果利凡得的其他基督教公侯也表示同样愼重的政治态度，情形将会好些；因为蒙古人对基督徒是容忍的，而曼麦琉克朝则反是。

在蒙古人和曼麦琉克朝的战爭里，"圣地"的港口和叙利亚的城市腹背受敌。下列事件是对它們的不幸：旭烈兀，即巴格达、阿

勒波和大馬士革的蒙古占領者，由于大汗逝世的消息，被召回到远东去。旭烈兀留守的将官被埃及曼麦琉克朝指揮官俾巴斯击潰杀死。俾巴斯出身蒙古族，作为奴隶出售到埃及；他成了一个狂热的穆罕默德教信徒，后来也成了一个兇猛的軍事首領。在蒙古将官失敗之后，俾巴斯成为叙利亚以及阿勒波和大馬士革的主人翁，于是他夢想把东方基督教国完全推翻。凡是薩拉丁由于智慧和容忍态度所未做的事情，这个可怕的狂人企图予以完成。他以勒索性的关税横加在通过亚历山大城的地中海和印度間的貿易身上，因而汲取了龐大无比的进款。

俾巴斯完全明白基督教国家的弱点；刚在統治埃及之后，他即准备进攻它們。1261年11月，他离开阿勒波，对安提阿的領土加以蹂躪。次年，波希蒙德的艦队在塞琉細亚港口被焚毁。此后，年年有着一次新的侵犯。1263年，圣貞德城被攻击。热那亚原拟援助俾巴斯来挫折威尼斯，但毕竟不敢这样去做。基督徒向小亚美尼亚的海敦及蒙古人乞援。俾巴斯在1267年占領凱撒利亚和阿苏夫作为报复；海敦企图以禁止羊毛、鉄及其他必需品从西里西亚出口来打击埃及，結果哈馬总督侵入境内，大肆燒杀。1267年太尔进貢埃及一万五千金币。1268年扎发被征服，俾巴斯不久出現于安提阿城前，在两天之內即攻陷它。于是的黎波里、西頓和亚克互相分隔了。

1277年，俾巴斯的逝世，使这种危險的局势化为烏有。屬曼麦琉克朝的大馬士革省长，原来由俾巴斯委任的，現在反叛埃及的新苏丹，而向蒙古人求助了。1281年埃及軍和蒙古人在奧倫梯河两岸上的埃麦薩地方进行决战；蒙古人慘敗。"圣地"上基督教殘余領土在被西欧遺弃的情况下，面临着埃及人的暴怒。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王国已只剩下列領土：亚克城及七十三个村庄、西頓城及十五个村庄、凱法斯与卡麦尔及七个村庄、貝魯特的領地、馬加特

的城堡以及的黎波里郡。1291年5月28日在一次英勇抵抗之后，圣貞德城被埃及的穆罕默德徒占領。1291年7月，凱法斯、太尔、西頓、貝魯特或被占領或被放弃。“耶路撒冷王国除了一段光荣的史跡外，沒有留下什么了。”

可是，誰也不需要为叙利亚的基督教国家的复亡而哭丧。即使有理由来为十字軍作辯护——那是有問題的——欧洲由于愚笨、由于虛伪、由于不公平，失掉了对东方要求任何权利的根据。由十字軍带来的移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堕落的事实，已是无可爭辯的。最偉大的近代英国历史家写了下面一段周詳的文字：

腐化和瓦解的过程，由于地方的和偶然的情势而加速起来。首批移民在他們的新土地上，生活的时間不长，而他們的在这地方出生的孩子們，是一个退化的种族。在十二世紀中，耶路撒冷共有十一个国王。头四个国王都是出生于欧洲的，在他們的时代，国家是在創建和巩固的过程中；后四个国王都是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在他們的时代，气候的影响和东方习俗的沾染，已很明显；在这四个国王中，三个人在未成年时即位，另一个还是麻瘋病患者。貴族家族，象王室一样，沒有从欧洲吸收新成員来补充，他們老早已陷于柔弱腐敗的深淵。在当地出生的法兰克人的一般性格，就是他們欧洲祖先的缺点与那些和他們共同生活的民族的缺点相結合而形成的。虽然从个人来說，他們是勇敢的，因为在下一世代里，赭弗理和波希蒙德的遺风尚在；可是，一般講，他們旣殘酷又柔弱，旣狂暴又无信义，旣奢侈又貪婪，所以，他們的榜样所产生的影响是：誘使新来的朝聖者陷入不名誉和墮落的迷途，可能远多于指导他們走上胜利的道路，或使他們朝气蓬勃的精力納入正軌；在这里，他們理应以自己的經驗来教导他們說：西方国家的方針，如果是有眞实性的話，必須使之实行……生命的短促和朝不保夕的情况，是不可救葯的病源，而它的效果，也是无法补救的……。在王国內，唯一健全的因素，是軍事寺院团的組織。它們从欧洲經常获得新鮮而又健康的血液的补充；它們的成員，都是年壮力強，沒有未成年者来充数；它們的私利同王国的強大是分不开的……。如果巴勒斯坦曾采用这种組織，它可能繼續留在基督

徒手里，或者至少能和塞浦路斯王国①繼續到同样长久。甚至那后来用以統治利凡得国家的威尼斯制度，也可能保証王国的一个較长寿命；因为这制度可获得新血液的注入，而可避免巴勒斯坦历史上足以垂戒的禍害；事实上利凡得也沒有灭亡，直到威尼斯已十分衰老无力再来支持它为止……但是，还另有一个原因，……十字軍軍队的龐杂成分：它們缺少共同的或統一的組織，在队伍中夾杂着大批非战人員的大群朝聖者；这批人只要有工資，愿为任何主人服务；他們靠着十分不穩定的收入来糊口。他們衣食不周，而又无所依靠，所以，成为十字軍的一个經常負担，又是一个經常飢饉和疾病的来源……[它是]一个內部互相敌对的王国，在一个毫无权力的外国人統治下，充滿着封建貴族；而这批貴族对欧洲基督徒的畏恨心理比对穆斯林还要厉害……它被一般衰敗过程压碎了……当地居民，不是被歼灭，便是互相敌对……世襲的貴族既墮落又分裂，注意于他們的私利远多于注意于他們的国家或他們基督徒的品質②。

在这以后，小亚美尼亚和塞浦路斯，是基督徒在东方的碩果仅存的据点。小亚美尼亚維持它的独立地位，直到1375年被穆罕默德徒征服为止。塞浦路斯王国持續到1489年；它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間商业爭霸的牺牲品，它也受到埃及和奥托曼土耳其人的威胁。1489年，威尼斯完全占有塞浦路斯島，并繼續保持着該島，直到1571年它被土耳其人占領为止。

在叙利亚和亚克丧失之后，塞浦路斯法馬古斯塔港成了西欧人在利凡得区最大商埠。在这里，意大利城市有着商站，附有教堂、貨棧、浴場和烘面包房，完全象我們在叙利亚所看到的那样。热那亚起初所享有的特权，比威尼斯要大。它的一个全权代表保护热那亚人在全島上的权利(从1329年起)；它的执行官吏甚至有权审理有关死刑案件，而且它是不繳付关税的。1306年，亨利二世也免

① 在1291年十字軍在东方的最后基地亚克城被占領后，塞浦路斯国王改称为耶路撒冷国王；在十五世紀末期，王国被并入威尼斯版图。——譯者

② 斯达布斯：《案卷丛書导論》，第343頁及以下。

除威尼斯人繳納一切商业税，并在購买土地而不建造砲台的条件下，允許他們在島上三个主要城市里，建立貨棧、教堂等等。在意大利城市中，安科納、比薩、佛罗倫薩和墨西拿同法馬古斯塔港有着貿易关系；在那里，法国是由那旁和蒙特皮列，西班牙是由巴塞罗納、塔拉哥納和薩拉哥撒等城市代表的。

十字軍失敗的各种原因，从剛开始起，已經蘊藏在內。所有跟着而来的困难，东方移民的不公正，統治阶級的利益分歧，激烈的商业竞爭，蜂湧而来的欧洲侨民所表現的輕浮、图利或腐敗作风和欧洲血統移民的德性淪丧（他們丧失西方习惯的、傳統的禁忌）；这一切都是失敗的基本原因。而且，那如此长久地煽起了十字軍火焰的狂热，已經衰退。最后，只有教廷还保持着这种热情。

但是，十字軍所从出的西欧情况，也是有着影响的。欧洲的幻想已經破灭。新生的世俗文学——不是浪漫派的抒情詩人和彈唱詩人的文学，而是諷刺家和寓言家的文学——損伤了十字軍士的动机和行动了。律特柏夫所写的《一个十字軍士和一个騎士的辯論》可作为一个例証，作者是十三世紀的一个平民出身的朱未那尔①。

到了十三世紀，那由英雄歌曲所激起的高度热忱和第一次十字軍的狂热已冷下来了。单純感情的呼吁已不行了。僧侶們必須說服听众。除了靠象“国王的軍旗”歌和“再会吧，神圣十字架”歌这一类的煽动尙武精神的歌曲以外，还必須同听众爭辯一番。于是，出現了一批偉大的辯論家：扎克·得·維特里、埃田·得·波旁、罗曼的杭柏特，他們的演說詞是經过精密准备好的而又富于爭辯性的論文。这些演說家特别企图駁倒那些以各种借口和遁詞来逃避教会所加的义务的人們。这些借口包括有健康的和財产的理

① 律特柏夫是法国的彈唱詩人，生于1230年；朱未那尔是罗馬的著名諷刺詩人。——譯者

由、或家庭关系或缺少現款的理由——因为到了这时期，如上文所說，十字軍出征已变成资本家的事业似的，需要大量金錢来予以維持；同时，那在早期贈給十字軍士現款、馬匹和行装的热潮也已退落。这些怀疑的听众甚至对宣傳者戏弄譏笑——“他們以碎布做成的十字架成为各色各样的可笑資料”①。

因此，教会对那些愿意去的人們添加恩惠，并增加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利益，而对那些拒絕去的人們加重了所加的处罰。教会广泛賜給完全的和特殊的恩惠，精神处罰的撤銷、过去所加的驅逐出教处分的取消、財产稅和人头稅的豁免以及契約或其他約言的解除等权利。

这些出征的开支是浩大的。我們有很完备的統計資料，可大概算出1248年圣路易的十字軍使法国所消耗的經費。国王的开支达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五百七十“图尔鎊”②；我們就貨币購买力的今昔之差别来折算，这一笔巨款約可折合三千五百万美元。跟随国王去的大貴族和騎士所花費的，可能和国王所花費的相等；所以，这次十字軍使法国总共消耗了大約七千万美元。不难理解：这类性質的一次出征怎样損伤了法国財富，并怎样使很多人貧困化。而且，这些数字，并沒有包括全部費用。因为它們还沒有包括那笔为贖回国王所付的巨款，也沒有包括那笔为贖回在曼苏拉战役里被俘的法国俘虜所需的数目。柏格尔估計，贖金的总額按照現代貨币計算，約合四亿美元；他說，在曼麦琉克王朝手里約有一万二千个法国俘虜。有一船現款，由卡斯提尔的布兰奇送出，沉沒海中。法国僧侶受到譴責，因为他們把原来可用以援助法王的金錢，輸送到罗馬去。教廷曾慫恿这次十字軍的出征；但現在，他要粉碎腓特烈二世比帮助路易九世更为殷切。王后布兰奇抗議：英諾森四世

① derisiones multimodas faciunt de assumentibus crucem.

② “图尔鎊”是图尔城所鑄造的貨币，值十便士。——譯者

在法国宣傳組織十字軍来反对康拉德四世；因为当时法王还在东方做俘虜。

乔伊維尔是圣路易的最忠心的臣仆，在他所著的《圣路易傳》里，有一段出色的文字，反映这种幻想的破灭和理性的回复。他写道：

法王懇切地劝我去参加十字軍出征（这是关于1270年法王的第二次十字軍出征），走上朝聖的十字道路。但我回答他說，当我以前在国外替国王服务的时候（1246—1250年），国王的官吏对我族人如此勒索压迫，使他們穷到这样地步，我不能想象无論他們或者我将会从这損失里恢复元气。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我再一次走上十字軍的道路，我可怜的人們将会整个地完蛋；而且，我已听到很多人說，那些倡导十字軍的人們犯了大錯，并造了大孽。

其时，欧洲的旧商路已經扩展，許多路加以修整，象在阿尔卑斯山中的那样，还有許多新路，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的，也已开闢。海上力量已变得很重要。对一切阶級来說，旅行已变成普遍事情，而且，比以前要舒适些。正式的海上航路已經規定出来，而某种定期的航行已經建立。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建造了各种类型的和大小不等的船只。普通类型的船舶是帆桨并用的。只在順风行駛的时候，才利用船帆。航海技术已有很大进步，而最灵便的船只，采取直綫航路，来代替沿海岸航行，或从一角到一角、一島到一島的航行。在气候良好、海面平静的条件下，帆桨并用的船只从馬賽到亚克，需时十五天。"船舶法"建立了海員和乘客中間的紀律。

关于十字軍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关于所轉运的商品种类，上文已講过。这項貿易在开始时，原象一条小溪那样，而后来汇成一条寬闊的大河；商品源源不絕地流遍全欧，連冰島也被波及。例如，在扫桑普敦的市政录里充滿着关于同威尼斯通商的資料。进口貨

物,原来是奢侈品,而現在变为必需品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标准。新織品,象棉布和絲綢一类,新食品,象砂糖、香料、胡椒、生薑、东方的蜜餞水果一类,至少改变了欧洲的上層阶級的卫生和飲食,也有助于居民物質享受的提高。浴池的使用(一个东方的习俗),虽然永未普遍化,但至少对于富裕阶層已更加寻常化了。

十字軍虽沒有建造西欧的城市,但他們刺激了城市的生活,使城市扩大并富裕起来。

十字軍的一个重要創造,是关于营业方式的发展。拜占廷商人象意大利城市的商人和銀行家那样,是資本家。威尼斯、热那亚、馬賽的出口商人、圣殿騎士团以及一切宗教团体也都是如此;犹太人也不例外。有重要意义的,亚历山大三世在1176年給热那亚城大主教的一項訓諭里,禁止高利貸并特别談到香料一項;当时,热那亚正在同比薩爭夺地中海的商业霸权。中世紀的兌換商由于营业的发展,成为銀行家;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銀行营业的方法和規程,当时已被采用。兌換商在設立現款存儲所后,經过相当时期,就发展成为眞正的銀行家了。起初,他們經营象收付錢款这一类的单純商业营业;后来,他們兼营倉庫业,代替他們顧客間汇划帳款,代收錢款等等。于是,銀行家变为交换商品的中間商;他們接受那些存在保稅倉庫內的貨物,并把它們轉运到其他的国家去。早在十二世紀銀行营业上发生了类似革命式的改变:就是,以象征移轉来代替眞正移轉,以收据来代替眞正貨币;这种收据,就是汇划票。佛罗倫薩人和大部倫巴人专門做这类汇划生意。倫巴人是法王和英王的財政代理人。在十三世纪,銀行家开始效法犹太人,收取利息,經营放款和貼現营业。

因为高利貸被禁止的,所以不得不采用权宜的办法。放款人以一个团体的名义出面,来掩盖自己的身分。这办法是有危險的,

但它可保护个人。这样一来，遂出現了股份公司。在十五世紀，热那亚的圣乔治銀行，便是一例。簡言之，在近代商业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制度，象領事、商业法院、海上法、汇划票、銀行、股份公司以及后来商业公会这一类，都是在十字軍时期或不久以后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产生出来的。

意大利銀行家，成了国王、大王公和教皇的不可缺少的財政顧問。十三世紀末期，在法国腓力四世和英国爱德华一世的政府中，我們可看到这类官員。关于这种"新財政"对政治史的影响，还有待于研究很多史料。例如：

爱德华一世，在从"聖地"返国途中，到奥微亚托訪問教皇；然后他又前往波倫亚和佛罗倫薩，他在有一处获得了一个大法学家，因而他能够进行司法改革，在另一处，获得了一項充分的財政支援，这大有助于他的冒險事业尤其是对苏格兰的战爭。貴族們当然憎恨任何使国王无須依賴他們資助的事情，起来反对爱德華二世，并立刻逐出多斯加納的財政专家；而他們后来由于急欲恢复他們的优势，再資助爱德华三世的远征；后者带領大部从黑諸慕来的外国佣兵，渡海到法国。①

在十字軍开始时，沒有貿易习慣法的。商业法的制訂和編纂，是由十字軍迫出来的。在这种发展上，象在銀行与財政方面那样，意大利人也是先驅。他們在西欧首先編訂管理商业来往的习慣法。其他国家采用并模仿他們的法律。于是，商业法院和通商法出現了，而商业法的大部分，是从拜占廷法律和出名的"罗得西亚島法典"得来的。

为了管理它們国外的商业殖民地，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派遣了叫做領事的官員；領事同时受命管理它們在外国的臣民并代表国家同駐在国的元首办理交涉。今天的領事还保留着这两种任务，但

① «曼特斯图亚特·格兰特·达夫的日記»，第1卷，第306頁（同历史家J. R. 格林的談話記录）。

是这种任务的重要性已倒置了。在中世紀时代，一个領事的主要責任是管理和执行法律，因为殖民地就它所在地区的范圍內說，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在近代，領事已失掉这項权力；他的主要地位，是一个代表者的地位。所以，最先的制度，是領事館制度。为了判理商务案件，設立了特別領事法院，它的程序，它的法律是异于封建法院的；角斗、神意裁判和宣誓証明制都沒有；裁判是根据証据的；每个意大利城市都派遣它的商务領事，他享有一种特殊管轄权。这項制度，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都予以采用。到今天，还有称为領事法官的官員。

还有一种国际慣例的体系逐漸建立起来；这些慣例，是关于公海上冲突事件的，或关于各国的船主間或其他官員、水手、商人之間的冲突事件的。海上貿易所需要的法律与規程稍稍不同于陆上貿易的法律与規程；又因为海洋主要是屬于国际性的，所以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从海上法发展出来的。最早出現的海上法典中有：比薩的"习慣法"(1160年)——它的前身可能是阿馬斐的簡直象傳說的"表法"——特拉尼的"法典"(1183年)，蒙特皮列的"习慣法"(1223年)，馬賽的"习慣法"以及威尼斯的"航海条例"(1255年)。比这些法律出現較后而內容更加完备的(虽然大部从它們得来的)是：很出名的加达魯尼亚(巴塞罗納)的"海上管轄权"、"鄂列倫的案卷"以及再后来，在十四世紀里北欧的最早商业和航海法典：律伯克、不来梅和維斯比的"法典"。

在对所謂十字軍的結果作出評价时，我們所感困难的，是区别哪些事情似乎是起源于十字軍的；哪些現象是在十字軍时出現，但它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十字軍所产生的。換句話說来，有时不可能确定什么是前因，什么是后果；也不可能确定哪种力量占优势和断定它們之間的关系。西欧人对东方奢侈品的嗜好——这問題上文已提过——激起东方的商业呢？还是东方的貿易关系

激起这种嗜好呢？

下引两段話，可以表明：历史家在解釋方面的意見，有多么大的分歧。

“我們几乎不可能找出一个政治的、軍事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艺术的、甚至宗教的生活領域，沒有从东方获得某种影响而丰富起来的。”（庫格勒語）

“毫无疑問，十字軍对基督教社会果然有些一般影响，但对所有这些結果，西欧人自己中間，却有着更积极、更有效力的原因。”（塞諾波斯語）

十字軍的間接刺激，似可說由于变換了欧洲的空气，比十字軍的直接影响，可能具有更大的积极效果。也許引用下面的說法，会更接近眞实性：与其說“十字軍的后果”倒不如說“阿拉伯和拜占廷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来区别：什么文明是从十字軍产生的，什么文明是在十字軍时期发展起来的。

还有其他的——也是較少关于物質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有关历史上不可衡量的东西的，一句話說，它們就是使西欧人的智慧和道德方面改換面貌，产生了新的社会理想。东方人原来有着一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礼节、不同的风俗；西欧人同他們接触以后，必然会睜开眼睛看到这一眞实：东方存在着有智慧而又有文化的民族，而且有着一种等于甚至超过封建欧洲文明的文明。十字軍創造了一种新的看法。

除了旅行和广大接触所产生的扩展眼界的效果之外，十字軍也把成千累万的西欧人带来同异教徒和不信神者直接会面；这批异教徒，按正宗教义的說法，一概不能获得灵魂的救渡；因为只有在一个眞正“教会”的范圍之內，人們才可获得救渡。但在君士坦丁堡，西欧人看到了一种他們从来沒有想到的財富、权力和豪华景象以及一种文化和文明比他們自己的还优越得很多。他們又看到，甚

至那些被鄙視又被憎恨的异教徒，在許多方面，也是屬于悪魔的藹然可亲的孩子們。在巴勒斯坦，至少也有若干人，認眞地联想到当年基督和使徒們的生活和服务，想到他們的貧困和微賤地位；这些都是和現在西歐教会上層的財富和驕矜态度截然不同的；人們就会奇怪：怎样会有这种情形呢？伊斯兰教不仅使人感动，而且使人改变信仰。因为我們看到对基督教"叛徒"所提的控訴說，他們竟抛弃十字架来換取新月；連僧侶阶層的成員，也有这样做的。有一个被派到非洲去的法兰西斯派傳教士，变成了穆罕默德教徒。此外，穆罕默德徒和基督徒之間的又龐大而又有利的商业关系也促进了宗教容忍态度的成长，因为国际商业需要宗教的容忍。宗教狂热是不利于貿易的发展的。

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可以看到：即歐洲人怎样在东方会忘掉他們过去的宗教狂热和他們反对穆罕默德教徒的种族的与社会的偏見。政治的仇恨果然还有，但这些观感已經消逝。烏尔班二世会感到伤心的，只要他知道了下列情况：在占領"圣城"后的一世代之內，穆罕默德教商人在耶路撒冷王国境內到处自由来往；伊斯兰教寺院依然存在；在安提阿和的黎波里，古兰經还在伊斯兰教学校里講授。十字軍士的第二代說阿拉伯語，象他們說本国語一样地流利；他們穿着东方服装，他們模仿阿拉伯人的礼节，他們用东方的家具、挂帷、地毯来布置他們的房屋和別墅，他們还用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品和图案来装飾这些地方。

东方的燦烂文明，在基督徒看来，是如此新鮮，如此不同于他們在西歐城堡里所过的窄狹而又单調的生活，所以，不久他們向它屈服了。东方的寬大服装，在他們看来比他們的民族服装似乎是更适合于气候。在他們的头上，他們纏着阿拉伯头巾，即一种防御日光的繞头巾；他們力求穿用金綫或珍珠来装飾着的絲綢衣服，着彎曲足尖的鞋子；他們对于精細的烹飪、对于奢侈的室內布置以及

对于东方人的豪华宴会，也已习惯而成自然。总之，西欧人已知道使自己适应于他們新的生存条件。

在这种半东方化的服装下(除修道士外，連僧侶也如此)，那些屬于軍事寺院团的留鬚而戴帽的騎士，一定会显出一种严肃的神态：圣殿騎士穿紅色十字的白色外套；救护騎士穿白色十字的黑色外套；在1190年建立起来的条頓騎士，穿黑色十字的白色外套。

封建式的而又好战的西欧之粗魯方式讓位給东方文雅态度了。战士典型的好斗的男爵轉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有优良的(虽非典雅温柔的)风度的紳士。貝魯特老翁就是这些在第二代里文明化的貴族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个叫做約翰·提柏林的著名作家称之为他的"老伯伯"。这个文質彬彬的老貴族，是伊柏林、阿苏夫、扎发、兰勒各封邑的所有人，也是貝魯特港的領主；他研究艺术、爱好文学，又是一个大法学家。不象英国人在印度那样，这些貴族东方化、叙利亚化了；而跟着时間的进展，他們成为一个簇新而又特殊的貴族阶層，他們是本地人而非外人，是容忍异教的基督徒，而又是熟練世故的文化人；在他們看来，辽远法国內的堂弟兄似乎是陌生人，正象那里的堂弟兄也把他們当作陌生人那样。

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于十字軍在东征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識和經驗而活跃起来。对东方的兴趣以及东方的商品引起旅行家的东遊，象馬哥孛罗那样。科学研究也获得了一大刺激。西欧人对于奇异的植物和走兽，发生高度趣味，因而他們設立了植物园和动物园。十字軍导入了一个航海和发現的时期，那終于导致新世界的发現。总之，十字軍增加了欧洲人的知識，扩大了他們的兴趣，刺激了他們的思想。如果沒有十字軍，文艺复兴不会蓬勃发展，不能象它所表現的那样的。

甚至教会也受到影响：欧洲人对它的尊敬已經丧失，而对它的畏惧也开始下降。当欧洲的其余部分已轉向于一个更寬大的容

忍态度时，教会和教廷却依然是旧的宗教狂热的堡壘，还在策划組織更新的、更銳利的不容忍形式。教会一倍一倍地增加恩典，并允許提高报酬来鼓起人們作进一步的努力去反对伊斯兰教，教会竟然对献金的人和对投效参軍的人都一样給予赦免权；由此可見教会注意于搜集資金多，而注意于提倡新出征則少。更恶劣的，教会竟掉轉它的狂热和武裝队伍来反对发尔多教派、亚尔比教派及其他异端教派，把十字軍完全糟蹋、汚辱了。郎基多克的擄掠和士魯斯与貝稷亚的大屠杀，多密尼克教派的瘋狂宣傳以及宗教裁判所的采用——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字軍的不良后果。历史的諷刺，再也沒有比在这些事件里表現得更为明显了。教廷一向是十字軍最热心的提倡者，而現在亲眼看到它所提倡的运动反过来竟然打到自己头上了。

譯名对照表

三 划

大馬士革	Damascus
大流士	Darius
大伽图	Cato major
大兰多	Tarento
大哈	Taha
士麦拿	Smyrna
士的里亚	Styria
土魯斯	Toulouse
土克	Touque
土伦	Toulon
凡尔登	Verdun
也門	Yemen

四 划

尤金	Eugene
尤西比阿斯	Eusebius
尤克辛	Euxine
巴塞罗納	Barcelona
巴隆	Ballon
巴本堡尔族	Babenbergers
巴勒摩	Palermo
巴伏	Bavo
巴塞洛繆	Bartholomew
巴登	Baden
巴苏	Passau
巴度威克	Bardowick
巴特里克	Patrick
巴納特	Banat
巴門梯尔	Parmentier
巴錫尔	Basil
巴拉斯特勒	Balastra
巴古达	Bagaudae
巴布·厄尔·曼得	Bab-el-Mandel
巴格达	Bagdad
巴斯克人	Basgue
巴克特里亚	Bactria
巴塞姆斯	Barsymes
巴勒姆	Bahram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利	Bari
巴斯塔尼亚	Bastania
巴庫	Baku
巴塞尔	Basel
巴塔維亚人	Batavians
巴登威勒	Badenweiler
巴斯特尼人	Basternae
巴叶	Bayeux
巴比伦	Babylon
巴索林姆	Bussolium
巴特勒	Butler
巴土亚	Padua
巴費亚	Pavia
巴士拉	Basra
巴尔克	Balkh
巴勒加扎尔河	Bahr el Ghazal
巴苏里	Bazury
巴米賽族	Barmecides
巴扎斯	Bazas
巴坡謨	Baparme
巴拉克拉瓦	Balaklava
巴巴利	Barbary
巴林群島	Bahrein Islands
巴利阿利	Balearic

巴尔加	Barca
厄賽那斯	Ursinus
厄尔士山脉	Erzgebirge
厄尔斯人	Erse
厄波	Ebo
厄息尼	Ursini
厄馬拉	Urmara
比尔登	Pilten
比耳克罗恩	Bierkeroen
比德	Bede
比斯开	Biscay
比哥尔	Bigorre
比特	Bitter
比懇尼格人	Pechenegs
比利牛斯山	Pyrenees
开溫	Kairwan
开罗	Cairo
什留塞斯	Schlusis
什列斯威	Schleswig
什維尔	Sch vill
丹多罗	Daudolo
丹尼門	Dunegate
文森兹	Vincenes
文得力科伦	Vindelicorum
日內瓦	Geneva
日德兰	Jutland
方坦那	Fontanas
方坦	Fontaines
太尔	Tyre
不来梅	Bremen
支斯得尔	Chester
"五港"	"Cinque Ports"
扎克·得·維特里	Jacque de Vitry
扎林治	Zarinje
扎拉	Zara
扎勒河	Saale
扎林根	Zahringen
扎发	Jaffa
韦德摩	Wedmore
韦尔柴姆	Welzheim

五 划

尼斯特洛姆	Nystrom
尼科坡力斯	Nicopolis
尼西	Nish
尼卡篤	Nicator
尼罗河	Nile
尼尼微	Nineveh
尼奥波利斯	Neapolis
尼特里亚	Nitria
尼西亚	Nicaea
尼門河	Nimen
尼祿	Nero
尼姆	Nimes
尼尔华	Nerva
尼哥米底亚	Nicomedia
尼薩	Nyssa
尼士比	Nisibis
尼森	Nicene (Nice)
尼斯	Nice (Nicene)
尼沙普尔	Nishapur
尼西柏	Nisiber
尼阿科斯	Nearkos
尼亚波利	Neopolis
尼日利亚	Nigeria
尼威根	Nimwegen
尼塔尔德	Nithard
尼日尔河	Niger
加斯科尼	Gascony
加斯太堡	Gasteiberg
加沙	Gaza
加奥尔	Cahors
加拉曼特人	Garamantes
加納	Ghana
加利波利	Gallipolis
加拉塔	Galata
加尔哈特	Kalhat

加尔达	Garda
加他罗	Gattaro
加列特	Ghariat
加达美斯	Ghadames
加拉提亚	Galatia
加力古拉	Caligula
加尔西頓	Chalcedon
加黎利	Galilee
加尔	Gall
加力伊那斯	Gallienus
加第斯	Gades
加的斯	Cadiz
加柏斯	Gabes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加薩尔	Cassal
加达尔几維	Guadalquivir
加里西亚	Galicia
加森基	Guthungi
卡利尼克斯	Callinicus
卡皮	Carpi
卡尼鄂拉	Carniola
卡貝	Cambay
卡西諾	Cassino
卡提林	Catiline
卡拉里斯	Caralis
卡格利亚里	Cagliari
卡息亚那斯	Cassianus
卡息奥多拉	Cassiodorus
卡尔息斯	Chalcis
卡尔斯堡	Carlsburg
卡伯林納斯	Capellianus
卡紐特	Canute
卡帕多細亚	Cappadocian
卡嫩敦	Carnuntum
卡魯滿德海岸	Coromandelcoast
卡麦尔	Carmel
卡塞伊尔	Casseuil
卡斯特兰	Castellane
卡司柏特	Cathbert
卡諾普	Kanop
卡涅夫	Kanev
卡散德拉	Cassandra
卡法	Kaffa
卡則勒拉斯	Cazerellus
卡斯特拉·巴太瓦	Castra batava
卡斯特	Castor
卡佩	Capetian
卡卡逊	Carcassonne
卡諾沙	Canossa
卡拉卡拉	Caracalla
卡匹托来	Capitoline
卡尼克	Carnic
布里斯多	Bristol
布洛德斐斯	Broadfirth
布腊	Blois
布立加	Briga
布伦希德斯	Brunhildis
布勒頓	Breton
布伦斯威克	Brunswick
布魯日	Bruges
布伦	Boulogne
布綽根	Buchogan
布罗溫斯	Provence
布拉替安	Brutium
布勒替安	Brittium
布勒塞尔	Bresal
布魯特斯	Brutus
布尔日	Bourges
布林的西	Brindisi
布尼克	Punic
布里昂	Brehon
布勒塔尼	Brittany
布累根茨	Bregenz
布哈拉	Bokhara
布朗克福	Blanquefort
布拉瓦	Brava
布里奥兹	Briouze
瓦塞特	Wasit

瓦伦斯	Valens
瓦德·特拉	Wad Dra
瓦內	Vanne
瓦兹河	Oise
瓦特堡	Wartburg
瓦拉	Wala
瓦斯特	Vaast
瓦尔德伦	Waldalen
瓦伦丁尼安	Valentinian
瓦勒里安	Valerian
瓦鲁	Varro
瓦尔达耳河	Vardar
瓦伦第諾波立斯	Valentinopolis
瓦雷	Valais
瓦伦斯	Valence
瓦拉弗里特	Walafrid
瓦勒里	Valery
瓦拉維尔	Varaville
瓦利德	Walid
瓦崙西恩	Valenciennes
瓦那	Varna
瓦特福德	Waterford
瓦特尼斯	Waterness
瓦士	Wash
瓦尔德·那布	Wald Nab
瓦吉伦	Wargelan
瓦伦人	Walloons
瓦雷契亚	Wallachia
瓦牧	Worms
圣泽門·得斯·普勒斯	St·Germain-des-Pres
圣馬丁·得斯·香	St·Martin-des-Champs
圣泽門	St. Germain
圣大	Sanda
圣大非	Santa Fe
圣雅科波·达尔托帕沙	San Jocopo d'Alto-passo
圣哥特哈德	St·Gothard
圣貞德	St Jean d'Acre
兰米尔斯柏	Rammelsberg
兰登	Landon
兰普勒赫	Lamprecht
兰哥巴第	Langobardium
兰恩	Ran
兰勒	Ramleh
兰伯底阿	Lampadius
兰·蒲尔	Lane-Poole
弗雷德卡	Fredegar
弗雷德艮第	Fredegundis
弗里茨拉尔	Fritzlar
弗伦提納	Frontinus
弗里加	Phrygia
弗洛拉斯	Florus
弗勒里	Fleury
弗罗杜尔	Flodoard
弗賴堡	Freiburg
弗勒查斯	Frejus
弗累克塞納特	Fraxinet
弗雷泽	Frazer
弗利阿里	Friuli
弗卡斯	Phokas
弗斯塔特	Fustat
弗卡斯	phocas
弗洛登堡	Freudenberg
弗薩拉	Fussala
弗日	Vosges
弗斯特尔	Fustel
弗罗基	Floki
弗尔达	Fulda
弗莱兴	Freising
以弗所	Ephesus
以得撒	Edessa
左頴曼	Zoleiman
本尼狄克丁	Benedictine
本尼狄克	Benedict
本都	Pontus
本哈特	Berhard

本杰明	Benjamin
布奇杜伦	Bouches-du-Rhone
布文	Bouvines
布吉亚	Bouchier
布尔乔亚	Bourgeois
布賴斯	Bryce
布兰德斯	Brandes
布林的西	Brindisi
布兰奇	Blanche
汉撒同盟	Hanseatic League
汉志	Hedjaz
汉堡	Hamburg
他林敦	Tarentum
皮德蒙特	Piedmont
皮斯托雅	Pistoia
皮特阿斯	Pytheas
皮西底亚	Pisidia
皮特拉	Petra
皮特	Pitt
皮图	Pettau
皮克特人	Picts
皮阿扎	Piacenza
皮特里森	Pitres
宁发尔	Nimphal
台維斯特	Theveste
台斯河	Theiss
台伯河	Tiber
史梯芬	Stephen
外侵团	Vikings
北欧人	Norsemen
民登	Minden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乍德	Chad
卢加諾	Lugano
卢加	Lucca
卢加德	Lugard
卢察安	Luchane
卢奇塞	Lucchesi
卢普·得·菲利厄	Loup de Ferrieres
卢克馬尼埃	Luxmanier
卢索維姆	Luxovium
卢赛威尔	Luxeuil
卢易特普蓝	Liutprand
卢昂	Rouen
卢佛尔	Louvre
卢森堡	Luxemburg

六 划

伊·得·卡馬克	Ile-de-Camar-que
伊馬德丁	Emadeddin
伊西多	Isidore
伊庇魯斯	Epirus
伊斯的里亚	Istria
伊斯塔克里	Istakhri
伊拉克	Irak
伊夫力基亚	Ifrikia
伊特拉斯坎	Etruscan
伊尔門湖	Ilmen lake
伊斯特拉第	Istradi
伊布林	Iblin
伊哥尔	Igor
伊思巴罕	Ispahan
伊柏林	Ibelin
伊德里西	Idrisi
伊鉄尔	Itil
伊甫里阿	Ivrea
伊塞尔河	Yssel
伊泊尔	Ypres
伊立斯波	Erispoe
伊勒斯堡	Eresburg
伊克哈德	Ekkehard
伊里	Ely
伊塞克	Ezsek
伊塞格	Ezseg
伊逊左河	Isonzo
伊里連	Illyrian

伊斯的里亚	Istria
伊特魯立亚	Etruria
伊梨里根	Illy icum
伊里諾斯州	Illinois
伊斯庫里亚	Iskuriah
伊撒克	Isaac
伊伯里安	Iberian
伊利里亚	Illyria
亚密苏斯	Amisus
亚格·摩特	Aigues-Mortes
亚尔比教派	Albigensians
亚斯	Aix
亚达諾	Adano
亚尔巴諾	Albano
亚丁	Aden
亚特拉斯	Atlus
亚伯拉罕	Abraham
亚理士多德	Aristotle
亚美尼亚	Armenia
亚尔薩斯	Alsace
亚实基伦	Ascalon(Askelon)
亚尔馬	Armagh
亚达	Adda
亚基拉	Aquila
亚平宁	Apepnines
亚述	Assyria
亚速夫	Azof
亚琛	Aachen
亚俄斯塔	Aosta
亚列尔	Allier
亚尔	Aar
亚得里瓦尔德	Adrevald
亚达里克斯	Ardaricus
亚貝威勒	Abbeville
亚尔丁	Ardennes
亚威农	Avignon
亚浦利厄	Apuleius
亚諾比厄	Arnobius
亚基列	Aquileia
亚勒索	Arezzo
亚特拉斯	Atlas
亚克兴	Actium
亚得里亚海	Adriatc
亚諾尔德	Arnold
亚浦利亚	Apulia
亚得里雅那堡	Adrianople
亚琪雷尼	Archelaus
安极乐	Angelo
安提阿	Antioch
安提阿姆	Antium
安科納	Ancona
安敦·庇护	Antonius-pius
安布洛兹	Ambrose
安那格拉特	Anagrates = Anegray
安东尼那	Antoninus
安密亚那斯	Ammianus
安泰奥卡斯	Antiochus
安东尼	Antony
安蒙	Ammon
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安布立亚	Ambria
安吉尔	Alger
安如	Anjou
安泽芬	Angevin
安德洛奈卡	Andronicos
安斯哥特	Ansgot
安科穆	Angouleme
安达曼	Andaman
安科尼坦人	Anconitans
安吉尔伯特	Angilbert
安斯卡	Anskar
安得那赫	Andernach
安娜·康尼那	Anna Comnena
安特卫普	Antwerp
安諾	Anno
安替-黎巴那	Anti-Libanus
伏德	Vaud

发兰琴	Varangian
发尔赫稜	Walcheren
发尔多教派	Waldensians
西西里	Sicily
西塞罗	Cicero
西姆馬朱斯	Symmachus
西加拉第	Cyclades
西提奥	Citeaux
西利亚	Coelia
西里西亚	Cilicia
西	Simeon
西徐斯	Scythis
西班牙	Hispania
西顿	Sidon
西薇士德	Sylvester
西斯陀华	Sistova
西西尼那斯	Sicininus
西斯特伦	Sisteron
西拉夫	Siraf
西格夫里	Siegfried
西格河	Sieg
多那特教派	Donatists
多利安人	Dorian
多米尼克派	Dominican
多瑙河	Danube
多哥伯特	Dogobert
多斯加納	Tuscan
多米提阿斯	Domitius
多米蒂安	Domitian
多米尼谷	Domenicho
多非內	Dauphiny
多道夫	Dorndorf
多瑙味特	Donauworth
多柏特	Dobbert
多特蒙德	Dortmund
米兰尼亚	Melania
米西亚	Moesia
米兰	Milan
米伦	Milne
米利都	Miletus
米尔森	Meersen
米薩·阿尔·杜拉夫	Misar-al-Dolaf
米斯理	Mithridates
米丹	Medan
吉斯柏特	Gisbert
吉拉特	Girart
吉巴林	Gibalin
吉伦特	Gironde
吉尔柏	Gilbert
吉本	Gibbon
吉比德	Gepid
吉美厄治	Jumieges
吉拉尔德	Gerald
吉尔多	Gildo
托尔达	Thorda
托伦堡	Thoremburg
托勒密	Ptolemy
托利多	Toledo
托納斯	Taunus
托魯斯	Taurus
托力克	Tauric
托托薩	Tortosa
托厄尼	Toeni
朱未那尔	Juvenal
朱密斯克斯	Tzimiskes
朱丽德	Juliet
朱理雅	Julia
朱理安	Julian
朱狄司	Judith
朱理尔	Julier
朱拉	Jura
色雷克斯	Thrax
色雷斯	Thrace
乔治亚	Georgia
乔治	George
毕加第	Picardy
毕尔比利斯	Bilbilis
毕尔巴鄂	Bilbao

华尔特	Walter
列塞默	Ricimer
列日	Liege
列斯堡	Lesbos
边恩	Bjorn
边谷	Bjorko
伏尔科夫	Volkhov
伏匹斯卡斯	Vopiscus
伏加斯提勃斯	Wogastiburc
优卑亚	Euboea
冰島	Iceland
考富曼	Kaufman
吉雷西阿斯	Gelasius
艾伯特	Albert
犹琴尼厄斯	Eugenius
朴茨默斯	Posthumus
乔济	Choisy
乔伊維尔	Joinville
休格	Hugh
因尼	Inn
刘特华	Liutward
扫桑普敦	Southampton
伦茨	Lenz
伦巴人	Lombard
伦巴第	Lombardy
伦湼堡	Luneburg
伟人阿郎	Alain Le Grand
伟恩	Vienne
芝諾	Zeno
芝加哥	Chicago
那塞里·庫斯兰	Nasiri-Khusran
那息薩斯	Narcisus
那邦内細亚	Narbonensia
那泥	Narni
那巴	Narbo
那錫士	Narses
那尼亚	Narnia
那不勒斯	Naples
那普魯斯	Naplouse
那瓦	Navarre
那克索斯	Naxos
那旁	Narbonne
那布河	Nab

七 划

克勒卡	Kreka
克勒芒	Clermont
克罗特人	Croats
克劳第烏斯	Claudius
克立索斯吞	Chrysostom
克里尼派	Clunians
克里米亚	Crimea
克力奥	Clio
克洛維斯	Clovis
克朗馬克諾厄	Clonmacnois
克拉尼	Cluny
克洛那德	Clonard
克劳曾堡	Klausenburg
克列斯馬	Klysma
克尔海姆	Kehlheim
克利安得	Cleander
克力維奇	Krivichi
克里特	Crete
克旺都維克	Quantovic
克里摩拿	Cremona
克契	Kertch
克拉	Croix
克拉立斯基	Krariisky
克伦第亚人	Carinthians
克利奇	Clichy
克魯太尔	Chlotair
克洛杜岡	Chrodogang
貝尔吉卡	Belgica
貝伦湼斯	Berenice
貝魯特	Beirut
貝督英	Bedouin
貝尔格萊德	Belgrade
貝尼溫陀	Benevento

貝利撒留	Belisarius
貝基安塞斯	Beguensis
貝臧松	Besançon
貝云	Bayonne
貝卡	Birka
貝稷亚	Beziers
貝基奥	Birkio
貝特尼薩	Bethnesa
貝尼溫敦	Beneventum
貝伦加	Berenger
貝加摩	Bergamo
里摩黎克	Limerick
里奎尔	Riquier
里柏利	Ripuli
里摩日	Limoges
里发斯·阿尔特斯	Rivus Altus
里阿尔托	Rialto
里維耶拉	Riviera
里細亚	Raetia
里次尔	Laegaire
里巴尼斯	Libanius
里迈	Remi
里普里安	Ripuarian
里塞默	Ricimer
里瓦	Riva
里曼	Le mans
里吉安	Rhegium
里昂	Lyons
麦提奥兰納斯	Mediolanus
麦細亚	Mercia
麦利	Merri
麦列克·厄尔·阿达尔	Malek-el-Adel
麦尔夫	Merv
麦則堡	Merseburg
麦尔克	Melk
麦郎	Melun
麦紐尔	Manuel
麦什特	Meshed
麦森布里亚	Mesembria
麦卡德	Murchadh
麦琪	Magie
麦尔默第	Melmedy
狄奥达特	Theodat
狄逊提斯	Dissentis
狄頓霍芬	Diedenhefen
狄兹那	Ditzina
狄奥多罗	Theodoro
狄麦特琉	Demetrius
狄西阿	Decian(Decius)
狄奥多理	Theodoric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狄奥多西亚	Theodosia
狄奥多	Theodore
伯諾尔德	Bernold
伯华德	Bernward
伯尔納德	Bernard
伯利恆	Bethlehem
伯尔尼	Bern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达謝	Dacia
达馬薩	Damasus
达克斯	Dux
达米伊塔	Damietta
达里厄尔	Dariel
达夫	Duff
达多	Dudo
达哥伯特	Dagobert
达米尔尼斯	Dagmealness
达尔馬提亚	Dalmatia
达馬亚特	Damyat
利普	Lippe
利奥	Leo
利奥尔	Reole
利維亚	Livia
利凡得	Levant
利奥維吉德	Leovigild
利比亚	Libya

利希脫	Richter
利穆辛	Limousin
利奥奈因	Leonine
利古里亚	Liguria
希禹斯(巴尔干山)	Haemus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希拉克略	Heraclius
希力奥波力	Heliopolio
希拉波立	Hierapolis
希伯伦	Hebron
沙特累因	Chartrain
沙巴	Charbar
沙脫尔	Chartres
沙立	Shari
沙塔	Shata
杜森	Duchesne
杜力伊比	Du'yeby
杜德拉	Tudela
杜易斯堡	Duisburg
杜德尔斯塔德	Duderstadt
杜尔斯特德	Duurstede
杜罗	Durrow
多米提阿斯	Domitius
辛科維奇	Simkhovitch
辛尼加	Seneca
辛西格	Sinzig
辛布賴	Cimbri
辛福林	Symphorien
辛德巴德	Sindbad
君士坦查	Constantza
君士坦士	Constance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君士坦都	Constantius
迈仙	Meissen
迈罗	Milo
迈奥斯·霍尔木斯	Myos Hormus
迈克尔	Michael
迈因哥尔德	Meingold
坎特布里	Canterbury
坎帕納	Campagna
坎佩尼亚	Campania
坎塔布立亚	Cantabria
伽图	Cato
伽理略	Galerius
来巴哈	Laibach
来比錫	Leipzig
李亚	Lea
努米底亚	Numidia
努勒丁	Nureddin
启尔窝	Kilwa
廷巴克图	Timbuctoo
廷尼斯	Tinnis
汪达尔人	Vandal
汪列尔	Wandrille
伯斯塔特	Burstadt
但泽	Danzig
犹提喀	Utica
彻尔尼谷夫	Chernigov
佐息馬斯	Zosimus
佐哥	Giorgo
亨利·麵因	Henry maine
邦尼非斯	Boniface
沃姆斯	Wolms
芒斯特	Munster
阿提客	Attica
阿塔內細阿	Athanasius
阿利阿	Arius(Arian)
阿那托力奥斯	Anatolios
阿适	Arsheh
阿匹安	Appian
阿斯都里亚	Asturias
阿波卡斯特	Arbogast
阿卡狄阿斯	Arcadius
阿塞杜那	Asidona
阿那斯塔細亚	Anastasius
阿伦人	Alans
阿拉发特	Aravat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拉克賽	Araxes
阿拉美易卡	Aramaica
阿坡利那里	Apollinaris
阿尔-奥芬	Alt-ofen
阿尔丁堡	Altenburg
阿勒拉特	Arelate
阿奎坦尼亚	Aquitania
阿卡莫因	Argamoyn
阿姆尔·伊宾·厄尔·阿斯	Amr-Ibn-el-As
阿根托拉敦	Argentoratum
阿文丁	Aventine
阿特里亚	Atria
阿尔-穆哈利布	Al-Muhaleb
阿拉波那	Arrabona
阿耳凡索	Alfa so
阿利振	Origen
阿基尔夫	Arculf
阿提那	Atina
阿尔·廖吉拉·伊布·秀巴	Al-mughira-ibn-shubah
阿勒曼尼克	Allemanic
阿立奥維斯塔	Ariovis us
阿利根尼	Allegheny
阿拉列	Alaric
阿布第拉	Abdera
阿辛諾伊	Arsinoe
阿杜力斯	Adulis
阿索安	Assouan
阿尔俾那	Albinus
阿提拉	Attila
阿格利巴	Agrippa
阿加狄亚	Arcadia
阿勒波	Aleppo
阿尔卑斯山	Alpine
阿柏哈特	Eberhard
阿梭斯	Athos
阿莫尼堡	Amoeneburg
阿利斯	Arles
阿拉德	Alard
阿斯那帕	Asnapum
阿尼安	Aniane
阿尔兹·苏·德赫	Arles sur-Tech
阿尔琴	Alcuin
阿波	Abbo
阿哥巴	Agobard
阿克太	Actard
阿尔騰堡	Altenburg
阿达尔柏	Adalbert
阿斯脫拉罕	Astrakhan
阿多夫	Adolph
阿尔	Ahr
阿塔克薩塔	Artaxata
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
阿克苏謨	Axum
阿尔匹安	Ulpian
阿姆河	Oxus(Amu-Daria)
阿格利柯拉	Agricola
阿敦里斯	Adonlis
阿利奥巴扎尼斯	Ariobarzanes
阿佛尔人	Avar
阿馬斐	Amalfi
阿哥远游队	Argonauts
阿斯科尔德	Askold
阿达巴尔	Ardabal
阿尔·朱巴尔	Al-Jubal
阿瓦兹	Ahwaz
阿密德	Amid
阿努尔	Arnoul
阿拉斯	Arras
阿奎里亚	Aquileia
阿克奎	Acqui
阿欣麦兹	Ahimaaz
阿布德·拉曼	Abd-er-Rahman
阿杜尔	Adour
阿波恩	Abbon

阿郎·巴布-多尔特	Alain Barbe-torte
阿克洛科林斯	Akrocorinth
阿德拉米兴	Adramyttion
阿卡内尼亚	Acarnania
阿利亚	Alia
阿苏夫	Arsuf
阿帕米亚	Apamea
阿布·泽伊德	Abu-zeyd
阿丹南	Adamnan
阿奎彭登特	Aquapendente
阿利热摩斯	Aligermus
阿布的·哈金	Abd-el-Hakem
阿奎丹	Aquitaine
阿斯旺	Assuan
阿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
阿曼	Oman
阿巴斯	Abassi
阿塞厄特	Asyut
阿士曼納	Ashmunen
阿克民	Akhmin
阿默德·易卜·图伦	Ahmad-ibn-Tulun
苏伊士	Suez
苏維汇人	Suevi
苏特喜尔	Soothill
苏斐图拉	Sufetula
苏格拉底	Socrates
苏丹	Sudan
苏瓦桑	Soissons
苏黎支	Zurich
苏哲尔	Suger
苏格第亚那	Sughdiana
苏达克	Sudak
苏薩薩	Susasa
芬雷	Finlay
芬奇阿斯	Vincius
芬得力哥魯	Vindelicorum
芬提格里亚	Vintiglia
劳狄栖亚	Laodicea
劳伊尔	Raoul
劳郎	Laurent

八 划

拉达加薩斯	Radagaisus
拉斯·阿布·森默	Ras-Abu-Somer
拉丁姆	Latium
拉格杜南息	Lugdunensis
拉特里那斯	Ratherius
拉克坦蒂阿	Lactantius
拉特契斯	Ratchi
拉特波尔德	Ratbold
拉姆塞	Ramsay
拉謨	Rum
拉多牙湖	Ladoga Lake
拉提米奇	Radimichi
拉温那	Ravenna
拉基塞斯	Largesses
拉戚斯坦	Lazistan
拉伯斯雷	Lapsley
拉特蘭	Lateran
拉古薩	Ragusa
拉丰	Rafn
拉·格拉斯	La Grasse
拉发哈佛穆斯	Lavahavemouth
拉格湼·罗德布洛克	Ragnar Lodbrok
拉塔奇亚	Latakia
拉里薩	Larıssa
拉西格南	Lusignan
拉洛士	LaRoche
拉斯卡立斯	Lascaris
拉·馬士	La Marche
拉·洛瑟尔	La Rochelle
拉斯金	Ruskin
拉·列奥尔	La Reole
拉克斯厄	Luxeuil
波比奥	Bobbio

波伦亚	Bologna
波力安族	Polyane
波洛夫茨	Polovtzy
波未	Beauvais
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
波波	Poppo
波旁	Bourbon
波希蒙德	Bohemond
波那	Bona
波斯特拉	Bostra
波拉	Pola
波希米亚	Bohemia
波多西	Potosi
波斯尼亚	Bosnia
波的亚	Boeotia
波尔多	Bordeaux
波克亥姆	Bockelheim
波亚蒂尔	Poitiers
波特芬	Poitevin
波恩	Bonn
波亚图	Poitou
波希米亚人	Bohemian
波索	Boso
波河	Po
波里那斯	Paulinus
波耳克利塔	Polgcleitus
波留	Beaulieu
波厄尔德	Poehlde
罗多尔弗斯	Rodolphus
罗尔	Leure
罗哲尔	Roger
罗馬納	Romagna
罗得西亚	Rhodesia
罗灵逊	Rawlinson
罗斯托夫	Rostov
罗曼	Romans
罗曼納斯	Romanus
罗多斯陀	Rodosto
罗地	Lodi
罗兰	Rolland
罗塞达	Rosetta
罗提尔	Rowthiel
罗尼河	Rhone
罗斯托夫捷夫	Rostovtzeff
罗耳士	Lorsch
罗因河	Loing
罗塞耳	Lothar
罗尔瑟赫	Rohrschach
罗亚尔	Loire
罗得島	Rhodes
帕馬	Parma
帕拉开昂	Palakaion
帕得鮑恩	Paderborn
帕夫拉哥尼亚	Paphlagonia
帕特南	Putnam
帕雷狄阿斯	Palladius
帕科密阿斯	Pachomius
帕拉斯	Pallas
帕特洛尼阿	Petronius
帕尔迈拉	Palmyra
帕諾波立斯	Panopolis
帕提亚人	Parthians
帕特洛克利斯	Patrocles
帕第克比姆	Pamticapaeum
帕提那克斯	Pertinax
帕拉泰因	Palatine
帕諾馬斯	Panormus
法息斯	Phasia
法加那	Farghana
法馬古斯塔	Famagusta
法提马朝	Fatimite
法斯	Fars
法兰德斯	Flanders
法兰西斯派	Franciscan
法兰西島	Ile-de-France
法拉米西	Faramish
法里西安	Frisian
法里西亚	Frisia

法里斯兰	Friesland
法尔康	Falcon
法拉特尼布	Flatneb
法罗	Faroe
法兰哥尼亚	Franconia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法雍	Fayum
易北河	Elbe
易宾·阿布德·哈坎	Ibn Abdel Hakon
易宾·庫尔达达巴	Ibn Khurdadabach
易宾·卡尔頓	Ibn—Khaldun
易宾·厄尔·阿提尔	Ibn el Athir
易格那提阿	Ignatius
易宾·科尔达柏	Ibn Khordabeh
易宾·巴托塔	Ibn Batuta
易斯巴斯克	Izborsk
易宾·霍卡尔	Ibn Hawkal
和闐	Khotan
非奥多西亚	Feodosyia
非基克	Figeac
非拉得尔斐斯	Philadelphus
佛卡塞	Vogasus
佛亚	Foix
佛来銘人	Flemings
佛罗伦薩	Florence
佛尔克	Fulk
佛吉尔	Virgil
佛吉力阿	Virgilius
帖木儿	Timurlane
帖撒利	Thessaly
帖撒罗尼加	Thessalonica
帖奥度尔夫	Theodulf
彼特洛尼尔	Petronell
奈斯波拉斯	Niceporus
奈法昂	Nymphaion
孟都亚	Mantua
孟斐斯	Menphis
孟加拉	Bengal
孟第維尔	Mandeville

孟勒本	Memleben
林肯郡	Lincolnshire
林尼	Lynn
林斯德	Leister
林哥尼斯	Lingones
林斯馬尔	Linsmore
图尔	Toul
图拉真	Trajan
图柏多	Thuburto
图尼	Turnu
底格拉尼	Tigranes
底比斯	Thebes
坦納易斯	Tanais
坦尼	Taine
坦納	Tanai
坦涅特	Thanet
的里亚斯特	Trieste
的黎波里	Tripoli
佩特拉斯	Patras
佩拉	Pella
佩斯奇亚拉	Peschiera
佩魯查	Perugia
佩里雅斯拉夫尔	Pereyaslavl
岡城	Caen
岡瑟	Gunther
岡特雷姆	Guntram
岡曾霍逊	Gunzenhausen
奇微塔·維奇亚	Civita-Vecchia
奇尔	Chelle
杭廷頓	Huntington
杭柏特	Humbert
松斯	Sens
雨果	Hugo
彼尔利奥尼	Pierleone
欧內斯特·雷南	Ernest Renan
欧巴托里亚	Eupatoria
昆尼諾斯	Comnenos
門的內哥罗	Montenegro
岱雅那	Diana

杰腊德	Gerard
杰弗里	Geoffrey
杰罗姆	Jerome
迦薩	Gaza
卑尔根	Bergen
迪狄摩太春	Didymoteichon
弥德斐斯	Midfirth
欣克馬尔	Hincmar
庞培	Pompeii(Pompeiusl)

九 划

科伦	Cologne
科不林士	Coblenz
科琉麦拉	Columella
科兰巴	Columba
科替安·阿尔卑斯	Cottine Alps(Cottian Alps)
科伦西尔	Columcille
科斯洛厄兹	Chosroes
科林斯	Corinth
科索立那	Cosolina
科尔奇斯	Colchis
科普多斯	Coptos
科普特人	Copts
科西嘉	Corsica
科比	Corbie
科尼斯	Caunes
科米里	Cormery
科德柏克	Caudebec
科維	Corvey
科立	Kori
科馬杜斯	Comodus
科摩	Como
科兰班	Columban
科尔瓦提	Khorovaty
科馬奇奥	Comachio
科隆	Coron
科孚	Corfu
科德柏克	Caudebec
科德哥特	Caudecote
科利庫特	Calicut
科瓦尔	Kawar
哈尔斯塔	Hallstadt
哈茨山脉	Harz
哈德比	Haddeby
哈斯丁斯	Hastings
哈夫丹	Halfdan
哈夫勒	Harfleur
哈勒	Halle
哈托	Hatto
哈伯斯塔特	Halberstadt
哈尔斯大德	Halzstat
哈伦·阿尔·拉希德	Harun-ar-Rashid
哈德拉孟数	Hadrumentum
哈赤	Hatch
哈德良	Hadrian
哈那克	Harnack
哈森堡	Hasenburg
哈汶斯坦因	Havenstein
哈夫尔斯峡湾	Hafrsfjord
哈罗德	Harold
哈馬丹	Hamadan
哈尔米洛斯	Halmyros
哈馬	Hamah
威斯巴登	Wiesbaden
威南塔斯	Venantus
威特金	Widukind
威特兰	Witlan
威尔	Werle
威特拉	Witla
威斯馬	Wismar
威堡	Viborg
威桑	Wissant
威尔士	Welsh
威尼西亚	Venetia
威森堡	Weissenburg

威拉·馬格那	Villa Magna
威塞尔河	Weser
威廉	William
威力巴德	Willibald
威尼斯	Venice
約翰·得·柏林	Jean-d'-Ibelin
約瑟发特	Josaphat
約但	Jordan
約克	York
約翰·得·馬里安	Jean-de-Mauri-enne
約伯	Job
約瑟福斯	Josephus
約但尼斯	Jordnes
柏德勒	Bedr
柏勒尼斯	Berenice
柏柏尔人	Berbers
柏立	Bury
柏舍琉	Besalu
柏尼瓦尔	Berneval
柏嘉特	Burchard
柏坦	B rtin
柏基	Bergues
柏格尔	Berger
柏吞	Burton
查尼邱兰	Janiculum
查士丁尼	Justinian
查士丁	Justin
查理曼	Charlemagne
查科拜教派	Jacobites
查克薩提	Jaxartes
查斯克	Jask
美因河	Main
美士谷	Mieszko
美拉	Malar
美哥	Mago
美因斯	Meinz
美黎达	Merida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美多克	Medoc
勃伦納山路	Brenner
勃兰登堡	Brandenburg
勃艮第人	Burgundians
俄亥俄	Ohio
俄勒崗	Oregon
俄特兰陀	Otranto
俄斯坦德	Ostend
契尔得柏特	Childebert
契尔柏立克	Chilperic
契尔得立克	Childeric
契維那	Chiavenne
契索尼斯	Chersonese
香宾一布里	Champagne-Brie
香宾	Champagne
恩斯河	Enns
恩斯堡	Ennsburg
恩諾狄阿斯	Ennodius
迦太基	Carthage
保林	Paulin
保加尔人	Bulgars
律特柏夫	Ruteboeuf
律伯克	Lubeck
英格尔亥姆	Ingelheim
英克曼	Inkerman
英哥尔夫	Ingolf
英諾森	Innocent
革拉苏	Crassus
革坡德	Gepids
洛尔夫	Rolf
洛塔列	Rothari
洛林	Lorraine
施奈德	schneider
施勒尼	Cyrene
叙拉古	Syracuse
突尼斯	Tunis
昆斯坦斯	Constans
南特	Nante
拜路·奥塞罗	Byelo Ozero

拜占廷	Byzantium
耶逊	Jason
耶路撒冷	Jerusalem
恆伯河	Humber
兹波斯	Tzibos
封特內	Fontenay
郇山	Mount Zion
柯尔曼	Kirman
柯托斯	Curthose
珀勒麼	Peremoum
珀茨	Pertz
珀琉細安	Pelusium
珀皮南	Perpignan
咸海	Aral sea

十 划

馬格那	Magna
馬朱斯	Majus
馬脫那斯	Maternus
馬克息馬斯	Maxmus
馬克森細阿	Maxentius
馬歇阿尔	Martial
馬賽	Marseilles
馬西利亚	Massilia
馬塞里納	Marcellinus
馬約林	Majoriun
馬尔巴赫	Marbach
馬斯·拉特立	Mas Latrie
馬科曼族	Marcomanni
馬德尔	Martel
馬扎儿人	Magyars
馬拉松	Marathon
馬卡斯	Marcus
馬洛斯	Maros
馬利亚	Malea
馬格斯	Margus
馬庫第	Macoudi
馬哥波罗	Marco polo
馬索斯	Massouth
馬西利欧	Marsilio
馬克立西	Makkrissi
馬格里布	Magrib
馬伦教派	Maronites
馬塞拉斯	Marcellus
馬飞阿	Mafia
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馬拉特勒	Malaterra
馬塞坎那斯	Marsicanus
馬太	Matthew
馬加特	Margat
馬馬斯	Mamas
馬利	Mary
馬立諾	Marino
馬格基奥	Maggiore
馬西諾	Massino
馬拿西	Manasseh
馬德堡	Magdeburg
馬斯特立希	Maestricht
馬康	Macon
馬伦海	Marlenheim
馬拉巴	Malabar
馬克兰	Makran
馬尔他人	Maltese
馬加多克索	Magadoxo
馬斯尔	Mussel
馬朱麻	Majuma
馬塞兹尔	Mascezel
馬拉加	Malaga
馬克	Mark
馬桑	Marcion
馬洛	Maro
特拉尼	Trani
特伦坎	Telemcan
特列茨	Trith
特鲁伏尔	Truvor
特累伏伦	Trevorum
特里尔	Trier
特累甫	Treves

特普力茨	Teplitz
特勒比遵德	Trebizond
特拉比左斯	Trapezos
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
特勒芬	Treffen
特息丰	Ctesiphon
特图良	Tertullian
特稜特	Trent
特拉西那	Terracina
特拉斯特維尔	Trastevere
特伦杰姆	Trondhjem
特德柏特	Theudebert
特罗杜	Trudo
特罗伊	Troyes
特林斯	Trins
爱索立安	Isaurian
爱奥尼亚海	Ionian Sea
爱索立亚	Isauria
爱斯图尔夫	Aistulf
爱达布	Aidab
爱里尼阿斯	Irenaeus
爱提安人	Aeduan
爱琴海	Aegean Sea
爱里尼	Irene
爱特立厄斯	Etherias
爱德华	Edward
爱科尼安	Iconium
爱丹普斯	Etampes
爱因哈德	Einhard
爱蒙	Aimon
爱斐尔	Eifel
爱尔福特	Erfurt
息塞克	Sziszek
息太耶伏	Scitarjevo
息普立安	Cyprian
息里內易卡	Cyrenaica
息杰尔米薩	Sidjilmessa
息斯脫西安	Cistercians
息坎米諾斯	Sycaminos
息烏特	Siut
息尼細阿斯	Synesius
息維力斯	Civilis
息多尼阿	Sidonius
息尼厄斯	Sineus
息立尔	Cyril
息立	Scyri
息米立亚	Cimmeria
息德那斯	Sydnus
息泽柏特	Sigebert
庫昔斯丹	Khuzistan
庫希斯坦	Kuhistan
庫尔德族	Kurdish
庫格勒	Kugler
庫尔德人	Kurds
庫太巴	Kutaiba
庫发	Kufa
庫拉雅特	Kurayyat
庫尔敦	Coulton
庫斐克	Cufic(Kufic)
庫尔兰	Kurland
庫曼人	Kumans
庫坦斯	Coutances
庫尔	Kur
庫波德	Kobad
庫兰杰	Coulanges
格列高里	Gregory
格累細亚	Gratian(Gratianus)
格拉斯吞柏立	Gladstonbury
格力斯坦	Gulistan
格罗內	Garonne
格罗	Gero
格伯特	Gerbert
格布哈	Gebhard
格兰特	Grant
格瓦达尔	Gwadur
格拉伯	Glaber
格陵兰	Greenland

格洛那	Grona
格勒諾布尔	Grenoble
格里馬第	Grimaldi
索謨河	Somme
索拉克特	Soracte
索格狄亚那	Sogdiana
索左門	Sozomen
索伦多	Sorrento
索非亚	Sophia(Sofia)
索伦尼斯	Solemnis
索哥德拉	Sokotra
索发拉	Sofala
索尔比那	Thorbunna
索尔斯坦因	Thorstein
索尔	Thor
索尔德亚	Soldaia
索瓦那	Sovana
索斯特	Soest
索来曼	Soleyman
烏格罗-宾尼克	Ugro-Binnic
烏馬那	Humana
烏得勒支	Utrecht
烏尔斯特	Ulster
烏耳赫尔	Urgel
烏尔班	Urban
烏斐格孙	Ufeigson
烏尔穆	Ulm
烏拉赫	Urach
烏斯特河	Oust
烏尔立喜	Ulrich
哥連德	Corrientes
哥摩罗	Comoro
哥得弗立德	Godefrid
哥拉森	Khorasan
哥尔兹	Gorze
哥斯拉尔	Goslar
哥尔馬耳	Colmar
哥特兰	Gothland
哥的克斯	Gothicus
哥尼留	Cornelius
哥尔杜巴	Corduba
哥尔多华	Cordova
涅雅西斯提亚	Neyasystya
涅拉	Nerra
涅格勒湃	Negrepont
涅微伊	Nervii
紐西亚	Nursia
紐伦堡	Nuremburg
紐弗勒特	Neauplette
紐斯的里亚	Neustria
班諾尼亚	Pannonia
班哥	Bangor
班堡	Bamberg
根特	Ghent
根达拉	Gandhara
埃匹非尼阿	Epiphanius
埃塞尔烏德	Ethelwold
埃尔-喀斯	El-kass
埃塞尔勒德	Ethelred
埃耳斯卢	Elsloo
埃斯令根	Esslingen
埃耳·馬第	El-Mahdi
埃耳·哈金	El Hakim
埃耳·雅苏里	El-Yazuri
埃耳·貝克里	El-Bekri
埃塔普尔	Etamples
埃利安諾尔	Eleanor
埃皮內	Epinay
埃耳柏兹	Elburz
埃麦萨	Emesa
埃东	Edom
埃波罗	Ebro
埃田	Etienne
埃皮克提特	Epictetus
埃肯巴德	Erkembald
埃提阿斯	Aetius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埃西	Isis

高摩达	Commodus
祖巴伊达	Zubaydah
高卢	Gaul
热勒斯·得·拉·弗龙德拉	Xerez de la Frontera
热那亚	Genoa
桑盖	Songhay
泰晤士河	Thames
泰巴喀	Thabaca
浦尔契亚	Pulcheria
修达	Ceuta
闪族(塞姆族)	Semites
盎格魯-薩克逊	Anglo-Saxon
哲佛	Gervais
秘魯	Peru
翁夫勒	Honfleur
朗格勒	Langres
朗基多克	Languedoc
倭丁神	Woden(Odin)
夏龙	Chalons
都納河	Duna
都尔內	Tournai
都柏林	Dublin
都尔	Tours
都兰斯	Durance
都拉索	Durazzo

十一划

第聶斯德河	Dniester
第勒尼安海	Tyrrhenian Sea
第聶伯河	Dnieper
第尔	Dill
第奥塔魯斯	Deiotarus
第阿罗得斯	Diarrhytus
第次	Dietz
第戎	Dijon
第尔廷安	Zeltinger
第薩耳本	Desarborn
第南特	Dinant
第厄普	Dieppe
第特馬	Thietmar
基尔賽	Kiersey
基耳得尔	Kildare
基輔	Kiev
基林	Geering
基云好人	Guillaume le Bon
基柏特	Guibert
基斯卡	Guiscard
基恩	Guienne
基泰	Gaeta
琉息安	Lucian
琉息坦尼亚	Lusitania
琉卡尼亚	Lucania
琉特法力德	Liutfrid
琉比契	Liubech
康波斯提拉	Compostella
康瑪其尼	Commagene
康諾得	Connaught
康拉德	Conrad
康边	Compiegne
康波斯特拉	Compostella
康华尔	Cornwall
勒尼尔	Renier
勒立克	Reric
勒米	Remy
勒敦	Redon
勒卡	Rakka
勒佐	Reggio
勒吉斯	Regius
勒赫	Lech
勒恩	Rennes
俾巴斯	Bibars
俾路支斯坦	Baluchistan
俾斯尼亚	Bithynia
俾替卡	Baetica
曼茲柏立	Malmesbury
曼西克特	Manzikert
曼苏拉	Mansourah

曼特斯图亚特	Mountstuart
曼麦琉克	Mamelukes
曼夫勒德	Manfred
曼利拉特	Manzalat
海濱蒙特里伊尔	Montreuil-Sur-Mes
海敦	Hayton
海伍德	Heywood
海派希亚	Hypatia
海基夫	Haguef
海耶	Hyeres
海洛尼馬斯	Hieronymus
海厄拉	Hiera
海德	Heyd
符茨堡	Wurzburg
符登堡	Wurtemburg
理查	Richard
理姆	Rheims
得拉夫·撒夫	Drave save
得比尔	Debil
得拉瓦河	Drave
累格納	Legnago
累根斯堡	Regensburg
密勒	Miller
莫三鼻給	Mozambique
盖羽	Guy
戚特魯克	Tschitluk
梵蒂岡	Vatican
培因斯	Bains
梭恩	Saône
崔格馬	Zeugma
納塞安曾	Nazianzan
納苏斯	Naissus
納穆提尔	Noirmoutier
陶利斯	Tauris
梯弗利斯	Tiflis
梅喀陵堡	Mecklenburg
梅斯	Metz
鄂列伦	Oleron
鄂斯曼	Othman
鄂图	Otto
鄂斯人	Osmen
鄂多	Odo
鄂多瓦	Odoacer(Odovacar)
鄂图·西克	Otto Seeck
菲坎普	Fecamp
菲利波利	Philippolis
菲力柏特	Philibert
菲利波波利	Philippopolis
萊茵河	Rhine

十二划

斯特德	Stead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斯瓦比亚	Swabia
斯特林加	Stellinga
斯諾斐尔尼斯	Snowfel ness
斯普呂根	Splugen
斯特累波	Strabo
斯达維洛特	Stavelot
斯图密	Sturmi
斯瓦比亚人	Swabian
斯路	Sluys
斯拉窝尼亚	Slavonia
斯达維洛特	Slavelot
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斯坦因	Stein
斯洛文人	Slovenes
斯奎拉斯	Squillace
斯多噶学派	Stoics
斯帕拉托	Spalato
斯特魯馬	Struma
斯皮斯	Spes
斯波萊陀	Spoleto
斯图加特	Stuttgart
斯底利哥	Stilicho
斯克拉維尼斯	Sclavenes

斯提里特斯	Stylites
斯摩稜斯克	Smolensk
斯維雅多斯拉夫	Svyatoslav
斯坦波尔	Stamboul
斯达布斯	Stubbs
斯巴达	Sparta
斯德丁	Stettin
斯拜尔	Speyer
斯塔特堡	Stadtberge
喀扎儿人	Khazars
喀波那里	Carbonari
喀姆布莱	Cambrai
喀山	Kazan
喀他基那	Cartagena
喀罗林朝	Carolingian
喀尔巴阡山	Carpathian
喀拉布里亚	Calabria
喀什葛尔	Kashgar
喀布尔	Kabul
喀大尼亚	Catania
喀拉	Kalah
喀拉科崙	Karakoram
普勒孟斯特拉派	Premonstratensians
普立息力安派	Priscillianists
普拉克息特利	Praxiteles
普林尼	Pliny
普洛巴斯	Probus
普力斯克斯	Priscus
普里珀特	Pripet
普里穆斯	Plymouth
普洛科匹阿	Procopius
普丁格	Peutinger
普提奥利	Puteoli
普弗賴姆特	Pfreimt
普薩尔蒙第	Psalmondi
普非斐斯	Pfavers
提貝易德	Thebaid
提阿非罗	Theophilus
提奥多里塔斯	Theodoretus
提庇里亚	Tiberias
提罗尔	Tyrol
提庇留	Tiberius
提尼斯	Tinis
提維尔茨	Tivertzy
提尔	Tiel
提比里	Thibery
提罗安尼	Therouanne
提兹河	Tees
提斯諾	Ticino
喜拉尔	Hilaire
喜尔得加德	Hildegarde
喜尔杜因	Hilduin
喜尔得珊	Hildesheim
喜尔达	Hilda
喜尔得布兰	Hildebrandine
喜坡	Hippo
喜斯特里亚	Histria
黑林	Schwarzwald
黑森	Hesse
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斐立柏特	Philibert
斐西尔	Fisher
斐拉腊	Ferrara
斐加那	Ferghana
斐贊	Fezzan
斐林	Phelim
雅洛斯拉夫	Yaroslav
雅兹德	Yazd
雅庫比	Ya'Kubi
雅利安	Aryan
雅穆斯	Yarmouth
腓力	Philip
腓力伯特	Philibert
腓尼基	Phoenician
腓利	Phile
腓特烈	Frederick
凱尔特	Celt

凯撒利亚	Caesarea
凯撒	Caesar
凯法斯	Caiphas
凯希	Keish
凯奥斯	Chios
凯密	Kemi
凯提尔	Ketil
凯司湼斯	Caithness
溫契尔西	Winchelsea
温达瓦	Windawa
溫德族	Wends
彭巴	Pemba
彭坦波里斯	Pentapolis
彭布魯克郡	Pembrokeshire
彭替安	Ponthieu
彭特－奥德麦	Pont－Audemer
彭太里尔	Pontarlier
彭提昂	Ponthion
彭廷	Pontine
彭特·西斯陀	Pontesisto
彭他兹	Pontoise
費拉得尔菲亚	Philadelphia
費勒拉	Ferrara
費勒罗	Ferrero
費兹	Fez
費里厄	Ferriers
湯克勒德	Tancred
森杰	Sanj
路列克	Rurik
博斯普魯斯	Bosporus
景教的	Nestorian
舒尔茨	Schultze
班諾尼亚	Pannonia
督伊德教徒	Druid
渾斯特列克	Hunsdruck
登尼斯	Denis
隆城	Laon
賈耳斯	Giles
富耳奇	Fulcher
塔布里士	Tabriz
塔斯太	Tustar
塔巴里斯坦	Tabaristan
塔斯	Tus
塔拉哥納	Tarragona
塔拉科那	Tarragona
塔拉	Tara
塔什干	Tashkent
塔非勒特	Tafilet
塔那	Tana
塔斯邱兰	Tusculum
塔明斯	Tamins
塔图塞	Tartusi
塔普薩斯	Thapsus
塔喀普	Tacape
塔里法	Tarifa
塔貝那	Tabenna
塔苏斯	Tarsus
塔西佗	Tacitus
塔里夫·伊宾·馬力克·阿布左拉	Tarif Ibn Malik Abuzura

十三划

奥哈拉斯	O'Haras
奥克里斯	O'Kellys
奥康諾	O'Connors
奥法勒尔	O'Farrells
奥托尔斯	O'Tooles
奥頓諾基斯	O'Donoghues
奥德威尔斯	O'Dwyers
奥康尼尔	O'Connells
奥馬兹	Ormuz
奥斯替亚	Ostia
奥伊亚	Oea
奥尔良	Orleans
奥索尼	Oszony
奥登堡	Oedenburg
奥尔索瓦	Orsova
奥尔比亚	Olbia

奥弗斯	Orpheus
奥赛阿	Osius
奥赛烈司	Osiris
奥得	Oder
奥米耶	Ommeyad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奥斯特拉西亚	Austrasia
奥古斯都	Augustus
奥俾內	Aubigny
奥科伦喀斯	Oxyrhyncus
奥舍耳	Auxerre
奥赛靡	Osimo
奥格斯堡	Augsburg
奥林拜杜魯斯	Olympiodorus
奥微亚托	Orvieto
奥得里克	Orderic
奥达尔	Oudalle
奥舍尔	Orcher
奥伦治	Orange
奥热	Ogier
奥列格	Oleg
奥伦梯河	Orontes
奥伦	Oran
奥瑪	Omar
奥綸河	Orne
奥拉	Aura
奥汾涅	Auvergne
奥杜卡斯特	Audoghast
奥索尼阿斯	Ausonius
奥东	Autun
奥頓涅尔	O'Donnells
奥尼尔	O'Neils
奥杜格尔多斯	O'Doughertos
奥汉隆斯	O'Hanlous
奥古斯大	Augusta
奥勃	Orbe
奥克尼	Orkney
奥拉夫	Olaf
奥德	Odd
奥特	Auth
奥里腊克	Aurillac
奥布	Aube
奥法	Offa
奥麦	Omer
奥柏普法茨	Oberpfaez
奥斯那布律克	Osnabrück
奥登瓦尔得	Odenwald
奥尔騰	Olten
奥理略	Aurelius
奥利連	Aurelian
塞芬	Cevennes
塞提斯	Syrtes
塞易斯	Sais
塞斯坦	Seistan
塞亚那	Siena
塞維立那	Severinu
塞第卡	Serdica
塞拉匹	Serapeum
塞維林	Severin
塞普替密斯	Septimius
塞弗拉斯	Severus
塞塔	Cirta
塞琉細亚	Seleucia
塞拉皮斯	Serapis
塞納河	Seine
塞維尔	Seville
塞普頓	Septem
塞兰克曼	Szlankamen
塞尔維亚人	Serbs
塞琉息兹	Seleucids
塞普替默	Septimer
塞普替美尼亚	Septimania
塞列堡	Seleburg
塞巴洛	Cembalo
塞科	Cerco
塞替斯	Syrtis
塞內加尔河	Senegal
塞尼山	Mont Cenis

塞汶	Severn
塞諾波斯	Seignobos
塞尔柱	Seljuk
雷拿德	Rainard
雷因	Lane
雷	Ray
雷朗	Lerins
雷苏	Lezoux
雷翁	Leon
雷普提斯	Leptis
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新基德納姆	Singidunum
新辛納图	Cincinnatus
新普伦	Simplon
路求·阿夫立加那	Lucius Africanus
路求·派索	Lucius Piso
路恩林根	Ruemlingen
瑟塞尔	Schesel
瑟拉拉特	Sherarat
瑟林吉亚	Thuringia
頓尼尔	Donnel
歇拉茨	Shiraz
詹姆士	James
瑙謨堡	Naumburg
蓝伯特	Lambert
蒙特·卡西諾	Monte Cassino
蒙特皮列	Montpellier
蒙托留	Montolieu
蒙斐拉	Montferrat
蒙巴薩	Mombasa
蒙西諾尔	Monsignor
蒙特	Monte
蓬眞	Bondjer

十四划

赫尔逊	Kherson
赫伊	Huy
赫斯斐尔德	Hersfeld
赫布里底群島	Hebrides
赫洛茨威撒	Hrotswitha
赫斯塔尔	Heristal(Herstal)
赫芒达列	Hermunduri
赫茹里	Heruli
赫斯珀立第	Hesperides
赫勒斯滂	Hellespont
赫諾提康	Henotikon
赫勒納	Helena
赫尔馬茨	Hurmuz
赫拉特	Herat
赫尔文	Hulwan
赫力阿斯	Helias
赫摩茲	Hurmuz
維希哥罗得	Vyshegorod
維罗那	Verona
維斯帕西安	Vespasian
維那西姆	Vimnacium
維塔利	Vitalis
維里哈道	Villehardouin
維密那西	Viminacium
維克多	Victor
維遜肖	Vesontio
維尼德人	Veneds
維奇亚	Vecchia
維发那	Vervaina
維提奇夫	Vitichev
維格佛遜	Vigfusson
維斯比	Wisby
維特列·勒·弗朗斯瓦	Vitry-le-Francois
維吉尼亚	Virginia
維特力阿斯	Vitellius
維斯杜拉河	Vistula
維多利亚	Vitoria
福图內塔斯	Fortunatus
福斯	Fos
福馬薩斯	Formosus
福察姆	Forcheim
福伊克斯	Foix

福斯塔特 Fostat
福細阿斯 Photius
福吉尔斯堡 Vogelsberg
瑪恩河 Marne
瑪納 Marnay
瑪摩拉海 Marmora
瑪喀比 Maccabees
瑪戴特人 Mardaites
瑪約里安 Majorian
瑪的尔达 Matilda
豪薩 Hausa
豪特維尔 Hauteville
豪兰 Hauran
魁罗阿 Quiloa
魁德林堡 Quedlinburg
魁迪 Quadi
盖塞立克 Gaiseric
慕尼黑 Munich

十五划

摩拉瓦 Morava
摩尔道 Moldau
摩里士 Maurice
摩塞耳河 Moselle
摩利亚 Morea
摩洛哥 Morocco
摩德拿 Modena
摩尔孟提 Molmenti
摩雷斯姆 Molesme
摩苏尔 Mosul
摩尔克 Molk
摩里得尼亚 Mauritania
摩敦 Modon
摩洛克 Moloch
摩勒斯 Maurus
摩尔 Maur
摩拉維亚人 Moravians
摩城 Meaux
德里納 Drina
德尔朋 Derbend
德維納 Dvina
德摩比利 Thermopylae
德拉倍泰 Therapeutai
德尔莫德 Dermod
德里佛斯 Treves
德文特 Dventer
德的摩尔 Detmold
德勒 Dreux
德里 Delhi
德兰索西阿那 Transoxiana
撒夫 Save
撒哈拉 Sahara
撒加利 Zachary
撒馬利亚 Samaria
撒地尼亚 Sardinia
撒狄卡 Sardica
撒摩撒达 Samosata
撒列諾 Salerno
撒馬尔罕 Samarkand
撒罗門 Salomon
墨累 Murray
墨洛溫朝 Merovingians
墨士卡特 Muskat
墨西拿 Messina
魯吉兰 Rugiland
魯伯特 Rupert
魯佛斯 Rufus
魯息雍 Rouissillon
黎巴嫩 Lebanon
黎舍尔 Richer
黎契尔德 Richilde
潘提昂 Pantheon
察柏斯 Chappes
蕃那哥立亚 Phanagoria

十六划

諾米諾 Nomeroe
諾曼底 Normandy

諾夫哥罗得	Novgorod
諾德豪森	Nordhausen
諾干	Nordgan
諾森伯兰	Northumberland
諾瓦拉	Novara
諾根特	Nogent
諾耳馬	Norma
諾立克	Noric(Noricum)
諾威巴薩	Novi-Bazar
諾拉	Nola
諾維細安	Novatian
諾立坎	Noricum
霍耳斯頓	Holstein
霍里奇	Horich
霍克海默	Hochheimer
霍恩	Horn
霍姆斯	Homs
霍耳狄奇	Holdich
霍比斯特斯	Hoeppestus
霍勒斯	Horace
霍里亚	Horrea
霍姆加尔德	Holmgaard
霍治金	Hodgkin
霍亨士堡	Hohensyburg
霍密斯达	Hormisdus
霍亨斯陶芬	Hohenstaufen
霍挪留	Honorius
錫倍德	Shepherd
錫兰	Ceylon
賴肯哈尔	Reichenhall
賴赫瑙	Reichnau
賴納赫	Reinach
穆斯喀特	Muskat
穆拉托里	Muratori
穆卡达塞	Mukaddasi
穆薩	Musa
鮑索里	Pozzuoli
鮑彻	Bouchier
鮑多	Bauto
鮑威尔	Powell
錢伯里	Chambery
錢馬維安人	Chamavian
薛西斯	Xerxes
澤耳	Zel

十七划

賽那	Sinai
賽伊尼	Syene
賽維立安	Syevryane
謝特兰	Shetland
謝巴	Sheba
謝尔德河	Scheldt
戴奥斯邱里亚	Dioscurias
戴奥多拉斯	Diodorus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十八划

薩利安	Salian
薩罗尼卡	Salonika
薩米士基得斯达	Sarmizegetusta
薩克逊	Saxon
薩罗尼加	Salonika
薩巴	Saba
薩伏衣	Savoy
薩波拉特	Sabracte
薩薩尼朝	Sassanid
薩拉密斯	Salamis
薩卑尼那斯	Sabinianus
薩卑那姆	Sabinum
薩拉森人	Saracens
薩拉	Zara
薩尔維	Salvian
薩拉坎谷	Saracanco
薩来	Sarai
薩皮拉	Sapera
薩第	Sadi
薩拉哥撒	Saragossa
薩基塔	Sagetta

薩里	Sari
薩浦尔	Sapor
薩利納	Salina
薩紐杜	Sanudo
薩拉丁	Saladin
薩摩	Samo
薩尔斯堡	Salzburg
薩特	Sarthe
繆司河	Meuse

十九划

瀾河	Lahn